





脫軌的革命

既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能直面毛澤東的時代，並給出一個詳盡、坦率的評價，這一工作只能留待斯坦福大學一位傑出的學者替他們完成。……對於想要考察共產主義中國的歷史學家來說，本書可以在許多研究課題上提供思路。而魏昂德的目標讀者是大學生以及有想法的一般讀者。就此而言，未來很長時間內將難以出現堪與本書媲美的作品。

——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1930–2019)

哈佛大學 Leroy B. Williams 歷史學與政治學講座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原主任

本書對關於毛澤東中國的眾多著作以及魏昂德本人可觀的社會學研究做了精妙總結。他將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政治史與對共產黨組織特徵的細緻觀察結合起來，以此揭示毛澤東的初衷為何常常帶來災難性的結果。在作者看來，毛澤東是「擁有狹隘、落後的觀點且武斷的領導人」。類似的深刻判斷在書中俯拾皆是，它們無疑會激起爭議，然而最終很可能為人們所贊同。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榮休教授

具有非凡智慧的人才能寫出這樣一本書。魏昂德或許藉由《脫軌的革命》進行了一場冒險，以探索一種全新的社會學敘事，在這種敘事風格下，制度特點或者運轉機制並不決定歷史，而是融入形形色色的歷史事件之中，共同塑造動態的歷史進程。對於想瞭解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讀者來說，這大概是近年最出色的一部著作。

——趙鼎新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

這部深具洞察力的著作出自一位致力於共和國研究的傑出美國歷史社會學家之手。為錯綜複雜到令人目眩的眾多事件提供了公允、審慎的論述，經驗數據無比扎實，分析精妙老練。如果閱讀確實是一切學問的基礎，那麼，要了解為什麼 1949 年之後毛澤東的期待幾乎無一實現，以及他留下的遺產為什麼如此具有爭議，你就需要讀這本書。

——沈邁克 (Michael Schoenhals)

隆德大學語言與文學中心教授

中國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為何在晚年「脫軌」，發動一場又一場瘋狂的革命，從而背離了他和他的同志們復興中華民族的雄心壯志？《脫軌的革命》對相關的結構起源和制度發展提供了豐富、詳盡的分析。……本書應當成為專家的必讀作品，和從事比較研究的學者的可靠指南。它的引人入勝也將打動學界之外的一般讀者。

——齊慕實 (Timothy Cheek)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堪稱一部有關當代中國歷史的創新之作。它以國際比較的理論視野和深入扎實的實證研究，令人信服地解釋了毛主義的歷史局限及其在中國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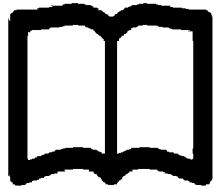
——董國強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魏昂德令人信服地向我們展示了毛澤東時代的不平等如何依舊形塑著當今中國……許多人會（因這本書）大受啓發，（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則會引起悲鬱的回憶）。

——《旁觀者》(The Spectator)

魏昂德對於毛澤東掌權的時代的描述富有細節、嚴密複雜且充滿力量……到底是什麼使得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願意跟隨毛澤東的指示，最終發起了一場對他自身政黨的內戰？毛澤東與廣大人民之間的關聯還有許多待解的部分需要我們去探索，而當我們試圖去理解這種關聯時，魏昂德的書將會是絕佳的選擇。清晰、精準、對於細節的令人驚嘆的嚴謹，這本書是對於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場革命的全面評價。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脫軌的革命

##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著 閻宇 譯



中文大學出版社

《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魏昂德 著

閻 宇 譯

繁體中文版 © 香港中文大學 201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88-237-127-9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mailto: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http://www.chineseupress.com)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in Chinese)

By Andrew G. Walder

Translated by Yan Yu

Copyright © 2015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237-127-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mailto:cup@cuhk.edu.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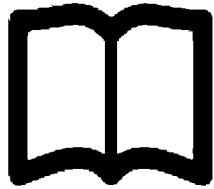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http://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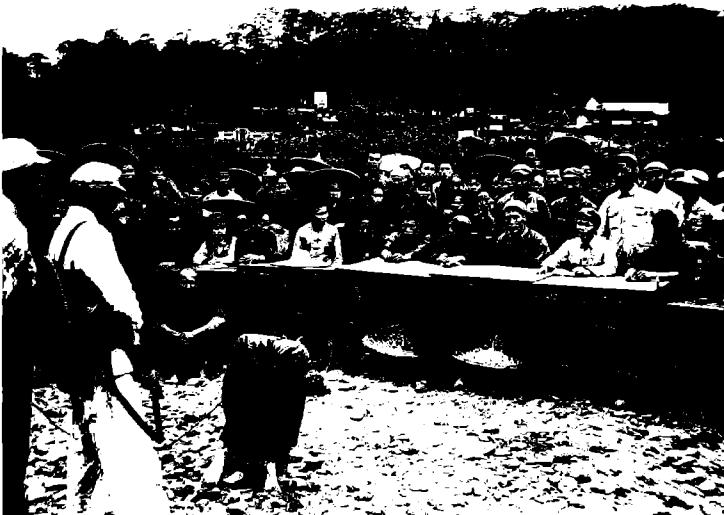


獻 紿

**Richard M. Pfeffer**  
(1937–2002)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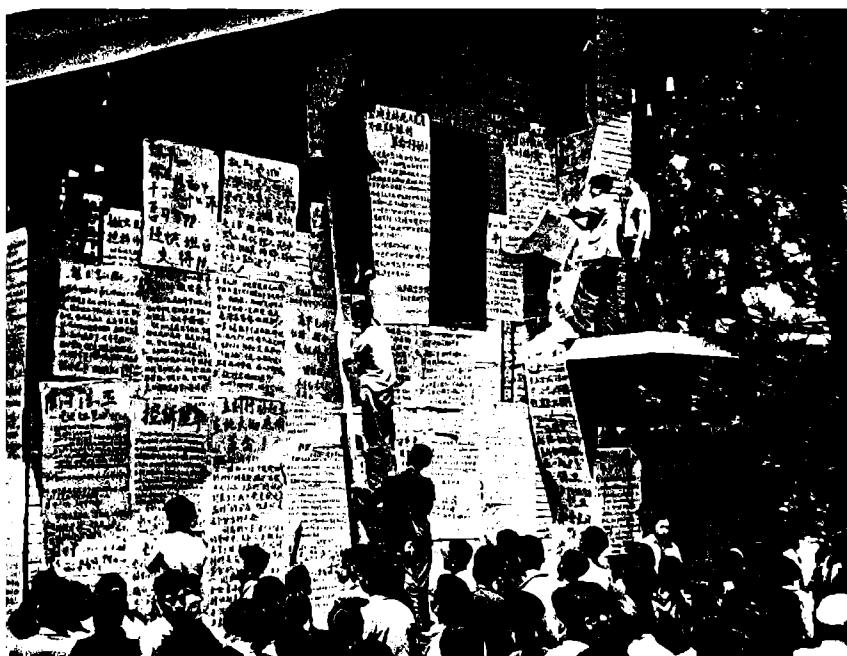
1952年土地改革。在廣東省佛岡縣，農民因擁有四畝土地被打成「惡霸地主」，被判死刑。(© Bettmann/CORBIS)



1952年土地改革。在廣東省佛岡縣，一名「惡霸地主」在判刑後立刻被槍決。(© Bettmann/CORBIS)



1965年5月12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黑龍江省阿城縣，一名「富農」被批鬥，被判兩年勞改。(© Li Zhensheng / Contact Press Images, from *Red-Color News Soldier*, Phaidon, 2003)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大學裏的大字報。(China Pictorial, November 1967)



1966年8月26日，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在批鬥大會上被批鬥，臉上被塗了墨水。(© Li Zhensheng / Contact Press Images, from *Red-Color News Soldier*, Phaidon, 2003)



1966年8月29日，黑龍江省省長的妻子在批鬥大會中。(© Li Zhensheng / Contact Press Images, from *Red-Color News Soldier*, Phaidon, 2003)



1968年4月5日，哈爾濱市郊，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兩名被判死刑的「反革命集團」分子即將被槍決。(© Li Zhensheng / Contact Press Images, from *Red-Color News Soldier*, Phaidon, 2003)



1968年4月5日，哈爾濱市郊，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群因政治罪被判死刑的人遭到槍決。(© Li Zhensheng / Contact Press Images, from *Red-Color News Soldier*, Phaidon,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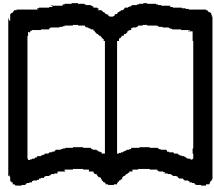
1968年7月18日，廣西省南寧市，在從「四二二」造反派手中奪取城市控制權的軍管行動中着火的建築。(New Century Press, Hong Kong)



1968年8月5日，南寧市，「四二二」成員集體投降。(New Century Press, Hong Kong)



1968年8月初，「四二二」成員投降之後在南寧街頭被就地處決。(New Century Press, Hong Kong)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目 錄

中文版序 .....	xix
序言 .....	xxi
第1章 國家葬禮 .....	1
第2章 從運動到政權 .....	15
第3章 農村革命 .....	43
第4章 城市革命 .....	65
第5章 社會主義經濟 .....	85
第6章 共產黨制度的發展 .....	105
第7章 解凍和反彈 .....	127
第8章 大躍進 .....	159
第9章 邁向文化大革命 .....	187
第10章 斷裂的造反 .....	207
第11章 瓦解和分裂 .....	239

第12章 軍事管控 .....	271
第13章 不諳之音與異見之人 .....	295
第14章 回望毛時代 .....	323
參考文獻 .....	351
索引 .....	377

## 中文版序

我很高興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的中文版現在可以讓大中華地區更多的讀者讀到。這本書提煉了我三十多年來關於毛時代中國社會的研究和教學成果。中國近現代革命是現代史上最為重要的社會革命之一，而由毛澤東擔任領導人的這一歷史時期，構成了這一系列社會革命的最終階段，並在許多意義上都可以說是達到了激進的高潮。這段時期不僅僅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至關重要，並且對於整個世界歷史來說都意味着一次重大的發展。

1980年代初我剛剛開始教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時，我的課堂上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是美國人。幾十年之後，我的課堂上滿是渴望獲取關於這一歷史時期知識的中國學生。他們常常告訴我中國高中的歷史教科書是怎樣輕描淡寫地略過了這一歷史階段，而本該詳細探討這一歷史時期的相關課程在大學課程體系中也是缺位的。我的這些學生意識到毛時代發生了對於中國歷史來說至關重要的大事，並且急切地渴求更加詳細和深入地了解這段歷史。

這本書並不是對於歷史的簡單敘述，也不是對於毛澤東本人的詳細研究，儘管它們確採取了敘事的形式，並不可避免地把毛澤東放置在敘述的中心。這是因為毛澤東在這一整個歷史階段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於如果我們將他的動機和行動從敘述中抹除，講清楚這些歷史事件的模式將會變得非常困難。從根本上說，這本書是一項社會學分

析，考察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新建立起來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及這些結構如何制約、擴大和改變了毛澤東所推行的諸多舉措。本書的核心議題，是毛澤東發動的包括百花運動、大躍進以及文革運動的各個階段的結果都與他本人原初的預期不同，這一落差迫使他不得不經常性地對他的方針與路線做出調整。本書的潛在議題，則在於毛澤東作為一位強有力的政治領袖，是如何帶領着他的政黨在1949年取得了非凡的勝利，卻又隨後在1950年代在新的社會結構面前遭遇種種制約與挫折。

本書分析的核心，是毛澤東與1950年代直接從蘇聯全盤複製過來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持續鬥爭。與其他20世紀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截然不同的是，毛澤東向這些國家建立新形式的官僚主義統治與不平等的普遍趨勢提出了挑戰。他在1960年代中期決定發動一場對抗這種官僚主義統治結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這在整個現代社會主義發展歷史上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膽激進的舉措。按照毛澤東自己的標準，並且他自己也承認，文化大革命最終沒有能夠達到他預設的目標，卻給他的繼承者們留下了如何將蘇聯模式的普遍性與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特殊需求相協調的難題。最終，毛澤東的繼任者們領導着中國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本書的讀者將會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這一轉折對於中國以及中國人民來說是多麼地幸運。他們也可能會意識到，在某些方面，中國依舊在持續解決着1950年代蘇聯體制所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

# 序 言

xi

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前25年充滿了動盪和災難，這一政權展現出極端的施政風格，造就了獨特的革命階段。這段時期無疑被打上了毛澤東的烙印，縱觀世界近代史，毛牢牢地掌控着自己的時代，力度不亞於任何其他領袖。以毛澤東為絕對核心的領導集體做出各類決策，可結果卻往往適得其反，給民眾帶來災難性創傷。隨着新的史料被不斷挖掘出來，一系列新的研究著作近來相繼出版，釐清了中共高層領導人在這一過程中變化的人際關係和激烈的政治分歧。本書將借鑒這些研究成果，但更關注這些領導人在此之前做出的一系列決策，而這些決策在毛澤東時代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思。同時，以此建立起的組織體系成為中國革命領袖用來強化管理紀律和確保政令實施的工具，成為紅色新中國的核心特徵。

有兩大組織架構至關重要：其一是共產黨組織體系，嚴格約束着廣大黨員，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其二是從蘇聯借鑒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給許多複製該模式的國家造成了一系列問題。中國的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從北京發出指令，這些指令通過政治和經濟兩大架構傳至地方各級，雖然達成了最初預想的偉大成就，卻也導致了意料之外的災難後果。撰寫此書時，我始終將這一信念牢記在心：必須先了解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環境和政治體系在1950年代的變化趨勢，這樣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共高層尤其是毛澤東本人的決策制定和施政成果。而這些客觀

xi

的組織架構其實並不利於落實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政策設計，甚至常常引起戲劇性的動盪和災難性的後果。雖然本書大部分內容都以敘事文本的形式展開，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以社會學的視角思考問題。

這一時期的社會環境與經濟體制造就了獨特的政治體系，依靠龐大的官僚體系和嶄新的社會結構，中央決策得以實施。然而，高層政令在傳達的過程中往往不是被誤解歪曲就是被過度解讀，結局總是出乎領導人的預料。權力的集中和嚴格的紀律賦予了中共看似強大的力量，但也埋下了弱點和隱患。對毛澤東本人及其支持者來說，幾乎所有舉措都沒有按照預期的路線發展，結局常常出人意料，後果令人難以接受。可以說，毛澤東的大部分舉措最終都適得其反：其原因究竟在哪裏？

中國的社會特徵與西方世界有着天壤之別，實際上，到共產主義統治的前十年結束時，中國社會與過去相比較也已經全然不同，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若想理解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如此狂熱地投身到這個時代的運動和衝突之中，我們就必須首先了解包括領導幹部和普通民眾在內所有人工工作和生活的社會和組織背景。這一點對於今天來說特別重要：中國生機勃勃的市場經濟已逐漸融入全球資本主義之中，當時的社會特徵現在幾乎已經難覓蹤跡。在本書中，我希望能闡明以下觀點：在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實際上是社會制度的外化表達，這些制度成型於中共建立統治後的第一個十年，是講述毛澤東時代故事的核心線索。

1973年，當我作為一名本科大三的學生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上第一節當代中國的課時，這本書的主題仍然非常模糊，只是關於一個封閉孤立政權內一系列事件的臆想。1983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第一次教這門課的時候，我稱之為「後革命時代的中國社會」(post-revolution Chinese society)，講述1949年共產黨奪得政權、建立新中國後所創造的新社會。在後毛澤東時代已經結束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那個時代的大部分經濟與社會痕跡已經在市場改革的浪潮下消失殆盡，但政治架構基本得以保存。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溯歷史，有一點非常清楚，1949年其實不是中國革命的結束，而是社會變革的真正開端，之前的游擊戰爭和國共內戰僅僅是樂曲的前奏。

本書描述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內容凝聚了我三十多年來研究的成果和教學的心得。我以有選擇性的敘事手法講述了這一時期的歷史，作為社會學家，我也深切關注政治和經濟因素——尤其是政治權威的基礎、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社會的不平等、政治衝突和民眾的抗議運動。當然，還有其他關於毛時代的中國的敘述方式也令人信服，但不是我在本書中所要採用的寫作方式。

我過去有關中國的研究，針對的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術界讀者。這些著述基於對其他研究的批判性解讀，強調作者的概念性框架、新穎原始的資料來源及分析模式。遺憾的是，這種風格對於學術圈之外的人來說閱讀起來非常枯燥晦澀。而這本書極大地借鑒了我的研究和多年來所閱讀到的優秀同行們的著作，而並不主要旨在面向專家。我試圖整合自己對中國這一歷史階段的了解，以一種既能適合學術圈交流、也能讓普通人讀懂的方式去寫作。

在學術上和在制度上我都受益良多。在學術上的受益不勝枚舉，特別是在我自己研究領域之外的主題，需要大量借鑒和援引同儕們的研究和著述。在引用時我盡可能清楚地注明來源，對同一作者引用次數越多，就表明這些作品對我的啟發越大。我在這裏要尤其感謝白思鼎 (Thomas Bernstein)、戴慕珍 (Jean Oi)、Dwight Perkins 和沈邁克 (Michael Schoenhals)，他們對本書的全部或部分草稿給出了寶貴意見。我還要感謝我的合作者和合著者——南京大學歷史系的董國強教授。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幾章裏，我引用了我們合作發表的研究成果。本書遞交出版前，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圖書館的 Nancy Hearst 幫我審訂了最終的書稿。在過去的近 20 年時光裏，斯坦福大學為我提供了理想的知識家園。我特別感謝斯坦福大學 Freeman-Spogli 國際研究所、人文科學學院和 Shorenstein 亞太研究中心慷慨的研究經費支持。在研究和寫作的最後階段，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為我提供了舒適的環境，讓我完成了本書大部分章節的起草。我還要感謝我在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 Michael Aronson，這本書和我其他的項目非常不同，我要感謝他對這個項目的支持和鼓勵。

本書的出版標誌着一段旅程的結束，這一漫長的旅途起始於1973年9月，在巴爾的摩的一間教室裏，我的本科導師Richard M. Pfeffer講授的課程名為「中國政府與政治」。Richard是一位堅定的反戰積極分子和中國問題專家，曾作為首批美國代表團成員訪問中國。他對聲勢浩大的文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他也深刻了解在一個紀律嚴明的革命組織中權力的濫用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而社會主義的官僚獨裁體系存在難以根除的問題。同時，Richard也是一個充滿激情又要求嚴格的老師，他孜孜不倦地要求學生去批判地審視包括自身觀點在內的所有論述，對學生的論文展示出無微不至的細心，會在每頁空白處寫上大量的批註，其中不乏犀利的評論，無情地指出偷懶糊弄或是邏輯錯誤的地方。他也是一位給予學生支持和精神滋養的導師，特別是當你開始走上研究正軌的時候。在此之前，我的本科課程顯得很乏味；但那之後，一切突然開始變得清晰明朗。Richard的教學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他的開蒙之恩，我永遠無法奢望去回報。謹以此書獻給Richard，深表懷念之情。

# 第1章

## 國家葬禮

1976年9月18日下午3點，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站滿了一排排衣着整齊的工人和士兵。他們沉默不語，低頭默哀。當時，中國已有接近10億人口，人們自發在廣場、村莊、工廠、院校和各單位組織起一場全國範圍的緬懷活動。毛澤東已於九天前逝世，享年82歲。人們根據事前的安排各自站好，低下頭默哀三分鐘。毛澤東的指定接班人是當時名氣並不大的華國鋒。紀念儀式上，華國鋒的致辭充滿了對已故國家主席的溢美之詞。毛澤東自1930年代早期就領導中國共產黨，並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全面主導了國家事務。黨的領導集體莊嚴地站成一排，旁人看來一片團結景象。

然而，這種表面上的團結在10月6日就開始破裂，華國鋒對毛澤東生前的激進派追隨者動手了。他與其他黨內高層秘密商議，命令其安保人員抓捕毛澤東的核心政治盟友。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她的居所被抓，而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被告知要參加一次高層會議，當他們陸續抵達時，驚慌失措的三人被武裝警衛一個接一個地帶走並拘禁起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幾人對毛澤東鞍前馬後。十年浩劫讓中國政權癱瘓，經濟衰退，受迫害和死難者達到數百萬之眾。被抓捕的四人都是當時中共十六人政治局的成員，參與黨和國家核心政策的制定，而王洪文和張春橋更是位列政治局常委，分別排名第二和第四。不久，四人被定性為「四人幫」，被指控犯下反革命顛覆罪行。而事實上，他們所做的其實只

是在毛澤東在世時完成他的指令。在去世時，毛澤東依然是革命正當性的象徵，但這是一場直接針對其政治遺產的核心要素的政變。四人幫的幕後主導恰恰是毛澤東自己。

27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55歲的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着人群莊嚴宣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人們相信，長達一個世紀的經濟蕭條、政治動盪、外強入侵、殖民侵略和血腥內戰終將過去。20世紀上半葉的絕大多數時間裏，中國可謂是一個失敗的國家，希望建立憲政共和卻慘遭失敗，留下千瘡百孔。<sup>1</sup>而在這之前的半個世紀裏，中國則是一個失敗的多民族帝國。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滿清)於1644年建立，在18世紀達到繁榮頂峰，但是卻在19世紀後期走向衰敗，同時面臨着大範圍內部叛亂和外強入侵。<sup>2</sup>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歷史意義並不在於無產階級打敗了資產階級，也不在於共產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其真正的歷史意義在於：新中國的成立標誌着一個能夠參與世界政治競爭、抵禦外部侵犯的現代中國的崛起。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第一次能夠有效地管轄自身領土，保證邊境安全，並擁有了處置小範圍內部叛亂的能力。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管理中國社會中農村和城市事務的不再是鄉紳士族，而是領薪水的國家官員。這些官員都是國家層級政權的組成部分，由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有效領導，並將政令傳達至最基層的普通大眾。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也將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視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一部分。而更深層面上，這標誌着中國第一個現代國家的誕生。

過去的一個世紀則不堪回首。1950至1864年的太平軍起義聲勢浩大，在十多年間波及清朝東南部四分之一的國土，起義建立了太平天國，在它的興衰過程中戰亂頻仍，奪走了超過2,000萬人的性命。<sup>3</sup>羸弱的滿清政府不僅要鎮壓地方叛亂，還在多場反抗外強的戰爭中屢屢失利。1900年，以抗擊外侮為旗幟的義和拳運動爆發，儘管義和拳組織受

<sup>1</sup> Nathan (1983), Wilbur (1983).

<sup>2</sup> Kuhn (1980), Rowe (2009, 149–296).

<sup>3</sup> Kuhn (1978), Platt (2012), Spence (1996).

到清廷支援，卻仍舊在殖民國家的聯盟前敗下陣來，滿清政府從此一蹶不振。<sup>4</sup>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看似以較為溫和的方式結束了帝制，實質上只是為早已奄奄一息的清王朝畫上了一個名義上的句號。<sup>5</sup>

人們試圖建立一個現代化的中國，然而很快就失敗了。在國家議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了勝利。宋教仁是該黨的創始人，在選舉勝利中功不可沒，卻在之後不久被人暗殺。幕後主使是袁世凱，此人作為曾經的清政府官員，正欲謀求自身的獨裁統治。<sup>6</sup>中國很快四分五裂，在地方割據和軍閥對抗中成為一盤散沙。<sup>7</sup>1920年代，兩大革命政黨尋求聯合，希望以武力手段重新匡扶中國：一方是中國國民黨，由孫中山和蔣介石先後領導；而另一方是中國共產黨，最終由秉持激進主義的湖南游擊領袖毛澤東領導。在1920年代中期，國共兩黨精誠合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共產黨宣導的社會革命讓國民黨內的有產階級政治精英們惶恐不已，國共合作很快破裂，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的一場旨在清洗共產黨人的閃電突擊行動中，數以千計的人遭到處決。<sup>8</sup>

血腥的國共衝突持續了十多年之久，共產黨在1930年代中期幾乎被全數剿滅。而此時，命運的天平突然受到外部干擾：日本軍國主義入侵，於1931年全面佔領了東三省（滿洲里）並在1937年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國民政府剛剛建立就遭到巨大衝擊，國家滿目瘡痍，大約1,200萬人死於非命。<sup>9</sup>

1945年，美國分別在長崎和廣島投下原子彈，日本投降，短暫的喘息之後，全面內戰爆發。國民政府在戰時遷往位於西南腹地的陪都重慶，此時緩過氣來，將矛頭掉轉，直指在抗戰中發展壯大的共產黨。在對日作戰中，共產黨在中國北部持續進行着小規模地下抵抗運動，避免

<sup>4</sup> Esherick (1987), Silbey (2012).

<sup>5</sup> Rowe (2009, 149–296) 對此有非常好的綜述總結。

<sup>6</sup> Young (1983, 217–228).

<sup>7</sup> Ch'i (1976), Nathan (1976), Gasster (1980).

<sup>8</sup> Isaacs (1961), Wilbur (1983).

<sup>9</sup> Mitter (2013, 5–6).

4

了與日軍的正面交鋒。內戰爆發初期，國民黨優勢明顯，但中後期節節失利，並在東三省的一系列會戰失敗之後開始迅速解體。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大陸的國民黨勢力已經被基本掃清，殘餘力量退守台灣島，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已進軍南部和西部的偏遠省份，完成最後的佔領工作。

無疑，國人都希望新中國的成立能結束20世紀上半葉以來的殘局，迎來國家團結、和平和經濟發展的新時代。但是，這些希望很快就破滅了：革命時代遠未結束，事實上，才剛剛開始。其即將帶來的災難遠遠超出了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想像。

被視為定義毛澤東政治遺產的兩大主要破壞性運動分別為1958至1960年的大躍進和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中，文化大革命前四年帶來的破壞是史無前例的。大躍進中，全國人民都被調動起來，夜以繼日地工作、不斷打破生產紀錄，並試圖在短短幾年內超過世界上的其他發達經濟體。大躍進中，黨領導下的國家近乎無所不能，這一偉大壯舉在十年前的人們看來不敢想像，對於許多國家而言也是天方夜譚。然而，運動的結果竟是一場災難：這出乎中國領導人的預料，更讓運動的發起者大失所望。在大範圍人為造成的饑荒中，有接近3,000萬人死去，工業發展嚴重倒退，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緩過氣來。

大躍進帶來了經濟倒退、人口失衡的災難，很快，文化大革命又帶來了政治上的大混亂。1966年，毛澤東鼓勵學生紅衛兵攻擊黨內要員，些許猶豫後，又允許工人參與到逐漸壯大的攻擊毫無抵抗之力的地方黨政官員的浪潮中。至1967年1月，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的人民政府機構近乎癱瘓，在之後的兩年內才緩慢地得以重建，其中還不乏暴力事件。在此期間，各造反派聯合前來恢復秩序的各部隊，形成複雜的聯盟關係，相互爭權奪利。許多地方人民政府功能盡失，彷彿回到了內戰時期。中央發出號召，希望相互鬥爭的造反派可以「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勝利旗幟下」實現團結統一，但收效甚微。直到部隊進駐並強力恢復秩序，文革的這一混亂階段才得以結束。

5

1968年夏天，中國絕大部分地區都實行了戒嚴和軍事管制，許多

市民都覺得鬥爭已經結束，社會安定即將到來。然而不幸的是，武裝部隊和人民政府又開始聯手，以越來越強硬的手段打擊他們的假想敵：階級敵人和政治野心者。這一舉動雖然有效重建了政府權威，但也讓數百萬人遭到刑訊逼供甚至肉體折磨。直到林彪神秘死亡，一系列事件才最終結束。當時的林彪是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被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卻在1971年9月離奇死亡。軍隊從民政部門撤走後，中國社會進入徘徊期，活躍在1960年代後期的那些紅色鬥士們又開始派系鬥爭，不時造成地區動盪。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1976年4月，北京和其他城市爆發反對毛澤東政策的抗議活動。而僅僅六個月後，毛澤東與世長辭。

這就是1976年9月天安門廣場盛大集會的歷史背景，厚重而複雜。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中，有的在文革期間支持毛澤東的政策，狂熱地攻擊曾經的同志，踐行毛氏革命的路線並詆毀那些將發展生產、提振民生置於革命之上的人；有的在這場風暴中得以全身而退；當然，也有的不僅丟了官職、飽受屈辱，甚至妻兒家屬也跟着喪命，他們中的有些人在長期關押和流放後才被召回北京，從1970年代開始肩負重建秩序的任務。毛澤東維護自身政治遺產的最終計劃，在其死後短短幾年間就以十分戲劇化的方式被徹底瓦解。對於一個屢屢力挽狂瀾，後又將中國置於二十多年極端破壞與無謂爭鬥的國家領導人來說，這無疑是最徹底的失敗。毛澤東政策的破壞性讓中國千瘡百孔，並促使毛的繼任者們開始重新思索。在接下來的30年間，他們將把中國帶到驚人的新道路上去。

本書希望講清這些事件和該時期其他的關鍵變革。最近的研究對國家領導層是如何鬥爭、背後的意圖，及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的影響都已有深入的探討。我將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我不想贅述歷史事實，而是關注事件發生背後的原因。我的分析核心自然是毛澤東本人：他到底想要達到什麼目的？方式如何？又是什麼想法或心態促使他這樣做？本書的核心論述是：無論毛澤東想做些什麼，他的初衷與事態最後的走向通常是背道而馳的，最後的結果不僅出乎眾人的意料，也與毛本人的

想法南轅北轍。為了理解其中原因，我們需要首先探討在1948至1949年間依靠武裝力量統一中國大陸的共產黨的革命機構組成，以及在漫長鬥爭中共產黨所獲取的歷史遺產。我們要理解共產黨是如何組織的，如何發展新黨員，如何獎勵有功者，又是如何懲處有過者的。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從蘇聯照搬來了經濟制度，並認為這是中國快速實現工業化的關鍵，但我們要充分理解其中存在的固有缺陷。這兩大組織體系——黨的組織體系和蘇維埃計劃經濟體系——是毛澤東時代鬥爭與衝突的核心。毛的許多不滿就是從此二者中來的，他的目標也因此屢屢擋淺。在許多人看來，毛澤東是一個被古板的、不合時宜的革命意識形態所左右的人物，以至於屢屢犯錯、常常顯得缺乏責任。然而，毛的個人失誤並不能幫助我們解釋歷史為何會以如此面貌發生。我的敘述將從毛對中國社會的干預入手，緊接着再分析干預的結果以及對他所締造的政權和中國社會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在本書接下來的五章中，我將詳細探討歷史跌宕起伏的發展。首先要解釋的是：中國如何在1947年以後迅速成為強大、統一、特色鮮明而又存在巨大缺陷的民族國家。在第二章中，我將介紹共產黨漫長的發展之路，講述該黨如何發跡，如何在鬥爭中吸取經驗並影響後續的發展。共產游擊和對日作戰為新中國成立奠定了核心基礎，但是這一部分我不作重點講述。在戰時根據地延安，中國共產黨開始高強度的斯大林化，毛澤東吸收了斯大林時代共產主義的核心理念，尤其是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綱領（很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以為這是毛自己的創造）。在延安根據地，共產黨繼續強化其策略，對黨員的忠誠和服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達不到標準的黨員遭到懲處。這一措施雖然為黨帶來了巨大的力量，但過於極端，也埋下了未來的隱患。1940年代後期，游擊戰早就被摒棄，取而代之的是大規模調動全國人民的策略，讓民眾支援以傳統戰爭為主要方式的國共內戰。這一改變也深遠影響着1950年代政權的建立和鞏固。<sup>7</sup>

1950年代，政權處在建設之中，社會革命也遠沒有停止。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簡要介紹了當時城市和鄉村的變革。歷經好幾個世紀的地

租制度，連同建立在其基礎上的社會結構，在短短幾年間就被摒棄。地主制度和佃戶體系消失了，剝削他人的土豪鄉紳也被處置。中國迅速變成了一個獨立小農國家。而在隨後的幾年間，土地卻又被收回國有，農民被要求加入農村合作社。城市生活也被改寫。選擇留守大陸的店主、商人和富裕資本家們的財產盡被沒收，私營企業不是併入政府管理的合作社就是被改造成國有企業。鄉鎮居民都需要登記在冊並按要求上戶口，因此與所居社區緊密地綁在了一起。團夥犯罪、武裝黑幫曾經讓中國城鄉社會飽受摧殘，現在都已銷聲匿跡，販毒、賣淫和強收保護費的現象也被清除。城鄉社會歸於平穩，恢復了秩序。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建立了嶄新而高效的民族國家，並希望以此徹底解決社會的公平與安全問題，這兩大問題長期以來困擾着中國人民。

在 1950 年代的建設中，這種新的國家秩序體現出濃烈的蘇維埃色彩。1920 年代，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建立起了由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第五章便描述了中國是如何迅速照搬這種模式的。現在看來，這一決定注定是錯誤的，因為這種發展模式有其深層的缺陷，最終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取得成功。但是在 1950 年代初期，這一缺陷還遠未顯現。這種模式給蘇聯帶來了飛速的工業發展，幫助蘇聯抵禦了納粹德國的入侵，在戰後依然發展強勁，並為蘇聯創造了強大的軍事實力，並威脅到西方列強。中國激進地採取了這種體制，但是在這種體制下，存款率高、投資率低，因此消費和生活水準都非常低，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僅僅略好於勉強糊口的水準。國家實行配給制，貨品供應短缺，住房條件糟糕，公共設施落後，這些問題一直到毛澤東時代結束都沒有妥善解決。

在所有這些根本性的改變之下，1950 年代最為重要的一個變化是：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意志滲透進政府、社會機構和企業的方方面面。這一趨勢在第六章有詳盡討論，學界對此有廣泛的認同，但是並未深究其中原委。共產黨並非尋求控制一切，關注的只是政府要害部門，關乎資源調配的核心機構，以及鍛煉未來精英的平台。黨的組織迅速學會如何調節資源部署、分配晉升機遇。這一舉措迅速改變了民眾入黨的動

機，並且最終改變了黨員身份的意涵和人們入黨的動因。在共產黨還未鎖定勝局之前，入黨需要十足的奉獻精神，要冒人身安全的危險，甚至面臨死亡的威脅。而在1950年代，情況可就大不一樣了：黨員身份有助於職業發展，甚至可以更輕易地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如果一個人在年輕時就能入黨，那麼他很有可能獲得一份有權有勢的工作，為親戚後代謀取更多的特權。當然，要想始終能獲取這些好處，就必須表現得對黨忠誠，服從組織。

在1940年代，共產黨是紀律嚴明、充滿革命精神的組織，可是後來，入黨成為人們謀求自身發展的途徑，黨的架構成為裙帶關係的工具，這一趨勢讓國家領導人十分頭疼。毛澤東也為這一問題深深苦惱，其政治設計中可能最重要的一條綱領由此形成。然而奇怪的是，我們將會看到，毛澤東並不認為這種趨勢是層級官僚體系、控制不動產權、壟斷晉升機會而導致的必然結果，相反，他認為這來源於資本主義的復辟。毛澤東對事態的判斷出現了偏差，以此提出的應對方案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反而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他想極力糾正這一現象，但是直至其逝世也沒有解決。

前面的幾章內容為毛澤東晚年的動盪局面做好了鋪墊。在這幾章中存在着一個驚人的共性：事情的結局總是事與願違，和毛澤東的初衷背道而馳。最後他不得不因此撤回政令，做出妥協，甚至改弦更張。<sup>9</sup> 1956年2月，赫魯曉夫主持召開蘇共二十大，從根本上了否定斯大林。從第七章開始，本書將敘述此後20年的大事，討論中國對蘇聯陣營劇變所做出的反應。赫魯曉夫的批評讓許多地處東歐的蘇聯衛星國家的領導人不知所措，他們之前都忠實地踐行斯大林時代的政策。毛澤東也身處其中，仿效斯大林的做法，搞個人崇拜，並建立起特色鮮明的紅色政權。相比於赫魯曉夫，毛澤東希望更勝一籌，推行屬於他自己的自由化進程。1957年2月，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下，毛澤東自信地鼓勵普通老百姓積極建言、批評國內黨政幹部的工作，希望以此「糾正」黨的行為，緩和民眾心中的不滿情緒，避免重蹈東歐各國的覆轍。沒想到，事與願違。在短短的幾週內，原本膽怯的民眾開始大規模地表達不

滿，大有否定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反對獨裁式統治之勢。師生們組建起獨立的報刊和社團，舉行集會並在校園中發表演講。工人們也變得活躍起來，要求漲工資並獲得選舉權益，各城市開始爆發罷工。農民從剛建立不久的農業合作社中退出，年輕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也參與到這場聲勢不斷壯大的反對活動中。

毛澤東當時非常自信，認為當時共產黨面對公開批評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可是他錯了。當年6月，毛澤東撤銷了自己的政策，共產黨開始採取反制措施，並常伴有報復行為。在一場巨大的反右傾運動中，許多批評者被當成目標對象，受到反黨、反動和反革命的指控。那些或發表過批評意見、或參與過有組織抗議活動的人都受到批鬥，還沒有審判就已經被家人朋友孤立。他們丟了工作，被迫到農業合作社勞動，或是蹲了大獄，接受勞改。部分學生運動和工人罷工領袖被處決。還有許多年輕黨員，出於對黨的忠誠和理想主義的想法，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批評糾正黨的不良作風，最終也在這場反右傾運動中受到牽連。這是最後一次坦誠的批評運動，直到1970年代後期，人們才重新站出來，發自內心地對黨的統治發表政治批評。10

毛澤東依然迫切地想要證明自己的能力，要以嶄新的、勇敢的方式解決社會主義存在的問題。反右傾運動還未結束，毛就發動了一場大範圍的工業化運動：大躍進。第八章着重討論了這一政策，中國共產黨充分利用先前對國家各層面建立起的管控，鼓勵工農大生產。黨員幹部督促人民夜以繼日地工作，只為完成那些誇張而虛高的糧食、鋼鐵等的生產目標。大躍進最終造成了生產亂象和資源浪費，在浮誇的生產指標和極大的政治壓力下，許多官員不得不虛報產量。1959年7月，局勢已經十分明朗：大躍進帶來的經濟破壞已經無法避免，黨內高層開始思索該如何糾正他們的政策。毛澤東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似乎準備更改政策方向。時任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將軍向中央寫了一封坦誠的書信，列舉大躍進的錯誤，毛澤東卻本能地捍衛自己的路線。彭德懷被定性為叛徒，並丟了官職。毛澤東執意繼續大躍進的路線，並發動第二次反右傾運動，凡是發表過批評或懷疑過中央政策的人都捲入其中。因此，大躍

進又進行了一年，饑餓甚至席捲了大城市，農村的饑荒則更為嚴重，餓死了上千萬人之多。

這是毛澤東連續犯下的第二次錯誤，但相比於第一次「百花齊放」運動，這次錯誤所造成的悲劇更為嚴重。大躍進的破壞和之後的餘波又迅速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這些事件在第九章都會詳細論述。毛澤東允許黨內其他高層修補經濟上的破壞，毛的副手劉少奇直白地分析了大躍進的失敗，這使得毛澤東很不高興。他感覺到許多同志都不認同大躍進背後的核心理念。此時的蘇聯正在朝着赫魯曉夫所謂「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發展，把重點放在科技、高等教育、培養官僚、和平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上，並試圖緩和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在毛澤東眼中，這是毫無原則地妥協，是蘇維埃官僚向帝國主義世界低頭的表現，這無異於重新回到以政治精英為主導的特權階級這一固化結構上去。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的復辟。毛澤東一向認為自己是徹底的革命者，與蘇聯的斯大林接班人截然不同，因此，他發動了對蘇的意識形態論戰，最終導致了中蘇關係破裂。<sup>11</sup>

在毛澤東看來，他的許多同志在革命意識形態上有所動搖，蘇聯又改變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此二者一定有緊密的聯繫。1963年，毛澤東已經年逾古稀，是該考慮自己政治遺產的時候了。斯大林死後才過了三年，赫魯曉夫就全面否定了他的政策，毛對此事耿耿於懷。毛澤東相信，雖然他的同志不會把他從主席的位置上趕下去，但他們可以坐等自己去世並淡出歷史舞台。毛不相信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同志會繼承他的革命遺志。而從1980年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上看，毛當時的擔憂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很精準的判斷。第九章是一個小結，講述了毛澤東在發動文革前做出的一系列準備。

毛澤東本可以輕易地一舉清除那些他認為對自己的路線不夠忠誠的人，但這並不是一次尋常的領導層清洗。與之同步的還有基層老百姓的「造反運動」，學生們身先士卒，我們在第十章將做討論。毛澤東動用大眾媒體，公開鼓勵高校學生造反派攻擊那些教職工中的「走資派」和庇護他們的管理人員。學生們組織起紅衛兵組織，不斷地以暴力方式攻擊

教員職工、學校領導，最終又將矛頭指向政府官員。他們的行為在大眾媒體上被大肆讚揚，毛澤東也在天安門廣場數次接見紅衛兵。安保部門和軍隊接到指令，不得介入。然而，紅衛兵自己卻四分五裂，有些人不願意遵從高層對運動的引導和控制，甚至開始攻擊執行毛澤東指令的官員。

這些問題讓毛澤東對學生造反派開始失去信心，1966年末，他決定讓工廠工人也參與到這場運動中來。在第十一章，我會對這一舉措的影響做出細緻分析。中國各大城市迅速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許多工人要求漲工資、提高福利政策。另一部分人則被鼓動起來，對抗造反派的攻擊，維護地方政府的權威。大街小巷上，不同派系相互爭鬥。到了1966年底，絕大多數的省級政府都到了崩潰的邊緣。面對着可能即將到來的社會癱瘓，毛澤東指揮地方造反派奪權，與忠誠於毛澤東的官員們團結起來，一同取締地方黨委並恢復社會秩序。這一舉措的典範就是上海一月革命。大批造反派工人和當時掌控宣傳機器的張春橋聯合起來，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建立起新的政府模式，在軍方的支持下恢復了社會秩序。張春橋的奪權獲得了中央的認可，被認為是人民的勝利和毛澤東革命思想的體現，人們將其視作藍本，認為能以此勝利地結束文化大革命。

12

然而，勝利並沒有到來。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為了奪權，很快就陷入劃分陣營、你爭我奪的派系鬥爭之中。中央希望軍隊能起到幫助作用，結果軍隊要麼強行鎮壓擁護毛澤東的造反派，在中央面前失信；要麼捲入地方派系鬥爭之中。中央的指令有時模棱兩可、含糊不清，有時又猶豫不決、缺乏果斷。到1967年夏天，地方鬥爭終於失去控制，彷彿回到了內戰時的局面。

毛澤東不得不動用軍隊，實施軍事管制。1968年，大眾造反和奪權運動結束，這一嘗試以失敗告終。第十二章按時間順序列舉了軍方為恢復秩序所做的一系列強制舉措。軍隊將不肯甘休者視為反革命分子，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恢復秩序，不容許任何反對行為的發生。數百萬人被調查、關押和刑訊逼供，這就是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要在

全國清除一切形式的異見分子。大學校園空無一人，學生們都被送到農村進行無限期的「再教育」。教職員工則被解職，在鄉下從事重體力勞動。政府官員被大批送到農村勞動改造，或是去工廠車間參與生產。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此時達到頂峰，人們跳着「忠字舞」，表達着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熱愛，每個工作日早晨都對毛澤東的畫像頂禮膜拜，「聆聽他的教導」。

這一系列運動到1971年9月才停下來，第十三章將介紹中國在此之後的動盪時期。林彪元帥公開支持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因此受到嘉獎，被提拔為黨內第二號人物，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左膀右臂和指定接班人」。不料，林彪卻在此時死亡。官方的說法是林彪在刺殺毛澤東的陰謀敗露後，慌忙逃往蘇聯，但是遭遇飛機失事而身亡。文革運動在過去的五年裏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破壞，發動文革的正當性現在已變得千瘡百孔。

巨大的轉變緊隨其後，軍方開始從民政部門撤出。文革期間，國家總理周恩來極力消滅其政治破壞力，因此受到毛澤東的擁護者頻繁攻擊。現在，周恩來獲取了毛的授權，開始着手修復文革帶來的創傷。黨的組織被慢慢地重建起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不像以前那麼狂熱了，公開的崇拜儀式逐漸減少。大學開始召回教職員工，小範圍恢復招生。文革期間數以百萬計的政府官員被下放勞作，現在也官復原職。雖然劉少奇等人在文革中去世（劉在獄中死去），像鄧小平這樣的國家領導人還是熬過了文革的動盪，重新回到原先的要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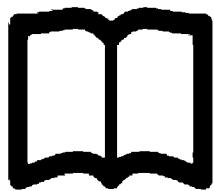
安定的局面並沒有持續多久，早些時候的問題並沒有被根除，現在又以衝突的形式顯現出來。民眾可以公開批評林彪的作為，許多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和早些時候的活動者借此機會表達對整場政治運動的不滿，間接地批評了毛澤東的政策。先前的紅衛兵、造反派和被下放的學生們發起了許多小型的獨立思想組織。黨內高層在毛澤東政治遺產的問題上又開始明爭暗鬥，下面的人也跟着製造衝突，派系鬥爭和遊行在各大城市又出現了。不斷發酵的事態在1976年4月4日和5日達到了白熱化的階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和其他城市，人們發起紀念周恩來的活動，這

位共和國的總理在不久前剛剛去世。這些紀念活動很快就演化成一場公開的批判，人們指責那些違背周總理意願，執意推進文革的官員。作為回應，鄧小平再一次從領導人的位置上被撤了下來。

毛留下了一個飽經破壞的落後國家。在第十四章，我分析了毛澤東去世時中國各方面的情況。儘管遭遇大躍進之後經濟急速下滑，和1960年代晚期緩速衰退，中國經濟在毛澤東去世時還是在增長的。但此時的中國遠遠落後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更不用說追趕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經濟體。工廠工人的平均真實收入自1957年以來一直在下降，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也非常糟糕，人們住在擁擠而髒亂的公寓裏，廁衛設施都是共用的。配給制依然運行着，消費品常有斷貨現象，部分商品的供應還不及1960年代水準。大學教育體系幾近癱瘓，公共機構的行政管理也無法發揮功能，因為有能力者被邊緣化，政治敵對常常一觸即發。生產線等資本設備陳舊，產品設計還是1950年代的老樣子。許多農民依然處在赤貧狀態，根據中國官方的標準，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膳食水平在亞洲幾乎墊底。

14

毛澤東去世時的中國千瘡百孔，想要修復，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毛澤東在世時給國家留下的破壞與落後，敦促其繼任者們開始重新思考國家建設的走向——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毛的接班人抓住了這一機遇，否定了毛的核心觀點，選擇了市場機制和私營企業，這在毛澤東在世時是不可想像的，因為對二者的反感是蘇維埃式經濟的核心概念，自1950年代以來就被奉為圭臬。當歷史的塵埃終於散去，中國轉型為依靠出口增長的東亞大國，並幫助共產黨得以重建，再次煥發生機。如果中國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政策中的嚴重問題，改革不可能有如此之規模。繼任者們的改革並不是毛所希望留下的政治遺產，事實上恰恰與毛澤東的初衷南轍北轍。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從運動到政權

建黨早期，共產黨經歷過兩次重大挫折，在國共內戰初期也度過了一段艱苦的歲月，因此，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可謂偉大的成就，對於部分黨員來說，這簡直就像是奇蹟。第一次重大挫折，是1927年春蔣介石發動的殘酷的政治清洗運動。政變宣告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共產黨人在城市內的組織網遭遇重挫。1927年4月，共產黨共有黨員5.8萬人，四個月後僅剩下1萬人左右，<sup>1</sup>倖存者不得不轉向城市地下活動，大部分人撤回鄉村地區，建立起臨時根據地。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在三省交界的山區建立起的江西蘇維埃政權，成為革命根據地中最大的一個。

共產黨所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挫敗，則是1934年國民黨發起對革命根據地的圍剿運動，成功摧毀了江西蘇維埃政權，剩餘的革命力量不得不開始漫長而艱苦的長征。紅軍從1933年的15萬大軍銳減到1936年的2.3萬人，這中間也只有一半人最終成功到達陝北的新革命根據地。<sup>2</sup>共

<sup>1</sup> Wilbur (1983, 620–672) 描述了分裂和清洗的長期過程，這一過程也分裂了國民黨本身。所提及的黨內人士來自於Lee (1991, 16–17)。

<sup>2</sup> Ch'en (1986, 204–216；關於人數的預估，參看頁198)，Dreyer (1995, 185–200；關於人數的預估，參看頁186–187及199)。

產黨人不得不在這一乾旱而多山的地區艱苦發展。<sup>3</sup>1937年，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摧毀了國民政府的許多軍事力量，並迫使其遷都中國腹地（陪都重慶），相反，由於共產黨人遠處西北，並未與日軍產生正面軍事對抗。

即便1945年8月日本帝國倉促投降後，勝利看起來離中國共產黨依舊很遙遠。共產黨軍隊進駐東北，並接受了蘇軍的補給。隨後，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軍隊數量更多，武器更先進，因此早期戰事對共產黨十分不利。共產黨在東北的部隊被一步步逼到北境，退到了臨近中蘇邊境的區域。蔣介石命令自己的軍隊發起大規模攻擊，希望將共產黨的部隊趕入西伯利亞的不毛之地。然而，龐大的國民黨軍隊在數次關鍵戰役失利後分崩離析，國民黨對華東華北的控制權迅速地落入共產黨的手中。短短一年時間，共產黨就從失敗的邊緣掙扎回來，並迅速翻盤，擊潰了國民黨軍隊。

共產黨奪取勝利的道路深刻影響了1949年後的政權建設，也影響了國家領導人和黨員們在此後數年內的觀念和行為。然而，其中的核心元素並不是以戰時根據地延安為代表的長年游擊戰爭的經驗，也不是抗戰時期革命根據地內的農村革命和黨建活動，雖然在官方的分析中，這是共產黨勝利的關鍵要素，並被寫入課本，搬上螢幕。共產黨的勝利並不來自於游擊戰：游擊只是對抗日軍侵略而選擇的生存之道。共產黨的勝利也不來自於對日本軍隊的武裝抵抗：事實上，共產黨有意避免和日軍的正面交鋒。相反，共產黨的勝利來自於與國民黨進行傳統戰爭模式的內戰。這留下了一個遺產：軍事化的政黨和傳統式軍隊高度統一，人民群眾被充分動員起來，以奉獻之姿支援戰事。共產黨是槍桿子裏來的政權，這為新的中國和國家未來走向打下了組織基礎。

<sup>3</sup> Apter and Saich (1994, 190–194) 中有生動的詳細描寫。

## 如何解釋共產黨的勝利

政治革命可以說是兩大組織之間的爭鬥：既有的建制派和崛起的新力量相互博奕。新崛起的一方希望在一定領土範圍內獲得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當性。<sup>4</sup>絕大多數歷史學家都以此方法理解1949年共產黨人的勝利。大家都認為，共產黨的組織和戰略都勝過國民黨一籌，但共產黨勝在何處，人們有不同的看法。

一種解釋認為，共產黨的成功得益於農村革命，歸功於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綱領引入中國，並將革命力量轉移至鄉村。這一策略結合了游擊戰的精髓，建立了基層政治組織，充分動員貧窮的農民。<sup>5</sup>對於這一論點，學界有三種版本，關於毛的策略為何能夠得到中國農民的回應，每種版本都有各自看重的原因。

最早的第一種版本認為，日本侵華的政治影響幫助共產黨取得了農民的支持。抗日戰爭激發了農民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共產黨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並以此取得了成功。在這一觀點看來，殘暴的日軍在所到之處實行血腥鎮壓，農民們本沒有什麼民族認同感，但現在卻被激起了強烈的民族情緒。共產黨一直在敵後活動，游擊隊在民眾眼中成為了救國救難的光輝形象。因此，共產黨團結起了新覺醒的農民階層，與他們共同抵禦外敵。<sup>6</sup>

第二種觀點認為，共產黨的勝利依託的是削減地租和土地革命。千百年來，土地制度一直是禁錮中國窮苦農民的枷鎖，貧農長久以來沒有一點生活保障，共產黨在農村實行了土地革命，讓農民有了土地，免除了他們繁重的賦稅，獲得了解放。<sup>7</sup>共產黨抓住這一關鍵，在政治上動

17

<sup>4</sup> 參見 Stinchcombe (1965, 169–180) 和 Tilly (1978, 189–222)。

<sup>5</sup> Schwartz (1951) 提到了對於這一觀點的早期表述。

<sup>6</sup> Taylor (1940) 中有這一爭議的最早版本，之後在 Johnson (1962) 處有具體闡釋。

<sup>7</sup> Selden (1971) 是對這種解釋有影響的早期宣導者。

員起了這些農民。共產黨幫助沒有土地的農民和佃戶取得了利益，釋放出了階級之間的矛盾，並因此獲得了來自農民階層無窮無盡的支持。<sup>8</sup>

第三種觀點是第二種觀點的引申，強調廣泛植根於農村社會的意識傳統，而不是階級間的衝突。根據這種觀點，共產黨人的政策提高了貧農的生活水準，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價值觀看來，正是成就了「皆有所養」的訴求。共產黨作為傳統文化的捍衛者，對抗着在全球範圍內急劇擴張的資本主義，自然獲得了農民的支持。<sup>9</sup>

以上觀點都解釋了為什麼游擊策略獲得了農民的支持。雖然部分解釋了共產黨人成功的秘訣，但並不能形成一個系統性的答案。共產黨動員農民和創建村一級的政治組織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這是以軍事手段控制某地區作為基礎的。研究者原以為只要具備某些更易於獲得成功的社會條件，共產黨就能取得成功，然而，他們並沒有發現二者之間的相關性。相反，他們發現有軍隊在的地方，共產黨更加容易取得成功。<sup>10</sup>黨內領導人並不覺得他們的策略和具體的經濟條件會有什麼聯繫。在他們看來，比比皆是的貧富不均已經足夠醞釀革命變遷了。<sup>11</sup>

在共產黨軍隊牢牢控制的地區，革命在根本上是很脆弱的。一旦軍事控制得不到保障，根據地很快就會解體。在1939年後期，侵華日軍進一步鞏固了對華北的控制，開始向共產黨開展敵後活動的區域進軍，抗日根據地迅速縮小，黨的幹部發現戰戰兢兢的農民們的合作意願不斷降低。<sup>12</sup>相同的情況在國共內戰爆發初期的六個月也出現了：在華北戰場，共產黨軍隊戰事不利，許多地方黨組織都出現了背叛倒戈的現象，原本實行的農村改革也改弦更張。正如一位歷史學家評價這一歷史時

<sup>8</sup> 這與中國和越南作為階級衝突的表現的更廣泛的解釋是一致的，例如 Moore (1966) 及 Paige (1975)。

<sup>9</sup> Thaxton (1983) and Marks (1984)，承接了 Scott (1976) 的「道義經濟學」觀點。

<sup>10</sup> Hofheinz (1969, 1977). Benton (1992) 對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撤離後共產主義力量在中國南方的活動的詳細描述強調了這一點。

<sup>11</sup> Van Slyke (1986, 651–652).

<sup>12</sup> Van Slyke (1986, 674–676).

期，「只要共產黨軍隊在，地方幹部就會推進土地革命，發動政治運動。可一旦軍隊撤走，先前在抗戰時期加入革命的人就會考慮改變他們的立場。」<sup>13</sup>

游擊策略並不能解釋共產黨的勝利，另一個原因也可以說明問題：城市大會戰才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需要動員起大量人力物力。而抗日戰爭期間，游擊策略雖然保證了共產黨的生存和壯大，但打游擊時並不太需要農民提供食品、物資和後備力量。國共內戰一爆發，共產黨就摒棄了游擊戰的策略：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向蘇聯部隊投降後，毛指揮軍隊洪水般湧入東北，並開始全面動員、準備發動革命戰爭。紅軍此時已經改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44年的47.5萬人激增到1948年的280萬之眾。<sup>14</sup>這場大規模戰爭需要巨大的物力和人力資源，遠遠不是過去游擊模式所能提供的。新的模式不僅改變了共產黨控制下的社會面貌，也改變了共產黨自己。全國人民被要求參與到對抗國民黨的軍事行動中來，所有人必須支持共產黨的行動，提供物資、勞力和人力的支援。在內戰後期，中國的局面與二戰末期蘇聯軍隊佔領東部歐洲的情形是一樣的。人民解放軍從東北揮師南下，佔領了主要國土，面積之大前所未有。自清朝滅亡後，像新疆西藏這些地區就再沒有回歸到中國的國家政權之下，現在也被納入新中國的版圖。

19

游擊隊員們在偏遠的鄉村地區活動，他們絕不是打敗強大國民黨軍隊的主要力量。事實上，共產黨高度掌控強大的現代化軍隊，動員所有力量發動奪取土地的戰爭，才是共產黨成功的關鍵，也是新中國政權的核心要素之一。如果想充分理解共產黨贏得內戰的原因，我們需要研究為什麼在這一階段共產黨比國民黨的軍隊更勝一籌。

<sup>13</sup> Westad (2003, 61).

<sup>14</sup> Dreyer (1995, 317–318), Van Slyke (1986, 621).

## 日本侵華的軍事影響

國共兩黨的歷史性鬥爭需要從日軍全面侵華的前夜說起。1936年，蔣介石在陝西大量集結部隊，準備向共產黨的陝甘寧根據地及其核心延安發起最後攻勢。此時，紅軍僅有5萬多人，29,000支槍，毫無空軍力量可言。相反，國民黨擁有200萬部隊，空軍有314架戰機，十分強大。<sup>15</sup>就在攻勢發起前，蔣介石手下的兩位將軍將其武力扣押，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時日軍已經佔領東北全境，並在一步步蠶食華北地區。兩位將軍並沒有意識到，蔣介石其實已經派出秘密談判代表，在這一問題上與共產黨方面達成了一致。蔣介石最後被釋放，攻打陝甘寧邊區的行動最後沒有發生。<sup>16</sup>

次年，各方面都佔盡優勢的日軍發動全面侵華，重挫國民黨的政府與軍隊。國軍的精銳部隊被消滅，在最初的幾週內，18.7萬名士兵犧牲。<sup>17</sup>蔣介石的精英力量部署在上海和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三個月內，淞滬會戰損失30萬人，另有10萬部隊在南京保衛戰中犧牲。到1937年末，總共損失約37萬至45萬人，佔主力部隊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sup>18</sup>國民黨軍奮勇抵抗，讓日軍遭受了出乎意料的巨大傷亡，致使日軍在佔領南京後採取了血腥報復，殘酷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sup>19</sup>

此後，國軍依然頑強作戰，國民政府遷入戰時陪都重慶。到1939年後期，日軍在與國軍的作戰中共傷亡約50萬人，短期內以閃電戰的形式全面佔領中國全境的計劃破滅了。國軍的抵抗讓強大的日軍也深陷泥沼之中，1939年冬天，蔣介石指揮了橫跨八個戰區的對日作戰。從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到1941年12月7日，國民黨軍隊又損失了130萬部隊。<sup>20</sup>

<sup>15</sup> Taylor (2011, 142).

<sup>16</sup> 這些事件以「西安事變」著稱 (Ch'en 1986, 226–229)。

<sup>17</sup> Taylor (2011, 150).

<sup>18</sup> Ch'i (1982, 42–43), Mitter (2013, 98–108), Yang Tianshi (2011). Harmsen (2013) 對於1937年淞滬會戰國民黨慘烈的防禦有專書。

<sup>19</sup> Mitter (2013, 124–144).

<sup>20</sup> Taylor (2011, 168–169); MacKinnon (2011).

共產黨的軍隊一開始本不能與日軍對抗，保衛中國領土、實施正面作戰的任務幾乎全部由國民黨軍承擔，因此國軍的損失也最為慘重。參與戰爭時，共產黨的軍隊僅有3萬人。1937年9月，八路軍的番號正式成立，此後不久，新四軍在華中地區成立，1934年紅軍江西蘇區撤離之後的殘部就在新四軍中。<sup>21</sup>

毛澤東清楚地知道共產黨自身的戰略弱點，因此實行了被他稱之為游擊戰的策略，避免與日軍主力部隊正面交鋒，與此同時積極保存和擴大軍事資源。<sup>22</sup>在抗日戰爭最初的兩年間（1937–1939），日軍據守鐵路沿線和軍事要塞，並未深入鄉村地區。當日軍企圖擴大控制範圍時，共產黨已經在敵後廣布勢力。<sup>23</sup>此時，部分指戰員建議立即開展運動戰對抗日軍，認為游擊策略收效甚微。他們主張與國民黨軍更加密切地合作，力圖重創日軍。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黨內領導的支持，<sup>24</sup>但是毛澤東堅持避免與日軍正面作戰，並指揮八路軍和新四軍化整為零，劃分為小股力量並投入到募兵、政治工作和根據地建設中。在這一策略下，共產黨軍隊與日軍的正面作戰少之又少，日軍的巡邏隊和日偽軍經常受到伏擊，彈藥物資補給隊常常被搶。與日軍合作的人被暗殺，鐵路線被破壞，公路上到處都是地雷，通訊基站被破壞，就連電話線也被偷走。<sup>25</sup>

唯一的特例發生在1940年。當時共產黨軍隊控制的鄉村地區越來越廣，信心也越來越足，發起了對日作戰中唯一一次主動而持久的進攻。在毛澤東授權下，104個團協同作戰，破壞鐵路線、公路線、煤礦和其他日本控制下的基礎設施。八路軍傷亡22,000人，日軍則損失約3,000–4,000部隊。日軍隨後進行了大規模的掃蕩和破壞行動，不僅重新佔領了所失地盤，還屠殺村民，搶奪牲畜，建起了碉樓地堡。共產黨控

<sup>21</sup> Van Slyke (1986, 613), Benton (1999),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290).

<sup>22</sup> Van Slyke (1986, 613–614).

<sup>23</sup> Van Slyke (1986, 631).

<sup>24</sup> 更激進軍事抵抗的擁護者包括周恩來、王明、彭德懷和朱德 (Apter and Saich 1994, 58–59;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13–314)。

<sup>25</sup> Van Slyke (1986, 672–673).

制地區的人口從4,400萬驟降至2,500萬，八路軍從40萬人縮水至30萬人。到1942年，共產黨在華北平原90%的根據地落入敵手，活動受到很大限制。百團大戰觸發了日軍強力的反擊，毛澤東重新回到了游擊策略上，再也不敢向日軍發起另一場大型進攻了。<sup>26</sup>

就承擔戰事任務而言，國共雙方是極不平均的。1940年1月，周恩來致信斯大林，報告對日作戰的積極影響。在信中周恩來說：自1939年8月以來，中國共有100萬士兵傷亡，但八路軍僅損失3萬人，新四軍僅損失1,000人。在中國軍隊傷亡總數中，共產黨軍隊僅佔3%。<sup>27</sup> 國民黨軍隊雖然遭受重創，但依舊繼續組織武裝力量，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堅持對日作戰。最後一次大會戰是1944年的豫湘桂會戰，即著名的日軍「一號作戰計劃」，<sup>28</sup> 這使國軍再損失14.6萬人。某份分析這樣說道：「日軍向國民黨軍隊發起致命一擊，讓後者再也沒能恢復過來。」<sup>29</sup> 一直到戰爭結束，國軍都是「嚴重的潰敗狀態」。<sup>30</sup>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都沾沾自喜，自封為抗日戰爭中的英雄，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不是被忽視就是被淡化。<sup>31</sup> 在絕大多數針對國民黨為何失敗的尖銳批評中，有一份指出國民黨軍的軍事成就是不容忽視的：「國軍堅持了八年的戰爭，對手又是如此強大，從人員組織、士兵訓練和武器配備上都遙遙領先。國軍粉碎了日軍以閃擊戰的方式一舉擊垮中國軍隊的幻想，並在上海、南京及華中和華北平原勇敢作戰，給日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讓侵略者深陷中

<sup>26</sup> Van Slyke (1986, 676–681); 亦可參見Yang Kuisong (2011) 及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 44–51) 描述了這一時期河北中部某縣城抵抗活動的毀滅。

<sup>27</sup> Taylor (2011, 168–169).

<sup>28</sup> Ch'i (1982, 68–81), Van Slyke (1986, 705–709), Wang (2011).

<sup>29</sup> Ch'i (1982, 81).

<sup>30</sup> Eastman (1984, 156).

<sup>31</sup> van de Ven (2011).

國的廣闊領土。」<sup>32</sup>在整個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共有483,708人戰死，190萬人負傷，而中國有130萬人犧牲，170萬人負傷。<sup>33</sup>

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是非常微小的。根據一份蘇維埃第三共產國際在1944年12月的報告，國民黨戰鬥減員100萬人，而八路軍僅損失103,186人，新四軍陣亡不過數千人，共產黨軍隊傷亡人數僅佔中方總傷亡的10%。<sup>34</sup>一位學者認為，毛澤東著名的人民戰爭思想有一個巨大的吊詭之處，即「人民戰爭思想其實並未被應用於對日作戰之中」。<sup>35</sup>

## 日本侵華的政治影響

日軍侵華不僅造成了軍事層面的影響，也削弱了國民黨政府的內部凝聚力。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從來不是一個團結的國家機器，國民黨軍隊也並非由中央統一領導。在1927年清洗共產黨人之後，蔣介石暫停了群眾動員，並與地方軍閥達成了一系列協定。這些地方軍閥雖然在名義上宣誓效忠南京政府，但其實保留了相當大的自治權。<sup>36</sup>在1935年的巔峰時期，國民政府直接控制了三分之一的中國省份，涵蓋中國中東部地區。其餘領土不是被軍閥控制，就是被日軍佔領(偽滿洲國)。<sup>37</sup>在軍事力量的控制方面，也有類似的情況。1937年，在全國共有176個師，蔣介石直接控制的只有31個。<sup>38</sup>1937年，日軍侵佔中國沿海，並沿着長江逐步向內陸推進，將國民黨軍隊擠出了原有的核心衛戍區域，並對蔣的嫡系部隊予以重創。<sup>39</sup>

<sup>32</sup> Eastman (1984, 130); 亦可參見Drea and van de Ven (2011)。

<sup>33</sup> Eastman (1984, 136).

<sup>34</sup> Taylor (2011, 297–298).

<sup>35</sup> Lüthi (2008, 25–26).

<sup>36</sup> Wilbur (1983, 719–720).

<sup>37</sup> Ch'i (1982, 23).

<sup>38</sup> Ch'i (1982, 37).

<sup>39</sup> Ch'i (1982, 40–82).

為了團結國民政府內部，蔣介石十分依靠軍隊力量，這在一位分析者看來，是「一個根基單一、只依靠部隊力量的軍政府，卻還要在表面上維護國民黨的領導。」<sup>40</sup>部隊是政權的核心基礎。國民黨和南京政府從未發展起牢靠的社會基礎，也未曾建立強大的制度機構。對日作戰中，國民黨軍的慘重傷亡讓國民政府丟失了根基。日軍投降、國共內戰爆發之後，搖搖欲墜的國民政府不再是共產黨的對手。<sup>41</sup>當年的抗日戰爭弱化了蔣介石與地方軍閥的同盟關係。在國民政府名義控制下的地方政府機構喪失了功能，嚴重影響中央政府的徵稅和募兵。國民黨只是多股相互競爭的政治力量之一，且黨內本身缺乏凝聚力，派系鬥爭很嚴重。<sup>42</sup>蔣介石之所以能將整個體系團結在一起，很大一部分靠的是眾將領和黨羽頭目對他個人的忠誠。國民黨在這一過程中走向衰敗：「戰爭期間，基層黨務工作幾乎停擺，各處的黨內機構都被地方領導控制和利用，成為他們尋求自身既得利益的工具。」<sup>43</sup>

蔣介石早已意識到國民政府內部的組織性弱點，也很羨慕共產黨人的團結守紀。1939年，劉少奇編寫了黨員的紀律與服從要求：「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行動上，所有黨員必須將自身利益與黨的利益區分開來，要毫不猶豫地為黨的利益着想，二者有衝突時，要犧牲自身利益，甚至是自己寶貴的生命，為黨，為無產階級，為民族的解放獻身。」<sup>44</sup>1938年，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因此他們必須有一個緊密的組織結構，要有超過任何別的黨派的鐵一般的紀律。」反觀自身，蔣介石對國民黨扼腕嘆息，覺得國民黨人「爭奪利益和權力，以公謀私，脫離人民。」<sup>45</sup>1949年1月，蔣介石從總統的位置上辭職，準備前往台灣，國民黨的失敗已經難以避免，他在日記中寫道：

---

<sup>40</sup> Ch'i (1982, 3).

<sup>41</sup> Eastman (1984, 130).

<sup>42</sup> Kirby (1984, 157–158).

<sup>43</sup> Ch'i (1982, 235).

<sup>44</sup> 劉少奇 ([1939]1984, 136–137)。

<sup>45</sup> Taylor (2011, 157).

「無可辯駁的是，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黨內的癱瘓，黨員建設、組織結構和領導方式都出了問題。因此，國民黨變成了沒有生命的空殼，政府和軍隊丟失了靈魂，因此軍隊才會潰敗，社會最終解體。」<sup>46</sup>蔣介石從中吸取教訓，退守台灣後，他立即建立了更加中央集權的獨裁統治，堅決地執行紀律，實現內部統一，絕不重犯在大陸的錯誤。<sup>47</sup>

既然蔣介石很早就意識到黨內存在的團結和紀律問題，為何不早點解決呢？蔣的難處在於地緣政治，此外，國民黨黨員的社會組成也是原因之一。1927年之後，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擴張，在大城鎮發展較快。絕大多數黨員都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商業利益，許多都是文化人，一部分還相當富有。因此黨內生活僅僅是他們考慮的一部分內容而已。國民黨人所控制的區域資源豐富，不需要與草根階層建立強大的聯繫就可以獲取足夠多的資源。黨內職務和政府職位很容易成為謀私利的工具。而在農村地區，國民黨人依舊延續了帝國時代的制度：允許地主士紳發揮政府職能，給予了他們相當大的自治權，甚至是徵稅的權力。

## 共產黨紀律的源泉

與國民黨相比，共產黨的情況恰恰相反。1927年，共產黨遭受清洗，被迫轉入偏遠而孤立的農村地區，那裏自然資源匱乏，他們要依靠農村老百姓生存下去，因此與之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共產黨員和黨的幹部並沒有融入城市社會，他們沒有職業上的競爭性，沒有大額財產，更沒有經濟利益。黨的工作可以說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即使選擇退黨，也無事能做。共產黨人先是被國民黨軍隊多次圍剿，隨後又遭到日軍的攻擊，他們不能背叛革命，不然就要坐牢、受辱甚至被殺。共產黨幹部為了生存，必須依靠黨組織。

<sup>46</sup> Eastman (1984, 207–208).

<sup>47</sup> Dickson (1993), Eastman (1981), Taylor (2011, 191–196, 212–217).

<sup>25</sup> 農村的現實環境給了共產黨發展的空間和機會，同時，他們極度重視紀律、強調團結，有時候都成為一種癡迷。但也正因如此，共產黨人才能夠充分發揮黨紀黨規的作用。共產黨人要求黨員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執行黨紀毫不含糊。在建黨早期，黨內的整肅是十分激烈的。主要的黨內整肅是在1930到1932年，目的在於清理江西蘇維埃政權游擊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sup>48</sup>當時，地方指戰員不服從指揮，毛澤東相信一定有暗地裏的陰謀，他展開了一波大範圍的處決，讓黨內檢察官進行地毯式搜索，搜捕嫌疑人。<sup>49</sup>當時另一片根據地，整肅也在同樣進行着，「就像中世紀抓捕巫婆一樣瘋狂，地方幹部人人自危，為求自保，相互告發別人為反革命分子，結果被捕名單越來越長。」<sup>50</sup>在共產黨的黨史記錄中，2,500多人捲入這一事件並被殺，而獨立史學家估計，確切的死亡數字應該接近1萬。<sup>51</sup>1934到1937年，其餘地方根據地也有類似的情況，嚴刑逼供、上百人集體處決的事時有發生。<sup>52</sup>

雖然針對內部叛變的指控和刑訊逼供從未停止，這些形式恐怖、對自身破壞力極大的整紀模式在抗日戰爭期間不斷地被修改、優化和推廣。1942至1944年，延安整風將黨內紀律發展到了頂峰。1938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sup>53</sup>出版，隨後被翻譯成中文，整風運動依照其中的內容，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共產黨內的紀律。

在莫斯科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學習以後，一些黨內領導在1937年10

<sup>48</sup> Averill (1995, 96–99; 2006, 389–391), Guillermaz (1972, 216–217).

<sup>49</sup> Averill (2006, 390); 亦可參見Pantsov and Levine (2012, 239–245)。

<sup>50</sup> Rowe (2007, 310–316, at 313).

<sup>51</sup> Rowe (2007, 313–315); Benton (1992, 313–314).

<sup>52</sup> Benton (1992, 239–240, 264, 282–283, 316–317, 337–339). Apter and Saich (1994, 49–54) 把清洗描述為當地游擊隊和中央指揮部之間的衝突。亦可參見Saich (1996, 530–550)。

<sup>53</sup> 這篇文章是運動期間高級幹部研究的「第一份重要文件」(Apter and Saich 1994, 275, 277)。

月回到了延安。其中一名叫王明的人企圖挑戰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權威。<sup>54</sup> 王明成年後大部分時間在蘇聯度過，並被斯大林熟知。他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侃侃而談，熟知馬克思主義原理，遠超毛澤東。毛澤東從未出國，之所以有領導權威，一來因為他是成功的游擊作戰指揮員，二來他在政治鬥爭中憑藉自己的精明才智一步步鞏固地位。王明以斯大林主義的真正解讀者自居，企圖顛覆毛澤東的權威，卻以失敗告終。

回到延安後，王明傳達了這樣一個信號：毛澤東在意識形態上必須加強認識，不能僅靠狹隘的經驗主義，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sup>55</sup> 毛澤東自然不甘示弱，展示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鞏固對黨組織的控制，並仿效斯大林在蘇聯的方式，不斷提升自身形象。<sup>56</sup> 這種早期的個人崇拜現象一部分也是要與蔣介石的個人崇拜相競爭。在抗戰期間，蔣介石就是抗擊外敵的象徵，他的中國領導人的形象獲得了國際的認可，甚至蘇聯也不例外。<sup>57</sup>

26

在建立自己的個人崇拜的過程中，毛澤東獲得了許多政治秘書的幫助，尤其是陳伯達。1920年代中，陳伯達進入共產黨控制的上海勞動大學學習，後赴蘇聯的莫斯科中山大學。<sup>58</sup> 陳伯達為毛澤東提供了推薦書目，幫助他學習馬列的基本知識，並修改毛的寫作文稿。毛澤東從兩本蘇維埃教科書學起，並學習了一篇刊載於《蘇聯大百科全書》上的文章。當然，對他影響最深的還是《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書，這本書在1939年就有了中文譯本。<sup>59</sup> 此書對毛澤東影響深遠，塑造了毛對馬列主義的理解，影響了他對社會主義的設計。毛澤東曾說，他沒有通讀全書，只是着重閱讀了每一章最後總結性的段落。雖然毛澤東並未深

<sup>54</sup> Teiwes and Sun (1995, 341–342), Van Slyke (1986, 616).

<sup>55</sup> Benton (1975, 341–342); 亦可參見 Apter and Saich (1994, 54–59)。

<sup>56</sup> Lüthi (2008, 26–29),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17–318), Teiwes and Sun (1995).

<sup>57</sup> Leese (2011, 8–12).

<sup>58</sup> Wylie (1980, 10–12).

<sup>59</sup>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1939); Hua-Yu Li (2006, 91–101).

入閱讀材料，但是他將自己的理解教條式地搬到了中國，沒有進行批判式的學習。<sup>60</sup>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書概要性地記述了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的發展壯大與最終勝利，認為斯大林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有不可磨滅的偉大歷史貢獻。毛澤東在隨後的1950年代建設中就照搬了蘇聯的藍本。然而，這本書對毛澤東的影響並不是這一方面，而是教會毛澤東如何在黨的領導集體中打壓自己的競爭對手，保持統治地位。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政見的分歧就意味着黨內鬥爭，必須區分出「正確」的一方與「不正確」的一方。每次政治劃界就相當於一次革命者與反革命者之間的階級鬥爭。該書的核心觀念是：即使社會主義已經建立，階級鬥爭依然要繼續，因為資產階級的不良分子永遠妄圖滲透共產主義政黨，這些人必須被徹底拔除。<sup>61</sup>因此，像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這樣的人就被視作黨內謀逆、反對社會主義的叛徒。此書將斯大林神化，稱讚他的個人崇拜，彷彿斯大林永遠站在對的一方，從不犯錯。毛澤東就模仿他的先驅，強化自己的權威，建立起個人崇拜，要求下屬絕對服從。在這些政治設計中，陳伯達都參與合作，這些理念最終成為毛的政治成果：毛澤東思想。<sup>62</sup>

27

## 共產黨的第一次斯大林式清洗

1942至1944年的延安整風完成了這一運動。<sup>63</sup>延安當時是共產革命根據地的首都，吸引着無數愛國青年、工人和知識分子。他們躲避日軍的入侵，來到延安參加抗日鬥爭。許多是都市人，左派觀點十分模糊。他們中大多數先前並不是共產黨員，懷揣自由信念，對民主依然充滿理

<sup>60</sup> Hua-Yu Li (2006, 101–102).

<sup>61</sup> Tucker (1977), Walder (1991).

<sup>62</sup> Hua-Yu Li (2010),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35), Wylie (1980).

<sup>63</sup> Teiwes (1976, 20–32).

想主義。<sup>64</sup>許多人反感嚴苛的黨內紀律，結果被共產黨初期官僚體系的獨斷和層級手段打壓得很厲害。相反，黨的領導人們始終擔心國民黨的特務已經隨着長征的隊伍滲透到了延安。

1942年2月，毛澤東的兩篇演講，標誌着延安整風運動的正式啟動。他批評了黨內的三種「錯誤趨勢」：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些標籤都是有針對性的，針對的是那些初到延安，沒有革命經驗的人，更重要的是，這些標籤直指剛從莫斯科回來的黨內領導，尤其是毛澤東的政治對手：王明。根據毛澤東的論述，主觀主義最壞的形式就是教條主義，不能僅依靠對馬克思經典的學習來做事，而脫離了中國的客觀政治現實。反對宗派主義就是要反對那些將自身利益放在黨的利益之上的人，反對拋棄革命崇高信仰的人。雖然黨內需要民主，但民主也要集中，黨員個人的利益應該成全黨的集體利益。毛澤東宣示，批評過去的錯誤是很重要的，能幫助根除這些問題，避免重蹈覆轍。毛澤東認為延安整風和過去十年黨內的血腥清洗不同，也有別於當時斯大林在蘇聯進行的大規模處決黨員幹部的行為，因此將這次整風運動比作醫生治病救人，既要治標，更要治本。<sup>65</sup>

毛澤東的一番話激起了狂熱的回應，但幹校和黨報的黨政人員做出的反應出乎毛澤東的預料。他們在黨報上刊文，並張貼大字報，他們認為教條主義說的就是沒受過教育的黨內官僚對文學和藝術的管控。他們希望政治和文學可以分開，獲得獨立於黨內宣傳的些許自由。此外，像著名小說家丁玲就批評延安社會對女性不夠重視，男性始終佔主導地位並常伴有性別歧視。到目前為止，最具有爭議也影響最廣的是一個叫做王實味的黨內翻譯。他認為，官方批准的文學形式粗糙而不入流，希望設置更高的藝術標準。他說，在延安的許多黨員幹部都太無情專斷，對待年輕而有理想主義的下屬時方式欠妥，還排擠他們。他指出，延安已經出現了與幹部等級掛鉤的一系列特權，以及食物、衣物和住宿標準的

<sup>64</sup> 在當時總計80萬名黨員中，90%是近期加入的(Apter and Saich 1994, 267)。

<sup>65</sup> Apter and Saich (1994, 279–281).

分層配給。同時，他強烈批評部分已婚幹部開始追求年輕漂亮女孩，甚至利用職權與他們發生男女關係的行為，這些幹部更是無視自己共同患難但年華漸老的髮妻。最後一項批評激怒了毛澤東，因為毛本人在那時剛剛拋棄了從江西蘇區一同到達延安的髮妻，與從上海來的年輕演員江青結合。王實味強烈批評黨內幹部頻頻舉辦週末交誼舞會的行為，不顧正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他將這些偽善通報出來，而受譴責的幹部也為自己辯護，表示他們的憤怒。<sup>66</sup>

這些文章一發表，黨內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黨員便有了共鳴，可這些批評與毛澤東發起這場整風運動的真實目的是有所偏離的。毛澤東希望加強黨紀，強化自身的個人權威。誰要是對這一原則發起挑戰，毛澤東就決不容他。隨後不久，整風運動立即轉變為對這些人的批鬥，一些人不得不坦白他們的「罪責」，並保證改進思想，但王實味拒絕認罪，據理力爭。王實味隨後被扣上了「五人反黨集團」之首的帽子，是托派，是叛徒。他隨後在公開場合遭到激烈批鬥，並被關進大牢，1947年被處決。<sup>67</sup>

讓批評者閉嘴之後，毛澤東在全黨範圍內發起了整風運動，特別要求揪出黨內的叛徒和內奸。整風運動的責任落到了康生的身上，他與王明一起1937年從莫斯科學成歸國。康生支援毛澤東與王明的鬥爭，並於1939年被委以共產黨特勤工作和黨內安全的重任。<sup>68</sup>1941年，康生被任命為幹部審查委員會主任，首先針對的就是被冠以「托派」、「叛徒」帽子的知識分子。之後，整風運動逐漸擴大到整個黨的體系，着重抓捕敵對特務，清除「思想偏離路線」的黨員。<sup>69</sup>

<sup>66</sup> Apter and Saich (1994, 59–64), Cheek (1984, 30–37), Goldman (1967, 19–32), and Dai (1994, 3–30).

<sup>67</sup> 對批評者和反對者的處理參見Cheek (1984, 37–44)、Goldman (1967, 32–50)及Dai (1994, 31–75)。王實味文章及類似觀點文章的翻譯參見Benton and Hunter (1995, 69–83)與Dai (1994)，也包括批判王的內容。

<sup>68</sup> MacFarquhar (1997, 290–292).

<sup>69</sup> Apter and Saich (1994, 289–292), Teiwes and Sun (1995, 370–375).

為了徹底清除黨內可疑的叛徒和間諜，整風運動首先審查了黨員幹部的檔案。調查員尋找那些有可疑背景和人際關係的人——其中包括曾參與國民黨青年組織後加入共產黨的，以及那些在敵佔區工作過的地下黨員（尤其是曾被逮捕後釋放的黨員）。在整風運動的第一階段，人們要求「向黨交心」，詳細交代為什麼參與共產主義事業，要與過去的政治立場徹底斷絕。不可避免地，有些人就要粉飾自己的過去，對那些有可能給自己造成麻煩的人際關係和社會背景自然略去不講。許多人顯然在交代過去的時候很不誠實，負責黨內安全的人員自然就變得懷疑起來。那些思想較為獨立、質疑黨的權威、懷疑政策正確性的人更成為重點調查的對象。

隨着運動的深入，整風運動開始使用長時間的心理摧殘、強迫審問甚至是刑訊逼供。關於地下間諜組織的冤假錯案不勝枚舉。這種情況下，坦白的人「多到無法控制」。審查員對這些刑訊逼供得來的材料深信不疑，越來越多的人被捲入所謂的「陰謀活動」之中。許多人只是不堪折磨才選擇「坦白」，本以為苦難到此結束，不料人們的互相告發讓更多人捲入。審查員還作偽證，顯得黨內的謀反者數量龐大。<sup>70</sup>

30

整風運動讓黨內恐慌密佈，許多黨內高層也十分不滿，因為他們的下屬都被捲入其中，尤其是周恩來，在康生提供的指控中，他影射周恩來指揮成立了一個地下組織。周恩來當然予以否認，隨後的調查才讓嚴刑逼供的行為公之於眾。1943年10月，毛澤東意識到整風運動不得人心，因此更改了政策。他意識到整風運動可能會削弱黨甚至導致分裂，急令停止草率的處決和嚴刑逼供的行為。<sup>71</sup>

在1944年的報告中，康生承認自己使用了嚴刑逼供，但是他始終覺得整風運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提高了人民的意識」，「剷除了顛覆分子」。而事實上，許多問題讓人後悔，尤其是刑訊逼供的老問題。針對這一點，康生歸結於「經驗不足」，認為在群眾運動中，經驗不足讓人

<sup>70</sup> Seybolt (1986, 57–65).

<sup>71</sup> Teiwes and Sun (1995, 364–365, 370–375).

惋惜但也不可避免，方式上的簡單粗暴導致了標準的過度單一。許多黨內同志認為，黨的寬容只是不再進行大規模處決罷了，因此，許多人覺得拷打、虐待和武斷的間諜罪指控變得不疼不癢，康生對此事深表痛心。許多人依然相信錯誤的指控和逼供得來的坦白，幹部中間很長一段時間依然有人一定程度上秉持這些錯誤的觀點。<sup>72</sup>康生解釋道，在高壓環境下「坦白」自己罪過的人中，其實只有不到一成是真正的敵特分子。<sup>73</sup>

雖然毛澤東才是幕後的主導者，康生擔起了整風運動的罪責。康生的影響力逐漸下降，被一再降職，直到1960年代還做着非常無關緊要的工作。<sup>74</sup>雖然官方已經承認延安整風做的有些過頭，但只認為做錯的地方在於刑訊逼供，其餘方面均是正確的，哪怕是在幹部群眾中造成了廣泛的恐懼。整風之後，凡是不同意黨內政策的行為都會被當作叛變看待。正如一位分析者所說，「這就好比一根大棒：人們害怕被認為是叛徒，因此心存畏懼，但這也讓他們對共產黨的政策保持服從。」<sup>75</sup>整風運動強化了黨的紀律和思想一致，對共產黨此後的成功非常重要，誰要是唱反調，就會遭受到最嚴厲的懲罰。

延安是相對封閉而孤立的一塊抗日根據地，與真正的抗日戰爭主戰場相去甚遠。毛澤東與他的同事們將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鑄造成了一支紀律高度嚴明的武裝力量。嚴苛的黨紀把服從一致性推向了極致，即使有一些代價，目的依然達成了。在同一時期，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抵禦日軍的最後一波攻擊，但基層黨組織幾乎停擺。相比之下，毛澤東強制重塑共產黨，推行其本人領導下團結一致且紀律嚴明的等級制度。日軍投降以後，留下了大量的侵佔地盤，國民黨軍剛剛飽受戰火摧殘而亟待整合，想要重新建立控制地位，但他們面對的卻是毛澤東領導的團結統一的強大力量。

<sup>72</sup> Seybolt (1986, 66).

<sup>73</sup> Seybolt (1986, 67).

<sup>74</sup> Teiwes and Sun (1995, 373–375), Walder (2009, 15–16).

<sup>75</sup> Seybolt (1986, 40).

## 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是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略階段，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這一時期進行了殊死較量。毛澤東最後成功了，但共產黨的勝利在一開始並沒有顯現出來。1946年6月，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當時國民黨軍有430萬裝備精良的部隊，而共產黨方面只有120萬部隊，裝備也很老舊。<sup>76</sup>內戰剛開始的時候，局面一度對共產黨不利，到1947年的時候，斯大林和許多毛的同事都勸毛澤東與蔣介石談判和解。但是毛澤東堅信內戰一定能贏。蔣介石孤注一擲，堅持要摧毀解放軍在東三省的精銳力量，但沒能成功。國民黨軍隊迅速解體，國民政府也瀕臨崩潰，更暴露了連年戰亂導致的各種弱點。共產黨摒棄了游擊策略，轉向全面動員的傳統戰爭模式。內戰的最後幾年，國民黨可謂是全面潰敗，歷史學家們不禁要問：內戰的結局到底是因為國民黨太弱，還是因為共產黨太強？如果雙方的領導人在決定性時刻做出的選擇有所變化，戰爭是不是又會有另一種結局？

日軍投降之後，共產黨的軍隊迅速整合重組，並獲得了新的名字：中國人民解放軍。林彪將軍帶領的解放軍主力在1945年晚些時候進軍東三省，並獲得了來自蘇聯軍隊的補給，迅速佔領了這一地區。林彪將他的部隊分成幾個強大的戰鬥單元，充分發揮了早年在蘇聯學習的各種軍事戰略。林彪不愧是陣地戰的行家，擅長反擊、快速行軍並打得敵人措手不及。林彪全面借鑒了二戰後期蘇聯紅軍在東歐戰場對戰納粹德國的作戰經驗，並付諸實踐，對抗國民黨軍。林彪認為，只要有正確的訓練方式，再加上從日軍繳獲的充足物資（後期是從國軍處繳獲的美式裝備），這場戰爭是可以打贏的。<sup>77</sup>林彪信心滿滿，也幫助毛澤東下定決心，一定要將戰爭進行下去，並獲得最終勝利。

32

在1946年，國民黨軍還未從對日作戰中喘過氣來。國軍保留下來的隊伍中，有一部分部隊裝備精良，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武器配備最好

<sup>76</sup>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48).

<sup>77</sup> Westad (2003, 122–123).

的部隊，而另一部分紀律渙散，還時常搶劫老百姓。有些指戰員對蔣委員長忠心不二，認為他是國家的大救星，有些則依然效忠於之前盤踞一方、之後供職於國民政府的軍閥。國民政府內部分裂嚴重，指揮有時候得不到落實，團結就無從談起。許多敵方指揮官不願意參與到對共產黨的作戰中，希望彼此的政治對手承擔這份損耗，坐收漁利。<sup>78</sup>

在日軍投降之後，國民黨需要重建權威，但也遇到了問題：他們迫不及待地進駐曾被日軍佔領的大城市，對於曾經與日軍合作過的社會精英是一概不用。國民黨的官員試圖重新佔有曾屬於他們的社會特權，卻讓大眾對此付出代價。<sup>79</sup>他們從未在農村建立強有力的組織，試圖對農民徵稅，可是農民剛從饑荒中走出來，抗戰時又飽受摧殘。國民黨強制執行繁重的稅賦和勞役，甚至有時午夜突襲老百姓的家，民眾自然怨念深重。國民政府的腐敗也很嚴重，富裕的家庭反而不用交稅。<sup>80</sup>1948年，國民政府的財政只有21%來自稅收，有68%來自濫印鈔票，造成了巨大的通貨膨脹，士氣也因此嚴重受損。<sup>81</sup>

<sup>33</sup> 蔣介石深知這些結構性弱點，對自己也信心不足，覺得無法在長久的戰爭中取勝。他知道，必須及時摧毀共產黨的精銳部隊，他拒絕和談或是組建聯合政府。1946年晚些時候，他發動了西至延安，東到沿海的大規模進攻，並命令部隊深入東三省。在最初的幾個月裏，共產黨節節失利，1947年3月，延安失守。<sup>82</sup>蔣介石本想一舉抓捕共產黨的整個領導層，摧毀共產黨軍隊的指揮所，但是潛藏在蔣介石身邊的特工卻在兩個禮拜之前將情報送出，共產黨領袖們早就安全撤離。<sup>83</sup>

共產黨軍隊從蘇聯手中接管了東三省的大部分地區，並向農村地區發展，與抗戰時的革命根據地一樣，推行激烈的土地革命。1947至

<sup>78</sup> Westad (2003, 148).

<sup>79</sup> Pepper (1999, 7–41), Westad (2003, 69).

<sup>80</sup> Eastman (1984, 80–81).

<sup>81</sup> Eastman (1984, 86–87); 亦可參見 Pepper (1999, 118–131)。

<sup>82</sup>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48).

<sup>83</sup> Westad (2003, 152).

1948年，東三省的土改可謂是「無限制的革命恐慌」。<sup>84</sup>共產黨幹部進駐農村，並向農民保證：地主、富農、敵特嫌疑犯以及其餘阻礙共產黨控制農村的人都會受到「批鬥」，這些人要下跪、接受高音喇叭播放的指控，身掛批判大字報並頭戴象徵恥辱的高帽。他們還要經受審問，有時還被拷打，被剝奪睡覺的權利。這些批鬥大會其實就是政治做秀的一種方式：人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在新政權之下的命運取決於他們積極地批鬥和討伐，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生存。批鬥會發展到最後往往是一頓暴打，虐待甚至是集體處決。共產黨起初十分支持這種形式，但後來也發現程度過了頭，效果就適得其反。<sup>85</sup>

地主被打倒，他們的土地和財產也被分給了農民。農民雖然分得了土地財物，但是共產黨立即要求他們向解放軍支援食物、補給和勞力。這種軍民關係與老革命根據地的情況是不同的：早期的土地改革較為溫和，不那麼強制性，不涉及暴力，民眾承擔的戰爭支援也不多。但這次可不一樣了：與抗戰時期不同，全面動員的戰爭形式意味着民眾要支撐龐大的傳統軍隊。為了對抗強大的國民黨軍隊，解放軍需要大批的人力、武器彈藥、後勤補給、馬匹和運輸設備。這一切都是無償索取的，沒有一分錢報酬。龐大的軍隊一旦運作起來，就需要大量的糧食、後勤人員、衣物鞋子、武器和燃料。解放軍士兵有數十萬，幹部指揮員又有好幾萬，再加上地方組織，這些都需要徵用大量物資。<sup>86</sup>

這一邊，共產黨正在東三省新的根據地內迅速擴張軍事實力，而另一邊，蔣介石執意要摧毀共產黨的精銳力量。國民黨的優勢僅僅持續了一年，1948年，戰爭發生了轉折。毛澤東派遣自己的部隊向華中平原的山區進攻，迫使蔣介石回防，保衛長江沿線的主要城市。共產黨的反擊

<sup>84</sup> Levine (1987, 224–226).

<sup>85</sup> Dikötter (2013, 64–74), Westad (2003, 134).

<sup>86</sup> Levine (1987, 229). Thaxton (2008, 83–88) 對中國北部一個村莊的描述也強調了內戰期間共產黨對於農村人口採用強制性手段進行動員工作的巨大成效。

讓蔣介石奪取勝利的計劃破滅了。1947年，解放軍部隊打敗了華中的國民黨部隊。此時的毛澤東信心滿滿，在各大戰區發動了對國民黨的全線進攻。他指揮各部隊作戰，並自信地預測：戰爭將在五年內結束。<sup>87</sup>1948年4月，共產黨重新奪回延安。6月，國民黨軍隊縮水至360萬人，而共產黨部隊擴大至280萬人。<sup>88</sup>

蔣介石加緊攻勢，企圖摧毀解放軍在東三省的精銳力量，將他們驅逐到西伯利亞。他派出大量增援力量，其中不乏最訓練有素、裝備最精良的部隊。1948年的前三個月，在一連串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役中，林彪更勝一籌，將東三省南部的大批國民黨部隊分割成一塊一塊，並逐個摧毀。戰爭的走向被徹底改變。<sup>89</sup>隨着戰事的快速變化，蔣介石失去了信心，開始考慮撤離到台灣島。除了軍事力量之外，蔣介石別無依靠，現在部隊被打垮，蔣介石也喪失了黨內的控制地位，許多部下逐漸對他失去信心。在城市，民眾對國民黨的支持急轉直下，通貨膨脹嚴重，經濟受挫，包括學生在內的城市群體開始嚮往共產黨的政策。美國政府先前也支持蔣介石，給予軍事援助和貸款，但現在對他喪失了信心，援助也少了下來。<sup>90</sup>1948年晚些時候，蔣介石徹底丟了東三省，損失了40萬精銳部隊。<sup>91</sup>

林彪即將取得決定性勝利，這些彷彿都證明毛澤東像預言家一樣決斷正確。有了黨內宣傳機器的幫助和近期的軍事成功，毛立即籌劃奪取中國的北部全境。蘇聯方面和其他黨內領導都覺得需要在1951至1952年左右才能取得全面勝利，毛澤東不以為然。蘇聯在那時依然承認國民政府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斯大林長久以來都覺得最好的結局是應該成立聯合政府，或者讓中國分裂為多個政權。但是在毛澤東看來，奪取內

<sup>87</sup> Westad (2003, 168–172).

<sup>88</sup>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50).

<sup>89</sup> Westad (2003, 175–178).

<sup>90</sup> Westad (2003, 181–211); Pepper (1999, 42–93, 132–195).

<sup>91</sup> Westad (2003, 197).

戰的全面勝利就在眼前。<sup>92</sup>解放軍步步推進，許多黨內領導擔心戰線拉得太長，部隊也需要整編，但是毛澤東堅持迅速奪取內戰勝利的策略。斯大林提醒毛澤東不要着急，並在1949年1月建議毛澤東和蔣介石和談。這一建議得到了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同意，但是毛澤東認為這是斯大林在拖慢解放軍的勝利速度，他不想看到多個政權畫地而治、南北對立的局面。毛澤東不顧斯大林的勸告，命令解放軍全面推進。<sup>93</sup>

## 完成軍事佔領

毛澤東的信心再一次被證明是對的。蔣介石的軍隊迅速潰敗，軍官將領和地方政府紛紛投降。整支部隊向共產黨投誠。位於東北的長春被林彪的部隊圍困了五個月之久，並最終於1948年10月投降，在長春之圍中，約有16萬平民死於轟炸或是饑餓。長春一役讓許多國民黨將領喪失了鬥志，他們不願再做無謂的鬥爭，讓平民喪命。<sup>94</sup>北京於1949年1月和平解放，隨後，天津解放。<sup>95</sup>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於4月解放，上海在5月解放。國民黨殘部逃往廣州，隨後撤離至重慶，在1949年12月退守成都之後，最終轉至台灣島。<sup>96</sup>

當解放軍獲得戰爭的全面勝利後，共產黨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該如何劃定中國最終的疆界？如何對待新疆、西藏和蒙古問題？明朝是漢族統治的最後一個王朝，明朝的版圖實際上只有1911年中華民國的三分之一。<sup>97</sup>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是大清帝國，這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由滿洲人領導。滿人本在東北發展，於1644年入關，取代明朝。17世紀初，滿清利用軍事手段不斷擴充疆域，將包括了新疆、西藏、蒙古地區

<sup>92</sup> Westad (2003, 198–199).

<sup>93</sup> Westad (2003, 199–208)

<sup>94</sup> Dikötter (2013, 3–8, 20–22).

<sup>95</sup> Yick (1995).

<sup>96</sup> Dikötter (2013, 22–32), Westad (2003, 221–255).

<sup>97</sup> Brook (2010, map on 41).

的非漢族區域納入版圖，這些少數民族區域奮起抵抗滿清的擴張，被吞併後依然時常叛亂，直到大清滅亡。<sup>98</sup>1911年以後，這些地區又獲得了獨立，1921年，在蘇聯的支持下，蒙古獨立，1924年，蒙古成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並變為蘇聯的衛星國。<sup>99</sup>在這一點上，國民黨是非常反對的，國民政府一直沒有承認蒙古的國家地位，堅持清朝的疆界。而另一方面，由於共產黨高度依賴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因此默許了這一事實。直到1945年8月，國民政府才做出了些許讓步：中蘇簽訂條約，國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獨立，換取蘇聯對國民政府是中國合法政府、蔣介石是合法國家首腦的支持。<sup>100</sup>自此之後，只有內蒙古留在了中國的疆界之內。

對於中國的疆界問題，共產黨本來支持非漢民族的獨立。在1940年代之前，共產黨對新疆、蒙古和西藏的立場都是支持的：他們可以首先獲得「全面的自治」，並隨後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選擇要不要與漢民族組成聯邦體系。當時蔣介石政府的「五族共和」政策是主張多民族統一的，但是為了有別於「國民黨反動派」，共產黨就支持少數民族獨立，認為「五族共和」只是「民族壓迫的藉口」罷了。在1932年的聲明中，共產黨「承認各少數民族實行民族自決的權力，即使造成中華的分裂也不為過」。1930年代，西藏地區一直在謀求獨立，共產黨就支持這一行為，認為是「民族自由運動」，能同時擺脫英國殖民者和中國國民政府的控制。<sup>101</sup>這一連串政策的核心是：「中國」就是「漢民族」，明確地認可其餘民族擁有民族自決的權力。

37 可是在1949年之後，共產黨的政策立即發生了大轉彎，政府希望建立社會主義下的五族共和：藏族、新疆維吾爾族、蒙古族、漢族和回族（漢族穆斯林）。一直以來，「五族共和」一直都是國民政府的立場，而共產黨則對其批評不斷，認為這是民族壓迫的掩飾。毛澤東與斯大林

<sup>98</sup> Rowe (2009, 71–78).

<sup>99</sup> Rossabi (2005, 30–31).

<sup>100</sup> Chen (2001, 27).

<sup>101</sup> Chen (2007, 131–32), Westad (2003, 118–119).

的特使在1949年討論了這一新立場，並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將會把少數族群從封建壓迫中解救出來。<sup>102</sup>

對內蒙古和新疆的佔領沒有遇到太大阻礙，因為這些地區本身就在中國的版圖之內。日軍投降後，這些地區於1945年8月在國民黨與斯大林的談判下回歸國民政府的管轄。<sup>103</sup>但西藏是一個特例。解放軍解放西藏時，敵人不是國民黨軍，而是藏人本身。清朝滅亡後不久，西藏的軍隊就將中華帝國的控制擋在高原之外，十三世達賴一直流亡印度，現在回到西藏，建立起一個新的政府並宣稱完全的獨立，<sup>104</sup>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政權和軍隊都是獨立的。日軍投降之後，西藏一直在做外交努力，不願歸入中國政府，希望在國際上獲得支持，保持獨立。<sup>105</sup>西藏向聯合國、英國和美國求助，也試圖與共產黨和談，但都失敗了。<sup>106</sup>1951年10月，解放軍入藏，西藏軍隊人又少、裝備又老舊，自然無法抵擋強大的解放軍。在最後一刻，西藏還向印度和聯合國求救，但是得到的國際支援非常少。<sup>107</sup>西藏政府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北京方面開出的條件，同意歸入中國，以此換來的自治承諾和宗教社會自由卻十分模糊。當時只有16歲的達賴喇嘛回到了拉薩。<sup>108</sup>

共產黨新的民族政策以漢民族的優越地位為核心。曾經被落後的封建制度壓迫的藏民們現在都被「解放」了，許多藏民無法接受這一強制性的安排，也反對漢民族的文化優越感。新中國政府不斷蠶食西藏的自治權利，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干涉西藏的社會和宗教自主。這自然引來了一連串的政治問題，其中就包括1959年被解放軍鎮壓的武裝叛亂。

<sup>102</sup> Chen (2007, 132–133), Westad (2003, 234–235). 這種立場的轉變和二戰後在蘇聯發生的一起類似案例異曲同工——斯大林首次強調了蘇俄在「文化、啟蒙運動與邊境秩序」上所起到的作用 (Service 2004, 496–497)。

<sup>103</sup> Gao (2007).

<sup>104</sup> Goldstein (1989, 58–66).

<sup>105</sup> Goldstein (1989, 522–610); Westad (2003, 92–94).

<sup>106</sup> Goldstein (1989, 619–690).

<sup>107</sup> Goldstein (1989, 690–736); Westad (2003, 92–94).

<sup>108</sup> Chen (2007, 157–159).

38

## 政治遺產

毛澤東和其餘的黨內領導能從這一階段的勝利中總結出怎樣的經驗？革命締造了新中國，新的國家政權又會繼承哪些革命遺產？

第一點，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要相信毛的判斷和領導。在共產黨歷史上的多個關鍵時刻，毛澤東在策略議題上都選擇站在少數，但隨後的發展卻都驗證了他的正確。毛是最早提出農村革命的人，當時許多黨內領導還依然堅持蘇聯的教條，認為革命不能太快，要先在城市建立無產階級基礎。在延安革命根據地時期，毛澤東重整了共產黨，將其建設為一支強大的力量，這才在日軍投降後有實力與國軍作戰。毛澤東最讓人折服的是他對內戰的判斷。即使國共內戰初期的戰事對共產黨非常不利，但他堅持戰爭，不顧較為謹慎的同志們的建議，認為一定能奪取內戰的全面勝利，並命令部隊加緊攻勢。<sup>109</sup>國共內戰的勝利強化了毛澤東在黨內的聲望地位，成為能力超群、遠見卓識的領袖。正如兩位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所說，「毛澤東總能力挽狂瀾，並最終取得革命鬥爭的勝利，人們因此認為他有超凡的能力，總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即使後期事實證明毛澤東也會犯錯誤，但人們對他深深的信服始終存在。」<sup>110</sup>

第二點，共產黨十分重視對黨的路線和毛澤東本人的高度服從與嚴明紀律。這些特質在1940年代的延安發展到極致，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後的歷史中一直發揮作用。其中的關鍵不在於黨對中國社會提出了什麼要求，而在於黨要求自己的黨員尤其是幹部的絕對服從。一個人若是被黨賦予領導地位，那麼黨也會同時要求他對黨絕對忠誠、對黨紀絕對服從。黨對幹部的一言一行嚴密監控，遠超過對人民的監管，要是有人偏離路線或是發表異見，就會受到嚴厲的制裁。黨員幹部要是不能做好被賦予的工作，就會受到處分，這一長期政策始終是共產黨高度團結、服從黨紀的源泉，這在革命鬥爭過程中一直有所體現，也成為之後的政治遺產。但這也帶來了負面效應，有一定破壞性：有時候某些政策

39

<sup>109</sup> Levine (1987, 93–101), Westad (2003, 17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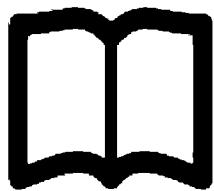
<sup>110</sup> Teiwes and Sun (1999, 13).

已經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嚴重錯誤，黨卻依然過度強調團結一致和執行命令。黨的許多政策經常因此大幅度地左右搖擺，遇到負面結果想及時糾正，卻總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從長期的權力鬥爭中，共產黨還總結出一項政治遺產，這一遺產並不是來自於革命根據地游擊隊員的堅韌和努力，而是內戰全面爆發時所動員起的大眾基礎。在國共內戰的最後階段，共產黨建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能夠從士兵將領和所轄人民那裏獲取大量的支援，支撐超大規模部隊的運作。這一革命團體面對強大的敵人，能夠依然為偉大的事業而鬥爭，黨和人民不惜為此付出代價。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毛澤東將利用他自身的威望，推進一系列與內戰策略相似的政策。就如某位分析者所說，「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從內戰中學到了最重要的一課：無論敵人多強大，阻礙有多難，只要能動員群眾，組織起足夠多的意志和決心，就一定能達到革命目的。然而，事實將證明：這一錯覺是致命的，並讓中國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sup>111</sup>

---

<sup>111</sup> Levine (1987, 247–248).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農村革命

大型社會革命雖然經常以反抗壓迫的形式開始，卻往往建立起更大、更強、更有力的中央集權政體。他們改變既有的社會制度，摧毀原有精英力量，建立起能夠自上而下觸及基層民眾的嶄新官僚體系。<sup>1</sup>在建立新政權後的第一個十年裏，中國共產黨就是按照這一道路快速、徹底地進行社會革命。在鄉村地區，這一過程包含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革命性的土地改革。這是一種強制的階級鬥爭，摧毀了原有地方精英的經濟和政治基礎，打破了他們幾百年來對於中國鄉村的統治。第二個階段是集體化。土地被集中到村一級的合作社，農民被吸收進農村的組織，成為實際意義上的負債勞動力，並依附於新政權任命的地方領導者的威權。

### 作為階級鬥爭的土地革命

中國共產黨將土地革命視作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並以此將權力一直延伸到中國的鄉村。共產黨清楚地意識到，要改變農村社會的結構，促進更大程度的平等，照顧窮人的利益。然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共產黨首先要做的是通過軍隊維護所轄區域的安全。隨後，共產黨派遣自

---

<sup>1</sup> Skocpol (1979).

己的幹部抵達農村地區，指導針對階級敵人和政治敵手的鬥爭工作，並建立起新的農村政府機構，以此幫助頂層權力有效地延伸到社會基層。

41 在馬列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方面，農村革命策略是毛澤東標誌性的貢獻。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是最早的提倡者，也是最堅定的衛道士，他不贊同馬列主義原有的教條，認為中國的革命必須要依靠農民。<sup>2</sup>在1925至1928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毛澤東的主要任務就是領導農民運動。黨內領導認為毛澤東是農村問題方面的專家，毛也幫助訓練了一大批農村幹部，他們中的大多數都隨着國民黨的軍隊一路北進。對於國民黨方面的批評和共產黨內部的質疑，毛澤東堅定反駁道：中國已經準備好了農村革命，只有徹徹底底地改變落後的農業社會結構，才能真正意義上完成中國革命。<sup>3</sup>

1926年7月，北伐開始前夕，毛澤東發表了他獨到的見解，闡述了農民在革命中的政治角色。他分析了中國南部地區農村的經濟結構，甚至包括地下幫會和土匪山寨。他將中國社會分為八個區分鮮明的階級，分析了各階級的特徵，認為少數人剝削多數人，勞苦大眾深陷苦難，種田者卻無土地，地主階級控制地方武裝。<sup>4</sup>在農業人口佔到80%的中國，毛澤東提出了相應的革命方案，「簡單地說，中國的革命就是一場農民革命。」即將到來的國家革命如果不能將農民解放出來，讓他們擺脫經濟和政治上的壓迫，就不可能成功。<sup>5</sup>毛澤東寫道，沒有農民的支持，革命不會成立。事實上，地主階級是目前革命面臨的最大敵人。<sup>6</sup>

毛澤東認為農民運動就是一場階級鬥爭，這一觀點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顯得充滿爭議。1926年，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北伐過程中，原來被地主僱傭的農村民兵被保留下來。毛澤東建議將這些地

---

<sup>2</sup> 另一個早期宣導者是廣東省中國共產黨活動家彭湃，1927年，他在廣東省東部創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1929年被國民黨處決 (Galbiati 1985)。

<sup>3</sup>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156–157).

<sup>4</sup> 毛澤東 (1926a)。

<sup>5</sup> 毛澤東 (1926b)。

<sup>6</sup> 毛澤東 (1926e)。

方民兵解散，因為他們曾效力於地主，將來會成為農村革命的阻礙。<sup>7</sup>地方民兵解除武裝之後，隨軍的共產黨幹部就在佔領區建立了新的農民組織，沒有受到太大的阻礙。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農民組織開展了對「土豪劣紳」的攻擊，他們的財產被分給貧農，隨後自身受到公開批判、毆打甚至是集體處決。<sup>8</sup>

42

協助北伐的蘇聯顧問被農村地區的暴力所震驚，在他們看來，這一情況威脅到了國共合作，不利於國民政府和中國革命力量的團結。在斯大林看來，國民黨軍隊是反抗封建勢力和地方軍閥不可或缺的「資本主義革命力量」。許多國民黨成員自身擁有土地，如果土地革命做得太過火，就會大量傷及他們的利益。斯大林命令中國共產黨適當弱化農村革命的劇烈程度，黨中央也希望能停止暴力，革命軍中的共產黨指揮員被撤換下來，農村起義和土地改革也被擱置下來。<sup>9</sup>

看似所有人都反對毛澤東的主張，針對這些批評，毛澤東強硬地進行了回應，拒斥那些認為農民運動無意義、認為農民是烏合之眾的言辭。相反，毛澤東認為農民運動並沒有威脅到統一戰線，反而讓聯盟更加牢固，動員起了中國大多數的普通老百姓。如果不以暴力方式打倒地主階級，就不會有真正的統一戰線。「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sup>10</sup>

毛澤東早就將自己的觀點闡述一清。幾個月前，毛澤東發表了一篇紀念巴黎公社的文章，他認為「只有國內階級戰爭，才能解放人類」，在文章中他這樣寫道：「現時國內頗有些人懷疑或反對階級鬥爭的，這是不了解人類進化史的緣故」，巴黎公社之所以失敗，原因有二，第一，

<sup>7</sup> 毛澤東 (1926d)。

<sup>8</sup> Wilbur (1983, 591–594).

<sup>9</sup> Brandt (1958, 88–90), Taylor (2011, 61–62), Wilbur (1983, 606–608).

<sup>10</sup> 毛澤東 (1927b)。

「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作指揮」，第二，「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我們對敵人仁慈，便是對同志殘忍……因為我們不用嚴厲的手段對付敵人，敵人便要用極殘酷的手段對付我們了。」毛澤東認為，所謂「赤色的恐怖」只不過是帝國主義欲分散革命勢力的聯合，在毛看來，「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sup>11</sup>

43 1927年2月，毛澤東向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關於湖南農民運動的長篇報道，分析農民革命問題。這是他對農民革命最細緻的闡述。在報告中，農民起義組織對抗地主富農，毛澤東認為這就是後續共產主義土地改革的範本。尤其值得一說的是，報告中的闡述成為後續黨員幹部發動農村「批鬥會」、開展土地革命的理論依據，這一形式也應用在了共產黨對於城市的管治之中。在文章中，毛澤東認為暴力革命才是革命的根本，這一理念一直是毛澤東政治哲學的核心。直到毛澤東去世，他依然秉持這一觀點。

報告大力稱讚了湖南的暴力革命，認為這很有必要，因此大書特書，強調對農村貧民的巨大影響力。有些人一旦發現做過了頭就立馬退縮，毛澤東批評了這種想法，認為有失分寸是常有的事，是革命不可避免的副產物。毛澤東認為，一個人對農村革命的態度就能反映出他的立場，就能區分出他是站在革命的一邊，還是該歸入反動派。在這份檔中，明眼人都能看出內在的緊張局勢，這種局勢不久後就將使國共合作破裂。文章一開始就充滿了毛澤東對農民起義的溢美之詞：

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

---

<sup>11</sup> 毛澤東(1926c)。

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sup>12</sup>

毛澤東對農民起義讚許有加，他的描述後來變成批鬥大會的理論依據，貫穿未來幾十年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發起的革命。「統率大眾，向着和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示威，在他家裏吃飯，少不得要殺豬出穀。」此外，公開羞辱也是農民起義的重要環節，並擁有長久效應：

戴高帽子遊鄉。這種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着，前後簇擁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sup>13</sup>

44

毛澤東認為這做得一點也不過分，農民們這麼做，就是因為要鬥倒那些劣紳地主，這是他們罪有應得。「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在一段著名的段落中，毛澤東論述道：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sup>14</sup>

「過正」有時就意味着集體處決，造成的暴力和恐慌能有效撼動舊制度的基礎。「槍決」只適用於最壞的土豪劣紳，通常是農民聯合其他階層

<sup>12</sup> 毛澤東(1927a, 430)。

<sup>13</sup> 毛澤東(1927a, 446)。

<sup>14</sup> 毛澤東(1927a, 434–435)。

的民眾共同執行。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極有效力。<sup>15</sup>有人反對他這種暴力的行為方式，毛澤東都強硬地予以反駁。事實上，他認為「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sup>16</sup>文章發表僅僅過去一個月，蔣介石就發動了對共產黨員的大清洗。

毛澤東一向認為，革命運動的爆發離不開軍事力量的支持，如果孤立無援，農民是沒辦法突破桎梏的，因為地主劣紳掌握着地方民兵。一個革命的政黨也需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來捍衛起義獲得的根據地。1927年8月，在大清洗僅僅四個月後，毛澤東再次強調了他的立場，「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子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sup>17</sup>1927年大清洗後不久，共產黨人發起了好幾次武裝暴動，但都沒有成功，因此退守偏遠的革命根據地。<sup>18</sup>在鞏固根據地之後，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開始施行先前報告中所描述的措施：在軍事控制地區開展批鬥大會。共產黨動員起貧窮的村民參與其中，瓜分原有農村精英的財產，並對他們發表批評、批鬥和當眾羞辱。毆打和集體處決都是常有的事情。從革命根據地時期的江西蘇區到抗日根據地，再到國共內戰爆發，再到對整個中國的軍事佔領，共產黨一直在進行階級鬥爭，這成為共產黨的一種基本手段，以此打破原有農村精英的政治經濟基礎，重新分配土地並啟用那些忠於黨的新領袖。

## 土地革命的政治影響

土地革命帶來了政治上的深遠影響，其程度不亞於經濟層面。地主

<sup>15</sup> 毛澤東 (1927a, 467)。

<sup>16</sup> 毛澤東 (1927a, 433)。

<sup>17</sup> Schram (1995, 36); 亦可參見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196)。

<sup>18</sup> Wilbur (1983, 673–681, 690–696).

階級和其他類似人群被打倒——他們的財產被一分而光，本人受到當眾侮辱、毆打甚至集體處決，倖存下來的人和他們的後代也都被「鬥倒鬥臭」，再無崛起的可能，因此，舊制度在鄉村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基礎被徹底摧毀，留下權力真空。填補這一真空的是政黨國家的權力架構。政治活動家和黨派成員從勞苦大眾汲取力量，被動員起來參與土地改革，並以村莊領袖的身份加入新的國家框架。新中國與國民政府不同，行使權力時，依靠的不再是原有的地方地主階級和富商家庭。

這看似是土地改革，本質上卻是一場政治革命。在運動發起者的設計中，這是要徹底摧毀舊制度精英的財富和影響，將他們和他們的後代完全擊垮。運動招募了新一代的黨員和農村領袖，這些人將自身視為土地改革的先驅者。這些領導幹部在新的黨派國家中任職，並對其效忠。此外，黨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彰顯了巨大的力量，擊垮了曾經的對手，以不可想像的方式重新建立起了社會制度。農民分得了土地，有了生活上的指望，新政權迅速獲得了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人群的支持。共產黨動員起大部分村民參加暴力批鬥，這些活動經常以草率地處決地主、搶奪並分配他們的財產為結束，這一過程將暴力革命有效地傳播到了鄉村廣大的人群中。<sup>46</sup>

威廉·辛頓 (William Hinton) 是一位持有共產主義觀點的美國人，他在 1940 年代後期來到中國，與中國共產黨共事，對於這場農村革命，他留下了非常詳細的回憶資料。在他的報告中，他詳細記述了山西中部的革命運動，當時日軍已經投降，紅軍進駐此地，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剷除叛徒」。原來的村長、地方民兵領袖和曾經與日本人合作的地主被拉上批鬥大會。共產黨幹部組織了一場浩大的批鬥會，要求所有人必須參加，被批鬥者被捆起來站在台上，幹部對他們大聲批評，指責他們的罪過，扇他們耳光，用拳頭毆打他們。雖然所有村民都被要求參加，但沒有一個人敢上台來加入批鬥。大會不得不推遲到第二天，當天晚上，共產黨幹部將村民分成幾個小組，並逐個分析每個人在日軍佔領時期的表現。他們對村民保證：紅軍將會繼續駐紮在這一地區，所以他們不必擔心打擊報復。在這些小會議中，黨員幹部指定了一部分人參加第

二天的批鬥大會。第二天，批鬥會的效果好了很多，越來越多的村民加入到批鬥會當中，人們紛紛表達對被批鬥者的指控，並要求以暴力方式對待之。幾天之後，一些更高級別的軍隊和黨政官員來到這個村莊，批鬥大會的規模就更大了，情緒也越來越高漲。兩名被批鬥者被判死刑，二人被拉到村邊，執行槍決。他們的財物也被沒收，隨後被分給普通村民。<sup>19</sup>

47

在懲罰了曾經與日軍合作的人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將矛頭指向富農家庭。1946年，他們開始攻擊地主，指控他們在最近的饑荒中囤積糧食。農村幹部領導召開批鬥大會，強迫地主跪下來，並對他們進行毆打，逼他們說出自己的錢財和黃金藏在何處。這些人並沒有被處決，一部分人逃離了這個地方。<sup>20</sup>這僅僅是一個開始，隨後，對地主的批鬥範圍擴大，天主教堂也被包括其中。當地顯赫家庭的族長都被拉上了批鬥大會，人們咆哮着指責他們的罪過，毆打他們，要求他們坦白罪行，有時還對他們進行虐待，逼迫他們供出錢財所藏之處。大會變得越加暴力，許多被批鬥者被活活打死，或者隨後選擇自殺，而他們的財產也被分給貧苦的村民，當地的天主教神父也沒能倖免。<sup>21</sup>

到了1946年中期，嶄新的農村政府機構已經建立，黨員人數也多了起來，並成立了黨組織。可是問題依然存在：有了紅軍和黨組織的支援，官員權力非常大，沒有人能夠挑戰他們的權威。這些新幹部隨即開始濫用自己的權力。威廉·辛頓詳細介紹了這些農村幹部和民兵首領的作為：腐敗、強勢欺人、霸凌群眾、性騷擾甚至強姦女性，而幾乎沒有任何權力的村民對此毫無辦法。<sup>22</sup>在內戰期間的北部中國解放區內，這一情況是普遍存在的。因此，黨的領導層決定，派出一個15人工作小組，其中包括了縣政府的官員、老師以及當地大學的政治活動家（包括威廉·辛頓在內），徹底調查此事並糾正錯誤。工作小組接管了村裏的

<sup>19</sup> Hinton (1966, 110–117).

<sup>20</sup> Hinton (1966, 132–138).

<sup>21</sup> Hinton (1966, 139–146).

<sup>22</sup> Hinton (1966, 222–240).

領導權，調查了村幹部以及黨組織的行為，他們建立起了農民協會，選舉出了新的幹部，並重組了農村政府機構。通過對村民的採訪以及小範圍的小組會議，他們記錄了改革之前土地的分配情況，將每個家庭都歸入到貧農、中農、富農或地主四個級別中的一個。<sup>23</sup>在這些訪談和小範圍會議中，他們也徵集了先前村幹部濫用權力的報告。<sup>24</sup>

正如威廉·辛頓詳細的記錄所展示的，農村改革實際上是國家政權建立的一種方式：它摧毀了舊制度的基礎，掃清了新政治機構的障礙，從先前被邊緣化的階層中招募新的幹部，並對普羅大眾保證他們的生活將會變得美好，這一切行為都使得新的黨派國家獲得了廣泛的支持。<sup>25</sup>

48

在新建立的政權體系下，國家第一次能夠直接從基層家庭徵收稅款。

在中國處於帝國時代的時候，國家政權的機構只延伸到縣一級，這是拿俸祿的國家官僚所達到的最低一層。縣老爺負責徵稅，並維護地方秩序，他們僱用自己的幕僚，與當地其他貴族一起建立關係網。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有土地，並通過了較低一級的科舉考試，農村地區在本質上實行的是地方有產精英領導下的自治，這些精英辦學校、經營寺廟、組織人事關係網，並捐獻錢款，幫助扶貧。<sup>26</sup>

到了1940年代，地方社會和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地方精英參與治理的形式並沒有改變。先前通過科舉考試的地方貴族參與地方治理。但現在，這些傳統意義上的鄉紳不再進行地方治理，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只有少數舉人秀才還活躍在政治舞台上。取代他

<sup>23</sup> Hinton (1966, 275–311).

<sup>24</sup> Hinton (1966, 332–366).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 92–110) 描述在此期間另一個北方村莊發生的類似暴力事件：最初的恐怖主義土地改革是通過製造階級鬥爭，然後是兩撥工作小組來糾正此前運動的錯誤。

<sup>25</sup> Thaxton (2008, 70–83) 描述了另一個村莊的革命過程，這個村莊距離辛頓研究的村莊不遠，在內戰期間進行過不止一次的權力交接。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激烈競爭使得這一地區每一次權力交接時都受到了暴力報復。這使得最殘酷的暴力民兵領袖進入了鄉村新政府的高層。

<sup>26</sup> Ch’ü (1962), Rowe (2009, 48–62), Siu (1989, 41–87).

49 們的是地方上的其他貴族：商人、大地主以及地方政治活動家。他們在農村與政府之間充當協調人的角色，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比科舉考試中走出的傳統鄉紳氏族擁有更加廣泛的自治。<sup>27</sup>

楊慶堃詳細闡述了1948年廣東省南清村的革命情況，他認為南清村1948年的局面並沒有比帝制時代改變多少。在共和時代，縣一級之下的政治秩序依然由非正式的地方社區領導擔任，而縣政府僅僅充當監管角色，每個村莊都是高度自治的權力單位，自從清政府滅亡後，分散的傳統地方政府並沒有從本質上改變，農村的政治生活依然是鬆散的地方政權結構，中央政府並沒有將他們有效地整合進國家體系。<sup>28</sup>在楊的敘述中，村莊裏修路修堤壩、挖運河、經營村裏的學校、給地方民兵補充裝備、抵禦外敵的角色是由家族勢力完成的，貧農和中農則自發組織起了莊稼保護隊，抵抗強盜和小偷。<sup>29</sup>他們也與當地的地下組織建立了某種聯繫，有時候還會與黑幫或幫會建立同盟。在同一個村莊中，有時可能出現多個非正式的權力組織。<sup>30</sup>

新中國成立後，楊慶堃還對這一情況進行了五年的後續調研，並從基層角度按時間順序詳細記錄了新政權的鞏固。與中國的其他地方一樣，與階級鬥爭和土地革命同時存在的還有打土豪的活動，儘管村子裏並沒有公開的審判和處決，每個家庭都被貼上了階級的標籤，有多少地、家裏有多少財產都記錄在案。牲畜先被充公，隨後重新分配。家族財產也被迫交出，用於學校和宗廟的建設。<sup>31</sup>

與此同時，政治改變同樣劇烈。在軍隊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的政權機構，莊稼保護隊被解除武裝，隨後解散。當地民兵的裝備充公，顯赫家庭的影響被消除，他們中的許多人逃往香港，幫會組織的財產也被沒收，不再發揮先前的社會功能，出現在農村的第一批國家代

<sup>27</sup> Barkan (1990), Duara (1990), Watson (1990).

<sup>28</sup> Yang (1959, 103, 106). 亦可參見 Siu (1989, 88–115) 對附近縣城的描述。

<sup>29</sup> Yang (1959, 109–110).

<sup>30</sup> Yang (1945, 143–156 and 173–189) 描述了山東北部的相似村莊。

<sup>31</sup> Yang (1959, 146–166).

理人是全副武裝的士兵和上面派遣來的幹部。在土地改革結束之後，1951年，鎮壓反革命的活動爆發，16個人沒審判就被處決，也沒有公開解釋。隨後恐慌在農民心中傳播開來，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些人成為了人民的敵人，新的地方政府指派了一名新村長和副村長，新的民兵組織被建立起來，但直接受到區政府的管轄。<sup>32</sup>楊慶堃總結道：「在極短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就在南清村廢除了舊的正式制度，完全解散了先前的非正式地方權力架構，在這一進程中，中國迅速向一個現代國家的模樣靠近，國家的集體化中央政治權力高度強化。」<sup>33</sup>

## 土地革命的經濟影響

土地革命在經濟層面的影響同樣劇烈。在短短的時間內，富農家庭的土地被沒收，並重新分配到貧農手中，土地的分配情況相當平均。在1930年代，貧農和貧下中農佔到中國農村人口的57%，卻只擁有24%的土地，在土地革命之後，他們的人均耕地份額幾乎翻倍，達到47%。而另一方面，富農和地主則遭受巨大損失。富農佔到全國人口的3.5%，擁有18%的耕地，但是，在土地革命之後，該份額下降到了6.4%。地主是土地改革中最慘的一個階層，他們不但要面對暴力批鬥大會和處決，還損失大量土地。地主只佔全國人口的2.5%，卻擁有40%的土地，現在，這一份額銳減到了2%。<sup>34</sup>圖3.1說明了這一場土地改革的劇烈程度。貧農的人均耕地面積幾乎翻倍，中農的份額略有上升，雖然富農的土地依然比旁人多得多，但也損失了原有的三分之一。在土地改革中，地主被徹底摧垮。顯然，地主是土地革命政治經濟層面打擊的主要目標，他們的人均佔有土地量暴跌了90%，在土地改革之後，他們擁有的財產也只是和普通村民一樣多。<sup>35</sup>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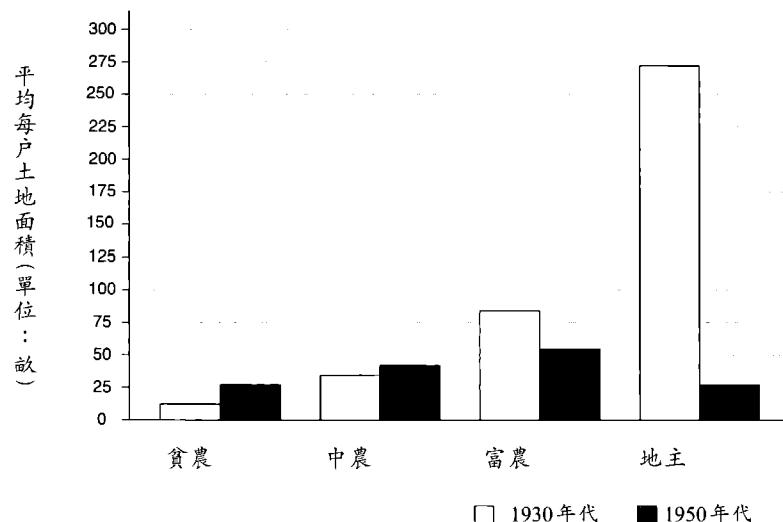
<sup>32</sup> Yang (1959, 167–175).

<sup>33</sup> Yang (1959, 169, 174). 亦可參見 Huaiyin Li (2009, 5) 和 Siu (1989, 116–142)。

<sup>34</sup> Riskin (1987, 51).

<sup>35</sup>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 84, 86, 105) and Huaiyin Li (2009, 11–19) 從村莊層面詳細描述了土地改革。

圖 3.1 土改前後各階層平均土地佔有量



來源：Riskin (1987, 51)

暴力是這一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儘管人們也完全有可能在不使用暴力批鬥、集體處決和政治手腕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土地並解除地主權力。1950 年代，戰後的日本、韓國以及台灣就進行了程度適中而有效的土地改革，讓土地的分配更加公平，並且為小農繁榮創造了基礎，奠定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在這種非暴力的土地革命中，地主雖然失去了原有的資源和特權，不再統治農村經濟，但是他們好歹還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補償，其餘形式的財產也都得到了保護，更沒有成為政治犯。

蔣介石退守台灣之後，國民黨在島內就進行了此種形式的土地改革，並佐證了其可行性。在大陸期間，國民黨的立法機構一直擱置此事，只是嘴上討論，從來沒有實施，在退守台灣之後，蔣介石建立了更加集權和壓迫的獨裁統治，並最終將這一政策實施到位。1949 至 1953 年，台灣當局立法規定：農民的地租只收取當年產量的 37.5% (八分之三)，公有土地以及從日本人手中沒收的土地被賣給無地的農民，價格上也打了不小的折扣。政府設置了土地保有量的上限，凡超過這一上限的土地都被廉價賣給了小農。地主雖然失去了土地，但是也獲得了補償，

得到了國有企業一部分的股份。擁有土地的家庭比例從原來的36%上升到65%，租用土地的家庭比例從原有的39%降至11%。改革的程度沒有中國大陸那麼激烈，也沒有分出什麼社會階級，從經濟上或肉體上摧殘這些地主們。不過，在台灣，地主的權力被徹底消解，獨立小農組織起農村信用社和儲蓄社，建立起運輸機構並促進農村的產業發展。<sup>36</sup>

## 鞏固對農村的控制

就像政權鞏固要經歷很複雜的過程一樣，農村的改變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在1950年代初期，如果黨員和農村幹部沒能盡職履行職責，黨組織就要予以懲罰。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農村黨員幹部越來越只關注自己家庭農場的生產。有一些農村幹部已經十分滿意改革成果，覺得土地革命已經達到了目的，現在是時候專注於農業生產了。因此他們更關心經濟，而不是政治活動，因為後者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影響種田，更何況當個農村幹部也沒什麼錢拿。許多農村黨員僱起了勞力，讓他們在田間勞作，這在一部分人看來是經濟盤剝的一種形式。黨組織對此事很關注，認為這一行為讓黨丟失了無產階級本色。1951年，在村黨組內掀起了一場「反右風」運動。有一成的農村幹部和黨員被撤職或開除，餘下的也受到嚴厲批評，一部分還受到了輕微的處罰。<sup>37</sup>

52

第二個問題是新的農村幹部做事粗暴，這一點早在威廉·辛頓對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的記述中已體現出來。他們壓迫批評言論，為了與黨的政策保持一致不惜使用強迫和恐嚇的方式，還經常使用暴力威脅，甚至是毆打。幹部們這麼做，也是事出有因，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上級領導要求他們必須完成給予的強制目標。1953年，為了解決這種權力濫用，又一場運動展開了。和前幾次一樣，黨和國家的基層幹部遭受了調查、批評，有的被解職，甚至入獄。<sup>38</sup>

<sup>36</sup> Wang (1999, 324–328), Tien (1989, 23–24).

<sup>37</sup> Bernstein (1968).

<sup>38</sup> 同上。

在許多農村地區，尤其是那些解放軍迅速佔領的省份，新的農村政府雖然建立，但是根基不穩。例如，貴州省於1949年11月被解放，土地革命很快推行，基層政府草草建立。隨即，新政府要求農民上繳大量的糧食以支持接下來的軍事行動，農民們不堪重負，便組織起來抵抗。農村幹部多是那些解放軍進駐時表現合作的人，現在反倒帶領民眾抵抗政府。1950年1月，解放軍進駐滇藏，反抗共產黨的地方武裝獲得了很大的支持，共產黨不得不從28個被圍困的區縣撤出。直到1951年，解放軍才完全控制住貴州。解放軍重新進駐該地區後，實行了所謂「恐怖」的強制措施。相似的問題也出現在中國西南地區，解放軍不得不採取強有力的壓制。<sup>39</sup>

1950年10月，中國加入朝鮮戰爭，自此之後，新政權更加注重內部安全，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貴州的情況只是全國運動的一個縮影。就像土地革命一樣，本場運動針對的是那些政治上和社會領域內被認定為敵人的群體，包括曾經的國民黨士兵、國民黨黨員、黑幫罪犯、地方豪強、邪教首腦、地下機構領袖、天主教神父、新教牧師和尋常罪犯。鎮壓反革命讓人們又想起了土地改革式的公開宣判、批鬥大會、關押罪犯和集體處決。<sup>40</sup>目前，學界對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的具體死亡數字沒有定論，但起碼有上百萬人。據一項分析統計，1947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中，共有約150萬至200萬人死亡。<sup>41</sup>黨內統計數字表明，至少71萬人在鎮壓反革命中被處決，另有120萬人入獄。非官方的統計數字往往更高。<sup>42</sup>

<sup>39</sup> Brown (2007). Dikötter (2013, 76–80) 記錄了中國南方地區廣泛的集體反抗和個別叛亂。

<sup>40</sup> Strauss (2006).

<sup>41</sup> Dikötter (2013, 83).

<sup>42</sup> Schoenhals (2008b, 72). 這一數據包括城鄉地區，但不包括土地革命期間的死亡人數。Schoenhals (2008b, 68–73) 提供了對死亡人數不同估計的批判性評述。Strauss (2006, 91) 指出被處以死刑的人估計高達五百萬之多。

## 走向農村合作社

農村經濟從內戰中快速恢復，有跡象表明，中國的小農體系將會讓農民過上好日子。農村市場復蘇，家庭收入增加，新中國成立時雖然內憂外患，但是最初幾年發展良好。<sup>43</sup>然而，新政權的目的不是建立小農產業體系。在1953年毛澤東發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中，這一點就已闡明。土地革命為的是剷除地主階級的勢力，獲得農民的支持，創造新社會主義的國家基礎。接下去是要建立以蘇聯為範本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這就意味着私人所有制的終結和集體合作社的開始。

1953年，土地改革剛剛完成不久，村幹部就鼓勵大家將每家每戶的勞動力都匯聚起來，共用牲畜，互幫互助，共同生產。新政策下，糧食都是要「統購統銷」的，這就意味着私人糧食市場已被禁止，所有的糧食作物都要拿到國家糧食採購站去賣，價錢也由國家規定。<sup>44</sup>到了1954年，所有的糧食供銷都被強制國有化，每戶除了國家規定口糧外的「餘糧」都必須賣給國家。雖然務農比城裏的工作更耗體力，但是國家設定的農村基本口糧卻比城市居民要低。<sup>45</sup>

54

國家要從農民手中收集糧食，量和價都要國家說了算，上述政策還只是第一步。中國仿效蘇聯集體農業的道路，唯一的問題就是這一進程需要多久。為了實現集體農業，通常來說，要先在獨立小農中間建立互幫互助團隊，這能夠在播種和收割農忙時期盡可能地匯集勞動力。接下來要建立農業合作社，此時每家每戶依然擁有自己的土地，但是耕牛、農具和農業機械歸為合作社所有。家家戶戶都需要向合作社捐資，用於批發種子化肥，飼養耕牛，或是購買農機所需的燃油。和生產互助隊一樣，在播種和收穫的農忙時節，合作社的成員們需要互幫互助。<sup>46</sup>

最後一個階段就是高級農村合作社，土地也不歸農戶所有，而是集

<sup>43</sup>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 111–122), Lardy (1987b).

<sup>44</sup> Oi (1989, 43–44), Shue (1980, 214–245).

<sup>45</sup> Cheng and Selden (1994, 660).

<sup>46</sup> Bernstein (1967).

體耕種，整合進超大集體農場之中，實行集體所有制，負責管理的農村領導也由黨直接任命。集體農場就像是一個工廠，參與的農戶就好比員工，集體農場的管理者負責統籌一切事宜：農業生產、勞務分工、存儲糧食、糧食買賣等等，農場的利潤也由他們存入集體賬戶統一管理。<sup>47</sup>

毛澤東始終要求中國的經濟要盡快追隨蘇聯的道路大步前進，其政策力度超過了蘇聯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的預期。斯大林曾經建議毛澤東步子可以慢一些，在可預見的未來保留現有的經濟架構，採取長期的政策，完成農業的集體化和工業的社會主義轉型。但是，毛澤東堅定地認為中國必須按照《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所描述的蘇聯的集體所有制改革那樣，快速地實現社會主義。<sup>48</sup> 斯大林在1951年出版了他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迴避了自己在蘇聯早期社會主義改革中的貢獻（或者說，是間接承認了當時的改革手段對蘇聯經濟的破壞）。在書中，斯大林認為要實現迅速的經濟轉型，單靠政治意願是不夠的。他強調，無論對於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有「發展的法則」。<sup>49</sup> 斯大林也認為中國的經濟過於落後，還不能直接轉型為社會主義，急於求成反而會造成經濟衰退。其他的黨內領導，尤其是周恩來、劉少奇和鄧子恢也贊同斯大林的觀點，他們和蘇聯有更密切的聯繫，對當時的社會主義經濟觀點認識更深，因此呼籲採取較為溫和謹慎的方式。

在1950年代早期，毛澤東隱晦地表達了他的不同意見，到了1960年代初期，他寫了許多沒有公開出版的蘇維埃政治經濟「讀書筆記」，公開批評斯大林的這一轉變。<sup>50</sup> 事實上，毛澤東更加讚許早年斯大林的革命作為而反對後期的斯大林。毛澤東始終認為中國可以複製《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蘇聯成功的模式。毛澤東急切地推動革命，並

<sup>47</sup> Oi (1989, 13–42), Siu (1989, 143–167).

<sup>48</sup> Tucker (1990, 69–145).

<sup>49</sup> 根據 Serice (2004, 566)：「此處展現出了驚人的偽善。如果說曾經有人試圖通過純粹的意志和暴力來改變一個經濟體，那一定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斯大林的領導下。」

<sup>50</sup> 毛澤東 (1977)。

不認為中國如斯大林所說的那樣貧窮落後。斯大林在世時，毛澤東並沒有與他撕破臉，只是低調地漠視他的建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毛澤東立即加速了自己的政策，號召建立起生產互助隊和農村公社，發起了集體化運動，力圖在1960年代早期完成。<sup>51</sup>1957年，毛與其他黨內領導發生了意見分歧，對集體化的速度保有不同意見，毛澤東批評了其中一部分人，說他們是「右派」，並要求1958年之內必須迅速完成集體化。<sup>52</sup>

1951年，村幹部開始組織生產互助隊。到了1953年，有一半的人已經是互助隊的成員。1954年，這一數字上升到85%。1955至1956年，毛澤東號召集體化的腳步進入「高潮期」，高級合作社被迅速建立起來。1955年底，已有62%的家庭加入，1956年底，幾乎家家戶戶都是合作社成員。1957年底，毛澤東決定建立更大規模的高級公社，動員群眾參加，到了1958年底，接近100%的家庭都加入了高級公社。<sup>53</sup>整個過程快速高效，一切都看似順利成功，尤其是沒有發生像蘇聯一樣的暴力事件，也沒有遇到俄羅斯和烏克蘭曾發生的饑荒問題。<sup>54</sup>不過，地方上還是有廣泛的反抗，甚至是個別起義事件。底層幹部為了實現上面強制派發的任務，有時也確實不擇手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sup>55</sup>

56

<sup>51</sup> Hua- Yu Li (2006, 61–94).

<sup>52</sup> Teiwes and Sun (1999, 20–52, 70–77).

<sup>53</sup> Riskin (1987, 86).

<sup>54</sup> Bernstein (1967), Conquest (1986).

<sup>55</sup> Bernstein (1967), Dikötter (2013, 208–225).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 122–198), Huaiyin Li (2006; 2007; 2009, 23–49), and Thaxton (2008, 89–117)追溯了從家庭農場到集體一波三折的變化過程。以上文章都具體描述了每個階段遭遇的嚴重問題和很多家庭農場微妙而公開的反抗——在後期尤為明顯。Bernstein (1967)、Liu 和 Wang (2006)分析了當地幹部的政治壓力，這種壓力使得集體化速度加快，甚至快於預期速度。

## 村莊作為集體公社

集體化帶來的，是一種徹底全新的社會經濟組織的形式。對於農戶來說，土地改革帶來的成果只持續了很短一段時間，貧農先是分得了土地，隨後卻立即收回國有。為了過上好日子，農戶本可以自己決定地上種什麼莊稼，勞動力怎麼分配，可現在不行了。個體農戶幾乎絕跡，農戶也只能在公社任務之餘偷偷地搞點副業。農民們曾在集市上銷售自家產的蛋、雞、豬、手工藝品和其他產品，現在被全部取締。取而代之的是國家運營的採購站，收購主糧和其他經濟作物。到了這一時期，所有的土地、農具和牲畜都被納入集體所有制的控制之下。<sup>56</sup>

到了1950年代末期，集體合作社的數量翻倍，既是行政單元也是經濟實體。高級公社的規模並不是單一不變的，在大躍進期間，公社的規模迅速擴張，十分驚人；但是到1960至1980年代，高級公社的規模略有縮小。後來，每一個縣的農業人口都會被組織進入人民公社——這是高級合作社新的名稱。人民公社的領導小組是國家官僚機構的最低一級，配備有書記和委員會以及其他必要的官員，他們領的都是國家的薪水。一個人人民公社一般有15,000人左右，通常覆蓋了好幾個村莊。每一個人民公社平均有15個生產大隊，每個大隊平均有220戶人家，980口人。生產大隊基本上就是一個村莊的人口，有時如果村莊很大，可能一個村裏有兩到三個生產大隊；而村子很小的時候，一個生產大隊可能就包含了好幾個村莊。每個生產大隊又被細分為許多小的生產小隊，一般平均是7個。生產小隊是農業組織的最基本單位，相對來說規模很小，在1970年代早期平均只有30戶人家，145口人左右。<sup>57</sup>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有自己的領導、會計和其他職員，他們的薪水並不是國家劃撥的，而是由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自理，這些人不屬於國家公務員系統。國家的官僚體系只延伸到人民公社一級，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的領導本身就是隊員，吃住和生產都在一起。

<sup>56</sup> Oi (1989, 132–145).

<sup>57</sup> Oi (1989, 5).

根據上級縣政府設定的生產目標，人民公社的領導會對生產做出具體的部署。生產大隊和小隊的領導要負責完成這些生產計劃，他們會對公社成員做具體分工，組織耕種、收割、加工、存儲和運輸。農民們因此獲得「工分」，工分都詳細記錄在案，年終會算總分。公社若是年末有現金結餘，就會根據每家每戶所有家庭成員的工分多少分配這筆錢。公社的每個成員也會根據性別和年齡分到配額的口糧，這部分糧食是生產大隊向糧食採購站交足份額之後剩下的部分。農村居民只能從生產大隊獲取糧食，因此沒有閒餘時間從事務農之外的活動。農民也要參加無償的「服務勞動」，農閒的時候，在公社幹部的領導和帶領下去修路、修水利。農民作為一種勞動力，被牢牢地綁在土地上。

1953年開始，農村的集體化基本完成，並催生了國家採購系統。主糧（水稻、小麥、大麥、玉米和高粱）、油料作物（花生、油菜籽和芝麻）以及經濟作物（棉花、煙草、甜菜和大麻類植物）都只能賣給國家採購站，買賣的價格也由國家規定。這一體制實行起來很簡單，因為控制公社的是公社和大隊領導，而不是具體農戶。這些生產負責人直接對上級負責，生產指標的達標與否決定着他們的升降。此外，也沒有其餘的市場可供買賣。這一體制下，計劃經濟的決策機構可以控制農業貿易，某種作物的具體比例也由他們說了算。<sup>58</sup>

在蘇聯的集體農業中，政府能夠從農業領域量大價低地獲取資源，以支援城市地區的高速工業發展。糧食價格走低時，城市工人的薪水也相應變少，結餘的資金就可以用於工業發展。隨着時間的推移，主要種植物都變成了主糧作物。農戶單幹的行為是嚴厲禁止的，更不能搞非農領域的副業，這讓農民的日子過得很苦。國家要求的糧食生產量很高，但設定的購糧價格卻十分低廉，這就意味着高級合作社裏的農戶們口糧很緊，現金收入更是少之又少。到了1970年代，除了煙草等「經濟作物」之外，對於絕大多數政府統一供銷的農作物來說，政府提供的購糧價格僅夠勉強維持農民的生產成本。<sup>59</sup>

<sup>58</sup> Oi (1989, 43–65).

<sup>59</sup> Ash (2006), Oi (1989, 55).

從事家庭生產將受到責難，有時還會面對嚴厲的懲罰，因為只顧自己家庭生產的行為是和集體活動的精神背道而馳的。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中，想搞些家庭副業幾乎不可能，雞、鴨、豬和魚塘等生產資料都控制在生產大隊或小隊手中，人們只是參加勞作，獲取工分。和糧食一樣，這些產品的供銷也是由生產隊統一管理的。有些生產隊業主組織了一些非農業活動——建設隊、手工製品作坊或者像磚瓦廠之類的工業組織，但利潤都由集體管理並存入銀行，人們絕大多數時間拿到的只是工分，能真的分到現金的時候少之又少。<sup>60</sup>

定期集市現在也幾乎銷聲匿跡，作為中國鄉村數百年來的一項特色活動，即使還有，也變成了偷偷摸摸的黑市交易。<sup>61</sup>取而代之的是國家運營的採購系統，國家從集體農場中收購糧食，量和價都由國家計劃部門規定。計劃經濟的執行者試圖確保集體農場中的農戶們都有足夠多的口糧，能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品質，而事實並非如此。國家過於重視主糧的生產，這使得過去在家庭生產模式下種類繁多的作物和副業產品生產大幅降低，導致農民開始以主糧生產為中心的農作模式。生產隊裏，大家都過着相同水準的日子，差別之小甚至超過剛土改的時候。部分工作相對輕鬆，例如領導職位、拖拉機駕駛員、木匠都能掙更多的工分，而整日辛勞但不需要太多技術的務農工作所得工分卻較少。不過大家的收入幾乎一樣，村子裏每家每戶的生活水準也都差不多。

這些變化讓村幹部獲得了比集體化之前更多的權力。根據李懷印所述，「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公社幹部作為特權者的出現」。在之前，這些人都是參加過革命的人，或是在土地改革和建立公社的過程中表現活躍的人，許多時候「依靠自己的巨大努力、勤儉節約、貼近民眾而獲得了村民的敬重。」在集體化出現以後，他們反而利用自身特權，將自己和普通民眾區分開來。他們能靠自己的工作掙得更多的工分，真正付出的勞動卻不是很多，收入都超過一般的壯勞力社員。這些發展其實都是新架

<sup>60</sup> Oi (1989, 135–137), Walder (1986, 54–56).

<sup>61</sup> Burns (1981), Oi (1989, 138–141).

構下的必然產物：「他們控制了公社內的所有經濟生活，包括安排工作、獎勵工分、分配農產品以及運營公社財政。」這一轉變越來越依賴行政秩序、強制手段，有時村幹部還會對農民言語侮辱、拳腳相加。這也讓村幹部開始有機會「參與腐敗和其他不軌行為」，<sup>62</sup>從蘇聯照搬的體制讓農村生活變得官僚化，「農業的集體化不僅讓國家能夠觸及最基層的農戶，也催生了數百萬基層的村幹部，他們的數量龐大到已經難以被政府直接指揮。」<sup>63</sup>

## 中國農村的轉型

在短短的十年間，中國共產黨徹底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從前，治理中國鄉村的是地方精英，他們的權威來自於私人財產、教育水準和對軍事力量的掌控。國家這一概念離村莊很遙遠，就連徵稅也是交給地方精英，因此農村在很大程度上實行的是自我管理。土地的歸屬也很多樣，有的地主從祖輩繼承掌握了大塊土地，僱傭長工在田間勞作，也有的小農戶自己擁有不大的田地，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秘密組織和宗教社團散播各地。基督教的傳教士也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將教義傳播到鄉村各處。土匪惡霸並不是什麼稀奇事，僱傭軍時而保護，時而欺凌，農村生活在許多地方其實很不安全。

之後，中國共產黨依靠武裝力量建立了新的統一政權，將權力管轄直接延伸到中國農村，並有效消除了土匪惡霸、私人軍隊、秘密結社、宗教團隊和邪教組織。真正保障這些革命性土地改革的其實是軍隊的力量，他們摧垮了原有的農村精英。國家延伸權力的第一步就是摧毀擁有權勢的地方精英，並消除他們的經濟基礎。在摧毀原有權貴的框架後，共產黨讓貧苦的農民參與到政治中來，這些人變成了土地改革中的活躍分子，在接受訓練和學習教條之後，又成為了新一代的農村管理層。重

60

<sup>62</sup> Huaiyin Li (2009, 44–47).

<sup>63</sup> Huaiyin Li (2009, 5).

新分配土地、均分財產之後，共產黨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同時也打破了世人曾經對它的懷疑。

與過往任何一個政體相比，共產黨將權力延伸至農村基層後，迅速控制了農業生產。土地和牲畜重新被收歸集體所有，國家和國家在農村的代理人們現在控制了糧食生產決定、收穫後的糧食作物、農產品的供銷和利潤分配。他們也控制了作為勞動力的農村人口，不讓農戶脫離集體公社。土改代表著農村革命的第一階段，劇烈地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經濟結構，並說明國家政權將權力延伸至最基層的農村生活。集體化則是農村革命的第二階段，讓農村經濟朝着另一個方向迅速發展，國家的權力延伸更深入了，打破了千百年來以宗法制和農戶為基礎的農村結構。

## 城市革命

自192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略一直着重於鄉村地區，在1947年之後，解放軍逐步向南向西推進，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綱領就在這些地區開展起來。共產黨幹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全國各地開展農村革命。而在城市，又是另一種局面。從1946年開始，共產黨才逐步控制了各大城市，第一個實際控制的城市是從蘇軍手中接管的哈爾濱。在東三省之外，解放軍第一個控制的是河北省的張家口市。解放軍在1945年8月佔領張家口，但是國民黨軍隊又在1946年10月將其奪回。<sup>1</sup>在最初，共產黨的策略是實行軍事管控，除了國民黨控制的國有企業之外，對當地的工商業所有制實行完整保留。在城市中，主要的側重點還是維持經濟穩定，促進工業發展，而不是着急摧毀舊社會的經濟基礎。當時的政策是較為溫和的，為的是保留國家經濟實力，穩定工業基礎，慢慢地過渡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上去。<sup>2</sup>

儘管共產黨在工會、學校、員警甚至是政府機構很早就有地下黨在活動，但是想要運行大城市，共產黨的幹部顯然太少了。此外，與農村不同的是，共產黨在城市明顯缺乏選民基礎，而城市居民是這裏人口組成的絕大多數，沒有群眾基礎，事情就難以像農村一樣順利開展。在城

<sup>1</sup> Pepper (1999, 332).

<sup>2</sup> Gao (2004, 14–16), Pepper (1999, 376–380).

市中還有很多曾效力於國民黨的黨員、官員、工業資本家、工會代表、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這些人即使對新政權效忠，也是搖擺不定的，因為共產黨的政策其實對他們並不是很有利。

解放軍最初佔領東三省和華北各大城鎮後，解放軍因並未做好面對新任務的準備而常常出現違紀現象。有些部隊和黨員奪取了私有產業和手工藝作坊，拆走了工廠的設備，沒收了城市居民的私有財物，號稱這是「敵人的軍用物資」。這些做法擾亂了城鎮經濟，共產黨實際上需要一些組織的支援與合作，但這些行為反而創造了一種恐慌情緒。毛澤東不想這些錯誤重演，他命令解放軍進駐城市時避免此類事件發生，要注意保護私有財產，尊重當地居民。<sup>3</sup> 共產黨在最初的一段時間別無他法，必須要依靠現有的職能機構和員警力量才能維護秩序。

隨着時間推移，共產黨也將農村革命的一些手法應用到城市中來。土地革命在城市中似乎沒有什麼用武之地，不過動員群眾的策略顯得同樣好用。為了在城市裏鞏固政權，共產黨軟硬兼施，動員起足夠多的力量。和鄉村一樣，這一過程時有暴力發生，常伴隨行事粗魯、公開威脅甚至是恐嚇。不過，僅僅是強制和恐怖並不能夠闡明共產黨如何完成其目的：共產黨也建立起基層組織，允許他們對居民進行監管、獎善罰惡，深化對城市的控制。

1949至1956年，共產黨使用了三種方法鞏固在城市的控制。最激烈的方法就是大規模群眾運動，以此強化對城市的政治控制。其中包括城市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隨後的「三反五反」運動，打擊政府腐敗和偷稅漏稅，沒收了許多私人產業。第二種方法目的是改變目標群體的行為風格和做事態度。其中包括打擊犯罪、吸毒和賣淫嫖娼行為，也包括對「資本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革」運動。第三種方法是動員政府官僚體系完成具體任務，比如登記城鎮人口，審查員警力量的可靠程度，對服務業和手工業進行集體化改革，以及將工業國有化等工作。<sup>4</sup>

<sup>3</sup> Pepper (1999, 386–390), Wakeman (2007).

<sup>4</sup> Strauss (2006) 也提到了第四種運動，旨在動員民眾完成社區任務，如植樹、滅鼠滅蚊，或清理城市社區的健康危害。

到了1950年代中期，最初掃除敵對勢力、消除潛在批評的工作已經完成。共產黨開始通過官僚體系的途徑對民眾展開控制。戶口制度讓人口不能自由流動，永久遷居很困難，若未經批准，旅遊都不行。國家也建立了配額制度，根據社會地位和等級分配食物、住房和其他物資。政府任命的官員四處巡查居民的生活，和社區中的員警站合作並維持秩序。私營的手工業、服務業和製造業被公有化，納入政府的管轄之下。找工作也由政府直接包辦，不再是自由擇業。根據社會階層和政治背景，城鎮人口全部註冊登記、國家同時施行檔案制度，跟蹤每個人的行為記錄和政治傾向。到1950年代後期，早期頻繁使用的群眾大會、公開審判和處決已經被國家機關單位和地方社區的日常官僚運作取而代之。

63

## 建立秩序

每當解放軍進入一座城市，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撤掉該市的所有最高領導，換成隨軍南下的黨員幹部，並組建「軍事管制委員會」。<sup>5</sup>多數隨軍南下的幹部都是北部根據地的老兵，生在北方，長在北方，不習慣南方的生活，方言也不會講。<sup>6</sup>當時共產黨遇到了嚴重的人才匱乏問題：有城市經驗的幹部實在是太少了。先前做地下黨工作的幹部人數也不夠，游擊隊員根本不適應城市生活。先前，有許多活躍的學生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組織並隨軍南下，他們很好地填補了這一空缺。不過即使如此，共產黨還是不得不依靠原有的城市管理者和員警力量維護秩序。<sup>7</sup>

1949至1950年，有超過六成的國民黨員警在接受了「再教育課程」後繼續留任。他們受到共產黨從解放軍裏新訓練出的一批警員以及原先滲透進員警系統的地下黨員的監管。抗日戰爭期間，日軍佔領上海後建

64

<sup>5</sup> Gao (2004, 69–79), Vogel (1969, 46–51).

<sup>6</sup> Gao (2004, 47–51), Vogel (1969, 51–55).

<sup>7</sup> Brown (2012, 16–22), Gao (2004, 51–64), Vogel (1969, 55–60), Wakeman (2007).

立了社區組織，國民政府奪回上海後保留了這一套組織。<sup>8</sup>上海解放後，共產黨充分運用了既有的社區組織，將其更新並擴大，建立了戶籍制度和配給制度。和國民黨不同的是，共產黨新政權利用基層社區組織，動員廣大人民參與到群眾大會和政治運動中。<sup>9</sup>

在完成「再教育」之後，這些員警在上海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維護社會秩序。他們取締了街上的小商小販，數量銳減至原先的一半。為了合法經營，所有的出版物都必須登記在案。貨幣兌換業務被禁止。乞丐、扒手和其他流浪者都被抓起來、登記然後接受再教育。三輪車夫與城市幫會攜手搞的詐騙也被禁止，偽造貨幣者被處決。原先的國民黨士兵和官員都需要登記，如果願意自己站出來，就會獲得寬恕，要想隱瞞身份，就會面臨嚴厲的懲罰。對待犯罪實行的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政府還大力杜絕搶劫行為。部分國民黨轉入地下，從事暗中破壞、顛覆和刺殺行動，但都受到最嚴厲的打擊。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這些措施變得越加嚴格，鎮壓反革命運動如火如荼。新生的政權加倍努力地鞏固自身，手段也愈加暴力。<sup>10</sup>

新政權也明確表示，在華的外國人即使長期旅居於此也變得不受歡迎。他們被員警騷擾，房產被沒收，許多外國商人、領事官員、教師甚至是留學生有時會被關起來。這些事即使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也屢見不鮮。隨着迫害的加劇，一大批人被關押或驅逐，部分人還被殺死。在華外國人於1951年急劇縮減。尤其遭殃的是天主教和新教教堂以及下轄的育嬰堂、慈善機構和修道院。在短短幾年間，在中國大地上的外國人就只剩下從蘇聯和其衛星國家派來的顧問。<sup>11</sup>

<sup>8</sup> Wakeman (2007, 23–25).

<sup>9</sup> Wakeman (2007, 43).

<sup>10</sup> Dikötter (2013, 50–51, 53–55), Wakeman (2007, 52–58).

<sup>11</sup> Dikötter (2013, 104–120, 124–127), Hooper (1986).

## 剿滅反對派

65

建國之初，維護公共秩序是主要目標，而在1950至1951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開始變得頻繁起來。像村莊一樣，解放軍所到之處其實遇到了許多反抗。在城鎮中，首要的難題是活躍在地下的國民黨分子，他們暗中搞破壞，並進行暗殺活動。但是，這場運動同時也指向秘密社團、地下犯罪團夥和邪教組織。這些其實構成了中國城市生活特色的一部分，也有能力反抗新政權的建立。相對應地，共產黨採取大規模集會、公開批鬥、高音喇叭播放判決、廣播其犯罪行徑等方式予以鎮壓，有時還包含大批公開逮捕和處決。<sup>12</sup>批鬥會都是精心準備的，充滿激情，民眾到了最後都高呼要立即集體處決罪犯。有些人雖然被批倒，但是免於牢獄，不過在接下去的時光中，生活都受公安的監視。<sup>13</sup>隨着運動的深入，批鬥大會和審判集會成為城市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景象：在杭州，超過45萬人次的民眾參加了1,545場批判反革命分子的集會。<sup>14</sup>

根據官方數據，有120萬人被捕並送到勞改營，超過71萬人被處決。<sup>15</sup>有事實證明，被處決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黨內領導的預期。毛澤東曾經想控制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處決的比例，讓下屬做事謹慎些，緩和運動的劇烈程度。毛澤東多次在報告上批閱，指出處決罪犯的比例應該限定在總人口的千分之一。<sup>16</sup>地方官員不願意讓別人覺得自己在鎮壓反革命立場上顯得柔弱，就盡可能按照這一比例落實，彷彿是完成目標份額一樣。運動最初的檔案指出，間諜、暗中破壞者和地下反抗組織的成員是此次運動的目標，要被處決。但是許多地方政府發現沒有那麼多人來

<sup>12</sup> Lieberthal (1980, 53–77), Strauss (2002). Dikötter (2013, 83–99) 主要基於黨內檔案描繪了運動的生動場面。

<sup>13</sup> Gao (2004, 140–146), Vogel (1969, 62–65), Yang (2008).

<sup>14</sup> Gao (2004, 144).

<sup>15</sup> Schoenhals (2008b, 72); 亦可參見 Gao (2004, 140) 及 Strauss (2002, 87–89; 2006, 901)。Dikötter (2013, 99–100) 基於黨內檔案發現，城鄉地區的可信死刑數據估計在二百萬人左右。

<sup>16</sup> Yang (2008, 109).

達到千分之一的指標，於是名單中又加入了犯罪團夥成員和邪教組織的首腦，他們被扣上了「地痞惡霸」的名號，在沒有具體罪行指控的情況下也一併被處決。在整場運動中，先前的國民黨士兵和官員以為只要登記身份就會得到寬大處理，但他們也被捕，最後被殺。在貴州，國民黨統治時期的 81 名縣長全部被處決，成都周邊的鄉鎮長也幾乎無一倖免。<sup>17</sup>

這場運動掃平了一些有組織的抵抗，也剿滅了國民黨殘部的地下網絡。暗殺和破壞行為數量銳減。但是，共產黨處決的人實在是太多。一份 1953 年的黨內報告指出，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蒙冤被殺。尤其遭殃的是那些解放戰爭晚期從國民黨方面投誠的士兵和官員。共產黨曾許諾那些自曝國民黨身份的人可以獲得寬大處理，但並沒有履行諾言。判決開始變得不分青紅皂白，引起了高層的注意，毛澤東曾一度叫停這一運動。<sup>18</sup>

很快，因為鎮壓反革命抓了許多人，原有的監獄已經人滿為患。<sup>19</sup>從國民黨時期繼承下來的監獄規模遠遠跟不上罪犯的人數，因此新政權建立了勞動改造營的體系。到了 1951 年年末，超過 200 萬人被捕，有 67 萬人被送到了新的勞改所，被迫參加勞動，自身的生活成本就從勞動所得中扣除。到了 1955 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 130 萬人。勞改所條件很差，囚犯經常餓肚子，並常有毆打事件發生，囚犯的死亡率非常高。<sup>20</sup>

## 鎮壓秘密教門、秘密結社和城市幫會

1949 年 1 月，共產黨禁止了秘密結社和秘密教門。政令中，政府譴責這些組織與國民黨有勾結，還在抗戰期間與日軍合作，搜集情報，散佈謠言，策劃地方反叛。<sup>21</sup>秘密教門的成員起初來自於遷入城市的第一

<sup>17</sup> Dikötter (2013, 89–92), Strauss (2002, 89–92), Yang (2008, 110).

<sup>18</sup> Yang (2008, 112–120).

<sup>19</sup> Dikötter (2003).

<sup>20</sup> Dikötter (2003); Dikötter (2013, 243–254).

<sup>21</sup> Hung (2010, 400).

代農村人(諸如天津)。在華北，他們的勢力很大，其中最有名氣的是「一貫道」。1950年，政府簽發了針對這一組織的政令。一貫道的教義是個大雜燴，包含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儒學思想以及其他從本土宗教借鑒的教義。共產黨認為這一組織是對新政府的極大威脅，在天津，1951年時約有一百萬成年人口，教徒就佔了20萬，大部分是小手工業者和商販，以及第一代城市居民的女性。<sup>22</sup>一貫道教徒佔到綏遠省的11%，北平的15%，成員數量還一直在增加。當時北平市政和公安系統中大約有1,100名官員都是其成員，當地的黨組織和共青團成員也有參加的。在北平的一個區，有23%的員警居然都是一貫道的成員。<sup>23</sup>

一貫道顯然有顛覆新政權的能力。一貫道公開反對共產主義，在一開始分土地時就和政府對抗。在共產黨獲得內戰勝利之前，一貫道散播謠言，說共產黨要施行共產共妻的政策。在朝鮮戰爭期間，一貫道號稱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到來，將會摧毀新中國政權。在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之前，共產黨就批評這一組織，號召其成員退出一貫道，自願回到戶籍政策上來。鎮壓反革命開始後，一貫道首當其衝，其組織成員互相告發，組織領袖被公開批鬥，隨後處決。宣判和處決都是公開進行的，效果非常好，有效地摧毀了這一組織。<sup>24</sup>

相同的命運也降臨到秘密社團和犯罪團夥上。這些組織曾經在中國城市活躍一時，秘密社團規模很大，組織結構很完整，從第二代或更年輕的城市居民中招募成員，尤其是運輸產業的工人們。在像天津、上海這樣的港口城市，秘密社團是國民政府治下的主要政治與經濟力量，曾參與販賣鴉片，開妓院，控制碼頭與貨物運輸，經營各類行會。這些組織在苦工、碼頭工人、三輪車夫和貨物裝卸工中有相當多的成員。犯罪黑幫相對規模較小，以地方社區為主。他們大多是農村惡棍，經常搞些敲詐勒索、收取保護費的勾當。不過在國民政府統治期間，他們反倒是

67

68

<sup>22</sup> Hung (2010, 400), 401–403; Lieberthal (1973, 243–244; 1980, 14–16).

<sup>23</sup> Hung (2010, 403–404).

<sup>24</sup> Hung (2010, 404–417); Lieberthal (1980, 108–119). Dikötter (2013, 196–206) 調查了20世紀50年代對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更廣泛攻擊。

唯一能給小商販經營生意提供安全保障的人，但要收取保護費。<sup>25</sup>

這兩類群體都和國民政府統治期間貪污腐敗的官員們有勾結，這也讓國民黨喪失了群眾基礎。這裏尤其要指出的是青幫。青幫和國民黨的城市官僚體系有很大的重合，據傳蔣介石也在1920年代加入過青幫，並在1927年對共產黨人的清洗中利用了青幫的勢力。青幫在上海的大佬名叫杜月笙，與上海市政府關係密切，並和國民黨高官來往密切。<sup>26</sup>在共產黨看來，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組織即為顛覆分子。

共產黨控制城市之後，有很多的管道可以獲得國民黨員的名單，所以共產黨要求國民黨員自報身份，否則嚴肅處理時，這一政策收效甚好。但是秘密結社和犯罪團夥是不會留下任何紙質記錄的，要想讓他們坦白自首，就非常困難。1949年1月，共產黨佔領天津，立馬就對運輸業的青幫採取打擊措施。共產黨在各個城區建立了新的運輸公司和服務站，組織苦工成立運輸隊，在大街上遊行，喊着口號譴責曾經的老闆。共產黨也建立了新的工會，為工人提供保護，取代黑幫老大和秘密社團先前的角色。苦工老闆若是願意合作、告發他人，就能加入新的工會。他們被要求參加學習班，對共產黨效忠，致力於新工會並批評「反動封建的秘密社團」。<sup>27</sup>

清除黑幫老大的工作遠比想像中的要難。這些大佬經常恐嚇那些加入新工會的人，甚至能讓忠心的下屬滲透到領導崗位上。黨員幹部很快發現，新成立的運輸公司和工會裏居然出現了他們的臥底。1950年代後期，對黑幫的打擊也被整合進鎮壓反革命的浪潮中，一大批人被捕，隨後便是嚴酷的懲罰措施。所有被確定的苦工老闆被逮捕，公開批鬥又組織了起來，刑事審判被直接跳過。到了1951年春天，一大批苦工老闆被公開宣判，隨後處決，城市黑幫這才徹底銷聲匿跡。<sup>28</sup>

<sup>25</sup> Lieberthal (1973, 245–250; 1980, 22–25), Hershatter (1986, 120–131).

<sup>26</sup> Martin (1996, 79–189), Wang (1967).

<sup>27</sup> Lieberthal (1973, 250–255; 1980, 60–77).

<sup>28</sup> Lieberthal (1973, 261–264).

## 打擊賣淫嫖娼

隨着打擊秘密結社和犯罪團夥的深入，販毒等罪行被有效遏制。打擊賣淫嫖娼的工作則採取了不同的方式，不過成效也非常好。從1948至1950年佔領城市以來，共產黨就發佈政令，宣佈取締性交易行為。穩固了對城市的控制之後，共產黨關閉了妓院，將這些婦女送回農村老家，或是在城市就地安排工作。<sup>29</sup>

在共產黨的分類中，從事性交易行業的婦女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不是罪犯。在共產黨看來，婦女是被剝削的群體，有罪的是那些從中牟利的人。新政府關閉了夜店、酒吧和妓院，並禁止站街攬客。政府開設了再教育中心，強制她們參加。這裏除了妓女之外，還有癮君子和乞丐，不能隨便離開。他們接受藥物治療、宣傳教育和再就業培訓，還要參加學習、互相批評和勞動改造。當被認為已經充分改造之後，他們能重獲自由，走上新崗位，有些還介紹了對象，結了婚。但是絕大部分被驅逐出城市，被永遠地送到了偏遠地區。<sup>30</sup>

對於妓院主人和皮條客來說，懲罰可就嚴重多了。在1950年的上海，政府就公開處決了兩個持續招妓、不知收手的妓院老闆。到了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所有妓院都被關閉，有些妓院老闆還被公開宣判。1952年之後，這一行業只在小範圍內運作，政府機構逐步將那些依然堅持賣淫嫖娼的人列為罪犯。到了1950年代中期，私有經濟幾乎絕跡，賣淫嫖娼才被徹底杜絕。<sup>31</sup>

70

## 限制勞工組織

國民政府時期，工會就已十分活躍，在日軍投降之後又迅速興盛起來。黑幫大佬控制的工會其實僅僅是一小部分，例如運輸產業。而在上

<sup>29</sup> Dikötter (2013, 51–53).

<sup>30</sup> Henriot (1995), also Hershatter (1997).

<sup>31</sup> Henriot (1995).

海和其他城市的主要行業都由工會掌控，實力非常強大。<sup>32</sup>有些從屬於國民政府，有些雖然是獨立工會，但是長期有共產黨員滲透。許多人將共產黨的管治認為是對抗僱主的好機會。在國民政府統治的最後幾年，通貨膨脹異常嚴重，工人們損失慘重，難以為繼，許多工會都認為共產黨接管之後，將會是一個彌補損失的機會。

1949年下半年，共產黨逐個佔領了中國的各大城市，一大波工會遊行運動開始湧現，成為中國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會運動。<sup>33</sup>許多工會組織起工人民兵參與遊行，這些民兵是隸屬於工會的，而不是來自公安系統或佔領部隊。許多曾經長期從事地下工人組織運動的共產黨人也對這些工會活動表達了他們的同情。

共產黨發軔於工人無產階級，人們普遍認為共產黨應對這些罷工遊行運動有天生的同情，但事實並非如此。共產黨現在要做的是管理城市，維護秩序，復蘇經濟。這些工會罷工反而破壞了社會穩定，有礙工業復蘇。此外，許多工會在過去和國民黨有來往，共產黨就更加懷疑他們發動罷工的動機了。

1952年初，勞動部部長、全國總工會主席、資深共產主義者李立三被罷免，理由是鼓勵工會實行「壟斷機制」，與中央政策相悖，推行經濟主義——無原則地關心工人福利，為後進工人爭取權益。和勞工行業一樣，共產黨成立了新的工會，吸納舊工會成員，指派新領導。有工會控制的民兵被解散。<sup>34</sup>新的工會不鼓勵罷工和其他暴力行為，尤其是當國有企業牽涉其中時更是如此。在1950年代中期以後，工人罷工被認作是顛覆政權的犯罪行為，會立即受到懲罰。

## 對待知識分子和大學

中國的城市知識分子也臣服於新政權。他們的許多人曾留學西

<sup>32</sup> Hershatter (1986, 210–240), Perry (1993, 109–237).

<sup>33</sup> Perry (2007).

<sup>34</sup> Perry (2007).

洋，馬列主義者相對不多，大多數是崇尚民主和學術自由。<sup>35</sup>這些態度是必須改變的。共產黨發起了「思想改造運動」，目的就是要改變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們的想法，原有的觀念在社會主義中國沒有立足之地。1951年10月，《人民日報》刊載了一篇文章，正式闡述了這一運動的目的：「新時代的大學教師必須勇敢地批評原先錯誤的觀念，一方面要反省自己，杜絕驕傲自滿，另一方面要大膽地開展相互批評。」<sup>36</sup>1951年9月，運動規模開始擴大，京津兩地20所大學的超過3,000名教職員工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改造學習」。這一計劃的目的就是要糾正「對美式生活的錯誤嚮往」，糾正「從英美學來的錯誤觀念」。學術界的人們要學習「革命主義觀點」、「服務人民、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維」。學員們要學習黨的章程、馬列經典、斯大林以及毛澤東的著作，還有共產黨領導人的演說。他們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旨在「消除錯誤思想」。<sup>37</sup>在國立浙江大學開展的學習運動非常典型，教職員工被要求參加講座，相互批評各自的資本主義政治觀點，還要寫文章承認自己落後的世界觀，若是對自己的反思不徹底，還必須重寫，直到認識透徹為止，表現不佳的還要面對批評大會。<sup>38</sup>有些人實在無法忍受坦白的壓力、不能改變自身觀點，於是逃往香港，小部分人則選擇了自殺。<sup>39</sup>

72

大部分坦白多少都包含着形式主義的表述，這些知識分子要表達對新政權效忠，贊同其意識形態，願意為了先前的「資本主義行徑」而作深刻檢討。一位教職員在1952年5月的文章中寫道，「我感到無比的自責懊悔，我先前沒有以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作為自身工作的準則，對人民犯下了許多錯誤。因此，我將會加倍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徹底改變自己。我會和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毫不動搖，更好地服務人民。」<sup>40</sup>

<sup>35</sup> Andreas (2009, 20–22).

<sup>36</sup> Chen (1960, 33).

<sup>37</sup> Chen (1960, 31–33).

<sup>38</sup> Gao (2004, 146–151).

<sup>39</sup> Dikötter (2013, 180–187).

<sup>40</sup> Chen (1960, 2).

對於建國前的知名學者和他們的門生與友人來說，壓力更為巨大。胡適就是一個案例。胡適是中國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大師，他的學生們就被要求批評老師的「腐化反動」觀點。胡適自己的兒子也沒能例外，在對父親的長篇譴責中，胡適的兒子寫道：「我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新政權認為十分有必要通過這種方式消除眾多傑出知識分子的影響力，而胡適只是其中一個。<sup>41</sup>

這場運動最初的目標是將中國的知識分子引向蘇聯，讓他們脫離先前曾經求學或從事研究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這一運動的核心理念是：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學科的領域，知識分子最終代表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此外，由於他們大多出身相對富裕的家庭，所以常被看作是代表地主階級和資本家利益的群體。另外，當時中國大學裏的教員大多或是有留學經歷，或是曾與外國學者共事，或是接受過英美德等國的課程學習，或是在仿效西方大學而建立的中國學府學習，或是在由西方基督教或天主教傳教士資助建立的大學裏求過學。蘇聯學者是這一時期新的革命模範，因為他們反映的是無產階級的利益，推進了革命事業的發展。

如果教職員工想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保留原來的工作，就必須和曾經的資本主義教育標準徹底決裂，並忠誠地站在蘇維埃式的標準一邊。在中國參與朝鮮戰爭之後，這些壓力陡增起來。一位受過外國教育的編輯在1952年7月的口供中說：「我盲目地崇拜歐美帝國主義的物質文明，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科學和文化……直到抗美援朝爆發後，我幡然悔悟，發現了美帝國主義的頹廢本質和美國侵略文化的醜陋……美帝國主義者是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致命敵人。」<sup>42</sup>另外一位說，「我現在明白，恨美國、愛蘇聯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在我開始討厭美國之後，我自然而然地看到，蘇聯是可愛的，值得尊重和欽佩

<sup>41</sup> Chen (1960, 45). 部分其他著名教育家和學者作為譴責對象的敘述可參見Chen (1960, 38–50)。

<sup>42</sup> Chen (1960, 2).

的……蘇聯專家無私地幫助我們，在全球事務上，蘇聯無條件地給我們支持。我感到羞恥，我過去與反動派分子站在同一陣營。」<sup>43</sup>

學者越傑出，譴責西方的言論就必須越詳細，廣泛宣傳這些陳述就越有價值。清華大學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在芝加哥和加州理工學院受過教育，他的自我批評包括了在美國時的經歷：

我第一次在美國生活的四年裏，我看到只有摩天大樓、汽車和剝削階級揮霍無度的生活，但我並沒有看到壟斷資本家對普通群眾的殘酷剝削……我錯誤地認為美國的「民主」是好的，人民有言論自由……我沒有意識到，美國總統和所謂的政府官員是壟斷資本家的奴隸，報紙上報道的政治辯論無非是一個個統治黨派的相互攻訐。

74

我1943年第二次去了美國，這是我一生中最可恥的一章。我以科學工作者的名義來到了美國，這個標榜自己是從事反法西斯主義的民主國家。但實際上，在1945年初，蘇聯在東歐的輝煌勝利已經說明了法西斯德國的最終命運……我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卻覺得這是我的「榮譽」。<sup>44</sup>

一位原武漢大學的生物學教授曾經在哈佛大學的實驗室裏進行多年的學習和研究，他為此感到羞恥。他覺得自己盲目欽佩美國的方方面面。他使用美國實驗室的設備，並遵循美國的教學方法。他教授達爾文的進化論，而不是蘇聯科學家米丘林 (Michurin) 更先進的理論，後者才符合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他承認與美國學者交換實驗室標本是「極端錯誤」的，更不應該接受哈佛的經費援助，並為美國農業部收集標本。「我沒有意識到，帝國主義者在剝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時，植物資源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這名學者經過真誠的反思和努力學習，得出結論：「只有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米丘林理論，才有可能有為人民服務的中國植物科學。」<sup>45</sup>

<sup>43</sup> Chen (1960, 2).

<sup>44</sup> Chen (1960, 62–63).

<sup>45</sup> Chen (1960, 63–64).

75

上述最後一位知識分子的坦白反映了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學界對蘇聯的癡迷。蘇聯的米丘林是一位遺傳學家，他主張後天獲取的特徵可以遺傳給下一代。這種原理源自於18世紀的法國自然學家拉馬克，可是學術界早就摒棄了這種理論，贊成孟德爾的遺傳學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sup>46</sup>因為米丘林的理論與斯大林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解一致，所以被提拔為蘇維埃官方科學，專門用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遺傳學。<sup>47</sup>米丘林的想法是在他去世後由另一位原蘇聯生物學家李森科（Lysenko）發展起來的，後者在1953年寫道：「我們驚奇地發現：斯大林的教導是對的，漸進、隱蔽、不明顯的量化變化可以導致快速、激進的質變，一種物種就轉化為另一物種，這理論適用於蘇維埃生物學家在植物進化中的探索。」<sup>48</sup>戰後初期，李森科聲稱的科學依據受到蘇聯科學界的普遍質疑，他將這些指責定性為「理想主義」、「與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共謀」、「西方思想」、「形而上學」、「種族主義」、「與實踐脫軌」，李森科和他的追隨者將反對派的觀點定性為「資產階級科學」，是「美國人試圖證明白人優於黑人的階級壓迫工具」，是「帝國主義階段誕生的、與生俱來的科學混蛋，是形而上學、違背歷史規律的形式主義遺傳學理論。」

一位1960年代的蘇維埃科學家寫道：「這愚蠢庸俗的謊話當然不能得到真正的成功，只會增加科學家們的反對意見。」中國有許多頂尖的科學家似乎也被說服了。十年之內，米丘林和李森科被廣泛認為是蘇聯科學的小丑，整個事件說明了科學對意識形態和無知政客的屈服。<sup>49</sup>

<sup>46</sup> Joravsky (1970, 40–54).

<sup>47</sup> 蘇聯科學家梅德韋傑夫 (Medvedev) (1969, 134) 將李森科發表在他自己的雜誌上的科學發現稱為「欺騙」，並對「這些無知且可恥的文章被宣傳為科學進步的成就」而感到痛惜，這些「神話般的轉變」主要來源於斯大林的權威。

<sup>48</sup> Medvedev (1969, 134).

<sup>49</sup> Joravsky (1970), Medvedev (1969). 中國領導層最終意識到米丘林是錯的，李森科是江湖騙子，1956年，在周恩來的鼓勵下，中國科學家拆穿了他的理論 (Lüthi, 2008, 52–53)。

在包括生物學、物理學、經濟學和歷史學的許多領域，中國學者被迫遵守那些他們明知是錯誤的理論說法，和那些他們認為是可笑無知的學術標準。一些蘇聯科學家到達中國大學時，對科學實驗室的品質印象深刻，它們通常優於當時在蘇聯的科學實驗室。其中一些人感到震驚：科學家們在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機構受過良好訓練，卻要受到教條的束縛，凌駕在他們之上的反而是無知的領導，唯一的作用就是抑制實用科學的發展。這些景象讓他們不得不想起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後幾年裏蘇聯發生的一切。<sup>50</sup> 19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和共產黨試圖建立的政治權威深受詬病，到了1957年「雙百時期」，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批評者們開始譴責這種教條主義和其催生的愚昧無知。

76

## 沒收私有資產

1949年之後，城市私營部門就開始急速衰退，甚至早於黨的領導層宣佈決定在1953年進入社會主義之前。政府機構開始接管銀行和批發供應商，使企業變得難以獲得信貸、融資和原材料，無法有效觸及客戶和市場。這些變化壓縮了私營部門競爭和成長的空間。在1949年至1952年間，私營企業在開放市場的銷售產出百分比從88%下降到了44%。私營企業越來越依賴與國家簽的合同：私營企業在對公合同中的銷售額同期從12%上升到56%。<sup>51</sup> 在最初幾年，私營部門佔工業產值的比例從63%下降到39%，被國營企業、合作社和聯合企業取代。<sup>52</sup> 雖然政府沒有對私營部門進行任何明顯的發難，但私營部門逐漸受到國家政策的壓制，不得不依賴國家機構。

對私營部門的逐漸擠壓在1952年轉變成直接的打擊。共產黨發起了打擊「腐敗、浪費、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並杜絕城市幹部濫用權

<sup>50</sup> 參見蘇聯科學家 Klochko 的中國回憶錄 (1964, 10–33, 64–65, 82–88)。

<sup>51</sup> So (2002, 694).

<sup>52</sup> So (2002, 698).

力。<sup>53</sup>那些擔任職位、對新政權效忠的公務員成為被打擊的對象。有些人「拒絕承認」罪行，就遭到強制性審訊和酷刑逼供，這導致了一連串的處決和自殺浪潮。很快，黨的行政體系癱瘓，導致毛澤東撤銷了這一運動。<sup>54</sup>在被調查的約400萬人中，120萬人因腐敗罪被定罪，接近20萬人是黨員。<sup>55</sup>

隨後，該運動轉向打擊私營企業。「三反」運動被整合進更大的「三反五反」運動中。新的說法是，幹部的腐敗是私營企業家的商業行為造成。新的「五反」針對「逃稅、賄賂、欺詐政府合同、竊取經濟情報和竊取國有資產」。工作組進入私營企業，要求查看賬本，進行徹夜的審訊，許多企業所有者不得不「承認」腐敗和逃稅，揭露「非法利潤」的來源，透露「隱藏」資產。許多企業受到大規模罰款，隨後倒閉。許多企業主「自願」將自己的公司轉交給政府，以此抵償那些強加給他們的退繳稅和犯罪罰款。<sup>56</sup>到運動結束時，城市私營部門已經縮小到僅佔工業總產值的37%，僅僅是1949年的一半。<sup>57</sup>

這場運動不僅是對私營企業活動的打擊，所有能調配不受新政府控制的資源的獨立組織都沒能倖免。一個例子就是對私人慈善事業的打壓。私人慈善是1949年之前中國城市福利救濟的主要手段。1949年，上海有近1,300個非政府組織，其中許多是私人或宗教慈善機構。1949年後，相對富裕的市民被允許繼續經營這些慈善事業，建國初期，這有助於中共恢復社會秩序。一些慈善家被歡迎加入到新政府創辦的市政協會中——新政府仍然缺乏向弱勢公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因此歡迎他們的慈善事業。

到了1951年，事態發生了變化。打擊反革命的運動是私人慈善走

<sup>53</sup> Dikötter (2013, 157–163), Gao (2004, 159–163), Sheng (2006).

<sup>54</sup> Sheng (2006, 72–79).

<sup>55</sup> Dikötter (2013, 163), Sheng (2006, 76).

<sup>56</sup> Dikötter (2013, 163–173), Dillon (2007), Gao (2004, 160–179), Gardner (1969), Lieberthal (1980, 125–152).

<sup>57</sup> 國家統計局 (1983, 214)。

向最終關閉的第一步。打擊的對象包含資金來自美國，或者職員裏有美國公民，亦或和海外宗教組織有密切聯繫的慈善機構。這些組織都被定性為顛覆政權而被強制關閉。與國民黨政權密切聯繫的慈善機構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最後到了「三反五反」時期，私人慈善機構也成為打擊對象。這基本上是對資助和運作慈善機構的社會精英的一次攻擊，他們同樣面對着莫須有的賄賂、逃稅和隱藏資產的指控。政府機構還施加了大額罰款，發佈政令關閉這些慈善機構或要求他們合併進入政府運營的慈善中去。到1954年，上海的私人慈善機構幾乎絕跡。<sup>58</sup>

## 戶籍登記制度

在這段時期裏，城市地區建立起一套戶籍制度，並最終將城鎮居民鎖定在原地，並迫使農民離開城市。1950年代末，若是沒有合法的城鎮戶籍，就沒有公民身份，沒有官方地位，就不符合食品和衣料配給條件，就找不到住所，無法就業、上學、結婚或加入軍隊。<sup>59</sup> 1953至1956年，制度基礎建立，同時完成的還有農村的農業集體化與城鎮的工商產業國有化。政府之所以這樣做，是要防止農村人口未經授權遷移到城市，並將「過多」的城市人口送回農村，或讓他們遷居到有工業發展規劃的內陸城市。<sup>60</sup>

78

1954年底頒佈的規定設立了城市居民區派出所，開始接管人口登記、執行居留身份的審核。同時，政府建立了城市街道辦事處，並提供了資金，用以維持10至15名工作人員的薪水。<sup>61</sup> 1955年6月，法規規定了永久戶籍制度：要想搬家，必須事先獲得許可。招待所需要憑單位或地方政府授權的旅行證件才能入住。1955年8月，國家頒佈了第一條關

<sup>58</sup> Dillon (2007).

<sup>59</sup> Cheng and Selden (1994, 644).

<sup>60</sup> Brown (2012, 29–47), Cheng and Selden (1994, 652–653).

<sup>61</sup> Cheng and Selden (1994, 655).

於城市糧食配給的規定，鞏固了對人口流動的控制。<sup>62</sup>除了1958年和1959年混亂的大躍進期間的短暫崩潰之外，這一制度有效地將農民隔在了城市的大門之外，不需授權的旅行直到1970年代末才漸漸放開。<sup>63</sup>

## 強化鄰里社區

戶籍登記制度是1950年代管理城市鄰里社區的關鍵。城市分為幾個城區，通常一個城區包含數十萬人。城區又被分為幾個街道，由街道委員會負責。每個街道平均又被分成約八個社區，每個社區由幾百個家庭組成，由居民委員會負責。居委會又分為若干居民小組，通常是住在同一棟樓或一條街上的15至40個家庭。<sup>64</sup>

所有這些城市組織的官員都由共產黨直接任命。城區、街道委員會的員工從國家領薪水，但社區居委會的工作人員主要是志願者性質。他們巡視所負責的地區，查看是否有過夜的客人或其他未曾登記但居住在當地家庭的人。他們張貼宣傳海報，負責公共廣播系統，負責政治宣傳，帶領居民閱讀新聞報道，召開政治會議，以此傳達政府資訊。他們還開展衛生運動，幫助管理糧食等物資的配給，調解家庭之間或家庭內部的糾紛，還負責婚姻諮詢。他們巡視鄰里，調查任何不尋常的東西，並檢查陌生人的身份。因為家庭幾乎沒有私人電話，居委會座機作為公共電話數量翻了一番，其中一名工作人員對其進行監管，撥打電話都要登記，要是接到來電，還要跑去通知具體居民。<sup>65</sup>

1955至1956年快速完成的社會主義產業轉型，是鞏固新政權對城市經濟和城市居民控制的最後一步。在高度公開的動員運動中，剩下的私營企業主被迫向國家「捐贈」自己的公司，或將其轉為「公私聯營」的所有權性質，其實質是一步步邁向純國有化。此前的企業主在國有企業

<sup>62</sup> Cheng and Selden (1994, 655–657).

<sup>63</sup> Cheng and Selden (1997, 32–46).

<sup>64</sup> Whyte and Parish (1984, 22–23).

<sup>65</sup> Whyte and Parish (1984, 18–22).

中獲得股份，在很多情況下繼續擔任經理人職務。國有企業在1957年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8%，「公私聯營」性質的企業類別也很快從政府統計資料中消失。<sup>66</sup>

隨着城市經濟逐漸轉由國家控制，一個新型工作組織的輪廓形成了。這就是在城市居民生活中發揮中心作用的「單位」。單位製成為城市社會組織的第二大支柱，與社區組織和戶籍制度配合工作，一起管控城市公民，並把人口固定在特定地區。戶籍登記制度建立、工商行業轉移到國家控制之後，國家機關就掌握了分配就業機會的權力，而工作分配情況幾乎是永久性的。<sup>67</sup>工作單位越來越多地承擔原先私營經濟所提供的社會服務，開始提供住房以及其他物質配給。養老金也由工作單位負責管理，國家醫療保險和殘疾人保險也是如此。<sup>68</sup>工作單位也發揮政治和社會層面的控制作用，在許多方面比居民委員會更有效。他們組織政治學習，在工作和閒置時間召開政治會議，組織計劃生育運動，批准結婚和離婚申請，並授權城市之間的旅行活動。他們的黨組織負責組織政治運動、執行國家政策，安全部門進行政治和刑事調查，將違規者移交給司法部門。<sup>69</sup>

80

## 革命化的城市

這些城市轉型加上鄉村革命，使得新中國將其權力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觸及社區、工作場所和每家每戶。新國家的能力與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家極為類似，對於中國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在傳統帝國時代，國家的權力架構達不到縣一級。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情況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雖然國民黨掌握了政權，但是國家建設的努力被軍閥派系

<sup>66</sup> 國家統計局 (1983, 214)。

<sup>67</sup> Whyte and Parish (1984, 37–42), Walder (1986, 68–74).

<sup>68</sup> Davis-Friedmann (1991, 102–116), Walder (1986, 44–45), Whyte and Parish (1984, 71–76).

<sup>69</sup> Henderson and Cohen (1984, 10–46), Whyte and Parish (1984).

主義和外強殖民入侵破壞。而中共是一個更加紀律嚴明的軍隊，在軍事上征服中國之後，進行了嚴格的政權鞏固，集中打擊妨礙中央對國家控制的一切阻礙。中共的使命是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但是國家建立的基礎卻依託於一個完全外來的，實際上是西方的模式。

1950年代中共決定性地結束了數百年來由地方精英間接統治國家的歷史。在國民黨時期統治地方的有產精英力量被徹底摧毀。國民政府時期猖獗的農村盜匪、有組織犯罪和政府腐敗的情況穩步受到控制。秘密結社和地下教門被壓制，無處不在的販毒和性交易得到有效遏制。這些都是新中國統治者開闢的新天地，國家真正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中國不再受外國軍事佔領，主要沿海城市也擺脫了殖民者控制。新國家動員了數百萬士兵開赴朝鮮半島，與西方優勢軍隊勢均力敵。

然而，前八年革命式的國家建設是為更深層次轉變做的鋪墊。中共開始建設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仿效的是一個20世紀文明所獨有的新形式：蘇維埃式國家社會主義。這個新文明建立在兩個支柱上：一個完全拒絕市場機制、由官僚管理的經濟體系，和一個全權掌控社會和經濟的紀律嚴明的黨組織。這兩個支柱中的每一個都有明顯的缺陷，對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來說，這些矛盾將會越來越明顯。二者都要與不可避免的官僚主義傾向做鬥爭，這將困擾毛澤東的一生，刺激他在人生最後20年終發起了具有強烈破壞性的運動。為了了解接下來20年的中國歷史，我們就必須研究計劃經濟的官僚主義特徵，同時研究不斷發展壯大、使中國的統治體系如此獨特的黨組織。而這些就將是第五章和第六章的主要內容。

## 社會主義經濟

中國在1960年代與蘇聯關係破裂後，便以擺脫蘇聯發展模式而著稱。作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策劃者，毛澤東成為了中國走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的代言人。但是，毛澤東晚年的所作所為，讓人難以理解其早期對全面採取蘇聯模式的熱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初期，毛澤東是蘇聯經濟模式最熱忱的支持者之一。相較於他的同事，毛澤東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全面的方式採取中央計劃經濟模式。<sup>1</sup>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觀點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的影響，該書由斯大林主持編寫，簡要敘述了蘇聯各個發展階段的歷史。<sup>2</sup>早在1950年，毛澤東就希望中國盡快全面採取蘇聯模式，但是直到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他才公開表露自己的想法。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事實上與斯大林1929年提出的「總路線」較為相似。<sup>3</sup>中國與其他戰後社會主義集團成員一道，貫徹落實了斯大林體系成熟時期的核心元素：由紀律嚴明和等級分明的政黨實行絕對的一黨

<sup>1</sup> Kirby (2006, 881–882).

<sup>2</sup> 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39), Hua-Yu Li (2010).

<sup>3</sup> Hua-Yu Li (2006, 1, 170).

執政、大力擴展內部安全機構、塑造一位佔主導地位的最高領導人。與政治體系相配套的是強調收歸國有、國家掌控經濟的經濟模式，側重於發展重工業和武器建設。<sup>4</sup>

1950年代，中國與蘇聯建立了深入而廣泛的關係，忠實遵照蘇聯模式設計建立了各類黨政機關、教育體系、研究機構、管理國有企業。蘇聯在中國建立了兩百多家工廠，成為中國新工業體系的核心。一萬多名來自蘇聯和東歐的專家來到中國，參與三百多個主要工業項目的建設，大約有四萬多中國人在蘇聯和東歐接受培訓。<sup>5</sup>中國在許多方面全面實施了蘇聯藍圖，比蘇聯更加全面地展現了教科書中所描述的方案。<sup>6</sup>

考慮到四十多年之後蘇聯模式在全球範圍內被摒棄，毛澤東對於全面實施蘇聯模式的熱忱似乎主要來自於他的政治信條。但是當時，人們有充分理由對蘇聯模式充滿信心。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在一戰當中被輕易打敗，但是30年後，蘇聯作為二戰當中經濟最不發達的主要參戰國，抵擋住了攻勢更為強烈的德國，在歐洲單獨作戰的同時實現反攻。人們普遍認為，蘇聯1930年代開展的工業化運動在這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蘇聯體系下所製造出來的軍需品是德國的兩倍之多，並且在人力和物力資源的利用效率、支撐與其經濟規模和經濟發展階段遠不相稱的軍隊方面，蘇聯展現出了優越性。<sup>7</sup>而正是在東三省採取了這種戰時動員模式，毛澤東才得以最終戰勝了國民黨。

早在1930年代，在這種模式展現出戰時優越性之前，蘇聯經濟就經歷了快速增長階段，而同時段的資本主義西方國家還深陷經濟大衰退的泥潭之中。從1928年剛開始實施五年計劃到與德國開戰之前的這個階段，蘇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3.8%，而受到經濟衰退影響的美國經濟一直處於停滯狀態。<sup>8</sup>從1928到1949年，蘇聯經濟年均

<sup>4</sup> Kirby (2006, 882), Lüthi (2008, 39–40).

<sup>5</sup> Dittmer (1992, 17–25).

<sup>6</sup> Kaple (1994).

<sup>7</sup> Gatrell and Harrison (1993).

<sup>8</sup> 根據Maddison (2006) 提供的可下載數據庫計算得出。

增長率為 3.2%，是美國經濟增速的兩倍。<sup>9</sup>考慮到位於烏拉爾山脈西側的大部分蘇聯領土在 1941 到 1944 年的戰爭期間受到重創，蘇聯經濟增速可以說非常可觀。蘇聯的經濟增長一直持續到 1960 年代。從 1950 到 1956 年，蘇聯經濟年增長率為 3.4%，而美國增速僅為 2.3%。<sup>10</sup>在蘇聯高層眼裏，最能夠展現蘇聯經濟體系活力的事件，莫過於 1957 年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繞地衛星。這種經濟模式幫助蘇聯成為世界性大國，對革命後的中國領導人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斯大林模式的吸引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對於未來的發展規劃了清晰的藍圖，同時提供了一種圍繞該藍圖的統一思想和行為的模式。這個時期的一位觀察者認為，「特別是在革命之後，國家就會利用現有的思想幫助他們度過高度不確定的階段，讓他們的行為更具合法性、更加協調。這樣一種解決方案往往會導致他們模仿其他國家的經驗，而不是僅僅考慮純粹的效果。」<sup>11</sup>

84

## 作為增長機器的國家社會主義

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社會主義增長模式如此成功？快速的持續增長背後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增長並非由市場需求和金融市場所推動。在短暫的資本主義歷史當中，總需求的波動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導致了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和衰退，而且經濟危機逐漸變得越來越嚴重，持續時間也越來越長，最終在 1930 年代出現了大蕭條。在蘇聯體系當中，市場需求並沒有刺激經濟活動，金融市場也不存在。國家計劃者通過向工廠下達每年增長的生產計劃指令而確保有效需求。國家提供融資，通過與國家生產計劃相匹配的國家銀行體系分配投資和生產資金。因此，蘇聯模式當中並不存在資本主義所擁有的不穩定性。

蘇聯體系的設計初衷是為了以更快的速度積累資本。蘇聯政府並沒有放手讓個人消費儲蓄和私營企業投資生產波動來影響經濟增速，而是

<sup>9</sup> 同上，頁 478。根據可下載數據庫計算得出。

<sup>10</sup> 同上，頁 279。根據可下載數據庫計算得出。

<sup>11</sup> Halpern (1993, 110).

85

自己出手管控消費和投資。蘇聯根據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劃分標準決定生產計劃。生產性投資提高生產原料產量，而工廠利用這些原料生產產品。生產性建設包括所有現代工業強勢領域：礦產、冶金、化學、石油、機械製造、機動車輛、航空、武器，還包括這些產業所依賴的物質基礎設施。非生產性投資指的是所有終端消費者購買的產品，而非製造業中可利用的產品。它不僅包括所有消費產品：成衣、家居裝飾、自行車、私人電話、民用汽車等，還包括針對私人消費的零售和服務行業。房產也名列其中，因為房屋在有人居住之後就會貶值，並不能用於物資生產。<sup>12</sup>

蘇聯模式犧牲非生產性投資，將大量投資轉向生產性行業，從而獲得快速增長。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成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當中，重工業發展龐大，而消費品領域極其落後，住房擁擠、質量低下。為了能夠建設現代經濟和國防所依賴的重工業，消費者做出的犧牲便被視為可以承受的代價。

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角度出發，非生產性投資屬一種浪費，是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主要缺陷。從社會角度和經濟角度來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當中損耗巨大的消費領域是非理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消耗大量資源，就是為了刺激消費需求。這方面的例子數不勝數。例如，每年都會對電視機、音響設備和私人汽車進行重新設計，吸引消費者。大量的資金被用於市場推銷和廣告，說服消費者購買產品。大批基本相似的產品陳列在貨架上，利用奢華包裝，吸引消費者的眼球。整個經濟領域都致力於非生產性任務，刺激消費者購買價值有待商榷的產品：市場營銷、零售、廣告。購買了新的消費產品之後，一些產品儘管還能繼續使用，但是已經不再新潮，便被拋棄了。<sup>13</sup>對於一個正統的蘇聯經濟學家來說，資本主義就是一個浪費王國，本可以用於社會理性生產的資源卻被浪費在非生產性活動上，僅僅為了商品流通、刺激不必要的家庭支出。對於

<sup>12</sup> Kornai (1992, 160–202) 對於增長模式的特點有所描述；Zaleski (1980) 探討了蘇聯這種增長模式的源頭和演進方式。

<sup>13</sup> 此類批評的詳盡描述見 Baran and Sweezy (1966)。

希望尋找到一種能夠快速推動工業化經濟模式的領導人來說，這種看法深得其心。

為了能夠在生產資料領域維持投資最大化，國家擁有所有生產性資產和金融行業。國家內部基本上不存在私營企業和私人金融行業。國家經濟計劃者做出所有生產和投資決定。金融領域不再是經濟動盪的危險來源，而是作為國家生產計劃的一部分，用於分配資金。這同樣要求國家經濟計劃者為基本上所有的產品制定價格。通過這樣的方式，計劃者能夠保證資源流向優先領域。<sup>14</sup>

控制價格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農業，旨在為快速增長的城市生產力提供便宜的食物。集體農場是這一體系當中的固有部分，因為國有機構管理這類農場，控制了收割和分配。集體農場需要按低價向國家出售配額糧食和其他食物，本質上說就是從農村獲取盈餘來補充城市工業。便宜的食物是增長模式的主要組成部分：主要食品價格低廉意味着城市工人的生活成本維持在較低水平，這就能夠讓國家向工人支付較低的工資。再加上在消費產品和城市工人房屋上限制投資，這就使得國家產業能夠積累更多盈餘，以更快的周轉速度投入(生產性)工業的擴大之中。概括而言，簡易版蘇聯經濟模式就是：國家為了刺激儲蓄和工業投資，限制了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等到經濟發展進入到較為成熟的階段，才能實現消費繁榮。

## 工業體系

蘇聯發展模式創造了一種非常簡潔的管控方式。<sup>15</sup>每年，工廠會收到兩份計劃：生產計劃和供應計劃。生產計劃通過表格形式呈現：每一

<sup>14</sup> Kornai (1992, 131–159).

<sup>15</sup> 以下段落以1979到1980年我在香港對退休的工廠管理人員進行的採訪為基礎撰寫。這些受訪者來自於中國，這些訪談是對中國工廠權力研究的一部分(Walder 1986, 270–272；受訪者5、23、55及65)。Kornai (1992, 110–130)為計劃制定過程和如何操作提供了系統的回顧。

87

行表示國家計劃者給工廠設定的年度生產定額；每一列表示可以向哪些終端消費者出售產品。生產計劃反過來就是供應計劃：每一行表示計劃者預估工廠完成生產計劃所需要的各類供給配額；每一列表示工廠可以從哪類工廠購買計劃內的所需供給。整個工業體系就是生產和供應計劃相互交織的網絡，在企業和國家採購機構中建立複雜的聯繫。

企業之間大體上根據生產和供應計劃進行協商。生產計劃當中的購買方將會在年初與企業碰頭，與企業敲定產品規格和發貨日期。工廠的採購部門也會前往供應計劃中所列出的企業做同樣的事情。如果計劃完成了，生產者和供應者之間就會以國家固定的價格完成交易，資金在國有銀行企業賬戶中劃撥。一家工廠的資金計劃提前預支一部分生產資金，用於完成計劃。完成計劃意味着工廠實現了既定的利潤目標，基本上所有的利潤都上交給國家金融機構，用於工業投資。工廠只能自留一部分利潤，用於獎勵管理者和工人。

表面上看，在一個安排如此有序的經濟體當中，似乎沒有給創新留有餘地。這樣的表象往往具有欺騙性，因為生產和供應計劃當中經常出現隔斷。計劃者希望通過利用資源提升效率，但是通過這樣的價格機制並不能夠實現目標，因為價格機制只是計劃交易背後的會計手段。相反，計劃者通過制定嚴苛的計劃鼓勵效率：並不是生產需要的所有供給都列在購買計劃當中。計劃者想當然認為管理者會將資源儲藏在倉庫，如果不會，那麼他們就會想辦法高效利用資源：在生產過程中減少廢料和浪費，或者節約利用燃料能源。

88

供應計劃當中還有一個隱藏在計劃經濟結構當中的問題：「計劃內」供給往往並不是購買企業所需要的產品規格。供應計劃當中並沒有規定具體的規格尺寸。產品質量，例如鋼鐵厚度、拉力、某一尺寸或某一設計的閒置部分等，需要通過採購部門和供應企業進行協商。有時候，供應商會表示自己沒有能力生產所需規格的產品。通常供應商同意按要求生產，但是最後配送的產品卻並不滿足合同所規定的要求。怨憤的企業通常沒有什麼合適的手段解決問題：因為蘇聯基本上不存在什麼《合同法》，供應商也沒有動力去滿足顧客的需求——在計劃體制內，基本上不可能失去顧客。除非這家企業的管理層級別夠高、影響力夠大，可以

在黨內疏通關係，否則供應商並不會懼怕對方企業。管理層也沒有什麼辦法，只能對供給貨物進行再造，或者是將它們放入倉庫，寄希望於與有該類貨物需求的公司進行產品交換。

在操作上，管理者通常會採用易貨貿易來應對緊張的供給。這屬計劃經濟當中的創新做法。社會主義工廠的銷售部門規模極小：他們所要做的就是坐在辦公室，等待生產計劃當中的終端使用者前來碰面。而供應部門規模更大，對於完成生產計劃來說也更為重要。供應部門會派出採購人員尋找供給，而本公司則用對方生產所需的貨物進行交換。通常採購人員會到一家曾經幫助過他們解決供應問題的熟悉的工廠。而其他時候，他們會參加大型「訂貨會」，事實上就是地方政府為企業解決供應問題所舉辦的大會。

正是如此，人們的聰明才智擊敗了官僚的精心計劃。管理層意識到工廠完成生產計劃唯一的限制就是供給不足之後，便開始在倉庫當中囤積貨物，對沖未來供給不足的風險。在很長一段時間當中，工廠能夠超額完成生產計劃，但是沒有上報，而是將產品儲存在倉庫當中。這些貨物就能夠被用於交換未來生產所需要的供給。這導致了在企業層面普遍出現囤貨情結，這些貨物遠遠超過了工廠自己生產所需的貨物。採購人員經常發現很難直接安排滿足雙方生產需求供應的交易。在這種情況下，交易一方需要先接受他們生產不需要用到的產品，不過由於這些產品處於供給不足狀態，可以與其他有需求的企業進行交換。因此，工廠倉庫當中儲存了既不向消費者出售、對企業也沒有直接用途的成品，但是這些成品可以用於交換，獲取工廠所需的供給貨物。簡言之，計劃者也加入到這個複雜的遊戲當中，與國有企業管理者抗衡。計劃者試圖粗略計算鬆散的資源，通過制定嚴格的計劃強迫管理者使用這些資源。而管理者的應對方式，則是為了普遍存在的易貨貿易，囤積供給和其他產品，而這種方式加劇了供給不足問題，使得大批貨物囤積在倉庫。<sup>16</sup>

---

<sup>16</sup> Kornai (1992, 228–261)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回顧了囤貨的影響。這是他為有關問題所撰寫的經典著作當中的濃縮部分。

對於熟悉市場經濟運作方式的人來說，這一複雜的易貨貿易對生產無濟於事，並且非常不必要。一個更為簡單的解決方式，就是允許「計劃外」稀有貨物供給市場的存在，貨物的價格由稀缺程度來決定。工廠可以出售和購買供給貨物，將其分配到使用率更為高效的地方。工廠可以將囤積的貨物轉化為現金，那工廠就有動力清庫存。以此便能解決整個經濟當中供給短缺的問題，並且能夠提高資源利用率。

由於一些現實原因，這一明顯的解決方案被排除在外了。第一就是企業管理人員不能與那些不在生產或是供應計劃之列的企業進行貨幣交易。國有銀行管理着企業的資金，僅僅允許在官方授權下進行轉賬業務。第二，如果企業管理人員的衡量標準僅僅為完成生產計劃，且所有的企業利潤都要上交給國家，那麼管理人員就沒有經濟上的動力為了現金出售庫存。出售貨物所得利潤都會劃撥給國家，而管理者仍然需要面對稀缺貨品供給不穩定問題，市場無法預計，而價格也無法確定。當然，最終的束縛還是來源於政治。允許稀缺物資出現在自由的補充市場有可能推翻整個計劃經濟，因為管理層改變了「計劃內」供給的用途，在計劃外盈利。對於蘇聯領導人來說，這是對資本主義的讓步。一直到蘇聯解體前夕，他們都不願意做出讓步。毛澤東和與他同時期的黨內領導人對這樣的解決方案也深惡痛絕。

## 短缺經濟

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對該經濟模式缺陷的總結最為精闢，基本上解釋了這種模式覆滅的原因。他恰如其分地將這種經濟模式形容為「資源約束」，而相比較而言，市場經濟為「需求約束」。<sup>17</sup>從公司角度出發，需求約束經濟中的生產只有到消費者不再購買產品時才會終止。如果沒有顧客，生產卻繼續，就會增加成本、降低利潤，有可能威脅公司的生存。在社會主義經濟當中，都不用考慮這些因素。國家計劃

---

<sup>17</sup> Kornai (1979).

會確保需求的存在；企業不僅僅會收到生產配額，還會收到一個購買他們公司全年產品的消費者名單。社會主義經濟屬「資源約束」型，因為生產不會終止，直到計劃完成，或者直到企業耗盡供給貨物。這類資源約束型經濟使囤貨現象變得普遍，這點我們剛剛提到過，這也是所有採用這種經濟模式的國家所面臨的工業管理問題。<sup>18</sup>這種可悲的結果是因為資本利用效率低下。這種經濟模式為了快速發展，將大量投資導向重工業經濟體系，這會產生讓人意想不到的結果，也就是說會導致佔優勢地位的重工業產業資源極度浪費。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會高效產出大量「社會意義上浪費」的產品，但是國家社會主義通常生產出來大量粗製濫造的重工業貨物，而且效率極為低下。

出現虧損的企業也會受到補貼。在這種體制之下，從未聽說國有企業會倒閉，理由有如下幾點。即使企業在賬面上處於虧損狀態，但是公司仍然為當地工人提供了就業崗位。此外，公司會將在職和退休員工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都算入生產成本。體量較大、成立時間較長的企業承擔了支付養老金的重任，導致公司生產利潤下降，但是它們仍然為國家的福利體系提供了資金。再者，社會主義下的公司會為員工建造和維護公共住房、提供服務，而其他地方提供不了類似的福利。最後一點，由於公司處在生產和供應相互交織的體系當中，需要為其他企業提供產品，滿足其他企業的供應計劃。

正是這些原因，導致關閉一家社會主義企業給政府造成的大量損失，有可能遠遠超過補貼這家企業、讓其繼續生產的損失。關閉一家企業會導致工人失業，侵蝕提供和維護公共住房及相關服務的基礎，將養老金支出負擔轉嫁到政府身上，強迫計劃者為被關閉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尋找替代品。毫無疑問，企業越大，那麼它作為僱主和供應商，地位就會越重要，僅僅因為賬面虧損關閉企業所帶來的代價也會越大。政府作為企業的所有者，非常依賴企業，正如企業也非常依賴政府。<sup>19</sup>

<sup>18</sup> 例如，可以參考 Berliner (1957)，他的研究依託於對從蘇聯流亡出來在戰後歐洲擔任經理職位的人的訪談。

<sup>19</sup> Walder (1992).

由於投資側重於重工業，以及企業受到軟性預算限制，整個蘇聯集團的工業在利用物資效率方面遠遠低於國際標準。即便是在1965年後的體系成熟期，社會主義經濟當中的工業所享受到的投資比重遠高於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當中，工業投資在全國投資當中所佔比例平均達到40%；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當中，僅佔25%。<sup>20</sup>這些數據和之前的討論表明，社會主義經濟通過向工業傾注大量資源實現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高效利用資源。一項研究發現，在1960到1988年期間，處於成熟期的社會主義經濟通過改善工廠效率為經濟增長做出的貢獻僅為27%，而資本主義經濟當中，貢獻率則達到65%。<sup>21</sup>而這正是毛澤東1950年代急於在中國國內推廣的體系。在之後的數年當中，毛澤東需要在不違背社會主義核心要義的基礎之上，解決這一體系固有的缺陷問題。而這些核心要義是他從1930年代蘇聯的教義中所汲取的。後來證明，解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固有問題基本上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 企業福利供給

社會主義經濟的設計初衷是為了實現充分就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由於企業特有的商業周期而造成部分人失業，但是社會主義經濟當中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因此管理層沒有動力為了降低成本而削減勞動力。企業要支付的工資為年度預算的一部分，而且由於在這樣的經濟體制當

<sup>20</sup> 根據Kornai (1992, 175) 提供的數據進行計算得出。這些數據涵蓋了兩個獨立時間段內（1965–1973與1973–1983）的8個社會主義國家和7個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工業投資在全國投資當中所佔比重最低為匈牙利的34%，最高為中國的54%；在資本主義國家當中，最低為丹麥的16%，最高為英國的32%。根據Gregory (2004, 122–123)，「對比研究發現，計劃經濟帶來的經濟效益與市場經濟頗為不同。與相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蘇聯和東歐國家一直以來對重工業和國防投入頗多，服務、外貿較少，投資率更高，城鎮化率更低。」

<sup>21</sup> 根據Kornai (1992, 187) 數據進行計算。該研究將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蘇聯三個國家與法國、日本和英國進行比較。

中，不會用利潤率來衡量企業，所以每年要支付的工資也都是定額。但是社會主義企業在提供社會福利方面的職能不僅僅局限於提供就業。在蘇聯集團當中，企業單位成為發放全套國家保險、福利、公共住房和其他服務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也是如此。1950年代末，中國版的經濟體系發展成為城市「單位體制」，而這一體制不斷發展，一直貫穿於毛澤東時代。對於居住在城市當中的中國人而言，規模較大、待遇較好的單位成為了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強大中心。<sup>22</sup>

中國單位體制的第一大特徵就是就業終身制：除非是因為刑事犯罪和政治上犯錯需要服刑，否則職工不會被解僱。相應地，職工也不能在其他地方取得就業機會。在完成學業之後，勞動局（或者是其他管理大學畢業生的人力機構）會給城市居民分配工作。除了那些可以在體制內升遷的管理人員和黨員幹部，所有職工在職業生涯當中會一直留在同一單位。無論他們是一直留在單位還是在黨政系統上得到提拔，都由行政決策支配工作分配。<sup>23</sup>

除了提供終生穩定就業，單位還會發放醫療保險、意外保險和養老金，事實上，這些資金就來源於單位。<sup>24</sup>員工可以拿到基本工資，這一部分的成本涵蓋在單位預算內，列入到企業生產成本或者是國家機構支出預算內。單位中，養老金是現金支付，退休員工要在每個月月底前往出納室排隊領取養老金。如果單位規模較大，或者有資源，還會為員工直接提供醫療診所和住院服務。大型國有企業通常會提供醫院，為員工的學前兒童提供託兒所、幼兒園，有些單位還會設立小學。

單位還是福利房的主要提供機構。在毛澤東時代晚期，基本上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居住在單位建設、維護和分配的公寓當中，而且公寓往

<sup>22</sup> Henderson and Cohen (1984), Walder (1986).

<sup>23</sup> 其他社會主義經濟體允許出現工作調整；中國對於換工作的嚴苛限制是為了防止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此外還因為城鎮勞動力供給過剩 (Walder 1986, 68–75)。

<sup>24</sup> 同上，40–43；Whyte and Parish (1984, 71–76).

93

往就在單位大院裏。<sup>25</sup>當時並不存在房屋自由市場，唯一的替代方式就是通過市政府。所以許多大型的重要單位，例如國有企業、政府機關、包括重點大學在內的相關機構，就會形成綜合性小區，員工都居住在單位大院當中生活，在單位大院裏養育家庭，退休之後也繼續住在大院當中。

由於1950年代私營企業都被關閉，單位相應承擔起之前由市場所提供的服務。單位會為員工及其家屬設立食堂和伙房，提供公寓中往往並不配備的淋浴設備和澡堂，這些都曾被視為奢侈品。單位還會設立小賣部和雜貨店、理髮店、美髮廊，建造禮堂用於舉辦演唱會、上演話劇和播放電影，為運動隊建造體育館或者是操場，如果單位沒有足夠的資源建造，那就會組織隊伍參加市級聯賽。有些單位甚至還會為不居住在單位大院當中的職工提供班車接送，還有一些會為員工和家屬定期組織和提供假期旅遊。<sup>26</sup>

在大型國企工作的職工還有可能定期通過企業間易貨交易獲得福利。有時候採購部門會購買大批較為稀有的消費品，例如收音機、手錶、名牌自行車，後來還包括黑白電視機。這些消費品會優先發放給一些員工及其家屬。一些單位還會與集體農場建立穩定關係，用產品交換稀缺糧食。許多單位在重要的節假日還會努力為員工提供煙熏火腿、雞肉、瓜果等稀有食物，調動員工積極性。

對於城市單位自給自足發展到何種程度，1980年代中期對中國第三大城市開展的調查當中有所記錄。8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可以在單位裏享受到食堂、醫療診所服務、澡堂；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單位提供嬰兒日託中心和圖書館；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有禮堂、電影院，還可以享受到單位組織的假日旅行；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有運動隊；四分之一表示擁有理髮店和單位內部運動設施；五分之一表示單位

<sup>25</sup> 這一數據指的是天津，來自於 Walder (1992) 文章當中所引用的調查數據。

同一項調查顯示，44%的人口居住在當地政府提供的公房當中，18%居住在自有房當中，房子主要來源於1949年之前家庭繼承。

<sup>26</sup> Walder (1986, 59–67).

提供班車接送。<sup>27</sup>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單位都提供同等福利；它們手頭上的資源各異，導致所能夠提供的生活品質也就有所不同。大型國企和高級別政府機構比其他單位享有更多特權。在市場經濟當中，不同職業的收入差異會決定不同社會團體的生活方式和水平。在中國，工資非常低，且差距並不大，因此不平等來源於單位提供生活用品和服務的能力，基本上所有這些用品和服務都是免費提供，或者只是象徵性地收費。在後毛澤東時代早期開展的調查表明，不同規模和級別的企業之間給職工提供的服務和福利存在巨大差異。<sup>28</sup>

單位還決定了個人身份。標準的個人身份識別是通過單位人事部門發放的工作證來實現的。每位職工還會有個人檔案，記錄了家庭背景、階級成分、教育背景和政治表現。檔案集工作記錄和治安文件於一身，保存在單位當中。如果檔案不轉，就不能換新工作。<sup>29</sup>如果想要到另外一座城市旅遊，必須出示單位許可。如果是公務出行，單位會幫忙購買火車票或者汽車票，少許情況下還會購買飛機票。如果是出於個人目的旅遊，只需要單位出具一份個人出行旅遊許可函。正式登記結婚需要單位同意；離婚也要取得單位同意。<sup>30</sup>

## 消費緊縮

貨幣和市場的地位有所下降，意味着需要通過不同的方式解決不可避免的消費品短缺現象。消費緊縮是蘇聯增長模式的核心：為了將投資轉向重工業生產性領域，對於消費品的投資和所有非生產性投資全都被忽視。有三種方式可以解決普遍存在的消費品短缺問題。第一種方式就是通過價格調配，但是所有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很大程度上拒絕了這種方式。稀缺物品的價格攀升到只有少部分人群才支付得起。在社會主義體

<sup>27</sup> Walder (1992, 532).

<sup>28</sup> 同上。

<sup>29</sup> Lee (1991, 329–342) and Walder (1986, 91–93) 介紹了檔案系統。

<sup>30</sup> Whyte and Parish (1984, 25–26).

系當中，生產並不是為了創造市場需求，因而物資短缺就會一直存在，稀缺物品就會永遠只提供給那些可以出高價購買的人群。第二種方式是通過排隊分配：價格保持不變，消費者通過自己的判斷，尋找仍有庫存的物資。消費者站在隊伍當中排隊購買，希望在輪到他們之前，供給都不會中斷。在這種方式當中，消費者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尋找零售站點購買自己所需的物品。第三種方式就是通過行政分配：價格固定，給個人或者家庭發放票證，允許他們購買限額內物品。對於一些較為重要的物品，例如公寓或者是汽車，個人或者是家庭會被添加到一份購買順序單當中，輪到他們時就會通知他們。相比較於第二種方式，行政手段更省時間和精力，理論上而言能夠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更平等的機會購買稀缺物品，但是地位較高的人群仍然會有特權。

在戰時的蘇聯和戰後的蘇聯集團，行政分配比較普遍。擁有市場經濟的美國和英國為了動員民眾全力應對軸心國，也曾選擇性採用行政分配手段；英國所採取的分配制度比美國更為全面，在戰爭結束之後也持續了幾年。隨着蘇聯集團各成員在戰後逐漸恢復經濟，食品和基本的消費品供應情況有所改善，行政分配也逐漸被棄用，通過排隊進行分配變得更為普遍（但是房屋和私人汽車還是通過行政分配）。審慎消費、在零售站點排長隊變為常態，成為蘇聯集團國家當中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徵。<sup>31</sup>

中國的人口更多、更窮，因此需要謹慎處理食物供應問題。中國經濟還處於初級發展水平，相較於更為富庶的蘇聯集團國家，中國的消費品供應更為短缺，也更為基礎（沒有摩托車、電視和汽車）。1953年和1954年大城市曾經出現過為了基本食品排長隊的情況，在這之後，大城市因為聚集了大量不滿的消費者，而給社會治安帶來了顯著挑戰。中國在1955年迅速推廣了一個更為全面的行政分配體系，涵蓋大批食品，包括主食和主要的消費品（還有房屋）。<sup>32</sup>這一體系一直沿用了整個毛時期。

<sup>31</sup> Zaleski (1980, 465–481).

<sup>32</sup> Huenemann (1966), Whyte and Parish (1984, 85–100).

分配體系最底端是滿足基本需求：食物和衣服。主食（大米或者是米粉）、肉類、食用油、布料都是需要供應票證才能購買。這是一個全國性的體系，票證是通過各省發放，只能夠在發放省份進行兌現。票證根據居住地點發放：如果一個家庭居住在單位分的房子當中，他們就會收到由單位發放的票證；如果他們住在單位外，就需要通過居委會拿到票證。這些票證的重要性可以從它們的樣式中體現：彩色印刷，設計與普通國家貨幣一樣精美。

價值含量頗高的耐用消費品同樣是通過分配，但是並不是定期供應。如果在資源較為豐富的單位當中工作，那麼就可以優先分配到這些物品，同理，級別更高的人也可以優先分配到。通常，單位和居委會制定「產品票證」購買順序單，允許個人在國營的零售站點購買特定物品。價值含量最高的票證就是三大名牌（鳳凰、永久、飛鴿）自行車購買票證，這些自行車分別在上海和天津生產。自行車是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主要城市的主幹道在高峰期會出現車山車海，統一向前緩慢行進。儘管一些自行車質量較差，但是也非常普遍。這類自行車輪胎經常會漏氣，自行車輻條經常斷裂，自行車車架不經意間就散架，零件也很快就會生鏽。名牌自行車會使用高質量鋼材和橡膠，耐久、可靠、安全。

其他價值含量較高的耐用消費品也是通過同樣的方式進行分配。腳動縫紉機當時屬必需品。這種縫紉機仿製1950年代蘇聯的縫紉機，而蘇聯的縫紉機又是仿造1920年代美國勝家縫紉機的款式。人們需要縫紉機才能夠高效利用分配來的布料：成衣對於票證的利用更加低效一些。最具價值的物品就是房子了。1950年代中國城區當中的住房極度受限。隨着人口增長，一戶人家需要擠在更為狹小的空間當中。剛登記結婚的年輕夫婦需要在單位或者城市居委會等待很長時間才能分到房；只有在正式登記結婚之後，他們才能夠遞交申請、被添加到等待名單當中。分居和離婚並不能構成遞交住房申請的充分理由（顯然，離婚率非常低；1980年代隨着房屋供給有所增加，離婚率也隨之升高）。家庭不斷擴大，通常住在一個大開間當中，所以要向上提交申請，希望住更大的房子。普通民眾基本上沒有個人廚房，也沒有設備齊全的私人浴室。

97

公寓當中有自來水，或者說有水槽，但是廚房設備和浴室都在走廊裏（或者在室外庭院中，亦或是在街道邊），與鄰居共享。在單位和居委會，民眾運用自己手頭的所有方法去影響政府，提高自己在名單上的排位，說服當局自己有急需。鄰居或者是同廠工人如果分配到新房子，通常會在那些沒分到房子的人當中引起抱怨。在毛澤東時代晚期，這樣一種做法塑造了一種城市文化，就是越來越沉迷於讓政策制定者幫助自己在分配物資上獲得優待，與他人建立利益交換的關係網絡，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也能保持富足。<sup>33</sup>

## 經濟問題的政治影響

這一套經濟制度是毛澤東在1950年代極力並快速推動實施的。了解該制度的運行模式及其固有的缺陷很重要，因為應對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具有政治意義，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和蘇聯產生分歧，最終導致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陣營的分崩離析、1960到1970年代中國嚴重的政治衝突，都是因為在解決上述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所導致。

這一經濟制度實施後，制度設計的缺陷立刻就顯現出來了。這些缺陷，在蘇聯早就有所體現，東歐的衛星國當時正在與之抗爭。在蘇聯集團內部，1950年代正是積極討論如何提升制度設計的年代。<sup>34</sup>他們曾經動員資本投向處於發展初期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但現在，很多人認為應當仔細審視明顯的制度缺陷。如果工業體系繼續浪費投資和資源，那麼基本上就不可能改善生活水平。必須擺脫時下無望的官僚主義經濟組織模式，才能獲得更高的效率。

針對這一問題主要有三個解決方案，每一個均有不同的政治影響。第一種方案，是將現代科學管理技術應用於計劃經濟，這一方案在蘇聯

<sup>33</sup> Walder (1986, 210–212).

<sup>34</sup> Kornai (1959), Lewin (1974).

越來越受青睞。<sup>35</sup>訓練有素的科學專家應用現代統計方法和數學模型，可以完善投入產出規劃。這一解決方案嚴重依賴精英官僚部門裏訓練有素的科學人才，儘管不會威脅到黨的統治地位和對經濟的控制，但卻意味着黨的官員不得不向技術專家讓渡相當大的權威。這一方案也意味着那些具有宏偉和不切實際野心的政治家需要面對專家的意見，而這些建議往往會給那些由政治驅動的計劃設限。這是一個根據科學原則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願景，由大型官僚制度當中的精英專家執行計劃。

第二種解決方案，是依靠市場機制來輔助計劃經濟。1950年代的南斯拉夫和1960年代的匈牙利是這一做法的先驅，當時蘇聯集團內部對這一方案也正進行着廣泛的討論。<sup>36</sup>這一解決方案需要徹底終結投入產出計劃的制定，給予企業管理者更大的自主權，並由企業管理者對生產和銷售負責。在這一方案下，企業會對自身的盈虧負責，商品的流通基於市場價格，價格則會反映商品的稀缺性。國家將維持對所有權的壟斷，但企業的效益將以利潤為標準而不再僅僅為了滿足配額。理論上說，隨着企業管理者對價格和成本越來越敏感，他們會更高效地利用資本和供給。同時，賺取更多利潤的企業將會支付更高的工資和獎金，提供更好的住房和服務。這一解決方案依靠利潤激勵和市場機制來輔助社會主義經濟，中國的經濟學家是率先提出並支持這一方案的群體之一，而孫冶方是最著名的一位學者，他在1950年代中期開始推廣這些想法。<sup>37</sup>

第三種解決方案則是毛澤東比較推崇的方案。這一方案本質上是政治原教旨主義的一種形式，將戰時經濟的原則理想化。毛澤東非常喜愛內戰最後一年東三省的那種政治動員模式，當時黨委書記為了滿足「政治需求」，鼓勵企業和員工對社會主義事業作出更大的承諾，為大眾的

<sup>35</sup> Baylis (1974).

<sup>36</sup> 早在戰前就出現了相關討論。在提出這些觀點的戰後經濟學家當中，最為著名的包括Kornai (1959), Lange (Lange and Taylor 1964), Liberman (1971), and Šik (1966; 1967; 1972)。

<sup>37</sup> Fung (1982), Lin (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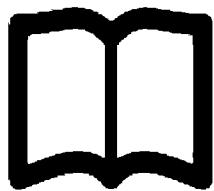
利益作出個人犧牲。毛澤東認為，只有政治動員能夠釋放大批工人的創造力，並挖掘出傳統方式無法挖掘出來的閒置資源——在傳統的蘇聯官僚主義模式下，囤積和低效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這一解決方案使得黨委書記掌握企業，大幅降低了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專家所具有的權威。這一方案拒絕被繁文縟節所束縛，包括那些維繫組織的官僚規則和條例等。然而，這並沒有改變整個經濟被巨大官僚機器所掌控的根本現實，而僅僅是將經濟的掌控權交到了政治領袖手中。

1960年代，毛澤東在選擇自己認可的方案的同時，也對前兩種方案進行了強烈的政治批判。<sup>38</sup>科學管理的解決方案賦予官僚主義當中的專家以權力，在毛看來，這些專家肯定會在計劃和個人偏好當中體現「資本主義」觀點。毛澤東決不允許他的革命黨授予官僚專家以權力，他也不希望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通過穩定的官僚事業逐步提升社會地位以獲得權力。這一方案將無可避免地導致階級分層的資本主義復辟。奇怪的是，毛澤東將龐大官僚機構下的科學管理視為資本主義，讓它看起來是站在市場競爭經濟的對立面。通過拒絕這一模式並將其定義為資本主義，毛澤東非常清楚地表達了自己對這一方案的否定。

在毛澤東心中，依靠市場機制來改善激勵機制和成本效益是一個更為糟糕的選擇。對他來說，這完全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化方案對於解決社會主義問題毫無裨益。毛澤東認為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模式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這一制度不再像光輝歲月時有效，一定是由於黨的幹部沒有扮演好動員的角色來使這個制度有效地運轉起來。黨的作用就是動員企業和員工取得更大的成就，提高效率，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更大的奉獻。黨的領導和強調努力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補救社會主義制度的低效和矛盾。不認可這一點，就必然會導致佔統治地位的官僚精英階級

<sup>38</sup> 毛澤東在他未經發表的閱讀筆記當中提出了對後期斯大林經濟學的反對意見，他閱讀的這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晚年的作品：《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1950年代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材。Service (2004, 566–567) 描述了斯大林時代晚期社會主義經濟學當中的主體，以及他們如何修正戰前的有關教條。

變得狹隘，也可能導致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蘇。這就是毛澤東在1958至1960年大躍進期間試圖呈現的願景。在大躍進這場略帶恥辱的運動失敗之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確保在毛澤東離開政治舞台後，中國不會訴諸官僚體系或用市場解決問題。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共產黨制度的發展

自1920年代末起，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成為一個革命性組織，佔據偏遠而孤立的農村根據地，在日佔區界線後方組織村莊，在日方或國民黨控制的城市中開展地下活動，轉移力量參與內戰。1950年代，共產黨在鞏固政權的同時，對城市和農村進行了改造。然而，隨着共產黨建立了一個新國家，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革。1949年前，共產黨是一個為了開展政治和軍事鬥爭而成立的組織。為了管理中國，共產黨迅速擴張，招募具備新技能的各種新黨員，同時對城市和農村進行管理。<sup>1</sup>1950年代，共產黨忠實地採用了蘇聯模式，這一模式使得龐大而複雜的官僚系統不斷擴大成為意料之中的必然結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當時共產黨有120萬成員，軍隊有91萬人。<sup>2</sup>1940年代末在東北的動員運動大大助長了共產黨和軍隊的規模擴張。在中共軍隊奪取大陸期間，有大批新成員湧入取得勝利優勢的共產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際，總共有450萬名共產黨黨員，他們構成了統治5.41億人口的新政權的核心。<sup>3</sup>共產黨即將展開一場深刻而讓人始料未及的轉型。

<sup>1</sup> Vogel (1967) 為最早分析這些影響的學者之一。

<sup>2</sup> Lee (1991, 16), Van Slyke (1986, 621).

<sup>3</sup> Lee (1991, 16).

## 從政治運動到執政黨

在共產黨勝利前入黨和勝利後入黨所蘊含的意味不同。中共將勝利前入黨的黨員稱作「革命幹部」——這是對其在冒險和犧牲的年代裏所做貢獻的一種官方地位的認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這些黨員佔據了新政權的高級領導崗位，他們的家庭也取得了特權地位。他們的子孫同樣繼承了這種優待地位，在入黨、入學和工作分配上也會享受到特殊待遇。那些在勝利前便參加紅軍的士兵也享有相似地位——「革命戰士」，他們的子孫也會得到類似優待。<sup>4</sup>

革命幹部的身份認可了一個事實，即內戰勝利前入黨，代表了對事業的忠誠，這一事業需要面對巨大風險和困難，甚至有可能犧牲生命或者殘疾。內戰勝利後入黨的人就不一樣了。隨着時間流逝，共產黨鞏固了其對經濟和教育系統的控制，入黨成為了對現有政權表達忠誠的行為，可能會在地位和工作晉升方面得到好處。當然，人們仍然期望黨員犧牲時間和精力，去完成艱難的任務，在嚴格的黨紀下將個人信仰放在一邊。無論個人動機如何，入黨帶來的風險和犧牲的可能性已經不能夠與早些年代相提並論，反倒是潛在的利益巨大。<sup>5</sup>1950年代，共產黨逐漸規模壯大，大學、公司和工廠裏都有招募黨員。他們有着不同於革命一代的技能和生活經歷。截至1965年，共產黨黨員數量已經翻了兩番，1949年後入黨的人數遠遠超過革命幹部的人數，比例超過3：1。<sup>6</sup>

<sup>4</sup> 詳見Kraus (1981)。第三個種類適用於「革命烈士」的後代，「革命烈士」指的是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的人。Barnett (1966) 與Vogel (1967) 還在革命後代當中做了身份區分。

<sup>5</sup> Oksenberg (1968, 92) 評價就並不那麼客氣：「共產黨代表了上升的康莊大道，吸引了大量機會主義者。」

<sup>6</sup>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2000)，第12卷，頁1227。

## 共產黨的影響範圍

黨組織是新中國的核心，隨着蘇聯體系逐漸鋪開，共產黨對工作分配、物資產品分配、學校招生和政商領導崗位的任命進行控制。其影響範圍上至所有社會組織和經濟實體，下至農村、工廠車間和辦公室。從本質上來說，共產黨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委員會鏈條，從北京最高領導組織到基層都複製了相似架構的委員會，共產黨擁有一個獨立的管理系統，對每一層的政府和行政機構進行監督和控制。最高級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956年由20名正式委員和6名候補委員組成；其中7名最有影響力的委員組成政治局常委，定期舉行會議。毛澤東作為黨主席，處於這個結構的最頂端。政治局是規模更大、基本上僅具有象徵意義的中央委員會所設的下屬機構，1956年中央委員會包括約197名正式及候補委員。他們不定期舉行會議，對決策的直接影響較小。<sup>7</sup>

102

北京的中共中央下轄29個負責各省事務的省委。省委書記是各省級別最高的官員之一，主持省委工作，與人數更少的省委常委定期舉行會議。這種結構在政府中層層複製，直到基層。省委下面是市委和地區黨委；再往下是縣委及區委；再往下是農村公社、大學、工廠以及其他重要組織的黨委組織。

這種共產黨委員會的全國性網絡對各級行政決策起到控制作用。例如，省長本身就是黨員和省委常委——如果黨委書記與省長並非一人。市長、縣長、廠長和大學校長也是這種情況。如果各級行政長官不是黨委書記，那他們往往會是常委，並兼任黨委副書記一職。通過這樣的方式，共產黨的全國組織在各層面相互平行，同時又與各級政府、企業和事業單位相互交織。

等級結構的底層是黨支部。一般黨員都是通過黨支部融入黨組織。每個黨支部平均對同一辦公室、工作間、學術部或集體合作社中的15名成員進行監督。黨員參加閉門會議，需要遵循黨的紀律，由黨支部書記來行使有關監督權力。反過來，支部書記從屬總支部，特定的支部書

<sup>7</sup> 同上，第9卷，頁40–48。

記又是總支部委員會的成員。總支部書記從屬黨委書記，通常也是黨委委員。

<sup>103</sup> 這就是新成立的共產黨政權所擁有的權力結構。這種結構有幾個顯而易見的特點。首先，這是一個直接從屬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單一等級制度，需要忠實地實行上級下達的指令。沒有黨委書記的同意和黨組織的支持，各級均不得自行作出重要決定。其次，這個等級結構異常龐大。1955年，共產黨已經有940萬黨員，到1965年，人數已經翻了一番，到1,870萬。<sup>8</sup>1965年，全國共有8萬多黨委，4.2萬個總支部和120萬個基層黨支部。<sup>9</sup>第三，數百萬個共產黨職位虛位以待：每個黨委都有一名黨委書記和幾名副書記，另外還有行政人員；每個總支部和黨支部都有一名書記和副書記。因此，黨組織決定了幾十萬共產黨幹部的工作機會，理論上，他們在職業生涯中將步步晉升，在這個等級結構內一直晉升到位於北京的中央權力組織頂峰，沒有其他方法能到達頂點。

儘管規模龐大，黨組織在各個地區和組織中並非均勻分佈。黨員相關統計總數很容易讓人誤解：一直以來，工農身份黨員超過黨員總數的80%，大多數黨員都是農民。<sup>10</sup>總數掩蓋了黨員集中在特定機構和崗位上的事實。共產黨將其影響力集中在決策、資本投資、資源分配和發揮權力之處。也就是說，城市的黨員比例大於農村；大型重要組織的黨員比例高於小型的非重點組織；而最高決策者中的黨員比例也大於普通職員和工人的黨員比例。

在後毛澤東時代早期進行的多項調查表明，中國共產黨關注重要機構和崗位具有悠久傳統。<sup>11</sup>

1990年代，城鎮地區有17%的成年人是黨員，農村的該項比例只有5.8%。在城市，機構的重要性不同，其黨員比例也各有不同。國有企業員工中，黨員比例幾乎是小型集體企業的兩倍(19%比9%)，政府

<sup>8</sup> 同上，第12卷，頁1227。

<sup>9</sup> 同上，第12卷，頁1229。

<sup>10</sup> 參看Lee (1991, 56–57)。

<sup>11</sup> 這些數據是根據Walder, Li, and Treiman (2000)文中的調查數據所計算得出的。

當中黨員比例是學校、醫院和研究組織的兩倍（64%比33%）。在城市和農村，職級越高，黨員比例就越大。在農村，只有4.6%的成年農民是黨員；村莊（或生產公社）裏擔任黨組織各級職務的人當中，有22%為黨員；在村內（或生產公社）擔任高級別職務的人當中，有78%為黨員。在城市，黨員比例也有着相同的變化趨勢，級別越高，黨員越多：有8%的體力勞動者是黨員，15%的白領工人是黨員，中層幹部中有49%是黨員，而85%的高級幹部都是黨員。<sup>12</sup>

這些數字說明了共產黨在權力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特點：具有戰略性，有選擇性地投入。統治共產黨的人都是傑出的精英。由於黨組織的目的是控制政府和經濟，因此黨組織會集中在行使權力、分配資源、對人員和資源施加權力的地方。對應地，服從上級的壓力、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滲透程度也因不同社會場景下共產黨的覆蓋率不同而產生差異。集體農場的農民受到共產黨日常命令的影響最少；藍領工人受到的影響可能大一點。在權力和資源集中的環境當中，政治紀律強度和政治干預隨之上升。<sup>13</sup>

## 政治監督

共產黨不斷壯大的網絡呈現出政治權力公開、外顯的一面。同時它也在隱蔽的政治監督網絡下壯大——這是公安部負責的一個全新國家安全網絡。這個機構的目的並不是維護公共秩序，而是鞏固新政體的控制力量，從而保護共產黨的權力。秩序維護的公眾面孔——包括戶籍登記、街道組織、學校及工作檔案，還有工作單位——似乎使得這個隱蔽網絡的國家安全機構作用並不大。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公安機關是政治權力的公眾面孔得以一直存在的幕後基礎，和蘇聯克格勃以及東德斯塔西的運營方式相似。

<sup>12</sup> 蘇聯也有類似的模式，參看 Hough (1977)。

<sup>13</sup> Vogel (1965) 是第一位研究不同社會背景下不同政治壓力的學者；Whyte (1974) 以更為系統的方式分析了這些不同。

105

從1949年開始，公安部模仿蘇聯克格勃，建立起一套層級機構，覆蓋區域和地方。由秘密官員和情報人員組成的該網絡將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城市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的邊境地區。這個網絡對國外機構建立起反情報業務，監視有反動傾向的人員，保護用於經濟生產的重要基礎設施免受蓄意破壞。<sup>14</sup>要開展這些任務，公安部及其區域機構將秘密的辦案官員（帶薪專業職工）和情報人員（非職員市民）安插在政府辦公室、大學、工廠和其他機構中。1950年代，公安部曾下達命令，要求大學人事部門中要有約三分之一為國家安全秘密官員，他們要在學校中建立情報人員網絡，撰寫卷宗——這些卷宗獨立於人事部門留存的個人檔案——從而對教職工和學生的政治傾向進行監視。<sup>15</sup>1950年代中期，國家鐵路系統的安全官員手上有超過10,000人的情報人員網絡。<sup>16</sup>

公安部招募和培養三類情報人員。第一種，「密工」(*secret investigation agents*)，負責監視潛在的社會反動窩點。這類情報人員的匯報內容包括他們在監視學校、工廠、賓館、飯店、電影院，特別是監視與外國相關的組織過程中觀察到的信息。第二種是「商幹」(*case agents*)，僱用這類人員並不是為採集一般情報和監視，而是滲透到目標人群和組織內，作為持續調查的一部分——尤其是教堂和其他與國外有聯繫的組織。第三種則是「掛靠」(*critical asset guardians*)，安置在戰略基地、工廠及其周圍——比如鐵路網、重點製造工廠、郵政及通訊系統、與軍事武器計劃相關的基地。他們的任務是協助辦案情報人員，防範蓄意破壞，避免敏感信息泄露。<sup>17</sup>

情報人員來自各行各業。政治積極分子和黨員在需要的時候會配合工作，但由於他們公開的政治傾向，可能不會被所調查的目標人群所信任。「壞分子」則是另一個極端，招募他們的目的正是因為他們有能力進

<sup>14</sup> Schoenhals (2013, 17–26, 30–46). Schoenhals的研究基於內部文件、訓練手冊和專業期刊。

<sup>15</sup> 同上，頁63–64。

<sup>16</sup> 同上，頁5。

<sup>17</sup> 同上，頁58–82。

106

入其他可疑組織。他們如果進行配合就可能會被豁免入獄，但前提條件是他們需要告發同夥。1950年代肅反運動中被調查者由於協助提供了其他人的信息，而時常得到庇護。<sup>18</sup>第三類人既不是忠實的革命積極分子也不是政治嫌犯，而是那些被勸說上報他們在辦公室、教堂、國外貿易組織和銀行所見所聞的人。<sup>19</sup>招募的手段包括敲詐，強調愛國主義情懷和政治忠誠，更甚者是含蓄地暗示獎罰並重。<sup>20</sup>只要這個監視網絡保持隱秘，它就能一直發揮作用。公安部詳細制訂了情報人員和官員之間的機密通訊流程，他們在固定的安全屋或臨時地點會面，通過加密的通訊方式和特殊電話交流。<sup>21</sup>這個監視網絡主要基於人工情報、口頭通訊和手寫紙質文檔。毛澤東時代開始後不久，中國的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發展出了滲透力更強、技術更複雜細緻的各種監視方式。

## 發展黨員

在一個由黨組織挑選國家等級制度中領導人選的社會裏，黨員身份就成為了個人晉升和社會流動的一條重要通道。如果說城市中只有17%的成人是黨員，農村更少，只有6%的人為黨員，那麼很明顯，入黨這件事並不是對所有人開放。在共產黨勝利後入黨的黨員往往是通過長時間表達政治積極性、忠誠於黨的政策和單位領導之後，才加入共產黨的。他們在學校或者單位加入共青團，很有可能在這些組織中升任領導職務。工作中，他們通常早到遲退，討論黨政策的時候第一個發言，第一個明確表示支持。如果黨組織命令他們匯報同事的所說所為，他們會照做。如果組織要求他們公開譴責一個聲稱犯了政治錯誤的人，他們也會這麼做。形成了積極和忠誠的政治記錄後，他們就會自薦成為黨支部成員候選人——或者被邀申請。核查過家庭記錄和其他個人檔案材料

107

<sup>18</sup> 同上，頁93。

<sup>19</sup> Schoenhals研究中提到了三種類型的人，參見Schoenhals (2013, 85–109)。

<sup>20</sup> Schoenhals研究中提到了招募策略，參見Schoenhals (2013, 138–169)。

<sup>21</sup> 同上，頁170–204。

後，順利通過核查的申請人就會成為預備黨員，然後接受指定連絡人輔導監督，由這位連絡人負責「發展」他/她。以預備黨員身份接受一段時間的密切觀察後，就能成為正式黨員了。<sup>22</sup>

很多人在年輕的時候就入黨。1949年後的成分歷史背景調查數據顯示，22和23歲入黨的人數最多，在23歲以上的人群當中，入黨人數快速下降。<sup>23</sup>如果一個人35歲前都還沒有入黨，那這個人可能以後都不會再入黨。對於體力勞動者來說，成為黨員是得到晉升、離開行業領域或工作車間的主要方式。一旦畢業、進入工作單位，黨員身份就成為了一個人是否能獲得工作晉升機會的唯一重要影響因素。一個人的職業由他參與黨領導活動的積極程度所塑造，而職業生涯早期作出的決定會影響其塑造程度。<sup>24</sup>

在這個時期入黨的人有着怎樣的特徵呢？成分歷史背景調查分析中浮現出一個清晰的視圖，讓我們有機會在保持其他特徵不變的情況下，估計某種特性對入黨幾率影響幾何。<sup>25</sup>首先，在其他條件保持相同的情況下，男性入黨的可能性是女性的兩倍。這可能是由於在男性所主導的黨組織中向來歧視女性，也有可能是因為文化因素，或者因為女性要承擔比例極為不相稱的家庭重任，使得她們在工作單位更少參與到能夠形成積極政治記錄的活動中，從而導致女性申請入黨比例降低。第二個是父母原因：如果父親已經是黨員，那麼其子女成為黨員的幾率是那些父親為非黨員的兩倍。這可能是由於父母對子女施加更多壓力，使其在政治活動中更加積極，因而申請入黨；也有可能是黨支部更加傾向招募黨

<sup>22</sup> Lewis (1963, 106–107).

<sup>23</sup> 本段根據Li and Walder (2001)。

<sup>24</sup> 關於年輕人面臨這一體系提供的就業機會時的選擇，以及這樣的機會在初屆中年之際是如何變少的，Oksenberg (1968, 64–65) 可能是第一個做出描述的學者。

<sup>25</sup> 本段和下段的數據來自於Walder, Li, and Treiman (2000)。正如前面一些段落，這些數據並不是百分數，而是根據事件–歷史模型估計出來的概率。數據反映了人的特性是如何影響加入共產黨的概率。

員子女。第三，職位高低對是否申請入黨有着很大的影響。基層領導人入黨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多——表明他們首先證明了自己的基層領導能力，而共產黨也希望確保這些領導人接受黨紀規範。

在這些估算中，有趣的是，如果一個人同時具備多種特性，其申請入黨的可能性是以乘積增長，而非以相加之和增長。例如，一位男性，如果他的父親是黨員，他本身同時也是基層領導，那麼他申請入黨的可能性是父親非黨員、自身非領導的女性的12倍( $2 \times 2 \times 3$ )。而另一種極端情況是，技術熟練的專業人員入黨的可能性反而遠遠低於其他人——專業人員入黨的幾率僅為非專業人員的16%。這表明了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存在懷疑，1957年後這一點愈發明顯；另一方面，這也表明了接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員不願意將自己置於黨紀之下。教育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並非特別重要。擁有高中文憑的人，其入黨的可能性是高中未畢業人員的70%，但相對高中畢業生，大學畢業生的入黨幾率並沒有提高。<sup>26</sup>

## 階級劃分和家庭出身

1920年代末，共產黨採取了蘇聯對人口進行階級劃分的做法。在蘇聯，階級劃分來自於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但事實上，政治身份已經成為了整個家庭的特徵，代代傳承，且受到官僚政治規則的影響而得以加強。1920年代，蘇共將蘇聯人口進行劃分，將「無產階級」與「剝削階級」、「階級敵人」區分開來。劃分完成後，被納入無產階級的人們享受特權和機會，而屬剝削階級的人們則面臨各種歧視和機會限制。<sup>27</sup>官僚政治的階級身份起到了以下幾點作用：社會公正、社會建構和政權鞏固。無產階級能優先入黨、晉升，也有更多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因為在舊社會，正是這些人群受到了壓迫。剝削階級家庭中的個人，從前能在各種有利的環境中享受巨大的優勢，而如今只能面對各種形式的歧視。

<sup>26</sup> Walder, Li, and Treiman (2000).

<sup>27</sup> Fitzpatrick (1993).

<sup>109</sup> 通過為那些從革命中受益的家庭提供特殊照顧，新精英階層藉接受高等教育而得以形成，取代在革命中失去地位和權力的舊精英。這些新精英比從前的剝削者家庭更加忠誠，而剝削階級則被視為對無產階級政權抱有敵意。他們被冠以階級敵人之名，時常被辱為「人民公敵」。<sup>28</sup>

1920年代末，階級劃分在蘇聯被深度強化。它們成為了1928至1931年間在蘇聯爆發的「文化革命」中「階級鬥爭」的工具，那些有「小資產階級」背景的人，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專家和舊知識分子，成為了共產黨積極分子的打擊目標，被稱作異類階級文化的反動代表，他們被降職，更有甚者被開除或被驅逐出城。這場運動體現了斯大林的新主張，即便沒收舊剝削階級的資產，消滅了物質基礎上的階級差異，階級鬥爭還是會加劇。他斷言，階級敵人會密謀阻止社會主義取得最終勝利。<sup>29</sup> 蘇共在1930年代初逐漸棄用階級歧視，1937年斯大林頒佈的新憲法正式結束了階級歧視。然而，這個舉措並未能阻止那些來自剝削階級家庭的人在1937至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劃分為階級敵人。<sup>30</sup>

蘇聯放棄了劃分階級做法很久之後，中國開始追隨，並對國內人口進行階級劃分。和蘇聯一樣，階級劃分是按照中國共產黨「解放」該地區時男性戶主的身份來界定的，屬「檔案身份」。<sup>31</sup> 土改期間，幹部們根據工作組下鄉調查得來的土地所有情況和個人政治記錄，對農村人口分配階級。階級附着在家庭上，按照經濟狀態和男性戶主的政治情況進行劃分。在城市中，階級劃分以永久檔案中的個人書面自述為基礎。每個人被要求完整敘述他們的全部工作經歷，描述自己所在崗位和父母的職業。同時也要求詳細匯報自己和父母的政治記錄。對每個人進行全面、仔細的背景調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編纂檔案和劃分階級的幹部經常向對象的同事和其他家庭成員求證，確保自述的一致性和真實性。對於在政府中任職的人員，或正準備申請入黨的個人，背景調查最為徹底。

<sup>28</sup> Fitzpatrick (1979).

<sup>29</sup> Fitzpatrick (1978), Tucker (1977).

<sup>30</sup> Fitzpatrick (2005, 24, 37–49).

<sup>31</sup> 同上，頁14–18。

和蘇聯一樣，將家庭劃分成「忠誠」（無產階級）和「敵對」（剝削階級）的努力卻遭遇到很多界定模糊和自相矛盾的困擾。所謂的模糊不清有兩種形式。首先，很多人一生中從事過很多不同職業。有人可能從貧困家庭出身，自己創業，之後累積了一定的財富；也有人可能出身富裕，但在事業中經歷破產或失業。日本入侵和內戰期間，這種混亂情況非常普遍，使得家庭的命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員的上下流動可能會使得階級劃分成為隨意的主觀判斷。其次，對於大部分人口而言，無法明確納入無產階級或是剝削階級。在農村，共產黨採取蘇聯的劃分方式，將農民分成「貧農」、「中農」和「富農」，另外多加兩種分類：「貧下中農」和「地主」，這樣才能涵蓋農村裏出現的普遍情況——許多家庭經營自家農場或依靠自家勞動力做小生意。對於城鎮專業人員、白領、教師和知識分子而言，也是同樣的情況。由於他們未參與到物質生產中，既不像馬克思主義定義的那樣被剝削，也沒有僱用他人或擁有可以稱之為剝削者的資本。一如中農，城鎮中的中產階級也被賦予了模糊的政治標籤。

階級劃分系統中也充滿了矛盾。首先，「階級」和政治立場結合在了一起。在蘇聯，1920年代人口階級劃分之前加入共產黨的黨員，無論入黨前家庭背景或者個人職業如何，都一律歸入無產階級。中國也同樣採取了這樣的方式。中共勝利之前入黨或加入紅軍的人，即便來自富裕的剝削階級家庭，也被認作革命分子。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吸引了很多愛國學生，而當時高中和大學教育僅限於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共產黨本身就是由富裕農村家庭的孩子所建立和領導的，在漫長的運動當中，共產黨也吸引了很多擁有相似背景的人。1990年代進行的成分歷史背景調查顯示，被歸入革命家庭的男性戶主，其階級地位和教育水平都驚人地高，僅次於被定義為剝削階級的人。<sup>32</sup>

反之，情況也成立：無論一個人的出身如何卑微，一旦加入國民黨或軍隊，均會抹去其無產階級出身，成為敵對階級。在抗日戰爭時期，

<sup>32</sup> Walder and Hu (2009).

共產黨軍隊有意逃避戰爭，而國民黨軍隊積極對抗日軍，對於這些國民黨退役軍人而言，這種劃分方式極為惡劣。可見，根據職業劃分階級所展現的模糊性在劃分政治立場上也表現了出來。有很多人普遍在內戰後期放棄國民黨而選擇加入共產黨，面對這種情況，模糊性就更加明顯了。

階級劃分的另外一個矛盾點在於它們是世襲的。也就是說，一個生長在被歸為地主或資本家家庭的孩子，即使他們的家庭財產已經在他們出生前被沒收，從小在貧困中長大，他們仍然會被視作地主或資本家。父輩或祖父輩是國民黨官員或國民黨軍隊官員的孩子也是一樣——即使先輩已經被處決或逃到台灣，與他們沒有任何聯繫。另一方面，共產黨勝利後，革命幹部和士兵被分配到領導崗位，之後很可能會升任到更重要的崗位上。這意味着，他們的子孫也會被視作革命分子，哪怕他們從小在富裕的家庭中長大，擁有寬敞的住宅和傭人伺候。

儘管這些標籤本意是固定不變的，但實際上可以通過政治調查和根據個人行為而發生變化。那些曾成功地向新政權欺瞞自己過往的人，他們的過往可能會被揭露，於是他們的政治標籤就會改變。在之後的運動中，如果與當局發生衝突，那麼他的家庭可能會被歸入到更低的階級中。這些標籤的靈活變通，或者說是韌性——其實根本上是模糊不清所帶來的產物——意味着很多人永遠都無法確定體制內的有利地位是否能一直延續下去。這些官僚階級身份可能隨時因為個人行為或再調查而改變。<sup>33</sup>

最大的模糊，是階級劃分與性別有所重合。家庭階級是按照男性戶主的身份地位所決定的，因此只能在男性血統中傳承。這就意味着一個來自剝削階級家庭的女性可能會與革命或者無產階級背景的男性結婚，從而享受男方身份賦予的安全感和特權。這樣的女性所生的子女可以繼承由更優階級所帶來的好處。階級劃分當中的性別特點對中國城鄉婚姻選擇造成了巨大的影響。<sup>34</sup>在馬克思理論裏並不能找到這種做法的源頭，

<sup>33</sup> 參看 Brown (2015)、Leese (2015) 及 Yang (2015)。

<sup>34</sup> Croll (1984), Unger (1984).

但這表現了對於傳統社會父權傾向的一種認可，而共產黨曾公開將這種傳統社會批判為「封建」。<sup>35</sup>

階級標籤大致可以分成三個大類。「紅色」階級包括革命和無產階級家庭。他們忠於黨、忠於革命，享有特權。「普通」階級包括舊中產階級。他們在革命中保持中立，或搖擺不定，既沒有受到優待，也沒有受到懲罰。「黑色」或「壞」階級為「剝削階級」或「反動分子」的家庭（見表6.1）。

表6.1 家庭的政治劃分

113

(1) 階級劃分	(2) 標籤	(3) 城鎮人口比例(%)
「紅色」階級		
革命階級	革命幹部、革命士兵、革命烈士	4.4
無產階級	貧農及貧下中農、工人、城鎮貧困人口	77.8
「普通」階級	中農、白領、知識分子、教師、專業人員	14.4
「黑色」階級		3.4
剝削階級	資本家、地主、富農	
反動階級	國民黨黨員、官員或士兵，「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	

來源：欄1及2，Kraus (1981)；欄3，Walder and Hu (2009, 1405)

這些標籤成為是否能夠入黨的重要標準，而革命家庭出身的個人也會受到特殊照顧。<sup>36</sup>在毛澤東時代，如果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一致，那麼帶有革命階級標籤的人入黨的可能性大約是來自一般無產階級家庭的兩倍。相同條件下，非紅色階級——舊時的小資產階級、剝削階級

<sup>35</sup> Stacey (1983).

<sup>36</sup> 本段根據 Walder and Hu (2009, 1413)；Li and Walder (2001) 當中有類似的估計。

和政治反動分子——相比於其他階級更難以入黨。來自於無產階級家庭的人，其入黨可能性是專業人員的兩倍，而來自革命家庭的人入黨的幾率是專業人員的四倍。

## 政治忠誠和職業晉升

正如共產黨根據忠誠度篩選入黨資格，黨組織同樣也或多或少根據政治忠誠度來決定大學是否錄取、工作初次分配、是否晉升。黨員身份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證明，尤其對於已經工作的成年人來說，但其他標準也同樣重要，特別是對於年輕一代而言。其中兩個標準實際上也帶有政治色彩：一個人的政治活動記錄和由世襲階級標籤賦予的家庭背景。

在中國教育體系當中，升學充滿競爭，達到教育階梯的頂層尤為困難。1965年，大約有3,290萬兒童進入小學，只有9%能畢業並接受初中教育。只有15%的初中畢業生能順利畢業進入高中。高中畢業生已經是優中選優的人群，但是也只有36%能被大學錄取。對於1965年入讀小學的人來說，僅有1.3%能入讀高中，進入大學的人更少，只有0.5%。<sup>37</sup>1960年代中期，是否能被高中和大學錄取，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標準就是標準化的入學考試——高中入學考試為全市或全縣統考，大學入學考試則是全國統考。然而，這個競爭非常激烈、精英林立的系統卻被深深嵌入在錄取流程中的政治標準所影響了。

第一個標準便是家庭的階級標籤。如果大學入學考試成績接近分數線，來自革命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申請者更容易被錄取；而來自剝削階級或反動分子家庭的孩子則必須考到比錄取分數線更高的分數才能被錄取。<sup>38</sup>大學錄取的機制被設計成「平權運動」的一種公開政治形式，以其他人為代價，提拔「紅色」階級。這種對無產階級家庭的優待，向這些1949年前無法享受教育的無產階級學生敞開了教育大門。1930年

<sup>37</sup> 本段數據來源於《中國教育年鑑》(1984, 965–966、969、971、1001、1023)。

<sup>38</sup> Rosen (1982, 12–66), Unger (1982, 11–47, 83–109).

代後期，中國高校的大部分學生都是來自於富裕家庭，頂尖高校裏，幾乎每個學生的家庭環境都非常富裕。<sup>39</sup>儘管政策有其自身意圖，但是在為紅色階級提供的特權當中，來自革命階級家庭的學生受益遠遠多於來自無產階級家庭的學生，此外，小資產階級乃至舊剝削階級學生的高校錄取率非常高。

表6.2反映了1960年代中期，階級標籤對北京兩所頂尖學校錄取率的影響，這兩所學校分別是清華附中和清華大學。在兩所學校裏，非紅色階級學生的錄取狀況遠比錄取政策所規定的要好。清華附中是一所頂尖的住宿學校，位於北京郊區，主要接收北京地區的考生。令人震驚的是（欄1），來自革命家庭的學生百分比遠超於革命家庭學生所佔中國城鎮人口的百分比（欄5）。這顯然是由於首都聚集了眾多身居要職的革命幹部。同樣讓人咋舌的是，從欄2可以看出，來自小資產階級甚至剝削階級的學生所佔比例也高於其在人口中的比重（大於1.0即表示比例過高，小於1.0則表示比例不足）。在清華附中，來自無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屬少數，與其在城鎮人口中的百分比遠不相稱。

115

表6.2 1960年代中期兩所頂尖學校根據階級背景劃分錄取率（%）

階級標籤	(1) 清華附中錄 取百分比	(2) (欄1) / (欄5)	(3) 清華大學錄 取百分比	(4) (欄3) / (欄5)	(5) 城鎮人口百 分比
無產階級	11	0.14	38	0.49	77.8
革命階級	24	5.7	9	2.0	4.4
小資產階級	55	3.8	42	2.9	14.4
「剝削」階級	11	3.2	11	3.2	3.4

來源：欄1及3，Andreas (2009, 70)（如果數據有出入，取二者估算值平均數）；欄5，Walder and Hu (2009, 1405)

<sup>39</sup> Lang (1946).

在清華大學，階級佔比的情況有所不同，因為它所吸引的申請考生來自於全國各地而並非僅限北京。這也就是為什麼，可以從欄4中看出，革命階級學生所佔比例雖然高於其在人口中的比重，但相比清華附中的佔比低了不少。相比清華附中，無產階級所佔比例更高，但仍然低於其在城鎮人口中的比重。很明顯可以看出，小資產階級和「黑色階級」——舊社會的精英階級——在大學中所佔比例比其他階級要高。如此精英雲集、考試導向的系統在實際操作上與階級政策的意圖相對立。<sup>40</sup>

舊精英持續擁有優勢的理由很簡單。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在父母受過教育的家庭中成長的孩子比較有優勢：家中有更好的教育資源；父母有能力輔導孩子完成學校作業；特別是這些家庭的父母對子女的期望更高。中國的舊精英們仍然能找到方式在這種教育系統中獲得成功，儘管受到政策歧視。這就成為了1960年代中期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廢除入學考試的根本原因。

第二個標準是政治參與積極程度，理論上來說，來自任何家庭背景的人都可以編寫一份有力的政治記錄。這些標準與入黨時所要求的態度和行為一致。由於高中生和大部分的大學生年紀太小，不能申請入黨，在學校中的政治參與積極程度是通過參與共青團活動而體現出來的，尤其是通過在組織中擔任領導職務。各個高中和大學均有活躍的共青團組織，這些組織直接隸屬於黨委，包含全系列團支部和領導崗位，完全仿照了黨組織本身的結構。曾在這些組織中擔任「學生幹部」的學生記錄就非常有力，這些記錄會被保存在他們的個人檔案裏，如果學生的標準考試成績與錄取分數線擦邊，或是學校或特定的項目考慮是否錄取該學生，這些政治記錄就會被擺上桌面公開討論，甚至成為決定性要素。<sup>41</sup>

儘管對於大學期間入黨的學生來說，黨員的身份已經是對黨表示政治忠誠的標誌，但是在學生畢業分配工作時，還會考慮類似的兩個政治標準——階級背景和政治參與積極程度。例如，1965年，北京大學中

<sup>40</sup> Andreas (2009, 23–32) 生動地記錄了在精英大學中共產黨是如何掌控政治資格和機會的分配。

<sup>41</sup> Shirk (1982), Unger (1982).

有7.8%的學生已經成為黨員，而清華大學則為13%。<sup>42</sup>這些學生的政治參與積極程度最高。結合階級背景、大學成績和導師意見，大學畢業生可能會被部委、研究機構、國企和研究生項目錄取。已經入黨的畢業生選擇餘地更大。

政治標準和精英標準在晉升過程中顯然存在衝突。隨後進行的幾項研究清晰地表明這種潛在的衝突是如何被解決的。本質上而言，共產黨創造了兩種獨立的職業道路，這兩種職業生涯要求具備不同的資質。<sup>43</sup>毫無疑問，想在政府、企業或事業單位中擔任重要領導角色，必須早早獲得黨員身份，但不一定需要大學學位。<sup>44</sup>在決策崗位上，黨員獲得晉升的幾率是非黨員的8倍多，相比其他個人特性而言更具決定性。之前的教育背景所扮演的角色和上文中我們看到的獲取黨員身份情況相似：高中畢業生獲得晉升的機會提高了2.5倍，但大學畢業生並沒有額外優勢。

相比於大學錄取和工作分配中強調政治標準，黨員身份對於科學家、工程師、醫生、經濟分析師、政府規劃人員或者大學教授而言作用並不很大。1960年代中期，這些職業收入頗豐，德高望重，但黨員身份對其能否獲得這類精英職業完全不起作用，反而受教育程度對他們極其重要。獲得高中文憑的人成為一名精英專業人員的幾率差不多能提高到9倍，大學畢業生更是高達14倍。黨員身份並無影響。專業工作以正統教育為基礎，別無他選。雖然看起來共產黨政權對黨政企官員的教育水平並不重視，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們之前已經講到，很多黨員多數在年輕的時候就已入黨，尤其是那些很早就表現出政治忠誠和領導能力的人。儘管在這些人當中，很少有人在入黨前就已經獲得大學文憑，但是

<sup>42</sup> Walder (2009, 23).

<sup>43</sup> Walder (1995). 在成分歷史背景調查數據可用之前，Oksenberg (1968, 67) 得出了類似的觀察結論：「一旦有人選擇了體制外的目標，那麼他之後就不能夠去追求體制內所提供的目標。」

<sup>44</sup> 本段和後一段根據 Walder, Li, and Treiman (2000, 200) 所撰寫。Bian, Shu, and Logan (2001) 根據不同的一組數據，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共產黨擁有一個龐大的成人教育系統，挑選有領導潛力的年輕黨員接受繼續教育。根據工作單位黨組織的推薦和支持，黨員可以以成人身份進入普通高校。這個項目最顯而易見的典型做法就是工作單位黨組織在大學錄取過程中推薦某人。這些學生也被稱為「調幹生」。地區政府也會組織大規模業餘成人教育項目，目的是提高領導素質。相比之下，黨員接受這些受支持的成人高等教育幾率是普通人的五倍，完成大學成人教育後，他們被提拔到高級領導崗位的幾率也是普通大學畢業生的四倍。<sup>45</sup>

## 權力和特權

入黨對一個人的生活水平不會有立即的影響。但無論是對某級別黨委書記在內的黨幹部而言，還是對一個企業或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幹部來說，入黨顯然可以提高未來職業晉升的可能性。中國擁有一個單一的全國幹部等級系統，最高為1級，最低26級。部級和部級以上幹部通常是6級以上；中層幹部，一般是部門負責人以上，為15級或以上。<sup>46</sup>生活水平的差異並非由收入差異導致。金錢收入可能會存在很大差異，但購買力並不能直接轉化為物質富裕程度。特權源自那些決定一定等級官員特權的規定，幹部無需支付或只需支付一筆名義上的費用便能享受這些特權。

特權還體現在個人專業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達到一定等級的官員不用騎自行車，但卻能得到由工作單位提供的汽車（配備司機）。他們在國內出行比其他人更方便。對於長途旅行，高級別的幹部有權乘坐舒適的軟座或者軟臥，避開擁擠的人群和為大眾提供的不舒適硬座。高級幹部能得到更大更優質的公寓，更有可能配備私人衛生間和廚房。最高級別的幹部可以一家人獨佔一套平房，有傭人和保姆伺候，還配備隨時待命的司機和座駕。在一般大眾還需要等待分配的時候，高級幹部有更

<sup>45</sup> Li and Walder (2001, 1398, 1402).

<sup>46</sup> 中共中央組織部 (2000, vol. 14, 1224–1231)。

多機會得到食物和日用品。旅遊的時候，他們能住上更好的酒店和旅館；在餐廳吃飯時，他們也能有單獨的幹部包間，享受更優質的服務和菜餚。

級別還會影響官員獲取信息的能力。黨和政府的官方文件在印發過程中，伴隨着一系列安全級別分類，視乎官員等級來決定他們是否能夠閱讀文件。只有達到一定級別的官員才能閱讀指定的文件和報告。共產黨發行數份內部報紙和簡報，內部版本所涵蓋的信息遠遠多於公之於眾的版本。《參考資料》是新華社出版的一份限制流通的簡報刊物，刊登國外新聞譯文，相比較毛澤東時代對所有幹部發行的同類刊物《參考消息》而言，《參考資料》含有更敏感的信息。《內部參考》由新華社發行，每日兩期，刊登專為國內政治精英提供的國內新聞報告，其中包含實施國家政策時遇到的問題、自然災害、地區抗議和其他不適宜廣為發行的新聞題材。<sup>47</sup>高級幹部還能獲取禁止公眾閱讀和觀看的外國書籍和電影。

119

儘管幹部的生活水準和特權嚴格按照等級制定，但是他們享有的特權還是相對適度，生活水平和一般人也不會有太大差別，除非他們晉升為高級幹部。毛澤東時期，即便是最高級別的中國官員，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比起市場經濟時代的富人而言，還是比較遜色。與之後相比，當時基本上沒有大筆消費。即便存在貪污，也不多見，數額也很小。儘管如此，在一個消費似乎持續緊縮的經濟體當中，伴隨級別而來的特權得到了極大的推崇。幹部身份能讓一個人避免糧食配給和短缺帶來的貧困局面，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舒適、便捷，而當時的中國只有少數人才能夠體驗這樣的生活。

<sup>47</sup> Schoenhals (1985).

## 封閉的等級制度

在一黨執政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體當中，權力和特權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織。然而，這是要付出代價的。共產黨官員和處在自由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中的公務員相比，有幾個明顯的差異特徵。第一個區別在於，官員不能擁有任何個人財產，而且除政府崗位外，他們不能再有其他生計來源。需要明確一點，他們有儲蓄賬戶，也有家庭財物，但沒有大額財富或獨立的收入方式。分配給他們的房子只徵收名義上的租金，但所有權不屬他們。汽車屬他們單位，費用由組織支付。即便他們在職時間很長，或是身居要職，也不能累積大量財富。他們所擁有的特權直接反映了其級別，只要他們的政治立場正確，就能一直享受這些特權。

第二個區別和第一個息息相關：幹部除了服務黨國之外沒有其他選擇。他們不能從政府崗位上辭職，做諮詢工作或開展私人生意，不能移民。他們無法選擇退休，也不能依靠個人存款生活。他們無法調職到其他單位或者省份重新開始生活。如果他們試着離開體制，或者遠離活躍的黨組織活動，會被理解成政治立場不堅定，忠誠度下降，違反黨組織紀律。從這個職業道路上退出，唯一的選擇基本上是被迫而且並不具備吸引力：降職或開除，伴隨而來的就是與級別相連的特權也會被即時剝奪。<sup>48</sup>

這些隱含的後果往往會在有關幹部特權的討論中被忽略。有特權，就有代價。幹部完全依賴黨組織提供給他們所享受的生活和特權，他們只要保持正確的政治立場，就能一直享受這些特權。黨要求服從和忠誠，並不止於入黨或是官員任命。幹部肩負壓力去履行政策，有些政策根本沒多少意義，他們要完成任務，要辨別和懲罰工作單位中被指不忠的人。比起其他社會組織——可能除了職業軍事官員——他們受到更多體制紀律的掣肘。他們不能公開反對上級所下達的極端命令，要一直

<sup>48</sup> Oksenberg (1976) 分析了對達到政治體系頂點的領導者的影響，但是他之前的研究也提到了體制內所有職業都沒有辭職這一選項 (Oksenberg 1968, 66–67)。

活在一種認知下，即一旦他們無法履行或服從黨的政策，就會嚴重危害現有的身份地位和未來發展機會。如果被評價為表現不達標或不夠忠誠堅定，就可能會造成終生影響，而在這個體制裏，僱主就只有一個。最糟糕的結果，就是他們接受整肅，或者是接受類似1942至1944年延安整風運動中對潛在敵人實施的審查。這可能會喪失身份地位，甚至招致牢獄或勞改之災。這些壓力對於中國幹部的影響遠甚於其他社會群體。

## 變革中的困境

從革命黨到政治官僚制度的轉換是一個根本上的變化，一旦決定追隨蘇聯模式就注定無法避免。如今激勵人們入黨的因素、成為黨員後獲得的職業優勢、以及共產黨所重視的品質和動機，較之常年革命鬥爭中的對應因素已經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共產黨控制了所有的經濟資源和職業晉升途徑，成為了通往權力和特權的道路，成為了一個大型的官僚體系，如一部政治機器般運行，存在着全世界官僚政治結構共同面臨的所有問題。

121

1950年代末，新中國剛剛鞏固後不久，毛澤東開始擔心這些發展變化，認為這些情況威脅了革命犧牲和鬥爭的理想信念。一個由希望得到崗位晉升和特權的人員所組成的官僚政治系統，有可能用一種壓迫來代替另一種壓迫。毛澤東的大部分國家領導同僚並不認為這是一個消極的發展趨勢，反而認為這是向科學社會主義現代形式演化的一部分，科學社會主義依靠先進的科學和技術，以及現代的工業組織，創造一個現代而繁榮的國家。在這種模式當中，黨對權力進行壟斷，但是實現這個願景，也需要依靠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發揮重要作用。

這一社會主義未來願景在斯大林時代成為了蘇聯社會主義的印記。當然，這條道路無法通向民主，更加無法通往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本主義。但相比於斯大林時代早期，這個體系現在更穩固，也更處在意料之中。打擊潛在敵人的大規模運動暫停了；有關持續開展階級鬥爭和打擊地下陰謀的宣傳現在被定性為令人遺憾的歷史錯誤；受害者從勞改營中被釋放，罪名被平反。如果他們能避免出現變為異己的跡象，就能過上

安定的生活，不必擔心可能會因為虛構的政治罪名而被起訴。公開將偉大領袖吹捧成國家英雄和天才反映了無知和國家落後，表現了封建主義思想，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令人懊悔，同時也導致在斯大林強人管治下出現了難以想像的苦難和毀滅。

1960年代中期，毛澤東認為這種後斯大林時期蘇聯社會主義觀點偏離了正確的革命道路。毛的未來藍圖與眾不同，他不願意看到他的黨國演化成一個穩固的官僚主義組織，由官僚統治下屬，對革命理想僅僅給予華而不實的口頭承諾，實則希望得到職務晉升和物質享受。毛澤東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新呼喚鬥爭和犧牲精神，他認為正是這些精神取得了過去看似不可能的勝利——過去的成功並非是因為精心策劃，也不是因為依靠科學技術專家，而是憑藉黨和社會的動員來征服自然、戰勝那些試圖從內部覆滅革命的敵人。毛澤東最終決定粉碎這個機器，從頭來過，依靠他那能夠與斯大林比肩的天賦所帶來的威望和地位，動員群眾推翻黨的建制，體制內成員彼此爭鬥。自1957年起，毛澤東花費了幾年時間和幾次政治事件，才得出這一論斷。最終的結果，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 解凍和反彈

1956年前夕，中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一系列改造。土地改革完成之後，又緊接着著手建立集體農場。私營工商業消失，生產性資料都收歸了國有，為跟隨蘇聯路線的官僚經濟打下了基礎。共產黨的權力網絡在全國範圍內鋪開，深入各類工廠、辦公室和農村。地位不再取決於財產的多寡，財富在代際之間不再傳遞。作為替代，人民可以根據在官僚體制當中的地位，享用全民公有的財產和服務，而在官僚體制內的地位又取決於黨。教育機構和知識分子的生活都被重新改造，人們紛紛與西方的影響劃清界限，學習「先進」的蘇聯教條。過去中國與世界市場經濟建立起來的聯繫也被切斷。儘管中國並不直接聽命於蘇聯的支配，但是還是被劃入到了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勢力範圍當中。

這是清朝滅亡之後建立起的第一個民族國家，基本上涵蓋了清帝國之前所有的領土。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建立的第一個大一統現代國家，吃着皇糧的官僚體系一直從北京延伸到城鎮社區。在1956年這個節點上，中國領導人可以滿意地回顧過去，充滿信心地展望未來。從這個角度而言，他們在國內戰爭中取得勝利之後，加強了自己對於中國的統治；共產黨軍隊在朝鮮半島上與美國和其他國家打成了平手；中國還以驚人的速度大步向前對國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農業化的時候發生了暴力和饑荒事件，但是中國並沒有發生類似的事情，順利地推廣了農業集體化。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脅迫和恐嚇助推了這些變革。1950年代早期的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導致一百多萬人被處決，上百萬人被關入監獄。「三反五反」運動強制剝奪了原屬城鎮商家和企業主的資產。思想改造運動強迫那些接受過教育的民眾公開放棄自己原有的看法，讓他們承諾改造自己的反動觀點，並且宣誓效忠於共產黨。一系列反對偏離正確社會主義教條的運動經常將矛頭對準作家和學者，稱他們擁有錯誤和顛覆性的觀點，有時候還將他們的觀點視為反革命陰謀，即便是黨內最著名的學者，也難逃其害。

這些改造運動發展之快，遠超計劃。毛澤東極力推動中國直接轉向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1953年他提出了黨的總路線，批評那些希望改革步伐更緩更穩的領導人，有時候甚至是威脅他們。毛澤東將斯大林麾下的蘇聯模式等同於社會主義，對於那些改革應當漸進的言論，毛澤東極不耐煩。總之，毛澤東希望快速進行工業化，認為按照蘇聯路線對經濟進行改造肯定可以讓中國成功。儘管有人建議以更加謹慎和平衡的方式發展工業，但是毛澤東極力要求新建立的農場提高糧食產量，要求重工業提高產出。毛澤東對於斯大林時代蘇聯社會主義的認同感，可以從黨內對於毛澤東領導日益高漲的狂熱崇拜中看出。《毛澤東文集》得以出版；他的個人肖像掛在全國各類辦公室和工廠當中；毛澤東思想在1945年之際還被寫入了黨章，作為共產黨事業的指導。以毛澤東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但是，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後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方向與中國同時期發展截然不同。1956年事件造成的影響重創中國，在領導層當中產生了巨大分歧，並且導致了中共第一次政治危機。自此之後，差不多一直到毛澤東去世前夕，這種成功感和樂觀都不再出現，被一系列導致混亂的危機所替代。

## 後斯大林時代蘇聯陣營的動盪

共產黨早年進行的這些改造也同樣發生在東歐，二戰結束之際，蘇聯軍隊一直佔領着東歐這些國家。它們在1953年的發展水平和1956年

的中國相差無幾。但是，改造的結果卻並不那麼盡如人意，導致1953年年中發生了一場危機。中國1957年的政治危機一直被認為歸咎於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這場批判給蘇聯陣營帶來的變化，就是終結了三年前斯大林死後開始的一系列內部變革。

那些掌控了蘇聯勢力範圍內東歐傀儡政權的「莫斯科社會主義者」全都執行了社會主義快速改造的相關政策，壓制政敵，清洗異見者，開展目標宏偉的工業化項目，基本上與中國所執行的政策相差無幾。與毛澤東一樣，東歐國家領導人效仿標準的蘇聯模式，按照蘇聯1930年代晚期那樣的模式進行改造。主要領導人將斯大林視為模範，經常陷入領袖狂熱崇拜的怪圈。

這些國家高強度的社會主義建設導致了嚴重的混亂。這一點，在1949年獨立建國的東德體現得尤為突出。新政權原來希望通過強權建立統治，但是1952年開始集中建立社會主義。東德打壓私營企業、攻擊新教；由於投資轉向重工業，工資有所降低；實行配給制，出現了食物短缺；對於那些反抗的人群進行「階級鬥爭」。<sup>1</sup>1950年代初期，有接近50萬民眾逃至西德。由於警察和邊境守衛也加入了逃亡至西德的隊伍當中，1952年最初幾個月的逃亡人數激增。人口外逃嚴重影響了東德的經濟計劃，高技術人才流失，最後在1961年建立柏林牆才得以解決這個問題。<sup>2</sup>保加利亞也出現了困難的初期跡象，從1948到1950年，集體化的迅速推廣和嚴苛的壓制行為導致了經濟出現困難，各地區發生了一系列起義。<sup>3</sup>

斯大林去世之後，新一屆蘇聯領導人有意調整斯大林時期的高壓政策，放棄了一些在衛星國招致廣泛不滿的政策。這給變革帶來了一絲機會，但動亂也隨之而來，因為人們紛紛走上街頭進行抗議。1953年5月，保加利亞多地發生罷工和遊行示威。<sup>4</sup>捷克斯洛伐克由於宣佈了讓

<sup>1</sup> Baring (1972, 3–49), Bruce (2003, 159–165).

<sup>2</sup> Kramer (1999, 13).

<sup>3</sup> 同上，頁15。

<sup>4</sup> 同上，頁15–17。

貨幣貶值、降低購買力的新經濟政策，在1953年前三個月零星出現了罷工和遊行。隨着貶值流言四起，4月和5月份有超過32,000名工人加入到了罷工和抗議遊行當中。6月1日，貶值政策正式實施之後，成千上萬名工人走出位於波西米亞地區比爾森市的斯柯達汽車工廠，上街抗議，其他市民也加入到他們的隊伍當中。他們與民兵和安全警察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雙方都有所傷亡。由於軍隊拒絕向民眾開火，示威遊行人群衝入政府建築實施破壞，毆打不受民眾歡迎的官員，將斯大林和捷克共產主義領導人哥特瓦爾德(Gottwald)的半身像扔出窗外。直到內政部從首都布拉格派出特殊部隊之後，暴動才被鎮壓。<sup>5</sup>

比爾森起義馬上被兩個星期後在東德發生的更大規模暴動所沖淡，後者涉及範圍之廣，直接影響到了這個新生政權的生存。與捷克斯洛伐克相似的經濟政策觸發了一波抗議：在新的工業體系下，工作節奏有所加快，但是工資卻被「調」低。工人們收到比以往更少的工資之後，馬上開始罷工。6月中旬，柏林開始出現大規模的街頭遊行，有超過50萬市民加入到罷工工人的隊伍當中。他們聚集在共產黨和政府部門前，強烈要求自由選舉。剛開始在經濟上做出讓步之後，政府似乎出現了癱瘓狀態，動盪蔓延到了東德地區所有工業城市，最終導致了6月17號的大規模叛亂。隨着危機逐漸擴散，政權面臨倒台，最終通過實施戒嚴、蘇聯軍隊和坦克大規模干預才恢復秩序。數十人被殺害，許多人被逮捕，還有一群人被處決。<sup>6</sup>緊跟在捷克暴動之後的東德起義，動搖了蘇聯陣營當中共產主義領導人的信心，讓後斯大林時代的新一屆蘇聯領導人重新思考自己的政策。

蘇聯的應對措施是推行解凍政策，放鬆在公開場合下的壓制，暫緩建立社會主義的極速步伐。他們總結道，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只是實施方式過於高壓。斯大林曾經的秘密警察首腦貝利亞在後斯大林時代權力鬥爭的初期就被清洗和處決，之前發生的鎮壓行為都歸咎到了他的頭

<sup>5</sup> 同上，頁17–22；Ostermann (2001, 113–142).

<sup>6</sup> Baring (1972, 51–113), Bruce (2003, 165–199), Kramer (1999, 40–45, 48–50, 52–54), Ostermann (2001, xxxi–xxxvi, 1–21).

上。<sup>7</sup>去斯大林化運動始於莫斯科，逐步釋放了政治罪犯，壓抑的政治氛圍也有所緩和。隨着對蘇聯斯大林時期的批判聲音逐漸抬頭，衛星國的共產主義領導人由於在改造中過於依賴壓制政策、在向社會主義過渡過程當中操之過急、為了加快工業化進程而犧牲民眾生活，而受到批評。蘇聯給東歐國家下令，執行「新路程」改革：弱化「階級鬥爭」，開始強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對知識分子少一些教條、多一些開放。

由於現在公開對那些涉及「鎮壓浪潮」、「經濟冒險主義」和「個人崇拜」的領導人進行批判，蘇聯於是強迫陣營內的國家進行改革，在一些情況下甚至要求資深領導人下台。例如，走強硬路線的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拉科西 (Rákosi) 就被迫將總理職務讓給改革派納吉 · 伊姆雷 (Imre Nagy)，後者在經濟和對待知識分子方面開啟了革新路徑。<sup>8</sup>此時，將工業收歸國有提高產量、大清洗和政治恐嚇、對領導人進行誇張式吹捧等激烈行為已不再受寵，這些行為因為破壞經濟、招致不滿以至於使政治發生動盪而受到指責。隨着赫魯曉夫在蘇聯逐漸鞏固自己的權力，他下令建立特別委員會，重新調查與斯大林有關的受害者案件，釋放勞動營當中的上千名囚犯。<sup>9</sup>

鐵托統治下的南斯拉夫成為第一個批判斯大林主義的國家。1950年被趕出蘇聯陣營之後，南斯拉夫領導人對日益式微的蘇聯官僚制度開展了全方位的批判。<sup>10</sup>在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當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批評斯大林主義遺產方面超過波蘭。1955年1月，波蘭共產黨發佈了一份嚴厲批評斯大林主義影響的文件。非官方批評者更加直言不諱，在之後的一整年當中，評論的底線有所拓寬。不滿大多源自黨內，忠誠的共

<sup>7</sup> Brown (2009, 234), Kecskemeti (1961, 40–46), Knight (1993, 194–200, 203–224), Taubman (2003, 250–263).

<sup>8</sup> Nagy (1957) 撰寫了一篇長度能夠成書的報告，為1955到1956年期間後斯大林時代這些更為溫和的措施辯護，這一舉措讓他成為匈牙利去斯大林化的旗幟性人物。

<sup>9</sup> Applebaum (2012, 437), Kramer (1999, 5–6), Taubman (2003, 275–277).

<sup>10</sup> Brown (2009, 203–209), Johnson (1972, 65–121), Rusinow (1977, 32–70).

128

產主義者對共產黨最近的行為表示了強烈反對。高壓統治和審查是他們不滿的原因之一，同時他們也反對蘇聯計劃經濟當中固有的官僚中心主義。波蘭和匈牙利共產黨的經濟學家，根據南斯拉夫之前提出的諸多觀點，制定了官僚經濟去中心化的計劃，從市場經濟當中借鑒方法，創造更高效率和更高生活水準。<sup>11</sup>

這些變化趨勢與中國同時期的發展方向截然相反。毛澤東仍然推動中國向着斯大林模式的道路上進行改造，似乎忽視了蘇聯陣營當中的自由化趨勢和緩和行為。他在1953年開始用自己的方式，快速推動集體化和國有化，而當時蘇聯正批判衛星國推廣的這些政策，將它們視為「冒進主義」。1954年針對作家胡風和「胡風分子」進行批鬥的全國性運動，以及1955年「肅反運動」中的大規模逮捕和處決運動回潮，與東歐逐漸擴大的解凍趨勢形成鮮明對比。毛澤東自1930年代末開始打造的斯大林式個人崇拜沒有受到影響。1956年2月，在尼基塔·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展開沉重打擊和激烈批判之後，毛澤東最終不得不面對這些衝突和差異。

## 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

儘管去斯大林化運動在蘇聯陣營當中已經發酵三年之久，但是赫魯曉夫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上的講話還是震驚了整個蘇聯陣營。事實上，赫魯曉夫的講話也遠遠超過了許多蘇聯領導層的預期，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他做過頭了。表面上看，演講的主題為「個人崇拜」，但是赫魯曉夫又詳盡描述了1930年代末那場重創黨內領導層的清洗運動。這一舉動前所未有的，有着深遠的意義。蘇聯領導層在此之前已經將處決忠誠共產主義者的罪名歸到斯大林副手、前安全警察首腦貝利亞頭上。現在，赫魯曉夫明確指出，斯大林自己就是個混蛋。在這場長達四個小時的演講當中，赫魯曉夫將斯大林描繪成一個具有施虐傾向的殺

---

<sup>11</sup> Brown (2009, 272–276), Milenkovitch (1971, 54–120).

手，他精心營造的個人崇拜是他邪惡獨裁的荒誕表現形式。<sup>12</sup>

所有來自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觀察員都在場，包括許多國家的高層領導人。蘇共二十大前夕就有跡象表明斯大林的地位可能會被削弱，但是當代表們聽到毛澤東在來信中高度讚揚斯大林時，都趕忙站起來大聲歡呼。<sup>13</sup>直到會期的最後一天，赫魯曉夫才在一場事先並未安排的閉門會議上發表他的「秘密報告」。這對斯大林是毀滅性的打擊。赫魯曉夫認為斯大林「嚴重濫用權力」。在他的指導下，「大範圍逮捕和流放上萬人、未經審判或正常調查就處決民眾，製造了危險、恐懼，甚至絕望。」對「反革命」進行大規模地下陰謀的指控非常「荒謬、狂暴、有違常理」。無辜的人民在古怪的指控前認罪，「因為各種施壓、施暴的方法導致他們失去意識，剝奪了他們的基本判斷能力，奪走了他們的尊嚴。」在這份冗長的演講中，最令人震驚的段落可能就是赫魯曉夫引用最近調查得到的數據，描述1930年代清洗的殘酷程度。在1934年中央委員會139名正式和候補委員當中，98名，也就是70%的委員都被逮捕、遭到處決。在1934年蘇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當中，1,108名代表因為反革命罪名被逮捕。演講給觀眾帶來的震驚也被記錄在文件當中（「會堂大為憤慨」）。<sup>14</sup>赫魯曉夫攻擊斯大林「對偉大極為狂熱」，還要求人們對他進行「令人作嘔地錯誤」吹捧。赫魯曉夫將他描述為一個無能的領導人、一個懦弱的戰時指揮官。他在戰前不久對蘇聯軍隊的清洗致命地削弱了蘇聯的防衛體系，他的集體化運動損害了蘇聯農業。<sup>15</sup>

129

用赫魯曉夫傳記作者的話來說，赫魯曉夫的演講「是他做過最為勇敢、魯莽的事情。」<sup>16</sup>二十大結束之後的幾個星期當中，人們對演講的內容開展了長時間的論辯，大多數赫魯曉夫的同事極力認為他應該剋制對斯大林的批評。在演講前一天，講稿還在被不斷修改。赫魯曉夫的講話

<sup>12</sup> Brown (2009, 236–243).

<sup>13</sup> 同上，頁240–243；Taubman (2003, 270–271).

<sup>14</sup> Khrushchev (1962, S20–S21).

<sup>15</sup> Taubman (2003, 271–273). 演講的英文全文詳見Khrushchev (1962)。

<sup>16</sup> Taubman (2003, 274).

遠遠超出了同事們的預期，在演講情緒高漲之際，他甚至還加了許多戲劇化的誇張動作。3月初，經過編輯後的講話文稿打印在小紅本上，上面印有「絕密」，分發給了黨內各委員會和國內的黨外活動家。<sup>17</sup>

2月25日晚，有人向會議的外國代表做了口頭匯報。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特別是那些屬斯大林主義者的衛星國領導人，感到非常震驚。講話文稿送到波蘭領導人貝魯特手中時，他正因為肺炎住到了克里姆林宮醫院當中。他在閱讀文稿時心臟病發作，並且在3月12日去世。<sup>18</sup>波蘭共產黨之前就已經着手去斯大林化運動，現在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對講稿進行翻譯，打印了一千八百多份，分發給全國各地黨內小組。鑑於波蘭共產黨對斯大林批判已經有苗頭，在黨內分發講稿就必然導致講稿流傳到海外。《紐約時報》在3月中旬發佈了講稿中的一些段落，1956年6月5日，發佈了講話全文譯稿，在世界範圍內流傳。<sup>19</sup>中國領導人在3月中旬西方媒體發佈一些節選片段之後，就收到了講稿全文。<sup>20</sup>

赫魯曉夫的演講在蘇聯陣營當中產生了間接影響，甚至還波及了朝鮮，而當時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在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之後一直致力於建立個人獨裁，讓逐漸不合群的朝鮮政權免受蘇聯和中國的影響。金日成的個人權力建立在新的意識形態之上，被稱為「主體思想」，事實上就是一種民族主義概念下的自力更生，在國家深度依賴兩個強大靠山蘇聯和中國的情況下尋求國家獨立。1956年6月金日成訪問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之際，赫魯曉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批評了他的經濟政策，特別是他努力在國內營造個人崇拜。這些情況慫恿了朝鮮共產黨內對金正日持批判態度的異見者。8月底，一些親中派領導人和親蘇派一道，直接對金

<sup>17</sup> Lüthi (2008, 48–49), Taubman (2003, 277–282).

<sup>18</sup> Taubman (2003, 290).

<sup>19</sup> 根據一種說法，一位駐守在華沙的以色列情報人員拿到了副本，將報告傳給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情報局又馬上通過美國國務院傳給了《時代》週刊 (Taubman 2003, 284)。另一種說法認為，據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回憶，他親自將講稿交給了外媒記者 (Leese 2011, 29–30)。

<sup>20</sup> Leese (2011, 30).

日成發起了挑戰，指責他的經濟政策和日漸高漲的個人崇拜傾向。金正日展開大清洗，一些高級官員流亡海外，在北京和莫斯科尋求避難。不久之後，毛澤東和蘇聯領導人批評金日成用逮捕和處決的方式處理黨內分歧，此外，還批評他用國外間諜和階級敵人的名頭定性批評者。中蘇代表團前往平壤，幫助金日成「糾正錯誤觀念」，但是只取得了暫時和有限的讓步。<sup>21</sup>

## 波匈起義

131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露在波蘭和匈牙利的影響更為深遠，動搖了兩個國家已經處在危機中的政權，1956年10月，危機達到高潮。波蘭基本上抵擋住了蘇聯的入侵；匈牙利共產黨政權在面對全國範圍內的起義時，也迅速潰敗，直到蘇聯和其他華約國家軍隊大規模入侵匈牙利，才得以重新恢復共產黨統治。

在赫魯曉夫演講之前，波蘭共產黨就已經成為對斯大林時代進行批判的溫床。在總書記貝魯特3月中旬突然去世之後，奧哈布 (Ochab) 繼任總書記一職，開始自上而下進行自由化建設，並配之以從下到上的激進化運動。年輕的知識分子在國內各地組成獨立的討論小組；成百上千名囚犯被釋放，批判性文章出現在官方媒體上。天主教得以恢復；工人開始因為工資和工作環境而受到鼓動；農民開始抱怨國家強迫他們必須以國家制定的價格進行銷售，要求去集體化；黨內幹部和警察也有所泄氣。<sup>22</sup>

奧哈布試圖在強硬派和堅持走波蘭特色社會主義派系中尋找中間道路。他最初的行为之一，就是恢復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 (Władysław Gomułka) 的黨籍，哥穆爾卡是一個溫和的領導人，1948年被時任第一書記的貝魯特排擠，之後被捕，1951年被開除黨籍。貝魯特直到1954

<sup>21</sup> Chen (2015, 108–114).

<sup>22</sup> Machcewicz (2009, 35–86).

年才因為蘇聯發起了去斯大林化運動，而被迫釋放哥穆爾卡。哥穆爾卡成為了改革和波蘭獨立的象徵，不久之後，情況就失控了。6月，工業中心波茲南的工廠工人上街遊行，要求提高工資，之後馬上升級成大規模起義，超過半數的市民都加入其中。波蘭共產黨如坐針氈，以工人為首的示威遊行人群與警察和波蘭軍隊發生了衝突，導致74人死亡，上百人受傷。<sup>23</sup>

鎮壓波茲南之後，事情繼續在黨內發酵，哥穆爾卡支持率迅速上升，於是重回政治局，迅速替代了奧哈布成為最高領導人。<sup>24</sup>在沒有蘇聯方面同意的情況下就選出了新任波蘭領導人，這一事件讓蘇聯方面開始擔憂：更糟糕的是，波蘭人民還要求被派到波蘭任國防部部長的蘇聯元帥下台。駐紮在波蘭的蘇聯軍隊迅速轉移到華沙，更多的蘇聯軍隊被派往波蘭邊境。赫魯曉夫要求在華沙進行一次會面，但是被拒絕。10月22日，波蘭許多城市發生一系列大規模集會。在華沙，超過50萬人上街抗議蘇聯干預。叛亂還蔓延到了農村地區：1957年底，85%的合作社都被解散，完全是給集體化開倒車。赫魯曉夫在沒有受邀的情況下，坐飛機到華沙，與他同行的還有幾位政治局委員。在進行幾輪劍拔弩張的談判之後，蘇聯決定終止入侵，讓哥穆爾卡穩定波蘭局勢，事實上在1970年第二輪波蘭動盪發生之前，他成功穩定了波蘭的局勢。<sup>25</sup>

赫魯曉夫對於波蘭妥協是因為匈牙利所面臨的問題更為嚴重。7月份，蘇聯堅持要求作風強硬、近似斯大林的匈牙利共產黨書記拉科西·馬加什下台，他被指在任期內主導了一系列對黨內領導人進行清洗和處決的事件。他前不久剛罷黜了任總理不久的改革派人物納吉·伊姆雷，1955年以「右傾」的罪名將他逐出共產黨。在赫魯曉夫2月份的講話之後，拉科西被迫妥協。之前許多共產黨人因為被控「鐵托代理人」而被判刑或是處決，而拉科西現在恢復了他們的聲譽。他們當中最重要的人

<sup>23</sup> Kramer (1998, 168–174), Machcewicz (2009, 97–124).

<sup>24</sup> Machcewicz (2009, 125–157).

<sup>25</sup> Kramer (1998, 168–174), Machcewicz (2009, 158–189, 241–252), Taubman (2003, 291–294).

物就是拉伊克·拉斯洛 (László Rajk)，他在1949年被拉科西處決之前，曾任匈牙利內政部部長。恢復聲譽的這一舉動嚴重地削弱了拉科西的威信，因為他曾利用對拉伊克的指控罪名，大規模逮捕了諸多黨內領導人。<sup>26</sup>在布達佩斯的知識分子主要圍繞裴多菲俱樂部展開反抗行動，這個俱樂部是在赫魯曉夫那場演講之後由拉科西於1956年3月所建立的。這個團體逐漸變得激進，成為反對拉科西的陣營中心。蘇聯方面非常警惕，對拉科西能夠恢復秩序喪失了信心，7月中旬，蘇聯趕走了拉科西，轉而支持格羅·埃諾 (Erno Gero)。<sup>27</sup>

10月份，情況變得十分危急。在一次官方批准的拉伊克的公眾葬禮上，納吉向在場的人們保證，斯大林主義也會最終被埋葬，現在拉伊克已經被視為斯大林主義的殉道者。一天之後，納吉被允許重新加入共產黨，並且成為能夠通過改革穩定匈牙利局面的人當中最具威信的那一位。街頭遊行迅速變得激進。10月2日，5,000名學生在布達佩斯科技經濟大學門前集合，發表了一份宣言，要求蘇聯撤軍，進行黨內選舉，將斯大林主義者從黨內領導層當中移除。他們堅定地支持波蘭「國家獨立運動」，要求「言論自由」和「媒體、電台自由」。第二天，也就是10月23日，學生聚集在布達佩斯電台門前，要求電台向全國宣讀他們的宣言。電台的主任同意了學生的要求，通過當地的擴音器製造了一場虛假的電台廣播。學生們知道他的詭計之後，便包圍了電台。同日在布達佩斯的中心廣場，巨大的斯大林半身像被推倒，上千名民眾歡呼雀躍。當晚，赫魯曉夫要求格羅重新任命納吉為總理。但是納吉拒絕與蘇聯簽署派遣軍隊到匈牙利恢復秩序的協議。他宣佈戒嚴，要求匈牙利軍隊執行。但是已經駐紮在匈牙利的蘇聯軍隊還是在10月24日凌晨進駐了布達佩斯，包括6,000名士兵和700輛坦克。他們迅速被人群吞沒，街上

<sup>26</sup> Kecskemeti (1961, 17–39, 71–82).

<sup>27</sup> 裴多菲俱樂部是以一位匈牙利愛國主義詩人的名字而命名的，這位詩人領導了1848年匈牙利革命。俱樂部的許多成員都是年輕的黨員和年輕的團員積極分子，他們傾向於走改革路線 (Applebaum 2012, 448–455; Brown 2009, 279–280)。

的人群用燃燒彈和小型武器與軍隊進行抗爭。匈牙利軍隊也與示威人群一同作戰。<sup>28</sup>

在叛亂發生期間，納吉替代了格羅成為黨的領導人，並且成立了包括其他政黨領導人在內的聯合政府，那些政黨在1940年代曾被迫解散。隨着街頭遊行繼續蔓延，赫魯曉夫一開始決定撤回蘇聯軍隊。毛澤東表示贊同，並建議他讓「匈牙利工人階級」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然而在兩起事件發生之後，兩個人都改變了自己的想法。第一起事情是，一撮人群包圍了布達佩斯市委大樓，抓住了安保人員，用街燈以私刑的方式處死了他們（包括布達佩斯第一市委書記），以報復他們大規模射殺抗議者。不久之後，納吉宣佈匈牙利退出華約，並且要求蘇聯軍隊永久撤出匈牙利。赫魯曉夫下令大規模入侵匈牙利，導致2,500人死亡，2萬多人受傷。700名蘇聯士兵在鬥爭中犧牲。在入侵後的鎮壓運動當中，超過10萬人因為反革命罪行而被逮捕，超過20萬民眾穿過邊境逃至奧地利。納吉曾在南斯拉夫大使館內避難，雖然他得到承諾可以安全離開南斯拉夫，但是最後還是被捕入獄，在1958年與他的國防部部長一道被處死。匈牙利不得不從零開始建設。<sup>29</sup>

134

## 步調不一致：1953年後的中國政治發展

這些事件震驚了中國高層領導，對毛澤東構成了威脅。儘管毛澤東並沒有像斯大林那樣對黨內領導人開展大規模清洗，但是中國在1953年後展開的一系列運動當中持續地迫害「反黨團體」和「反革命分子」。這個時期最主要針對的是左翼作家，他們曾經反對國民黨、支持共產黨，但是他們最開始就對於那些社會主義官僚要求民眾嚴格執行的社會

<sup>28</sup> Kecskemeti (1961, 47–82), Taubman (2003, 290). Sebestyen (2006) 回憶了這些事件，並且還為布達佩斯發生的街鬥和後續鎮壓提供了非常詳盡的描述。

<sup>29</sup> Brown (2009, 278–288), Kramer (1998, 175–210), Taubman (2003, 294–299). See also Ekiert (1996, 49–98).

主義教條感到惱怒。<sup>30</sup>這些作家要求對人物和故事進行有區別地描述，少一些刻板印象；對於從事宣傳工作的官員而言，他們就是眼中釘。1954年和1955年，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因為「小資產階級思想」而受到批判，丟掉了編輯職位：他們當中較為著名的有馮雪峰和丁玲。本質上而言，這是當年改造知識分子思想、讓他們消除獨立思想運動的翻版。<sup>31</sup>1955年夏天，對於丁玲的指控升級為成立反黨陰謀集團。她和她的追隨者被撤職，同時被拘留接受調查。<sup>32</sup>

這些人基本上都承認了對他們的指控，因為希望能夠減輕懲罰，但是有一個人拒絕承認錯誤，還與指控他的人發生爭執。這就是著名作家胡風，他曾是人大代表、《人民文學》編委會成員、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他於1954年7月向中央委員會遞交了一篇長篇報告，指責共產黨對文學和詩歌進行機械和教條式審查，他還指名道姓地要求與一些負責宣傳工作的官員斷絕關係。共產黨對這份報告採取的措施十分嚴苛，看起來與相關事件的嚴重程度並不相稱。緊接着1955年就開始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進行批判。<sup>33</sup>胡風和他的親密同伴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關入監獄，並且在全國範圍內對與胡風觀點相近的人展開了清查運動。超過2,100名作家和編輯因為被認為是反革命集團成員而受到調查；92人被關入監獄，數十人被撤職。<sup>34</sup>

對於文學界開展的迫害範圍有限，不過卻從屬更廣泛的鎮壓浪潮，並最終藉1955年7月開始的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而達到頂點。這場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對個人檔案進行高強度審查，對個人政治歷史重新調查，審訊嫌疑犯，並且進行秘密譴責。這場運動在1957年以各種名義得以延續，超過1,860萬人遭到調查，超過257,551人被視為反革命分

<sup>30</sup> Goldman (1967, 58–66, 119–122, 129–139).

<sup>31</sup> Lin (2009, 484–495).

<sup>32</sup> 同上，頁523–525。

<sup>33</sup> Chen (1960, 88–90), Dikötter (2013, 187–189), Goldman (1967, 129–157), Lin (2009, 501–521).

<sup>34</sup> Lin (2009, 520–521).

子或是「壞分子」。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被送去了勞改營，或是被下放到農村，在「監視下」工作。在這一過程中，有1,717位被批鬥的對象自殺。<sup>35</sup>

簡而言之，比起後斯大林時代蘇聯陣營內的解凍和部分自由化運動，斯大林去世後中國的政治發展勢頭與斯大林時代晚期的大規模迫害更為相似。但是，這種趨勢並沒有達到1930年代後期斯大林大清洗的迫害程度。儘管如此，赫魯曉夫對於斯大林的批判將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置於一個在政治上非常尷尬的位置。中國與其他蘇聯陣營國家的發展步調不再一致，因為中國選擇繼續按照斯大林模式發展。

## 百花齊放

蘇聯陣營發生的事情在一段時間之後，才對中國產生了影響，主要分為兩個階段。對於赫魯曉夫1956年的那篇演講，中國收斂了對毛澤東的吹捧，開始強調黨內集體領導，並且開始自我解凍。面對10月份在歐洲的動盪，毛澤東開闢了新立場，開始支持開放和批判政策。儘管他的同事極力反對，但是毛澤東還是展開了整風運動，讓普通人也加入到了批評教條主義和濫用權力的隊伍當中。這在政治上非常精明，而且出人意料，並不能代表毛澤東當時的政治思想狀態。作為去斯大林化的一大潛在目標，毛澤東擺出姿態，支持開放和大眾對黨的權力進行限制，從而將批評意見引蛇出洞。

毛澤東偏離了他作為斯大林忠實追尋者的形象，看似是一個自私的手段，但可能並非如此。毛在1940年代確實在延安開始樹立個人崇拜。他所領導的政黨也通過大量恐嚇和威脅在全國範圍內鞏固了統治，並且他還支持在農業和工業領域進行社會主義快速改造。但是，赫魯曉夫對於斯大林的批評、為蘇聯效忠的衛星國共產主義者所犯的錯誤，還並沒有出現在毛澤東的身上。毛並沒有對中共領導層開展大清洗，沒有

<sup>35</sup> 同上，頁558；Vogel (1969, 136–138).

像斯大林那樣展開公開審判，也沒有大規模處決黨內官員。他對於「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確實期待太高，但是蘇聯陣營當中所出現的混亂和暴力事件並沒有出現在中國，同時中國也沒有出現東歐國家那種叛亂。毛澤東有正當理由宣佈，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第一階段處理得較為成功。

儘管如此，中國對於赫魯曉夫 1956 年的演講還是有所防範，最開始去斯大林化運動的步伐緩慢而穩當。赫魯曉夫的演講使中國領導人頗為意外，同時也警醒了他們，與其他共產主義兄弟政黨（還有赫魯曉夫的同事）一樣，中國領導人事先並不知道演講的內容。毛澤東和其他黨內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做得有些過分了，他沒有認可斯大林取得的成就。他們和赫魯曉夫的同事一樣，都擔心與斯大林決裂會削弱社會主義陣營的權威，增強社會主義陣營當中帝國主義敵人的力量。讓他們感到尤為惱怒的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人格的攻擊，在毛澤東看來，演講並沒有為區分斯大林的錯誤和成就提供理論依據。中國領導人開始擔心，如何將中國最近的歷史發展與斯大林時代區別開來，如何將毛澤東與斯大林區別開來。<sup>36</sup>

1956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的主要觀點表示，對於斯大林進行過度誹謗是錯誤的：他的貢獻遠超他的錯誤。顯然，文章轉移了對毛澤東樹立個人崇拜的批評。毛澤東之後又發表了兩篇講話，第一篇是 4 月 25 日的「論十大關係」，呼籲與其他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些民主黨派被允許保留下來，象徵着所有愛國同胞「統一戰線」，尤其要與那些組成大部分「民主」政黨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層「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更為著名的是毛澤東 1956 年 5 月 2 日發表的講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意味着對文藝界和學術界有所放鬆，對於非馬克思主義、但是能夠滿足國家發展建設的觀點更加開放。「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並不相似。這些講話，和 4 月 5 日的社論，對過度壓

<sup>36</sup> Leese (2011, 30–36), Lüthi (2008, 49–50), MacFarquhar (1974, 43–48).

制、忽視集體領導、將觀點的相異轉為政治錯誤或是犯罪、在經濟政策方面操之過急等進行了批評。<sup>37</sup>在中國領導人看來，這是進行去斯大林化運動的一個相對溫和而又平衡的方法。

這些講話起初對鼓勵人們公開論辯並沒有起到明顯的作用。人們對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清洗運動、特別是肅反運動，記憶猶新。但是在毛澤東發表講話之後，發生了具體且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變化。劉少奇和彭真讓安全部門減少逮捕、判刑更輕、少用嚴刑酷法。<sup>38</sup>在1956年9月召開的八大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當中被摘除。<sup>39</sup>此外，八大的政治報告當中認為，在之前生產模式的基礎上，對於農業和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解決了階級鬥爭問題，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現代化工業基礎。<sup>40</sup>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的舉動就是將康生降職，他是1943年黨內恐怖整風運動的主要策劃人，在這場運動當中他幫助毛澤東掌控全黨，並且開始建立個人崇拜。康生從位列第6的政治局委員，被降到位列第15位的候補委員，在國家領導人當中排第23位，一下子降了17位。<sup>41</sup>黨代會發出了清晰的信號，中國共產黨開始偏離斯大林主義傾向。<sup>42</sup>

## 整風運動的分歧

毛澤東希望整風運動再往前進一步，但是遇到了阻礙。他在4月5日《人民日報》社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當中，呼籲普通人加入到批評共產黨錯誤的隊伍當中，但是劉少奇在八大的政治報告當中並沒有將這一點囊括進去。<sup>43</sup>黨內高層認為整風運動是有必要的，但是

<sup>37</sup> Lüthi (2008, 50–53), MacFarquhar (1974, 43–48; 1989, 6–7).

<sup>38</sup> MacFarquhar (1974, 78–85).

<sup>39</sup> 同上，頁100–102。

<sup>40</sup> Shen (2008, 322–323).

<sup>41</sup> MacFarquhar (1974, 148, 165), 中共中央組織部 (2000, vol. 9, 36、40–41)。

<sup>42</sup> Leese (2011, 38–46).

<sup>43</sup> MacFarquhar (1974, 120–121).

對於方式產生了分歧。毛澤東支持「開門整風」，鼓勵普通民眾也來批評黨政官員。另一種方式就是「閉門整風」，讓黨員就其他黨員的缺點進行互相批評。毛澤東並不認為在黨內進行整風教育足以避免讓民眾非常不滿的權力濫用現象。他認為，黨外人士也應該表達自己的不滿情緒。他感覺到，讓他們有透透氣的方式，會給社會和政治帶來更多和諧。反對開門整風的人認為，外界公開對黨進行批評將會讓黨內幹部意志消沉，導致政治動盪。<sup>44</sup>

黨內分歧讓毛澤東和鄧小平站在了一邊，另一邊則是劉少奇和彭真。匈牙利事件加劇了兩派之間的分歧，一些人認為公開批評會導致混亂，而毛澤東則認為只有開門整風才能夠避免類似匈牙利事件出現。毛澤東最終取得了這場爭論的勝利。<sup>45</sup>中國對匈牙利事件的官方定性可以從第二篇《人民日報》社評當中窺見：於1956年12月29日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社論駁斥了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的觀點，他認為匈牙利暴亂是對斯大林主義的不滿，反過來說，也是蘇聯體系不可避免的發展產物。中國方面認為，問題並不在於體系，而是領導層犯下了錯誤，導致「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矛盾」。換句話說，匈牙利事件是因為領導層錯誤的做法，而不是蘇聯體制存在問題。黨內官員出現了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這些行為是可以被糾正的。呼籲改變體制是錯誤的，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種修正。<sup>46</sup>

這是一種具有局限性的保守教條。中國的新政治和經濟制度不會發生改變。體制沒有出錯，因此就無法對管治方式和經濟組織進行改革。問題在於官員個人的錯誤品行。中國將維持從蘇聯學來的體制模式。

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發表的演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詳細闡述了上述觀點。<sup>47</sup>這就是他對於開門整風的論據，毛澤

<sup>44</sup> 同上，頁178–183、189–199；Shen (2008, 491–501).

<sup>45</sup> MacFarquhar (1974, 177–178); Shen (2008, 501–522).

<sup>46</sup> Leese (2011, 51–54), Lüthi (2008, 63, 70), MacFarquhar (1989, 9).

<sup>47</sup> Mao (1957), Shen (2008, 470–476). 同時參看Goldman (1967, 187–191)。

東試圖將自己打造成為一個在共產主義世界範圍內具有創新的領導人。在這篇長達四個小時、觀點雜亂的演講當中，他最主要的觀點就是，黨和人民的矛盾是正常的，並不應當被視為階級鬥爭。對於黨的批評不一定就代表敵對階級發動了反革命運動。如果一個政黨不能夠接受批評、將所有批評者視為階級敵人，那麼這個政黨就會犯錯，導致匈牙利叛亂那樣的事件。<sup>48</sup>

毛澤東的演講是希望進一步推動整風運動。他在演講當中多次提到，黨內有幹部反對開門整風。<sup>49</sup>毛澤東之後還在多個小型場合發表了類似演講，整個3月他都不在北京，而是在外巡講。<sup>50</sup>在他「百花齊放」的演講之後，中國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事實上蓄意破壞了毛澤東的呼籲，組織了一場針對一位作家的譴責運動，這位作家曾經寫過一篇短篇小說，描述一位年輕的共產主義者因為在黨內憤世嫉俗和無用武之地而意志消沉。<sup>51</sup>毛澤東對《人民日報》非常生氣，因為報社並沒有宣傳他有關於「矛盾」的新觀點，後來他將報社總編輯鄧拓、還有其他主管宣傳的官員叫到自己的住處，訓斥了他們。<sup>52</sup>毛澤東的批評終止了他們的拖沓行為。對於該政策持主要反對意見的人，特別是彭真，最終妥協。《人民日報》4月中旬發表了一系列五篇社論，批評那些反對開放和「百花齊放」的人。<sup>53</sup>1957年5月1日，整風運動正式開始。百花運動僅僅持續了五個星期，雖然很短，卻高潮迭起。

<sup>48</sup> Leese (2011, 57–60).

<sup>49</sup> MacFarquhar (1974, 184–199).

<sup>50</sup> 十篇講稿的翻譯版可參考 MacFarquhar, Cheek, and Wu (1989, 191–362)；Shen (2008, 476–490)。

<sup>51</sup> 這篇短篇小說由一位年僅21歲的作家王蒙撰寫完成，題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這篇文章發表在1956年9月份的《人民文學》上。譯稿詳見 Nieh (1981b, 473–511)。

<sup>52</sup> Cheek (1997, 175–182), MacFarquhar (1974, 192–194).

<sup>53</sup> MacFarquhar (1974, 200–207).

## 民眾的回應

中國各城鎮黨委機構舉辦座談會，歡迎民眾對幹部的態度和行為進行批評。<sup>54</sup>人們發現國家對批評者並沒有馬上進行報復，這之後，就出現越來越多、越來越直言不諱的批評者。黨的幹部需要面對下屬提出毫無保留意見的批評。這些是下屬們以前並不敢表達的想法。對於黨的幹部而言，批評的結果就是讓人感到羞恥、意志消沉。隨着批評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幹部的同事、還有一些黨員高級幹部對批判表示贊同，批評浪潮越演越烈。整風運動馬上超過了原有的邊界，開始攻擊蘇聯模式固有缺陷。

140

共產黨在城市的工作場所所設立的新型控制模式遭受了尤其嚴苛的批評。批評者抱怨，在每一個組織機構裏，黨員都掌控了所有權力：黨員幹部甚至能夠駁回專家的決定，忽視那些經驗更為豐富、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所提出的建議；黨的幹部缺乏能力，會在工作上犯錯，對下屬公開表示不尊重；他們為自己爭取特權，任命配偶擔任自己工作單位內的高收入職位；黨員經常在晉升當中被優先考慮，即便他們並不能夠勝任這份工作，有些黨員甚至都不識字。<sup>55</sup>

記者也抱怨他們不能很好地完成本職工作，抱怨審查制度讓他們失去了做這份工作的尊嚴。他們抱怨自己並不享有獲知政府決策的權利，希望有更大的自由進行真實報道。他們抱怨，報紙已經成為僅僅重複政府官員話語的機構，記者和編輯都不允許進行獨立思考。更為直言不諱的批評者指出，共產黨對記者的要求就是讓人民保持無知。<sup>56</sup>

學術界對於黨的制度尤為憤恨。他們公開譴責黨對於自然科學進行嚴格限制，同時幾乎摧毀了整個人文和社會科學，強迫他們遵從已經過時了的馬克思主義教條。他們譴責共產黨死板地遵從蘇聯教條和學術：崇拜蘇聯的事物，而對於美國的事物卻膝跳反射般反對。國家不允許出

<sup>54</sup> Shen (2008, 523–551).

<sup>55</sup> MacFarquhar (1960, 51–53).

<sup>56</sup> 同上，頁59–76。

現批判思維，如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會受到懲罰；在他們缺乏能力管控的領域，無能的黨委書記對教學進行監視；教工和研究人員被以往的政治運動所恐嚇，都不敢發表看法。一些領域的研究由於無知的黨委書記機械的教條態度而被中止。經濟學家公開譴責他們學科發展有所衰退：數據和調查都被視為「資產階級科學」而受到譴責，學者被迫儀式般地重複來自馬克思經典著作的論述，「例證」建立在簡單的算數上。<sup>57</sup>

在以往反對自由思想運動中倖存下來的作家和編輯公開為自己之前的觀點進行辯護，並且撰寫了諷刺性的文章，諷刺共產主義官員的教條主義。其中一篇發表在《人民文學》的文章，嘲諷了黨的幹部不經思考便遵從教條主義，而且經常改變黨的路線：

現在的高級幹部……那「才略」，是非凡的。我看到，有些不讀書的人，卻極善於領導別人的讀書，而且極善於批判讀書的人從讀書得來的言論。……這種馬克思主義領導者的特徵，是他們的理論雖然幾經反復，卻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曾經錯過，他每一次的一百八十多度的轉向都是正確的。……這種人的思想的特點，我看就是「隨」，也就是自己從未思想過。他自己隨隨，是無關緊要的，但他是領導者，於是被領導者們可吃苦了。<sup>58</sup>

這些批評可能刺激到了黨的幹部，他們之前只習慣於聽到擔驚受怕的下屬對他們表示應和，在很多機構，批評者偏離了原定的道路，很顯然對體制展開了批評，而不僅僅是幹部的個人行為和態度。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教授表示，現在的情況甚至比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情況還要糟糕，共產黨完全脫離了人民：「民眾想要推翻共產黨，殺掉共產黨人。」這位教授表示，如果共產黨不在根本上改革自身，那就會倒台被推

<sup>57</sup> 同上，頁117–120。類似的抱怨也可以參考Andreas (2009, 34–38)、Chen (1960, 152–170) 及 Shen (2008, 579–581)。

<sup>58</sup> Nieh (1981b, 323–324)。作者為徐懋庸，文章名稱為〈「蟬噪居」漫筆〉。Goldman (1967, 191–202) 調查了小說家和詩人提出的批評，Nieh (1981a) 翻譯了批判共產黨在文藝和詩歌上的教條主義的文章。

翻。<sup>59</sup>瀋陽師範大學的一位教授描述了在共產黨統治下的艱難場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特別是近一兩年，共產黨開始超越了人民，享受特權，標榜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黨的聲譽一天天下降。越來越多帶有不純目的的人加入到共產黨當中。他們加入共產黨，因為可以獲得榮耀、權力、影響力和金錢。他們對個人主義嗤之以鼻，討好共產黨，屈從於共產黨，在任何事情上都聽從於共產黨……必須廢除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權……憲法就是一堆廢紙，共產黨沒有必要去遵守憲法……就集會、集社和出版的自由權利而言，它們只是紙上空文；事實上，民眾只能成為順從的臣民，或者說用更為直白的詞，就是奴隸……應當建立起普選體系，同時廢除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權。人民應當擁有自由成立新政黨和社會團體的權利，自由出版，開放輿論空間，監督政府，打擊廉價的褒獎，鼓勵民眾反對糟糕的現狀，即使這意味着反對中國共產黨。<sup>60</sup>

142

另一位批評者甚至控訴黨不再像過去那樣與人民站在一起，而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壓迫人民：「（黨）不再站在人民群眾當中，而是站在群眾背後實施統治。」政治活動家一邊在公眾場合為民發聲，另一邊卻在背地裏檢舉他人；他們裝作大公無私，實則不顧他人、以鄰為壑。<sup>61</sup>還有一位批評者抱怨道，黨員為了在這種壓抑環境下生存，必須進行自我審查和自我疏離：「要想成為一個黨員，必須將自己視為瘋子或行屍走肉。只有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他們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sup>62</sup>

這些都是體制的問題，而非幹部個人的缺點。然而，專家學者的異議還並非是黨內領導最為頭疼的事。最終導致「雙百方針」急停的原因，

<sup>59</sup> MacFarquhar (1960, 88–89).

<sup>60</sup> 同上，頁106–107。

<sup>61</sup> 同上，頁49。其他嚴厲的批評可以參看Zhu (2005, 195–201)。

<sup>62</sup> MacFarquhar (1960, 73). 講話人名為戈揚，是一位資深的共產主義者和記者。其他類似進行徹底改革的呼籲可以參看Shen (2008, 573–579)。

是以大學生為主的學生獨立運動以及更令人不安的工人集體動亂。

在首都，北京大學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心，這裏在歷史上曾是20世紀初期學生運動的發源地。隨着5月中旬出現的第一批海報，學生運動迅速蔓延。校園中心建起了一堵「民主牆」，吸引了大批人貼文讀文。這堵牆也引來不少公開辯論和演講。獨立的政治社團和討論小組相繼成立並發行各自的報刊。<sup>63</sup>當月，北大內還貼出了赫魯曉夫講話長篇節選的譯文。<sup>64</sup>最常見的抗議內容包括鎮壓反革命中發生的種種不公，黨的領導對教育機構的負面影響，對「胡風反革命集團」明顯錯誤的指控，刻板堅持蘇維埃教育模式，學術課程過度政治化，以及黨員幹部以教條式思維對待非黨員教師和學生。還有一些批評意見質疑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像黨所宣稱的那樣得到改善，認為黨的專制進一步擴大了黨和人民之間的距離。<sup>65</sup>

在所有發表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最著名也最具爭議性的發言來自鄰校中國人民大學一位直言不諱的法律系學生——林希翎。<sup>66</sup>在5月23日的演講中，林公開質疑黨對胡風及其同案犯的定性，並指出胡對黨中央的建議完全符合「雙百方針」。胡風就藝術和文學給出的建議是「正確的」。將他定性為反革命的依據是毛澤東在1940年代初期的論斷，而這些論斷早已過時。因為胡風與他人有過「秘密通信」就認定胡風組建了一支「反黨小組」，林希翎對這一指控不屑一顧：「哪個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說真話。」為什麼這些顯而易見的錯誤仍未得到黨的糾正？「我看共產黨是有些為難，沒法下台，錯了也不肯認錯。」<sup>67</sup>

<sup>63</sup> Wang et al. (1998, 515–516).

<sup>64</sup> Leese (2011, 61).

<sup>65</sup> Goldman (1962), MacFarquhar (1960, 130–141).

<sup>66</sup> 根據 Moody (1977, 189–192)，林希翎是程海果的筆名，她原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於1953年退伍，後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

<sup>67</sup> Doolin (1964, 23–25).

隨後，林希翎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所述的斯大林所犯過錯與中國的錯誤相比較：「我國也是肅反擴大化。」林之所以知道這個情況，是因為她曾在一個地方法院實習，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審查涉嫌反革命的案件，當然，這些罪名顯然是不成立的。她所說的這些問題，其根本原因還是出在制度上：「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樣的國家……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sup>68</sup>

林希翎直言，中國的蘇聯模式存在很嚴重的問題，僅靠毛澤東的整風運動等表面措施難以得到糾正：

共產黨用整風的辦法，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向人民讓點步就夠了……共產黨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採取愚民的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對一切缺點不能用改良主義的辦法，因為還有很多衛道者，他們想把先烈用鮮血換來的社會主義成果，作為他們向上爬的台階。

144

林在發言的最後提到了那些在武漢、南京等地做動員工作的學生，並呼籲全國上下為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奮鬥。在她看來，匈牙利事件起因之一就是為了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sup>69</sup>

一星期後，林在北大作了第二次發言，詳述了斯大林主義的典型濫用植根於蘇聯模式的組織結構。她也說明了自己的想法從何而來：「我對南斯拉夫問題很感興趣，我認為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比較民主的。」在中國的官僚制度下，「我們並不是以德才來衡量一個人，而是看他是不是黨員……一些人為了享受特權而爭着搶着入黨；不入黨就沒

<sup>68</sup> 同上，頁27。

<sup>69</sup> 同上，頁27–28。

有出路。」<sup>70</sup>這些問題深深紮根在中國經濟政治制度的新型組織架構中，而新的組織架構卻帶着強烈的「封建性和法西斯性」以及「買辦性」色彩：「買辦是媚外崇美，對蘇聯的學習也是如此。」<sup>71</sup>

赫魯曉夫的講話對林希翎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過去對斯大林印象很好，蘇共二十大上對他的批評讓我很生氣。但是，在我讀過這份秘密報告後，我才看到真正的斯大林。對斯大林的評價不能建立在個人崇拜的基礎上，必須以制度本身為依據。」毛對反革命分子的過度迫害，「受到斯大林錯誤論斷的影響。斯大林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建立後階級矛盾會變得越來越尖銳。」<sup>72</sup>

林希翎崇尚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她對波蘭、匈牙利、特別是南斯拉夫的思想家們不斷努力擺脫斯大林式的過去深感欽佩，他們希望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形式。這些嘗試遠遠超出了毛澤東對黨內整風運動的設想。林並非是唯一一個持類似看法的，也不是最極端的，還有人比她更大膽。以「民主自由」為宗旨的北大百花學社宣稱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過時，呼籲組建新的政黨、開放多黨競爭。<sup>73</sup>民主牆上還有海報把根據政治地位劃分階級比喻為一種變相的種姓制度，認為人事部門就是通過這種劃分掌握新的統治基礎。<sup>74</sup>

在這一時期，常有持異見者批評中國已經完全建立了新的特權階級。最極端的言論中有一則出自一位匿名人士（可能是一名中年黨政幹部），闡述了一個離經叛道的內部人士的想法：

我是那麼無力，既沒有勇氣，也沒有抗爭精神。我只知道如何生活在領導的指示下。我每天吃得很好，拿着高薪水……許多領導幹部享受着有宴會、有別墅的豪華生活。為什麼要活得節儉？有多少

<sup>70</sup> 同上，頁31。

<sup>71</sup> 同上，頁32–33。

<sup>72</sup> 同上，頁38、41–42。

<sup>73</sup> 同上，頁16。

<sup>74</sup> 同上，頁45–46。

人學會了假意服從，對領導卑躬屈膝，但面對群眾的時候卻把自己當成高官和貴賓？……二十年來，我看透了這些做派的人。面對敵人時，我血紅的眼睛裏充滿了憤怒，我願拋頭顱灑熱血；但面對共產黨的專政，我卻是那麼懦弱無力……我們獻出了自己的熱血、汗水、辛勤勞動甚至寶貴的生命，捍衛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一邊壓迫着人民一邊過着奢靡生活的官僚。他們就是一群法西斯，因為心中的惡而聚在一起，用愚民的手段扭曲真相。<sup>75</sup>

這位匿名人士還對毛澤東不屑一顧，指責毛是一個偽善的獨裁者。「我反對毛主席最近向共青團中央作出的指示，『黨是一切工作的核心，任何偏離社會主義的行動都是錯誤的。』這一指示實際上是在說：必須接受黨的領導。如果有人反對太上皇，他就是在犯錯誤，應該馬上被拉去砍頭。」他還將毛澤東和秦始皇相提並論，後者建立了一個殘暴的政權，以背信棄義、焚書坑儒而聞名：「陛下，就因為您的一聲令下，多少人沒了理想和希望！陛下！在您面前，秦始皇的所作所為根本算不了什麼！1949年以來，您殺掉了七十多萬人（還不包括自殺的）。照着您的心願盡情殺人吧！殺光所有中國人！」<sup>76</sup>

146

這位作者還出言諷刺延安共產主義的神話。「獨裁者，你變成了洪水猛獸。在延安……你殺了多少所謂嫌疑犯？你卻稱之為『內部淨化』……在所謂的延安聖地，就因為提了提大廚房、中廚房和小廚房的事，王實味被清算……他現在被弄到哪兒去了呢？沒人知道。抗日大學的學生在前線拼死抵抗的時候，你卻在延安沉迷酒色。你在窯洞裏活得可真是苦！」<sup>77</sup>

因為一些不言而喻的原因，媒體並沒有公佈這些批評的聲音，也沒有公開報道這些學生運動。但是黨員們通過《內部參考》以及其他資料

<sup>75</sup> 同上，頁60。

<sup>76</sup> 同上，頁61–62。

<sup>77</sup> 同上，頁65–66。這位作者呼應了王實味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對中共領導人的批評，參見第二章。

中的機密報告對這些情況是有所了解的。<sup>78</sup>這些公開表達的異見表明整風運動在走下坡路，而這正是反對整風運動人士所擔憂的。毛澤東開始對自己犯的錯誤感到不安。他錯誤地將屈從當作認同，低估了1950年代的鎮壓造成的怨恨，特別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心中的憤懣。他錯誤地以為，1956年中國的相對平靜是因為人們對政權還有堅定的信任。

新成立的獨立社團和出版的刊物，以及要求終結一黨專政的呼聲遠遠超出了最初的設想。更令人震驚的是，學生運動快速蔓延到全國上下，許多人將之與開啟了現代革命的五四運動相提並論。北大的學生積極分子前往天津動員學生群體。<sup>79</sup>全國各地的校園紛紛效仿建立「民主牆」和「自由論壇」。截至5月底，北京全部的高校（共計31所）以及武漢、上海、南京、吉林、天津、蘭州等地多所大學都開展了類似的校園運動。<sup>80</sup>沒上大學的高中生則罷課示威，甚至破壞校舍和設備；武漢、西安、廣州、瀋陽等地的校園也不乏類似示威，原因是大學生們對工作分配及其他一些事務頗為不滿。<sup>81</sup>武漢、南京、成都、青島、桂林等地的學生們走上街頭展開示威遊行。<sup>82</sup>許多學校的共青團組織變成了異見者中心。

考慮到之前發生在東德、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亂，工人們的抗議實際上是更大的潛在威脅。工人們組織起來抗議新計劃經濟下的工作條件。上海的工人運動是全國工人抗議浪潮的縮影，這股浪潮始於1956年並在雙百運動期間到達頂峰。1957年春，上海587家企業發生勞資糾紛，超過200家發生罷工事件，涉及近3萬名工人，另有700家企業內出現其他形式的抗議。這是繼1949年10月以來，上海勞工運動史上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工人浪潮。根據1957年的一份黨內文件顯示，當年春天中國爆發了一萬多次罷工，學生紛紛抗議，群眾走上街頭請願和

<sup>78</sup> 基於內部資料，Shen (2008, 584–596) 描繪了學生和工人的憤怒。

<sup>79</sup> MacFarquhar (1974, 221), Wang et al. (1998, 517).

<sup>80</sup> Shen (2008, 587–590), Zhu (2005, 218–222).

<sup>81</sup> Shen (2008, 590–591).

<sup>82</sup> MacFarquhar (1960, 143–164), Shen (2008, 591).

示威。上海的大部分勞資糾紛都發生在剛從私營轉為公私合營的企業中，原因是改制降低了工人們的工資水平，取消了過去他們和私營老闆已談妥的福利待遇。正如前幾年的柏林和比爾森一樣，國家接管企業後就將工資和待遇「下調」。工人們大舉抗議官僚、專制的勞資關係，公然詆毀黨委書記和「傀儡」工會。<sup>83</sup>

農村地區的抗議活動也隨處可見，直接的導火索是上一年快速組建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而這些合作社的組建並非出於農民自願。農民公開表達不滿情緒，時間長達幾週。而在1956年底，情況越演越烈。後來的黨內報告對此有詳細說明。村民抱怨新政干預個人時間的支配，幹部隊伍管理不善，職位安排和收入分配過於隨意，收入大幅縮水，分配食物數量和質量下降。新任村幹部行為「粗魯」、「壓迫與欺凌」村民，他們不僅挪用、浪費公款，還辱罵、捆綁、毆打出聲抱怨的村民。這份報告引用了一些農民的原話：「合作社沒比勞改營強多少」，新的集體生產「帶來的痛苦比收入多」。<sup>84</sup>

148

雖然對農村的抗議活動記錄較少，但有資料顯示，確實發生了大規模的動亂而且後果嚴重。在江蘇省內，有農民強行自留收割的糧食，頂撞村幹部後退出合作社。<sup>85</sup>1957年4月中旬至5月底，浙江省內某縣33個鄉鎮中有29個鄉鎮發生了鬧事事件，農民們紛紛退出合作社。該縣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參與率從91%掉至19%。村幹部遭受毆打，家中發生打砸。山西和廣東也爆發了類似的大規模暴力事件。<sup>86</sup>在邊境地區，激進的集體化催生了強硬、組織嚴密的叛亂。<sup>87</sup>

中國領導人有足夠的理由引起警惕。毛澤東最初一直堅持自己的「開門整風」，沒把學生的抗議和罷工當回事，認為沒必要對此過分擔心。但毛澤東無法打消同事們的擔憂，而且很顯然，情況即將失控。最

<sup>83</sup> Perry (1994), Shen (2008, 591–593).

<sup>84</sup> Huaiyin Li (2009, 57).

<sup>85</sup> 同上，頁55–76；Huaiyin Li (2007).

<sup>86</sup> Shen (2008, 593–594).

<sup>87</sup> Wang (2015).

令人不安的是，一部分最尖銳的批評來自年輕黨員，共青團組織正在成為異見中心。遍佈全國的學生運動、工人的群眾抗議以及年輕黨員的批評，都是此前東歐大規模運動的徵兆。這些徵兆預示着重重威脅，最終使得領導人們達成一致意見。後續的事態發展證明，部分領導人對整風運動的擔心是正確的，該運動確實會破壞社會穩定。毛澤東最終改變主意，下令進行嚴厲的鎮壓。<sup>88</sup>

## 反彈：反右運動

6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社論重新定性整風運動，認為這次運動已經淪為「右派」對黨和社會主義的無情攻擊，而這批人的所言所行都是為了袒護剝削階級的利益。從本質上來說，這一論述背離了中共八大確立的黨的路線，即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從根本上消除了階級矛盾。黨內整頓實際上變成了黨對人民的整頓。在雙百運動期間提出過批評意見的人成了反右運動針對的對象。此外，民主牆被取消，堅持發聲的學生和工人被捕，獨立社團和刊物被強行停業。

過去鼓勵自由批評的論壇現在轉而譴責那些在過去幾週提出批評意見的人是在犯錯誤。反右運動的時長遠遠超過雙百運動，並持續到1958年初。黨內發動黨員記錄雙百運動中的批評性話語和行動。被劃為右派的人士，不僅會在工作會議上受到嚴厲批評，還要被關起來交代自己的問題。先前對黨批評得最兇的人甚至被當眾批鬥。關於批鬥的人數和規模，地方黨委都有相應的指標。這就導致那些善意直言的人淪為受害者。<sup>89</sup> 反右運動不僅在大學和其他受過高等教育人員比重較高的組織中開展得風風火火，也蔓延到工廠和農村。農村的反右重點是中學老

<sup>88</sup> MacFarquhar (1974, 218–219, 225–240, 248–249, 261–269), Shen (2008, 597–608).

<sup>89</sup> Chen (1960, 171–201), Shen (2008, 637–673). 雙百運動期間，不僅僅是那些滿腹牢騷的人批評了共產黨。U (2012) 分析了那些享受特權、對共產黨非常忠誠的人對黨提出批評的動機，儘管他們要面臨潛在風險。

師、舊時的地主、富農以及那些抱怨村幹部腐敗、濫用權力的人。<sup>90</sup>

隨着反右運動的開展，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終於在2月份發表。毛在當月就同一題目發表了演講，很多觀眾聽取了該演講的錄音。而文章的內容與演講內容略有不同，新增了對「過分」批評的警告，強調這是不能被容忍的；此外，文章提到了階級鬥爭。原來的演講花了大篇幅指責斯大林未能區分兩種性質不同的批評，反而把所有的批評都視為敵對勢力，從而「把矛盾混合起來了」。同這一段一樣被刪去的還有一句話：「誰如果批評了，那麼就懷疑你是敵人，就有坐監獄的危險，就有殺頭的危險。」演講中引自赫魯曉夫的內容同樣被刪去：1930年代有90%的蘇共大會代表和80%的中央委員被殺害。毛在之前的演講中還提到，出於「必要原因」而殺掉了「少數個人」（而實際上，1951到1953年間殺掉了70萬人。1955年之後又殺掉了8萬人）。毛澤東把過去一年的學生鬧事定為「人民內部矛盾」的論述也被文章刪去。<sup>91</sup>

150

該演講公開發表的文字修訂版粉飾了毛澤東顯而易見的政治判斷錯誤：他過去信心滿滿地強推整風運動，卻被事實打臉。上述修訂以及毛掩耳盜鈴般地宣稱之前所為是為了「引蛇出洞」，實則是為毛在全體黨員面前挽回面子。然而，此舉更深遠的目的在於把階級鬥爭重新列為黨的中心任務。1956年中共八大所確立的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不再堅持。<sup>92</sup>知識分子和專家參與經濟建設的計劃也被擱置，而前者更是被視為潛在的顛覆分子。中國的去斯大林化政策就此草草結束。

反右運動涉及數千萬參加過抗議和集會的民眾，以及數十萬告發受害者或者充當情報人員的積極分子。1958年初反右鬥爭基本結束，共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sup>93</sup>他們根據其罪行嚴重程度被分為幾類。有一小部

<sup>90</sup> 例如參看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 209–213)。

<sup>91</sup> MacFarquhar (1974, 266–269). Schoenhals (1986) 詳細分析了這些變化。原文譯稿詳見 Mao (1957)。

<sup>92</sup> Leese (2011, 65–66), Shen (2008, 673–680).

<sup>93</sup> Shen (2008, 662); 這一運動給著名文藝界人士帶來的毀滅性影響參看

151

分人因其言行被認定為公然反革命而被執行死刑。這其中包括一些組織學生暴力抗議活動和罷工的領袖。<sup>94</sup>多數人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刑期不定。最嚴重的服刑二十多年，直到毛澤東去世後才被釋放。罪行較輕的被送去勞改農場，其中一些人在1960年代初被釋放。其他人受到降職、降級、降薪等處罰，不過仍可以留在原單位留用考察。直到毛澤東去世後，他們才被摘掉右派的帽子。他們的家人也受到牽連，因為像「地主」或「國民黨」這樣的右派標籤能夠影響整個家庭。毛澤東的雙百方針，其本意是為了增進黨和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卻反而徹底毀掉了原有的聯繫紐帶。

有輕微的跡象顯示，在這期間毛澤東的威信和判斷受到了間接但是公開的質疑。<sup>95</sup>1957年的大部分時間，毛澤東都不同意劉少奇對反右運動的看法——越是強調階級敵人的危害，越是讓毛澤東先前的判斷顯得大錯特錯。經過幾個月的斡旋，兩派最終就反右運動的性質和範圍達成妥協。<sup>96</sup>1957年6月，毛澤東被迫放棄雙百方針。而另一邊，因為其「秘密報告」而引起東歐動盪的赫魯曉夫勉強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仍被控行事魯莽和作風強硬，犯下一系列錯誤。他面臨着政治局多數成員的嚴厲批評，但他最終得以扭轉局勢，指控反對派為「反黨集團」並將他們逐出政治局。<sup>97</sup>毛澤東和赫魯曉夫都是因為推動自由化改革而引火燒身，當然赫魯曉夫面對的問題更為嚴峻。赫魯曉夫在之後幾年得以擴大去斯大林化政策，而毛澤東卻很快回到了他最初的角色當中，即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倡導者。自此，中蘇兩國的意識形態向着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sup>98</sup>

---

Goldman (1967, 202–242)。

<sup>94</sup> Hoffmann (1974, 146–147), MacFarquhar (1974,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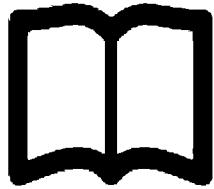
<sup>95</sup> MacFarquhar (1974, 283–289).

<sup>96</sup> 同上，頁289–310；Leese (2011, 63–64) 並不贊同這一解讀，認為毛澤東掌握着更堅實的權力。

<sup>97</sup> Taubman (2003, 310–324).

<sup>98</sup> Lüthi (2008, 71–74).

毛澤東因為其推行的去斯大林化政策草草結束而頗為受挫，他將精力轉而投入快速建設經濟的鬥爭當中。他利用黨來發動這場鬥爭，動員手法恰如內戰的最後階段。正如我們所見，相較於1957年的反右整風，這場鬥爭的結果對中國而言更具災難性，對毛澤東的個人形象而言更具破壞性。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大躍進

反右運動和大躍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大躍進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生產運動，最終以失敗收場，並造成巨大災難。其失敗是必然的，但災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大躍進背後的經濟論斷存在嚴重錯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實現其崇高目標。災難則是大躍進的政治因素所致：兩場旨在肅清黨內不忠分子的大規模運動促成了大躍進的開展和持續。反右運動不單單是針對1957年春批評共產黨的黨外人士，成千上萬的黨員和年輕幹部也成為受害者。他們本來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通過公開批評來糾正黨的錯誤，但這些批評卻被定性為政治不忠，是站在「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立場反對「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立場。毛澤東由此斷定，這說明中國的階級鬥爭還未結束，在黨內也有所反映。一些黨員的意見被認為體現了剝削階級思想，因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懲罰。據說，他們的「反社會主義立場」旨在從政治上削弱黨，阻止中國向社會主義轉變。

隨着反右運動與大躍進相結合，對大躍進的熱情支持和對其成功的堅定信心成為政治忠誠的主要標準。對其措施或主張的質疑，或者對其問題的如實匯報，則成為政治不忠的表現。在嚴重問題逐漸浮出水面，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大躍進政策正在造成災難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第二場肅清運動開始了，那些匯報問題或者主張減速的人成為打擊對象。這阻礙了對路線的糾正，釀成了大躍進最慘重的後果，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

## 大躍進的起源

1950年代，毛澤東一再要求中國經濟加快步伐向蘇聯模式轉變。在毛的干預下，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的完成速度比最初計劃的大大加快。這使農業在1955年和1956年出現嚴重問題，負責經濟規劃的領導人就糧食生產和其他方面的過高指標提出了警告。他們說，「冒進」會導致經濟失調，損害長期經濟增長，造成農民生計困難。1956年和1957年期間，他們成功制止了毛澤東對過高產量指標的盲目追求，但這沒能持續多久。<sup>1</sup>

反右運動期間，在1957年9至10月舉行的中共會議上，毛澤東大力反擊，強烈要求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生產目標。他把經濟政策問題變成政治忠誠問題。他宣佈，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右派分子提出的批評意見就是這種矛盾的體現。他宣佈，反對「冒進」的中共領導人犯了「右傾」錯誤。他指責稱，這種錯誤的政治路線導致在階級鬥爭的問題上態度軟化，從而鼓勵了「資產階級」和「富農」在1957年發動的反撲。<sup>2</sup>

毛澤東對大躍進的想法，源於他在1957年11月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週年慶典期間。在前一年的蘇聯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宣佈，新的蘇聯五年規劃將是共產主義建設向前邁出的「一大步」。1957年5月，他宣佈蘇聯「重要產品」的產量將在15年內超過美國。在私下談話中，赫魯曉夫可能對毛澤東說，蘇聯第七個五年規劃的目標是到1970年，使蘇聯人均工業產量超過美國。<sup>3</sup>和赫魯曉夫一樣，毛澤東也對社會主義的發展非常樂觀，儘管專家們和經濟規劃官員堅持認為，這樣的宏大計劃不切實際，但他和赫魯曉夫都不以為然。赫魯曉夫的豪言壯語增強了他的信心。身處莫斯科期間，毛澤東給北京的中共領導人

<sup>1</sup> Bernstein (1969), Teiwes and Sun (1993; 1997; 1999, 20–52).

<sup>2</sup> Teiwes and Sun (1999, 67–69).

<sup>3</sup> MacFarquhar (1983, 16).「重要產品」包括鐵礦石、生鐵、鋼鐵、煤炭、石油、電力、水泥，以及一些消費品，如糖、毛織品和皮鞋。

打電話，說反對冒進是錯誤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速度可以遠遠超過那些謹慎的領導人的看法。<sup>4</sup>

赫魯曉夫的誇誇其談鼓舞了毛澤東。他在莫斯科公開宣佈，中國將在15年內超越英國。這在他回國兩週後成為黨的政策。<sup>5</sup>毛澤東打算通過政治動員來迅速實現經濟突破。在第一個五年規劃（1953至1957年）期間，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但這種增長高度失調，這是蘇聯模式的通病。工業增速是農業的五倍，人均糧食產量增長緩慢，沒有多餘的糧食可以徵調用來養活工業勞動者。<sup>6</sup>

毛澤東對建議謹慎行事和平衡發展的規劃部門官員很不耐煩。他相信，集體化和大規模動員會克服所有障礙。<sup>7</sup>毛澤東拒絕了陳雲和鄧子恢等人關於各產業平衡發展的意見。他們的想法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支持。陳雲希望提高農民收入，加大對輕工業的投資，為他們提供可購買的生活消費品，而輕工業的利潤積累將為重工業投資提供資金支持。陳雲的想法類似於上世紀20年代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在蘇聯提倡的那一套，但布哈林的主張被斯大林否決，並且在斯大林剷除政治對手的過程中被定性為右傾錯誤（蘇聯歷史短訓班就是這樣講的，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理解就源於短訓班）。<sup>8</sup>雖然陳雲的想法與斯大林執政早期的蘇聯正統觀念背道而馳，但非常符合對蘇聯發展模式的回顧性批判式思考。1950年代，蘇聯發展模式在蘇聯和東歐國家被廣泛採用。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明顯過時，在精通社會主義經濟學的人眼中是思想狹隘的，落後時代20年。

毛澤東的辦法是通過組織變革和政治動員來實現糧食供應的迅速突破，從農村徵調更多的糧食，以支持對重工業的更大投入。毛澤東相

<sup>4</sup> 同上，頁17；Teiwes and Sun (1999, 70–71).

<sup>5</sup> MacFarquhar (1983, 17).

<sup>6</sup> Lardy (1987a, 360).

<sup>7</sup> 同上，頁362。

<sup>8</sup> Lieberthal (1987, 300). 陳雲在這一時期關於中國發展戰略的文章的英文版可參看Lardy and Lieberthal (1983)。

信，更大和更多的「社會主義」公社會帶來規模經濟效益，對現有資源尤其是勞動力的集中動員會實現產量突破。和傳統的蘇聯模式一樣，資本投資被過多地直接投向重工業，尤其是鋼鐵等行業。<sup>9</sup>

毛澤東對經濟發展的錯誤看法還不足以釀成大躍進的巨大災難。大躍進的嚴重後果是這些看法與政治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政治運動使經濟政策蒙上了政治忠誠與否的色彩，與階級鬥爭劃上等號。大躍進未能刺激經濟增長，而大躍進的政治因素把它變成了一場災難。

在 1958 年 1 月的中共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周恩來和其他反對冒進的領導人。他聲稱，這種錯誤路線給右派分子壯了膽。在隨後幾個月的中共會議上，他繼續批評那些強調平衡、規劃和經濟規律的人。他說，這些原則只是基於「迷信」和「教條主義」。毛澤東宣佈，中國從此以後將「政治掛帥」，強調人的因素和群眾的熱情。專家不再主導決策過程。他們對合理規劃和科學標準的信奉是「資產階級迷信」。黨的幹部和人民群眾將取代專家。專家制定各種規章制度只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地位和權力。<sup>10</sup> 毛澤東號召大家「鼓足幹勁」，發動「技術革命」，批評「右派思想」，「破除對專家和蘇聯模式的迷信」。<sup>11</sup>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這麼強烈地堅持他對經濟的看法，從本質上轉向個人獨裁，不容許任何反對意見。持有不同政策觀點的人受到嚴厲批評。1958 年期間，他直接接過經濟指揮棒，繞過產業部門的經濟規劃官員，讓省委書記和國家黨組織執行他的命令。毛澤東發出黨內階級鬥爭的警告，這加大了提高產量指標的政治壓力。他把「反冒進」視為反馬克思主義，堅持認為冒進是馬克思主義觀。他警告說，黨內存在分裂風險。他聲稱幾個省出現了「反黨集團」，導致 1958 年 5 月對「反冒進」的省級領導進行了高調清洗。周恩來和其他官員被迫作出自我批評，有幾人被撤職。在一段時間內，周恩來甚至似乎被取消了總理職務。<sup>12</sup>

<sup>9</sup> 在 Lardy (1987a, 363) 看來，大躍進是基於毛澤東對中國農業所面臨的制約因素的誤解。

<sup>10</sup> MacFarquhar (1983, 52–63), Teiwes and Sun (1999, 73–77).

<sup>11</sup> Dikötter (2010, 15–24), Teiwes and Sun (1999, 85–86).

<sup>12</sup> Teiwes and Sun (1999, 90–93).

這些威脅迫使各級幹部對大躍進表現出絕對的熱情。制定產量指標的會議變成了對「反冒進」錯誤路線的批判大會。1958年期間，隨着反右運動蔓延到農村地區，曾經反對快速集體化和指出問題的人也成為打擊對象。<sup>13</sup>這壓制了所有反對意見，並使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成為政治忠誠的標準。

遭到毛澤東反對的經濟發展戰略認為，應該讓政府部委司局和供職於這些機構的規劃者、專業管理者和技術專家來確定經濟目標和投資重點。這一方案由陳雲設計，並得到周恩來的支持。蘇聯在二戰後就採用了這種現代化的做法，按照一套官僚程序把經濟規劃從上至下傳達給省和地方政府。而在1958年期間，毛澤東卻把規劃工作從他們手中剝離，交給省委書記來做。在此如此緊張的政治氛圍中，省委書記們不得不積極響應。對大躍進的規劃變成了充滿政治色彩的誓師大會。在很多會議上，各級黨委書記競相承諾大幅提高糧食、鋼鐵和其他重要產品的產量，這使黨組織本身掌握了巨大權力，代替各級政府作出經濟決策。這還使各級幹部承受了巨大壓力，他們不得不表現出全心全意的支持，然後努力兌現他們的承諾。

黨委書記們誇下海口大幅提高工業產量，這使毛澤東大受鼓舞。1958年5月，他宣佈自己之前太過保守，現在只需要7年時間就能超過英國，15年時間就能趕上美國。<sup>14</sup>鋼鐵指標大幅提高。1957年的全國產量為500萬噸，規劃官員最初對1958年設定的目標為580萬噸，但到了1958年9月，省委書記們承諾的數字使全年目標提高到1,100萬噸，1959年的預期目標更是高達3,900萬噸。<sup>15</sup>為了實現這些承諾，對重工業的資本投資出現飆升，主要通過從社會主義陣營進口設備（通過增加糧食出口來償債）來提高產能。1958年的資本投資目標最初是145億元，後來迅速提高到386億元。<sup>16</sup>

<sup>13</sup> Lieberthal (1987, 301).

<sup>14</sup> Teiwes and Sun (1999, 96–97).

<sup>15</sup> MacFarquhar (1983, 88–90), Teiwes and Sun (1999, 100–105).

<sup>16</sup> Lardy (1987a, 367).

黨委書記們同樣承諾大幅提高農業產量。1957年的糧食產量為1.95億噸，而在1958年期間，指標迅速提高至3.5億多噸。<sup>17</sup>和重工業不同的是，儘管農業指標大幅提升，但對農業的資本投入卻只有小幅增長。為了實現不切實際的產量指標，農村地區的幹部進行了激進的組織變革，對農民們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 農業大躍進

增加糧食產量的戰略嚴重依賴於擴大灌溉和墾荒面積。水壩和溝渠所覆蓋的區域超出了公社的範圍，所以第一步是把現有的公社合併成更大的公社。1957年，大約有7萬個公社，平均每個公社包括大約15個生產大隊（大致上等同於村）。而在1958年期間，這些公社被合併成大約2.3萬個大公社，平均每個公社包括50多個村。這使幹部可以動員大量勞動力進行大型建設項目。<sup>18</sup>

公社內部也作出了調整。農業生產以軍事方式進行組織，農戶被要求上交個人財物——炊具、桌子、椅子和櫥櫃——供公社使用。所有人都到公社食堂吃飯，不再自己儲存和準備食物，而是大家共同完成。工分的記錄被暫停，因為對農民的時間和精力提出了很多新要求。農民可以在食堂隨便吃，不再受到定量供應的限制。為了讓婦女和老年人參加勞動，公社建立了託兒所和幼兒園。在修建食堂、幼兒園和辦公樓時，農民被分配到這些項目當建築工人。在某些情況下，私人住宅被推倒拆掉，充作建築材料。農民按照軍隊的方式被組織成大隊，通常男女分開。勞動基本上沒有報酬，而且是強制性的。如果拒絕勞動，就無權到公社食堂吃飯，但只有公社食堂才有飯吃。<sup>19</sup>

大躍進這場生產運動像軍事運動一樣組織起來。河南省的一個模範公社建立了28個生產兵團，每個兵團下設團、連、排和班。農民被要

<sup>17</sup> 同上，頁366。

<sup>18</sup> 同上，頁363–365；Yang (2012, 163–167).

<sup>19</sup> Dikötter (2010, 47–55), MacFarquhar (1983, 103–106), Yang (2012, 167–170).

求遵守嚴格的紀律：服從領導和命令；積極勞動；不能遲到或早退；與資本主義思想作不懈鬥爭；互助合作。農民每個月至少要勞動28天，每天早晨軍號一響就必須起床，一起吃飯，同時睡覺。這個模範公社用兵營取代私人住房，男女分開，兒童住在單獨的房子裏。<sup>20</sup>

在大躍進之前，公社的勞動很有規律，隨季節而定。春耕和秋收是最忙碌的時節，冬天則是農閒時間。但大躍進打破了這種規律，農民總是忙個不停，不是在田裏幹活，就是在從事大規模灌溉項目、道路建設和墾荒。為了幫助省領導實現大幅提高的工業產量指標，公社建立了小型工廠。為了完成省裏的鋼鐵產量指標，各村建起了原始落後的臨時煉鋼爐，晝夜不停地運轉。勞動力被用於農業生產以外的地方，這常常導致照料和收割作物的農民太少。以前按照農事季節作息生活的農民發現，他們幾乎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貢獻了出來，公社幹部對勞動力的需求似乎永遠無法得到滿足。<sup>21</sup>

新的人民公社對集體生活的強調遠遠超過了集體農莊，還使農村官僚機構大幅膨脹。農業生產各方面的集中指揮需要更多的各級公薪幹部。公社通常有至少30名幹部，生產大隊有10名，生產隊有5名。這大大高於兩年前的數量。

在集體化之前，1名公薪幹部通常負責7個村。現在，每個村需要提供大約5名幹部的薪水，到了公社級別還有全職的公薪幹部。<sup>22</sup>從全國範圍來看，這意味着新的農村官僚機構擁有數以百萬計的全職幹部，這進一步壓榨了農村收入。另外，這個新的官僚階層對農村資源擁有集中支配權，而那些資源以前是在農戶或者村政府手中。他們控制了更多的資金，作出開支決定，掌握了村民的時間、勞動甚至食物供應。這為小規模腐敗、特權和濫權創造了條件。

<sup>20</sup> Yang (2012, 168–169).

<sup>21</sup> Dikötter (2010, 56–63), Yang (2012, 77–78).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 216–240) 和 Thaxton (2008, 118–156) 記錄了河北省兩個村莊和大躍進相關的實踐行動。Huaiyin Li (2009, 82–102) 記錄了江蘇省一個村莊的運動。Siu (1989, 170–188) 記錄了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的情況。

<sup>22</sup> Yang (2012, 168–169).

## 官僚自欺欺人的惡性循環

在龐大的官僚機構內部，互相欺騙和自我欺騙成風，最終導致大躍進釀成災難。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各級幹部不得不隨波逐流、盲目服從。起初，在目睹了對「反冒進」的清洗後，全國各級幹部紛紛不切實際地承諾大幅提高糧食產量，並表現出對前景充滿信心和熱情。這種自我欺騙還意味着，贊同那些明顯適得其反的措施會產生積極成果，而且完全照辦，根本不顧常識。然後，自我欺騙演變成向上級浮誇虛報，結果被當成榜樣加以宣傳和表揚，這使其他幹部面臨更大壓力，他們也競相效仿，弄虛作假。隨着問題的增多，虛報又發展成瞞報。事實被隱瞞，言路被閉塞，哪怕作物枯萎、饑餓蔓延，也堅持宣稱一切順利。後來，儘管饑荒日益擴大，但先前虛報的糧食大豐收已經使農村幹部作繭自縛，他們不得不向國家上交更多糧食，這導致饑荒進一步惡化。欺騙的最後一種形式是聲稱農民隱藏糧食、吃得太多，那些說沒有糧食可交的農村幹部是在說謊，他們囤積糧食供自己享用。這導致農民越來越少的儲糧被剝奪，即使饑荒已經非常嚴重。

160 惡性循環的第一步是省、市、縣和下屬各級黨委書記在小組會議上進行新的規劃，承諾來年的產量指標。最初的幾輪小組會議舉行的時候，正是反右運動接近尾聲、毛澤東把反冒進和黨內右傾錯誤公開聯繫起來之際。這些誓師會議就像一場拍賣，最高「出價」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力。高「出價」裹挾了其他人，因為沒有人希望被視為落後分子。<sup>23</sup>當省級幹部舉行區和市級規劃會議時，他們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要求下屬承諾很高的產量指標，好讓他們可以完成省級指標。為了保險起見，他們要求下屬承諾的產量指標之和往往高於省級指標，以防範可能出現的產量缺口。隨着這種層層加碼現象向下逐級蔓延，產量指標變得越來越不現實。

這些不斷提高產量指標的要求有一個問題，就是要求之間互相衝突。短時間內提高糧食產量的要求與現實相衝突，因為只有在擴大灌溉

---

<sup>23</sup> Oi (1989, 59–62).

和墾荒面積之後，才可能提高糧食產量。農村幹部從田地裏調走大量的勞動力從事建設項目，修築大壩、水庫和溝渠，以及開墾荒地。這轉移了種植、栽培和收割作物的勞動力，影響了糧食產量。抽調勞動力進行土法煉鋼，或者把勞動力調入公社和縣政府建立的新工廠，也會造成同樣的問題。農村幹部只能促使農民更努力、更快速地工作，來完成那些相互矛盾的指標。

相互欺騙循環的第二步是推廣一系列模範樣板，據說這些做法對實現看似不可能的目標很有幫助。其中兩種方法是密植和深耕，被黨組織和新聞媒體大加推廣和讚揚。密植是指提高播種的密度，使用更多的化肥，以此來增加有限耕地的糧食產量。這種方法有兩個缺點，一是在播種時需要使用更多的種子，二是秧苗互相爭奪陽光、水和土壤營養，導致作物發育不良和歉收。這不僅導致糧食減產，還使種子和化肥被大量浪費。儘管如此，這種方法的成功事跡仍被媒體熱心報道。深耕同樣具有破壞性。它把肥沃的表土（在中國很多地方已經是又薄又少）埋入深深的地下，把貧瘠的底土翻到表面。<sup>24</sup>

161

地方幹部不顧一切地想要實現不可能完成的指標，結果弄巧成拙，最終帶來巨大損失。一個常見的例子是破壞果樹等寶貴資源，以便擴大糧食種植面積。另一個例子是在不適合小麥或其他穀物生長的田地上種植糧食，導致副食品減產。最令人震驚和傷害最大的，是為應對化肥不足而普遍採取的一種措施。由泥磚和稻草建成的農民住房被拆掉，用來給田地施肥，使某些地方的很多農民長期無家可歸。<sup>25</sup>由於匆忙上馬，沒有請教土木工程師和其他專家，灌溉項目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某個地方的灌溉系統造成內澇，鹽分侵入表土層，使農作物產量大幅減少。匆忙建成的大壩在雨季容易垮塌，引發可怕的洪水。為了種植糧食，山坡被梯化或被砍光樹木，導致水土嚴重流失和河道被淤泥堵塞。<sup>26</sup>

<sup>24</sup> 其他案例參見 Yang (2012, 274–275)。

<sup>25</sup> Dikötter (2010, 166–173).

<sup>26</sup> 同上，頁174–188。很多黨的內部文件描述了事件發生後所帶來的破壞，英文譯稿參看 Zhou (2012, 72–90)。

162

失敗是必然的。如果幹部匯報說，這些在政治上備受讚揚的做法存在錯誤，那麼他們就會受到政治譴責，被批評為對黨和大躍進缺乏信心。各級幹部對問題心知肚明，但不敢開口，而且積極封鎖消息，以免他們弄虛作假的事情曝光。幾年後，他們會解釋說，他們之所以沒有向上級報告饑荒，是因為「擔心被打成右傾分子」。而當幹部向公社報告饑荒時，領導卻明確警告他們，說這是「右傾思想」，他們「看問題的方式過於簡單」。生產大隊的幹部被要求匯報更高的糧食產量，「沒有這麼做的人遭到批鬥和毆打」。<sup>27</sup>地方幹部領着參觀代表團踏上經過精心策劃的行程，以免他們發現當地的問題。如果黨派來的調查員發現了隱瞞饑荒的證據，就會受到地方幹部威脅，有時甚至被禁止離開當地。<sup>28</sup>地方幹部少報死亡人數，殫心竭慮捏造統計數據，這種行為常常得到上級領導的默許，因為他們同樣希望只報喜不報憂。<sup>29</sup>

統計系統被完全政治化。各級黨委必須認可匯報給上級的統計數據。在大躍進的第一年，統計機構被告知，「我們的統計工作是為了服務別人，而不是我們自己。需不需要和需要什麼的問題由別人來決定。同樣，計算方法和標準根據我們所服務的人的要求而定。」<sup>30</sup>如果省級統計人員抱怨他們的黨委匯報虛假數據，他們就會被告知，「大躍進是不可阻擋的潮流，你所能做的，就是服從省委的決定。某一天，中央政府可能會向你要真實數據，你必須確保隨時可以向他們呈遞所有的真實數據。」<sup>31</sup>1959年，由於大躍進造成的問題已經嚴重到無法忽視的地步，國家統計局提交了真實報告。結果，統計局領導因為「政治覺悟低」和試圖「給大躍進吹冷風」，而被迫進行自我批評。統計局被要求「堅決捍衛黨的總路線，在與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發起反攻。」<sup>32</sup>

<sup>27</sup> 這些語錄來自於 Yang (2012, 32) 對當地的訪談。

<sup>28</sup> 同上，頁 52。

<sup>29</sup> 同上，頁 52–56。

<sup>30</sup> Xue Muqiao, 引自 Yang (2012, 257)。

<sup>31</sup> Xue Muqiao, 引自 Yang (2012, 258)。

<sup>32</sup> Yang (2012, 258).

## 官僚壓迫的惡性循環

農民並不總是自願遵守對他們的要求，並不是所有的地方幹部都滿腔熱情地執行上級的命令，贊同明顯錯誤的指示，提交虛假的報告，掩蓋嚴重的問題。隨着時間的推移，要是不對那些不聽話或者試圖說出真相的人進行威逼恐嚇和採取令人震驚的暴力措施，官僚自欺欺人的把戲就無法再持續下去。於是，農村的大躍進染上了濃厚的暴力壓迫色彩，這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越演越烈。彼此欺騙的黨組織不希望聽到壞消息，就算真有壞消息，也會故意曲解它。

163

農村地區的大躍進從一開始就極具破壞性。儘管自我審查和虛假報告的現象鋪天蓋地，但在1958年4月，中央政府確實收到了大規模食物短缺和糧食危機的真實報告。到1958年下半年，饑荒即將來臨的跡象顯露無疑。1959年初，饑荒在全國範圍內蔓延。<sup>33</sup>

雖然問題越來越多，但毛澤東再次強調了一個他從未動搖的觀點：大躍進所代表的總路線是絕對正確的，其成績遠遠超過其缺點。對大躍進的批評是階級鬥爭的體現，是黨和社會主義的敵人發動的進攻。他在1959年2月的一次會議上說：

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所常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認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一大二公的公社是我們的農村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的形式。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sup>34</sup>

<sup>33</sup> Bernstein (2006), Dikötter (2010, 67–72), Zhou (2012, 4–16).

<sup>34</sup> 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2月27日，由Yang (2012, 438–439) 翻譯。

毛澤東指責地方幹部推行政策用力過度，做事太急，能力不足，制定的目標過高。他承認饑荒報告是事實，但堅持認為問題不是那麼嚴重，而是因為基層執行有誤，大躍進的原則沒有錯。<sup>35</sup>

饑荒的主要原因在於，收成數據被嚴重誇大，導致糧食徵購過高。<sup>36</sup>省級幹部謊報稱上年糧食產量大幅增加，所以他們需要上交的糧食也相應增加。1958年真實的糧食產量為2億噸，只比上年增長2.5%。但官方的糧食產量數據被荒唐地誇大到3.75億噸。<sup>37</sup>出於明顯的原因，省級幹部發現不可能完成更高的徵購指標。由於1958年饑荒蔓延，公社陷入混亂，導致作物歉收，1959年的糧食產量下滑15%。省級幹部處於非常困難的局面，毛澤東似乎已經在說大躍進的問題是他們的錯。

省級幹部如何擺脫這種困境？他們可以承認上年的糧食產量數據是假的——這肯定會遭到政治懲罰，或者可以歸咎於下屬。很多人選擇了後者。1959年1月，廣東省報告稱，糧食是有的，但被農戶藏了起來，當地幹部默許了這種行為。他們報告稱，搜查村莊的工作收效很大，找到了被隱藏的糧食。安徽省提交的報告這樣寫道：「農村地區糧食短缺問題不是因為沒有糧食，也不是因為國家徵購的糧食過多，而是因為思想問題，特別是地方幹部的思想問題。」這份報告解釋說，囤積糧食是因為地方幹部擔心公社不讓他們保留足夠的糧食，或者是為了避免明年指標增加太多，又或者是他們懷疑其他幹部扣留糧食，把負擔轉嫁到他們身上。<sup>38</sup>

毛澤東已經被迫承認大躍進存在嚴重問題，但不願承認其總體設計有問題。因此，他欣然接受了上述說法。他認為「隱瞞糧食」的問題「非常嚴重」，要求加大努力找出更多糧食。<sup>39</sup>於是，打擊「瞞產私分」的全

<sup>35</sup> Dikötter (2010, 86–87).

<sup>36</sup> Bernstein (1984).

<sup>37</sup> Li and Yang (2005, 845–846) 比較了最初報告的結果和隨後幾年大躍進之後的數據。

<sup>38</sup> Dikötter (2010, 85).

<sup>39</sup> 同上，頁85–86。文獻翻譯見Zhou (2012, 23–25, at 25)。

國性運動開始了。如果各級幹部堅持說沒有更多糧食，農民已經在挨餓，那麼他們就會被視為陰謀反對大躍進的一分子，這意味着反對毛主席。

這場運動演變成了政治鬥爭。不承認隱瞞糧食的村幹部和普通農民遭到批鬥和威脅，最後常常升級為毆打甚至折磨。多年後，一位上了年紀的農村幹部說：「如果你不打，你就會被打。你打得越狠，說明你的立場就越堅定，對共產黨就越忠誠。如果你不打，就會被當成右傾分子，很快會被別人打。」<sup>40</sup>在某公社，縣委指示從當地最高級別的幹部查起。在傳達這一指示的會議上，幾位公社幹部被捆綁毆打，其中一人當場死亡。<sup>41</sup>堅持說沒有多餘糧食的農村幹部遭到批鬥和毆打。很多人被降級或開除黨內職務，但至少保住了性命，而有些人不堪忍受，自尋短見。<sup>42</sup>

165

這場運動對農民更加殘酷。為了找到被藏起來的糧食，農民的家被翻了個遍，戶主遭到拘留審問，面臨坐牢威脅、毆打甚至折磨。<sup>43</sup>就算沒有發現隱藏的糧食，家具和其他家庭財產也會被洗劫一空，使很多忍饑挨餓的農戶更加窮困潦倒。有時，農民的家被推倒，以此懲罰那些拒

<sup>40</sup> Yang (2012, 49).

<sup>41</sup> 同上，頁335–336。在這個公社，超過1,000名當地領導人被免職，173人被毆打致死。

<sup>42</sup> 關於這一鮮為人知的運動的大量文件參見Yang (2012, 28–37, 224–229, 335–338) 和Zhou (2012, 18–19, 25–36)。

<sup>43</sup> 1961年四川省提交的一份內部報告顯示，當地官員建立私人監獄和勞改營，農民在裏面被使用的酷刑方法，包括「吊人、打人、強迫人跪在燃燒的木炭上、穿刺人口、割手指、縫嘴巴、針扎乳頭、餵糞便、向喉嚨裏填乾豆等等」(Zhou 2012, 21)。1961年河南省提交的一份內部報告列出了更多酷刑：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還有一種被稱為「點天燈」的折磨——剝去人們的衣服，把他們赤着身子掛起來，用油澆遍全身，然後點火(Yang 2012, 30–31)。

絕交出隱藏糧食的人，甚至停止提供口糧，讓他們活活餓死。很多地方建立了「勞動改造大隊」，被懷疑隱藏糧食的人被迫進行高強度勞動，而他們得到的口糧少得可憐，只能忍饑挨餓。在瘋狂搜查糧食的過程中，無論地方幹部多麼兇惡，都找不到什麼糧食。這場運動僅僅使饑荒變得更加嚴重。<sup>44</sup>

1959年7到8月，正當反對瞞產私分的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之時，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會議，討論如何「重新調整」大躍進，緩解毛澤東被迫承認的幾個嚴重問題。很多領導人敏銳地意識到了饑荒的蔓延，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回到家鄉，和親戚們進行了一番交談。軍隊領導人通過大多數來自農村地區的下級軍官和士兵關於家人境況的報告，意識到了饑荒的問題。這些領導人清楚地認識到，大躍進的很多核心政策造成了災難性後果，他們希望說服毛澤東改變路線，避免進一步損失。

不幸的是，他們的希望未能實現。毛澤東反應激烈，因為對大躍進的批評明顯意味着沒有什麼成績可以誇耀，問題不是出在地方幹部執行有誤。<sup>45</sup>他聽說，一些中央委員私下裏直言不諱地講大躍進的壞話，說土法煉鋼爐「無用」，整個政策是「驕傲自大」的產物，質疑毛澤東關於「缺點」只是「一個指頭」和「成績」是「九個指頭」的觀點。他特別感到不安的是，這些人把他的專橫跋扈比作「斯大林晚年」的專制獨裁。<sup>46</sup>

<sup>44</sup> Thaxton (2008, 188–198) 提供了相關事件的鄉村層面視角。

<sup>45</sup> 眾多廬山會議相關的材料參見Dikötter (2010, 90–99)、Lüthi (2008, 126–135)、MacFarquhar (1983, 193–251)、Teiwes and Sun (1999, 202–212)。本段中的具體內容來自 Yang (2012, 350–393)。

<sup>46</sup> 對於「斯大林晚年」的形容，幾乎可以肯定這些官員不是指1937至1938年的大規模清洗和處決，這一時段的中國和蘇聯相比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相反，他們似乎是指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對政治局成員的反覆無常和恃強凌弱的行為，這是在1953年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和其他蘇聯高官對他強烈不滿的一點 (Service 2004, 531–540)。

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詳細講述了大躍進的缺點。收到這封信後，毛澤東決定反擊。他的反應是強烈和報復性的，抹殺了調整大躍進政策以防止災難進一步惡化的任何可能性。<sup>47</sup>他立刻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要求嚴厲批評彭德懷和其他幾位高級領導人，說他們結成「反黨集團」，發起「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毛澤東升級了他關於黨內階級鬥爭的言論，以個人名義指責彭德懷等人是野心家和陰謀家，缺乏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sup>48</sup>其他高級領導人，甚至是那些心裏和彭德懷等人看法相同的人，也跟着站隊並以同樣惡毒的語言攻擊他們。<sup>49</sup>

在8月2日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談到了黨內的根本「路線鬥爭」：

我們的路線究竟對不對？現在有一些同志發生懷疑。……初上廬山，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說我們現在沒有民主，說話不自由，有一種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後來才了解，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路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要言論自由，其實是要破壞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批評總路線的言論自由……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在向着黨，向着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着人民的事業進攻。<sup>50</sup>

隨後，毛澤東又在8月中旬寫了兩篇措辭更加嚴厲、情緒更加激烈的黨內通信。「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局面似

<sup>47</sup> Bernstein (2006) 追溯了毛澤東的思想轉變和在大躍進期間對壞消息反覆無常的反應，以及他在廬山會議上的防禦型反應的原因。

<sup>48</sup> Bernstein (2006), Yang (2012, 384–385).

<sup>49</sup> 這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Yang (2012, 367–383)。

<sup>50</sup> 同上，頁385–386。

的。」<sup>51</sup>毛澤東不允許這一切。「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sup>52</sup>

這是毛澤東在延安學習《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後對斯大林主義思路的充分運用。政策分歧代表階級鬥爭，最高領袖是真相和智慧的唯一源泉。質疑者都是代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利益的叛徒。關於彭德懷的官方決議把問題定性為「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他們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決議要求全黨揭露「這個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的真面目」。所有人被要求頌揚大躍進的正確性，批判所有質疑者：「堅決粉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不但對於保衛黨的總路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對於保衛黨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完全必要的。」<sup>53</sup>

於是，第二場「反右」運動開始了，這次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這場運動導致幾千萬人餓死。共產黨正在修正錯誤以緩解大躍進造成的災難，然而這場政治運動卻將黨的糾錯重心轉移。中國徘徊在歷史性饑荒的邊緣，而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做法最終把中國推下懸崖。反對各地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運動，強化了反對「瞞產私分」的運動，使全國一千多萬人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受到懲罰。<sup>54</sup>

任何合理的觀點都會認為，災難的根源在於官僚機構內部的強制性大規模動員。如果各級幹部沒有熱情響應黨中央不切實際的要求，如果指出這些要求明顯存在的問題，那麼他們就會被懲罰，有時甚至遭到暴力對待。毛澤東錯誤地認為，問題出在「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猛烈逆流」。他把問題歸咎於反黨集團和階級敵人的破壞。<sup>55</sup>

<sup>51</sup> 同上，頁387。

<sup>52</sup> 同上，頁387。

<sup>53</sup> 同上，頁388。

<sup>54</sup> 同上，頁390、392。Thaxton (2008, 143–156) 詳細敘述了在此期間對村幹部們施加的壓力，要求他們強烈擁護執行黨政方針，並對失職者施加懲罰。

<sup>55</sup> Yang (2012, 445).

毛澤東不是把農村的暴行和饑餓歸咎於他所命令推行的反對「瞞產私分」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階級鬥爭」，而是認為「階級異己分子」篡奪了中國農村地區的權力。在貫徹執行錯誤運動的過程中，農村幹部是毛澤東最忠誠、政治上最狂熱的代理人，他們對隨後發生的災難負有責任。1960年底，中央委員會的一份文件寫到，問題「千真萬確的是反革命復辟，是披着共產黨外衣的地主、國民黨對勞動人民的殘酷階級報復。」<sup>56</sup>中央委員會指責「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篡奪黨和行政領導權，以反右傾運動為掩護，他們……採取地主和國民黨的手段，比如任意毆打、逮捕和殺害，實施大規模階級報復……各級領導和幹部變成控制和鎮壓人民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也是冷血殺手。」<sup>57</sup>

總而言之，問題的原因不在於官僚體系強制要求幹部無條件忠誠，動員幹部對臆想的敵人不斷進行階級鬥爭，而在於潛入黨內的階級敵人進行顛覆活動。毛澤東根本不相信，忠誠的地方幹部在必須服從中央錯誤政策的壓力下做出暴行。1960年12月，在河南省委的一次會議上討論信陽事件時，一位官員表達了他開展對敵鬥爭的決心：

如果說我們認識上有錯誤，那就是對明明顯顯的敵我矛盾認識不足，對打着共產黨員招牌的國民黨實行資產階級報復的本質沒看清楚……明明看着群眾死亡，硬是扣着口糧不發，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眾家裏冒煙，不准群眾挖野菜，不准群眾出去逃荒……對待人民不如牛馬，任意打罵，一直打到死，連一點人性都沒有，這不是敵人是什麼？……這些人為了保存他們自己，大批殺了我們的階級兄弟，我們非狠狠地殺他一批不可。<sup>58</sup>

169

在權力濫用特別嚴重的河南省信陽專區，數千名農村幹部被撤職，一萬多人被批鬥，每個縣都被下達了幾百人的犯錯幹部處理指標。<sup>59</sup>由

<sup>56</sup> 同上，頁60–61。

<sup>57</sup> 同上，頁62。

<sup>58</sup>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的講話，1960年12月6日，由Yang (2012, 63) 翻譯。

<sup>59</sup> 同上，頁61。

於犯錯者被當成在土改和肅反運動中倖存下來的地主和富農，這些「壞階級」群體也被挑出來受到迫害。<sup>60</sup>

## 饑荒的規模和原因

直到毛澤東去世幾年後，饑荒才被官方承認。饑荒死亡人數是被嚴格保護的最高機密。據說周恩來收到了一份詳細報告，該報告聲稱死亡人數達到幾千萬人。他立刻指示官員銷毀這份報告的所有副本和原始數據。<sup>61</sup>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中國都沒有公佈人口數據。毛澤東去世後，政府開始發佈人口和農業統計數據，人口統計學家立刻發現了饑荒異常嚴重的確鑿證據。<sup>62</sup>

直到1982年全國人口普查以及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數據的發佈，才可以準確可靠地計算大躍進對人口的影響。對於人口超過六億的中國來說，全國平均值背後的含義令人震驚。從1957到1960年，粗死亡率 (crude death rate) 提高2.5倍，出生時預期壽命從49.5歲降至24.6歲，嬰兒死亡率翻了一倍多。在1958年後的四年時間裏，中國的人口減少了一千多萬(表8.1)。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過早死亡人數」逼近3,000萬人。<sup>63</sup>

<sup>60</sup> 同上，頁61–64。

<sup>61</sup> 同上，頁406–407。

<sup>62</sup> Aird (1982, 278), Coale (1981, 89).

<sup>63</sup> 人口統計學家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中人口年齡結構的分析，得出了對饑荒死亡人數的最終估計。Ashton及其同事們 (1984, 614, 619) 估計死亡人數超過2,950萬，Banister (1987) 估計為2,890萬，Coale (1984) 估計為3,070萬，數據基本一致。Yang (2012, 421–425, 428–430) 根據中國學者的非人口普查數據，採用不同估計方法，對各種估計進行了評估，認為其中3,600萬是可能性最高的數字。其他學者(例如，Dikötter 2010, 324–334) 認為，檔案記錄實際上可以支持高達5,000萬的數目。這類數字不符合對應年齡的人口數據。為了使更大的估計數目可信，全國人口普查將不得不在早期人口普查中低報真實的人口數據，並在之後的人口普查中誇大人口數據——這

現在，雖然饑荒已經被官方承認，但對於饑荒的規模和真正原因，中國政府仍然不願意承認。大饑荒被稱作「三年自然災害」，也就是洪水、乾旱和暴雨。<sup>64</sup>這種解釋與天災破壞和作物產量的地區數據相矛盾。1959年，饑荒達到高峰時，只有9.6%的播種面積受到天災影響，1960年為16.6%，1961年為20.1%。只有9.6%的播種面積連續兩年位於指定的受災區域。1959年天災造成的破壞並不比1956年和1957年更嚴重，那兩年糧食收成還有所增加。<sup>65</sup>在減少的糧食產量中，只有不到13%可歸咎於天災。如果大躍進的政策沒有禁止把糧食送回農村，那麼饑荒就不會發生。<sup>66</sup>

表8.1 大躍進所造成的人口影響

年份	粗出生率 (每千人出生人數)	粗死亡率 (每千人死亡人數)	初生嬰兒 預期壽命 (歲)	嬰兒死亡率 (每千人死亡人數)	人口 (百萬)
1956	39.9	20.1	47.0	143	619.1
1957	43.3	18.1	49.5	132	633.2
1958	37.8	20.7	45.8	146	646.7
1959	28.5	22.1	42.5	160	654.3
1960	26.8	44.6	24.6	284	650.7
1961	22.4	23.0	38.4	183	644.8
1962	41.0	14.0	53.0	89	653.3
1963	49.8	13.8	54.9	87	674.2

來源：Banister (1984, 254)

可能性不大。Coale (1984, 64–74) 解釋了生命表方法。

<sup>64</sup> 官方報道還將饑荒死亡人數降至最低，將死亡人數定為1,700萬，根據一項未公開的「優化」方法計算，該方法將過高的超額死亡率歸因於「自然原因」。Yang Jisheng (2012, 421–425) 批判性地評述了中國作者的估算範圍。

<sup>65</sup> Peng (1987, 651).

<sup>66</sup> Li and Yang (2005, 843). Kung and Lin (2003, 66–67) 在氣候對地區死亡率的影響方面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171 表8.2 大躍進期間的糧食產量與徵購

年份	糧食產量 (百萬噸)	糧食徵購 (百萬噸)	人均自留糧食 (公斤/人)
1956	193	40	284
1957	195	46	273
1958	200	52	268
1959	170	64	193
1960	143	47	182
1961	148	37	209
1962	160	32	229
1963	170	37	231
1964	188	40	256
1965	195	39	261
1966	214	41	282

來源：Li and Yang (2005, 846)

這些年份準確的農業統計數據發人深思。1958年，真實的糧食產量僅增長2.5%（表8.2）。此後收成大幅減少，到1960年幾乎下滑30%，然後再次逐漸增加。大躍進對中國的農業造成巨大破壞，直至1966年糧食產量才恢復到1958年的水平。對糧食產量的強調導致其他食物產品大幅減產。1960年的油料作物產量還不到1957年的一半，比1949年以來的任何年份都要低。1962年的甘蔗和甜菜產量比1957年減少三分之一，肉產量減少一半。<sup>67</sup>

但中央最初使用的卻是大為不同的糧食產量數據。最初報告的1958年糧食產量為3.75億噸，而1980年公佈的真實數據是2億噸。<sup>68</sup>1959年，報告的糧食產量為2.7億噸，但真實數據是1.7億噸。直到1960年饑荒達到歷史性水平，中央才報告了較為真實的1.5億噸收成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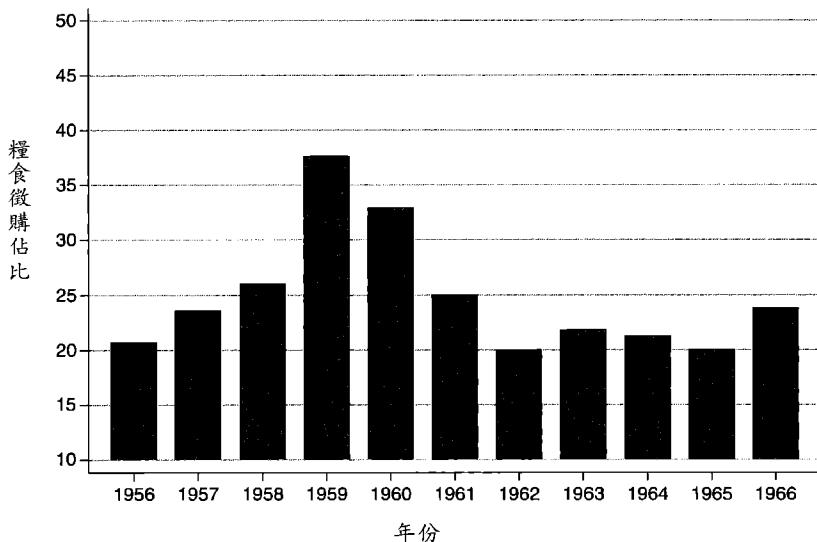
<sup>67</sup> Lardy (1987a, 369–370).

<sup>68</sup> Li and Yang (2005, 845).

據（真實數據為1.43億噸）。<sup>69</sup>與此同時，公社連續兩年被要求上交更多的糧食。1959年，在糧食產量減少3,000萬噸的情況下，國家徵購增加了1,200萬噸。1960年，當饑荒無法再被忽視的時候，國家徵購減少至4,700萬噸，但這仍然太高，與1957年的徵購量持平，而1957年的糧食產量比1960年多出5,200萬噸（表8.2）。正當收成開始減少的時候，糧食徵購佔糧食產量的比例達到歷史最高水平，1959年接近40%，比1956年提高了近一倍（圖8.1）。

172

圖8.1 國家糧食徵購佔收成的百分比（1956–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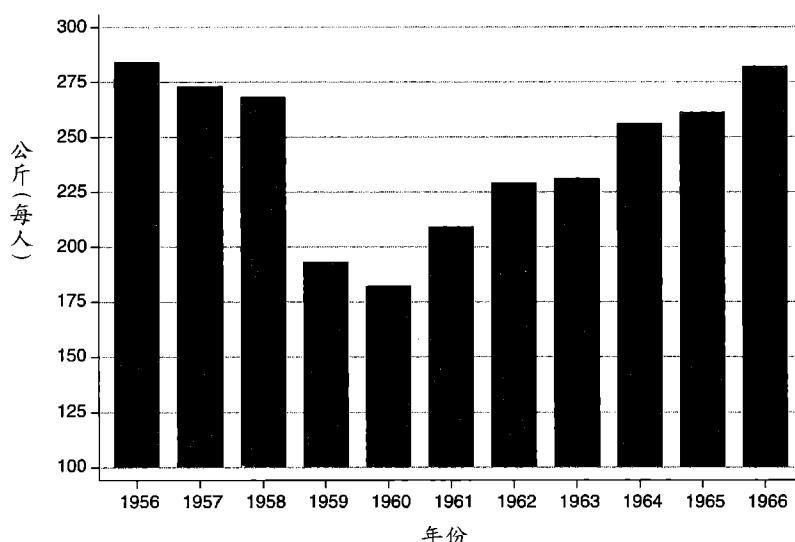
來源：從Li and Yang (2005, 846) 計算得出

留給公社的糧食大幅減少，從1958年的每人284公斤降至1960年的182公斤（表8.2）。大躍進政策帶來了深重且長期的破壞，公社的人均糧食供應直到十年後才恢復至1956年的水平（圖8.2）。這是因為糧食分配長期偏向城市。城市出現了嚴重的糧食供應中斷，而來自城郊公社

<sup>69</sup> Ashton et al. (1984, 626).

173 的饑餓難民使情況更加惡化。乞丐在街上遊蕩，糧店爆發衝突，小偷小摸和持械搶劫變得更加普遍。<sup>70</sup>從1957年到1961年，上海的豬肉供應減少近90%，其他食物供應也很少，導致大範圍的營養不良。北京的1961年死亡率是1957年的兩倍。<sup>71</sup>儘管如此，城市獲得的糧食供應足以避免饑荒。

圖8.2 集體公社自留的糧食（1956–1966）



來源：Li and Yang (2005, 846)

政府努力對城市人口尤其是外界隱瞞這些問題。為了幫助逃荒的難民，國際紅十字會打算提供糧食援助，但遭到中國斷然拒絕。<sup>72</sup>中國繼續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出口糧食，以償還貸款。<sup>73</sup>1959年的

<sup>70</sup> Brown (2011; 2012, 53–75).

<sup>71</sup> MacFarquhar (1997, 3).

<sup>72</sup> Ashton et al. (1984, 630–632). 反共產主義人士發佈的關於饑荒的頻繁報道通常被認為是有偏見的。

<sup>73</sup> Dikötter (2010, 72–83), Lüthi (2008, 109–111, 153–154).

糧食淨出口實際上增加了逾 50%。1960 年，即使是在饑荒嚴重程度無法再被忽視的情況下，糧食出口還在繼續，但數量有所減少。直到 1961 年，中國才成為糧食淨進口國。<sup>74</sup>中國拖延了兩年時間才從國際市場購買糧食，導致糧食淨出口達到近 700 萬噸。按照每天 2,000 卡路里的基礎代謝量，這麼多的糧食可以供應 1,600 萬人近兩年時間。<sup>75</sup>中國領導人為了面子而制定的國際貿易政策使饑荒進一步惡化。

## 工業大躍進

從統計數據來看，大躍進對製造業的破壞不下於對農業的破壞。考慮到對農業的破壞造成了嚴重饑荒，工業受到的關注少得多是可以理解的。工業衰退，產量減少，工人下崗。大躍進對工業體系的破壞雖然沒有導致大量人口死亡，但卻造成了持續多年的工業衰退。

原因很容易理解。正如第五章所述，蘇聯工業體系是「資源約束型」而不是「需求約束型」。在這種資源約束型經濟中，當資源供應——燃料、原料、零件——短缺時，生產就會停止。大躍進的目標是一舉打破阻礙生產的資源限制，擴大整個工業體系。中國想通過勞動力和資本的大規模投入來實現這一點。現有的工人被要求更努力、更快速、更長時間地工作。產能迅速擴大。地方政府建立大量的新工廠，動員農村公社的勞動力進廠工作。產量指標全面提升。在壓力下，各級黨委書記承諾大幅提高鋼鐵、煤炭、化工、石油、機械和機動車輛的生產指標。通過促使所有人更努力、更快速地工作，以及榨取工業體系中的每一分冗餘資源，供應增加帶來的良性循環會消除資源對工業的限制，加快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這種想法在毛澤東看來是很有道理的，對黨的幹部也具有吸引力。通過在工業體系內開展大規模政治運動，借鑒自蘇聯的笨重官僚體系會

<sup>74</sup> MacFarquhar (1997, 23–31).

<sup>75</sup> Ashton et al. (1984, 622).

煥發生機，黨的領導會使人的潛力發揮到以前無法想像的地步。只要黨不懈地動員人民和物質資源，讓他們專心致志地工作，就可以實現看似不可能完成的目標——正如解放戰爭的最後階段。一夜之間，短缺經濟就會成為過眼雲煙。

從短期來看，只有加快現有工作速度，工廠才可能滿足大幅提高產量的要求。要想加快速度，可以改變或放棄旨在確保產品質量、工人安全或固定設備維護的程序，可以強制工人加班，也可以僱用大量的新工人。在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地方官員迅速建立新工廠或擴建已有工廠，以此響應提高產量的號召。他們從附近的公社僱用大量的新工人，這是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分流的一部分原因，最終導致糧食減產。在1958年和1959年，中國各地的縣城和鄉鎮報告稱，工業就業人數大幅增加。增加的人手幾乎全部從事於簡單的勞動密集型工作，以低資本投入來提高產量。

加快現有工作速度的要求，完全無視工程和技術人員為了確保產品質量、工人安全和固定設備維護而建立的程序。這常常使黨委書記和黨內積極分子與白領人員和技術熟練工人之間產生矛盾分歧。黨委書記堅持要求加快熔煉鋼鐵的速度，尋找稀有合金替代品，減少化學質量檢查。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指出，以更快的速度加熱煉鋼爐會浪費稀缺的燃料，改變化學成分或跳過質量檢查會導致產品不符合下游用戶的鋼鐵技術規格。但他們的擔心都被置之不理。在機床或生產線操作中，黨委書記發現，通過減少質量檢查、提高工作速度或延長工作時間，可以加快操作速度。

技術人員、熟練工人和工會幹部知道，這些提議會導致固定設備的損壞、危及工人健康和安全的工業事故，以及不符合質量標準因而浪費稀缺資源的瑕疵產品。但黨委書記壓制了他們的反對意見。在「釋放群眾創造力」的會議上，政治積極分子提出了上述捷徑和革新，在工廠裏（和媒體上）受到表揚。就浪費、質量和安全問題提出反對意見的工程和技術人員，被批評為「資產階級專家」，說他們的反動觀點是基於「迷信」。在反右運動後，少數人「愚蠢地」堅持他們的反對意見，認為黨的大躍進可能適得其反。

這些預測很快變成現實。工廠出現了許多工業事故和設備故障。工人被迫長期輪班，因為疲勞而犯錯；在追求速度的過程中，不顧安全規定，造成死亡事故；<sup>76</sup>超負荷運轉或沒有按時進行檢修和保養的設備發生故障。即便故障沒有導致傷亡，也要停工進行耗時的維修。

儘管遇到了這些挫折，產量仍然在提升，至少是在剛開始的時候。但可以預見的是，在產量提升的同時，質量在急劇下滑。因此，生產者面臨一個選擇，但在當時的背景下，這個選擇並非難事。他們本來可以承認其產品不合格，宣佈它們不能使用，不把它們包括進生產指標中，把它們重做成可用的產品。這意味着生產指標無法完成，用來生產不合格產品所消耗的勞力、材料和燃料都被浪費了。

於是，黨委書記一邊倒地選擇宣佈所有產品合格，並運送到最終用戶手中，壓制管理人員、工人和工程人員的反對意見。這意味着他們把問題轉移到了使用其產品的工廠。整個工業體系的工廠收到的鋼鐵容易碎裂或彎曲，無法用來生產他們的產品；零部件無法用於他們的裝配過程；機床損壞或失靈；貨車總是出故障。儘管可以使用的投入產品數量有所增加，但整個工業體系突然面臨合格投入品的嚴重短缺，無法維持工業生產。

一場旨在克服資源限制的生產運動，反而導致了資源危機。中國各地的工廠收到的是他們無法使用的投入品。他們不得不耗費額外的能源和勞力，把不合格的投入品重做成可用的投入品（如果可能的話），或者試圖把無用的投入品交換到能夠重做（和極度需要可用投入品）的其他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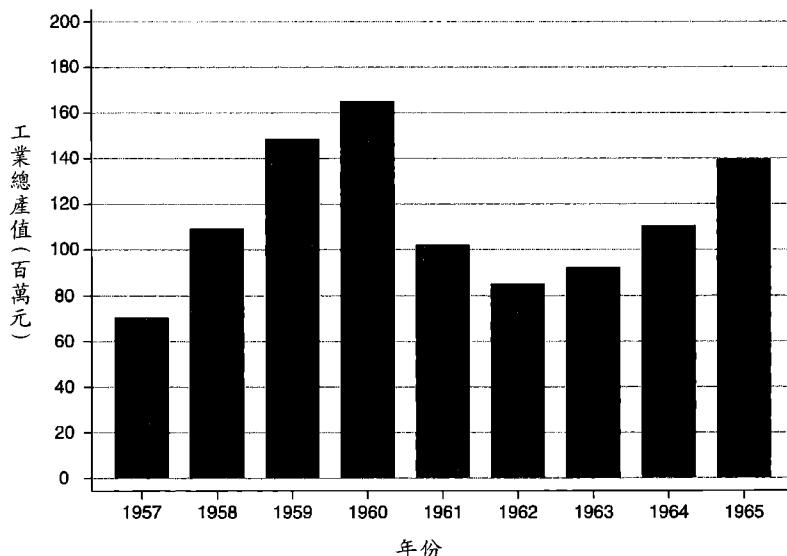
工業衰退正在形成，原因完全不同於市場經濟環境下造成衰退的金融恐慌和需求銳減。中國的蘇聯式工業體系本就受到資源的限制，反而還系統性地大量浪費資源，造成一連串短缺危機。電力、汽油、燃油和煤炭被大量消耗，生產出來的卻是無法使用的產品。<sup>77</sup>

176

<sup>76</sup> Dikötter (2010, 269–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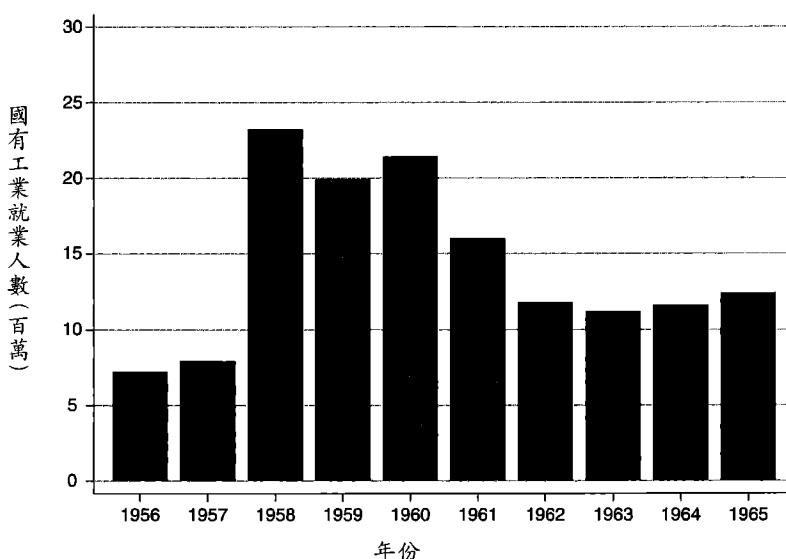
<sup>77</sup> 同上，頁145–154。

177 圖 8.3 工業總產值 (1957–1965) (元)



來源：國家統計局 (1983, 214)

圖 8.4 國有工業就業人數 (1956–1965)



來源：國家統計局 (1983, 126)

到1960年，工業體系中所有的閒散資源都被耗盡。1961年，工業產值暴跌。到1962年，工業淨產值下降近50%（圖8.3）。工業體系受到的破壞非常嚴重，產量直到1964年才恢復。在1958年和1959年生產高潮期間新增的工人紛紛下崗，1958年之前就從事工業生產的部分工人也下崗了。<sup>78</sup>非農就業人數從1960年的近6,000萬減少至1962年的4,200萬，國有工業就業人數從1960年的2,130萬減少至1963年的1,120萬（圖8.4）。<sup>79</sup>其中很多工人都是在大躍進早期從附近的公社遷移而來。現在，他們被迫大規模返回公社。中國的城市人口從1957年底的9,950萬暴漲至1960年的1.307億。到1962年，這一數字減少至1.167億。<sup>80</sup>中國工業企業數量在大躍進早期翻了一倍多，但現在急劇減少，因為在農村地區建立的很多新工廠紛紛關閉。到1965年，工業企業數量比1957年還少。<sup>81</sup>

## 中央計劃導致的衰退

蘇聯工業體系的設計旨在排除市場資本主義典型的商業周期和金融恐慌所導致的不穩定性，確保持續穩定增長。毛澤東希望，他的大躍進是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創新貢獻。但結果適得其反：旨在避免衰退的工業體系反而出現了大規模衰退。1960至1962年的饑荒不是創新，而是不幸地重現了1932至1934年蘇聯的災難。中國在之前的集體化運動中，幸運地避免了這種災難。<sup>82</sup>

中國經濟在1960年代初的衰退和美國的經濟大蕭條一樣嚴重。1929至1933年，美國人均收入下滑32%。1959至1962年，中國人均收

<sup>78</sup> MacFarquhar (1997, 33–36).

<sup>79</sup> 國家統計局 (1983, 126)。

<sup>80</sup> 同上，頁103；Brown (2012, 77–107).

<sup>81</sup> 國家統計局 (1983, 213)。

<sup>82</sup> 對蘇聯饑荒的估計大致為570萬到850萬(Davies和Wheatcroft 2004, 414–415)。依照人口的百分比來看，這兩次饑荒的嚴重程度大致相當。

入下滑 35%。但中美經濟衰退的原因有所不同。美國經濟大蕭條是市場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造成的，直到 1940 年才完全恢復。中國的經濟衰退完全是錯誤的政府政策所致，在放棄這些政策後，經濟恢復得比美國更快。到 1964 年，中國恢復到大躍進前的產量水平，只用了兩年就擺脫低谷。<sup>83</sup>

中國的經濟危機有政治和組織因素。之所以說有政治因素，是因為毛澤東作出極其錯誤的判斷，固執地打擊持反對意見的其他領導人，也是因為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對批評作出過激反應，為了壓制批評而發起了猛烈的反右運動。那場運動阻止了對大躍進政策的及時糾正，而政策糾正本來可以挽救數千萬人的生命。之所以說有組織因素，是因為上級向下級施壓，導致省級、區級和基層幹部不切實際地承諾大幅提高工農業產量，也是因為這些幹部在面對如實匯報問題和虛報成績的選擇時，選擇了後者。毛澤東的干預導致中國的經濟體系和以全民動員為基礎的政治組織遭遇重大挫折。1948 至 1949 年，毛澤東在東北失敗的邊緣獲得勝利，其方法是對軍隊和黨組織提出遠超普通限度的要求。十年後，他又採用同樣的方法，但這次卻是從勝利的邊緣遭遇失敗。毛澤東作為國家領袖和思想舵手的威信遭到嚴重削弱。大躍進災難產生的政治後果在幾年後才顯現出來，當它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出現時，對中國造成了沉重打擊。

<sup>83</sup> Lardy (1987a, 395).

## 邁向文化大革命

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可直接歸因於毛澤東的專橫和錯誤領導，必然產生嚴重的政治後果。出人意料的是，這沒有導致他被趕下台，也沒有嚴重削弱他的政治地位，但在經濟發展速度的問題上，毛澤東被迫放棄了他不切實際的看法。其他領導人，甚至是那些最初支持大躍進、默許毛澤東打擊彭德懷及其「反黨集團」的領導人抓住此次機會，糾正這一時期的政治錯誤。他們暗中試圖引導經濟政策走向，擺脫毛澤東以階級鬥爭來加快工業發展的做法，採取有力措施修復嚴重受損的經濟。

毛澤東最初同意取消大躍進政策。在農業方面，這意味着把龐大的公社分成更易於管理的單位，關閉公社食堂，結束軍隊式的勞動力動員，恢復生產隊和多個地方的個體農業，提供更加明確的生產激勵和獎勵。在工業方面，這意味着把權力交還給企業管理者和技術專家，尊重他們的意見，結束黨支部組織的急功近利的生產活動，以加薪和獎金的形式激勵工人。在全中國，這意味着不再堅持認為經濟政策反映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在現代社會主義陣營中盛行的、關於如何彌補蘇聯式經濟缺陷的想法受到更廣泛的傾聽，知識分子和科學家有更大的自由去思考和表達被意識形態擁護者壓制的觀點，大學招生不再強調階級成分和政治忠誠。

毛澤東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這些變化。他將之視為暫時的讓步，以糾正大躍進無意中造成的問題。即使是在最可怕的經濟衰退和饑荒期

間，把大躍進如實描述成災難的坦白言論仍然令毛澤東感到憤怒。經濟危機最嚴重的階段一過，他就再次強調階級鬥爭。雖然毛澤東確實批評自己過於樂觀，但他從未承認大躍進背後的核心想法是錯的。儘管所有證據都表明事實正好相反，他繼續聲稱，大躍進的成績遠遠超過其缺點。<sup>1</sup>

更令毛澤東不安的是，以頑固的劉少奇為首的一些領導人，公然挑戰他關於大躍進有很多成績值得表揚的說法。同樣令他不安的是，有人呼籲為1959年被錯誤地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和1957至1958年間被打為「反冒進分子」的人們平反。這一切暗指毛澤東犯了根本的「路線錯誤」。而且，對知識分子生活的有限解凍導致了明顯反對毛澤東看法的觀點出現。這些觀點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不久，毛澤東指示忠誠的下級幹部反擊這些趨勢，再次強調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的中心地位。

## 從毛的大躍進中拯救中國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終於發佈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緊急指示信」，要求恢復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公社三級所有制，停止強制佔用生產隊和社員的資源，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家庭副業，恢復工分制，增加社員收入，恢復農村集市，認真實行勞逸結合。<sup>2</sup>幾週後，毛澤東在黨內會議上作了有限的自我批評，承認向公社所有制轉變的速度過快，推動的大型公共工程項目太多。他承認，改變所有制和農業組織形式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完成。<sup>3</sup>這些舉動意味着終於允許進行姍姍來遲的糾正，停止大躍進運動。

到了這個時候，大躍進導致大規模饑荒的事實已經顯而易見，毛澤

<sup>1</sup> MacFarquhar (1997, 13–19).

<sup>2</sup> 同上，頁12–13；有關「農業十二條」節選的英文版，可參見Yang (2012, 437)。這些措施在1961年的「農業六十條」中得到擴展並正式化(MacFarquhar 1997, 45–48, 63–65)。

<sup>3</sup> Yang (2012, 437–43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96, 364–367)。

東不再堅持認為問題是因為「瞞產私分」。他向農村地區派出了由其政治秘書和其他高級幹部領導的調查隊。在饑荒之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親自前往農村地區進行調查。<sup>4</sup>調查結果令他們震驚：直到政策被明確糾正和他們親自深入農村，他們才真正了解到大躍進期間地方幹部使農民遭受的苦難有多深。<sup>5</sup>

## 責任歸屬

饑荒被中共高層承認後，就很難再繼續宣稱大躍進的成績遠遠超過其缺點，以及把問題歸咎於階級異己分子的陰謀。1961年1月，黨決定對個體農業、活躍農村市場、注重工業技術能力和物質獎勵、加強科學研究和文藝創作的自由做出讓步。<sup>6</sup>但對於問題的原因，黨內看法不一。1962年1月，中央委員會召開規模空前的工作會議，旨在總結經驗，在經濟危機問題上「統一思想」。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黨委幹部，史稱「七千人大會」。<sup>7</sup>

會議先是以小組形式討論劉少奇和鄧小平起草的一份報告。該報告大力肯定了發動大躍進運動的總路線的正確性，同時指出了「黨中央」犯下的一系列錯誤。<sup>8</sup>這導致幹部們紛紛懷疑問題的真正原因是政策本身有誤，而不是地方執行不力。這激怒了大躍進核心政策的堅定捍衛者，促使毛澤東指示劉少奇讓他的起草委員會修改報告。在哪些高層領導人應該承擔責任的問題上，起草委員會產生了分歧。有些委員強烈認為，黨的整個領導層都負有責任，包括毛澤東本人。這導致其他委員竭力為毛澤東辯護，說他的領導是必不可少、沒有錯誤的，他的看法是絕對正確的。<sup>9</sup>

183

<sup>4</sup> 政治秘書包括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 (Yang 2012, 61, 436)。

<sup>5</sup> MacFarquhar (1997, 39–43, 48–63).

<sup>6</sup> 同上，頁61–120。

<sup>7</sup> 同上，頁137–145。

<sup>8</sup> 同上，頁145–152。

<sup>9</sup> 同上，頁152–158。

劉少奇向大會作報告時，先是小心謹慎地稱讚了毛澤東，但也說了幾件公然反對毛澤東看法的事情。他說，從1959到1961年，農業產量大幅減少，工業產量下滑40%。他認為，大躍進其實是大後退。他指出：「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違背了毛澤東一再強調的「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是一個指頭」。劉少奇還直言不諱地談到責任歸屬：「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傾箱倒篋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劉少奇把大躍進背後的核心政策稱為一次「試驗」，說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sup>10</sup>

劉少奇的評價比毛澤東的評價負面得多。他關於承認錯誤的講話，不管是不是有意挑戰毛澤東，導致大會延長了幾天，而很多代表覺得必須捍衛大躍進的正確性，向毛澤東宣誓效忠，他們把大躍進的問題歸咎於「異常嚴重、長期持續」的自然災害。可能最響亮、最熱情的支持來自於軍委領導、政治局常委林彪。他在這次會議上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就像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打擊彭德懷一樣。<sup>11</sup>

會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武漢。劉少奇召開一系列會議，討論拯救經濟的措施。這些會議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比七千人大會作出的判斷要可怕得多。劉少奇說，黨還沒有充分面對現實。他認為，中國正面臨深重的危機，需要的不是常規調整，而是「緊急措施」。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前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了這一駭人的判斷。他同意採取緊急措施，但認為這份報告把形勢看得過於黑暗。<sup>12</sup>

儘管如此，劉少奇穩步推進恢復措施。1962年5月，他制定了經濟調整計劃，說中國的經濟基礎不夠穩固，這可能導致政治動盪。在他的指示下，一系列旨在鞏固經濟基礎的措施出籠。城市人口大幅下降，到

<sup>10</sup> Yang (2012, 502).

<sup>11</sup> Lieberthal (1987, 325–331), MacFarquhar (1997, 158–168), Yang (2012, 502–503).

<sup>12</sup> Yang (2012, 505).

1962年底，有1,000萬人回到農村。基建工程減少，個體農業試點擴大。受過批評和處分的「右傾機會主義」被重新甄別，可能翻案平反。<sup>13</sup>

毛澤東無疑感覺到黨的領導方向正在發生偏轉，和他的想法背道而馳。尤其令他不安的是，個體農業受到地方幹部和農民的好評，實施範圍超出了他的預料。他開始強烈反對個體農業，嚴厲批評那些推廣這種做法的省級幹部。<sup>14</sup>1962年7月，返回北京後不久，毛澤東把劉少奇叫到他的宿舍，當面批評他把形勢看得過於黑暗，匆忙取消大躍進的很多政策。劉少奇直言不諱地回答：「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多年來，幾乎沒有哪位高層領導人敢對毛澤東這樣講話。毛澤東回擊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sup>15</sup>

毛澤東肯定覺得，劉少奇頑固強調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性，糾正大躍進的錯誤，這說明劉少奇和其他高級領導人不再致力於毛澤東最珍視的目標。「我死了以後怎麼辦」這句話充分體現了他的這種想法。他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赫魯曉夫是如何在1956年全盤否定斯大林的。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的講話表明，他已經意識到某些高級領導人說他的行為像「斯大林晚年」。從事後來看，毛澤東的擔心不無道理。即使他不必擔心失去對黨的領導，他也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在他死後，他的核心理念會被否定。

185

## 暫時的解凍

大躍進是向知識分子發動的總攻，是對知識分子地位的貶低。從反右運動開始，大躍進從始至終都反對資產階級科學、社會科學和傳統的

<sup>13</sup> 同上，頁508。

<sup>14</sup> MacFarquhar (1997, 209–233).

<sup>15</sup> 這段對話是在劉少奇妻兒撰寫的劉少奇傳記中提到的，由 Yang (2012, 506–507) 翻譯。亦可參見 Dikötter (2010, 337)。「三面紅旗」是代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口號。它體現了毛澤東對推動經濟發展速度的強調 (Yang 2012, 87)。

人文研究領域。階級鬥爭也必須在學術界有所反映。外國的資產階級觀點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修正主義」觀點遭到批評和壓制，傳統的人文科學也是如此。不管是哪種學術或者藝術，只要沒有體現「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沒有積極支持黨的總路線，就會被批評和壓制。老一輩知識分子被送去搞體力勞動，失去了他們在大學和學術機構裏的領導職位，被熱烈擁護黨的年輕一輩取而代之。工程師被要求向農民和工人學習，數學等學科和科學理論被忽視，只注重教授實踐技能。<sup>16</sup>

黨在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時，也取消了這些適得其反的政策，開始把學者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專家作為經濟恢復戰略的一部分。這帶來了短暫的科學文化解凍，在某些方面類似於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但這次，是劉少奇發起解凍，目的不是促進對黨的批評，而是讓中國的知識精英重新參與到經濟建設的緊迫任務中去。1961年年中，黨宣佈知識分子不必總是向黨交心，可以通過為中國發展作貢獻的方式來表明他們的愛國精神。<sup>17</sup>隨後，很多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得以平反昭雪。許多人被允許返回之前的工作崗位。<sup>18</sup>黨表現出了尊重知識分子的新態度，他們的學識和技能不再被貶低為植根於資產階級思想的「迷信」。<sup>19</sup>

186 新政策允許更自由地使用來自於資產階級的科學理論，甚至是社會科學理論。經濟學家開始就經濟改革發表意見，類似於在東歐和蘇聯被廣泛討論的看法。這些看法植根於對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批判，在斯大林時代晚期開始出現，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得到進一步發展。<sup>20</sup>不久後，和蘇聯集團一樣，中國的主要經濟刊物也發表文章，探討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利潤和效率、價格和市場機制的角色、數學模型應用於經濟

<sup>16</sup> Goldman (1987, 432–444).

<sup>17</sup> 同上，頁436；MacFarquhar (1997, 244–248).

<sup>18</sup> MacFarquhar (1997, 234–235).

<sup>19</sup> Goldman (1969, 59–60).

<sup>20</sup> Goldman (1987, 437–438).

規劃的前景和資本利息的效用。<sup>21</sup>所有這些想法先前被指責為資本主義經濟學原理的運用，體現了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孫治方是引領這些討論的人之一，他在1956年首先提出這些想法，1961至1963年期間再次提出。<sup>22</sup>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短暫的文化復興。被禁書籍再次出版；除了正統的歌頌無產階級英雄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外，其他的文學形式受到公開鼓勵；藝術本身——與階級和政治內容無關——的內在價值得到更廣泛的推崇。官方報刊批評文化官僚如暴君一般，對文學和藝術一無所知，只想維護他們的權力和特權。<sup>23</sup>在這一時期，中宣部副主任召開了一次大型文學會議，批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教條，鼓勵作者譴責群眾運動和急功近利的項目，在文學作品中把大躍進描繪成一場不幸的悲劇，而不是一個正在形成的烏托邦，如實講述農民遭受的苦難。<sup>24</sup>

儘管這時允許討論先前被禁止的想法，但知識分子，尤其是在大學裏，比1957年的時候顯得更加遲疑。和百花齊放時期不同，這時沒有民間雜誌或團體。最富有批判性的表述實際上來自於黨內級別較高、受過良好教育的官員，主要是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幹部。和百花齊放時期不同，這些官員的批評不是針對黨，而是針對毛澤東近期推行的政策和那些政策所體現的政治思維。

這項活動的一個中心是由彭真擔任第一書記的北京市委。在七千人大會的分組討論會上，只有少數幾個人敢於說毛澤東本人應該為大躍進造成的災難承擔部分責任，彭真是其中之一。<sup>25</sup>北京的報紙和雜誌發表了一系列雜文和小說作品，從表面上看似乎是溫和的社會和歷史評論，但也可以解讀為對毛澤東領導方式及其近期政策的婉轉批評，但當時並沒有很多人認識到這一點。鄧拓的雜文就是例子。由於毛澤東不滿意

<sup>21</sup> Goldman (1969, 62–63).

<sup>22</sup> Fung (1982, 82–110).

<sup>23</sup> Goldman (1969, 61–63).

<sup>24</sup> 同上，頁69–73。

<sup>25</sup> MacFarquhar (1997, 155–157).

《人民日報》沒有對他的百花齊放政策提供及時和足夠的支持，鄧拓被解除《人民日報》總編職務，轉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思想文化戰線工作。<sup>26</sup>他在《北京晚報》開設「燕山夜話」專欄，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期間共發稿152篇，其中很多雜文可以解讀為間接批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官員的專制領導、無理行為和傲慢自大，對科學的貶低，大躍進背後的無知臆想，以及對如實匯報壞消息的誠實官員的處罰。<sup>27</sup>大概在同一時期，其中很多主題都在《前線》雜誌的「三家村札記」專欄中得到詳細闡述。「三家村札記」涵蓋一系列話題，主要作者是鄧拓、吳晗和廖沫沙，他們用同一個筆名發表文章。廖沫沙做過新聞記者和歷史小說家，在為該專欄撰稿時是北京市委高級官員，負責宣傳和教育工作。<sup>28</sup>

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學家，他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明朝官員海瑞的劇本。剛正不阿的海瑞批評常年不上朝、不了解實際情況的皇帝，對他說如果不把田還給農民，緩解農民的困境，那麼整個王朝就完了。1959年6月，廬山會議前不久，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海瑞罵皇帝〉的文章，把1566年海瑞給皇帝的一封奏疏翻譯成白話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你前些年倒還做些好事，但……內外臣工誰都知道。

188 過於苛斷，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為是，拒絕批評，你的錯誤太多了。」<sup>29</sup>大躍進結束後，吳晗在毛澤東一位秘書的勸說下，寫了這些文章和劇本。那位秘書曾在1959年聽到毛澤東抱怨說，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講真話。毛澤東積極回應，稱讚了吳晗的作品，多次親切接見了這位歷史學家，還送給他一本親筆題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sup>30</sup>

<sup>26</sup> Cheek (1997, 176–187).

<sup>27</sup> Goldman (1969, 79–83; 1987, 442–447), MacFarquhar (1997, 250–252).

<sup>28</sup> MacFarquhar (1997, 254–256).

<sup>29</sup> Goldman (1969, 74).

<sup>30</sup> Goldman (1981, 32–36), MacFarquhar (1997, 252–253).

## 重提激進看法

這一寬鬆時期是短暫的。毛澤東很快重提其看法，恢復他對政治議程的掌控。1962年8月的一次會議上，他嚴厲批評了對大躍進的悲觀評價、對個體農業的熱衷和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翻案風」。<sup>31</sup>毛澤東警告稱，個體農業勢必引起兩極分化。他問道：「究竟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他把單幹風歸咎於黨內「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他們是馬克思主義化程度不好的人：「黨內有些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足夠的精神準備。」毛澤東認為，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判斷是正確的。<sup>32</sup>

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重申了其政治信仰的核心。這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源泉。<sup>33</sup>

在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產者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sup>34</sup>

##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89

毛澤東重新強調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無處不在，這很快導致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在1962年底展開試點，一開始是為了打

<sup>31</sup> Lieberthal (1987, 331–335), MacFarquhar (1997, 274–281).

<sup>32</sup> Yang (2012, 510–511).

<sup>33</sup> MacFarquhar (1997, 283–286).

<sup>34</sup> Yang (2012, 512).

擊農村地區的腐敗和濫權。毛澤東認為，大躍進的問題是掌握基層領導權的階級敵人所為。他認定，社會主義的命運在於中國的農村。這場新的運動是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探索。<sup>35</sup>這場運動花了一年時間成形。基本做法是派遣工作組下鄉調查地方的權力濫用。但有些基本問題需要解決。範圍應該多大？應該派遣多少個工作組？應該多麼嚴厲地對待打擊對象？多少幹部應該被撤職？領導工作組的應該是可能替直接下屬掩蓋錯誤行為的縣委，還是應該由區委或省委負責，完全不讓地方幹部插手？在一年多的時間裏，這場運動時斷時續，沒有一個明確的焦點。<sup>36</sup>

雖然毛澤東和劉少奇先前在大躍進的問題上產生分歧，但劉少奇也完全贊同農村問題是階級鬥爭的體現。他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階級敵人已經控制公社並滲透進黨支部的前提假設。1964年，劉少奇開始主持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融入自己的想法，把範圍擴大到城市機構。他指示組建更大規模的工作組，由更高級別的幹部組成，由更高層級的黨組織領導。他採取更加激進的立場，把問題看得更加嚴重，非常嚴厲地對待參與腐敗和濫權的地方幹部。劉少奇的激進立場和積極開展這場階級鬥爭的做法，最初得到了毛澤東的衷心支持，因為這完全貫徹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的看法。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龐大的工作組被派往全國各地。他們發起大規模調查，處罰了很多地方幹部。這場運動以群眾大會和批鬥會的形式展開，有時還會出現毆打和自殺的情況。<sup>37</sup>

這是1949年以來對全國黨組織的最大打擊。農村地區的基層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隨時都有可能崩潰，激進的工作組甚至要求接管當地領導權。<sup>38</sup>城市機構同樣遭到嚴重破壞，企業和大學裏的機關黨委成為調查對象。劉少奇展現出對全國黨組織行使其權力的決心，指責那些拖後腿的省委書記。<sup>39</sup>

<sup>35</sup> Guo and Lin (2005, 9–29).

<sup>36</sup> 同上，頁30–99；MacFarquhar (1997, 334–348).

<sup>37</sup> Brown (2012, 111–136), Chan, Madsen, and Unger (1984, 37–73), Guo and Lin (2005, 99–156), MacFarquhar (1997, 403–407).

<sup>38</sup> Guo and Lin (2005, 156–187, 204–252).

<sup>39</sup> MacFarquhar (1997, 410–415).

人們也許以為劉少奇的立場會取悅毛澤東，但到1964年底，毛澤東對劉少奇開展這場運動的方式表示強烈反對，尤其是劉少奇竭力維護自己作為激進政治路線倡導者的權威。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政治局同僚趕下台的消息，和隨後北京認為蘇聯新領導人實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的看法，可能觸發了毛澤東的這種擔憂。<sup>40</sup>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劉少奇不僅繼承了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的癡迷，而且更加激進。這使得毛澤東擔心出現「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主義」。更加令他不安的是，新的蘇聯領導層指責赫魯曉夫的經濟政策「輕率愚蠢」，批評他的領導風格蠻橫粗暴，對其他同志盛氣凌人、缺乏尊重。<sup>41</sup>毛澤東在這兩方面的表現顯然更加惡劣。劉少奇如此激烈地開展這場毛澤東主義運動，似乎是想「謀朝篡位」。

1964年底，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目標和方法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產生分歧。在12月舉行的會議上，他公開批評劉少奇開展這場運動的方式。<sup>42</sup>他指責說打擊的範圍過寬，打擊的幹部級別太低。毛澤東堅持認為，這場運動應該專注於黨的幹部，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不是打擊腐敗。在後來的會議上，當毛澤東繼續展開批評時，劉少奇作出了反擊。這對中共高級領導人來說是非常罕見的態度。劉少奇在會上公開質問毛澤東，說他不明白什麼是「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請毛澤東解釋一下。第二天，令所有人吃驚的是，毛澤東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發表了長篇大論的講話，最後不點名地指責某些人試圖阻止他出席會議，表達他自己的看法。<sup>43</sup>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否定了已經通過的會議紀要，發佈了新的會議紀要。新的會議紀要強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打擊區、省和中央黨機關裏

<sup>40</sup> Lüthi (2008, 285–301).

<sup>41</sup> Brown (2009, 264–265), MacFarquhar (1997, 416–417), Taubman (2003, 3–17, 614–619).

<sup>42</sup> Guo and Lin (2005, 253–274).

<sup>43</sup> MacFarquhar (1997, 419–425), Yang (2012, 516–517).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sup>44</sup>依靠這份會議紀要，毛澤東從劉少奇手中奪回了階級鬥爭話語權。

通過徹底整肅基層黨組織，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造成了巨大分裂，當文化大革命發動時，這些分裂便開始顯現。這種影響在城市地區最為明顯。1964年秋，這場運動擴大到城市，1,800家大型國有企業以及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成為針對目標，重點不在於打擊腐敗和濫權，而在於打擊向修正主義的「和平演變」。<sup>45</sup>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市企業內部造成分裂，南京大型國有企業揚子江機械廠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sup>46</sup>這家大型生產廠處於北京第四機械工業部和南京市委的雙重領導之下，第四機械工業部負責業務運營，南京市委負責黨務。這家企業由國民政府成立於1945年，很多工人和職員都來自於那個時期。這些「舊社會人員」的身份不同於後來進廠的年輕工人、技術人員和人民解放軍退伍士兵。

1964年9月，第四機械工業部派出由六百多名幹部組成的工作組進廠調查，組長是第四機械工業部黨委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有軍方背景。他作為第四機械工業部的代表，認定這家工廠的黨委領導班子，在南京市委領導下已經變成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於是，工作組對這個黨組織進行了深入清洗。黨委書記被撤職，近半數的中高層幹部被當成其小集團的成員。幾乎所有幹部都遭到批鬥，還有很多工人和技術人員被視作他們的忠誠追隨者。這場運動的開展可以說是對南京市委的含蓄指責。

1965年1月，在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的做法後，第四機械工業部的工作組被命令進行自我批評，減輕處罰力度，縮小打擊範圍。先前被清洗的很多工廠領導得以復職。工作組在1965年7月撤離，幾個月後，第四機械工業部派遣一位退伍軍官作為這家工廠的新任黨委書記。廠長以及其他一些高級管理人員和黨支部書記在清洗中倖免於難，保留了他們

<sup>44</sup> Guo and Lin (2005, 274–296), MacFarquhar (1997, 425–428).

<sup>45</sup> MacFarquhar (1997, 409–410).

<sup>46</sup> Dong and Walder (2011a, 18–19).

的職位。這是第四機械工業部和南京市委之間的一次妥協。雖然清洗中途停止，但工作組仍然大權在握，並任命了新的領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導致這家大型國有企業內部發生嚴重矛盾，最終這些矛盾未能得到解決，從而造成巨大分裂，在1966年秋演變成公開的衝突。

第二個例子是一所頂尖大學，它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很快產生了巨大的全國性影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北大造成的分裂，為1966年6月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1964年7月，康生命令抽調十名幹部，以中宣部副部長為首，組成一個小型工作組，對北大黨委領導班子進行調查。工作組約談了很多憤憤不平的幹部和教師，其中說話最不客氣的是哲學系政治指導員和資深黨員，他們捲入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和該校黨委領導的一系列衝突。<sup>47</sup>這些教師中包括聶元梓，她是黨委成員，幾個月前剛成為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工作組在8月底提交了調查報告。報告認為，北京大學裏有很多政治上不純潔的分子和外國的間諜，而該校黨委對此無所作為。康生接受了這份報告關於「壞分子」已經滲透該校黨組織的結論。

1964年10月，一個龐大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開始了全面的調查，同樣是由那位中宣部副部長帶隊，組員包括來自全國各地的二百多名宣傳、文化和教育單位幹部。11月底，工作組得出結論，認為北大黨組織確實走了資本主義道路。1965年1月，他們開始對所謂的階級敵人舉行批鬥大會，很多黨支部書記和常委被指責從事反黨活動，學校黨委領導，特別是黨委書記陸平的罪名是縱容公開的顛覆活動。

193

對於這種做法，工作組的很多成員，以及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官員，都覺得太過火了。1965年1月，在北京市委的一次會議上，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和黨委副書記彭佩雲作了自我批評，但也對工作組的做法提出了抗議。一場激烈的爭論接踵而至，但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站在陸平一邊。鄧小平也是如此，他批評康生煽風點火，認為北大黨委領導班子無過錯。1965年3月，鄧小平指示中宣部對北大和工作組

<sup>47</sup> Walder (2006, 1025–1027). 另可參看Guo and Lin (2005, 187–203)。

開展整風運動，糾正之前導致運動出現裂痕的問題。

形勢逆轉，激進的工作組成員和他們在北大的支持者陷入不利局面。在1965年3至7月舉行的三次會議上，工作組被批評犯了「左」的錯誤。支持工作組亂扣帽子的北大黨委成員被迫作了自我批評，其中最有名氣的是哲學系黨支部書記聶元梓，以及支持她的很多哲學系教師。現在，那些站出來指責北大黨委書記陸平的人不得不在他手下工作。這起事件造成的裂痕將在一年後再度顯現。<sup>48</sup>

## 中蘇決裂

自從1956年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以來，中國和蘇聯的關係一直非常緊張，在大躍進期間進一步惡化，因為蘇聯公開質疑大躍進。毛澤東不滿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尤其是他們對世界局勢的判斷和對緩和超級大國緊張關係的渴望。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係開始惡化，最終在1963年決裂。兩國之間最後的交流表明，當時這兩個主要的共產主義政權在思想上存在很大差異，導致中方清楚地表達出一個觀點，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報復的心態來實現這一觀點。

1963年7月，中國的這一觀點出現在一份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長篇聲明中。從本質上來說，中國立場的核心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去斯大林化。<sup>49</sup>中國認為，必須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發動侵略。只有通過武裝鬥爭，而不是姑息妥協和對全面裁軍的天真呼籲，才能實現世界和平。核武器沒有改變鬥爭和革命的必要性，蘇聯不能以核戰爭的威脅為藉口，放棄對第三世界革命鬥爭的支持。社會主義無法僅僅通過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和平競賽而取得勝利。在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不可避免地還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放鬆對內部階級敵人和間諜的警惕，認為舊社會階級不再存在，這是資產階級觀

<sup>48</sup> 這是全國性的普遍模式——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後期，分裂開始，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發展成基層的衝突(Guo and Lin 2005, 296–349)。

<sup>49</sup> Lüthi (2008, 236–245).

點。對「個人崇拜」的攻擊只不過是蘇聯強迫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更換領導人的藉口。<sup>50</sup>

作為回應，蘇聯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他們驚訝地表示，居然有共產黨會支持個人崇拜，這早就被視為小資產階級觀念。顯然，言外之意是中國維護錯誤的毛澤東個人崇拜，這體現了斯大林主義最糟糕的特徵。他們還堅持認為，核武器確實導致與資本主義的鬥爭性質發生「激進、本質」的變化，因為核戰爭既會消滅一小撮資本家，也會消滅千千萬萬的無產階級。蘇聯指責中國的立場缺乏階級內容，完全無視會在核戰爭中犧牲的億萬勞動人民的生命。隨後，蘇聯和美國在7月20日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這導致中蘇最終分道揚鑣。<sup>51</sup>

關係破裂後，中國準備針對蘇聯發動大規模宣傳攻勢。這項任務由康生領導，他指揮一百多名寫手，分成八個工作小組，入駐釣魚台國賓館。他們相繼撰寫了一系列關於蘇聯政策的評論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1964年7月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九評〉。<sup>52</sup>這篇文章中所表達的內容成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據。

195

這篇文章描繪了一個無產階級被資產階級反復攻擊的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提供物質刺激，允許高薪，擴大收入差距，在反對個人迷信的幌子下，醜化無產階級專政，用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取代社會主義的管理方法。「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他們清洗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控制了黨和政府。結果，「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面臨着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赫魯曉夫實行美國的「和平演變」政策，這是在開社會主義的倒車。<sup>53</sup>

然後，這篇文章談到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對中國的教訓。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堅持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

<sup>50</sup> 同上；MacFarquhar (1997, 353–354).

<sup>51</sup> Lüthi (2008, 260–272), MacFarquhar (1997, 349–350).

<sup>52</sup> MacFarquhar (1997, 360–362).

<sup>53</sup> 同上，頁363。

義傳統。這關係到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關係到子孫後代能不能「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核心問題是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這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是無產階級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的極其重大的問題。」<sup>54</sup>這篇文章沒有說如何實現這一切。這將成為兩年後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

## 毛澤東準備發動對黨的攻擊

毛澤東為即將到來的風雲突變做着精心準備。雖然其他領導人幾乎總是對毛澤東個人非常恭敬，但他不確定，如果他的意圖被提前獲悉，會不會遭到聯合抵制。直到他的忠誠追隨者各就各位，他才準備發動對黨的攻擊。毛澤東不僅想從黨的最高領導層中，開除某些地位突出的共產主義者——從他選定的接班人、黨內「二把手」劉少奇開始；還想對整個黨組織進行大清洗，徹底肅清在言論或行動上表現出「修正主義」思想和行為傾向的各級幹部。毛澤東認為，在剝削階級殘餘分子及其思想的影響下，修正主義幹部正在開展一場大規模、全國性的陰謀。這一判斷很快將變得清楚明確。他打算通過一場大規模運動，把他們清除出去，但運動的方式和期限還未確定。

只有在那些對毛澤東的忠誠超越了對黨組織的忠誠的擁躉者的支持下，毛才能做到這一點。這些擁躉者已經在過去的衝突中證明自己完全忠誠於毛，會毫不懷疑地執行他的命令。毛澤東的行為恰恰符合反黨陰謀的定義。從1964年底到1966年中，他採取措施，為奪取對黨、政、軍和安全部門的控制權打下基礎，鞏固他不容置疑的個人領導權，開始發動對黨的攻擊。

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兩個人是他的妻子江青和林彪。江青之前在中國政壇上並不活躍，沒有擔任政府或黨內職務，多年未曾公開露面。

<sup>54</sup> 同上，頁363–364。

1960年代初，她開始活躍於藝術界，宣傳革命題材的歌劇和戲劇，批評革命前的傳統藝術主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她策劃發表文章，嚴厲抨擊那些沒有傳達革命思想的劇作家和文藝作品。這期間，她和上海宣傳部裏志同道合的意識形態主義者結盟，尤其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張春橋是上海市委委員、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姚文元是張春橋的下屬，擔任宣傳部副部長和《解放日報》編委。<sup>55</sup>當江青無法在北京媒體上發表抨擊那些作者的文章時，她在上海得到了及時的配合。在她更加積極鎮壓藝術界的所謂顛覆活動之際，她得到了軍隊和軍方刊物的幫助，林彪讓她隨意使用這些資源。在軍隊和上海市委的支持下，江青召開文藝座談會，在會上嚴厲批評北京文宣幹部馬虎鬆懈，同時表揚了林彪和康生等人。<sup>56</sup>

197

林彪表現出了對毛澤東始終不渝的忠誠。在內戰的最後階段，他對人民解放軍的指揮領導證明了毛澤東的必勝論斷。在1959年廬山會議和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他大力支持毛澤東打擊「彭德懷反黨集團」，熱情讚揚大躍進。林彪取代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部長後，他把人民解放軍變成了一支徹底的毛澤東主義軍隊，高舉游擊戰的傳統和人比現代化武器更加重要的思想。他在高級軍官會議上說，毛澤東是天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他組織了一場高調的活動，在全軍上下宣揚毛澤東思想。根據林彪的授意，從1961年起，他命令編輯和發表毛澤東語錄，後來彙編成冊，也就是鼎鼎大名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sup>57</sup>

另一位效忠毛澤東的重要人物是康生。1940年代初，他領導了殘暴的延安整風運動的後期階段。由於嚴刑逼供、屈打成招、打擊範圍太大，他受到批評，實質上是替毛澤東發動的這場運動承擔責任。此後，曾經作為最高領導層一員的康生被排擠出黨中央領導核心，在1950年

<sup>55</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5–17).

<sup>56</sup> Leese (2011, 122–124), MacFarquhar (1997, 382–384, 439–440).

<sup>57</sup> Leese (2011, 94–107). 關於紅寶書的彙編、印刷和發行的完整說明參見Leese (2011, 108–122)。

代擔任省級職務。在1956年舉行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他被大幅降職，似乎是因為在共產主義陣營去斯大林化的浪潮中，安全部門的大規模鎮壓導致普遍反感。<sup>58</sup>1960年代初，毛澤東把康生召回北京工作，幫助他打擊修正主義和思想倒退，主持編寫針對蘇聯的評論文章。康生的升職完全是由於毛澤東的照顧，他完全依賴於毛澤東對他的支持。<sup>59</sup>

陳伯達也是如此。他在延安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對毛澤東個人崇拜和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和康生一起負責了1940年代初的整風運動。陳伯達始終支持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立場和毛澤東在大躍進後對失敗原因的不同看法。1958年，中共理論雜誌《紅旗》創刊，陳伯達擔任總編輯。很多左派作者在這本刊物上發表文章，為毛澤東的行動提供思想依據。1960年代期間，《紅旗》實際上變成了毛澤東的非官方喉舌。和康生一樣，陳伯達的地位也完全取決於毛澤東的支持和照顧。<sup>60</sup>

另一位重要的追隨者是總理周恩來，但他和毛澤東是另外一種大為不同的關係。周恩來長期在黨內擔任要職，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甚至比毛澤東的職位更高。作為總理，他領導着國務院和中央政府，素有精明強幹、孜孜不倦和光明磊落的聲譽，以及求真務實、對黨忠誠的美名。最重要的是，自從1930年代以來，他始終忠於毛澤東，每次毛澤東因為所謂錯誤攻擊別人時都站在他一邊，包括對彭德懷的攻擊。每當他被指責偏離毛澤東的思想時，他都會進行長時間的自我批評，並發誓效忠。毛澤東很看重周恩來的忠誠和辦事能力，但他的忠誠不是因為信奉或者贊同毛澤東的看法。<sup>61</sup>

毛澤東為了確保他的追隨者們掌握國家權力，從1965年11月開始採取一系列精心策劃的措施，清除那些可能阻礙他顛覆中國政治秩序的人。他把彭德懷從北京調到偏遠的西南部，突然撤銷楊尚昆的中共中央

<sup>58</sup> MacFarquhar (1974, 148, 165).

<sup>59</sup> MacFarquhar (1997, 439–440), Walder (2009, 15–16).

<sup>60</sup> 參見第二章；Walder (2009, 16).

<sup>61</sup> MacFarquhar (1997, 434–435).

辦公廳主任職務，由汪東興接替。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負責在黨內高層之間溝通上下、傳遞文件信息。汪東興對毛澤東忠心不二，是中央警衛局局長，負責毛澤東的安全，無論到哪裏都陪着毛澤東。<sup>62</sup>1月，他命令對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展開調查。中央軍委秘書長負責軍隊的日常事務。在軍隊的政治化、對現代化武器的看法和士兵的訓練等問題上，羅瑞卿和林彪一直不和。3月，在一系列嚴厲的批鬥會之後，羅瑞卿試圖自殺。對解放軍的指揮現在完全處於林彪和毛澤東的控制之下。<sup>63</sup>

彭真和陸定一是被清除的最後兩個障礙。當時，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還領導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他和劉少奇是長期好友和同事。彭真曾公開反對毛澤東在1956至1957年發動的整風運動。<sup>64</sup>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認為毛澤東應該為大躍進造成的災難承擔部分責任。對於1964年和1965年文學界和知識分子遭到的攻擊，彭真努力緩和對他們的政治攻擊，堅決主張把藝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區分開來。<sup>65</sup>在這些事件中，彭真和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有着密切合作。

3月底，在劉少奇出國訪問後，毛澤東出手了。劉少奇離開期間，毛澤東把康生、江青和陳伯達叫到杭州，批評彭真和以陸定一為首的中央宣傳部包庇「反黨分子」，抵制他的命令。他威脅要解散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和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sup>66</sup>4月2日，《人民日報》批評北京宣傳機構裏存在「黑路線」。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被打成「反黨集團」。他們的下屬被逮捕。北京市委遭到大清洗，幾位重要領導幹部自殺。<sup>67</sup>

通過這些迅速、精心策劃的行動，毛澤東確保了他對國家宣傳機構、軍隊和各級黨組織溝通渠道的個人控制。北京的安全保障工作被重

<sup>62</sup> 同上，頁447–448；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9–20, 36–37).

<sup>63</sup> MacFarquhar (1997, 448–450),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0–27).

<sup>64</sup> MacFarquhar (1974, 180–184, 195–196, 202–207, 270–273).

<sup>65</sup> MacFarquhar (1997, 445–447),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7–18).

<sup>66</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4–35).

<sup>67</sup> 同上，頁38–44。

新調整。軍隊和公安部隊由新任命的北京衛戍區司令統一指揮。<sup>68</sup>當毛澤東公開出手時，劉少奇正身處離北京很遠的地方。現在，毛澤東謀劃中的第一步已經完成，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拉開帷幕。

---

<sup>68</sup> 同上，頁48–51。

## 斷裂的造反

1966年5月，毛澤東開始了對黨內高層的清洗，文化大革命就此拉開序幕。但是，什麼是文化大革命？想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審視文革的最終結果。在一開始，毛澤東似乎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計劃，文革過程中也被迫幾次三番地臨時易幟，改弦更張。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對事件的意外發展和忠誠下屬的行為感到沮喪。毛澤東發動了一系列的階級鬥爭，但發展方向不斷出乎其本人的預料，迫使他去回應並重新思考。文革的確摧毀了原有的國家官僚體制，並達到了清洗所謂修正主義者的目的，但除此之外的其他影響都超出了毛澤東心中原有的設計。事實上，我們很難確定毛澤東當時心裏想的到底是什麼。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發展完全超出毛澤東本人和其他高層領導的意料。

從某種角度上說，文革是一次大規模清洗，旗號是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毛澤東眼中的修正主義者。上至黨內高層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下至農村公社或國營工廠的支部書記，大批領導幹部被打倒。如同1930年代末的蘇聯一樣，很多人從崗位上被揪下來，遭到驅逐。而不同的是，在蘇聯，那些被肅清的人都被送到勞動營或是被處決；而在中國，這些人首先會被關押一段日子，期間會有一部分人死於監禁或選擇自殺，但絕大多數受到的是標準對待：被造反派當眾羞辱並遭到暴力毆打，隨後被短暫地關進臨時牢房，並最終下放到工廠或鄉間長期從事體力勞動。相比於斯大林時期的受害者，大多數在文革中受迫害者都倖存下來並最終回歸公職。

但是，文革絕不僅僅是對黨內高層的清洗：大清洗只是罷免一些人，並不會動搖體制的架構和根基。文革的目標其實是要徹底顛覆從蘇聯照搬來的官僚體制；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為簡單的革命委員會，將革命幹部、軍幹部和造反派代表融合，僅保留極小部分來自舊官僚體制的機關人員。這一設計的本意是希望建立起紀律嚴明的政治等級制度，由經歷過反覆考驗、絕對忠誠於毛澤東的人為核心，並以類似解放戰爭時期戰時動員的模式管理中國。最終，中央部委裏70%到90%的工作人員都被下放到農村，送往所謂的「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並在那裏從事體力勞動。<sup>1</sup>

中國原有的黨政合一體制遭到破壞，新體系隨後建立，整個過程既有自上而下的政治舉措，也有自下而上的民眾運動。毛澤東從政治體制頂層開始，迅速重組權力，第一階段在1966年夏末即宣告完成。中央委員會中大批人員被清洗，既有的結構被摧殘殆盡，功能幾乎癱瘓，任何抵抗都毫無意義。各政府部門或是被迫縮減規模，或是多個合併為一，而決策的制定權則被轉移到所謂的革命委員會手中，這些委員會由毛澤東的忠實擁護者組成，並直接向他單獨匯報工作。隨着文革的不斷發展，這些非正式組織的規模不斷擴張，攫取了越來越多的權力。在十年動盪中，無數人被打倒，政黨合一的官僚體系結構逐漸被摧毀，最終土崩瓦解並停止運轉。在黨政頂層，毛澤東的擁護者們儘管在黨政職位上毫無制度性的權力基礎，但他們倚仗着毛澤東的權威，瘋狂地破壞和蹂躪原有的國家官僚體系。

文革的另一個顯著成果是動員起基層群眾參加造反運動。這些造反派攻擊各級黨政機關中那些被認定為對毛澤東思想不夠忠誠的幹部。最初，重組國家權力機構的首要原因之一便是為群眾造反鋪平道路，並讓其按照毛澤東所期望的方向發展。表面上，學生紅衛兵運動在1966年8月戲劇性的爆發看上去混亂無序。實際上，這場運動由派駐學校的全職「特派員」所監控、指導；他們負責上報地方局勢，並向學生造反派傳達

---

<sup>1</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56–160).

建議、鼓勵和指示。這一政治體系極具影響力，在1966年夏秋兩季直接引導着學生運動。但是，這一制度逐漸被人操控，淪為權力鬥爭的工具，出現的問題也越演越烈，因此遭到了民眾抵制，並最終走向瓦解。

## 國家權力的頂層重構

1966年5月，對北京「反黨集團」的批判開啟了一連串的黨內清洗運動，嚴重破壞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北京市的行政機構。到7月，北京市的十位副市長都已被免職，北京市委書記處的成員僅剩兩人，到10月，這兩位也最終未能倖免。同時，有81個部門的一把手或副手被監禁。<sup>2</sup>中央委員會書記處下屬的部門也被嚴重破壞：234個中央宣傳部的幹部被免職，整個部門被縮減到只剩一個毛澤東思想宣傳處。中共中央組織部也遭到毀滅性打擊：中組部整個領導層都在8月被免職，二百多個工作人員中，絕大多數都受到了審查。<sup>3</sup>

這些變化標誌着國家權力結構的劇烈轉變。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位於首都的其他黨政部門逐漸喪失職權，並最終停止運作。一個新的臨時委員會接管了他們的領導職能，其成員都是絕對效忠毛澤東的人物。5月末，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立，人數規模於次年迅速增長。小組的核心成員無疑都是毛澤東的忠實心腹，他們早就為人所知，而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毛澤東的背書。這些人幾乎都來自宣傳或安全部門，經驗豐富，在之前反對自由化和「資本主義」傾向的鬥爭中脫穎而出。其中沒有人在當時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員，也沒有人擔任過政府部門或經濟系統的負責人。<sup>4</sup>

中央文革小組最初由陳伯達領導，此人是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的馬列主義導師，也是黨刊《紅旗》的總編。文革中，《紅旗》這一刊物成為

<sup>2</sup> 同上，頁43–44。

<sup>3</sup> 同樣的命運也落到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處理與其他共產主義政黨之間的關係）和中央調查部（主管情報部）這兩個部門頭上。

<sup>4</sup> 康生和陳伯達是兩個職位最高的人物，是1966年5月政治局候補委員。

- 203 中央文革小組的宣傳機器，傳播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康生也是要緊人物之一，他在1943年將黨的整風運動引至過於暴力的局面，並在最近領導了抨擊蘇聯「修正主義」的大型寫作組。中央文革小組還有兩個重要的副手，分別是江青和張春橋。江青於1938年成為毛澤東的妻子，在黨內或政府部門並沒有正式職位；張春橋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先前曾幫助江青在文藝領域抨擊自由化傾向。其他的關鍵成員也都是以辯論家或「理論家」的形象為人所知，是毛澤東意識形態的堅定擁護者：其中，姚文元是張春橋在上海宣傳部時的下屬，王力、關鋒、戚本禹和穆欣雖較為年輕，但與陳伯達或是康生都有過共事的經歷。<sup>5</sup>

中央文革小組成為了毛澤東的司令部，用以指揮文革運動，攻擊、壓制和破壞現有的黨政國家體制。中央文革小組在建立新秩序上其實沒什麼作為，在破壞原有權力架構上倒是一把好手，其政治權威完全出自毛澤東的支持，行動路線則是基於他們對毛澤東各項意圖的揣度。然而，毛澤東的心思其實常常捉摸不定，並且經常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模糊不清。開始時，中央文革小組只是一個寫作小組，大概由十來個人組成，第二年卻迅速發展成一個小型官僚組織，在北京西郊的釣魚台國賓館佔據了七棟別墅。原先，鄧小平領導的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處理中央委員會的日常事務，其職能現在徹底被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中共中央的官僚隊伍遭到清洗，相應部門職權急劇萎縮，中央文革小組的規模和權力也就逐漸擴大。

對毛澤東來說不幸的是，中央文革小組從各方面來說都是一個混亂無序的組織，充滿內部矛盾，明顯缺乏協調。其成員流動性極大：到1967年1月，原來的19位成員和顧問中超過半數不是遭到清洗就是被迫靠邊站。小組成員公開相互攻訐，而且幾乎沒有明確的權力分配界限，也不存在任務的具體分工。此外，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的方式也從未規範統一：中央文革小組沒有定期的書面報告，針對同一事件，毛澤東會從不同的人那裏獲得不同的口述匯報，他自己似乎也不甚關心政事，很少

<sup>5</sup> 關於這些人的傳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演變的更多細節見Walder (2009, 14)。

參加會議，經常遠離北京，住在其他省份的別墅裏。更糟的是，陳伯達和江青都不領導召開小組會議，這兩個人都沒有行政經驗，卻都是古怪脾氣，難以相處。相應的責任就落到了總理周恩來的肩膀上。雖然他並不是小組的正式成員，但周恩來為其設定了會議日程，並能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說話行事。<sup>6</sup>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中的激進派成員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傾向，因此在這整個時期一直都試圖巧妙地削弱他們的行動效果，降低其破壞性影響。中央文革小組的激進派清楚這一點，因此對周恩來懷有相當大的不信任，常常試圖限制或阻撓周恩來的工作。

1966年8月，毛澤東重整了黨內高層，降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職務，令其在政治排序上大幅落後；同時，毛澤東提拔了很多中央文革小組中較有資歷的成員，並將林彪提升到第一副主席的位置，指定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林彪對民政事務毫無概念，僅關注軍事事務。周恩來反而因此接管了劉少奇和鄧小平原本的職責，他不定期地召開非正式「中央碰頭會」，發揮此前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的功能。但毛澤東和林彪幾乎從不參會。<sup>7</sup>這些變化顯然使周恩來成為新權力結構的中心，從很多方面來看，他都是文革時期國家權力機器不可或缺的一環。雖然周恩來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獨立政治權威，但因為基本上所有決策的制定和執行都得經他之手，所以周恩來事實上影響了各項事件的進程。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也在這一時期組建起來，並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其前身是1966年5月末為調查北京「反黨集團」而建立的委員會，成員包括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幾乎全部成員，此外還有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和林彪的妻子葉群。成立該小組是為了審查、揭露、逮捕並監禁中共內部的「修正主義者」和「叛徒」。隨着清洗規模的擴大，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活動範圍和組織規模也在增長。<sup>8</sup>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規模最終發展到數千人之多，只要被懷疑為地

<sup>6</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00–101).

<sup>7</sup> 同上，頁98–99。

<sup>8</sup> 這一段和下一段基於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77, 281) 以及Schoenhals (1996)。

205

下叛徒，就會遭到組織調查。他們和遍佈中國的半獨立群眾組織一同辦案，後者代前者在各個地方開展調查。<sup>9</sup>到1968年，中央委員會中一共有88位成員被懷疑為「叛徒」、「間諜」、「通敵分子」而遭到調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活動通過全國性網絡展開，到1968年已經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在搜集證據的過程中，他們大量利用威脅恐嚇和身心折磨進行刑訊逼供，這一問題在最基層尤為突出。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在重演1930年代蘇聯的大清洗運動，但是對這些所謂「修正主義者」的指控其實和他們的政治立場或所作所為都沒有太大關係。相反，這些被審查的受害者都背上了難以置信的背叛罪名：「從事地下反黨活動」、「充當國民黨或外國情報機構的間諜」、「在建國前有背叛革命的行為」等。

## 發動群眾造反

文革還動員了一場自下而上攻擊原有官僚體系的群眾造反。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裏，學生和工人先後被賦予建立群眾組織的絕對自由，批判並「揪出」在他們看來懷有修正主義傾向的幹部。文革的這一面和毛澤東在1956至1957年發動的「開門整風」運動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是，1957年時毛澤東並不支持建立獨立的群眾組織，也沒有鼓動群眾去罷免個別幹部。接近十年之後，毛澤東對黨內形勢的判斷與1957年相比有着根本不同。此前，他認為老百姓對個別幹部的善意批評足以糾正黨的問題；但是現在，他認為修正主義趨勢的發展已經帶來極大威脅，只有發動一場大規模運動才能徹底清除黨內的修正主義勢力，打碎原有官僚體系，並培養出新一代的革命接班人，防止中國走上蘇聯道路。

但是，毛澤東也沒打算放任群眾造反組織自由發展。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監控校園活動，煽動和支持學生造反派，通過內部渠道鼓勵造反，並有力地削弱在職幹部的權力。中央文革小組試圖通過群眾運動推翻原有的政治秩序，這不禁讓人想起建國前在國民黨控制區

---

<sup>9</sup> Schoenhals (2008a).

域內的地下共產主義運動。而到了1966至1967年，類似的活動變得更加公開直白，可文革小組與紅衛兵領袖實際上卻保持着私下甚至是秘密的聯繫。

206

正如中央文革小組本身，造反派的活動剛開始規模也很小，但起步後發展迅猛。自1966年6至7月起，中央文革小組內的年輕成員和相關工作人員以及為數不多的調查記者就開始在北京各大高校活動，和學生中的造反積極分子建立聯繫，提供內部信息和建議。隨着紅衛兵運動在8月份迅速發展壯大，《解放軍報》和新華社的幾百名記者被徵調為特派員，安插在遍佈全國的大學校園裏，人數最終有上千之多。他們和紅衛兵領袖建立聯絡，向北京的上級提交定期報告，並經常向學生造反積極分子提供信息和建議，告知文革運動的最新政治動向。他們向中央文革小組提交的報告被彙編成《文革簡報》，每一期只印刷不到20份，呈送給毛澤東和他指定的其他幾位高層人員。這為黨內精英提供了除《內部參考》外另一個獲取信息的渠道。《內參》是由新華社提供的內部簡報，歷史更久遠，流傳更廣泛，此時《內參》也從1966年8月起增發《文化革命動向》特刊，發展到11月時，每天都會有兩期發行。<sup>10</sup>

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利用這個情報網絡監控學生運動的最新態勢，並引導其走向他們期望的方向。同時，他們還借此發現並提拔那些有前途且願意合作的學生領袖，反之警告那些在他們看來言行失當的人。到1966年底，這個網絡已十分龐大，發現、逮捕並批判許多不服從中央文革小組的、持不同意見的紅衛兵。一些特派員開始常駐校園，參與策劃造反組織的活動，充當紅衛兵得到情報和獲取建議的權威來源，並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和校園造反組織之間的直接紐帶。中央文革小組逐漸挑選出中意的學生造反派系，並鞏固與他們的聯繫。隨後，北京學生開始在全國各地的省會城市建立起「聯絡站」，為當地的紅衛兵提供建議和指導。這使得中央文革小組在全國範圍內擁有了更為公開和直接的影響力。到1966年秋，中央文革小組會定期邀請他們所認可的紅衛

207

<sup>10</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79–81), Walder (2009, 169–170).

兵領袖到釣魚台總部參加磋商或是戰略會議，甚至在中南海核心政務辦公區或者人民大會堂舉行各類活動。<sup>11</sup>

同時，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也採取了一系列或明或暗的措施幫助學生造反運動。新聞媒體一直鼓勵學生造反派的活動，從不吝惜褒揚的筆墨。自8月18日開始，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系列集會，與造反群眾會面，官方媒體對此發佈了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最後一次集會安排在1966年11月，至此已有共計約1,200萬人參加了這些群眾集會。<sup>12</sup>如果學生們要全身心地投入這場政治運動，那顯然就會荒廢學業：6月中旬，不准參加政治活動的禁令被徹底解除，所有課程和期末考試因此全部取消，學位授予、工作分配和國家高考被中止。現在，學生們除了留在校園裏參加造反運動之外無事可做。同時，另一條重要指示要求學校在暑假期間必須繼續開放宿舍並提供餐飲。到8月末，中央又頒佈了兩項法令，命令公安機關和軍隊方面不得干涉紅衛兵的活動。這些指令一直嚴格執行到1966年12月，但之後安全部門得到指示：對那些批評中央文革小組的造反學生採取行動。<sup>13</sup>

儘管有上述諸多措施，中央文革小組仍然發覺其實他們非常難以掌控紅衛兵運動。派系分裂、相互攻訐的現象層出不窮，屢屢需要中央文革小組的干涉。通過愈發直接和公開的強硬控制手段，中央文革小組確實得以將運動引至他們希望看到的方向，但同時也遭到了來自學生造反派的抵制和反抗，情況變得愈發棘手。最終，安全部隊在年底得到指令，受命嚴厲鎮壓中央文革小組的反對者，並逮捕那些持不同意見的紅衛兵。

## 大學紅衛兵

說到對紅衛兵運動的幕後操縱，出現在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是個標誌性事件，這張大字報隨即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傳播，

<sup>11</sup> Walder (2009, 154–171).

<sup>12</sup> Leese (2011, 129–134).

<sup>13</sup> Walder (2009, 148–150).

拉開了文革的序幕。1966年5月25日，七位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講授馬列主義的教師張貼了一張大字報，批判北大校長（同時也是校黨委書記）和另外兩位領導，指控他們是修正主義者、與北京反黨集團不清不楚、密謀阻止群眾的自由動員、將造反運動引導至小規模會議以便施展「陰謀」控制等等。大字報認為，這些人的行為表明他們是「一群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sup>14</sup>

作為紅衛兵運動的先驅事件，這張大字報自此擁有了神話般的地位，也使其作者成為了政治明星。但是，這張大字報的作者其實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學生。相反，大多數其實是黨內相當有資歷的人。在後來，聶元梓就以該大字報主要作者的身份而聞名全國，其本人實際上就是北大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1966年，已經45歲的聶元梓是一名擁有革命經歷的幹部，日本侵華時期離開高中校園，並在延安成為一名共產黨積極分子，她在黨內的資歷很深，擁有廣泛的人脈，在精英圈關係甚多。即便如此，她卻十分有理由抨擊當時的北大領導層：她和她的盟友們於兩年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攻擊學校領導，並在社教運動調轉方向後遭到批判。此時她和她的同事正處於政治陰雲之下：頂頭上司是曾經試圖推翻的領導，而其中很多人都正要被調離北大。<sup>15</sup>

這張著名的大字報其實是康生在幕後一手策劃的，他向北大派出密使，安排對校領導的批判。康生的特使向他們保證，這一次必定一舉定乾坤。大字報在校園裏產生了預期的效果，引起騷動。康生向毛澤東呈送了一份大字報的副本，毛澤東就此看到了機會：他下令將大字報內容全國廣播，並刊載於各地黨報黨刊，還附上親自撰寫的社論，對其大加稱讚。北大領導人卻因此難逃厄運。第二天，他們就受到批判並被免職，北大黨委近乎癱瘓，由大批高級黨員幹部組成的工作組來到北大校園，接管了學校事務，並迅速展開行動。工作組和聶元梓及她的同僚展開合作，對學校的組織結構進行了大清洗，手段則基本上沿襲了此前社

<sup>14</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56–57).

<sup>15</sup> Walder (2006, 1025–1026; 2009, 35–36).

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激進模式。<sup>16</sup>在整個首都乃至全國的大學校園裏，  
209 學生積極分子、政治指導員和共產黨員們也都紛紛效仿聶元梓，組成戰鬥隊，對學校領導展開攻擊。

批判對象涵蓋了全北京的大學黨委，很多人召開緊急會議，因為可能被捲入北京的黨內清洗，他們感到極度恐慌。這些擔心不無道理：一週之內，南京大學的黨委書記遭到批判並被撤職。他之前將人文學部的師生送到了偏遠的農村，以便將學習和體力勞動相結合，響應當時毛澤東關於教育的一系列號召。但是，科學和工程學部仍然得以留在南京市中心，人文學部的學生和教師對此事深感不滿，十分憤怒。校長堅持立場，並試圖以反對毛主席的名義讓批評者噤聲。而此時，他卻因此被拉下校長的寶座，被迫戴上了「修正主義者」的帽子。<sup>17</sup>

與早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樣，工作組被派往大學和高中，旨在發動群眾展開批鬥、組織清洗基層黨員幹部。7月下旬，毛澤東在長期離京後回到首都，反而批評工作組「鎮壓革命群眾運動」，隨後，工作組撤出校園。毛澤東將這種「錯誤路線」歸咎於劉少奇和鄧小平，將兩人進一步邊緣化，貼上所謂「修正主義者」帶頭人的標籤，為進一步打壓二人奠定基礎。<sup>18</sup>當工作組撤出時，他們遭到反對者以及毛澤東激進派追隨者的指控，譴責他們「試圖削弱群眾運動」，從而「保護黨內的當權派」。後續更為仔細的考察表明，實際上工作組一直在幫助發動學生攻擊學院領導，摧毀了大部分校園黨組織。但是，這也使得校方和學生間產生了深刻矛盾並彼此對立，無意中為後來紅衛兵運動的派系分裂埋下了禍根。<sup>19</sup>

<sup>16</sup> Walder (2006, 1027–1028; 2009, 36–37).

<sup>17</sup> Dong and Walder (2011a, 11–12).

<sup>18</sup> 似乎有理由認為，毛澤東是設計好讓劉少奇落馬的。鑑於劉少奇之前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採用的方法，毛澤東清楚地知道劉少奇會如何展開他的運動，他不反對派出工作組，也拒絕澄清自己到底是支持還是反對這件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63)。

<sup>19</sup> 這一結論的證據見 Walder (2009, 28–58)。

工作組進駐一所大學時，有多種方式可供選擇。第一個選擇是工作組可以保留原有的黨政領導班子，讓他們自己去清理下級的幹部隊伍。如果工作組拒絕這種做法，並逼迫整個領導班子靠邊站，那麼他們又面臨進一步的選擇：是有選擇地清洗掉一些人，同時肯定其他人的忠誠；還是採取更激進的方式，認定整個黨組織已經徹底腐爛？工作組們最初還會有些猶豫，但不久後大多都採取了較為激進的做法。<sup>20</sup>然而，無論採取哪種方法，都會有人不滿和反對，學生、黨員和幹部因此鬧得四分五裂。如果工作組保留了原有的學校領導班子，那就意味着先前效仿聶元梓批判學校領導的人將面臨秋後算賬的可能；如果工作組認定一部分學校領導是可靠的，而另一部分人應該成為清洗的目標，那麼這部分人在學生和教師中的支持者自然不樂意，工作組將失去很大一部分人心，造成基層分裂；如果工作組選擇批判整個校園領導班子，就會大量疏遠原本與學校領導層關係密切的黨員幹部和學生中的積極分子。無論是什麼情況，都會有人開始怨恨工作組，他們言辭激烈，要求撤換工作組。

如果工作組完全放開限制，任由學生批判學校黨委領導，則還是會面臨問題：允許批評任何人就意味着工作組無意中讓造反運動成為脫繩的野馬，容易引起混亂。許多工作組擔心無法控制局面，因此會試圖限制暴力活動的規模，或是控制帶頭的學生積極分子，這就會催生激進派學生對工作組的敵意，因為他們覺得工作組這是在試圖「鎮壓」學生運動。

北大情況就是典型的例子，6月18日，工作組進駐不到三週，就吸收了聶元梓進入隊伍，並對整個北大黨組織進行了大清洗。身居要職的行政人員及威望較高的教師成為清洗目標，被控告階級出身不純，或是有海外聯繫。隨後，幾乎任何一個在之前的政治鬥爭中站在前任校長一邊的人都遭到了清洗。到了7月初，20名黨總支書記中只有一位免於清洗——那就是聶元梓本人。只有不到8%的學校幹部被認定為政治清

---

<sup>20</sup> 同上，頁56–57。

白，而三分之二的人所面臨的指控大到足以讓他們被當即罷免。<sup>21</sup>

很快，工作組就發現自己很難控制學生運動。北大的情況與不到十年前短暫的「雙百運動」形成了驚人的對比。1957年，學生同樣被動員起來，在牆上張貼大字報，但雙百運動期間，學生們是在抗議威權政黨統治和受斯大林主義影響而產生的僵化教條主義，同時要求更多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有些人甚至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秉承1919年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傳統，北大學生站在一場日益壯大的運動前沿，希望中國追隨蘇維埃陣營的自由化趨勢。

十年後，情況卻大不相同。現在北大的學生積極分子和他們在全國各校園的同齡人一樣，爭先恐後地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激進且狂熱的批鬥者。他們批判曾接受過海外教育或是擁有自由主義名望的教職工，其中許多人也是早先思想改造和反右運動中的目標。同時，學生造反派也攻擊那些在他們看來促進了「階級異己分子」影響的黨員幹部。

這種狹隘的教條主義本就十分荒誕，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學生造反派展開了嚴厲而極端的批鬥活動，對受批判者施以言語暴力和身心摧殘。激增的批鬥會像極了土改和其他政治運動中對待地主或是其他階級敵人的儀式。在此過程中，被批鬥的對象被迫戴上高帽，脖子掛上沉重的標語牌，受到高聲譴責和極端侮辱，被粗暴地推來推去，頭髮被拉扯，胳膊被反綁，同時還要雙膝跪地，做出「噴氣式飛機」的姿勢。有一些人更是慘遭毒打。北大在這方面再典型不過：6月中旬，工作組記錄的就有178名幹部、教師和學生被暴力對待，其中數人不堪屈辱而選擇自殺。

6月18日，北大校園再度爆發大規模批鬥會，工作組最終決定限制這種不加約束的暴力活動。近70名幹部和教師被拖到臨時搭建的平台上，臉上塗着黑墨水，遭受踢打和大聲指責。更有甚者，據稱有兩名女性幹部被剝去部分衣服，而一名年輕男子以摸其私處的方式羞辱她們。一系列暴力批鬥會的大多數受害者是學校的黨委委員或是更低一級的支

<sup>21</sup> 同上，頁37–38，首都的其他主要大學也出現類似情況。

部書記。工作組派成員到校園各處阻止暴力活動，並為受害者提供緊急救助。<sup>22</sup>

工作組批評了這種暴力行為，並且向中央書記處呈遞了一份報告，譴責這起「六·一八事件」。此時中央書記處仍然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兩天後，這份報告作為中央文件分發全國各級黨委。文件中稱，工作組的這一行為是「正確而及時的」。有了這個新指示，全國各地的工作組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打擊那些堅持暴力、拒絕服從的學生。那些不服工作組管控的學生被孤立、批評和拘留。挑戰反抗工作組權威的則被給予警告，並以懲罰相威脅。而那些要求撤換工作組的，或者要求學生和教師自己主導文革運動的，則可能要參加批評會，還會被指控為從事反黨活動。在這場短暫的運動中，工作組重振了自身的權威。幾乎每所學校裏都有相當一部分反對工作組的少數派被批判，有時候還被貼上政治標籤，他們的名字也作為麻煩製造者被工作組記錄在案。<sup>23</sup>

正是這份文件和鞏固工作組權威的舉措給了毛澤東充分的理由。7月中旬，毛澤東回到北京，憤怒地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領導的這一措施，他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並在大學校園裏「搞獨裁」。其實大多數工作組都貫徹了毛澤東關於反對校園修正主義的指示，毛澤東對此卻視而不見。正是暴力活動使得工作組有選擇地控制校園裏的一些好鬥分子，毛澤東對此也不聞不問。毛澤東命令所有工作組在7月底前撤出校園，此後學校將自己展開文化革命運動。<sup>24</sup>

毛澤東的設想是這樣的，當工作組受到批評並撤出校園後，學生中的激進分子將團結一致，攻擊學校幹部。但事與願違，因為學生運動從一開始就存在深刻的分裂。毛澤東沒有考慮到，事實上大多數工作組並沒有禁止對學校黨組織的攻擊。校園裏的部分激進派學生卻因此大受鼓舞，他們與那些激進的工作組形成了統一戰線，而且支持工作組反擊那些挑戰他們權威的少數學生。另一面，與工作組合作的學生本就佔多

<sup>22</sup> 這一描述基於 Walder (2006, 1028)。

<sup>23</sup> Walder (2009, 62–63, 70–84).

<sup>24</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81–84).

數，工作組撤出後，他們控制了校園，並且組織學校文革委員會的選舉，這些委員會自然也被他們所主導。<sup>213</sup>

這就為嚴重而持久的校園分裂奠定了基礎。那些與工作組發生過衝突的少數派學生幾乎都遭受了懲罰，他們要求運動的批判目標從學校領導轉到工作組成員上來。少數派指責那些和工作組合作的學生密謀鎮壓學生造反派，所以沒有權利領導校園文革。此外，他們還要求工作組成員必須回到學校接受批鬥，承認先前企圖鎮壓「革命群眾」的罪行。

然而，大多數學生積極分子認為這些指控無異於在打他們的臉。他們覺得聲明自己和激進的工作組在清洗中合作是正當的，是心懷不滿的少數派誇大了工作組的錯誤，歪曲了事實。少數派指責多數派是「修正主義者」或「保守派」；而多數派則暗示少數派遭到的待遇是罪有應得，這些少數派學生現在只是想借此洗白自己的政治案底。整個8月裏，大學校園充斥着兩大陣營間吵吵嚷嚷的辯論，有時候甚至出現爭吵打鬥。隨着紅衛兵組織成立，這兩個陣營幾乎在所有校園都走向了分裂，形成少數派和多數派。<sup>25</sup>

多數派控制着學校，為了展示他們的革命資格，多數派組織了批鬥會，並將批鬥對象集中到臨時牢房和「勞動改造隊」中，讓他們挖溝或是掃廁所。相反，少數派希望把焦點集中在工作組的錯誤上，並質疑多數派贏取選舉的正當性。如果說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期望通過鼓舞學生運動來繼續反對修正主義，他們現在估計是大失所望。從一開始，大學紅衛兵就懷揣各自的想法，因此只顧互相爭鬥。

## 高中紅衛兵

高中學生的造反活動最初比大學生的更加顯眼，而且受到了毛澤東的公開盛讚。第一個採用「紅衛兵」作為名字的學生組織於1966年5月末在清華附中成立。為了爭取獨自建立組織的權力，學生們先和學校當

<sup>25</sup> 這總結了Walder (2009, 88–119) 中一段更長的分析。

局鬥爭，後又與工作組周旋。他們張貼大字報挑戰工作組，還起草了好幾篇文章，表達他們想要參與造反的精神。同時，北大附中也在進行一場類似的鬥爭，另一個紅衛兵運動的前身「紅旗戰鬥小組」，也對派往他們學校的工作組發起了挑戰。

工作組被撤回後不久，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開始格外關注這兩個學生組織，毫不吝惜自己的讚美之詞。在與高中生領袖舉辦的座談上，江青和其他領導人對其大加讚揚，並邀請學生領袖上台講話。讀了學生們的文章後，毛澤東予以熱情回應。在8月1日寫給學生們的信中，毛澤東肯定了學生的大字報，認為這是「革命性的」，還讚揚了高中生們的激進立場。他命令將其中兩張大字報連同他的回信一起，在8月初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刊印並分發給所有參會者。毛澤東還抓住這個機會表達了他對北大附中「紅旗」的支持。他在公開信中寫道：「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sup>26</sup>

在這次表揚之後，毛澤東邀請了大約1,500名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的觀禮台上參加8月18日盛大的紅衛兵集會。超過20名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收到了邀請。當他們接受毛澤東的接見並說明自己的身份時，毛澤東回應說：「我果斷支持你們！」幾天後，這次接見見諸《人民日報》的報端。在這次集會上，一位來自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學生領袖向毛澤東贈送了一枚紅衛兵袖章，她曾貼出該校「第一張大字報」。隨後，一張她在為微笑着的毛澤東戴上紅袖章的照片登上了全國各地的報紙頭條。在之後的幾天裏，國家媒體發佈了這些高中生激進分子的發言和大字報的節選。<sup>27</sup>

與黨內領導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一樣，造反派學生在教育領域對黨的

215

<sup>26</sup> 同上，頁129–135。毛澤東完整的回信見頁133。

<sup>27</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06–110), Walder (2009, 134–135).

「階級路線」採取了一種極為激進的立場，突出強調政治教化的作用，在入學時看重階級出身和政治積極性，並且批判對學術成就和考試成績的狹隘關注。這種思想非常合乎第一波高中紅衛兵的立場，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來自黨員和革命幹部家庭。北大附中、清華附中和北師大女附中的早期紅衛兵領袖都擁有「革命家庭」的背景，並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然而，伴隨着一幅著名對聯的流傳，麻煩也開始了。這幅對聯稱讚了來自革命家庭的學生，並貶低了來自「壞分子」的學生。這就導致了高中紅衛兵運動的第一次重大分裂。

這幅極具冒犯性的對聯聲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聯作者們辯稱這是要表達黨的階級路線，但很多學生覺得這是一種侮辱，意思是革命者的孩子是世襲的政治貴族，天生就是「紅色」的，而其他人無論在後天多麼忠誠，先天就低人一等。對聯同樣冒犯了那些出身於無產階級和農民背景但父母不算是革命英雄的人。毫無意外，很多學生開始批評這幅對聯，認為內容很不成熟、弄巧成拙。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在8月初的紅衛兵集會中上升為暴力衝突，當時學生們為了搶奪話筒而大打出手，有人還被刺傷。<sup>28</sup>

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擔心圍繞這幅對聯的爭論會分裂並削弱正剛剛起步的學生運動。一些成員要求學生們把這個問題擱在一邊。同時，江青和康生提出了更為溫和的解釋，以試圖澄清階級分析如何為世襲政治地位提供正當理由，以及如何權衡實際的政治忠誠和家庭背景，可收效甚微。<sup>29</sup> 反而越是想分清這些政治標籤，就越難以平息相關的爭論。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學生對暴力的使用，這直接導致了高中紅衛兵運動中的第一次派系分裂。工作組撤出後，暴力的浪潮迅速席捲了高中校園和城市社區。高中生紅衛兵抓住黨委書記、中學校長和老師同學，對他們進行暴力毆打，有人死於批鬥，也有人選擇自殺。<sup>30</sup> 高中生激進分

<sup>28</sup> Chan, Rosen, and Unger (1980), Rosen (1982, 109–118), Walder (2009, 136–138).

<sup>29</sup> Walder (2009, 137–142).

<sup>30</sup> 根據Wang (2004) 中的記錄，其中還有20個這一時期的類似案例。

子也從校園湧出，攻擊目標人群中的一些人。在公園和歷史古跡裏，他們對教育部門和團委的幹部、知名小說家、編劇以及京劇演員進行了批鬥，用拳頭和皮帶狠狠毆打他們。紅衛兵在城市的居民區街道上遊蕩，恐嚇「反動」家庭的成員，闖入他們家中，把他們押至批鬥場所。期間，紅衛兵發放了傳單，要求「黑階級」家庭將他們的財產上交給公安局，並立即離開城市。

這些家庭的成員被聚集在高中的操場或是社區的公園裏，遭受批鬥和毆打。受害者常常被關在卡車後面的車廂裏遊街示眾。在8月18日第一次天安門集會後的一個月裏，北京共有11.4萬戶被抄家，價值4,480萬人民幣的外匯、黃金和其他貴重物品被沒收，還有230多萬冊圖書和330多萬件繪畫、藝術品和家具。在西城區，從1,061戶人家那裏沒收來的圖書、繪畫、卷軸和其他物品被焚毀，大火連續燒了八天八夜。同時，北京有7.7萬戶居民被趕出家門。暴力活動在8月的最後一週達到頂峰，平均每天有超過200人死亡。8月中旬之後的四個星期裏，據北京官方統計的死亡總人數為1,772人。<sup>31</sup>

首個公開反對此類暴力活動的是來自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他們是發起紅衛兵運動的組織之一，且在8月初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他們對席捲全城的暴力發出了警告，並且發佈了〈緊急呼籲書〉，譴責那些以「紅衛兵名義到處毆打一些人……進行流氓活動」的「混蛋和糊塗蟲」。〈呼籲書〉要求各校「真正的左派」應聯合起來，制止「流氓行為」。那些有此類行為的學生應該被開除出紅衛兵的隊伍。<sup>32</sup>

〈呼籲書〉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與先前的大字報不同，這份文件沒有得到媒體的宣傳，而暴力和恐怖的浪潮則在8月末達到頂峰。

<sup>31</sup> 這總結了Walder (2009, 142–142) 中更長的一段描述。9月，上海發生了354起打人致死事件和704起自殺事件，高中學生毆打了超過1萬人，有接近1,000人嚴重受傷 (Perry and Li 1997, 11–12)。同樣見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17–131)，其中有一段對這一時期全國範圍內的「紅色恐怖」更長的描述。

<sup>32</sup> Walder (2009, 145).

217 清華附中紅衛兵隨後發佈了一份對紅衛兵運動的〈十點估計〉，覺得很多學生「草菅人命」，認為這是「法西斯」行徑，而不是「紅五類家庭出身的真正的紅衛兵」的作風。<sup>33</sup>

然而，毛澤東卻並不同意。學生呼籲制止暴力，可他的觀點恰恰相反，而中央文革小組的核心成員則和毛澤東保持一致，他們認為要造反，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而受害者所受的傷害則是可以接受的。私下裏，高層幹部也知道了運動的暴力趨勢，但他們也只能表示無可奈何。<sup>34</sup>

從學生運動一開始，江青就明確地向學生造反派表明，針對被批鬥者的暴力行為不算逾矩。她向高中生做了幾次講話，在7月28日的一次演說中，江青說道：

我們不怕亂。亂和治是不可分割的。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人的錯誤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風暴中出現打人的事情不是壞事。毛主席說過：「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今後不要再打人了。」

一週後，紅衛兵發佈關於暴力問題的〈緊急呼籲書〉。江青起初並不反對，但態度很快改變。她確信，一些立場較為溫和的領導人會將其當作壓制學生造反派的藉口。工作組限制了暴力的傳播，毛澤東對此似乎不以為然，也不願意看到學生造反派受到任何限制。8月23日，暴力活動達到最高峰，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對這一問題很不耐煩：「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急急忙忙做出決定，吃了很多虧，急急忙忙鬥左派……急急忙忙發呼籲書。」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也同意毛澤東的觀點。在8月下旬指揮社區派出所協助紅衛兵甄別「反動家庭」的一次會議上，他說：「群眾

<sup>33</sup> 同上，頁146。

<sup>34</sup> 接下來的幾段內容基於Walder (2009, 148–150)。

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8月21日和8月22日的兩份官方指示也表達了這種態度，並在全國範圍內傳達：地方部隊和警察方面嚴禁採取任何措施限制紅衛兵的行動。

考慮到毛澤東的態度，對紅衛兵暴力的限制就只能全靠紅衛兵自我約束了。<sup>35</sup>紅衛兵組織自我監管的努力在高中紅衛兵中滋生了嚴重的分歧，並促使其走向分裂。周恩來曾多次試圖限制紅衛兵運動帶來的破壞性影響，8月下旬，一個叫做「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團體宣佈成立。創立者之一是周恩來在國務院辦公廳的一個下屬的兒子。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能證明周恩來就是幕後主使，但該組織的立場與其高度相似，且周恩來在該組織成立後迅速提供了組織支持，二者的聯繫恐怕應該不只是巧合。「西糾」也成為紅衛兵組織的第一個跨校聯盟。

糾察隊規定了一套基本原則，堅持「非暴力鬥爭」的方式：「在今後的文化革命運動中，嚴禁打人，嚴禁體罰及變相體罰，嚴禁侮辱人，嚴禁逼供信。」這一禁令「沒有例外」，哪怕是對那些已經被認定為反革命分子的人。糾察隊也提供了明確的界定：「跪、趴、彎腰、負重、遊街、長時間站立、長時間舉手、長時間低頭等等都屬體罰及變相體罰，都不是我們所應採取的鬥爭方法。」被禁止的侮辱方式包括「掛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頭」等等。他們說的「逼供信」是什麼意思呢？「不注重調查研究，不注重事實證據，反而片面輕信口供，迷信口供，並用武鬥或威脅的方法逼人招供，逼出來了就信，這就叫逼供信。」

因為周恩來無法使用常規警力，糾察隊就成了他控制局勢的主要工具。周恩來通過國務院辦公廳建立了直接聯繫糾察隊的專線，並且派出國辦工作人員和這些組織進行溝通。在之後的天安門廣場集會上，周恩來邀請了糾察隊的一些成員登上主席台。他接見了糾察隊的領袖，並讓助手為糾察隊提供辦公場地、資金、制服、交通工具和打印設備。糾察隊的傳單也由國務院的印刷廠專門大規模印製。

<sup>35</sup> 接下來的幾段內容基於 Walder (2009, 150–153)。

糾察隊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在履行職責時，他們與來自大學的少數派造反分子產生了衝突。少數派闖入政府辦公室，抓捕先前擔任學校工作組成員的人，並把他們拉到批鬥會上去。這使得糾察隊潛移默化地和大學的多數派形成了暗中的聯盟，中央文革小組隨即採取強有力的反制措施，以重新調整和引導紅衛兵運動。這使得「西糾」的學生站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對立面。

## 造反派的崛起

在8月和9月，各大學的少數派都處於守勢。他們無法在校園論辯中佔得上風，便將目標轉移到了校園外面。行動的先鋒是兩所重要學校的少數派：「北航紅旗」和「地院東方紅」。前者大膽地在國防部門口發起了長時間靜坐抗議；後者則在地質部門口多次示威，最終闖入並佔領了地質部辦公樓。<sup>36</sup>

8月26日，「北航紅旗」在國防部門口靜坐，目的是讓曾進駐北航的工作組成員回到學校接受批鬥。當事人拒絕被拘留，在周恩來嘗試斡旋失敗之後，靜坐就一直持續到了9月中旬。8月23日起，「地院東方紅」也在地質部採取了類似行動，他們派去了大約千名成員，要求曾進駐地質學院的工作組領導回去參加批鬥會。當事人是地質部的一位高級官員，可以想見，這名官員自然也不願意去。「地院東方紅」隨後又兩次派人去地質部示威，並最終在9月19日攻佔了地質部大樓。

這些行動吸引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注意，認為可以借此改變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分裂的僵局。現在似乎可以鼓動大學紅衛兵衝擊政府部門，「揪出」先前的工作組成員，並最終打擊那些派出工作組的高級別「修正主義」官員。此前，中央文革小組從未成功地將大學紅衛兵真正團結起來，但到了這時他們重新制定了策略，開始公開支持少數派以反對他們的對手。

<sup>36</sup> 下一段基於 Walder (2009, 119–120)。

此時，新成立的高中糾察隊捲入了大學紅衛兵的派系鬥爭之中，自然成為中央文革小組計劃的絆腳石。<sup>37</sup>糾察隊崇拜人民解放軍，因為軍隊有鐵一般的紀律，糾察隊認為紅衛兵也應該如此，有自我約束的意識。此前，紅衛兵到國防部的解放軍總司令部外抗議示威，糾察隊對此感到十分憤慨。糾察隊反對暴力活動，而在對工作組官員的批鬥會上，少數派則常常訴諸暴力。8月31日，「西糾」宣佈成立並發出聲明僅六天之後，就展開了第一次公開的行動：國防部外的靜坐集會已持續到第二週，「西糾」的一個小分隊出現在「北航紅旗」面前，試圖強行驅逐抗議者，但卻被擊退。

9月7日，地質部發生了一場更具戲劇性的對峙事件，「地院東方紅」在此抗議已有三天。9月5日，當他們抵達地質部並要求交出工作組領導人時，「西糾」也來了，他們包圍了大學生，猛烈攻擊靜坐人群，用皮帶抽或是拿磚頭砸。「西糾」抓走了幾名抗議者，之後還發傳單譴責「地院東方紅」衝擊政府部門的行為。

此時的紅衛兵運動因派系鬥爭本就已經深度分裂，少數派的新嘗試雖然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由衷認可，但卻在校園裏遇到了不得不面對的更為強大的對手。他們所面對的，是高中紅衛兵第一個組織化的跨校聯盟，阻擋着少數派對黨政官僚體制的攻擊。更糟糕的是，糾察隊背後顯然有周恩來和其他反感暴力的黨內領導人的支持，因此才能迅速壯大，不需要警察和軍隊就能限制少數派的暴力活動。

221

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中央文革小組發起了一系列反制行動，在學生的派系鬥爭中選擇公開站隊，此舉大大影響了學生的造反運動。<sup>38</sup>如果造反要成功，既需要建立跨校聯盟，也要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明確支持。到9月底前，這兩項都已具備；到了10月中旬，造反派就開始反擊對手。9月6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三司」）成立。在此之前，中央文革小組並不明確支持紅衛兵運動的某個派系，並

<sup>37</sup> 下一段基於 Walder (2009, 156–157)。

<sup>38</sup> 接下來的幾段內容基於 Walder (2009, 157–163)，和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33–135)。

且多次呼籲，希望相互敵對的學生活派能夠團結起來。到了現在，中央文革小組放棄了這一立場，全心全意支持少數派，直接干預運動的走向。這一點在與紅衛兵的會議之中就能看得出來。

在這些會議之後，毛澤東也決定公開支持少數派陣營。9月21日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組接見了「北航紅旗」的學生領袖，對他們在國防部前的抗議表示支持。他們命令工作組負責人服從學生造反派的要求。同一週，「地院東方紅」的抗議者也衝進地質部大門，突擊搜查了工作組存放檔案的辦公室。他們砸開櫃子，把反對派學生的檔案都帶走了。「地院東方紅」於9月23日返回地質學院，從多數派手中奪權，並爭奪學校廣播系統的控制權，大規模爭鬥導致一百多人受傷。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少數派的消息迅速傳遍北京，整個城市的少數派都奪取了所在學校的廣播系統。局勢開始逆轉。

9月26日，在「三司」舉行的一次大規模集會上，中央文革小組正式公開地表示了對這一新造反聯盟的支持。周恩來發表了講話，重申了毛澤東對少數派的支持，為他們平反，並摘掉這些少數派先前被貼上的反黨標籤。為了解決他們最關心的問題（無疑是為了削弱他們為搜尋工作組領導而進一步衝擊部委的動機），周恩來宣佈所有這些人被收集上來的「黑材料」將不會留在他們的個人檔案中。

隨着學生運動的風向改變，新一批紅衛兵領袖迅速崛起。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清華大學突然高升的蒯大富，他之前只是清華少數派中的一個小角色，之所以能成名，是因為早先曾和中共副主席薄一波公開對抗，並指責劉少奇的夫人、參與了清華大學工作組的王光美。<sup>39</sup>儘管如此，蒯大富在清華少數派中仍不受重視，因為少數派的領袖認為他善變而魯莽，不值得嚴肅對待。

然而，中央文革小組要的就是蒯大富的魯莽和善變。蒯大富等公開挑戰薄一波和王光美，說明他敢於攻擊高層領導人，擁有挑戰幾乎所有人的意願。中央文革小組希望能夠通過學生運動打擊劉少奇的勢力，蒯

<sup>39</sup> Walder (2009, 67–73).

蒯大富自然是最佳人選。9月23日，張春橋單獨約見了蒯大富，鼓勵他成立新的造反組織，並且保證中央文革小組會予以支持。第二天，蒯大富就宣佈成立新的造反組織，此後迅速上升，爬上了造反運動的頂峰。

## 十月的轉折

10月3日，《紅旗》雜誌發表權威評論文章，明確了對首都「三司」的支持，這是一個決定性的轉變。這篇社論對文革的直接目標提出了新的定義，並對此前四個月的事件做出了新的評價。文章稱，工作組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部分，被那些反對毛澤東和試圖破壞文革的人所操縱。社論提到，「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並指出國家官僚組織中有更高級別的官員策劃了這場陰謀。<sup>40</sup>

為了將這條新路線的精神下達全國，毛澤東在10月的後三週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該會議的一大亮點就是陳伯達報告。事實上，報告文本由毛澤東本人事先反復修改，總結了文革運動的階段性進展。陳伯達描述了文革中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他指責某些幹部和紅衛兵試圖阻止這場運動，並改變文革路線。他為紅衛兵的暴力行為正名，否認紅衛兵「行事冒險」，稱他們不是「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和打砸搶分子」。陳伯達還攻擊了那些和工作組往來密切的紅衛兵，認為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反動立場」是由於出身革命幹部家庭而懷有的傲慢。<sup>41</sup>陳伯達將此類行為定性為「修正主義路線」，並歸咎於劉少奇和鄧小平。二人在黨內被進一步打壓。<sup>42</sup>

223

現在，學生運動的矛頭指向了那些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幹部——曾經試圖以任何形式轉移、緩和或者鎮壓學生激進運動的人都成為鬥爭對象。從陳伯達的發言中可以明顯看出，工作組先前以避免暴力活動為由限制紅衛兵行動，現在成為了批判的目標。同樣，那些曾與

<sup>40</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35).

<sup>41</sup> Walder (2009, 164–166).

<sup>42</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36–140).

工作組合作，且在之後事件中站在工作組一邊的紅衛兵也遭到批判，曾組織起來防止造反派打人和殺人的紅衛兵也未能倖免，被指控也和這條反動路線串通一氣。報告稱這些人至少是保守派，很可能是反動分子。這樣一來，曾在8月份的運動中衝在前列的學生積極分子被迫靠邊站，有些還遭到了侮辱。

那些此時還捍衛自己立場的多數派變得士氣低落，在學校裏失去了影響力。他們建立跨校聯盟的努力也失敗了。在北京乃至全中國，「紅衛兵」這一稱呼儘管沒有完全消失，看起來卻越來越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相關聯。而「造反派」一詞越來越受歡迎，成為學生組織的主流名稱，這反映了他們不同於第一批紅衛兵，因為後者和中央文革小組起過衝突。毛澤東和黨中央這時已經發話：這些早期的紅衛兵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勾結，他們最好和造反運動的新方向保持一致。北京各方反應迅速：這座城市很快就爆發了一場大浪潮，少數派衝擊政府部門，搜查工作組領導的辦公室並帶走檔案。在其他大城市裏，少數派的聯絡站向地方紅衛兵組織傳達了造反運動的新方向，鼓勵造反派攻擊省級和市級的幹部。

高中糾察隊此時也陷入了混亂。他們的立場顯然已經被毛澤東駁斥，周恩來也不得不放棄了他們，國務院辦公廳自然也不再提供支持。

224

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對於打殺受害者的行為採取了明顯漠不關心或看似暗中默許的態度，有鑑於此，一些糾察隊的老成員重新組成了更小的戰鬥隊，也開始加入使用暴力的行列。糾察隊作為一個市級跨校協調組織已經不復存在，不過學校自身的糾察隊們還在接下來的幾週裏維持凝聚力。包括許多早期紅衛兵運動的領袖在內的一些人準備進行最後的抵抗，這是對抗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大膽舉動，但注定會以失敗告終。

現在，中央文革小組已經介入學生運動，建立了新的聯盟，同時拯救了少數派。造反運動又活躍起來，但嚴重依賴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庇護和指令。二者的聯繫愈漸明顯和正式化。新造反聯盟中的學生領袖可獲得開展運動所需的資金和其他資源，中央文革小組的網絡也日益擴張，二者越來越牢固地整合起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訪問校園、

參加集會、發表講話、指導學生領袖和積極分子。特派員向中央文革小組看中的學生領袖傳達指示或直接下達命令，必要時還會威脅他們的對手。在接來下的幾個月裏，造反派領袖緊緊依靠幫助，從中獲取動向並尋求批准和指導。<sup>43</sup>

## 抵抗與鎮壓：紅衛兵的命運

多數派的前任領袖和試圖制止紅衛兵暴力的高中生們現在卻遭人唾棄，被貼上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盲從者的標籤。其中一些人開始反擊，他們模仿少數派早先反對工作組的做法，通過大字報、傳單以及新的跨校聯盟發起了反攻。他們把反對資產階級路線運動的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指責他們操縱學生運動，打壓異己觀點，鎮壓那些敢於批評他們的人。反擊運動攬亂了好幾所高校，學生們又激動地辯論起來，攻擊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出現了，這引發了對中央文革小組更為大膽的挑戰。中央文革小組的神聖權威遭到挑戰，那些新近被欽點的造反派追隨者自然憤怒無比。異見者的運動從11月中旬開始，方式愈發大膽。最終，中央文革小組對持異見者實施鎮壓。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紅衛兵運動就此終結。

225

這次運動的中心之一是北京航空學院，北航多數派紅衛兵抱怨說中央文革小組忽略了他們，還把他們當成「修正主義者」而置之不理。<sup>44</sup>他們把自己的遭遇比作工作組進駐時的少數派，並認為中央文革小組「蔑視群眾觀點、官僚主義、善於擺佈人、鎮壓學生運動，是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寫的一張大字報中說：「看來這些平時口口聲聲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也並未認清反動路線的所在……官氣十足的關鋒、戚本禹就根本不能代表毛主席了。」隨着運動升級，持異見的學生質疑中央文革小組本身，認為其形跡可疑，看起來像是一個地下黨組

<sup>43</sup> Walder (2009, 167–171).

<sup>44</sup> 接下來的幾段總結了在Walder (2009, 174–184) 中一段更長的描述。

織，密謀把國家和黨推入混亂之中。最具煽動性的大字報出現在12月中旬，指責中央文革小組把自己偽裝成左派，實則是為了策劃政變。

多數派的領袖在其他學校也紛紛效仿，挑戰中央文革小組。北京林業學院的一位前紅衛兵頭頭傳播了一張名為「踢開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毛主席鬧革命」的大字報，用了之前少數派反對工作組時相同的口號。他指出，中央文革小組在黨和國家體制裏沒有地位，也從未有人說過其免受他人的批評。如他所說，「文革小組成員坐在上面，做官當老爺，不深入下面，不調查……就是欽差大臣滿天飛，誇誇其談，亂發議論。見到中央首長講話就搶得要命，視為珍寶……中國只有毛主席才能領導。任何事物都要懷疑，懷疑一切。」

這些情緒也出現在高中校園裏的大字報和辯論之中。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原來北大附中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試圖組建一個新組織協調抵抗，這一組織被稱為「聯動」。這些創始人就是那些在8月份反對紅衛兵暴力時發佈了〈緊急呼籲書〉的學生，許多人曾在8月18日第一次紅衛兵大集會時和毛澤東一起出現在主席台上，可現在對中央文革小組公開表示反對。11月27日，他們首次開會並組成跨校聯盟，其成員都是想法一致的海淀區高中生，並在12月5日發佈了成立宣言。<sup>45</sup>

這場運動在北大引起不小的影響，在那裏，聶元梓仍宣稱自己擁有絕對權威，因為毛澤東對其「革命大字報」倍加讚許，聶元梓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是不可動搖的，在很多方面她確實如此。但是，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對聶元梓和她的追隨者來說卻不可忽視，讓他們感到不安。先前，聶元梓和她的團隊曾與北大工作組積極合作，他們從來沒有像其他學校的少數派一樣，領導一場抵抗運動趕走工作組。8月和9月北大紅衛兵運動興起時，聶元梓曾試圖對其實施絕對控制。她發號施令，彷彿自己的權威不可撼動，這導致那些要求自治的紅衛兵激進分子發起反抗。聶元梓表現出明顯的獨裁傾向，指控造反的學生犯有政治罪——她聲稱，反對她就是反對中央文革小組。這就疏遠了很大比例

<sup>45</sup> 接下來的幾段總結了在 Walder (2009, 184–186) 裏一段更長的描述。

的北大紅衛兵，使得很多最初支持聶元梓的人站到了她的對立面上，包括那張著名大字報的大部分合作者。北大被疏遠的造反派也效仿了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攻擊，以此為武器反對聶元梓。<sup>46</sup>

操縱學生運動的企圖遭到強烈抵制。毛澤東本想把學生造反塑造成信奉自己而唯命是從的工具，可現在這一舉措遭到了公開的挑戰，而毛澤東所信任的學生代表也被公然嘲諷。然而，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反抗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到12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組下令反擊。12月3日，《紅旗》刊登的社論指責，持異見者的運動是「一小撮走資派煽動的、對真正左派陣營的攻擊」。<sup>47</sup>社論呼籲對階級敵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

這開啟了新的造反派系諷刺性的轉變，這一抗議運動本來是為了反對工作組的獨裁做派，現在卻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狂熱支持者。12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接見了造反派領袖，學生們不禁問起該如何處理持異見者的挑戰。康生則對他們說：「我們必須實行對反革命的鎮壓，這是民主的最高形式……我們必須實行對反革命分子的專政……只有革命者才有言論自由。」

227

更具戲劇性的一幕隨後發生，12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再次反擊，江青在中學生積極分子大會上發言，為反對高中糾察隊的新運動奠定了基調：「這些所謂的糾察隊有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他們以貴族自居，以為血統高貴，盛氣凌人，什麼東西！」於是，江青作了一項令人驚訝的指控，公開批判在周恩來手下工作的幹部對糾察隊提供組織幫助和物資補給的行為。江青指責糾察隊自身應該對紅衛兵運動的殘酷和暴力負責：「我們一定要對這樣一小撮殺人犯、打人、破壞革命的罪犯堅決地實行專政。」江青扭曲了不少歷史，據她所言，糾察隊是「一群反動殺人犯組成的暴力團夥，他們從走資本主義反動路線、妨礙毛澤東的文革的官員那裏得到了幕後支持。」她聲稱，學生們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父母的革命傳統使之擁有貴族背景」，而他們的暴力行為則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這些特權而孤注一擲的選擇。

<sup>46</sup> Walder (2006, 1032–1034; 2009, 106–107).

<sup>47</sup> 接下來的內容基於 Walder (2009, 186–200)。

造反派現在感受到了中央對他們的期望，隨後便發起一波鎮壓浪潮。造反派學生抓捕了持異見的紅衛兵，並將他們移交給了公安機關。1967年1月，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稱「文革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那些在新加強的公安條例下被逮捕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公安警察散佈城市的各個角落，逮捕持異見的學生，給他們戴上手銬，然後把他們像被審判的罪犯一樣裝在卡車裏遊街示眾，成群的造反派學生在遊行隊伍經過市中心時便高呼口號。

中央文革小組覺得，有必要為自己的行為做一個詳細公開的辯護。

228 他們的批判運動完全忽略了來自異見者的批評，只關注糾察隊和「聯動」所謂的暴力和反動性質。這兩個組織被扣上「新法西斯主義」的帽子，被指控企圖保護資本主義復辟，是國務院官員策劃陰謀的一部分，這些官員曾幫助過糾察隊，並且通過他們與劉少奇和鄧小平有某種聯繫。實質上二人指導了這些行動，而直接涉及此事的周恩來卻得以全身而退。

運動如此尖銳，無疑是出於兩點：很多糾察隊和「聯動」的領袖都曾是全國聞名的紅衛兵，而他們是唯一公開站出來反對暴力的學生，但這一立場遭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斥責。這場運動中，中央文革小組似乎對暴力沒有責任，反而讓他們做出不支持暴力的姿態。批判運動在全國傳播的基調就反映在官方的小冊子中：「『聯動』分子瘋狂地實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毫不奇怪。『聯動』現在表現得很粗魯，像瘋狗一樣。不論誰是革命的，他們都反對。不論誰是反革命的，他們都支持。他們想要的只是全國的混亂。儘管他們獲得了莫斯科和華盛頓的小丑熱烈的掌聲和秘密的示好，他們早已被廣大群眾所唾棄。」

持異見的紅衛兵遭到鎮壓，這標誌着學生運動作為一支獨立政治力量的終結。而代表了這一趨勢的是朱成昭的命運，當時卻幾乎沒人注意到他。朱成昭是「地院東方紅」的一名頭頭，也是「首都三司」的締造者之一。在12月，他開始對運動的方向提出懷疑。朱成昭認為造反派已經實現了他們的主要目標：為遭受工作組打擊的學生平反，消除他們檔案中的「黑材料」，控制他們所在的學校，並且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明確支持。在和同僚的會面中，他抱怨說文革已經失去了群眾運動的特點。朱成昭認為，中央文革小組不是在發動一場群眾運動，而是在煽動群眾

互相鬥爭，或是如他所說，文革不是「群眾運動，是運動群眾。」朱成昭還抱怨說，對青少年紅衛兵和「聯動」這種組織實施的迫害太過極端。朱成昭的這些言論使他團隊中的其他成員感到無比震驚，其中一人隨後向中央文革小組告發此事。朱成昭之後失去了領導地位，並被關押起來。幾個月後，中央文革小組揭露了「朱成昭反革命集團的罪行」，還在學校組織了批鬥會。朱成昭被形容為「反革命右派分子」和「地院東方紅的叛徒」。他的「反革命集團」「惡毒地攻擊了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炮轟毛主席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參與了反革命政變的策劃，背叛國家、投靠敵人，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朱成昭之後在勞改營裏度過了十多年的光陰。<sup>48</sup>

## 造反派聯合的最終瓦解

北京的紅衛兵運動向其背後的支持者拋出了一系列令人頭疼的問題。首先是關於階級出身問題的情緒化分歧，中共對於階級出身實施的政策本身就概念模糊且自相矛盾，中央文革小組自己也解釋不清，陷入窘境。接下來是紅衛兵運動早期領袖的一系列聲明，他們對使用暴力的紅衛兵表示鄙視，稱其為「法西斯主義者」。然後是大學裏多數派和少數派的分裂，對抗使學生運動陷入僵局，讓學生中的激進分子再次互相攻擊。接着是糾察隊的成立，毛澤東命令禁止限制學生的暴力造反，但糾察隊巧妙地繞開了這一禁令，很快就與多數派達成默契，結為同盟。再往後，他們協力組織和宣傳新的造反派聯盟，並選出新一批學生領袖，試圖改變整個學生運動。最後，持異見的紅衛兵發起了極具攻擊性的反抗運動，公然挑戰中央文革小組，先前曾有「禁止暴力鎮壓學生激進分子或用公安力量摧毀持異見者」的命令，現在又不得不反悔。

可以想見的是，在這一切的過程中，毛澤東本想利用激進學生運動實現自身目標，但最終失去了信心。造反派只剩下了最後一次證明自己

---

<sup>48</sup> 同上，頁201–202。

價值的機會：在異見學生被鎮壓之後，造反運動得到加強，且有了紀律，似乎終於準備好執行他們最根本的任務：從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手中奪權。而這卻最終演變成一場徹徹底底的失敗。<sup>49</sup>

1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指示造反派頭頭從北京市當局手中奪權。聶元梓和蒯大富宣佈了成立北京公社的計劃，這是一種新的政府形式，是由毛澤東的忠誠支持者和造反派頭頭組成代表大會。然而計劃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之前，造反派頭頭是團結一致的，先是反對多數派，接着又壓制異見者。而現在，他們在奪取黨和政府部門權力的過程中成為了競爭對手。協調工作很快失敗，局面一派混亂。來自不同大學的「奪權小組」來到同一棟政府辦公大樓，爭論到底誰能優先奪權。在其他案例中，一所大學的造反派奪了某個政府部門的權，而另一所大學的造反派隨後而至，宣佈本該是自己來奪權，因此形成對峙。亂上加亂的是，大多數黨政機關其實早已有了由自己的工作人員組成的造反團體，而他們又總是分裂成不同派別。當學生造反派來奪權時，他們又相互爭吵，不知道該支持哪一方。

造反派頭頭對待自己的對手毫不寬容，他們將妥協和克制都視作修正主義。但這也就削弱了他們在奪權時團結起來的力量。到1月底，來自不同大學的學生造反派因為爭奪國家部委、政府機構和報刊媒體而陷入武鬥。造反派聯盟剛取得勝利，新的仇恨就開始在他們的領導人中滋長。來自地質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的造反分子結成了聯盟，並逐漸和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還有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形成公開的對立。讓局面變得更為混亂的是，為了針對北大聶元梓和清華蒯大富，地質學院和北師大的造反派還轉而支持在北大、清華校園裏那些反對聶蒯二人的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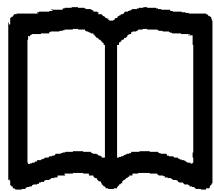
2月初的奪權計劃被迫取消。面對混亂的北京造反派運動，中央文革小組通知他們奪權到此為止。首都北京將不再由群眾來奪權。相反，北京將在行政命令下組建新的革命委員會，由公安部和北京衛戍部隊扮

<sup>49</sup> 這部分內容基於 Walder (2009, 203–217)。

演主要角色。<sup>50</sup>學生造反派失去了他們的機會。他們將不會成為在中國各地日益擴大的奪權運動中的領導力量。

---

<sup>50</sup> 同上，頁204–207。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瓦解和分裂

紅衛兵不斷製造麻煩，令毛澤東大失所望。他和中央文革小組不得不一次次干預紅衛兵的行動，使其保持團結一致，可每次他們解決了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畢竟，大學生只是數量很少的精英群體。1966年，全國共有7.4億人，而大學生只有不到67.5萬。這個群體規模太小，內部還四分五裂，無法對全國範圍內的黨組織產生預期的影響。考慮到這些，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決定轉而發動工人隊伍。

直到1966年11月，官方仍然不鼓勵城市工人建立自己的造反團體。11月10日，《人民日報》告誡工人要留在生產崗位上，不要離開工廠去「交流革命經驗」。正如之前試圖限制學生的暴力行為一樣，周恩來在與「群眾代表」的數十次會議中也竭力讓經濟領域免受文革的影響。但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卻漠視這一禁令，在與紅衛兵和工人積極分子的多次會面中，中央文革小組反覆強調革命意識對工業生產的積極作用。<sup>1</sup>

### 工人造反派

11月初，中央文革小組已經在幕後鼓動工人發起造反運動。11月6日，北京造反派學生成立在上海的聯絡站已經和上海市17個國營工廠中的

<sup>1</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41).

232 政治活躍分子會面，學生們傳達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消息。在他們的鼓勵下，工人們建立起一個叫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組織，並任命時年32歲的王洪文作為負責人。王洪文是工廠的保衛科黨員幹部，在6月裏起草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第一張大字報，並且與派到廠裏的工作組發生過衝突。<sup>2</sup>

該組織要求得到上海市委的承認，可以想見，上海市委拒絕了此事，不願看到這個類似獨立工會組織的成立。超過2,000名「工總司」的成員強佔了一列開往北京的火車，請求北京官方的支持。周恩來下令將火車停在上海市郊。工人們於是阻斷了連接上海和南京以及華北的鐵路，南北鐵道交通完全中斷。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之前是上海的官員，於是被派去談判。為了讓工人停止阻斷鐵路的行為並返回上海，張春橋答應了他們所有的要求：給予官方承認，並將事件責任歸咎於上海市委。<sup>3</sup>

張春橋的單方面行動讓中央文革小組的幾位同事感到吃驚，他們最初反對這一做法，但毛澤東卻很快表示同意。上海達成的協定是否標誌了全國政策的根本改變？到這時仍不得而知。周恩來召集了工業部部長和地區黨委的代表，徵求他們的意見。代表們強烈反對成立工人造反組織，認為由此造成的混亂將使生產陷入停滯。11月22日，周恩來將他們的意見呈送給毛澤東，但被拒絕。12月9日，北京終於發佈文件，確認工人有權成立自己的「革命組織」，但要求他們只能在工作之餘參與政治活動。隨後，另一份類似文件將這一政策擴大到集體農場。<sup>4</sup>

該項決定意義重大，從根本上擴大了全國造反運動的規模和範圍。1966年，全國有國營工廠和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共計5,200萬人，比大

<sup>2</sup> Perry and Li (1997, 31–33, 45–47). 北京大學的聶元梓也從11月中旬起在上海待了幾週，在此期間她鼓勵反對上海市委領導的造反運動 (Walder 2006, 1034; Wang 2001, 754–762)。

<sup>3</sup> Perry and Li (1997, 32–36).

<sup>4</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42–144).

學生總數多出75倍。<sup>5</sup>本質上說，毛澤東的這一做法等於開了綠燈，整個工業界的工人們都動員起來。這一影響立竿見影，且發展劇烈。1966年12月初，工人造反運動在全國迅速蔓延，學生運動卻被擠到了一邊。

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最初相信，工人更加聽從指揮，內部也會比學生更團結，可他們迅速意識到並不是這麼回事。很快，他們就遇到兩個問題。首先，工人們很快得出結論，認為是「修正主義」管理者導致了工人對工資發放和生活水平的不滿，他們認為這些人一味關注生產目標，犧牲工人的福利。建國後，中國從蘇聯學來的工業體系意味着工人的薪水很低，消費品短缺，住房也很緊張，而這是自1957年以來工人第一次有機會公開提出訴求，希望提高工資標準和生活水平。其次，大學和高中的黨組織在6月和7月被工作組摧毀後即陷入癱瘓，而與此不同，全國各地工廠裏的黨組織基本完好，並且仍然活躍。他們迅速網羅工人中的支持者，建立自己的造反團體，從而對抗其他造反派的破壞運動。工廠黨委的領導層內若是之前就存在某種對立，那就剛好借助派系林立的造反活動相互攻擊。工人造反運動因此迅速擴張，同時也像學生運動一樣四分五裂。鑑於工人規模要大得多，出現的問題自然更加嚴重。

## 地方政府的土崩瓦解

工廠工人分裂成幾個派系之後，工作時間禁止參加政治活動的禁令也難以繼續執行。工廠被內部衝突擾亂，而一些派系和其他企業中的盟友聯合起來，開始在工廠以外的地方進行武鬥。新生的造反派組織攻擊工廠幹部，在街頭擾亂交通和公共服務。隨即，黨員工人和工會積極分子也領導起自己的造反派，予以反制。<sup>6</sup>對於這些群眾運動，工廠幹部和市政當局幾乎沒有阻止。毛澤東現在既然已經批准工人組建起自己獨

<sup>5</sup> 國家統計局(1983, 123)。

<sup>6</sup> Walder (1996).

立的組織，地方當局很快就意識到由忠誠的工人團體組成的群眾動員符合自身利益。他們學會默許這些造反派的組建，為他們提供私下甚至是明面上的支持。

234 依靠工廠黨組織和工會所擁有的工人網絡和大量資源，這些忠於當局的組織以驚人速度成長，並對先前的造反派形成重大挑戰。在上海，「工總司」在11月中旬成立並得到承認後不久，一個叫做「上海赤衛隊」的反對派工人聯盟也宣佈成立，並且很快發動起成千上萬的普通工人走上街頭。<sup>7</sup>當造反派緩慢成長、在長期鬥爭中擴大隊伍時，忠於當局的組織卻依靠現有的黨內和工會網絡在非常短的時間內集結了大量成員。

在工廠層面，工人間的衝突和分歧往往反映了工廠領導的內部分歧。揚子江機械製造廠就是典型案例，本書曾在之前的章節裏描述過該廠，講到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分裂現象。1964年的運動將廠裏的領導層分裂成兩派，分別擁有第四機械工業部（四機部）和南京市委的支持。當文革蔓延到工廠裏時，之前被南京當局支持的黨員派系將支持他們的工人動員起來造反，意圖打倒與四機部結盟的幹部。由四機部支持的工廠幹部轉而動員起自己的擁護者，從而抵禦這些攻擊。工人造反運動在1966年11月和12月迅速發展，一邊尋求到了南京市委的支持，隨後加入到更大的市級造反聯盟中以保衛市委。而另一邊由四機部支持的幹部所動員起來的派系也加入到屬於自己一派的造反聯盟中，意圖推翻南京市當局。<sup>8</sup>

第二個後果就是經濟需求迅速上升。工人們要求提高工資標準和生活水平，而這就需要以犧牲投資為代價，破壞了照搬蘇聯工業化模式的核心。在上海，隨着「工總司」和「赤衛隊」的矛盾加劇，人們在經濟上的不滿情緒催生了上百個新的造反組織，他們主要的訴求就是獲得更高的

<sup>7</sup> Perry and Li (1997, 71–85). 杭州和武漢也有相似的發展，見Forster (1990, 20–29) 和 Wang (1995, 90–94) 的報告。

<sup>8</sup> Dong and Walder (2011a, 18–22). 工廠黨員幹部之間的分歧也決定了上海工人派系的分裂，這些分裂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就已開始並逐漸加劇(Perry and Li 1997, 30–31, 45–47, 132–136)。

工資和福利補貼，要得到永久城市戶口，分配到新公寓，想要調到新崗位或是更換工種。臨時工和合同工也組成造反組織，要求在國有部門獲得穩定的工作；而固定工則要求立即大幅提升多年未漲的工資；另外，在大躍進後的衰退期被分配到農村的工人要求回到他們原來在城市的工作崗位；工資微薄的學徒要求晉升和漲薪；在小型的非核心集體工廠和合作社中的工人則要求獲得之前只向國有部門崗位提供的醫療和福利。

235

工人將工廠和政府的幹部挾為人質，直到他們同意這些要求為止。許多情況下，他們被迫一次付清「串聯費」。工人的要求在12月迅速升級，先前只是充滿抱怨的小群體，現在擴展到隸屬於「工總司」和「赤衛隊」的大型造反組織。<sup>9</sup>這些要求表達了工人因計劃經濟而產生的不滿，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先前完全沒有預計到這些，他們也不希望事情會變成這樣。然而，這也恰恰印證了工業界官員們早前的預測，所以他們當初才堅決反對工人成立自己的獨立組織。

嚴重影響還不止這些，黨政機關中的職員迅速組成了造反組織。既然工人能造反，那就沒有理由約束文職管理部門和國家權力機構中的職員造反。哪怕是在黨政部門總部的辦公室職員也組織起了他們的造反派，指控所在單位的高層幹部，擾亂正常工作，或是和部門內的其他造反組織競爭，並且和外界的造反組織建立聯繫。隨着造反運動的擴散，黨員幹部甚至無法保證自己部門的職員還能聽自己的。<sup>10</sup>

到1966年底，中國的大城市很快變得一片混亂。工人們離開崗位，去參加反對地方黨組織的抗議活動，他們常常與那些支持地方黨組織的工人激戰。鐵路和輪渡服務被中斷；船隻無法在港口裝卸貨物；工廠也被迫關閉。自8月下旬以來，軍隊和安全部門收到禁令，不得干預造反活動。儘管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以武力鎮壓了持有異見的紅衛兵，這一禁令在地方上仍然有效，所以地方黨組織無法調動部隊。黨員幹部

236

<sup>9</sup> Perry and Li (1997, 97–111), Walder (1978, 39–46). Forster (1990, 27–28) 和 Wang (1995, 112–113) 提到杭州和武漢也有類似的趨勢。

<sup>10</sup> 案例見Dong and Walder (2011b, 428–430) 、Perry and Li (1997, 17–18, 86) 和Walder (2009, 203–207) 。

基本無法控制城市街頭的混亂局面，甚至逐漸喪失對自己部門職員的控制，他們向北京發出報告，稱自己的部門已經「癱瘓」。到這時，很多地方領導人實際上已經被造反派拘留，並不斷被送去參加群眾大會和「批鬥會」。<sup>11</sup>文革的意圖不可能僅僅是為了造成中國經濟和社會秩序的全面崩潰，必須繼續實施下一步舉措。

## 上海一月革命

上海在上述所有這些問題上都飽受摧殘。12月，「工總司」和「赤衛隊」的衝突升級，使整座城市陷入癱瘓。當「赤衛隊」最終意識到他們無法保衛上海市委時，他們放棄效忠上海市委，轉而調頭攻擊政府當局，情況變得愈發嚴重。12月23日，他們動員了30萬工人，在市中心舉行集會「批判上海市黨委的反動路線」。他們要求獲得上海市長的承認，後者立即同意。但是第二天，上海市長在「工總司」的強迫下又拒絕承認「赤衛隊」。此事一經廣播報道，兩三萬「赤衛隊」成員包圍了上海市委的辦公處，要求和市長當面對質。

12月29日，「工總司」動員了將近十萬人包圍「赤衛隊」的抗議者。一場暴力武鬥隨之發生，「赤衛隊」人數上處於劣勢，因此遭受重創。12月31日，大約兩萬名「赤衛隊」成員沿着通向北京的鐵路遊行抗議。當他們到達上海郊區時，遭到大量「工總司」人員的襲擊。這場戰鬥再次阻斷了進出上海的鐵路交通。工人不是離開工作崗位去街頭遊行，就是在工作地點進行武鬥，工廠、交通樞紐和碼頭都陷入癱瘓。造反派工人包圍工廠幹部，要求他們交出現金，後者別無選擇，只能服從。國有單位銀行賬戶上的錢很快被取光，到了工人手裏。工人們一時間獲得大筆現金，立馬湧入零售店採購。很快，本就稀缺的消費品全部售空。食品短缺隨之出現，市民們急忙出門想去銀行裏取錢，公共交通又隨即陷入癱瘓。<sup>12</sup>

<sup>11</sup> 見Dong and Walder (2010, 679–680)、Forster (1990, 24–32)和Walder (1978, 35–36)。

<sup>12</sup> Perry and Li (1997, 86–88, 114–116), Walder (1978, 46–50).

面對這番混亂的局面，一場精心策劃的「奪權」運動開始了，旨在恢復社會秩序和工業生產，同時將上海黨政領導替換成忠於毛澤東路線的幹部。1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和姚文元飛抵上海。他們與「工總司」協調行動，授權造反派接管主要媒體並命令他們發表社論，要求恢復秩序。這些社論聲稱，上海當局通過煽動派系鬥爭、引誘工人提出經濟要求，企圖阻撓文革，而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另一種表現形式。<sup>13</sup>張春橋要求「工總司」在1月6日組織一場群眾集會，「推翻上海市委」。這場集會有十萬人參加，黨委第一書記、市長和上海市委的其他主要領導人都在台上低着頭，被迫接受批判。<sup>14</sup>

此舉有效地瓦解了上海市委。很快，56個成員中有45人被免職；市長和所有七名副市長都被罷免。1月9日，上海地方報紙以「工總司」和其他造反組織的名義發佈了一則〈緊急通告〉，頒佈一系列恢復穩定的措施。人們在經濟上的訴求受到譴責，並被批判成「修正主義的陰謀」。毛澤東告訴中央文革小組，上海造反派的行動是正確的，而且整個國家需要「學習上海經驗，一致行動起來」。1月12日，一份賀電發至全國各地，對上海的奪權運動大加讚賞，並且鼓勵其他地方也採取類似行動。「赤衛隊」則發表了一份題為〈向毛主席請罪書〉的聲明作為回應，為他們之前反對「工總司」的行為道歉。<sup>15</sup>

張春橋在1月19日宣佈，新的市政權力機構取名為「上海市人民公社」。然而，也許是因為造反派學生創立的「北京公社」最後搞得一塌糊塗，2月中旬，毛澤東告訴張春橋名字應改為「革命委員會」，張春橋遵命，在2月23日宣佈更名。革委會中，張春橋是主任，姚文元是第一副主任，而「工總司」的頭頭王洪文則是他們的重要幫手。<sup>16</sup>

<sup>13</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63–164), Walder (1978, 51–57).

<sup>14</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64–165), Perry and Li (1997, 89).

<sup>15</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65–166).

<sup>16</sup> 同上，頁166–169；Perry and Li (1996, 126–127), Walder (1978, 60–63). 在1976年，這三個領導人以及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以「四人幫」的名義被肅清。

238

張春橋明確表示，現在權力「已經掌握在真正的革命者手中」，禁止對權威提出進一步的挑戰。張春橋命令造反派撤出街頭，回去工作。從8月的禁令到現在，他頭一回部署軍隊維持秩序，防止人們對權力機構的進一步衝擊。他從南京軍區調動部隊，還派出忠於自己的工人派系民兵在街上巡邏，維持秩序。<sup>17</sup>

學生和工人造反派中都存在反對張春橋奪權的聲音。第一個挑戰來自一個叫做「紅革會」的大型學生造反派聯盟。他們的領導人對這場奪權深表懷疑。因為有軍隊的支持，奪權運動看起來更像是一場被「革命」的空洞口號所掩蓋的暴力鎮壓。畢竟，張春橋自己就是上海市委一位頗具資歷的成員。此外，他還把最先攻擊上海市委的學生晾在一邊，反而與「工總司」合作。1月27日，在與張春橋、姚文元的會議中，「紅革會」將兩人圍困了六小時，試圖迫使他們為調用軍隊鎮壓造反派而道歉。雖然張春橋和姚文元沒有作任何妥協，最後還是被釋放了，但第二天學生激進分子就綁架了張春橋的一名重要副手，把他關在復旦大學的校園裏。張春橋派軍隊前去解救。學生們於是分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攻擊張春橋派來鎮壓學生運動的軍隊。作為回應，張春橋動員工人在公共場所巡邏，防止人們進一步表達異議。中央文革小組拍發了一份公開電報，稱對張春橋的攻擊是「完全錯誤」的，並警告那些堅持己見的人，再繼續下去「將會有嚴重後果」。學生造反派很快就放棄了他們的進攻。<sup>18</sup>

同樣地，張春橋還面對來自「工總司」盟友派系的挑戰。有好幾個組織反對計劃中的上海公社，因為他們未能參與組建公社的談判過程，因此拒絕解散，不願被整合進「工總司」。耿金章是造反派系「二兵團」的負責人，他動員了人數眾多的工人聯盟，公開挑戰王洪文，還宣佈要成立另一個公社。2月下旬，公安部隊逮捕了耿金章，解散了他的兵團。從那時起，上海再也沒有大派系之間的街頭武鬥。雖然派系衝突仍

<sup>17</sup> Walder (1978, 51–63).

<sup>18</sup> Perry and Li (1997, 20–21), Walder (1978, 60).

然存在，但都被限制在個別工廠之內。<sup>19</sup>毛澤東堅定不移地支持上海的奪權運動，允許部署公安部隊和地方民兵，使得上海在中國大部分地方公共秩序崩潰之時成為一片相對穩定的綠洲。

## 地方奪權

上海的一月革命成為全國其他地方的榜樣，似乎可以說這是一場群眾運動的結果。幾個較大的群眾組織支持張春橋，而他們的頭頭也被吸收進新的權力機構。張春橋是毛澤東可以信賴的激進分子，他長期支持毛澤東的倡議，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最終，上海一系列事件表明：在當權派被推翻後，奪權運動可以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秩序。全國各地的造反派收到指示，以類似方式奪取權力。

雖然上海激發起全國的奪權運動，但黑龍江則為新的權力架構提供了一個被認可的名字：「革命委員會」。有趣的是，時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在奪權過程中未受影響，之後組建了一個包含造反組織領導人、革命幹部以及軍隊幹部的新政府。潘復生當時剛剛來到黑龍江，在1965年10月才從別處調到這裏。所以，他和地方領導人沒有什麼牢固的關係，也不用對黑龍江原先領導的行為負責。潘復生從一開始就公開歡迎學生造反，和周邊在位更久的同事保持距離，表現得像是當地紅衛兵的支持者。8月中旬，他在哈爾濱主持了大規模的紅衛兵集會，模仿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的角色。當學生指控省裏的高級幹部時，他欣然同意，甚至主持了幾場對其他省級高層領導人的批鬥會。當1月下旬造反組織叫囂着要奪權時，潘復生也公開歡迎他們。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批准下，他於1月31日成立了一個新的權力結構，自己任一把手。也有好幾個大的造反組織提出反對，但是潘復生派遣了軍隊前去鎮壓。中央文革小組在2月2日正式批准了這個新的地方政府。<sup>20</sup>比起「公社」，毛澤東更

<sup>19</sup> Perry and Li (1997, 119–144), Walder (1978, 58–59).

<sup>20</sup> Bu (2008, 390–39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71) 提到潘復生一開始讓一個群眾組織的頭頭擔任最高職位，但卻被更高層否決。

240 喜歡「革命委員會」，學生們之前沒能辦好「北京公社」，他也因此很反對「上海公社」這個名字。

對那些迫切希望遏制文革破壞性一面的人來說，奪權對他們更有吸引力。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周恩來當初就反對工人加入，現在，周恩來積極支持1967年1月的奪權風暴，因為他認為這是擺脫混亂秩序的唯一途徑，於是開始鼓勵全國其他地方的奪權行動。在南京，造反派頭頭仍然猶豫不決時，周恩來直接打電話讓他們從江蘇省黨委手中奪權。<sup>21</sup>然而，他的舉動卻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猜疑，他們認為周恩來突然表現出的左傾熱情，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違背了原則，僅僅是為了恢復現狀。中央文革小組擔心，由周恩來策劃的奪權可能會成為恢復現狀的幌子。兩邊的政治立場之間存在緊張關係，這將會使成立新權力機構的鬥爭一直持續到1968年，中國各省的混亂和暴力程度在未來還會進一步加劇。

上海模式如果在全國範圍推廣，顯然會讓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覺得文革已經取得了勝利，這看起來似乎正是他們在1967年初所期待的。一開始，他們遵循上海和黑龍江的套路，取得了一些成功：先找到一名對毛澤東路線忠心耿耿的高級官員，確保他能夠獲得當地相當一部分造反力量的支持，然後讓其負責奪權。到2月中，又有三個省份以這種方式奪權並獲得認可：貴州、山東和山西。在每個省，北京的官員都能找到一個資歷足夠深的地方官員，且此人已經展示出對中央文革小組行動計劃的絕對忠誠，還有來自造反派的大量支持。每個省的奪權行動都引起了反對的聲音，這和上海的情況一樣，每個省的新任領導人在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都部署了武裝部隊前往鎮壓反對派。<sup>22</sup>

在這之後，奪權運動陷入停滯。一直到8月份都沒有其他革命委員會被批准，而這一年剩下的時間裏也就只有一個新的省級革委會獲得批

<sup>21</sup> Dong and Walder (2010, 678–682).

<sup>22</sup> Bu (2008, 306–307, 383–39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98, 124–125), Wang (2001, 750–753).

准。在其他地區策劃奪權的努力未能成功，中央文革小組要麼無法找到一個可以信賴的高級官員帶頭，要麼是造反派分裂嚴重、勢均力敵，無法發動足夠的力量成功奪權。當其餘省份的政治局勢懸而未決時，軍隊就被調來維持秩序。如果省級的奪權行動沒有得到批准，更低層級的奪權自然無法開展，這意味着一系列問題在基層都沒有得到解決。

241

江蘇的情況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中的激進成員持截然不同的態度，奪權的造反派為此飽受困擾，而前者一直在協調奪權談判。1月初，該省大部分的高層領導都被造反派控制，而交通樞紐和碼頭都因為街頭武鬥完全癱瘓，周恩來打電話給當地的造反派要求他們奪權。可是，數天談判都無法確定新權力機構人選，一些造反派頭頭之後便決定自己單獨行動。在地方武裝力量的支持和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的同意下，他們在1月25日宣佈奪權。沒有參與奪權的造反派立即抗議，還衝擊了地方黨報的大樓，阻止公佈奪權通告。奪了權的造反派滿懷期待，等着北京的批准，但首都那邊卻一直沒有回覆。相反，周恩來命令他們去北京談判，解決造反陣營中的分裂問題，促成內部團結。各派的頭頭組成大型代表團，來到北京參加和周恩來以及其他高層領導人的激烈談判，但雙方無法就哪一位高級官員擔任政府新領導的問題達成一致。最終，談判陷入僵局。而江蘇從3月初起就被置於軍事管制之下，實質上這是一種維持穩定的策略。當問題解決之前，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受命維持秩序。<sup>23</sup>

廣東的情況也很類似，只不過奪權採取了不同的形式。和江蘇一樣，城市裏的大型造反運動無法就奪權達成統一。當一個造反派組織在沒有得到其他造反組織同意的情況下就開始自己奪權時，會被其他造反組織邊緣化。不過，廣東的奪權運動採取了一種特殊的方式。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或許是想模仿黑龍江的潘復生，在造反派前來奪權時表示歡迎。趙紫陽同意交出權力，並承諾他的領導班子和職工會在造反派的監督下繼續工作。這樣既能保證奪權成功，同時也能維持秩序。造反派同

242

<sup>23</sup> Dong and Walder (2010).

意了，這一安排顯然很受周恩來讚許，他在北京稱：這是未來奪權的首選形式。但是，落後的造反派馬上反對這種安排，稱之為「假奪權」，因為省裏的高級領導都還在位。這一指控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共鳴，他們同意這個說法，並且支持這些造反派的主張。周恩來試圖通過談判達成協議，但最終無果，被迫將廣東置於軍事管制之下。<sup>24</sup>

## 軍隊干預的後果

因為造反派一貫的分裂傾向，軍隊的支持對穩定新權力機構就顯得至關重要。已經獲准成立的第一批省級革命委員會對此心知肚明，而其他省份宣佈奪權成功的造反派也急切地尋求軍隊的支持。在1月最後一週，毛澤東批示林彪，呼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隨之下達了一份指示，要求「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要求軍隊援助，軍隊都應當派出部隊積極支持他們。」隨後關於澄清如何執行這一指示的請求促使毛澤東1月28日又下達了一道命令，禁止群眾組織衝擊軍事設施，並且授權地方指揮員鎮壓「右派」和「反革命組織」。<sup>25</sup>

這一關鍵的命令推翻了1966年8月頒佈的禁止人民解放軍干預造反運動的禁令。軍事管制改變了軍隊和奪權造反派之間的關係，一旦宣佈軍事管制，軍隊就有了更大的權威。如果該省還沒有一個被北京批准的革委會，那麼軍隊幹部就沒有地方文職部門指導行動（這不像上海和黑龍江），軍方被迫自己來判斷不同造反派的主張，若有地方造反組織不服從軍事管制，軍方也要自己考慮該怎麼辦。中國的大部分地區情況都與此類似，軍事管制並沒有加快革命委員會的形成，反而無意中將軍隊拖入了地方的派系衝突中。分裂的局面不斷加劇延長，進一步推遲了革命委員會的成立。

243

1967年1月下旬，軍隊「支左」命令頒佈後兩個月間的事態發展進一

<sup>24</sup> Yan (2014).

<sup>25</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75–177).

步奠定了派系暴力的基礎。造反組織和武裝部隊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衝突。當解放軍實施軍事管制時，面對的是已經佔領了辦公樓和其他公共設施的造反組織。儘管這些奪權者還沒有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認可，但造反派認為他們的奪權合理合法，並經常試圖捍衛奪權成果。當軍隊接管戰略地點時，便削弱了已奪權造反派的影響，無意中加強了那些在奪權中落後的造反派的力量。這擾亂了地方對抗勢力之間的平衡。正因如此，當軍隊欲接管戰略地點時，他們常常遭到據守造反派的強烈反抗。<sup>26</sup>

這些衝突後果嚴重。失去戰略地點控制權的造反組織常常將軍隊的行為解讀為對群眾運動的非法鎮壓。他們很明白，失去戰略地點就失去了他們的奪權勢力，他們害怕這會削弱他們與其他造反派的競爭實力。當衝突演變為暴力時，隨之而來的是逮捕，這深埋下了派系對立的種子。

在最初的衝突中，遭受打擊的造反派經常動員起他們的成員，包圍軍隊大院進行抗議，策劃抵抗軍隊的運動。這些對峙可能會變得非常危險，尤其是對造反派這一邊。2月末，青海一處軍營外就發生了一起屠殺169名造反分子的事件，新疆、內蒙古和河南的槍擊事件也造成了平民傷亡。相比於死傷的個案，更常見的是對抵抗軍隊的造反組織的大規模逮捕。在四川，造反派包圍成都軍區司令部，後來成千上萬人因此被捕。在廣州和南京，衝突並不那麼激烈，但也導致宣稱奪權的派系成員被捕入獄。<sup>27</sup>那些堅持暴力抵抗的造反組織則被貼上「反革命分子」的標籤，他們的頭頭和積極分子被監禁，而組織則被取締。

為了支持已獲准成立的革委會，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並沒有覺得軍隊暴力鎮壓有什麼不對，認為軍隊在上海、黑龍江還有其他地方保衛新權力架構的行為正當合理，甚至很有必要。在這種情況下，有組織的抵抗都被視為非法行為；軍隊的行動是為了保衛文革的地區性勝利果實。然而，北京還在試圖釐清不同造反派不同的主張時，軍隊已經在地

<sup>26</sup> 案例參見Dong and Walder (2011b)。

<sup>27</sup> Dong and Walder (2011a, 2011b),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77–181), Yan (2014).

方上積極鎮壓造反派，這會破壞當地的權力平衡。對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很多人來說，這場運動是他們鼓勵和培育了好幾個月的成果，現在軍隊的介入讓毛澤東開始擔心起來：軍方的政治立場尚不明確，現在他們正用自己的方式強行解決地方衝突，文革可能會因此過早結束。1967年2月中旬舉行的黨內領導人會議上，這些擔憂進一步加劇，一些最高級別的軍隊將領就文革造成的混亂憤怒地質問中央文革小組成員。<sup>28</sup>林彪可能是毛澤東最忠實的副手，但其他軍事官員似乎對文革造反沒有那麼熱衷，地方指揮員尤其如此。

到3月中旬，毛澤東斷定軍隊已經做得太過了，他們的行為大大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已經達到了毛澤東無法接受的程度。他下令逮捕了幾名地區指揮員，並且肅清了有問題的地方部隊。4月6日，林彪為了回應毛澤東的擔憂，對軍隊下達了一道新的指示，扭轉了1月命令中的重點。林彪要求軍隊決不能向群眾組織開火，並停止逮捕群眾。軍隊不得取締群眾組織，也不能將其貼上反革命的標籤，已經取締的造反組織要馬上恢復，已經貼上的政治標籤則相應取消。在未來，只有北京官方才有權這麼做，反對解放軍與否將不再是判斷一個群眾組織是不是「真左派」的標準。<sup>29</sup>

這些命令迫使軍隊收斂已經強硬施行的軍事管制，並導致在2月和3月遭到打擊的造反派組織東山再起。這也帶來了意外的後果，因為實際局勢已經發生了變化。當造反派頭頭和他們的追隨者獲釋之後，造反組織很快恢復，也摘掉了反動的標籤。但是，想要他們假裝過去兩個月裏什麼事都沒發生，這絕對不可能。現在，他們對地方軍隊指揮員深感不滿，一是因為他們在其手中遭受打壓；更為重要的是，當他們的組織被鎮壓時，他們作為奪權領導人的權力被壓制了。雖然4月6日的指令禁止了軍事鎮壓，但是被釋放的造反派現在有了一個嶄新的而且更為迫切的政治目標：重新獲得他們在軍隊手中衰退的影響和威望，並削減軍事管制。

<sup>28</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91–197).

<sup>29</sup> 同上，頁180–182。

此外還有一個微妙的變化，同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軍隊無意間也將自己捲入派系衝突之中。奪權運動幾乎總是會有反對的聲音，被邊緣化或被排斥在外的造反派自然會不滿意。上海發生的事情就是如此：「二兵團」和「紅革會」都反對「工總司」策劃的奪權。因為有毛澤東的明確支持，新的上海當局自信地部署軍隊前去鎮壓反對派。可在中國其他地方，情況則完全不同，反對派奪權後苦苦等待北京的批准，卻始終未得消息，在這種情況下，一派成功奪權，別的造反派則持不同意見，因此十分歡迎軍方介入，制約奪權者的行動。這些未能奪權的造反派認為軍事管制非常適宜，因為武裝部隊拒絕承認已奪權造反派的主張。而到了4月份，這些被軍隊鎮壓的造反派系得以重新崛起，獲得了之前的權力和地位，開始表達對軍隊的不滿。而那些始終未能奪權的造反派這時感到必須站在軍隊這一邊，因為軍方的行動間接地幫助了他們。新的派系衝突由此奠定了基礎：反對軍隊和支持軍隊的造反組織之間開始醞釀新的鬥爭。

## 派系暴力的基礎

1967年的夏天，實施軍事管制的行動無意中帶來了暴力元素。在南京，造反運動分裂為兩派，一派支持奪權（「好派」），另一派反對奪權（「屁派」）。<sup>30</sup> 2月份，兩派在北京的談判宣告失敗，中央文革小組偏向「屁派」的主張。這一派系中頗有一些南京最著名的造反派頭頭，在秋天反對江蘇省黨委的運動中就為中央文革小組所熟知。當軍隊對南京的戰略地點實施軍事管制時，「好派」的隊伍與之發生衝突，隨後一部分人被逮捕，「好派」就開始抗議軍隊的做法。而另一方面，「屁派」覺得軍隊的行動無可指摘。

246

4月初，禁止武裝部隊鎮壓造反派的指示頒佈，衝突的核心開始發生變化。「好派」和「屁派」之間的衝突除了奪權之外，現在加入了另一個根本分歧：對待軍隊的態度。當「好派」的頭頭從監獄中獲釋後，他

<sup>30</sup> 這一描述基於 Dong and Walder (2010, 2011b)。

們發起了反對軍隊「錯誤路線」的運動。「屁派」則站在軍隊這一邊。雙方勢均力敵，而「屁派」和軍隊之間有更密切的聯繫。這兩個造反聯盟之間關於奪權和軍事管制的對抗在春末升級，雙方開始爭奪學校、辦公樓和其他地點。街頭武鬥更為普遍，而「好派」指責軍隊在幕後支持「屁派」。4月的指示命令軍隊撤出，所以軍隊很少干預雙方的武鬥，兩派間的暴力便不受約束。

在這時，中央文革小組從支持「屁派」轉而支持「好派」。他們起初支持「屁派」中的知名造反分子，但中央文革小組現在擔心軍隊會撲滅造反的火勢，「好派」對南京軍區的衝擊正好符合中央文革小組的新行動，而「屁派」現在則支持軍隊。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央文革小組開始和「好派」合作，加強對軍隊的抵抗，而江蘇軍方則發現自己陷入了不斷發展的派系鬥爭之中。在4月新指示下達之後，軍隊不再有權力制止雙方的街頭武鬥。這就引發了更大規模的暴力事件。

廣州的事態與南京大致相同。當地的造反派在1月末奪權運動中因相同原因而產生分裂。<sup>31</sup>被排除在奪權運動之外的造反派指控這是一場「假奪權」，因為其保護了那些之前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官員。這一說法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共鳴，尤其是周恩來將廣州的奪權捧為模範之後。中央文革小組在2月的北京談判中支持反對奪權的派系。當談判陷入僵局後，軍事管制在2月底開始施行。南京發生的一切以同樣的次序在廣州上演。奪了權的造反派抵抗軍事管制，遭到逮捕，組織也被取締。另一派造反派則贊同軍隊的行動。當4月指示要求軍隊釋放被捕造反派時，他們動員起來攻擊軍隊，贏得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兩派現在更為勢均力敵，雙方衝突在全省各地升級。反對軍隊的造反派被稱為「紅旗」，而支持軍隊的一方則被稱為「東風」。<sup>32</sup>

<sup>31</sup> 這一描述基於 Yan (2014)。

<sup>32</sup> 同樣的分裂也出現在杭州的造反派中。和武裝部隊發生衝突並最終反對軍事管制的一派叫做「聯總」，而避免和軍隊發生衝突並在之後支持他們行動的一派叫做「紅暴」(Bu 2008, 414–416; Forster 1990, 29–33; Jin 2000, 242–246)。

在武漢，造反派圍繞一月奪權也同樣經歷了最初的分裂過程，但之後的事件發生了非常不同的轉向，並且產生了巨大的全國性影響。在湖北，造反派就奪權中的代表權問題而分裂，在奪權中佔上風的派系和地方軍隊產生衝突，後被譴責和鎮壓。<sup>33</sup> 3月下旬，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在北京和周恩來還有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會面，而他們一致認為佔主導地位的造反派行為是不正確的，並且不能容忍造反派對軍隊的攻擊。陳再道從這些指示中獲得信心，返回武漢並指揮了一場異常激烈的運動，鎮壓抵抗軍隊的造反派，逮捕他們的頭頭和大量追隨者，摧毀了該組織，並將許多成員批判為反革命分子。

站在對立面的派系則支持軍隊的行動，檢舉和批判先前佔主導地位的派系成員。然而，他們也很快與軍隊發生了衝突。3月初，他們在自己仍然掌控的《湖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警告軍隊對其對手的鎮壓不應誤導保守派，讓他們誤認為現狀將會繼續維持下去。出乎造反派預料的是，軍方將這篇社論解讀為對他們的攻擊，便迅速奪取了報社的控制權並迫使其領導進行自我批評。現在，這邊的造反派系也已失勢。

軍隊開始穩定公共秩序、恢復生產。依靠在之前幾個月裏被嚴重打擊的黨組織和工會，他們在工廠裏建立了「促生產」隊伍。新的造反組織在成員身份和政治立場上比較像之前的「上海赤衛隊」，後者當時被動員起來保衛上海市委。這些組織堅定地支持軍方在武漢恢復秩序。<sup>34</sup>

248

4月6日對軍隊的指示發佈後，武漢軍方先前的行動正是指示中明令禁止的。這就給了造反派東山再起的決心，他們在攻擊陳再道將軍的運動中又一次聯合起來。被取締的造反組織又建立起來，並宣告重生，他們在城裏遊行，突襲了兩大日報的辦公樓，還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絕食抗議，要求釋放在押成員。<sup>35</sup>

與南京、廣州和杭州不同的是，1967年5月和6月在武漢發展起來的新派系並不是像先前一樣分成敵對的兩派。造反派已經聯合起來對抗

<sup>33</sup> Wang (1995, 113–121).

<sup>34</sup> 同上，頁121–128。

<sup>35</sup> 同上，頁128–132。

軍隊，而另一個叫做「百萬雄師」的全新聯盟則組建起來站在軍隊這一邊，並且和黨組織、安全部門還有民兵都有密切聯繫。東山再起的武漢造反派開始對武漢軍區發起進攻，在全市發動絕食抗議，要求釋放被監禁的成員，並且要求重新承認他們先前被取締的組織。5月初，造反派和軍隊之間爆發了小型的衝突。軍方釋放了一些被關押的造反分子，但是堅定地認為取締造反組織的決定是正確的。在5月和6月間，造反派重建並擴大了他們的組織，而「百萬雄師」也同時壯大起來，堅定支持當地軍方。<sup>36</sup>

兩派勢力不斷壯大，而軍隊此時無法使用武力，沒有什麼辦法能夠限制不斷升級的派系暴力武鬥。記錄顯示，5月末開始就有人在武鬥中喪命，而大規模暴力還在後面。到這時，每個派系都開始武裝自己，主要使用棍棒和長矛，並開始佔領樓房、辦公室和工廠等地，增強自己的實力以反抗對手的攻擊。「百萬雄師」有一個明顯的優勢，他們由退伍老兵組成了有紀律的部隊，並且接管了城區裏的好幾個工廠以及市委總部。武漢軍方多次呼籲結束街頭暴力，但是因為無法使用武力，他們的呼籲無人重視。

武漢成為了一個戰場，整個城市都在進行街頭武鬥。根據造反派統計的數字，在5月和6月間共發生174起暴力衝突，涉及7萬多人，導致158人死亡、超過千人嚴重負傷。「百萬雄師」在6月發起了對造反派的大規模攻勢，系統性地奪取了造反派手中的地區。據稱有數十人死亡，而受傷的人更多。造反派也陷入了混亂。6月23日，「百萬雄師」佔領了主要造反組織的司令部，在此過程中死亡25人。武漢造反派走到了徹底失敗的邊緣。<sup>37</sup>

密切關注這些事件的中央文革小組對造反派的困境感到震驚。6月26日，他們向武漢軍區發去了一份緊急電報，命令陳再道阻止對造反派的進一步攻擊。電報批評了「百萬雄師」，並警告稱那些打死人的必將受

<sup>36</sup> 同上，頁138–141。

<sup>37</sup> 同上，頁144–146、148。

到懲罰。兩派被請到北京參加談判。「百萬雄師」行動受限，街頭武鬥得到控制，而兩派代表也各自準備在北京為自己進行辯護。<sup>38</sup>

## 武漢事件

談判地點很快轉移回了武漢，因為毛澤東突然開始了對南部省份的視察，武漢是第一站。毛澤東於7月13日秘密抵達武漢，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一同前來，隨後周恩來也加入其中。王力和謝富治在當地一所大學會見了造反派，消息一下子在全城傳開。<sup>39</sup>毛澤東在7月15日和16日決定了方案，被鎮壓的反對派應得以恢復，並受到平等對待，「百萬雄師」也不應該被解散，但定性為「保守派組織」，而武漢軍區的領導應該對自己的錯誤進行自我批評。在接下來的幾天裏，謝富治和王力向軍隊指揮員和群眾組織傳達了這些指示的要點。消息在全城傳開，造反派主張強調對「百萬雄師」和軍方的批評，而在王力對軍官的一次講話中沒能把握好分寸，加強了這種印象，讓人覺得毛主席的這一決定更傾向於批評「百萬雄師」，似乎代表了「百萬雄師」的徹底失敗，他們的頭頭和積極分子深感憤怒，其中很多人拒絕相信這是毛澤東的最後裁決。很多人將問題歸咎於王力，認為他該對此負責，而同情「百萬雄師」的士兵也持此觀點。<sup>40</sup>

250

7月20日晚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後來被稱為「武漢事件」。當晚，一批同情「百萬雄師」而心懷不滿的士兵闖入謝富治和王力的住處，對他們動粗，還綁架王力作為人質。毛澤東此時就住在附近的一棟別墅裏，士兵的突然侵入引起了他的警覺，考慮到自己的安全，毛澤東趕緊離開了武漢，乘飛機前往上海。有謠言說，中央文革小組否認了王力的觀點，毛澤東也改變先前的說辭。「百萬雄師」在全城舉辦慶祝遊行，還張貼了批判王力的標語。王力最後被轉移到軍隊關押，並於7月22日獲釋。王

<sup>38</sup> 同上，頁147–148。

<sup>39</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06–208), Wang (1995, 149–150).

<sup>40</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08–210), Wang (1995, 150–154).

力拖着一條被打斷的腿和傷痕累累的身軀飛回北京，像英雄歸來一樣受到熱烈歡迎。<sup>41</sup>

北京對王力歸來的反應震驚了原本處於歡呼雀躍中的「百萬雄師」。7月20日晚上的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政變」，全國各地都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聲討「武漢的反動分子」。7月27日，北京發佈了一封公開信，號召武漢人民行動起來，與武漢軍區的「壞頭頭」和「百萬雄師」作鬥爭。陳再道和他的下屬被遣送北京，被指控試圖發動軍事政變。「百萬雄師」被頻頻譴責，並迅速瓦解，退出政治舞台。重新得勢的造反派開始攻擊曾經的「百萬雄師」成員。在未來幾個月裏，造反派進行了血腥的報復，僅在武漢就有超過600人被殺害，約6.6萬人遭受永久性的傷害。<sup>42</sup>在「百萬雄師」被擊敗後，造反派因為權力分配而不和，再度走向分裂，無法達成妥協。而新的軍事當局採取了不干涉的態度，造反派兩邊都極大地擴張自己的勢力，並恢復了他們的暴力對抗。<sup>43</sup>

## 充滿暴力的1967年之夏

「武漢事件」引發了對軍隊政策的根本轉變。7月3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共同刊發社論，號召「揪軍中一小撮走資派」。社論表明了對造反派的強力支持，後者開始挑戰地方軍事指揮員。全國範圍內，軍隊發現自己面臨新的衝擊。那些與軍方有衝突的派系開始利用這場運動，從而在派系鬥爭中取得上風。在武漢和其他地方，造反派立即開始了一場搶奪軍事裝備的運動。先前的指示命令軍隊不得向群眾組織開火，民眾自發組織起來搶奪武器時，軍方就很難控制局面。在此期間，毛澤東本人號召「武裝左派」，以便與敵人作鬥爭，而一些地方軍隊則開始向他們認可的造反派系提供武器和彈藥。<sup>44</sup>

<sup>41</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10–212), Wang (1995, 154–157).

<sup>42</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12–214), Wang (1995, 165–166).

<sup>43</sup> Wang (1995, 170–175).

<sup>44</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14–216), Schoenhals (2005, 279–282).

事態在全國各地產生了爆炸性影響。1967年的8月和9月，造反派之間的武鬥和造反派對軍隊的攻擊都達到了頂峰。在重慶，一次動用軍隊武器的武鬥捲入了大約一萬名戰鬥人員，導致了近千人的傷亡。另一場武鬥甚至使用了坦克和大炮，重慶的一個港口區被夷為平地。長江的航運因此中斷超過六週。<sup>45</sup>在9月的前幾天，長江港口城市瀘州爆發了一場大規模武鬥。超過三萬人參與其中，並使用了軍隊的武器，導致二千多人死亡。該市的大部分地區都被摧毀，港口地區的碼頭更是被夷為平地。<sup>46</sup>

在江蘇，許世友的部隊自4月以來就一直處於守勢。「好派」和「屁派」的武鬥在6月升級，「好派」發起一系列突襲，衝擊軍方手下的公安局辦公樓。在武漢事件發生後，中央文革小組在地方上的代表鼓勵「好派」直接攻擊許世友。他們指控許世友是「江蘇的陳再道」，說他必須被「揪出來」。許世友明白自己的危險處境，在心腹下屬的護送下，許世友撤到鄰省安徽的一個秘密軍事基地。反對許世友的造反派認為很快就可以推翻當地的軍事領導，於是成立革命委員會。而當派系鬥爭失控時，江蘇的軍隊仍然駐紮在兵營裏，按兵不動。<sup>47</sup>

在廣州，「紅旗」一派受到武漢事件的鼓舞，加強了對敵方「東風」一派和廣州軍區的攻擊。使用了軍隊武器的大範圍武鬥在廣州和周邊地區爆發，8月中旬，在工會大樓發生了一場長達四小時的槍戰，船廠和碼頭倉庫的兩場武鬥中甚至用上了槍枝、炸彈和手榴彈。在其中一場武鬥中，太古糖倉被焚毀，燒壞了所有的精煉糖。<sup>48</sup>在浙江，兩派之間的戰鬥也在升級。雙方都搶奪了武器彈藥，或是從支持他們的部隊手中獲得武器。在港口城市溫州，一場激鬥將市中心的大片商業區燒為平地。被敵方派系俘虜的人員遭受折磨甚至處決。因為軍隊不能使用武力，所以也就無法控制該省的局勢。<sup>49</sup>

<sup>284–289), Wang (1995, 161–163).</sup>

<sup>45</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17).

<sup>46</sup> Schoenhals (2005, 292–293).

<sup>47</sup> Dong and Walder (2011b).

<sup>48</sup> 廣東縣志編纂委員會；Hai (1971, 150 –175).

<sup>49</sup> Forster (1990, 44–50).

由於中央文革小組對攻擊地方軍事指揮官表現出強烈的支持，軍隊因此開始出現嚴重的內部分裂跡象。南京軍區的許世友就面對來自其下屬空軍部隊和其他一些軍官的挑戰，而江蘇其他地方的軍隊也公開支持帶頭攻擊他的造反派。<sup>50</sup>浙江的情況也是如此，不同的軍隊在地方鬥爭中支持不同的派系。在杭州，空軍和一些地面部隊承諾支持「聯總」攻擊浙江軍區和軍事管制委員會的領導。<sup>51</sup>

毛澤東在匆忙逃離武漢後仍住在上海，他在整個8月裏都注視着這些省份的動態，但似乎還沒有決定該如何回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鼓勵造反派攻擊軍隊，並傳達毛澤東的指令，要去給代表左派的群眾組織分發武器。此舉不僅沒有恢復地區派系鬥爭的平衡，反而導致了更多的破壞和傷亡。更糟糕的是，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地方軍事部隊內部有嚴重的政治分歧，在派系鬥爭中積極介入，支持不同的派別，這也有可能會導致軍隊自身的瓦解。一些革命委員會在1967年初成立，鎮壓了一部分造反派，現在這些組織又重建起來，挑戰革委會。毛澤東在8月的講話中似乎透露出一種穩坐釣魚台的輕鬆，好像這一切都照着只有他才知道的宏偉計劃在進行。實際上，毛澤東已經開始審視最近的一系列決定，發現這些舉措不僅沒有解決老的問題，反而產生新的麻煩。

253

## 建立新秩序

8月末，毛澤東再次改變路線。他表達了對「揪軍中一小撮走資派」口號的疑慮。8月30日，毛澤東下令逮捕並公開羞辱幾名中央文革小組中參與了攻擊軍隊的激進分子，包括因「武漢事件」而出名的王力，還有其他幾名曾為反抗軍隊的造反運動提供支持的工作人員。<sup>52</sup>這些人成了毛澤東武裝造反派和允許攻擊軍隊決策的替罪羊。看到毛澤東立場的明顯轉向，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著名成員，特別是張春橋和江青，很快

<sup>50</sup> Dong and Walder (2011b).

<sup>51</sup> Forster (1990, 4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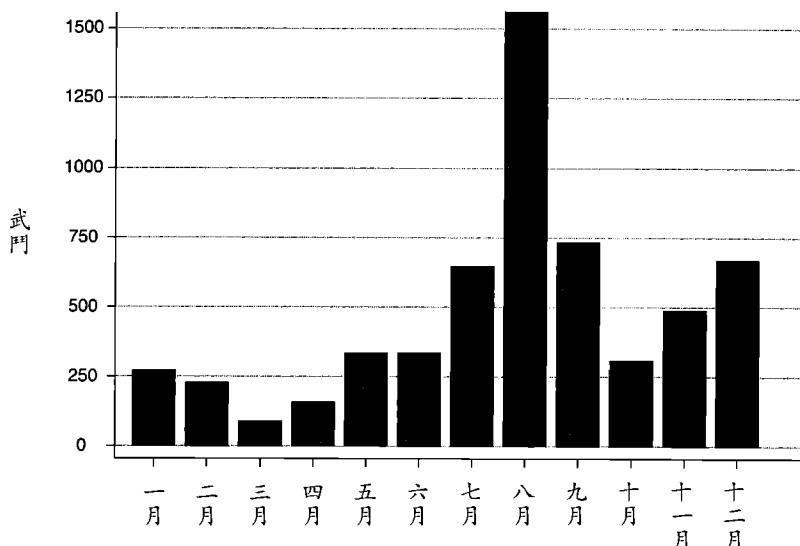
<sup>52</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29–233), Schoenhals (2005, 296).

就撤回了他們對各省造反派的支持。<sup>53</sup>毛澤東命令軍隊停止分發武器，並從造反派手中收回武器彈藥。軍方收到指示，如果造反派以武力抵抗，軍隊就有「開槍自衛的權利」。<sup>54</sup>

這在江蘇這樣的省份產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響。8月16日，仍在上海的毛澤東命令張春橋飛往許世友在安徽的藏身之處，並親自護送他到上海。第二天，毛澤東會見許世友，向他保證不管是許世友個人還是南京軍區這個組織都不會有事。張春橋很快命令他在南京的造反派聯盟停止攻擊許世友的部隊。周恩來利用毛澤東的態度轉變，在和地方造反派的多次會面中強調，現在應停止對解放軍的攻擊。周恩來毫不含糊地命令南京造反派停止他們的運動。兩派雖然照做，但是仍然彼此不合。<sup>55</sup>

圖 11.1 1967 年暴力衝突的次數(按月計算)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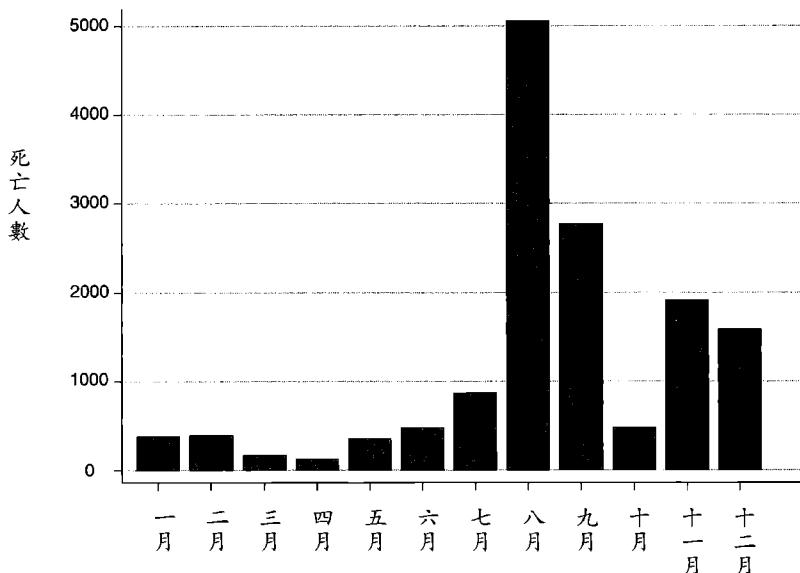
數據來源：Walder (2014)

<sup>53</sup> Dong and Walder (2011b, 437–438).

<sup>54</sup> Schoenhals (2005, 297).

<sup>55</sup> Dong and Walder (2011b, 438).

圖 11.2 1967 年政治運動中的死亡人數（按月計算）



數據來源：Walder (2014)

圖 11.1 展示了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號召武裝造反派並鼓勵攻擊地方軍隊的影響。造反派之間的武鬥和對政府辦公樓、軍隊設施的衝擊在 1967 年 8 月激增，9 月份毛澤東改變立場，開始大力支持地方軍事指揮員，暴力事件次數迅速回落到先前水平。向造反派分發軍事裝備的影響則更大。圖 11.2 顯示，向武鬥人員分發武器後，派系衝突變得更加致命。1967 年 7 到 8 月，有記錄的武鬥次數只增加了兩倍多，但因為這些衝突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卻足足增加了五倍。想要從造反派手中收回武器也十分困難，這意味着 8 月之後每月的死亡人數仍然遠高於之前的水平。

毛澤東最終放棄了操縱地方造反組織與軍隊之間衝突的想法，覺得此舉無法取得他想要的成果。到 1967 年 9 月，毛澤東得出結論，恢復秩序的唯一辦法就是依靠軍隊。上海模式已死。隨着革命委員會的成立，相應的最高職位幾乎都被軍事指揮員佔據，而且軍官也在處理安全和宣傳工作的重要部門中佔據主導地位。這些結果讓造反派頭頭非常失望，

他們本來想和上海的造反派頭頭一樣獲得重要職位。然而在1967年大部分時間裏，全國各地爆發的暴力衝突使得不論哪派的造反派頭頭都不可能真正獲得實權要職。他們曾帶頭攻擊軍隊，現在算是落到了軍方的手裏。

在軍事管制下，重建政治秩序在很多省份都是漫長而充滿爭議的。建立一個革命委員會需要六步。第一，武鬥的群眾派系和他們的軍方支持者必須停火；第二，代表們需要前往北京，並在北京當局的監督下做自我批評，然後討論如何解決分裂的問題。第三，就新革委會的人員名單達成一致，更準確地說，是迫使代表團接受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決定的革委會人選。第四，批判並罷免那些不願意妥協或放棄武鬥的派系頭頭。第五，建立新的權力機構，禁止那些跨單位或跨學校活動的群眾組織。第六步也是最後一步，讓他們回到地方上，在更下級的市、區和縣重複這一過程，在學校和單位裏開展批評運動，從而打破派系關係，建立新的領導機構，加強軍隊的權威。

江蘇省就是一個典型案例。<sup>56</sup> 9月4日，在毛澤東要求造反派停止攻擊許世友將軍後不久，周恩來力勸兩個造反聯盟簽署停火協議，並命令江蘇軍事管制委員會派代表到北京。敵對的各派系在南京和江蘇其他重要城市選出了一百八十多名代表。曾積極攻擊許世友以及支持許世友的兩派軍官也分別成立了各自的代表團。

256

談判從「學習班」開始，每一派都被要求就他們之前幾個月中的行為做出自我批評，但這些會議總是頻繁地陷入激烈的爭論中。談判無意中又重新點燃了南京和江蘇其他城市的街頭武鬥，因為每一派都想增加自己的實際勢力，以提高自己在談判桌上的籌碼。反對許世友的派系堅持對許世友的指控。激烈的會議一直持續到12月，考驗着周恩來和康生等領導人的耐心，他們在許多場合都生氣地譴責了固執的代表們。12月，談判還是處於僵局，武鬥沿着滬寧鐵路沿線重新爆發，鐵路交通再次中斷多日，這也使得軍隊走向分裂，各自支持他們的造反派盟友。

---

<sup>56</sup> 這一描述基於Dong and Walder (2012a)。

經歷了四個月激烈而徒勞的談判後，毛澤東發話了，逮捕許世友在軍隊裏的敵人，以及支持這些人的造反派頭頭，並將其批判為煽動派系鬥爭的「黑手」。這些人在南京舉行的大規模集會上被批鬥，受到粗暴對待。地方媒體對這些人及其追隨者展開了尖銳的批判。「煽動衝擊軍隊」現在成為一種罪名，將受到嚴厲懲罰。在北京的代表和他們在當地的追隨者們受到威脅，禁止他們追求進一步的派系鬥爭目標。中央軍委處罰並轉移了那些參與過反對許世友戰鬥的軍官和部隊。這一場鎮壓最終結束了在北京的爭論，並熄滅了江蘇的派系鬥爭之火，中央的集權性決策讓這場持續四個月的談判終於在 1968 年 1 月結束。

1968 年 2 月，在肅清了反對許世友的激進造反派和軍官之後，新代表團在北京開會，選舉產生江蘇革命委員會。到這時，其實已經沒有什麼開會的必要了，因為毛澤東已經決定讓許世友領導江蘇革委會，而唯一真正的問題是將哪些前江蘇高層黨政領導納入新的班子。經過短暫的討價還價，周恩來諮詢許世友後與其達成共識，將擬定的人選報給代表團，名單在 3 月 20 日獲得一致通過。名義上說，新革委會的 165 名成員中大多數都是「群眾代表」，但其實造反派成員基本沒有實權。革委會很少召開全體會議，其「常務委員會」倒是經常會面並做出重要決定。而常委會完全被軍隊官員掌控，他們在革委會成員數量中只佔不到五分之一，但壟斷了所有的關鍵職位。許世友是革委會一把手，而四個副手中除了原省委書記彭沖，其餘都是軍官。負責政治、生產和安全等關鍵部門的也都是軍官。沒有一個造反派頭頭被任命為副手。每個造反派系中各有一個突出的頭頭被任命為 39 名常委中的一員，可沒人有真正的實權。許世友和他手下的軍隊繼續將江蘇置於牢牢的軍事管制之下。

江蘇省革委會是 29 個省級革委會中第 17 個成立的。最後一個是 1968 年 8 月成立的廣西革委會。廣西省毗鄰越南，發生了嚴重而持久的武鬥，絲毫沒有回應中央對停火談判的呼籲。後來廣西派往北京的談判團本身也受到了暴力的影響：廣西的軍隊司令韋國清在他的賓館裏受到造反派的襲擊和毆打，後者也從廣西趕來與他對質。廣西的造反派結成了兩個省級的派系大聯盟。一派叫做「四二二」，他們反對韋國清，但得

到了駐紮在省會南寧的解放軍主力的支持，後者直接聽命於北京。「聯指」支持韋國清，同時他手下的軍隊也表示支持。因為軍方各自支持不同的造反派聯盟，北京的談判就陷入了僵局。

毛澤東的耐心已經到頭了。7月3日，一份措辭強硬的文件下令，嚴厲鎮壓廣西任何一個抵制軍事管制的組織，而支持「四二二」的解放軍主力也被調離該地區。造反派仍然控制着南寧，韋國清發起了總進攻。他的軍隊在7月中旬轟炸了南寧，摧毀了該市的大部分地區。戰鬥在南寧持續了兩週，導致5萬人無家可歸，1萬多人被捕，後來超過2,300人被處決。<sup>57</sup>

這次進攻由解放軍正規部隊和全副武裝的「聯指」戰鬥人員在全省發起。戰鬥隨後深入到農村地區，觸發小城鎮和村莊內的大屠殺，有些看起來和省裏兩大派的衝突根本沒什麼關係。<sup>58</sup>在賓陽縣，7月26日至8月6日，所有的公社都發生了大規模屠殺，共有3,681人慘遭殺害。而賓陽縣在整個文革期間被殺人數一共是3,951人，其中93%都發生在這短短的11天裏。<sup>59</sup>在東蘭縣，「聯指」的頭頭和他們的軍隊盟友動員了3,000名武鬥成員，在縣裏清洗了他們的敵人，逮捕1萬多人，處決1,016人。<sup>60</sup>

廣西的暴力事件摧毀了造反派的有生力量，並最終使得中國的大部分地區置於嚴厲的軍事管制之下。在29個省中，解放軍將領獲得了其中20個省的管轄權。在廣東、遼寧、山西、雲南和湖北，軍隊領導了81%至98%的縣級以上革委會。<sup>61</sup>在江蘇，軍隊領導了所有的區級單位和下級68個縣中的60個。<sup>62</sup>軍管實際上已經取代了中國的黨政體制。那些曾經抵抗過軍事管制的造反派現在已經完全處於軍隊的掌控之下。

<sup>57</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44–245).

<sup>58</sup> Su (2011).

<sup>59</sup>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 (1990, 116 –117)。

<sup>60</sup> 同上，頁125。

<sup>61</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45–246).

<sup>62</sup> Dong and Walder (2012b, 901).

## 北京苦澀的結局

在當局試圖於各省建立「大聯盟」的幾個月裏，在首都北京的學生造反派也出現了同樣的派系鬥爭。大學造反派分裂成兩大聯盟，分別叫做「天派」和「地派」。衝突的主要焦點集中在兩個最大的校園：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這兩所學校的造反派因為聶元梓（北大）和蒯大富（清華）領導權爭議而分裂。聶元梓和蒯大富是「天派」的領導人，而地質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的造反派則是「地派」的中堅力量。他們堅定地支持聶元梓和蒯大富的反對者。<sup>63</sup>

「天派」和「地派」之間的對立從1967年初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組頭疼的問題。儘管聶元梓和蒯大富在1966年底作為首都造反運動的典範而成了全國名人，現在卻變成了政治包袱。兩人的行事都在各自學校裏引發了造反運動的內部分裂。而「天派」和「地派」在全北京的僵局逐漸演變成校園暴力衝突。為了籌辦革命委員會，造反派一邊招募自己的人選，一邊攻擊那些倒向另一派的人。他們開始逮捕囚犯，還設立了審訊室來逼供。造反派先鞏固好自己控制下的學校大樓，並繼續搶奪學校裏的地盤。到1968年春天，北大和清華的校園裏就好像在進行着一場內戰，沒有任何權威部門可以調解雙方的暴力衝突。<sup>64</sup>

北京大學的衝突在1968年3月到達頂峰，「地派」的一大批造反分子在校園裏遊行，要求揪出聶元梓。聶元梓組織她的戰鬥人員前去抵抗，隨後幾天裏，武鬥開始爆發，上千名「地派」和「天派」的增援人員加入了戰鬥。<sup>65</sup>雙方的衝突仍在繼續，互相的指責也變得更加咄咄逼人。4月時，聶元梓的人佔據了上風。對手只能掘壕固守，她看起來似乎站在了勝利邊緣。聶元梓的反對者試圖躲在防禦工事後繼續堅持，並停止了小報的發行。當他們試圖恢復水電、並向自己的地盤運送食物時，衝突隨即爆發。聶元梓的手下扣押並審訊任何他們能抓到的反對者，還讓他

<sup>63</sup> Walder (2009, 204–222).

<sup>64</sup> 同上，頁223–242。

<sup>65</sup> 對北大和清華最後戰鬥的描述基於Walder (2009, 242–245)。

們參加公開批鬥會。有好幾人都被折磨致死。4月底，聶元梓舉辦了一系列公開審判，批鬥那些被她逮捕的造反派頭頭。她還設立了監獄，在裏面關押了超過200名幹部和教師，這些人常常被毆打折磨，受到刑訊逼供。

聶元梓不容任何妥協，並要求對方徹底投降。臨近7月末，她準備進行最後的戰鬥。她的人手切斷了對方地盤的水電供應，用瓦片、長矛和磚頭展開戰鬥，一直打到附近的街道上。7月27日，聶元梓聽說一大批工人和士兵包圍了隔壁的清華大學之後，她召開緊急會議協調對策，囤積了燃燒瓶和其他武器，還部署了哨崗。然而，在7月28日凌晨3點，聶元梓被叫到人民大會堂參加緊急會議。260

叫聶元梓去開會的原因正是那天清華發生的事件。蒯大富和對手之間的鬥爭早就發展成了暴力武裝衝突。從5月初起，清華校園裏大樓防守堅固，陣地犬牙交錯，處於攻勢的始終是蒯大富一方。一開始，學生們用棍棒、長矛、匕首、磚頭和彈弓武裝起來，受傷人數不斷增加。臨近4月底發生了第一起死亡事件。5月初，對方陣營的成員抬着遇害者的屍體去天安門廣場遊行，在那裏舉行抗議集會。接着是一系列小型校園衝突，又導致兩人死亡，多人受傷，而俘虜則被殘忍毆打。在其中一個頭頭被殺後，反對派在5月末又舉行了一次遊行，帶着屍體上天安門廣場抗議。

5月30日，事情出現轉折。在一次進攻反對派所佔大樓的襲擊中，雙方使用了長矛、刀具、燃燒瓶和手榴彈，甚至還用上了一輛自製坦克。蒯大富的部下放火燒了這幢樓，並在反對派戰鬥人員試圖逃離時捕獲他們。在這場長達11小時的武鬥結束後，三名學生喪命，超過300人負傷。蒯大富的部下獲得了步槍，在校門和被包圍的樓房進出口部署狙擊手，開始瞄準那些試圖離開或進入的人。衝突仍在繼續，越來越多的手榴彈、燃燒彈、土炮和工程專業學生設計建造的土坦克投入其中。蒯大富的對手陷入絕望，向北京市革委會反覆求救，希望將清華戒嚴。7月7日，他們又帶了一具戰友的屍體上天安門廣場遊行請命。可戰鬥仍在繼續，7月9日，校園裏的一幢剛建不久的新大樓幾乎被燒毀。到7月

末，已有12人被殺，好幾百人受了重傷。學校裏大部分人都逃走了，估計不到400名頑固的武鬥分子還留在校園裏。

毛澤東這時已經對蒯大富和北京的學生造反派失去了耐心，很難想像他們在兩年前還是毛澤東看重的人選。毛命令負責保護國家領導人安全的精銳部隊派出軍官從附近六十多個工廠中召集上千名工人，並組建一個由軍官組成的領導核心，動員起將近三萬人的力量於次日早晨聚集於清華校外。他們只帶着《毛主席語錄》，因為毛澤東不希望武裝軍人進入校園並用致命武器鎮壓造反派。因此，這支浩浩蕩蕩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走進校門，高呼毛澤東的語錄，把雙方隔離開來，並開始清除路障和防禦工事。

蒯大富認為這一舉動是為了竊取自己的勝利果實，並宣佈是黨內領導層中的黑手派來的工人隊伍。他命令追隨者發起抵抗。在長達12小時的衝突中，手無寸鐵的工人和士兵試圖進入建築、勸說蒯大富的戰鬥人員解除武裝，卻遭到蒯大富方面的襲擊。最終，蒯大富還是選擇了投降，可這時他們已經殺了宣傳隊中的5名成員，並使其中超過700人受傷。

當清華的敵對情緒逐漸減弱時，蒯大富、聶元梓和其他三名來自「天派」和「地派」的著名紅衛兵頭頭被叫到人民大會堂參加緊急會議。當他們在7月28日凌晨時分抵達時，面對的是以毛澤東本人為首的一批高層官員，其中包括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遭受嚴重清洗後的整個黨內最高領導班子幾乎都來了。會議從凌晨3點半開始，足足持續了五個小時。

經過編輯的會議記錄後來被印成小冊子公佈。在會議記錄中，毛澤東相繼表現出操心、諷刺、威脅和憤怒的心情。<sup>66</sup>組織這次緊急會議顯然是因為清華所發生的一切。而會議剛開始，毛澤東就對蒯大富表示強烈不滿。蒯大富遲到了，毛澤東頻頻詢問此人為何還未到場。會議開始後，毛澤東馬上說明了召開會議的目的：「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

---

<sup>66</sup> 這段毛澤東和紅衛兵領袖的交鋒基於 Walder (2009, 245–247)。

人去鎮壓、壓迫紅衛兵，黑手是什麼？現在抓不出來，黑手就是我嘛！」雖然毛澤東的講話帶着他特有的凌亂邏輯，但中心意思很明確：紅衛兵運動到此為止。毛澤東對他們的行為深感失望，大學校園也將被置於軍事管制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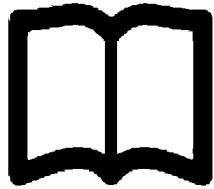
這一消息作為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以五位紅衛兵領袖的名義下達全國，其中引用了毛澤東的原話：「現在是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希望你們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麼兩派。」毛澤東明確表示，主要的錯誤，就是持續的派系武鬥：

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脫離了農民，脫離了部隊，脫離了居民，脫離了學生的大多數。

毛澤東明確表示他的耐心也已經到頭了：

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佈告，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紅衛兵被告知立刻返回校園，等着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到來。到8月末，北京市革委會和衛戍部隊向北京的大學校園派去了1萬多名士兵和1.7萬名工人。當這些看過去有點像1966年工作組的宣傳隊到達校園時，學生們發現文革彷彿又回到了原點。不過，宣傳隊可不容忍任何反對或批判。幾乎每個工宣隊都由軍官領導，他們毫不含糊地建立起自己的權威。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軍事管控

1967至1968年劇烈的社會動盪之後，人們都認為軍事管制和革命委員會將會「讓社會重歸秩序」。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一新階段發生了劇烈而扭曲的社會變革，新的迫害運動無論在規模還是在劇烈程度上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大批城市學生和官員被下放到鄉村，從事體力勞動。大學關門，政府機構空無一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了新的頂點，與集體性宗教膜拜幾乎無異。數百萬人被投進監獄，面對刑訊、虐待，或是在搜捕政治陰謀假想敵的行動中被處決，亦或是選擇自殺。這些運動所造成的死傷遠遠超過了紅衛兵的狂暴行動和造反派聯盟之間的派系武鬥所造成的破壞。

### 清除造反組織

軍隊領導下的思想宣傳隊抵達後，開始強制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紅衛兵和造反派領袖這才幡然醒悟。這些宣傳隊裏有工廠工人和部隊軍官，擁有軍管會的支持。宣傳隊的目的不是宣佈誰贏誰輸，也無意再讓運動積極分子繼續做政治秀。宣傳隊認為，造反派沒能實現大串聯，雙方都犯下嚴重的政治錯誤，因此必須進行再教育，坦白自己的罪行，並強制參加「學習班」。這一再教育過程的口號是「鬥批改」，軍管會採取了一系列系統的措施，來消除造反派頭頭的影響。切斷了他們與其他學

校和單位同盟間的溝通，並穩步地消除他們在學校、工廠和政府部門的派系隸屬關係。

「鬥批改」運動是一場強制性的運動，包含相互批評、思想改造等環節。在這場運動中，近幾年來的派系分裂被消除。在強制參加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中，各級派系領導人被強制要求寫下對自己的批評，承認在群眾運動中犯下的錯誤。學習班的指導員會詳細評估這些懺悔，學員也要相互做出批評。相互批評常常揭露沒有被人們坦白的新錯誤，那些不願意承認罪責的人就會被拖去參加由軍隊官員組織的批鬥大會。舉辦學習班的理想結果是將組織充分改造，讓人們成為團結、守紀、服從的人民公僕，服務於領袖毛澤東，因為他成功化解了分製造反派的派系觀念。

全國知名的造反派領袖也沒能倖免，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北大聶元梓的案例，她因為寫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獲得毛澤東的讚譽，也是北京革委會委員，可此時卻受盡屈辱。<sup>1</sup>1968年7月與毛澤東的那場會面標誌着紅衛兵運動的結束，會後，聶元梓回到大學校園，她的派系下的報紙發表了一篇社論，「熱烈歡迎」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進駐。宣傳隊於8月中旬進駐北大後，事態急轉直下。聶元梓一派的派系報紙被立刻關停，宣傳隊要求所有人交出武器，解散鬥爭工作，士兵控制了所有播音設備，釋放了所有被關押在私設監獄的囚犯，並要求各方不得再相互攻擊。聶元梓很快得到消息：她必須反思自己強制鎮壓批評意見、造成並持續暴力分裂的作為。

雙方派系的領導都被強制參加學習班，坦白自己在過去運動中所犯的錯誤。然而聶元梓拒絕承認所犯下的嚴重錯誤，依然堅持抨擊自己的對手。10月，宣傳隊召開了三千多人參與的批鬥大會，指責聶元梓反抗宣傳隊。11月下旬，聶元梓又受到大會批鬥，指責她的「資本主義立場」和「腐化偽善的作風」。

1969年9月，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最終成立，軍隊幹部擔任一把

<sup>1</sup> 這一說法基於 Walder (2006, 1044–1045; 2009, 247–248)。

手。在六位副手中，有三名是軍隊幹部，一名是宣傳隊的工人，其餘兩名才是大學方面的人物，聶元梓就是其中的一位。這一舉措實際上就是擺擺樣子：毛澤東曾經公開讚揚這位大字報寫手，必須給這樣一個標誌性的人物留足面子。聶元梓被孤立，一年多時間裏一直在進行「再教育」，唯一一次露面是作為黨代表參加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而事實上這也只是擺個樣子，沒有實際意義。九大期間，雖然聶元梓有政治問題，她還是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北大革委會成立兩個月後，聶元梓就被下放到某個國有農場參加勞動改造。在接下來的兩年中，聶元梓的名字也被悄悄地從北京市和國家領導人名單中刪去。

蒯大富是清華大學知名的紅衛兵領袖，他的下場也好不到哪裏去。<sup>2</sup> 8月上旬，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解除了清華大學兩大派系的武裝，並釋放所有被拘禁的人員。部隊負責確保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順利進駐清華大學，而1969年1月，清華大學革委會成立，一把手就是該部隊的指導員。在接下來的近十年中，清華大學由宣傳隊負責管理。<sup>3</sup> 蒯大富被下放到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的一個兵工廠裏，在1970年被調回清華，但是被孤立，並受到審訊，罪名是懷疑他參與地下極左組織。最終，蒯大富回到北京一家工廠工作，可是依然受到「嚴密監視」。

北京的其他知名造反派領袖都遇到了相似的命運。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在1968年10月被送到北京附近的一處部隊駐地參加體力勞動，1970年中，她回到北師大，卻因涉嫌極左陰謀而面臨審訊。在此次受挫後，直到1970年代中期，她一直在北京的一家工廠工作，並受到監視。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也同樣被孤立，於1968年末接受調查。1969年末，韓愛晶被送往湖南的一處工廠參加勞動，並受到監視。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在1969年1月被發配到四川的一處工廠。總之，在新建立的權力機構中，這些曾經名噪一時的北京學生運動領袖都失去了地位。

<sup>2</sup> 這一說法基於Walder (2009, 248–249)。Andreas (2009, 138–142) 描述了大學裏實施宣傳隊控制的局面。

<sup>3</sup> 對於這一段時期的描述，參看Andreas (2006)。

## 鞏固革委會

北京著名造反派的經歷只是軍隊消除派系力量這一整體戰略的一個縮影。在江蘇，省級革命委員會於1968年4月在南京成立，一把手就是許世友將軍。<sup>4</sup>無論造反派領袖有什麼影響，都隨着他們原來造反派組織的逐步解散而消除了。第一步就是將學生、工人和農民分別歸入市一級的「人民大會」中，這有效地阻止了政治積極分子跨校、跨單位的活動。這一措施並沒有立即消除派系鬥爭，但是將鬥爭有效地控制在了各個學校和工廠內部。接下來就是組織學習班，強制派系領袖參加，並開展「鬥批改」運動，逐步化解派系聯繫。要是有地方派系領袖反抗，這些人就會成為運動的首要目標。隨後發起的對抗各種政治陰謀運動進一步打擊造反派的活躍分子，許多人還因此進了監獄。在一連串舉措中，江蘇的軍隊沒有大規模調動軍事力量，但逐步加緊了對該省的控制。<sup>5</sup>

造反派領袖們很快意識到他們在革命委員會的職位只是一個虛名。1968年5月，他們派出了一個代表團到鄰近的上海學習模範經驗，之後他們的不滿更為強烈。代表團回到江蘇後，前造反派雙方都公開讚揚上海的模式：與他們不同的是，先前在上海活躍的造反派領袖（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王洪文）依然身居要職，掌握實權。曾經對許世友將軍發起攻擊的造反派成員更為沮喪，因為他們成為「鬥批改」運動中的首要目標。

這一進程並不順利，反抗行為偶爾還會引發暴力衝突。1968年4至7月，南京共發生五起小規模衝突。由於跨行業組織已經被取締，派系鬥爭只是在單位內部進行，已經與先前的大規模上街打鬥大有不同。4月23日，第一起這樣的衝突發生在南京廣播學院，是由一批強烈反感許世友的人挑起的。兩派之間發生了爭吵，部隊很快就開進學院，要抓捕罪犯但遭到了反抗，附近單位的活動分子趕到學院聲援自己的盟友，一場激烈衝突就此爆發。5月4日，一家軍隊運營的製造廠發生了相似的衝突，派遣部隊很快來到現場。這反而促使反許世友分子在革委會總

<sup>4</sup> 有關江蘇省的描述，是基於 Dong and Walder (2012a, 24–29)。

<sup>5</sup> Forster (1990, 56–91) 描述了浙江省及其省會杭州發生的相似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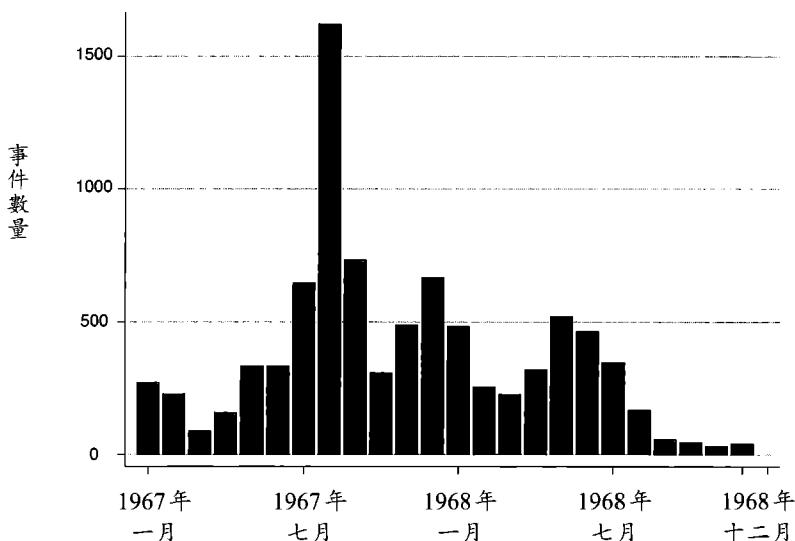
部大張旗鼓地遊行示威。類似事件一直持續到7月份，其中一起還造成一名學生日亡。

衝突雖然不大，但是持續不斷，這讓軍方很頭疼，只能組織更多的學習班。到1968年8月，江蘇省已經舉辦了150萬場次的學習班，還是沒有根除派系爭鬥，許世友感到非常苦惱。雖然街邊武鬥已經絕跡，大規模造反派聯盟也被瓦解，位於基層的革命委員會還是十分脆弱。

1968年7月，毛澤東傳喚北京紅衛兵領袖，批評了他們的做法，與此同時，中央政府頒佈了兩份措辭嚴厲的指導性文件，支持廣西和陝西用強制性手段遏制派系鬥爭的做法。許世友抓住這一機會，進一步採取嚴厲措施。南京的造反派領袖在學習班被孤立，誰要是反抗，就會受到言辭犀利的批評。宣傳隊進駐學校和工廠，發起的運動都針對反抗權威的造反組織。學校被清空後，當局的措施實行起來更加順暢。1968年末，大學生都被分配了工作，全部離開了南京，大部分的高中生都被下放到農村勞動。大學裏反對許世友的勢力大都離開南京，校園裏剩下的老師學生也都被派到工廠、礦場或是鄉下從事體力勞動，直到1970年才回來。

圖12.1 暴力事件的數量，按月計算（1967–1968）

268



來源：根據 Walder (2014) 的資料計算

江蘇的案例基本與全國的總體情況一致。圖12.1說明了軍管措施和革命委員會的影響。這一數據表明，1968年夏天對群眾派系鬥爭的處理是有效的。造反派系間的武鬥次數、攻擊政府部門和軍隊駐地的次數明顯回落。1968年9月，這一混亂而暴力的文革階段宣告結束。

## 關閉大學

最初幾年，社會動盪不安，大學沒有新生入學，也不開課，更沒有人獲得文憑、順利畢業。1966年6月，大學入學考試被取消，很長時間都沒有恢復。1966年春季學期，已經在讀的大學生在未來兩年仍然留在學校，但其實在校園衝突變得危險而暴力以後，許多人陸續逃離了大學校園。到1968年秋天，全中國的大學和高中學生既沒有完成學業，也沒有進入工作崗位。1966、1967和1968年的高中應屆畢業生直接沒有書讀。現在，是時候決定該如何安排這些學生和大學了。

最初，最重要的當然是要確保軍事管控，管理好相互鬥爭的學生活。教職員工和學校管理層已經遭受學生的攻擊接近兩年之久，現在又面臨進一步的思想改造和意識形態塑造。大學並沒有重新開放，沒有錄取新一批學生。在校生的課程在1966年中斷，卻也沒有恢復上課，相反，共產黨做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選擇：大學被無限期地關閉，學生、教職員和管理人員都被趕出了校園。

第一步，在1968年底宣佈所有的學生畢業，並給他們分配工作。  
269 大亂之後，要在學校中建立新的權力機構，這樣一來，原來的造反派領袖就沒有辦法在新的權力機構裏佔有一席之地。他們大多都被分配到了十分偏遠的地方，不是在工廠裏做工，就是擔任一些低水平的技術員工。最幸運的學生當了兵——這還是有政治背景的學生才能享受的。學生造反派領袖的政治生涯無論是在所處院校還是當地政府都基本宣告結束。在揪出所謂的反動派和間諜之後，第二步是將幾乎所有教職員工和管理人員送到「五七幹校」。所謂「五七幹校」，其實就是一系列農村設施的統稱，為的是通過體力勞動改造知識分子和官員。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教職員工被統一送到江西省某個湖泊泥濘的岸邊，他們不得不

建立自己的住所，種植自己的食物。該設施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才關閉。<sup>6</sup>

絕大多數大學關門後，直到1972年才重新開放，教職員工和管理人員從五七幹校被召回。第一批入學者的資格仍然由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控制，新生入學率要比1966年水平低得多，直到1977年才恢復到以前的水平。<sup>7</sup>然而，最大的變化是入學資格的挑選方式。即便存在着階級標籤系統，以前的全國考試還是素質優先，小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們很佔優勢。可是他們現在被貼上了「反動派」的標籤，這種考試形式被廢除。現在，沒有學生能從高中直接進入大學。所有的大學新生都是從集體農場、工廠車間和士兵隊伍裏挑選的，現在唯一的標準就是申請人的階級標籤、政治積極性和當地革委會領導根據政治考察開出的推薦信。<sup>8</sup>

## 下放農村

新的大學入學方式意味着高中畢業生不得不放棄眼前的大學計劃，而去參與沒有限期的體力勞作。有些學生們沒有進入高中，或是剛剛完成了職業技術學校的課程，就被分配到工廠或其他城市單位上班。絕大多數高中畢業生被派往偏遠農村，進行無限期勞作，成為了普通農民。這種做法在1960年代初於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就開始了，當時規模還不是很大，主要是安置沒考上大學、在當地又找不到工作的高中畢業生。<sup>9</sup>可現在，這一措施在全國都變得非常普遍。

270

農村生涯漫漫無期。城市青年被要求以普通農民的身份開始新的生活。一些人入了黨，後來成為生產大隊或是公社的幹部。幸運的少數人能夠打動他們的上司，並獲得大學的推薦信，作為「工農兵」學生入學。

<sup>6</sup> 有關五七幹校的描述可參看Yue and Wakeman (1985, 251–273)。此外，一個知識分子在河南經歷的回憶錄可參見Yang (1984)。

<sup>7</sup> 國家統計局 (1983, 511)。

<sup>8</sup> Andreas (2009, 188–210).

<sup>9</sup> Bernstein (1977a, 36–44), White (1978; 1979).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這些青少年剛開始很難適應艱苦的農村生活，吃不慣低熱量的以穀物為主的農村飲食，還要進行重體力勞動，這超越了以往青年學生們在城市裏所經歷的一切。有些年輕女孩子本來身子骨就弱，現在要遠離家庭獨立生活，還不時遭到農村幹部的性騷擾甚至是強姦。<sup>10</sup>在接下來的十年中，1,800萬城市青年被送到農村。在這幾年中，只有72萬人最後以「工農兵」學生的身份進入大學校園。<sup>11</sup>

被下放到農村的城市居民中有另一部分人是被逐出權力層的政治人物。從1966年開始，根據階級成分或是其他負面政治標籤而揪出的「可疑分子」和他們的全家老少都被下放到農村，這一政策在革命委員會的管控下迅速擴大。這種放逐原本是永久性的，但是當毛澤東進入晚年之時，這些人開始抗議他們的處境。在天津市，約15,000人被驅逐到農村地區，25,000名家屬也隨之下放，人數加起來大約是天津城市人口的1.3%。<sup>12</sup>

## 官員的勞動改造

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必須參加體力勞動，接受意識形態改造。這一舉措也適用於在官僚機構工作的職員。大部分人都要在五七幹校參加長時間的勞動改造，或是到工廠做工。從1969年開始到1971年，全國各地的政府辦事機構幾乎空無一人。管理人員和工作人員大多數時間都在進行體力勞動。辦公室裏只剩下極少數骨幹員工，維持最基本的功能。學術研究實際上已經停止，政府服務減至最低。這種做法也被推行到大型國家工廠：工廠辦公室被清空，工程師、會計員和其他技術人員都被下放到車床或是高爐上當技術工，或成為清潔和餐飲服務的輔助人員。當這些人最終回到辦公室工作時，他們的權威被大大削弱了。

<sup>10</sup> Bernstein (1977a, 121–171; 1977b), Unger (1982).

<sup>11</sup> 《中國教育統計年鑑》(1984, 969)。

<sup>12</sup> Brown (2012, 137–168) 描述了城市情況及影響，具體驅逐數據可參見頁139和144。

最初，辦公室職員被「下放」的運動規模遠遠超過了青年人到農村去的規模，但持續時間不長。在上海，有兩萬多幹部被派到車間裏工作，這是為了計劃永久減少各級行政部門的人員編制。<sup>13</sup>在天津，有70%以上的辦公室員工被送到體力活的崗位上。<sup>14</sup>1969年底，河南共有12,300名省級黨政幹部被分三批下放到農村勞改營，接受勞動改造。<sup>15</sup>在湖北，有8,000多名幹部從省政府被派往一處改造過的軍營，務農改造。<sup>16</sup>廣東省共建成313個「五七幹校」，164,600名省、市、縣機關單位工作人員被派往這些地方勞改。當時，廣東當局計劃將政府人員的數量永久減少15萬。<sup>17</sup>直到1971年，這一舉措才逐漸撤銷，到了1972年，這些農村「勞改營」才徹底關閉。

## 清理階級隊伍

隨着軍管會對自身權力的鞏固，「鬥批改」運動逐漸擴展為對叛徒和反革命分子進行更大範圍和更為嚴厲的追捕行動，這就是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不久，在全國範圍內動員起了大範圍的清洗運動，一直持續到1969年。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通過兩個截然不同的渠道發動的。其一，在北京開展一系列調查，指控在文革大清洗中被打倒的國家官員。開展調查的是成立於1966年的中央專案調查組。在專案組組織的調查中，在全國範圍內有近100萬幹部被捕調查。<sup>18</sup>前不久被打倒的高官被指控為陰謀反黨。根據專案組的邏輯，陰謀必定有追隨者，這些追隨者必定隱藏在這些官員以前任職的地區。北京的調查人員命令地方當局調查可能涉

272

<sup>13</sup> Contemporary China Editorial Office (1993, 262).

<sup>14</sup> 同上。

<sup>15</sup> 同上。

<sup>16</sup> 同上。

<sup>17</sup> 同上。

<sup>18</sup> Schoenhals (1996, 109).

及更高級別案件的人。這一指令是地方革委會絕不敢忽視的，這便觸發了全國範圍內相關案件的輔助調查。

打倒內蒙古人民黨的運動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開展起來的。起先，是對內蒙古最高官員烏蘭夫展開調查，他在文革之初就被打倒。1968年春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逐漸展開，為的是徹底消除烏蘭夫的政治影響力。革命委員對烏蘭夫以「陰謀罪」立案，指控他領導了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認為他與蒙古族分裂分子和蘇聯暗中勾結。運動繼續推進，一大批人——主要是蒙古族人——被捕，遭到嚴刑拷問，一旦招供，還要被逼說出其餘「同黨」。直到1969年3月，北京才終於干預，終止了這場運動，可當時已經有79萬人被牽連進去，受到針對和詢問，有12萬人因毆打或酷刑而落下終生身體殘疾，有22,900人被殺、被處決或是選擇自殺。<sup>19</sup>

清洗運動的大部分受害人並不是因中央專案組設立的案件而受到牽連。通常情況下，運動通過地方學校和工作單位獨立發起的調查而開展。在北京幾個示範性單位舉行的運動開始之後，鬥爭經驗被寫入中共中央的批示文件，獲得了毛澤東個人的認可，向全國派發。全國性運動也開始了。1968年元旦，《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社論，奠定了運動的基調：無產階級政權的勝利正在鞏固，我們要繼續大範圍打擊革命隊伍中的階級敵人和叛徒。1968年5月底，在北京新華印刷廠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經驗被記錄為最早的一份批示文件。該運動由工廠的軍管會執行，委員會由現役部隊人員組成，而這一部隊同時也負責政治局的安全保衛工作。工廠十分老舊，發起運動的人認為，曾為舊社會、國民政府和日佔時期工作的人隱藏在工廠裏的「非常複雜、劇烈和暴力」的階級鬥爭之中。人們舉行了群眾大會，「揭露」叛徒，「揪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嫌疑人遭受批鬥，被迫招供，並被告知「只有那些充分承認錯誤的人才能得到寬恕」。<sup>20</sup>

<sup>19</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57–258).

<sup>20</sup> 同上，頁254–255。

為了開展該項運動，地方上的政府機構和工廠學校組織專案小組，負責收集證據，找出這些人的所謂罪行。他們調出當事人的政治檔案，尋找嫌疑人之前不法行為的證據，他們從前的上司和同事也被約談，以獲取定罪信息。隨着運動在全國各地展開，新一波的指控、訊問和供認接踵而至。第一步是指控，通常沒有證據支撐，最多是基於個人歷史的懷疑或聯想。指控的形式有時候是上級的一封書信，有時候是其他單位的一份函件或是派出的一位代表，有時候是當地自己的調查委員會，也有時是或公開或私下的「人民群眾舉報」。

運動造成第一批受害者之後，牽動新案件的源頭就來自於審訊本身。最好的情況下，訊問只不過是威脅或毆打。被調查者被假定為有罪，要是不供認罪行，就被威脅會受到嚴厲的制裁。儘管北京方面已經做出指示，審訊要「有原則地」進行，但其實肉體虐待相當普遍。根據一份後毛澤東時代的回憶錄文件，這其中還包括許多十分極端的手段。嫌疑人要是承認了罪責，訊問並不會因此結束：「陰謀」就一定意味着有「同黨」。嫌疑人必須供出其餘同夥，要是不說，虐待就會繼續，直到說出那些「同謀者」的名字為止。這樣一來，被供出的「同黨」就會面對同樣的審訊：刑訊逼供、強制認罪、說出同黨。這樣，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往往會牽連大量受害者。由於他們承認的指控中有「反革命」一項，所以之後經常伴有處決。而其實，運動中許多人在審訊室裏遭受酷刑而死，或者是不堪屈辱而選擇自殺。受審者自殺是調查員不願看到的，調查員會認為這是「畏罪自殺」，間接證明了受審者是「有罪」的，但是人一死，線索鏈就斷了，無法揪出更多的同黨，調查就陷入了死胡同。運動早期，像康生或是公安部部長謝富治這樣的人就對此表示擔憂，認為自殺事件阻止了調查的進行。<sup>21</sup>

當時，軍隊接管了北京大學，取締了學生造反組織，並將其領導人收押改造。一個月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專案組忽略了過去兩年校園中發生的一切，直接對900多名「有嫌疑的」幹部和教師發起了調查。

---

<sup>21</sup> 同上，頁255–256。

當事人被拘留在校園內，面臨摧殘身心的訊問。宣傳隊花了僅僅一個月多一些的時間就認定其中的542人是「人民公敵」。到當年年底，18人自殺。死者中包括一名校黨委高層，是第一批公開贊成聶元梓反抗學校權威者之一。而此時他的屍體在大學的游泳池中被發現，很明顯是自殺。<sup>22</sup>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波及面很廣。其中很大一部分受害者都屬文革早期就被打擊的社會類別：有海外經歷的、與國民黨有聯繫的、來自地主家庭或是有資本主義背景的。但是也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讓一個人成為運動所針對的目標：幾十年來忠實為黨的人會被指責參與一個根本不存在的間諜組織；那些1949年以前冒着生命危險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反倒成為「國民黨間諜」；有些人在文革早期積極參與派系鬥爭，可現在他們的行為可能被認為是反對毛澤東和社會主義的陰謀；有人對江青發表了幾句批評，或是不小心讚揚了劉少奇等領導人幾句，就會遭到懷疑；先前得罪了現在負責開展運動的人自然受到報復；誰要是站出來指責專案組的酷刑和謀殺行為，或是為被打倒的黨內領導說幾句好話，都會成為主要嫌疑人。<sup>23</sup>這場運動造成了廣泛的恐怖氣氛，這不僅僅是因為對嫌疑犯的嚴苛，也是由於該場運動廣泛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雖然之前大範圍的派系武鬥在中國的絕大部分地區都造成了影響，而上海倖免於此，但這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卻給上海造成了重大的影響。上海市革委會想搞一場紀律十分嚴明的運動，揪出隱藏的階級敵人，並將他們拉到公眾面前批鬥。這場運動從1968年1月開始，到1969年4月結束，共有169,000人被調查。20名在文革前夕擔任上海黨政要員的人中，有17人被認定是「叛徒」。前市長和一名副市長被拘留並在獄中死去。上海市黨政官員總共有900多人，其中約84%的人員被指控和拘留，46人在拘留期間死亡。到1968年底，該運動造成的總死亡人數超過了5,000人，而這僅僅是負責調查的管轄部門所提供的數據。<sup>24</sup>

<sup>22</sup> Walder (2006, 1044–1045), Wang (2006). 這一時期的大學情況在Yue and Wakeman (1985, 233–250) 中有所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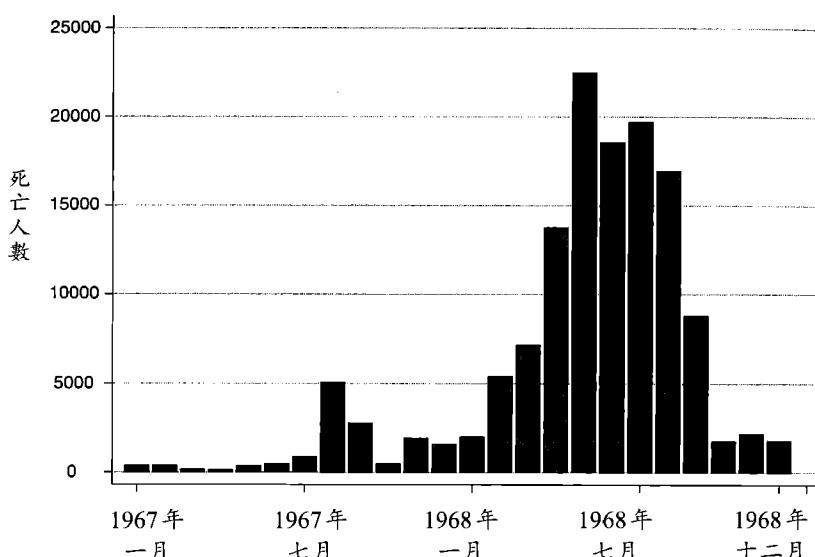
<sup>23</sup> 相關案例參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56–262)。

<sup>24</sup> Xu (1990).

廣東先前經歷了暴力的派系武鬥，雖然被軍方鎮壓，但派系仇恨仍然劇烈，並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加劇了當地事態的惡化。在廣東，軍隊支持「東風」派，打壓「紅旗」派，「紅旗」派一直到最後都頑固地反對軍管。1968年2月，雖然還有零星反抗軍事管制的情況，廣東政局已經基本穩定，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便緊隨而至。當局為了鎮壓鄉村地區的反抗，又進行了新一波的殺戮，僅這一時期就有三萬多人喪生。<sup>25</sup>

圖12.2 文革運動中的死亡人數，按月計算（1967–1968）

276



來源：根據 Walder (2014) 的資料計算

圖12.2就顯示了相對於文革早期，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所造成重大影響。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和同時期發生的武力鎮壓反對派系一起，造成了一波重大的暴力傷亡，遠遠超過早前死亡最嚴重的月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67年8月死亡人數達到一個峰值，那個時期正是軍事武器被分發給群眾派系的時間。從1968年3至9月，因為清理階級隊伍造成

<sup>25</sup> Contemporary China Editorial Office (1991b, 118).

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 1967 年武鬥死亡人數的峰值，而且那段時間連續五個月每個月的死亡人數大概都要比武鬥時期高出四倍。通過對比圖 12.1 就能看出，造反派武鬥造成的死亡人數開始降低時，清理階級隊伍造成的死亡人數反而達到峰值。從這些數據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不但沒能解決派系暴力武鬥所造成的弊病，事實上反而使其變得更為嚴重。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初衷是通過將注意力轉移到潛在的敵人身上的來鎮壓根深蒂固的派系鬥爭。但難以否認的是，這一運動的發展超出了人們的想像，變得一發不可收拾。革委會的成員中有在早年鬥爭中倖存下來的人，他們的背景和政治傾向難以統一。新的權力機構又加入了軍方的人，他們是其中的主導者，經常懷疑來自造反派系的領導人。現在地方幹部也加入了進來，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文革早年成為造反派的攻擊對象，後來許多人為求自保，就對某些造反派宣誓忠誠，而這些造反派為了在「大聯合」中獲得更廣泛的基礎，就接受了他們。因此，最後新成立的權力機構中包含了從造反派中選上來的領導，有時候是來自兩個死對頭的領導。這些新組建的權力機構和專案小組裏如果沒有明顯的敵意，那也是充滿不安全感和互相猜疑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演變成類似其他歷史背景中的宗教法庭和政治迫害。新成立的當地機構十分相信：在新的運動中必須狂熱地履行上級交派的任務，否則他們的忠誠就會受到懷疑。新近發生的一切讓他們覺得：就算你是當權者，如果沒能狂熱地完成上級任務，就有可能成為運動中的受害者。

革委會和專案組的成員始終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因此沒有人勇敢到站出來制止那些狂熱而暴力的審訊、質疑那些牽強而荒謬的指控。要是一個人為那些受指控的人說話，希望審訊手段能溫和些，或是希望控制受牽連的人數，那麼此人可能自己就會遭殃，被懷疑「同情敵人、通敵叛變」。肉體和心理的折磨在刑訊逼供時變得越來越普遍，事態就開始惡化。招供必然牽連出一群人，再招供、再牽連，循環往復，一大批人就這樣被連帶了進來。一個人必須要鼓起十足的勇氣甚至幾近魯莽，才

能去質疑人們所供內容的準確性，才能去審視所謂「龐大地下叛徒網絡」是否真的存在，才能去要求不應該僅僅通過質疑就定一個人的罪，或是指出一份供詞並不能成為足夠的事實依據。一個人要是做這些事，他無疑是在挑戰領袖的權威、反對文化大革命、同情人民的敵人。

從大躍進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紅衛兵運動到造反派武鬥，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與其他毛澤東支持的運動一樣，無休止地推進，造成了超出預期的破壞。<sup>26</sup>這些運動就像沒有剎車的汽車，橫衝直撞，直到毛澤東自己覺得事態發展太過嚴重，這才緩了下來。可這時候要挽回損失為時已晚。文革期間受迫害死亡的人數中，有一半以上死於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總人數估計達到60萬至80萬之多。<sup>27</sup>

## 毛崇拜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及其後續一段時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幾乎人人都別着主席的像章，毛的塑像隨處可見，海報也到處都是。基本上每家每戶牆上都貼着毛主席的畫像，也都有毛澤東的半身像擺出來，誰要是敢不放，就有可能受到政治懷疑。在公眾場合，毛澤東的塑像在大學校園、機關門口、城市廣場被一個接一個樹立起來。在公共假日期間，人們往往會湧上街頭，高舉毛澤東的畫像，或是簇擁着擺出英雄般姿勢的毛澤東塑像，跳起高度一致的舞蹈，在街上遊行。<sup>28</sup>各種大禮堂裏都聚集着成百上千的人，他們跳着高度統一的舞蹈，表達對毛主席的崇拜，並向領導人表示衷心。如果有人不經意間弄髒了毛主席畫像，或是丟棄了印有毛主席照片或手跡的報紙，就會受到審查，面臨「不忠於偉大領袖」的指控。每家每戶都要妥善保存印有毛主席照片或是畫像的東西，因為丟棄這些東西會帶來政治危險。

278

<sup>26</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59–260).

<sup>27</sup> Walder (2014).

<sup>28</sup> Leese (2011, 210–219).

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最早源於林彪軍隊的有目的的推動，由軍管會實行，這就是所謂的「三忠於四無限」。「三忠於」指的是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綱領；而「四無限」指的是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熱愛共產黨，無限熱愛毛澤東思想，無限熱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綱領。大眾對毛澤東的愛戴長期以來受到官方支持。不過，對國家領導人的真正的普遍的尊敬現在已經轉變，借用兩位此方面的專家所言，「此時的崇拜已經成為一個由國家機器支持的有組織的運動，儀式組織精細，毛澤東說的什麼陳詞濫調都被神化成警世恒言，有人稍有偏離或是質疑就會受到強硬制裁。」<sup>29</sup>

北京針織總廠的模範經驗成為了運動的核心元素之一。負責該廠的軍隊官員發明了一種能夠在工作日宣傳忠心的方法。換班的時候，工人並不是直奔崗位，而是先聚集起來，面對着一張毛澤東的畫像，「聆聽他老人家對工人們的教導」。在工作期間，工人們會大聲朗讀貼在牆上的毛澤東語錄，以此激發工作熱情，換班的時候，他們會互換《毛主席語錄》，以此顯示「相互關心、互幫互助」。下班的時候，他們又會聚集到毛澤東的畫像前「匯報工作」，仔細反思一天下來的思想和工作情況。工廠領導將這些都寫成報告，在1967年底遞交給了毛主席。毛澤東在旁邊做了批閱：「我看過了，非常好，謝謝你，我的同志！」<sup>30</sup>這份報告被轉發全國，隨後不久，數百萬人都在他們各自的工作單位裏參與了類似的有組織的崇拜儀式。<sup>31</sup>

毛澤東崇拜的另一個關鍵元素在於能「生動地應用於」現實生活中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尤其是那些現代科學和技術無法解決的困難。新聞和廣播經常報道一些這樣的事跡：人們認真研讀毛澤東的文章，即使沒有接受過科學的訓練，也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在一個著名橋段中，一組外科醫生，雖然缺少必需的經驗，也沒有一個受過訓練的麻醉師，但是受到毛澤東語錄的鼓舞，完成了一個異常複雜的手術，成功地

<sup>29</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62).

<sup>30</sup> 同上，頁263。

<sup>31</sup> Leese (2011, 195–202).

從一名病患身上切下了一個重達100磅(45公斤)的腫瘤。得了癌症的病人要忍受化療和副作用的折磨，但是誦讀毛主席語錄就能「減輕痛苦」。沒有受過訓練的醫護人員通過「研習毛澤東經典」，就能讓聾啞人重新說話，能唱《東方紅》，能喊「毛主席萬歲」。在其他的案例中，只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就能讓盲人復明，斷手再續，甚至是起死回生。<sup>32</sup>

當然，毛澤東思想不可能有這種神效，這麼做只是為了彰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鼓勵人們去做那些本以為無法完成的事情。這些案例的言下之意是：只要好好學習毛澤東思想，就能超越那些從現代科學技術科班出身的「資產階級」專家，充分展現無產階級的優越性。<sup>33</sup>

體現毛崇拜最著名的事情可能就是毛澤東給工人贈送芒果一事了。1968年8月上旬，毛澤東給北京的部分學校和工廠送了一些芒果作禮物，結果受到了熱烈的反響。當時，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長來訪，送給了毛澤東一筐金燦燦的芒果，毛澤東就讓手下人把芒果分成好幾份，分別送給北京的一些模範單位。一些芒果在8月5日送到了前不久在清華大學組建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sup>34</sup>8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了這一喜訊，採用的通欄大標題是：「最大關懷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和群眾心連心；毛主席把外國朋友贈送的珍貴禮物轉送給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sup>35</sup>旁邊的文章則描述了校園裏的反應：

280

五日下午，當毛主席向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贈送芒果的特大喜訊傳到清華園的時候，人們立即聚集到偉大領袖毛主席贈送的禮物周圍，熱烈歡呼，縱情歌唱。他們熱淚盈眶，一遍又一遍衷心地祝願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他們紛紛向自己所在的單位打電話，傳頌這一特大喜訊，並且連夜

<sup>32</sup> Urban (1971, 1–27).

<sup>33</sup> Leese (2011, 187–194).

<sup>34</sup> Baum (1969), Leese (2011, 219–221).

<sup>35</sup> 接下來的這一段描述是基於 Chau (2010, 257–259)。

舉行各種慶祝活動，冒雨到中南海報喜，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表達他們的赤膽忠心。

北京紡織廠也收到了一個芒果，革委會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芒果儀式，在儀式上工人們背誦毛澤東語錄並且慶祝收到了這個禮物。然後把芒果用蠟封起來保存。芒果被供奉在大廳的一個壇上，工人們排隊一一前往鞠躬致敬。沒幾天後芒果就開始腐爛。革委會將蠟弄掉，剝皮，然後用一大鍋水煮芒果肉，再舉行一個儀式，工人們排成一隊，每人都喝了一口芒果煮過的水。革委會用蠟做了一個芒果的複製品，將「芒果」放回大廳的壇上，作為未來廠裏開展毛主席儀式的中心裝飾品。

之後幾個月，全國掀起了一波「芒果熱」，芒果臨時成為了向毛主席表達「無限忠誠」的象徵。人們用蠟做了更多的芒果複製品，一些裝在玻璃盒子裏，複製品被送往北京和全國巡迴展覽。各處工作單位都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慶典和觀摩活動。外省的革命委員會紛紛向北京發函，希望這些珍貴的芒果能夠運往各地展覽。那些從巴基斯坦帶來的芒果早就開始腐爛，人們做了更多的複製品用以替代，隨後送往全國，就像巡迴演出的明星一樣。芒果到達成都之後，估計有五十多萬人前來迎接。芒果運輸走的都是專列，所到之處都是盛大的遊行。<sup>36</sup>毛澤東像章和海報以成百萬的數量被製作出來，上面也都加入了芒果的圖案。河南的一家香煙廠甚至推出了一款芒果牌香煙。後來幾年，一部反映階級鬥爭的電影也加入了芒果的元素，讓芒果成為了貫穿故事的主線之一。<sup>37</sup>

毛澤東崇拜的另一重要的元素是「忠字舞」。忠字舞反映了對偉大主席的尊敬和熱愛，舞步據說最初來自於少數民族的舞蹈動作，後來加入了現代音樂的節奏和歌詞。跳起忠字舞時，百萬民眾的心一起律動，

<sup>36</sup> Leese (2011, 221).

<sup>37</sup> Murck (2013, 113–233)一書對芒果崇拜事件有詳細的描述，他同時記錄了一家博物館對芒果現象的展覽，其中包含了芒果崇拜的相關照片與文物等大量細節。Chau (2013)對1976年電影《芒果之歌》的主要情節有具體概述。

表達對主席的無限忠誠。忠字舞在任何場合、任何時間都能跳：火車上、公交車上或是飛機上都可以，工廠和政府的政治集會上更是要跳。大家跳起忠字舞時，任何人都不得拒絕加入，否則就是對毛主席不忠。根據那個時代的人回憶，年輕女性在忠字舞中表現活躍，對有些人來說甚至成為一種娛樂的方式。而年長者則沒什麼節奏感，藍領的工人跳起來會手足無措，不合拍子，總是顯得很尷尬。<sup>38</sup>

審視這些事件，可能會覺得這是人們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傳奇力量，因此集體而自發地進行這種狂熱的膜拜，或起碼是對毛本人能力的尊敬。我們當然無法知曉當時經歷這些事情的千百萬人心中在想些什麼，但是我們十分了解當時這些事情所處的政治環境。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為的是揪出潛藏的叛徒和革命的敵人，而就在這時毛澤東崇拜也達到了高潮。整場運動有再明顯不過的強制性元素：如果一個人不能展現出足夠的熱情，那他就要受到批鬥的威脅。借用一位研究毛澤東崇拜的同行所說的，「對於絕大部分中國人來說，當時的環境實在是極不穩定又難以預測，動不動就抓人，為了保全自身，大家不得不參加到公開的膜拜活動中去。」如果不合群，「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哪怕念錯了毛主席語錄，或是冒犯了個人崇拜的象徵物品，就會被認為是反革命。」<sup>39</sup>

282

有記錄表明，許多人在這一時期被指控「對毛主席大不敬」而進了監獄，甚至丢了性命，或是因為不小心出現了口誤，或是不經意間將印有毛主席語錄或畫像的報紙當成了廁紙。<sup>40</sup>平常人不需要目睹這些懲罰也明白對毛主席「不忠誠」意味着什麼。這場運動旨在根除潛藏的叛徒，在這場運動中，明眼人也都能看出有一些指控明顯是錯誤的。可是如果不參與其中，自己和家人就可能有危險，而參與進去的成本又極低，只要稍稍花些功夫，表達一下對偉大領袖的敬仰，就可以避免專案組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的關注。

當時的政治環境是極其微妙的，人們更願意相信：全國人民體現出

<sup>38</sup> Leese (2011, 204–206),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64).

<sup>39</sup> Leese (2011, 174, 206–207).

<sup>40</sup> 同上，頁207。

的非理性信仰也是迫於無奈。這與大躍進時期的自欺欺人如出一轍，只是形式截然不同：極大的壓力要求人們步調一致，運動中的表現體現了一個人對領袖的忠誠。與大躍進時期所導致的大饑荒不同，表忠心運動看上去似乎沒什麼破壞性，但其中的集體行為源出同門。這些表忠心的活動直到1969年6月才被徹底叫停。同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毛崇拜體現了其尷尬的一面，也因此開始受到質疑。<sup>41</sup>

## 更多的調查運動

就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和毛澤東崇拜達到高潮之後，針對「反革命」  
283 的兩項新運動開始啟動，旨在加強軍事管控，鞏固革委會的權威。第一場運動是1970年2月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並在當年年底之前推廣到了全國大部分地區。「一打」指的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中國各地當時仍有零星的地下抵抗行為，或是冥頑不化的派系鬥爭。運動的這一方面就是要消除任何形式的殘餘反對行為。當時發動「一打三反」的文件是這樣指導地方機構的：

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對那些通敵叛國、陰謀暴亂、刺探軍情、盜竊機密、殺人行凶、縱火放毒、反攻倒算、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和搶劫國家財產、破壞社會治安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對於那些氣焰囂張，罪惡纍纍、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sup>42</sup>

而「三反」指的是「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三反運動的指向明確：要對新成立的地方權力機構形成有效約束，因為他們揮霍無度，飯局、送禮、修建招待所、裝修辦公室花了很多不必要的錢。有些單位之間還進行物物交換，說是「合作」的一種形式。

<sup>41</sup> 同上，頁226–231。

<sup>42</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02).

雖然打擊對象的界定依然模糊不清，一打三反運動的涉及面比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要窄很多，影響也小了不少，但是也造成了一部分死亡。在北京城區，有5,757名「叛徒、特務、反革命和其他壞分子」被抓，挪用公款和斂財相關立案6,200多件。在上海周邊的農村地區，有64,000人被「揪出來批鬥」，其中死亡520人。在全國範圍內，運動最初的八個月就逮捕了284,800多人。<sup>43</sup>根據毛去世以後公佈的地方歷史記錄估計，一打三反逮捕的人只佔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四分之一，死人數量也要少得多。全國範圍內因為一打三反而死去的人不到1968至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10%，且大多數死於處決。<sup>44</sup>

284

另一場運動則是「反五·一六分子」運動。該運動在一打三反運動之後，打擊面更加集中，因此規模也更小。「反五·一六」目標明確：要打擊一小撮極左勢力、手段極端、企圖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地下密謀分子。這一運動的名字緣起於1967年，並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激進成員聯繫起來，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和其他成員成了1967年8月襲擊軍隊的替罪羊。<sup>45</sup>這場運動於1970年在多地開展起來，並在1971年到達頂峰。地方政府將這場運動解讀為經過上邊的授權可以抓捕、審訊、恐嚇，甚至有時候是關押之前群眾派系的領袖，尤其是那些不服從軍事管制的人。之前的造反派領袖是不是很早就放棄抵抗毫不重要。革委會接到任務後，將這些人孤立起來，進行審訊，看他們到底有沒有跟這個懷疑中的全國性的極左陰謀團體有地下關聯。

工人造反派很容易辨別，然後進行隔離和審查。然而，先前的學生造反派此時都被送到了偏遠的集體農莊或是工廠。這些情況下，當局就把他們接回此前他們進行造反運動的地區，再進行審訊。比如，1970年，一些著名的北京紅衛兵就從偏遠農村被帶回了原來的大學校園，隨後便是對他們在派系活動中的情況進行長時間的審訊。<sup>46</sup>先前的武漢造

<sup>43</sup> 同上，頁306–307。

<sup>44</sup> Walder (2014).

<sup>45</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21–233).

<sup>46</sup> Walder (2009, 248–249).

反派領袖被關在所處單位臨時搭建的牢房裏，審問和這個「五·一六集團」有沒有瓜葛。整座城市有33,659人被打為「五·一六分子」。若是被貼標籤的人身居要職，立馬免去。絕大部分人最終在「監視下」接受勞動懲罰。本來打算處決84名核心成員，但此事最後不了了之。<sup>47</sup>

在江蘇，這一運動異乎尋常地劇烈。該省反對軍管的派系遭受了最後的致命一擊。運動從1970年春天開始，在年末達到頂峰，並零星持續到1972年，江蘇有超過13萬人被指控為「五·一六分子」，其中57,000人交代了自己與派系的地下關係。後來公佈的數字表明，超過6,000人在關押時留下了永久性的身心殘疾，甚至是丢了性命。而在之後參加過內部調查的人則表示，真實的數字還要翻一番。<sup>48</sup>

在江蘇的整場運動中，所有那些在大串聯中謀得一官半職的前造反派領袖都被打倒，部分老資格的民政幹部好不容易獲得了「革命階級」的標籤，也被牽扯進去。許世友將軍領導下的軍隊最終完全建立了對整個省的絕對控制。該運動牽涉到了江蘇革委會常委的大部分成員：28個成員中有21位受牽連。其中，所有的9名前造反派領袖都被罷免，8名老資格的省級幹部也被調查，不過並沒有全部丟了官銜。清洗運動也涉及軍隊內部，1967年夏天曾經參與攻擊許世友的軍官被孤立，受到審問，並被罷免。許多人進了監獄，其中一名顯赫的軍官在關押時死去。許多南京的造反派領袖被訊問和關押折磨得精神受創，即使後來被釋放，都難以繼續正常生活。<sup>49</sup>

1968到1971年這一時期與前兩年的群眾動員和造反運動相比，事態出現了驚人的逆轉，之前是黨政機關裏的任何人士都可能並確實受到挑戰。起先，造反派在毛澤東「造反有理」的鼓動下挑戰權威，可到後來卻成為了被鎮壓和迫害的對象。一開始，學生和工人受到鼓勵，挑戰官僚主義權威，而最後新的軍事化官僚機構鎮壓了前者。新的官僚機構進行了日益加劇的政治迫害，搞得城市裏的居民人心惶惶。所有人被迫

<sup>47</sup> Wang (1995, 224–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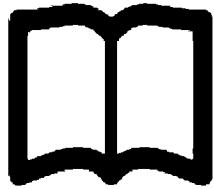
<sup>48</sup> Dong and Walder (2012b, 900–901).

<sup>49</sup> 同上，頁901及905。

從事最奴性而幼稚的英雄崇拜，將毛澤東視為幾乎超自然的存在，宣稱他的「思想」有神奇的力量。

這一階段很快就要過去，1971年9月，一架三叉戟噴氣式飛機離開中國領空，不久墜毀在蒙古的山坡上，無人生還。這件事將中國推向了新的不確定的方向。五七幹校被關閉，幹部和白領回到了原先的崗位上，軍管會被解散，軍方的人逐漸撤出了政府機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倒的民政官員官復原職，四處傳播着對文化大革命中極端行為的批判。此前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的工人終於開始變得躁動不安。先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被軍方壓制，現在又動員起來抗議自己被邊緣化。民主運動開始出現。就在毛澤東去世前幾個月，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公開表達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也間接表達了對毛澤東的不滿。

通常來說，一場空難不會產生如此廣泛的後果，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副主席林彪將軍也在飛機上，他是毛澤東的既定接班人，被廣泛認為是毛澤東崇拜的始作俑者，同時掌控着1968年以來實際控制幾乎整個國家的軍方。據傳，他發動政變，暗殺毛主席未遂，隨後逃離中國。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不諧之音與異見之人

在林彪出事之前，他的下屬就遇到了政治麻煩。這意味着林彪自己很快可能面臨被降職，甚至更糟的情況。毛澤東的決斷總是讓人出乎意料，許多黨內高層都成為受害者，與他們不同的是，林彪並沒有默默地走下政治舞台。很明顯，他試圖逃往蘇聯，但是飛機在途中墜毀。林彪的出逃帶來了重大的政治影響。官方是這樣向民眾解釋這一事件的：林彪在一場政變中企圖暗殺毛主席，但未能得手，在逃亡蘇聯的途中，他的飛機燃油耗盡，機毀人亡。

無論林彪事件的真相如何，他的死激發了一連串的政治效應，決定性地改變了中國政治的走向。林彪在軍隊中推廣了印有毛澤東語錄的「紅寶書」，並最終由紅衛兵擴散至全國人民幾乎人手一冊，並成為毛澤東個人崇拜中「無限忠誠」的象徵。林彪確保軍隊對文革的絕對支持，並利用一切機會發表對毛澤東的溢美之詞。林彪本是毛澤東路線的忠實擁護者，可現在居然被揭發出來是個叛徒，這讓人們開始懷疑毛澤東的判斷力，乃至毛本身的能力。人們甚至開始懷疑整場文化大革命背後的邏輯依據。

林彪事件對毛澤東本人也是一次重大的打擊。他非常傷心，一連幾個月都沒有露面，1972年的時候還得了一場重病。<sup>1</sup>為了做出回應，毛

<sup>1</sup> Teiwes and Sun (2007, 31–3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56) 認為，

288

澤東改變了先前的政策。許多資深的領導人在文革期間被打倒，毛澤東決定修補與他們的關係，並將文革的極端暴力問題歸咎於林彪和林在軍方的小圈子。起初，毛澤東重用周恩來，試圖依靠周恩來重新修復關係，摒棄近幾年來破壞力驚人的極端政策。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周恩來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批林」運動，譴責林彪集團在文革期間採取的極端暴力行為。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毛澤東授權周恩來重新建立中國的民政管理機構，並慢慢撤出人民政府中的軍方人員。

修補創傷的工作不經意間又引發了新一輪的衝突，給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再次帶來動盪，直到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軍方的人要撤出政府，空出的職位由誰來填補？有兩類人都想獲得職位：第一類是在文革期間被「靠邊站」的民政幹部、有經驗的黨員和專家，此時許多人還在工廠生產區下放勞作或是在農村進行勞動改造；第二類是先前的造反派，他們早幾年間發動了對老幹部和專家的攻擊。雖然他們中的部分人還在軍管期間擔任一些名義上的職位，但絕大多數人都丟了先前在革委會的官職，或是在1968到1971年的清洗運動中被打倒。軍管時期，大家都保持沉默，而到了這時候，這兩類人之間的敵對狀態時時刻刻都會再次爆發衝突。

在林彪時代結束後，中國的政治需要糾正先前所犯下的錯誤，這就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這一問題一直是毛澤東人生最後幾年的首要矛盾。不可避免地，人們要問這樣一個題：到底誰來接管領導權？什麼樣的作為和政策會被認為是「極左」的錯誤路線？什麼是毛澤東路線的決定性因素，一旦脫離就要不惜一切代價取締？對這些問題，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人們有不同的回答，從上到下意見都非常不統一。在國家領導層中，在文革中被「靠邊站」的元老級官員，現在對於「過度極端」有更廣的視角，樂意恢復很多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路線。中央文革小組中得以倖免的成員和他們的支持者則不同，他們認為糾正文革極端路線本質上就是徹底否定文革本身。類似的政見分歧在各級領導中都有體現，

---

毛在1972年1月治療肺部感染時健康惡化，幾乎喪命。

更讓早期幹部和造反派領袖走到了互相的對立面上。在一些緊要關頭，毛澤東緊急介入，希望妥善處理這些不和，平衡好在國家領導層中互為對抗的力量。可是毛澤東的政策非常模糊不清、完全無法預測。兩派爭論喋喋不休，毛澤東就時而支持這一方，時而支持另一方，搖擺不定。年邁的毛澤東讓他晚年的中國政治動盪不安。

就在這些衝突還未解決時，又有一股力量登上舞台：那些沒有捲入派系鬥爭但又在文革期間吃盡苦頭的普通民眾。他們曾經十分活躍，但認為自己遭到背叛，老少市民對派系武鬥深惡痛絕，生活很受影響，他們受教育和獲得晉升的途徑因文革而受到阻礙。這一階段的早期，他們批評那些極端化的毛澤東思想，後來這種異見的表達越演越烈，在毛澤東死前不久，北京、南京和很多其他城市都爆發了大規模街頭遊行。這些運動孕育着新的政治理念的種子，在後來短暫的民主運動中更為公開地表現出來。這些群眾運動象徵着：極端政策喪失了民眾支持，毛澤東退出舞台之後，這些政策將難以為繼。

## 批林運動

批林運動從1972年早些時候開始，引發了一系列衝突。官方對林彪事件的解釋有很大一部分顯然是捏造的，尤其是其中對林彪性格和動機的描述。林彪的飛機在蒙古墜毀，林也在空難中喪命。蘇聯的官員找到了空難現場，確認了林彪的遺骸，也找到了其家庭成員的屍體。但是，林彪並不是官方所宣傳的那樣是一個「野心勃勃、渴望權力的陰謀家」。事實上，林彪並不情願擔任如此重要的政治角色，被選為接班人後也整日惶恐不安。<sup>2</sup>沒有什麼證據能說明林彪參與了顛覆毛澤東、奪取政權的政變活動。不過，也有跡象表明林彪的兒子，一名很有影響力的空軍將領，可能與其他年輕官員有過密議，要在父親失勢時組織反抗，但談話最終被泄露。

<sup>2</sup> Teiwes and Sun (1996) 對這一點，有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

290 很明顯，在1969年晚些時候，毛澤東就已經意識到他在1968年賦予了軍方過大的權力，並深深感到不安。毛澤東的位置要想坐得安穩，絕大部分要依靠軍方的支持，而軍隊掌握在林彪手中。中共九大之後，各省黨委才得以重建，而林彪領導的軍方在各級黨委中都佔據了關鍵的一席之地。1971年8月，在一共29個省級黨委中，有22個省的一把手是軍方的官員，軍方的人也佔據了各省黨委的大多數，很大程度上擠壓了非軍方背景的毛主義者。<sup>3</sup>

政治局中林彪手下的將領們和中央文革小組中倖存的激進派本就不和，到了1970年，矛盾更加激化。陳伯達改變了立場，放棄之前的非軍方盟友，投靠了軍方這一邊。隨着領導層內的鬥爭越來越激烈，毛澤東決定打壓一下軍方的勢力。陳伯達首當其衝。陳伯達雖然是毛澤東思想的早期設計者之一，一生都在踐行毛澤東的暴力革命理念，但1971年1月，他作為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上的領頭人被批鬥成一名「偽馬克思主義者」、「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毛澤東想讓林彪集團的軍官們做出自我批評，可是他們的回應並沒有讓毛澤東滿意，於是毛就在軍方採取了人事調動，確保軍隊對自己的忠誠。而在此當口，林彪的兒子據傳開始和別的軍官密議，要排擠非軍方的激進派，並反抗毛主席針對自己父親和整個軍隊系統的措施。林家老少匆匆忙忙地登上了一架小型客機，因為怕追捕隨時到來，起飛時都沒來得及加滿油。雖然這是看起來最合理的官方公開的事件描述，但由於官方保密，真相依然模糊不清。<sup>4</sup>

無論事實如何，這就是官方的故事版本。隨後的批林運動改變了中國後續的政治走向。政治局中林彪的左膀右臂都被清洗、抓捕，軍隊人事重新洗牌。但是林彪事件給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出了個難題：該如何向公眾解釋此事，才能避免可能出現的政局動盪呢？最終傳遞到黨政機關和人民群眾耳朵裏的信息包含了四個關鍵點：第一，林彪試圖發動軍

<sup>3</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00).

<sup>4</sup> Jin (1999, 163–199), Leese (2011, 231–237),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25–336), Teiwes and Sun (2007, 31–34).

事政變奪權；第二，林彪和他的同黨們鄙視那些幫助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非軍方激進派們；第三，林彪和他的同黨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十足的浩劫；第四，他們蔑視毛主席的權威。

1972年1月，中央下發了〈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這份文件成為批林運動的核心基石，但也是事件中最耐人尋味的一點。文件首先下發給全黨全軍的各級領導層，隨後是全體黨員，民眾也大都從黨員口中知道了文件的內容。文件的核心據說是被指控的林彪同黨寫下的筆供的複本，表達了這群政治陰謀者發動政變的動機背後的邏輯。<sup>5</sup>

無論這些材料到底是怎麼來的，其中的內容讓人震驚不已。文件表達了對毛澤東和文革的強烈不滿。中央下發這份文件作為「學習材料」，無非是想證明林彪是個叛徒，否則中國民眾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但是作為針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以及幫助毛發動文革的政治領導人的罪證公訴，文件中的批評着實打擊了許多黨內領導、無數黨員和人民群眾。事實上，文件所列舉的每一條激烈的批評都有其事實基礎，幾乎每一位讀過的人肯定都知道。

文件的第一個主題是：林彪和他的密謀同黨們不認為文革是一場偉大的勝利，反而讓中國社會變得一團糟，「政局不穩……廣大農民被壓迫，經濟陷入停滯，人民群眾、基層幹部和士兵的生活水平下降，大家都很不滿，但敢怒不敢言……領導層非常腐敗，混亂不堪，沒有能力……領導層內部就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的事情發展到了極致。」<sup>6</sup>

文件列舉了所有在文革中受害的人員名單，表達了他們所承受的痛苦。農民生活被忽視：「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把年輕人送到鄉下本質其實就是「勞改」。紅衛兵先是被利用，隨後被拋棄：「最初紅衛兵被欺騙和利用，成了火炮的彈藥，而到了後來，他們又被壓迫，成了替罪羊」。民政幹部也怒火中燒，「被壓迫、被攻擊，敢怒不敢言。」<sup>7</sup>

<sup>5</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37–339), Teiwes and Sun (2007, 34–35).

<sup>6</sup> Kau (1975, 81, 84).

<sup>7</sup> 同上，頁84。

對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那些激進派——即五年之後被定性為四人幫的成員，文件表達了輕蔑。這些人被說成是騙子和偽善之人，「筆桿子托派集團任意篡改馬列主義，為他們的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辭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事實上，根據作者所言，他們的政治綱領無非是法西斯主義的一種新形式：「他們的社會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台相互殘殺，相互傾軋的絞肉機。」<sup>8</sup>

毛澤東崇拜的頂點剛剛過去，這份文件上對毛主席的評價讓人大吃一驚。毛主席在他們的筆下變成了一個獨斷、專權、冷血又兩面派的人，「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文件中指出，毛澤東清洗了那些曾經為自己鞍前馬後的忠實同志，「歷史上看，有哪一個人不是開始被他捧起來，後來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今天是座上賓，明天卻成了階下囚……沒有一股政治力量能和他共事始終……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sup>9</sup>

作者認為毛澤東絕不是偉大光輝的崇拜形象，反之，毛是一個獨斷的暴君，一個政治騙子，比中國歷史上那些糟糕的皇帝好不到哪裏去，「他濫用中國人民的信任和地位，歷史的走向反面……實際上成了當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sup>10</sup>

現在我們也只能做些猜測：為什麼這份文件對毛澤東和文革批評得如此之狠，他還要將它發給全國傳看。沒有毛澤東的許可，這份文件是不可能下發的，這就更加奇怪。<sup>11</sup>不過，此事造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sup>8</sup> 同上，頁83。

<sup>9</sup> 同上，頁89。

<sup>10</sup> 同上，頁83–84。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的建立者，首次通過武力統一中國。他成為一個專制暴君，焚書坑儒，秦朝很快就滅亡了。

<sup>11</sup> 根據Teiwes and Sun (2007, 35)，至少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反

這份文件對於毛澤東來說，就好比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講話對於斯大林一樣，將他批判成一個獨斷專行的暴君，嚴重破壞了毛澤東在意識形態上的光輝形象。不需要別人說，普通民眾自己知道在過去的幾年裏生活有多糟糕，他們自己知道生活水平依舊很低，事實上變得更糟了。可這還是頭一回閱讀到對自己生活的苦難如此直白的批評。激進派是自私自利的騙子，意識形態的變節者，發明了「社會主義法西斯」這樣暴力的新東西。毛澤東自己則變成了一個毫無章法的暴君，比橫徵暴斂、最後導致第一個統一王朝覆滅的秦始皇好不到哪裏去。

誠然，那些始終堅定信任毛澤東的人看了這份文件，一定會覺得這是最壞的叛徒的無稽之談。這可能是他們應該作出的反應。但是很多其他人肯定會覺得這份文件道出了他們長久以來不敢說的心聲。那些在文革中被虐待、清洗或是受了大苦的人也會很認同上面說的話，包括很多那些早期滿懷理想響應毛主席「造反有理」號召、隨後卻被無情鎮壓的人。這份文件給中國老百姓展現了一個與官方宣傳截然相反的對事實的解讀，也提供了批評文化大革命、批評激進派甚至批評毛澤東的言辭素材和樣板。這份文件的影響不久就會顯示出來。1970年代，城市街邊海報和地下刊物上都開始出現相似的言語和情緒，這代表當時中國出現了第一波公開異見的跡象。這些內容甚至出現在了1976年3月末4月初的天安門廣場乃至中國的其他地方，而六個月之後，毛澤東的生命也將走到盡頭。

## 1972–1973：恢復政府職能

批林運動也旨在重建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並使政府官員恢復原職。林彪被描繪成一個在文革期間扭曲毛主席本意、極端行事的極左分

---

對分發這種材料，因為它所包含的內容極不利於毛澤東的美好形象。出人意料的是，毛澤東否決了紀的意見，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分發材料。

294 子，而文革造成的破壞也被歸因於林彪集團的密謀：肆意擴大毛澤東崇拜、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害人無數、破壞人民政府組織、修建農村勞改營迫害官員，這些事情都是為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權力所做的極左掩護。上百萬張毛和林同時出現的照片，以及「紅寶書」和其他帶有林彪語錄或者題詞的材料都被銷毀。<sup>12</sup>

以這場運動為政治掩護，毛澤東依靠周恩來逐漸開始修復所造成的破壞和千瘡百孔的政府機構。這期間毛澤東自己身體不適，深居簡出，而周恩來主持日常工作，直到1973年晚些時候。<sup>13</sup>公眾場合的毛澤東崇拜儀式被取消，五七幹校關門，數百萬官員和知識分子不必再受「勞動改造」之苦，回到了城市和他們原來的崗位上。大學開始招收少量的「工農兵」學生，教授一些短期、基礎的課程。各級黨委在1966年以來都陷於停擺，現在開始重建，功能逐漸恢復後，革委會的權威開始下降，黨委的權威開始上升。

在周恩來主事的這一段時間內，工作中心就是給官員平反，讓那些曾經受過屈辱的官員重新回到重要崗位上來。1972年3月，周恩來準備了一份超過400人的名單，上面都是經過審查、並且能力符合要求的高級官員。周恩來將這份名單遞交給毛主席看，毛澤東也同意了。因為黨委得以重建，基層政府的官員復位工作進展得也很順利。這一點在中共十大上達到了頂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中央委員會人員組成和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很有不同：現役軍方的官員數量急劇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前幾年飽受屈辱的政府官員。最重要也最令人驚訝的回歸者當屬鄧小平。1967年，他被批鬥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第一號走資派是劉少奇，在1969年患病，因為無法及時得到治療而去世）。有了毛澤東的允許，鄧小平在1973年2月從江西返回北京，並重歸中央委員會，任副主席一職。<sup>14</sup>

鄧小平一路升遷，在1973年接任周恩來的工作時達到頂峰，這都

<sup>12</sup> Leese (2011, 238–239).

<sup>13</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39–347).

<sup>14</sup> 同上，頁360–365；Teiwes and Sun (2007, 42–85).

是毛澤東的主意，他認為周恩來從1973年下半年起就不那麼配合自己，覺得鄧小平是個可以替代他的更合適人選。<sup>15</sup>政治局裏的激進派們不相信周恩來，深深質疑周所做的事情。激進派認為周恩來就是個妥協之人，經常試圖批評文革中具有破壞性的一面，並且願意為了行政的有效性而犧牲毛澤東的綱領。1972至1973年，周恩來發起了對極左主義的嚴厲批評，並在地方上給老幹部復位，擠壓了各省造反派的利益，因此政治局的激進派們都極力反對。<sup>16</sup>他們抓住周恩來與美國談判的機會，說周恩來出賣中國的國家利益，並真的讓毛澤東相信了他們的觀點。隨後，周恩來失去了共和國總理這一關鍵職位。<sup>17</sup>

此事對國內政治帶來了兩大影響。首先，鄧小平接替了周恩來，繼續重建政府部門，修復文革造成的破壞。其次，政治路線發生了偏移：不再批判文革時期的極端做法，轉而防範回到文革之前的企圖。這一點在批林運動的改變上就能看出端倪。1974年1月，批林運動變成了「批林批孔」運動。對林彪罪名的解讀也出人意料地變了：他現在被說成是一個反對文革的人，暗中想恢復文革之前的一切制度，是個像極了孔夫子的反動派。孔夫子則被描述成只會委曲求全、只想着穩定和諧的和事佬，恰好代表了那些反對革命的反動社會階級。其實這些也是周恩來的品質，因此周才是這場運動本質上反對的對象。<sup>18</sup>這標誌着現在是時候反對那些企圖恢復到文革前狀態的逆流了。

## 1974：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批林批孔運動有兩大目標，第一，延續先前批林的路線，徹底根除軍方對政府的影響。起先的批林運動大大降低了軍方在中央政府和地方

<sup>15</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58–360).

<sup>16</sup> Forster (1990, 116–118).

<sup>17</sup> Teiwes and Sun (2007, 85–109, 132–146), Vogel (2011, 61–79).

<sup>18</sup> Forster (1990, 118), Goldman (1975),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66–373).

296 政府中的影響力，但是沒有被牽連進林彪案的軍方官員依然在許多地方身居要職，民事官員還未完全掌控政府。1973年末，各大軍區進行了規模巨大的人事調動，軍區首腦都調到了新的軍區。有些資格很老的軍方將領在1968年以來建立了自己的影響圈子，可現在到了新環境下，失去了原有的人際資源和地方盟友。批林批孔運動的第二個目標就是暫緩撤銷文化大革命的相關政策。周恩來運用先前批林時的趨勢，讓政府機構效率更高，這同時意味着老幹部和黨領導將會重回要職。1974年的批林批孔正是毛澤東在幕後支持的一場運動，因為毛澤東陣營的人們並不希望老幹部快速回歸，也不希望文革的經濟和教育政策這麼快就被改弦更張。<sup>19</sup>

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正式啟動，公開鼓勵人們批評那些反對文化大革命目標、希望恢復舊制的官員。這既包括地方軍事官員，也包括老資格的政府幹部。在許多地區，一大批地方力量動員起來，充分利用中央的這一模糊指示。一批造反派領袖在文革期間先是獲得了要職，隨後在軍事管制期間被軍方排擠，給老幹部復位時又沒有重獲官位，現在他們抓住了這個機會。先前的造反派利用這一運動，重新建立自己的影響力，在政治的舞台上默默無聞好幾年之後，現在希望能夠重新回到原來的位置上，與老資格的政府幹部再次形成對抗的局面。因此，這次運動激發了群眾動員和街頭抗議，被稱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或是「第二次奪權運動」。<sup>20</sup>這次運動給全中國又帶來了動盪的局面，也激發了反對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抗議浪潮。

1974年在杭州發生的事件非常符合「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內涵。在批林運動期間，許多老幹部重回要職，可這也損害了那些與先前造反運動有關之人的利益。<sup>21</sup>1973年下半年，這些人鼓動自己的勢力，批評那些現在於各省當政的幹部，要求給自己黨員身份並獲得省市級政府或

<sup>19</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58–373), Teiwes and Sun (2007, 110–118, 146–171).

<sup>20</sup> Teiwes and Sun (2007, 111, 172–178).

<sup>21</sup> Forster (1990, 110–114).

是工廠的領導職位。在工會組織重建工作上，年輕的造反派和老資格的幹部互不相讓，都試圖獲得主導權。<sup>22</sup>1973年下半年，由於未能入黨，也未獲得官職，不滿的反對派們在全省聚集起來，打算去北京抱怨自己遇到的不公。杭州的街頭也出現了大字報，批判省領導。接近年底時，一群不滿的造反派來到省黨委駐地，圍住了省領導，對他們惡語相向、拳打腳踢，要求獲得更多的任命。造反派的領袖們安排了更多的攻擊活動，準備向省領導發難，並在當地的大工廠鼓動工人組織起來反對「錯誤的政治路線」。<sup>23</sup>

批林批孔運動體現了最高層對捍衛文革的支持。省級領導很快受到合力攻擊，因為造反派組織起了大規模的集會，宣告「反抗反動派有理」，並呼籲對抗「資本主義的反撲」，阻止他們「恢復舊制的企圖」。<sup>24</sup>造反派對省領導提出了許多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將他們中的數百人任命為政府重要職位的官員。作為反擊，當地政府一口氣吸收了8,000名新黨員，並將其中3,000人提拔到領導崗位上。<sup>25</sup>第二項要求是建立工人民兵組織，隨後在全省範圍內組織了起來。起先他們的武器只是鐵棍，在杭州和其他城市的民兵感到害怕，他們時不時地攻擊守衛工廠和其他設施的官兵。杭州的造反派領袖宣稱，組織民兵是為了從軍隊手中奪權。<sup>26</sup>民兵慢慢地獲得了更先進的武器，發生的衝突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1967年時的武鬥，衝突擴散到了杭州的一些大型國企，並干擾了鐵路運營。當局面對衝突的蔓延，表現得束手無策。<sup>27</sup>

而在南京，運動沿着另一條路徑開展。批林批孔的主體是普通市民。他們在先前的政治運動中是受迫害者。在南京，老省級領導利用這一運動徹底消除軍方在江蘇政府部門中的影響，造反派領導在這一運動

297

298

<sup>22</sup> 同上，頁120–128。

<sup>23</sup> 同上，頁133–139。

<sup>24</sup> 同上，頁144–145。

<sup>25</sup> 同上，頁148–151。

<sup>26</sup> 同上，頁152–155、163–164。

<sup>27</sup> 同上，頁155–159、172。

中發揮的作用很小：在此前，造反派幾乎被軍方摧毀殆盡，成為政治舞臺上一股非常小的力量。政府幹部聲稱自己是這些造反派的支持者，批判軍方在1971年「反五·一六」運動中對他們的粗暴的鎮壓行為。在南京也出現了民眾抗議示威，但帶頭的都是一些在文革中受苦的人——主要是數萬被貼上政治標籤隨後被趕出城市的民眾。<sup>28</sup>

1968年以來，許世友將軍在南京實行的是鐵腕整治，在江蘇省重建黨組織時，他非常不情願讓政府官員回到核心崗位上。到了1973年底，依然有二千多名軍方人士在黨政方面擔任要職。江蘇省區一級的黨委一把手都由軍方控制，68個縣一級的黨委書記中，也有39名是軍方人士。<sup>29</sup>許世友在1973年底被調往廣州軍區，離開了南京軍區，政府幹部這才有機會將剩餘的軍方勢力清除。

在南京，老幹部們發動起一場運動，批判軍方在軍管時期的鎮壓行徑，尤其是對造反派領袖的迫害。但是這樣做以後，他們又不可避免地動員起了數千普通市民，他們走上街頭，控訴軍管時期自己受到的不公。對前幾年軍方行動的控訴讓曾經被驅逐出城市的市民們湧了回來，希望回到家中，並獲得原先的工作。在軍管開始時，江蘇省有超過35萬人被強制送往農村，光是南京市就有13萬人。許多人都來自所謂「剝削階級」家庭，或是政治背景「不清楚」。1974年1月下旬，數千人回到南京城，向當局提出申請，希望重新獲得城市戶口，重回工作崗位。接近三個月來，這些上訪者都在省市黨委駐地前抗議示威，張貼海報，詳述他們的苦難，並時常組織街邊遊行。他們的活動引來許多人觀看，干擾了中心城區的交通。這一窘境一直持續到4月份，上訪者變得憤怒起來，大批湧向火車站，要求登上北京的列車，去北京上訪。乘務員阻止他們上車，他們就坐在鐵軌上，使得京滬鐵路癱瘓數日之久。

299 南京當局與抗議者談判，並達成一致，隨後鐵路恢復暢通。政府願意為抗議者找工作，讓他們回到原先的單位，但是這又不經意間造成了

<sup>28</sup> 這些段落中有關南京的描述是基於 Dong and Walder (2012b)。

<sup>29</sup> 同上，頁902。

更大的問題。上訪者成功的消息一傳開，又有5萬人從南京周邊的鄉下湧進城來，要求獲取同等對待。政府不可能和這麼多上訪者談判，抗議者因此再次堵塞了城區交通，或是湧入車站要求去北京。鐵路再次癱瘓，有些上訪者竟然在高速公路上截下公交車和卡車。前去阻止的官員被圍起來，有些還挨了打。在運動結束之後，政府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將街上的上訪者清理乾淨。

在廣州，另一股反對文革的力量在運動中登上舞台：先前的造反派活躍分子發起了一場自覺的政治批評運動。在廣州，這些政治上非常敏感的造反派們走上街頭，同樣抗議軍管時期受到的壓迫，但是他們做的不僅如此：他們同樣批評文革本身，這為後續另一種不同的政治意識埋下了種子。這些想法被寫成一篇長文章，貼在大街小巷，被廣泛討論和印刷。這一事件被廣泛地認為是中國197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的開端，開始呼籲中國政治體系的改革，加強民主和法治。<sup>30</sup>

1968年廣州軍區鎮壓反對派力量時，廣州的「紅旗」派反對軍管，因此受到嚴厲打擊。1972年10月，「紅旗」派先前的領導從監獄中釋放，共有約三十人，他們與其他一些被迫害的老幹部一道，討論為什麼文革會失敗，他們的批評集中在當地的軍方力量上。這樣，在1973年下半年，其中一些人開始批評所謂的「林彪體系」，並開始起草文章，相互傳看。1974年2月批林批孔運動開始時，作者們就開始將這些文章做成大字報貼在牆上，並用集體署名「李一哲」。<sup>31</sup>最著名的文章就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1974年11月，文章被張貼在廣州城的醒目位置。這是一系列的大字報之一，這些大字報給官員施加壓力，要求釋放更多的前「紅旗」派人士。

這群人組織起了一連串的公眾集會和示威遊行，與其他深懷不滿的群體聯合起來：退役的士兵希望漲工資，年輕的工人對工資和生活條件不滿，下放的青年和從前的紅衛兵希望懲懲那些在1960年代末犯下罪

<sup>30</sup> Chan, Rosen, and Unger (1985, 9–16, 31–86).

<sup>31</sup> 同上，頁2–6。這一筆名借用了三位合著者的名字：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

行的軍隊官員。<sup>32</sup>這些行為獲得了新上任的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的同情，趙紫陽自己在文革期間也被迫害，同樣希望撤銷軍事管制。幾個先前將批判矛頭指向軍隊的紅衛兵領導負責批林批孔，其中的一名受命調查軍方干涉地方黨報的案件，此事讓他們有機會公開發表先前只是在地下傳看的文章，並進一步向省領導請願。<sup>33</sup>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一文雖然肯定了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但是此文也展現了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文章最初的批判目標就是「林彪體系」，文風與前些時間流傳的批判「林陳反黨集團」的文件一致，文章作者譏諷道：1960年代後期半宗教性質「無限忠誠」運動不是現代社會主義，反而像古代的封建帝王崇拜。<sup>34</sup>他們抨擊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和一打三反運動中獨斷專行的作風，認為所謂的「反革命成分」定位十分模糊。他們反對那些希望回到文革狀態，整天壓迫、毆打、折磨，只為找出假想中的叛徒和階級敵人的人。他們認為，所有這些暴力行徑標誌着新的統治階級正在形成，這個階級用強迫手段和王權崇拜來鞏固自身的獨裁，阻止中國走上社會主義民主的進程，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中國缺乏真正的民主，以及制約官員權力的法律。沒有保障措施來捍衛人民免遭虐待的權利以及對強制權力的法律束縛，社會主義將會變成一種「社會主義法西斯」，這種現象就出現在最近三年的「林彪體系」中——換句話說，就出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sup>35</sup>

301 文章的初衷是反對1974年批林批孔所代表的政治走向。文章的作者認為，新的運動只不過是為了回到文革時期的社會主義法西斯狀態下。他們認為，真正需要的不是反對恢復文革前的制度，而是建立新的制度，保護人民的民主權利，制約獨裁迫害，減少那些當權者的特權。<sup>36</sup>這是一種嶄新的政治思維，文章的作者和其他立場相似的人成為

<sup>32</sup> 同上，頁9–12；Rosen (1985, 4–5).

<sup>33</sup> Chan, Rosen, and Unger (1985, 6–9).

<sup>34</sup> Leese (2011, 243–244).

<sup>35</sup> Chan, Rosen, and Unger (1985, 32–85) 可見此文的完整譯文。

<sup>36</sup> 同上，頁10–13。Moody (1977, 209–216) 首次概述了此文並進行分析。

1978至1979年後毛澤東時代民主運動的領軍人物。<sup>37</sup>

文章抨擊一黨專政，這給中央的政治人物敲響了警鐘，政治局中的激進派更為震動，尤其是江青。江青批評這篇文章是「自解放以來最反動的」東西。1975年早些時候，廣州城內召開了對這篇文章的批判運動，作者被拉到公眾大會上批鬥，此外還在學校和工廠的集會批評這一文章的論點。文章作者被流放到農村，針對贊同此文章觀點者的調查案件就有數百起。<sup>38</sup>

每個地方的抗議活動性質不一，但是1974年中國很多地區社會動盪迭起，造成嚴重的經濟問題。在工廠、鐵路樞紐、造船廠，先前的造反派領袖挑戰老幹部，因為後者希望重獲權威，並執行工作紀律。除了上述的南京和杭州外，上海的碼頭工人也開始罷工，抗議再次實行工資按件計算的制度。在鐵路系統中，派系鬥爭，尤其是在重鎮徐州，讓運輸嚴重受阻。鋼鐵、煤炭和其他重要物資堆在生產地運不出去，供應短缺造成生產停緩。1974年前三個季度，工業產量下降，近幾年稍微向好的經濟又開始下跌。

到了10月，這些問題最終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呼籲要保持「團結穩定」。很明顯，毛澤東希望造反派力量對抗那些企圖恢復到文革前制度的人，但同時也不想回到全國混亂、不得不大規模依託軍隊力量強制恢復秩序的1968年。接近年底時，毛澤東最終命令中央的官員果斷採取措施，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他重新啟用了鄧小平。鄧在1975年早期開始着力實施恢復秩序，發展經濟的政策。<sup>39</sup>

302

## 1975：恢復秩序，穩定經濟

有了毛澤東的准許，鄧小平果斷地恢復黨組織的建設，將民事機構

<sup>37</sup> Chan, Rosen, and Unger (1985, 16–28), Rosen (1985).

<sup>38</sup> Chan, Rosen, and Unger (1985, 13–28)記錄了作者們此後的遭遇，他們在毛澤東去世後不久就被逮捕監禁，最終在1979年被無罪釋放。

<sup>39</sup> Forster (1990, 164–172), Teiwes and Sun (2007, 197–199).

中的軍方人員全部移除，並徹底終止了1974年造成經濟衰退的國內衝突。相比於周恩來，鄧小平所做的更多，做事也更果斷。<sup>40</sup>不過，到年末的時候，鄧小平的舉措又遇到了阻礙。毛澤東支持他重新建設黨組織，消除派系衝突，創造「團結穩定」的局面，認為這樣就可以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是，鄧小平所做的超出了毛澤東的預想，鄧希望為中國工業的現代化創造條件，建立更強大的科研界，並恢復高等教育。這些舉措事實上站在了「維護文革成果」的對立面。和周恩來一樣，鄧小平不久就被孤立，受到批評。

不過，在被孤立之前，鄧小平就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將軍方的勢力徹底從政府部門撤出。在一連串針對軍界領導的演說和文件指示中，他批評軍方機構冗雜，辦事效率低下，只為自己建立寬鬆舒適的環境，尋求一己私利和各種特權。他呼籲人民解放軍重新專注於軍務，不要摻和民政部門的事，因為這樣不利於軍隊時刻準備好打仗，也讓軍方紀律渙散。他指令軍方更新換代武器系統，並着力消除軍隊中的派系鬥爭。1975年8月，他要求一切軍方人員從政府崗位上撤出。<sup>41</sup>

鄧小平同樣發起運動，重建全國的黨組織。他幫助黨委書記們恢復權威，並繼續平反老幹部和技術專家。他強調，黨的權威是不可侵犯的，決不允許挑戰黨的權威。他同時要求重新調查1968年之後入黨的黨員，不符合資格要求的、沒有紀律意識的、還抱着派系鬥爭不放的，一律開除出黨。那些喊着升到領導層位置，或是已經坐到領導層位置的人，應該回到基層，先去積累領導層所必備的經驗。<sup>42</sup>

鄧小平指導了一場強有力的運動，着力解決派系鬥爭問題。首先關注的就是全國鐵路運輸系統，隨後推廣到煤鋼等關鍵產業。這一行動的突出表現是他對徐州鐵路局的撥亂反正。徐州是江蘇省北部的交通要地，對華東華北的運輸起着關鍵作用，可是深深的派系鬥爭嚴重影響了徐州鐵路樞紐的運作，1975年2月，他將鐵路系統的權力從地方收歸中

<sup>40</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81–382).

<sup>41</sup> 同上，頁388–391；Vogel (2011, 97–98).

<sup>42</sup> Vogel (2011, 121).

央，並成立鐵道部，在中央文件中將那些反抗這一政策的派系描述為「走資派」，將那些破壞鐵路設施的人認定為「反革命」。他將一個工作組派到由鐵道部領導的徐州鐵路局，並將先前的局長——一位造反派領袖——抓了起來。原局長的支持者們企圖抵抗，也一並被抓。工作組召開了一系列公眾集會，批判了派系鬥爭，要求立即杜絕破壞事件的發生，並完成運輸任務。工作組將一大批活躍分子調走，取締了地方上的派系網絡。<sup>43</sup>徐州的經驗被迅速推廣到全國，鐵路系統的困難很快被解決。鋼、煤等關鍵生產領域在文革期間也遭受到類似的破壞，現在也採用徐州模式進行恢復。<sup>44</sup>

在浙江，曾經在1974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時期組織起工人民兵組織的造反派們對鄧的調整政策十分抵制。鄧小平派出了一個強有力的工作組，到杭州解決這一問題。造反派頓時倍感壓力，工作組在凌晨突然來到該派系的大本營，帶走了造反派的一號人物翁森鶴。人民解放軍進駐杭州城內外各大工廠，以防止社會動盪，其餘的造反派領袖也受到懲罰，工人民兵組織被解散，省領導層人事進行改組，以配合這一調整措施。<sup>45</sup>

304

## 激進派的最後抵制

鄧小平果斷地恢復秩序，重建黨的組織權威，這些都是他的本職工作。毛澤東早就清楚，要把政府機構中的軍方勢力徹底清除，而鄧很好地完成了這一任務。毛主席希望黨組織能夠快速恢復，先前被打倒的幹部能夠回到崗位，發揮作用，而鄧小平都積極地推進了這些日程的發展。毛澤東同樣意識到要維護「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成果」，其中並不包括擾亂生產和社會秩序的派系鬥爭。毛澤東想要秩序、紀律和穩定，他認為這些可以幫助維護文革的成果。鄧小平使用的主要的政治手段：建立

<sup>43</sup> 同上，頁103–109。

<sup>44</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82–387), Vogel (2011, 109–114).

<sup>45</sup> Forster (1990, 198–219; 199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86–387).

黨不容置疑的權威、強調團結守紀。這些舉措都沒有僭越毛澤東的界限。

但是，鄧小平做的不僅僅是政治舉措，同時也在建立現代經濟的基礎。雖然現在看來這些舉措十分溫和，但是當時可能已經讓毛澤東懷疑鄧小平，認為他對文革不忠誠。鄧小平在毛澤東死後開啟了市場經濟改革，從這一點上看，毛澤東當時的擔憂不是多餘的。鄧小平採取的多項措施不僅僅是為了恢復秩序、維護穩定。他授權起草了一份重振中國經濟，恢復發展的雄心計劃，促進國外高科技的引入，並與國際貿易規則相接軌，接觸外國信貸，通過促進按勞分配的原則，提振工人積極性，加強行業自律。第二份計劃則呼籲加強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重建中國科學院。這份計劃提倡恢復專業期刊，希望軍方和思想宣傳隊不要干預科學，引入更多的科研材料和設備，包括外文出版物，召回所有還在農村下放的科學專家，專注發展像電腦、激光、遙感等高科技領域和核能、原子物理等基礎學科。該計劃同樣呼籲振興社會科學研究，建立獨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三份計劃是關於高等教育的：計劃重申了文革前那些專家學者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大學直接從高中招生，而不是讓學生從工廠和農村裏依靠政治推薦信入學，要求大學教育中去除「強制勞動教育」這一部分，加長課程時間，增加專業訓練科目，提高學術水平。<sup>46</sup>所有這些計劃的言下之意是：中國的工業和科技已經遠遠落後其他國家，高等教育領域也十分不足。這些新政策暗含的理念再明顯不過：文革讓中國更加落後。

1975年底，毛澤東已經深深感到不安。目前我們不清楚到底是什麼事讓毛澤東迅速地對鄧小平失去了信心，但是他的態度在9月份就開始急轉直下，到了11月，毛澤東開始嚴厲批評鄧小平的「錯誤政策」。<sup>47</sup>

<sup>46</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00–402), Teiwes and Sun (2007, 324–348), Vogel (2011, 125–133, 137–140).

<sup>47</sup> Teiwes and Sun (2007, 363–381, 388–399) 詳細追溯了毛澤東的態度變化，並觀察到了在清華大學（毛澤東最喜歡的模範單位之一）中對高等教育的爭論，和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遼寧省的激進派首領）的干預，都在毛澤東

現在看來，毛澤東當時的感覺沒有錯：鄧小平對鞏固文革成果並不是很感興趣，相反，他更致力於清除文革中那些破壞經濟的政策，重建被毀壞的一切。1976年1月，鄧小平不再於公共場合出現，也失去了領導層的職位。當月，周恩來去世，華國鋒被任命為代總理，並成為第一副總理，實際上就替代了鄧小平的角色。<sup>48</sup>同時，一股強勁的「反修正主義」和「反復辟主義」運動開始了，首先針對的是在工業、科學、技術和高教領域支持鄧小平政策的官員。<sup>49</sup>這些官員在大眾傳媒和街邊大字報上被廣泛批評，公眾集會上也遭到批鬥，像極了1960年代的景象。一名官員在批鬥會上暈倒，並最後死於心臟病。這些官員的罪名是聽從了一名未有指名的「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而這位沒有指名的走資派幾乎毫無遮蓋地指向了鄧小平。

## 1976：清明節抗議

周恩來逝世，鄧小平再次下放，復辟主義被嚴厲批判，這些事情都集中在1月中旬同時發生，象徵着中國政治氣候的再一次轉向。在鄧小平主政期間被打壓的各省造反派領袖覺得機會來了，希望能夠捲土重來。在南京、杭州和武漢這樣的省會城市裏，造反派又動員起來，攻擊犯了和鄧小平同樣錯誤的當地老幹部。在這些城市，造反派領袖再一次挑戰老幹部，希望將最近任命的官員拉下馬來。因此造反派張貼大字報，在政府大樓前舉行抗議示威。<sup>50</sup>對他們來說，局勢彷彿又要再一次轉變，而他們已經準備好抓住機會，重回舞台。

而在事件中，普通市民第一次站出來反對。自從林彪死後，民間的情緒一直在悄悄醞釀，人們在地下組織學習小組，重新審視馬列主義，

---

的觀點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亦可參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04–412) 及 Vogel (2011, 140–151)。

<sup>48</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14–417).

<sup>49</sup> Teiwes and Sun (2007, 416–426).

<sup>50</sup> Dong and Walder (2014), Forster (1990, 235–242), Wang (1995, 258–265).

從前的紅衛兵開始反思自己運動失敗的原因，普通民眾開始寫作匿名文章和請願書，抨擊文化大革命、江青甚至是毛澤東本人。<sup>51</sup>在這場批判復辟主義、針對鄧小平、暗批周恩來的新運動的最初階段，相似的情緒也開始以傳單和大字報的形式浮出水面。<sup>52</sup>

1976年早春，潛伏在人們心中的情感開始以激烈的方式爆發。這種公眾情感反映的是更廣大群眾的心中所想，而不是省裏幾個造反派異見分子那麼簡單，所反映的也與1月份做出的政治轉向處在完全的對立面上。催生一切的是周恩來的國家葬禮，尤其是中央政府對人民公祭周恩來的阻止。1月15日，周恩來的官方國家葬禮規模盛大，但是相應的宣傳報道卻沒能讓群眾滿意。電視上也就是寥寥幾個鏡頭，隻字未提發表悼詞的鄧小平。葬禮後不久，中共中央就下發指令，要求禁止地方上舉行紀念周恩來的活動，反而要求人們集中力量批判「右傾之風」，這顯然是在批鄧，而事實上是在間接攻擊周恩來總理，因為在民眾眼中，周的政策和鄧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中央的這一表態激怒了公眾，並催生了大範圍的上街遊行，人們開始批判政治局的激進派，間接地批判毛澤東本人。

307

最早也是最知名的抗議活動發生在南京，始發於南京大學。南大也是南京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發源地，在1月份周恩來死訊公佈不久後，南京各大學校園和其他組織都召開了紀念儀式。<sup>53</sup>可是幾天後，中央下發了禁止紀念活動的指示，許多工作單位和學校取消了原有的計劃。但是南大依舊我行我素。當地市民對如此不充分的新聞報道非常不滿，現在居然還要被迫批判與周相關聯的政策，更是大為憤怒。官方宣傳絲毫沒有在群眾中點起熱情。南京當地忠誠於毛澤東路線的造反派攻擊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沒有表現出足夠的熱情，認為他們是鄧小平修正主義的合謀者。

<sup>51</sup> Heilmann (1993, 1996),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49–352).

<sup>52</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20–422).

<sup>53</sup> 這一段對南京事件的描述是基於 Dong and Walder (2014)、Garside (1981, 110–114) 及 Louie and Louie (1981)。

1976年3月25日，上海《文匯報》在一篇題為〈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的文章中公然說「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無論是有意的或是無意的，這篇文章的矛頭直指周恩來。<sup>54</sup>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回應，予以反擊。第二天，南京大學四處貼滿了大字報，言辭激烈地批評《文匯報》以及所有膽敢攻擊周總理的人。大字報公開批評了那些以上海為大本營的政治局激進派。江青更是覺得受到了侮辱，因為有一個大字報的作者說「想念楊開慧」。楊是毛澤東早年的妻子，被國民黨所殺。學生們遊行到南京火車站和汽車站，在出行的列車巴士上都貼滿標語，將南京進行的運動通知到其他城市，捍衛周恩來的名譽。

4月4日清明節前兩週，獻給周恩來的花圈出現在南京城大街小巷，大字報宣示「我們永遠緬懷周總理」。大量的花圈出現在南京城南部的一處小山上，這是國民黨曾經用以處決革命者的地方，解放後就成為人們緬懷先烈、擺放花圈的場所。當一個400人學生團體希望進入卻遭到阻止時，廣場門口爆發了肢體衝突。隨後，在3月28日，學生們走到城市中心，帶來大量花圈。這引來無數人上街觀看，大字報用更加犀利的語言抨擊政治局裏的激進派，捍衛周總理的名譽。一張著名的大字報寫道：「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台」，批判張春橋是一個「野心家、兩面派」。抱着深深的不安，中共中央在4月1日發佈命令，要求停止上街集會，並將花圈和大字報全部清除。

308

4月2日，北京禁止紀念活動的指令到達了南京，幹部和工人被要求遮蓋那些具有攻擊性的標語海報。<sup>55</sup>但是，這些命令並不能阻止抗議示威的擴大。由於對禁止大字報和花圈的禁令非常不滿，4月3日，抗議規模反而更加空前，抗議者張貼海報，吶喊標語，比之前更加具有對立性與攻擊性：「緬懷周恩來不是反革命」、「我們堅決和舉着白旗對抗周總理的陰謀家對抗到底」。當日，約有14萬人在城南的一處公園集

<sup>54</sup> Louie and Louie (1981, 339); 同時參看 Zweig (1978)。

<sup>55</sup> 這兩段的描述是基於 Dong and Walder (2014)。

會，接下來幾日，南京街頭的群眾人數達到60萬之多，並在4月4日達到頂峰。<sup>56</sup>南京事件同時引發了江蘇南部其他城市和縣鎮的示威活動。<sup>57</sup>

杭州市也出現了相對規模較小的類似運動。批鄧運動激怒了政府部門中的一些官員，他們張貼大字報，認為老幹部們並沒有腐化成「走資派」。《文匯報》將周恩來比作「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一事徹底激怒了民眾，他們開始張貼大字報批判上海市委，而後者其實就是政治局激進派的擁躉。4月1日，一個鋼鐵製造廠的黨員們將一個巨大的紀念花圈送到了勞動局建築的屋頂旗桿上，高處的花圈幾個街區外都能看見。杭州的其他工廠和工作單位也紛紛仿效，浙江大學的人們亦是如此。滿城的大字報宣示「反對周總理就是反對革命」、「小心那些像林彪一樣的投機分子和陰謀家奪取黨內和國家權力」。這些政治性表述在市中心的商場、大學門口以及幾處主要的廣場最為集中。像南京一樣，從杭州出發到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列車上也被人寫滿了標語。<sup>58</sup>

這些地方上的事件可能幫助催生了4月4日及5日在北京進行的更大規模紀念活動。赴京列車上的標語十分見效：天安門廣場上出現的最初幾個標語中就有「我們堅定支持南京市民的革命鬥爭」。<sup>59</sup>在北京，早在3月19號就有花圈被陸續送到天安門廣場，但是被很快清除，公安局收到指令，要記錄下那些送來花圈的人的名字。3月30至31日，南京運動的消息傳到了北京城，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圈越來越多，反對激進派的詩歌和文章被貼在廣場上，前往觀看的人也急劇增多。在4月4日前的短短幾天，約有超過100萬人到過天安門廣場。公安局在廣場一角設立了聯合指揮部，裏面都是工人民兵的成員和來自北京衛戍部隊的士兵。他們廣播宣傳清明節是封建傳統，各單位不應該派人送花圈來，南京發生的更是「反動事件」。不過，他們並沒有和人群發生正面衝突，只是逮

<sup>56</sup> Wu (2002, 22).

<sup>57</sup> Yan and Gao (1996, 492).

<sup>58</sup> Forster (1986).

<sup>59</sup> Louie and Louie (1981).

捕了小部分人，移走了一些花圈。<sup>60</sup>

4月4日清明節當天，廣場上的人數達到了約200萬人，人們送來更多的花圈，還有詩抄、傳單、海報，人們發表演講，吶喊標語。氣氛逐漸變得緊張起來，人們與公安開始發生零星的肢體衝突，有官員受傷。絕大多數的言論都是緬懷周總理的悼詞，但是和南京一樣，部分人也尖銳地抨擊政治局的激進派們，尤其是江青和張春橋。更加驚人的是，其中出現了暗批毛澤東本人的內容。這場抗議顯然是要反對毛澤東新發起的批鄧運動，但更本質的是反對文化大革命。雖然毛澤東沒有被點名批評，但是部分海報和演說已經將他設為批判的目標。當天，廣場上有一首著名的輓詩是這樣描述政治局中的激進派的：

可笑群魔不自量，  
妄想重翻腥風血雨。  
鼓唇搖舌，捧裙牽裾，  
猿猴沐冠，什麼東西！  
.....

讓那些傢伙看看吧：  
天安門前花似雪，  
紀念碑下淚如雨。  
你們不念我們念，  
你們不祭我們祭。  
.....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

<sup>60</sup> 這一段描述是基於 Teiwes and Sun (2004; 2007, 471–475) 和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22–427)。亦可參看 Garside (1981, 115–135) 和 Yan and Gao (1996, 492–501)。

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  
見鬼去吧！  
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sup>61</sup>

對政治局激進派和毛澤東本人如此直白的批評當然不會被輕易放過。當天深夜，黨內領導召開會議，決定清除廣場上的一切花圈，一些深夜還在廣場上徘徊的人都被拘捕。官方並沒有公開解釋為何清除了所有的花圈，但是4月5日早晨8點，消息很快傳開，約一萬憤怒的市民在廣場上集結，到了下午，人數又多了幾倍。人們惱怒而激動：他們集中站在人民大會堂前的台階上，要求收回花圈。一輛播送「批判階級敵人」的警車被掀翻，公安局的聯合指揮部也被抗議者佔領並焚毀。警方和民兵直到深夜都沒有和人群發生正面衝突，隨着夜幕降臨，一份北京市長的錄音批評了那些「壞分子」和「欺騙民眾的人」，要求人們都回家去。晚11點，錄音已經循環播送了許多遍，公安和民兵最終手持棍棒來到廣場上，將剩下的抗議者驅散，並在廣場上拉起警戒封鎖線。頓時流言四起，有人說廣場上死傷慘重，但邏輯不通，因為當局顯然能夠在暴力相對較小的情況下控制住廣場上的局面。次日，局面相對平靜，數千民眾來到廣場上表達他們的尊敬，他們放下一個花圈，而花圈並沒有被強制清除。

## 毛澤東最後的歲月

顯然，政治局的激進派和他們的支持者為四五事件感到惶恐不安。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在4月7日向毛澤東做匯報：「這起反革命的政治事件……公開舉起支持鄧小平的旗幟，並將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sup>62</sup>部分政治局的激進派們指責鄧小平暗中指揮抗議示威，是反黨陰謀的一部分，宣稱鄧當天就在廣場上指揮一切。毛澤東並不相信這些，但是他

<sup>61</sup> Garside (1981, 127).

<sup>62</sup> Teiwes and Sun (2007, 489).

清楚地明白這些抗議活動意味着民間存在着強大的力量，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而周和鄧只是這股力量的一個號召力。他命令撤去鄧小平的領導職位，並正式任命華國鋒作為周恩來的接班人（自2月以來華已經是代理總理了）。華國鋒同時也成為第一副主席，這意味着他成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鄧小平再一次受到公開批判，為期四個月的「批判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運動也變成了一場批鄧運動。<sup>63</sup>這一事件是毛澤東人生中最後一次干預中國的政治走向。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政治局的激進派和他們在首都內外的支持者們繼續批判鄧小平的政策，成千上萬同情天安門抗議或是表達相似情緒的人在全國範圍內受到調查，據估計，又有大約一萬人被拘捕。激進派又組織起集會遊行，慶祝「摧毀反革命逆流」。<sup>64</sup>反對老資格幹部的活動又在各省開展起來，尤其是那些1975年被鄧小平清除派系鬥爭壓制的地區。像杭州、南京這些城市，先前的造反派領袖又開始攻擊那些配合鄧小平政策、鎮壓派系鬥爭的老幹部。<sup>65</sup>華國鋒和其他領導試圖繼續維持穩定，在毛澤東設定的界限內重振經濟，但他們發現受到了阻礙：無論修補文革破壞的政策多麼溫和，激進派官員們都不滿意。

就在這一關鍵當口，毛澤東的健康開始迅速惡化。5月11日，毛心臟病發作，雖然意識清醒，但是已經臥床不起。6月26日和9月2日，毛又有兩次心臟病發作，並於9月9日逝世，華國鋒隨後任代理主席。軍隊提高警戒，嚴防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任何政治動亂。11至17日，人民大會堂每天都舉行悼念儀式，9月18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紀念集會，約有一百萬人參加。華國鋒發表了悼詞，讚揚毛澤東是當代歷史上「最偉大的馬列主義者」。全國人民在約定的時間內集體默哀，工廠和火車頭的汽笛鳴響三分鐘。鄧小平和他的親信前不久全部丟失了官位，現在也被禁止參加這些活動。<sup>66</sup>

<sup>63</sup>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27–430).

<sup>64</sup> Heilmann (1994, 46–53),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31–432).

<sup>65</sup> Dong and Walder (2014), Forster (1990),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34).

<sup>66</sup> Teiwes and Sun (2007, 551–552), Vogel (2011, 174–175).

10月初，政治局的激進派們被逮捕，官方將其定性為密謀攫取權力的「四人幫」，這與當時對林彪事件的官方解釋十分類似。逮捕「四人幫」實質上是一場政變，主導的官員非常明白這些激進派人士會成為他們的眼中釘，害怕政治局的激進派會不斷獲取權力，甚至將其中一員推到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不過現在看來，似乎並沒有證據顯示在毛澤東逝世後的幾週內，政治局的激進派們真正做出奪取黨內權力的嘗試。<sup>67</sup>

相反，抓捕行動似乎是事先組織好的。毛澤東死後一個禮拜不到，華國鋒會晤了其他高層，討論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先前已有一些高層領導私下討論過這個問題，但這次華國鋒採取主動，討論如何將其從領導層中清除。他在9月下旬與其他政治局成員會晤，討論這個問題，指出與激進分子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覺得可以在政治局發起投票，開除他們，但是這樣做風險太高，為地方上的叛亂分子提供時間喘息反抗。<sup>68</sup>「粉碎四人幫」的計劃開始加速，並將更多的官員動員起來。北京的激進分子名單也被列出，指定逮捕。在適當的時候，北京衛戍部隊將被命令佔領新華社、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機場等首都的戰略地點。

10月6日上午，政治局開會，邀請核心激進派成員參加。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到達所謂會議地點時即刻被捕。江青和毛的侄子毛遠新不久之後在家中被捕。北京衛戍部隊控制了戰略地點，行動在不到一個小時內完成。<sup>69</sup>接下來的一週內，各省、軍區的官員被召集到北京，聽取了關於此事的通報。首都30名激進分子的重要政治盟友也被捕。上海是激進派的大本營，上海的黨內領導人無法與北京的盟友取得聯繫，於是懷疑「修正主義者」已經掌權。他們10月8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動員民兵抵抗。10月12日，一些上海官員計劃向全國的反擊行動的支持者發出信號，要求大家罷工，組織示威，爆破橋樑，以巴黎公社的方式抵抗。不過，該計劃從未得以實施。上海官員被迫去北京進行磋商，

<sup>67</sup> Teiwes and Sun (2007, 536–568, 572–579).

<sup>68</sup> 同上，頁570–571。

<sup>69</sup> 同上，頁579–580。

他們回來後卻對在北京的見聞三緘其口。10月14日，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公開，上海居民對此感到困惑。第二天，當人們知道被逮捕的人員名單時，民眾對政變表現出強烈的擁護，所有抵抗計劃也都被放棄。<sup>70</sup>

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後幾週，他自己也意識到可能無法贏得這場博奕。1976年夏天，毛對華國鋒說了一段很著名的話，他對自己這場「最後的革命」在未來的評價進行了反思：

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了老家。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和平中不成就動盪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腥風血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sup>7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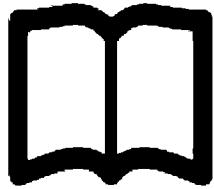
如果毛澤東認為華國鋒能夠在黨內高層的高度分化中做好平衡，從而保護好自己的激進派擁護者，那麼他再一次失算了。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他的妻子、侄子以及一眾政治盟友都被關進了監獄。在接下去的幾年中，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的榮譽被繼續保留，但是他人生最終幾年的政治遺產被否定。共產黨隨後就發動了「全面糾正文革錯誤」的運動，徹底打倒了在毛澤東生前效忠的激進派官員。外界看來，似乎這些官員，而非毛澤東，才是文革「十年動亂」的罪魁禍首。但是情況並非如此，1981年，毛澤東去世僅五年之後，共產黨就發表了官方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sup>72</sup>決議中明確地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

314

<sup>70</sup> 同上，頁584–585。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43–449) 描述了計劃和實際逮捕之間如何在細節上存在差異。

<sup>71</sup> 引自 Teiwes and Sun (2007, 595)。

<sup>72</sup> 引自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回望毛時代

毛澤東去世之際，並沒有實現他在1950年代中期所制定的目標。他的兩大成就——建立統一的中國、按照蘇聯模式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得以倖存，但是卻遭受了嚴重破壞。毛澤東逝世後，留下了一個充滿派系紛爭而又分裂的共產黨、一個需要從過去十年不斷衝擊中恢復的政府。工業化進程停滯了；農村地區普遍存在貧窮狀況；城鎮居民生活水準原地打轉，在某些方面還有所退步。高校體系有所倒退，科學技術發展落後於全球水平數十年。因為毛澤東開展的各項運動，中國在發展方面嚴重落後於其他國家。毛澤東去世後的中國落後、孱弱，基本上沒有實現1950年代初的目標。

### 意外的後果，沮喪的野心

1956年之後，基本上毛澤東的每一次干預都破壞了最初取得的成就，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例如雙百運動。毛澤東試圖在一個穩固而又安全的新社會主義政權當中，將自己打造成一位後斯大林時期自由化運動的捍衛者，即便黨內其他領導人反對，但他還是呼籲群眾公開對黨內幹部進行批判。批評出人意料地日益激烈，學生組織各類遊行示威，工人開始罷工，集體農場開倒車，農村地區也偶現叛亂，這些都表明，中國的群眾並不如毛澤東想像地那般接受共產黨新政權。對於毛澤東來

說，雙百運動後的「反右運動」在許多方面而言都是一次恥辱的失敗，這讓他重新回到堅持斯大林主義的道路上，而這對於未來而言並不是一個好兆頭。

帶來巨大災難的大躍進事實上是一次更為慘痛的失敗教訓。不同於斯大林和其他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堅信能夠以更快的速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還迅速對經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1957年改造便已經完成，遠超計劃。這給予了毛澤東巨大的信心，認為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經由政治幹部發動與內戰後期類似的動員活動，可以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動力。毛澤東對於共產黨動員中國人民的能力抱有信心，他這一判斷是正確的。噴湧而出的精力和全國範圍內的積極性在許多方面都令人震驚，很少有現代國家可以發動這樣的運動。但是，結果卻與毛澤東的預想截然不同。除了在大災荒中大量民眾餓死，這場大躍進還破壞了農業和工業，花費多年都還沒有恢復。毛澤東這一次失敗得非常徹底，於是放棄了之前自己對於經濟快速發展的執念，轉而在政治上先發制人，應對這場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失敗給自己帶來的政治後果。他生前一直在鬥爭，但並沒有獲得成功。

從文化大革命本身出發，這場運動至多可謂功過參半。它最終以失敗而告終，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文化大革命卻又極為成功。毛澤東能夠在短時間內動員大量造反者對抗黨國體制，這一體制在1967年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憑藉造反力量，毛澤東在避免黨國完全解體的基礎上，破壞了原有的黨政架構。後來，他又以革命委員會的方式建立起新的政府機構，代替原有的黨國架構。但是這些都是徒有其表的勝利。毛澤東和他的激進分子能夠在全國範圍內慾惠民眾造反，但是他們試圖引導和影響造反的努力總是落空。毛澤東最初的一些戰略失敗之後，他就不得不經常改變原有的策略和道路。學生運動在最開始就已經出現分裂，學生拒絕團結在一起。在中央文革小組插手支持一派、拋棄曾幫助他們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另一派學生之後，這一派又成為了被拋棄的那群學生所反抗的對象。這些紅衛兵異己分子被壓制，為許多忠誠於中央文革小組的學生造反派留出了活動空間。但是這些學生造反派又分裂成兩個新派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都在相互對抗。

毛澤東對學生失望之後，轉而動員工人階級。一開始，這一策略看似前景頗為光明。工人造反派聯合在一起，迅速佔領了地方黨政機關，但是工人們同樣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要求上調工資和生活水平，還有許多人被動員起來保護當地黨政領導人，與其他工人抗爭，導致工業和交通陷入癱瘓。上海的一月奪權風暴最初看起來是一種解決方案，也就是說工人階級造反派和忠誠的毛派分子聯合起來，從黨政機關手中奪權，壓制經濟需求和反對聲音。一些省份也照搬效仿，但是很快失效。1967年初，類似的奪權運動基本上都失敗了，迫使毛澤東動用軍隊進行控制。這又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因為地方武裝力量加入到造反派的衝突當中之後，又進一步加深、延長了造反派當中的分裂傾向，將地方軍隊捲入到派系鬥爭當中。

1967年春夏，造反派之間發生大規模武鬥，毛澤東試圖將武鬥的規模引導向積極的結果。他要求軍隊支持「左派」，批准造反派攻擊那些在地方鬥爭中站錯隊伍的軍隊。這樣做的後果只是加劇了武裝鬥爭，派系鬥爭導致的死亡人數也有所增加，而且現在又用上了軍隊武器。一些地區城市的所有街道在武鬥中都被摧毀，一些曾經建立起脆弱秩序的省份又再次遭受動盪。毛澤東意識到他原本想要加強造反派力量、解決區域衝突的努力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於是他又迅速轉向全面支持武裝力量，清洗中央文革小組中那些忠實執行他指示的替罪羊，呼籲群眾放下武器。在經過長達一年、試圖團結交戰雙方的艱難談判之後，毛澤東逐漸傾向於採取專制手段和軍事獨裁，嚴厲壓制那些他曾經重視的造反派領導人，用更容易擺佈的「群眾代表」來代替他們的位置。大多數倖存下來的人都成為了傀儡。

在這段混亂的時期裏，毛澤東試圖製造一種假象：這些跌宕起伏都朝着有利於實現他的終極計劃的方向發展。1968年末在中國大部分地區新設的革命委員會被認為是偉大的勝利。事實上，它們確實是一種在舊廢墟上所建立起來的政府新形式。但是它們並沒有像宣傳的那樣運轉，最終存在時間也不長。除了上海和北京，基本上所有的省級革命委員會都被軍隊官員所佔據，由委員會掩蓋軍事獨裁本質。革命委員會延伸至基層，迅速導致了一場大規模清洗運動，這場尋找階級敵人的運動所擁

有的規模和慘烈程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首屈一指。到了1969年，毛澤東突然發現，他被迫給予軍隊大量權力，而這使得他極度依賴軍隊。他試圖削減軍隊權力，但是卻導致了林彪事件的危機。

林彪的死削弱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依據，標誌着中國短暫軍事管制的結束。毛澤東餘生一直都在做着極不穩定而又不成功的努力：從早些時候的動亂當中汲取些許意義。他將重建黨政機構的任務交給周恩來，讓軍隊從政府機構中撤走，並讓他領導一場運動，將由他主導的文化大革命所導致的慘劇都歸到「極左分子」林彪身上。隨後，他又罷黜了周恩來，發動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來維護文化大革命的功績，同時繼續讓軍隊從政府官僚體系中撤走。當運動導致中國大部分地區陷入動盪，工業和交通陷入癱瘓狀態之際，毛澤東又啟用鄧小平重塑紀律和秩序，穩定經濟，接手重建政府職能的任務。眼見鄧小平並沒有對文化大革命的信條展現出任何尊重，毛澤東又罷黜了他，最終導致南京、北京等各地掀起大規模街頭示威遊行，蔑視毛派激進分子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讓中間派華國鋒接手，希望他能夠在毛派激進分子和資深官員當中取得平衡。但是，毛澤東逝世一個月之後，華國鋒就開始逮捕、譴責毛派激進分子，邁出了後毛澤東時代不同道路的第一步。

事實上不難得出結論：毛澤東在1956年後對於中國的貢獻從他自己的角度而言並不成功，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破壞性的，他自己肯定也未料到會是如此。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當中，毛澤東帶來的破壞遠超積極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破壞了中國的黨政機構，迫使那些內心對毛澤東理念有所質疑的官員靠邊站，而且革命並沒有產生持久性的成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不斷嘗試在意外的態勢中尋找積極的一面，斷言混亂最終必會帶來更偉大的秩序。但是民眾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與不斷加強的毛澤東個人崇拜一道，都變得虛有其表，與毛澤東之前對於大躍進的「九分功，一分過」的堅持一樣空洞。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在他生前最後兩年有所惡化，於是似乎接受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他的遺產並不能被延續，領導層和社會當中的強大力量正團結起來反對他的遺產。

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他的同事對毛澤東的遺產也抱有相同的看法。陳雲曾經因為堅持中國發展必須保持平衡穩固而被毛澤東「靠邊站」，他在1978年末有所保留地表達了這一普遍看法：「倘若毛主席在1956年去世，毫無疑問，他是中國人民的最偉大領袖，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當中一位值得尊重、愛戴和傑出的偉人。如果在1966年去世，他的光輝將受到一些磨損，但成就依舊斐然。但他死於1976年，對此，我們毫無辦法。」<sup>1</sup>

## 毛時代的國家發展路徑

評價毛澤東時代不應當僅僅從毛澤東的目的和結果出發。更為重要地是要全域看待中國在新政權和經濟體制下的發展，這一體制在1950年代由共產黨所建立。當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鞏固權力、選擇蘇聯模式推動經濟發展之際，他們也選擇了一條快速工業化的道路。毛澤東極力推動快速實現工業化，而他的同事覺得這樣的速度過快，在工業化實現之後，他又進一步通過政治動員加快生產。這種模式在蘇聯已經自證：它擅長在戰時動員和建立大規模重工業基礎之際發揮效用。在中國建立蘇聯模式不久後，赫魯曉夫開始轉而改善蘇聯人民生活水平，吹噓蘇聯即將達到能夠與美國匹敵的發展和繁榮水平。回頭看來，這樣的預言非常虛幻，但是在當時而言不但不牽強，還激發了毛澤東效仿蘇聯的決心。

在大躍進當中，毛澤東將這種發展模式推向了極致。他貶低技術專家建議，要求全國範圍內的黨政機構動員工人、農民加班加點加速生產，提高經濟發展的速度。結果就是嚴重的工業衰退和歷史性的饑荒。1960年代中期經濟有所恢復後不久，毛澤東再次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攻擊經濟官僚，讓各級官員和專家接受政治攻擊，將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下放去做苦力。在林彪事件之後經濟有所緊縮，而後經濟領域又成為了政治

<sup>1</sup> 引用自 Lardy and Lieberthal (1983, xi)。

戰場，各方就技術專家角色、企業管理方式、工作激勵方式、工人生活等方面進行爭論，而各級領導人因此而無法工作。

隨着毛澤東時代逐漸落幕，很難忽視毛主義所帶來的沉重代價。從某些角度而言，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些許成功。公共衛生條件穩步改善。粗死亡率從1953年的25.7%下降到1976年的7.8%。嬰兒死亡率從1953年的175%下降到1976年的45%。出生預期壽命從1953年的40歲，上升到64歲，這一數字通常在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下才能實現。<sup>2</sup>這些指標表明，政府基礎設施有能力改善公共健康，為大部分人群提供基本醫療保障。此外，也正是這些政府基礎設施，在1950年代針對犯罪、毒品和性交易、城鎮黑社會等現象展開了高效打擊運動。

這些成就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仍然保留了下來，除此之外，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樣令人咋舌。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出按名義價值計算增長了十倍。工業產出增長了兩倍。<sup>3</sup>從這個角度而言，毛澤東版的蘇聯經濟體系所取得的成就遠超最初的預期。

但是在表面之下，顯然存在着嚴重問題。第一個顯著問題就是中國的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樣迅速：1952年之後，人口翻了一番，從5.84億增長到了9.32億。人口壓力阻礙了生產總值增長轉化為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同時還有一部分原因是錯誤的政治干預。在大躍進之後，毛澤東下令否定那些提議控制生育的人口專家，指責這樣的觀點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屬資產階級馬爾薩斯觀點，後者將貧苦歸結到窮人自己身上。此外，他推斷，人口控制在經濟上也不會帶來什麼價值，因為人類勞動力是所有價值的源泉，因此勞動力更豐富，經濟也就更加繁榮。

不斷膨脹的人口，與高投資發展戰略一道，意味着越來越多的人將永遠被困在溫飽線附近。在毛澤東晚年，就已經有明顯跡象表明，農業和工業都已深陷泥潭，而且問題還在不斷惡化。中國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按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計算，在1952年之後仍然是有所提高，

<sup>2</sup> Banister (1984, 254), Henderson (1993).

<sup>3</sup> 國家統計局 (1983, 13)。

儘管在1961至1962年大躍進期間和1967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有所下降。但是，1950到1973年間，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累積年增長率僅為2.9%。在同時期，中國只能算是亞洲國家中檔水平，多少高於菲律賓和印尼，是印度增長率的兩倍，但是遠遠落後於亞洲地區排名前六的國家，包括泰國在內（表14.1）。

表14.1 亞洲國家/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950–1973)

322

國家/地區名稱	增長率(%)
日本	8.1
台灣	6.7
韓國	5.8
香港	5.2
新加坡	4.4
泰國	3.7
中國	2.9
菲律賓	2.7
印尼	2.6
馬來西亞	2.2
斯里蘭卡	1.9
巴基斯坦	1.7
印度	1.4
孟加拉	-0.4

來源：Maddison (2006,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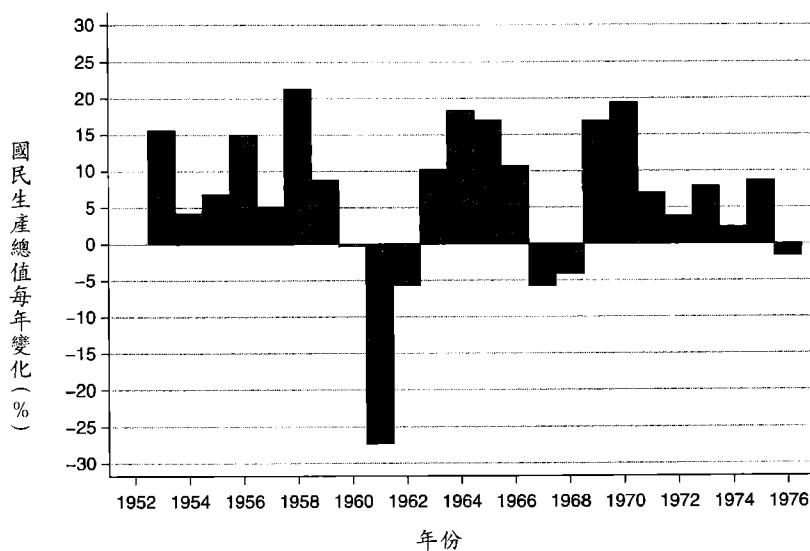
備註：增長率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複合年均增長率

圖14.1清楚地表明，經濟增長極不穩定。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增長率經常波動，不僅僅是因為大躍進和早期的文化大革命。儘管總體上而言，除了這兩個階段，經濟發展形勢還是較為積極，但是中國經濟從未呈現蘇聯體系那樣的穩固增長模式，而蘇聯模式本來目的就是為了消除市場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最為發人深省的是，經濟在文化大革命破

壞最為嚴重之後，也沒有能夠恢復。事實上，經濟還陷入了一段時間的停滯。1970年後，軍隊從政府機構撤走、白領專家回到工作崗位之時，增長率僅為2.4%。1974年，經濟基本上沒有任何增長，這一年是政治動盪的一年，並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那一年陷入衰退，下降了3.4%。<sup>4</sup>

經濟增長有所放緩是因為農業和工業雙雙出現了問題。集體農場竭力提升每畝耕地產出，產量提升勉強跟上中國高速增長的人口。提供給城市的糧食收購在1970年代停滯下來，由於農業生產率並沒有迅速提高，食品供給危機逐漸逼近。工業是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特別是重工業領域，在犧牲消費品、服務和住房的基礎上，重工業領域吸收了大量投資。儘管低效，但是中國還是向重工業領域投入了大量資源，1953年，重工業吸收了52%的全國投資；大躍進期間，吸收了87%的全國投資，之後一直到毛澤東時代結束，基本上每年都佔到了80%以上。<sup>5</sup>

323 圖 14.1 國民生產總值每年變化(不變價格)(1952–1976)



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1983, 22 和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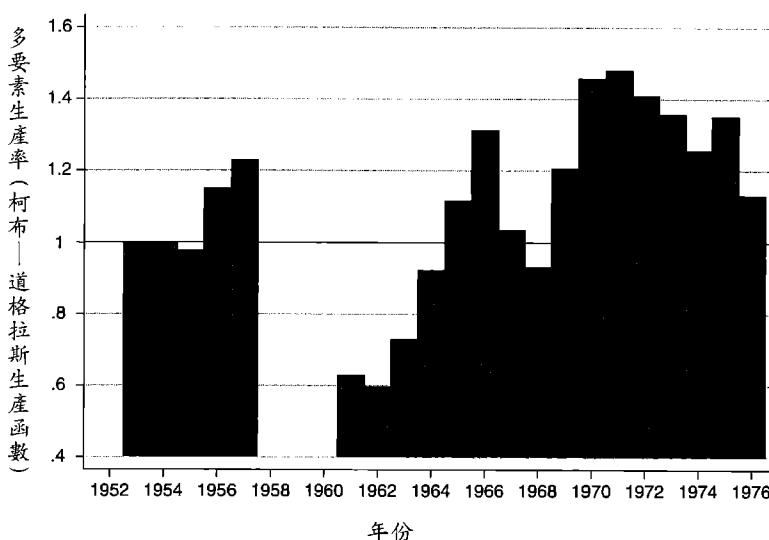
<sup>4</sup> 根據圖 14.1 的數據計算得出。

<sup>5</sup> 國家統計局(1983, 339)。

由於資源豐富，重工業利用資源的效率低下，1970年後這個問題尤為突出。圖14.2展示了多要素生產率趨勢。數據大於1.0表明工業產出大於投入；數據小於1.0表明產出小於投入。如果數據大於1.0，那麼數字越大，產業利用資源效率越高。如果數據小於1.0，那麼數字越小，國家經濟資源浪費越大，對於資源利用也越偏離。圖14.2清楚表明，中國工業在1970年代之前，效率都比較低下——在大躍進之後，極為低下。1970年代早期，要素生產才逐漸上升，同時伴隨以快速和可持續經濟發展。但是，緊接着，工業效率開始穩步下降，到1976年為止，除了1976年一年有所上升以外，其他年份逐年降低。

圖14.2 工業生產率趨勢(1953–1976)

324



來源：Kuan et al. (1988, 583)

這些明顯的停滯跡象表明，經濟體系本身存在缺陷，而體系本應作為增長動力。中國經濟機構，特別是工業的低效表現，消耗了本可以用於其他迫切用途的資源，此外成就也比較有限。一個損耗巨大的工業體系實際上從本可以提高中國人民生活水準的基礎設施、住房、工資、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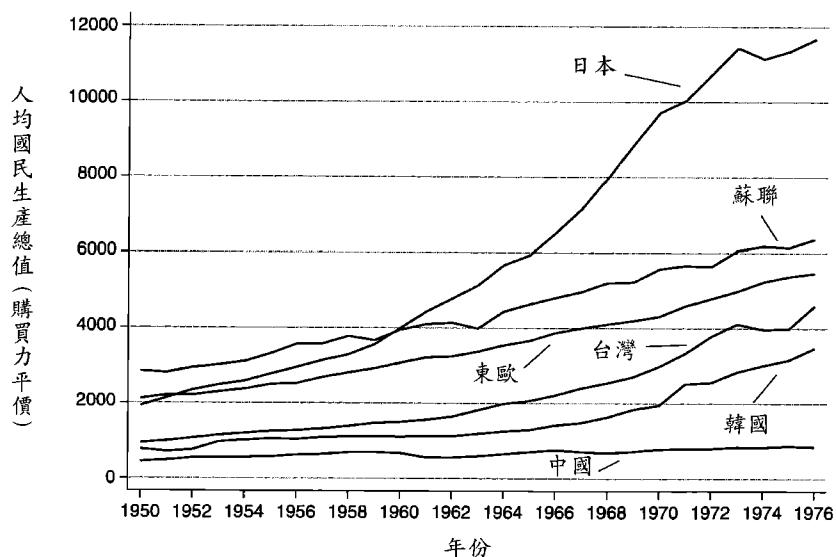
費品生產當中吸走了大量資源。中國人民為了重工業體系做出了犧牲，而重工業又因為政治原因而低效，使得中國處於落後狀態。

中國根本無法承受經濟停滯之重。1976年，也就是經過27年斷斷續續的社會主義發展之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163美元，基本上與處於貧困狀態的印度持平(164美元)。<sup>6</sup>儘管高於孟加拉(140美元)這個當時經濟發展極度落後的代表性國家，中國在1976年的發展水平仍落後於印尼(286美元)。同時，中國遠落後於韓國(824美元)，而韓國曾在1950到1953年期間遭受戰爭重創，1953年的經濟發展水平與中國相差無幾。香港作為一個小港口，1950年之前，根本無法與繁華的上海相媲美，但是現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了2,849美元。處於戰後經濟上升中期的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經達到了5,111美元。如果將1976年的發展水平和後來中國的增長相比較，更能突出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的滯後。到1990年，在經過十年有限的市場改革之後，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了314美元，2000年為949美元，2010年為4,433美元。

圖14.3明顯地展示了中國落後於其他相應經濟體的程度，圖中列出了不變價格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數據還運用了「購買力平價」調整不同國家間的價格，避免對比失真。中國一直以來希望追趕其他發達經濟體，或者趕上其他更為發達的社會主義經濟體，但是這一希望越來越趨近於無法實現。中國的進步相較於台灣、韓國、日本、蘇聯、東歐國家的發展而言，基本上可謂微乎其微，而且中國與這些經濟體的差距逐漸增大。圖14.4提供了另外的視角看待增長趨勢。圖中展現了這段時間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淨變化值(並沒有就購買力平價進行調整)。在這種計算方式下，中國的整體增長高於印度，但是落後於其他(修正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且遠落後於東亞鄰國。顯然，中國已經被鄰國遠遠甩在了後頭，被困在低水平的發展水平之中，成為了該地區最為貧窮的國家之一。

<sup>6</sup> 此段數據和下段數據來自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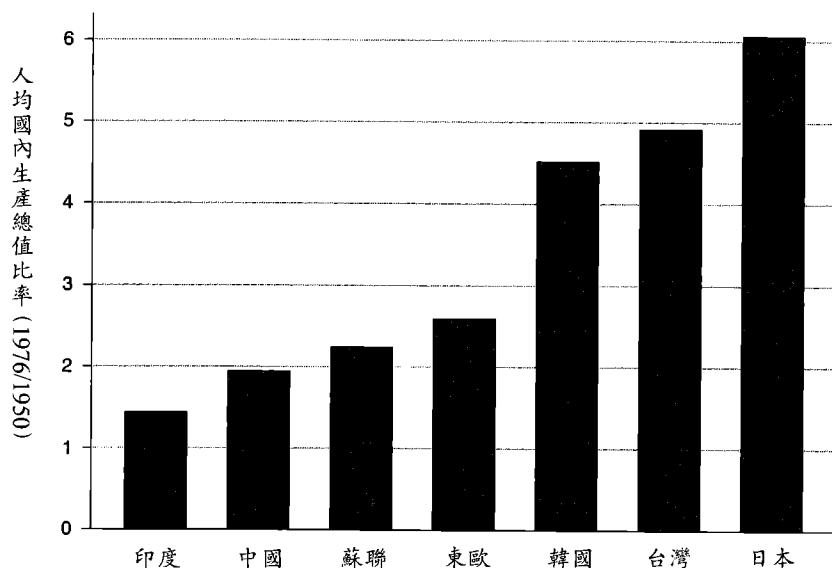
圖 14.3 選定國家/地區經濟發展趨勢 (1950–1976)



來源：Maddison (2006, 304, 479)

圖 14.4 選定國家/地區經濟擴張 (1950–1976)

326



來源：Maddison (2006, 304, 479)

## 收入和生活水平

327

艱苦的生活狀況和延緩物質繁榮是蘇聯發展模式的固有特點。對於重工業的過量投資成為快速增長的保障。但是，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破壞性的干預和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政治運動，選擇了一種曾在蘇聯早期歷史中帶來持續和活力發展的模式，但是毛澤東卻將其變成了一種極為不穩定的模式，導致了中國工業發展仍處在較低水平之時經濟就出現了停滯。毛澤東努力打造一條讓中國趕超蘇聯經濟的發展道路，但顯然失敗了。毛澤東原封不動地保留蘇聯模式的核心，提高黨內官員和政治積極分子的地位，摒棄那些接受過教育的管理人員和工程師，這樣的干預只是加劇了體系固有的低效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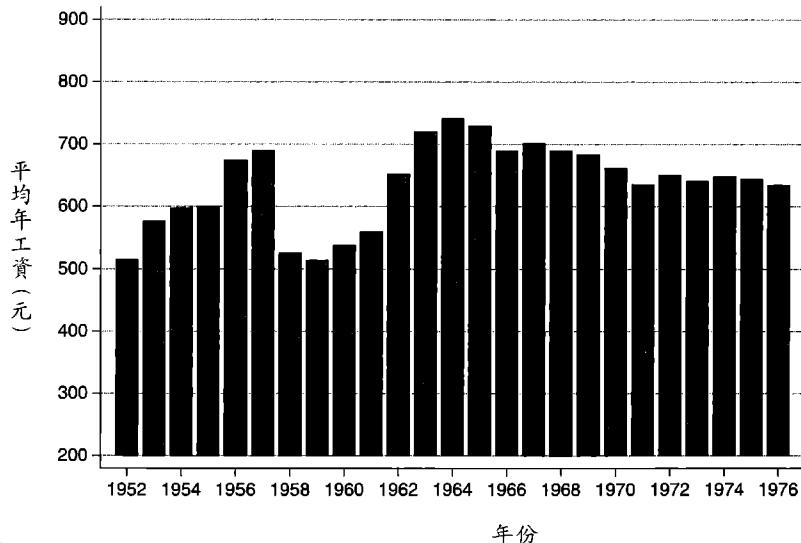
328

儘管城鎮居民相比於集體農戶受到了很多優待，但是城鎮居民還是要遭受工資停滯不漲，消費品、住房、服務供給不足等問題。1963年最後一輪全國範圍內工資調整之後，工人工資就不再增長。在那一輪調整當中，有40%的勞動人口在評級和薪酬方面都有所提升。一直到毛澤東去世後的兩年，工人的工資都沒有調整。與生產率掛鉤的獎金在1966年之後就在政治上被禁止了。單位試圖彌補工資停滯不漲所帶來的困難，找各類理由提供小筆資金補助或是提供物資和服務，但這些都是權宜之計。隨着新一代工人加入到最低收入隊伍當中，而且工資一直保持不變，城鎮工人的平均工資實際上逐步下降。圖14.5展示了自1956年工業國有化之後，城鎮居民工資的下降趨勢，而且在之後的20年當中繼續下降。唯一一次例外就是大躍進期間工資的大幅下降，當時上百萬新工人的工資都處於最低水平，之後隨着經濟遭受破壞，又被迫下崗。1957年年均收入僅為700元，1976年下降到630元出頭。<sup>7</sup>

消費品的供應在量和質上都無法滿足需求，與之相匹配的是家庭預算逐漸緊縮。工業產品分配體系仍然在執行，而後十幾年都沒有被摒棄。按照周邊市場經濟體的標準，即便是在中國最為昂貴的商品也相對

<sup>7</sup> Walder (1986, 195).

圖 14.5 中國國營企業平均工資 (1952–1976)



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1983，490）

比較簡陋。這個時期任何一位城鎮居民都能背誦一份家庭最需品清單：縫紉機、手錶、收音機和特定品牌的自行車。縫紉機需要腳踏發動，其設計抄襲了1950年代蘇聯的一款縫紉機，而蘇聯的這款縫紉機又是仿製了美國勝家縫紉機公司1920年代推出的款式。縫紉機是為了盡可能充分利用每年分配下來的布料。收音機需要使用真空管。單速騎行的自行車則是城市交通的主要方式。

配給制度避免了人們為了主要工業產品進行排隊，但是分配並沒有解決物品短缺的問題。人們很難尋找到一些特定的產品：鞋子，合適尺碼、風格的成衣，家具，廁紙，鋒利的廚房刀具，加熱時不會斷裂的鍋碗瓢盆。人們對於物品供應、質量和規格極為不滿。國營商店市場時常不能夠滿足人們對於新鮮水果、蔬菜、魚、豬肉的需求，即便有時候能夠滿足，物品也經常出現不新鮮、有撞痕或是氣味難聞等問題。人們需

要謹慎消費，由於合適規格和質量的消費品緊缺，產生了一種朋友間互幫互助的文化氛圍，並且與其他人構成了互相幫助的「關係」。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早期前往中國的外國遊人，本來期待看到一個免受氾濫的西方消費主義所影響的樸素平等社會，但是卻發現熟人經常向他們求助，以他們的名義在向外國人出售商品的專營商店購買物品。人們格外關注購買稀缺消費品，且形成了一種互換好處的城市文化氛圍，外國人對此感到驚訝不已。<sup>8</sup>

329 城市生活水準下降最為顯著的表現形式為住房。住房在1950年代就已經非常緊張、擁擠，在此後的20年當中，變得越來越擁擠。1953年，房產的支出佔到了基本建設的12.5%，之後逐年下降，而對於生產原料工業投資逐漸上升。在1966年後的十年當中，住房支出佔到國家建設支出2.6%到6.5%之間。<sup>9</sup>於是新婚夫婦需要排長隊等待住房，對於想要更大住房面積的年輕家庭來說，需要等待的時間更長。同時，這也耽誤了對現有建築的維護修繕工作，這些建築隨着使用年限增加而逐漸破敗。1956年，城鎮居民人均擁有住房面積為4.3平方米；到了1976年這個數字降到了3.6平方米。根據官方標準，50%的住房都被認定為「急需修繕」，10%的住房屬「危房」。<sup>10</sup>

到了1970年代中期，四口之家住在單人間的情況還是比較普遍。一張桌子可以用於家庭吃飯，經過打掃之後就可以用於學習，晚上又可以作為床鋪。缺少空間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城市公寓還缺少基礎設施。基本上所有公寓都沒有獨立衛生間和洗浴設施。衛生間在公寓走廊、庭院當中，有一些年代稍微久遠的小區中，衛生間在街道上。一些公寓提供水龍頭，但是大部分家庭都是使用公寓裏的公共水槽。公寓裏基本上也沒有獨立廚房；做飯區域基本需要共享。煤爐基本上是最為常見的室內供暖方式，同樣煤球也是最常見的熱源。通風不充分會導致居民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電風扇還比較少見；人們當時基本上不知道空

<sup>8</sup> 同上，頁179–186、194–205。

<sup>9</sup> 國家統計局(1983, 339)。

<sup>10</sup> Walder (1986, 194–196).

調為何物。除了高級幹部，普通居民也都沒有私人電話線。在城市小區當中，電話通常都是先打到居民所在居委會的辦公室公用電話。在居委會工作的志願者，通常都是些退休老年人，在接到電話後會把電話那頭要找的人叫來。國際服務基本不存在，在毛澤東時代之後，人們仍然需要在市郵政局和電信局總部預約長途電話，並且還需要排隊。

體現居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最後一個方面是極為有限的城鎮服務領域範圍。在1950年代中期私營領域取消之前，中國城市擠滿了小型家庭服務攤：食物攤和餐廳、招待所、茶館、酒吧、各類小型零售店、理髮店、修理店、牙醫診所、磨刀店、中醫舖、浴室等等。1960年代早期，這些小店幾乎都消失了。他們如果不是在針對私營經濟的批鬥中被關閉，就是被併入到集體或者國營服務企業當中。服務領域再也沒有恢復過來。國營飯店數量少、規模大但異常擁擠，並且以糟糕的質量和粗魯的服務態度著稱。單位嘗試為員工補償這些消失了的服務。這就是單位為員工提供餐飲服務、洗浴設施的主要原因。單位試圖內化之前由私營領域提供的許多功能，但是它們不可能補全已經消失的所有服務，而那些不夠幸運、只能為條件較差的單位工作的員工就無法享受這些服務。

330

## 平等和不平等

人們很容易就認為，這些受壓抑的生活水準是強調平等勝於繁榮的經濟體系所具備的典型特徵。在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不平等現象迅速攀升，而人們提到毛澤東時代，經常會想到那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為平等的國家。儘管現在中國收入不平等狀況遠糟糕於1976年，但是對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平等印象只能說是部分正確。

衡量收入不平等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堅尼系數，從0到1，數字越高表明不平等現象越嚴重。按照這種計算方式，1970年代世界上收入分配最為平等的國家為工業化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詳見表14.2）。一些國家堅尼系數僅為0.20或是0.21，遠低於1979年中國的0.33。即便是蘇聯，一個在中國被毛澤東思想認定為資產階級復辟的捍衛修正主義的國家，收入不平等狀況卻遠優於中國。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會主義國家。

另一方面，中國的收入分配情況處於亞洲經濟體的底端。中國不平等狀況優於印尼和菲律賓，同時也優於印度，但是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基本與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持平。台灣的收入分配明顯比中國更為平等。相較於工業化市場經濟，中國的排名也是如此。中國比美國和日本，還有加拿大、西德都要公平，但是與英國相差無幾。

331 表14.2 1970年代收入不平等狀況比較（堅尼系數）

社會主義國家	堅尼系數	亞洲國家/地區	堅尼系數	工業國家	堅尼系數
東德	0.20	台灣	0.28	中國	0.33
保加利亞	0.21	中國	0.33	英國	0.34
捷克斯洛伐克	0.21	巴基斯坦	0.33	加拿大	0.39
南斯拉夫	0.21	斯里蘭卡	0.33	瑞典	0.39
波蘭	0.22	印度	0.38	西德	0.39
匈牙利	0.25	泰國	0.42	意大利	0.40
蘇聯	0.27	印尼	0.44	美國	0.40
中國	0.33	菲律賓	0.47	日本	0.42

來源：社會主義和工業國家，數據來源於 Kornai (1992, 318) 和 Jain (1975, 41, 107)；亞洲國家數據來源於世界銀行 (1983, 卷 1, 94) 和 (1975, 108)。中國的數據為 1979 年數據；所有其他國家數據為 1970 年代初期數年數據。

對於在毛澤東時代末期來訪中國城市的人來說，這些數據會有些令人驚訝。中國城市幾乎沒有展現出任何擁有顯著財富的跡象。生活水平看起來整齊劃一且非常樸素。衣服風格和交通方式（自行車）看起來高度一致。分配制度似乎有強大的平等效用。國有企業工人工資差距並不打。事實上這些印象並非那麼具有誤導性。中國城市收入分配是當時世界上最平等的。1981 年城鎮居民收入堅尼系數僅為 0.16。在亞洲經濟體當中，1970 年代巴基斯坦對應數據為 0.36，馬來西亞為 0.52。<sup>11</sup>為什麼

<sup>11</sup> Riskin (1987, 249).

中國城市當中收入分配如此平等，但是在全國範圍內收入分配跟社會主義國家相比較高，而跟亞洲市場經濟體和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較低呢？

答案就是：中國城鎮和鄉村之間、富裕地區和鄉村貧困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巨大。出現這一現象基本上有兩個原因。我們可以看到，蘇聯發展模式目的在於從集體農場當中盡可能抽取所有糧食，降低價格，保證鄉村收入和主食消費水平遠低於城市。第二個理由事實上惡化了第一個理由當中出現的狀況，因為戶口制度和糧食分配制度對群眾施加了極為嚴格的控制。農民不能遷居到城鎮區域尋找收入更高的工作，即便是暫時性遷居也不被允許，而且農民也不能從最貧窮的農村區域轉移到更為富裕的地區。<sup>12</sup>其他亞洲城市出現更為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是因為沒有土地的窮人遷居到了城鎮貧民窟當中，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戶口制度和糧食分配制度將貧窮的居民趕出城市，使他們被永遠地釘在偏遠而又赤貧的農村地區。在市場經濟當中，勞動力會轉移到城市或者其他經濟發展更強大的區域，隨着農村窮人遷居到城市，會使城市和鄉村地區的收入水平變得更加平均。這也意味着，貧窮在城市更為凸顯，因為窮人會聚集在貧民窟，這問題困擾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這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也就是像印度、印尼這樣的國家，不平等和貧困狀況比中國更加糟糕。這樣的印象並非不正確，但是這僅局限於城市。這反映了中國戶口制度的有效性，它成功地將窮人困在了偏遠的農村地區，而並沒有體現中國整體經濟平等的結構，也沒有表現出自身消除貧困的優越能力。

332

## 農村貧困

消除赤貧失敗可能是1970年代末期最令人驚訝的事實，也反映了

<sup>12</sup> 蘇聯和東歐一直以來都以城鎮經濟為主，並不像中國那樣擁有規模巨大的農村人口，因此蘇聯和東歐對於人口遷移並沒有進行限制。人口更為自由的流動降低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

毛主義最致命的失敗之一。人們可能認為，新中國極為出色的組織能力可能為農村人口提供最基本的保證，無論他們居住在哪裏。一個在大躍進時期動員成千上百萬群眾徹夜工作、讓百萬紅衛兵和造反者攻擊黨領導層中修正主義者的政權，肯定能夠保證最貧窮的群眾有基本食物，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毛澤東時代末期，大部分農村居民仍然絕望地生活在貧窮當中。

在 1970 年代末展開的調查呈現了一幅農村生活水平的樸素圖景。<sup>13</sup>中國農村當中五分之一的人口飲食攝入低於中國政府當時制定的每日卡路里攝入標準。中國政府的溫飽標準事實上還低於國際標準。1976 年平均每日總攝入跟亞洲地區貧困國家平均水平相近——高於孟加拉，比印度高一些，但低於巴基斯坦和印尼。<sup>14</sup>集體農場農民攝入的食物平均質量極低。集體農業強迫農民攝入穀物類農產品，導致菜油、肉類和其他蛋白質類攝入逐漸下降。按照國際標準，主食提供的卡路里在中國農民的飲食當中佔比較大。後毛澤東時代政府對農村居民生活標準進行調查之後，發現在 1978 年，30% 的農村居民，也就是 2.37 億人，收入低於中國政府制定的貧困線，而中國政府制定的標準又遠低於國際機構制定的標準。<sup>14</sup>難以避免的一個事實是：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冗長、動盪的掙扎年代，它所帶來的結果是遠非革命性的。台灣、日本、韓國在 1950 年代所採用的非革命式土地改革為繁榮的農村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它們的農村市場經濟普遍存在於小農基礎上，使得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經濟飛速發展——它們並沒有像中國那樣進行血腥的暴力土地改革。1978 年以後，中國農村地區的貧困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因為集體農業被廢除，這表明毛澤東時代的失敗事實上是他自己造成的。

<sup>13</sup> World Bank (1983, 101) 調整了中國 1979 年的數字，比 1977 年增加了 19%。

<sup>14</sup> Oi (2008, 3).

## 毛主義的人力成本

這些差強人意的成就都被巨大的人力成本所抵銷。最高昂的人力成本就是3,000萬人在大躍進造成的饑荒當中餓死。近來研究顯示，事實上這個數字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在「反右」運動或是因為「私藏」糧食、拒絕在饑荒中提供糧食，而被處決或是打死的。大躍進所導致的巨大死亡人數只能與中國漫長歷史當中更為觸目驚心的片段相比較。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死亡人數估計達到1,200萬，這數字當中包括200萬因戰而死和400萬在1943年河南大饑荒中死亡的人數。<sup>15</sup>現代歷史上能夠與中國大躍進中的饑荒相提並論的只有1932到1933年期間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因為強制集體化而導致的饑荒，這段時間估計的死亡人數在570萬到850萬之間，在蘇聯人口當中的佔比與中國饑荒死亡人數佔比相當。<sup>16</sup>

大躍進當中的死亡人數遠超1949年以後中國故意發起的各類殺戮行為所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了土改和1950年代初期鎮壓反革命運動當中的處決人數，後兩者估計在100萬到200萬之間。同時，大饑荒的死亡人數也讓文化大革命當中因為衝突和政治運動而死亡的人數相形見絀。根據一套幾乎完整收齊的中國國內公開發表的地方縣志數據，保守估計1966到1971年的死亡人數約為110萬到160萬左右。這些數據還表明，四分之三的人死於革命委員會和軍隊的各種行動，特別是1968年的前幾個月當中，有一半的人數，也就是至少60萬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一數字是造反派派系武鬥所導致的死亡人數的三倍。<sup>17</sup>許多

<sup>15</sup> Mitter (2013, 5–6).

<sup>16</sup> Davies and Wheatcroft (2004, 414–415). 據估計1933年蘇聯人口約為1,500萬，基於此，饑餓死亡人數比例為3.8%到5.7%之間。中國饑餓死亡人數為3,000萬，佔6.53億人口中的4.6%。蘇聯的估算數字範圍較大，因為蘇聯不像中國那樣在事件發生前後進行了人口普查，所以蘇聯歷史學家只能在不完整的檔案記錄上做推斷。

<sup>17</sup> Walder (2014).

在武鬥中死亡的人都是因為毛澤東在1967年夏天錯誤的指令，將軍事武器分配到群眾派系當中去。必須認識到的是，因毛澤東而起的全國動亂爆發後，又展開了恢復秩序的嚴苛的運動，而這一恢復秩序的運動導致的死亡人數和其他種類的受害人數遠超動亂本身所導致的死亡人數和受害人數。如同大躍進一樣，這些生命為了一個錯誤而又缺乏長遠價值的事業而犧牲了。<sup>18</sup>

## 毛主義的局限

長久以來，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國外，毛澤東都被譽為大膽而又標新立異的思想家，拓展了馬克思列寧思想，脫離了蘇聯教條，為解決共產主義革命不可避免地轉為精英統治的機械官僚獨裁問題而提出了非比尋常的解決方案。掌權時候的毛澤東肯定可以被稱為大膽，甚至是魯莽的。1960年代他發動的打破當權派的運動肯定是對於蘇聯教條和實踐的一種巨大脫離，這似乎表明他思想的靈活性與創新性，將他排除在了蘇聯社會主義主流之外。

但是，如果將毛澤東的行為和產生的後果視為一位大膽創新的領導人所帶來的產物，那麼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相反，這樣一種說法強調了毛澤東思想的狹隘限制，反映了毛澤東的死板與教條主義，執拗於守舊和落後思想，不願意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學習和適應變化。他的核心觀點受他1930年代在延安時所吸收的一系列簡單觀點所影響。最為重要的觀點可以在斯大林主編的共產黨歷史書《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找到，此書使毛澤東對於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有了更為清晰的觀點。這些教條與毛澤東1920年代所擁有的早期觀點相契合，這些觀點包括在革命性的社會變革中有必要進行暴力鬥爭，需要建立統一

<sup>18</sup> 文化大革命中的死亡人數與1937到1938年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持平，據估算，在「大清洗」時期，死亡人數約為80萬到120萬之間。但是由於總人口存在巨大差異，蘇聯因政治迫害而死亡的人口比例至少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五倍（同上）。

而又擁有武裝力量的共產黨來領導群眾。這些觀點在內戰這樣殘酷的考驗下得以加強，1940年代末動員全民在對抗國民黨的過程中取得了一場似乎不可能實現的勝利。

毛澤東一生都不願偏離這些想法，而他在生前最後20年的行為事實上是抗爭那些希望遠離毛澤東核心思想的海內外共產主義人士的。在很多人眼裏，毛澤東的思想似乎越來越過時，而且帶來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從這個角度而言，毛澤東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反動分子，在斯大林教條過時後依然堅持這些觀點。

許多對毛時代一系列政治事件發展的解釋都不可避免地圍繞毛澤東在一些關鍵轉折點時做出的決定和干預，而此書也不例外。但是，當我們考慮毛澤東在1949年革命勝利前就已形成的核心觀點之際，我們指出事件發展是由更深層次的原因所推動的。共產黨後來並沒有修改共產黨所設立的目標和實現目標的途徑。1949年以後中國革命的發展事實上是因為毛澤東不願意修改之前的這些決定，還因為他日漸感覺其他領導人有可能修改這些決定。

336

是什麼樣的核心思想對1949年之後的中國產生了如此決定性的影響呢？第一個思想可能是最早形成的：毛澤東認為只有暴力衝突才能帶來真正的社會變革，解放受壓迫者。這些想法在1920年代就已經在毛澤東腦海中形成，並且在有關農民運動的文章中有着全面清晰的表述。在這些文章當中，年輕的毛澤東堅持認為造反運動中的暴力事件是社會變革當中不可避免的副產品，而絕對不是糟糕的「多餘」之物。對於破舊立新而言，有必要對精英使用暴力、進行羞辱。毛澤東不僅強有力地解釋了為什麼在真正的社會變革當中需要暴力，而且批評了那些對農民運動中的暴力事件有所畏懼的人。在他看來，他們喪失了加入革命的權利，成為了反動分子。

這些看法在中國共產黨後期的歷史當中有所體現，包括在農村土改當中黨政幹部發動的批鬥運動，1950年代在中國城市鞏固權力之際發動的批鬥運動，文化大革命當中對於黨政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羞辱打罵。這些運動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通過群眾運動反抗固化的精英階層。提到這次運動，就不可能不提到這一思想基石。毛澤東曾公開

337

忽視那些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因為紅衛兵運動而致死的人，他對於1967年夏天的武鬥死亡人數也毫不在意。對於那些對紅衛兵暴力事件感到震驚的官員，毛澤東也非常不屑，認為這反映了他們的反動本質，這些跡象都反映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呼籲官員支持紅衛兵，這是對他們革命奮鬥精神的考驗，正如1927年對於農民運動的看法也是一種嚴峻的考驗，證明他們到底是革命的共產黨人還是反動的國民黨人。毛澤東從革命生涯開始到去世前的一致態度就是，階級鬥爭導致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對於實現真正的革命性變革也是必要的，人們不能因為不可避免的連帶傷害而退縮。

第二個觀點則是社會主義當中也存在階級鬥爭；隨着社會主義縱深推進，階級鬥爭也會變得愈發殘酷；對於經濟政策和社會主義改造速度的不同觀點就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毛澤東的這種思想源於蘇聯那本《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這是斯大林思想的核心，在斯大林晚年選擇忽視這一觀點，後繼者全面否定這一觀點、將其視為錯誤而具破壞性的觀點之後，毛澤東仍然堅持。這啟發了毛澤東在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尋找黨內叛徒。這就是毛澤東清洗官員的正當核心理由，那些官員對於社會主義「草率推進」持批判態度，或者說他們有膽量挑戰大躍進所取得的成就。這塑造了毛澤東對於大躍進災難性後果的理解：農村地區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被國民黨殘餘分子所掌控，剝削被壓迫階級，破壞毛澤東的偉大革命。他認為，只有階級敵人才會以非人類的殘酷方式對待饑餓的農民。這就是推動四清運動背後所蘊含的觀點，四清運動是一場既不穩定也缺乏一致性的運動，而劉少奇一直積極推動，直至運動終止。蘇聯拒絕接受這一觀點，這也是毛澤東譴責蘇聯為修正主義者、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若非這一核心觀點，也就難以想像會發生文化大革命。<sup>19</sup>

第三個觀點，實現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一個等級分明、有組織的共產黨，黨內紀律嚴明、思想行為統一。此外，還形

---

<sup>19</sup> Walder (1991).

成了對黨內領導層、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一種崇拜，認為他們都是正確的，都不會犯錯。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所譴責的「領導人崇拜」，在毛澤東看來，有助於在黨內形成紀律性和信仰，也正是此因素幫助共產黨成功擊敗國民黨，改造中國，建立社會主義。這種觀點和核心要義就是最高領導人本身有能力決定正確道路，決定什麼樣的政策是革命性的或是反動的。因為階級鬥爭隨着社會主義的勝利曙光逐漸顯現而變得更加嚴酷，最高領導人必須保持警醒狀態，防止在領導層和全黨範圍內出現資產階級傾向。毛澤東和斯大林一樣，認為對一位領導人樹立起鐵一般的信仰，有助於在作為鬥爭力量的共產黨內維持統一和紀律——否則就會陷入黨派鬥爭混亂。毛澤東思想最為顯著的特徵，就是革命黨的這些特徵必須要長時間保持，時間必須遠長於他人認為有必要或者是合適的時間。革命不會隨着權力的獲得而停止，階級敵人消滅、所有制改革之後也不會消失，革命要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這就要求領導層也保持革命狀態。

第四個觀點，1930年代蘇聯在工農產業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形式就是社會主義的定義本身，這種形式具體而言就是拒絕私營企業、市場經濟、利益驅動。此外，這種經濟模式可以、也必須被快速建立，從上到下進行革命，方式如同1930年代斯大林創立這種模式一樣。儘管斯大林本人曾建議中國採取一條更為平衡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而在斯大林晚年時期，也開始承認「客觀經濟規律」適用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者，但毛澤東仍然堅持原有觀點。毛澤東始終拒絕重新考慮政治動員在推動經濟變革和發展過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也拒絕承認現代科學技術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專業管理人員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毛澤東甚至拒絕承認，蘇聯模式那些廣為人知的低效問題可以被部分採用資本主義經濟機制所緩解，也就是採用價格機制、競爭，為了提高效率，引入利潤計算機制。對於毛澤東而言，這是絕對不能考慮的，因為這樣社會主義就會被資本主義所替代。毛澤東斷言，贊同這些觀點的人代表了國內外資本主義階級的利益，想要推翻社會主義。

毛澤東拒絕在這些觀點上改變立場，除他以外的社會主義世界一直在改變。蘇聯教條主義的緩和開始於二戰之後，並於1953年後速度有

339 所加快。赫魯曉夫 1956 年發表演講之時，毛澤東的許多核心觀點都公開受到攻擊。新的教條並沒有否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核心——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的推動力，但是一旦社會主義經濟建立起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基礎就消失了，任務就變為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無產階級專政」和大規模鎮壓必須有所緩解。社會主義當中並不存在階級鬥爭——這被全面譴責為斯大林最為錯誤的創新論點，缺乏馬克思主義依據支撐。吹捧最高領導人在斯大林時代變得極端，這事實上令人扼腕，這是一種荒謬的幻想，只用於掩護斯大林瘋狂處決假想敵和真正敵人的事實。這並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要義，這些都脫離並扭曲了馬克思主義，用赫魯曉夫的話來說，是對共產黨和人民的一種犯罪。沒有一位「最高領導人」應當被允許以法令的形式確定哪些政策是革命性的，哪些政策是反動的。

毛澤東最開始就拒絕接受這些觀點。他拒絕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應當緩慢而漸進，經濟發展才能穩固平衡，大規模運動和階級鬥爭的時代已經結束。他拒絕「過分」詆毀斯大林。1956 年和 1957 年這短暫的兩年間，他曾試圖將自己打造成為後斯大林時代的解放者，但是雙百運動對他有所衝擊之後，他又重新回到反右運動中的階級鬥爭道路，在大躍進當中為發展經濟展開動員運動。在大躍進災難之後，毛澤東又加深了自己對於階級鬥爭這一斯大林核心要義的認識，精心策劃反黨計劃和群眾運動，打破官僚政黨體系，代之以新的「革命」機構。毛澤東的行為看起來非常具有創新性，且屬非正統的革命觀點，但是他背後的核心動機卻在社會主義陣營裏被認為是保守，甚至反動的，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黨內也有人這麼認為。

毛澤東經常被認為格外關注共產主義政權的官僚機制，這樣的機制會逐漸出現自我加持的精英，為自己謀取特權，產生新形式的階級壓迫。毛澤東高度重視這個問題，事實上文化大革命當中毛澤東的作為也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他不僅試圖清洗掉那些對毛澤東理念缺乏忠誠度的官員，同時動員所有人打破黨政機構、建立起新體制。

340 但是，這也反映了毛澤東思想非常突出的局限性。他拒絕考慮一個截然不同、但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判斷：問題深深植根於官僚社會主義當

中——所有生產方式的配置都掌握在國家官僚手中，而官員又由一黨執政的共產黨任命。毛澤東需要解決官僚對財產和權力的壟斷問題，還要應對特權階層這個由晉升體制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產物，而晉升體系又建立在政治忠誠度之上。毛澤東拒絕反思蘇聯經濟模式，特別是拒絕讓市場競爭、物質獎勵、計算利潤發揮作用，他特別抗拒反思斯大林的觀點，例如世界上只存在一種正確觀點，那就是最高領導人的觀點；例如對於實際問題的意見分歧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

毛澤東對於蘇聯轉向「資產階級」這一判斷事實上非常奇怪——蘇聯領導人因為依賴官僚專家、計件率和貨幣激勵，使得蘇聯社會主義走向資產主義。但是事實上，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蘇聯都不具備：蘇聯不存在私有制，企業之間不存在市場競爭，沒有使用價格機制管控供給和需求。蘇聯擁有的官僚體系與中國1950年代向其學習的體系仍然保持一致，只是在運行層面上做了些許調整。

儘管毛澤東被譽為一位思想家，但是毛澤東並不完全是一位反對官僚的思想家。他事實上並不反對官僚階級——他只是更傾向另一種官僚體系。毛澤東拒絕將權力讓渡給擁有專業知識和接受過科學培訓的官員。他希望黨政官僚絕對服從於他和他的思想，官員按照政治忠誠度進行選拔和晉升。毛澤東所傾向的官僚體系通過效忠意識形態而實現，或者換言之，就是通過教條式政黨掌控。當政黨對於權力和特權的壟斷不可避免地固化了佔壓迫地位的官僚階層，毛澤東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推倒重來，用對黨忠誠並且目的更加純粹的新代理人代替舊制。但是，這又重蹈了導致問題發生的原有狀況：一個由對黨忠誠的人所組成的階層，對物產、權力、工作分配和特權分配進行壟斷。此外，通過以叛徒和階級陰謀的罪名威脅對黨忠誠的代理人，毛澤東迫使他們必須在服從命令的壓力下反覆推行破壞性的激進運動。這就是大躍進災難的核心，黨政幹部下令大量提高產量，對取得的成就進行造假，從挨餓的村民當中奪取糧食——所有這些都受到反右運動的威脅。這也是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核心，毛澤東在基層的新代理人積極響應清理階級敵人的指令，不能也不願意約束逐漸失控的迫害行為。

毛澤東的判斷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的復辟，而是官僚階級的頑固。他所認為的問題是體系不可避免的產物，而這個體系正是他所堅持的唯一體系，不可動搖，只能通過回到初始狀態，重新煥發活力。毛澤東的判斷導致中國陷入衝突和毀滅的循環之中，逐漸被困在落後的泥潭裏。對於中國而言，這是由一位擁有極其狹隘、落後的觀點且武斷的領導人所導致的悲劇性失敗。在這位逐漸年老的領導人去世之後，中國領導人才擺脫了毛澤東教條思想的循環邏輯，考慮採取與蘇聯模式不同的組織和經濟替代方案。考慮到十年後蘇聯帝國垮台，這似乎是一個適時的決定。

## 前 路

毛澤東留下了一個幾乎可以說是處在危機之中的中國，一個並不穩定的國家，社會處於不斷變化當中。在那些曾幫助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努力保留文化大革命遺產的官員被逮捕之後，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和其背後的核心觀點，都要被擯棄。人民顯然希望社會和政治更加穩定，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許多方面，毛澤東去世後所留下的廢墟給予後繼者重新開始的機會。從蘇聯處繼承下來的制度已經被破壞，亟待重建。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充滿了不確定性。毛澤東無意間給予了繼任者做選擇的機會，跳出毛澤東思想的局限和各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觀念。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從某些方面而言回到了起點，重新尋找能夠踏上繁榮和國家強盛的道路。在1940年代末，蘇聯提供了一個貌似合理的選擇，而這個體系一直到1960年代運轉仍然良好。但是自1940年代末以來，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領導人最終面臨了根本性選擇。在1970年代後期，蘇聯已經不再是那個30年前具有吸引力的發展模式。蘇聯及其衛星國的增長率自此之後有所放緩，進入了停滯的狀態，最終解體。匈牙利通過有限的市場改革、向小型私營企業妥協，成為了蘇聯集團當中的一片繁榮綠洲。而波蘭未經改革，面臨財政難題，導致價格飛漲，引發了團結工會運動，政權逐漸走向崩潰。

令人羨慕的增長模式就擺在中國家門口：日本的增長最讓人驚喜，除此之外還有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與1940年代情形不同，因為市場資本主義顯然不會崩塌，同時也不會再經歷1930年代的那般大蕭條。在這些日益繁榮的區域當中，只有日本是憲法上規定的多黨輪流執政國家，但即便如此，日本數十年來一直是一黨執政。新加坡的一黨執政更為嚴苛。韓國和台灣屬領導人獨裁，香港屬英國掌控的殖民地。但是所有這些區域都融入了世界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指導私營經濟活動，依賴出口增長實現繁榮。因此，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如果採用市場經濟體制、對外開放但保持共產黨一黨執政，就有可能加速中國發展。

在1978年底鄧小平重回權力中心之前，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就已經開始改革。<sup>20</sup>違背毛澤東理念的新政策執行緩慢，但是在幾年內，發生了巨大的轉折。新領導層堅定支持採用現代科學技術；他們與科技專家和諧相處；重新恢復了中國的科學基礎設施，重建大學體制和社會科學領域；領導層通過與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教育和研究交流提升中國的科研水平；他們將成千上萬的學生送到國外；他們放棄了集體農業，支持家庭聯產承包制；他們撤銷了對小型私營企業和家庭企業的限制，特別是在服務領域；他們放鬆了對遷居的限制，邀請外國專家提供指導；向海外借貸，接受國際援助；他們開始試驗價格和利潤機制，試圖改革效率極為低下的國營工業領域；在「經濟特區」，他們開始嘗試接受外來私營企業投資。

也許人們會忍不住說：「接下來的歷史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中國仍然是一片散沙；整個國家仍然處於極度分裂狀態。年輕人被異化，許多人拒絕接受毛澤東時代，同時也拒絕共產黨本身，共產黨遭受了巨大的信任危機。2009年，中國共產黨慶祝了改革開放30週年。但是人們常常忘記，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十年，也就是1979到1989年，中國仍處於動盪之中，領導層就政治和經濟改革程度和速

<sup>20</sup> Teiwes and Sun (2011; 2013).

度產生了巨大分歧。此外，還經常出現呼籲民主的群眾運動：1978到1979年之間出現的「民主牆」，1980年為地方人大爭取民主選舉的學生運動，1986年底全國範圍內呼籲政改和民主的學生運動，還有1989年春天的學生民主運動，這一事件在全國範圍內蔓延，動搖了共產黨政權的執政基礎，導致在北京發生了一場對運動積極分子和旁觀者的殺戮，戒嚴幾乎持續了一整年。<sup>21</sup>需要耗費很長時間才能解決毛澤東時代產生的一系列問題，而且共產黨不得不經受1989年的政治危機，因為那一年東歐劇變，蘇聯開始解體。

從發動文化大革命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毛澤東如今成為了一位和善的文化偶像。他的形象被印在中國的人民幣之上，代替了毛澤東時代紙幣上的工人、農民、拖拉機和壓道機。他的臉龐出現在毛澤東個人崇拜時期所生產的各類徽章、海報和人工產品上，數量以成百萬計，現在這些東西在各地被推銷給遊客。文化大革命主題餐廳以紅衛兵和「忠於毛澤東」時代的歌曲和舞蹈討好顧客。由於不滿於中國在轉向市場國有資本主義道路上出現的腐敗和不平等現象，「新左派」知識分子開始鼓吹毛澤東時代的積極成果；普通老百姓也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認為那是一個更簡單、更平等、更少欲望和更少腐敗的時代。在慶祝毛澤東誕辰110週年之際，共產黨高層強調了毛澤東帶來的積極成就，試圖強化黨的合法性，歡慶黨的歷史，強調國家榮譽。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這些觀點，與1970年代末的流行觀點不同，因為1970年代末，中國剛開始從毛的錯誤統治所帶來的破壞中逐漸恢復。而現如今，對毛的評價卻建立在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和大範圍遺忘之上。

---

<sup>21</sup> 參看 Baum (1994)。

## 參考文獻

- Aird, John S. 1982. "Population Studies and Population Policy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8: 267–297.
- Andreas, Joel. 2006. "Institutionalized Rebellion: Governing Tsinghua University during the Late Year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Journal*, no. 55: 1–28.
- \_\_\_\_\_. 2009.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pplebaum, Anne. 2012. *Iron Curtain: The Crushing of Eastern Europe, 1944–1956*. New York: Doubleday.
- Apter, David E., and Tony Saich. 1994.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sh, Robert. 2006. "Squeezing the Peasants: Grain Extraction, Food Consumption and Rural Living Standards in Mao's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88: 959–998.
- Ashton, Basil, Kenneth Hill, Alan Piazza, and Robin Zeitz. 1984. "Famine in China, 1958–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 613–645.
- Averill, Stephen C. 1995. "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 Pp. 79–115,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ed.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Armonk: M.E. Sharpe.
- \_\_\_\_\_. 2006.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Banister, Judith. 1984. "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 241–271.

- \_\_\_\_\_. 1987.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an, Paul A., and Paul M. Sweezy. 1966.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aring, Arnulf. 1972. *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June 17, 1953*, tr. Gerald On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arkan, Lenore. 1990. "Patterns of Power: Forty Years of Elite Politics in a Chinese County." Pp. 191–215,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ed.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arnett, A. Doak. 1966.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Aspects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Bureaucracy." *China Quarterly*, no. 28: 8–39.
- Baum, Richard. 1969. "China: Year of the Mangoes." *Asian Survey* 9: 1–17.
- \_\_\_\_\_. 1994.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ylis, Thomas A. 1974. *The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and the East German Elite: Legitimacy and Social Change in Matur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nton, Gregor. 1975. "The 'Second Wang Ming Line' (1935–1938)." *China Quarterly*, no. 61: 61–94.
- \_\_\_\_\_. 1992. *Mountain Fires: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 1934–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_\_\_\_\_. 1999.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nton, Gregor, and Alan Hunter, eds. 1995.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rliner, Joseph S. 1957.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rnstein, Thomas P. 1967. "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sation in the Soviet and Chinese Collectivisation Campaigns of 1929–30 and 1955–56: A Comparison." *China Quarterly*, no. 31: 1–47.
- \_\_\_\_\_. 1968. "Problems of Village Leadership after Land Reform." *China Quarterly*, no. 36: 1–22.
- \_\_\_\_\_. 1969. "Cadre and Peasant Behavior Under Conditions of Insecurity and Deprivation: The Grain Supply Crisis of the Spring of 1955." Pp. 365–399, in

-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 A. Doak Barnet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_\_\_\_\_. 1977a.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77b. "Urban Youth in the Countryside: Problems of Adaptation and Remedies." *China Quarterly*, no. 69: 75–108.
- \_\_\_\_\_. 1984.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3: 339–377.
- \_\_\_\_\_. 2006. "Mao Zedong and the Famine of 1959–1960: A Study in Wilfulness." *China Quarterly*, no. 186: 421–445.
- Bian, Yanjie, Xiaoling Shu, and John R. Logan. 2001.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and Regime Dynamics in China." *Social Forces* 79: 805–841.
- Brandt, Conrad. 1958.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ook, Timothy. 2010.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Archie. 2009.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New York: Ecco.
- Brown, Jeremy. 2007. "From Resisting Communists to Resisting America: Civil War and Korean War in Southwest China, 1950–51." Pp. 105–129,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11. "Great Leap City: Surviving the Famine in Tianjin." Pp. 226–250, in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ed. Kimberly Ens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_\_\_\_\_. 2012.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15. "Moving Targets: Changing Class Labels in Rural Hebei and Henan." In *Maoism at the Grass 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Joh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ce, Gary. 2003. *Resistance with the People: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in East Germany, 1945–195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Burns, John. "Rural Guangdong's 'Second Economy,' 1962–1974." *China Quarterly*, no. 88: 629–643.

-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4.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n, Anita,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China Quarterly*, no. 83: 397–446.
- \_\_\_\_\_. eds. 1985.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M.E. Sharpe.
- Chau, Adam Yuet. 2010. "Mao's Travelling Mangoes: Food as Relic in Revolutionary China." *Past and Present* 206: 256–275.
- \_\_\_\_\_. 2013. "Political Awakening Through the Magical Fruit: The Film *Song of the Mango*." Pp. 78–95, in *Mao's Golden Mangoe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 Alfreda Murck. Zürich: Museum Rietberg Zürich and Verlag Scheidegger & Spiess.
- Cheek, Timothy. 1984. "The Fading of Wild Lilies: Wang Shiwei and Mao Zedong's Yan'an Talks in the First CPC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1: 25–58.
- \_\_\_\_\_. 1997.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hen, Jian. 2001.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_\_\_\_\_. 2007. "The Chinese Communist 'Liberation' of Tibet, 1949–51." Pp. 130–159,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14.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1956 as a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and Cold War History." *Modern China* 40.
- Chen, Theodore H.E. 1960. *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erome. 1986. "The Communist Movement 1927–1937." Pp. 168–229,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ed.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Tiejun, and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 no. 139: 644–668.
- \_\_\_\_\_. 1997.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Hierarchies: China's *Hukou* and *Danwei*

- Systems." Pp. 23–50,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of China*, ed.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Armonk: M.E. Sharpe.
- Ch'i, Hsi-sheng. 1976.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2.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h'ü, T'ung-tsu. 1962.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ale, Ansley J. 1981.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7: 85–97.
- \_\_\_\_\_. 1984.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39.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Short Cour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Conquest, Robert. 1986.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ll, Elisabeth. 1984. "Marriage Choice and Status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175–197 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ited by James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i, Qing. 1994. *Wang Shiwei and "Wild Lilies": Rectification and Purg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42–1944*, tr. Nancy Liu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Armonk: M.E. Sharpe.
- Davies, R.W., and Stephen G. Wheatcroft. 2004.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Davis-Friedmann, Deborah. 1991. *Long Lives: 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exp.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ckson, Bruce J. 1993. "The Lessons of Defeat: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on Taiwan, 1950–52." *China Quarterly*, no. 133: 56–84.
- Dikötter, Frank. 2003. "The Emergence of Labour Camps in Shandong Province, 1942–1950." *China Quarterly*, no. 175: 803–817.
- \_\_\_\_\_. 2010.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 London: Bloomsbury.
- \_\_\_\_\_. 2013.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57*. London: Bloomsbury.

- Dillon, Nara. 2007. "New Democracy and the Demise of Private Charity in Shanghai." Pp. 80–102,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ittmer, Lowell. 1992. *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1945–199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2010.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 *China Quarterly*, no. 203: 675–692.
- \_\_\_\_\_. 2011a.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 *China Journal*, no. 65: 1–25.
- \_\_\_\_\_. 2011b.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425–447.
- \_\_\_\_\_. 2012a. "From Truce to Dictatorship: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Jiangsu." *China Journal*, no. 68: 1–31.
- \_\_\_\_\_. 2012b. "Nanjing's '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 *China Quarterly*, no. 212: 893–918.
- \_\_\_\_\_. 2014. "Foreshocks: Local Origins of Nanjing's Qingming Demonstrations of 1976." *China Quarterly*, in press.
- Doolin, Dennis J., tr. 1964. *Communist China: The Politics of Student Opposition*.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 Drea, Edward J., and Hans van de Ven. 2011. "An Overview of Major Military Campaign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Pp. 27–47,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reyer, Edward L. 1995.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don: Longman.
- Duara, Prasenjit. 198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0. "Elites and the Structures of Authority in the Villages of North China, 1900–1949." Pp. 261–281,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ed.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unayevskaya, Raya. 1944. "A New Revision of Marxia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4: 531–537.
- Eastman, Lloyd E. 1981. "Who Lost China? Chiang Kai-shek Testifies." *China*

- Quarterly*, no. 88: 658–668.
- \_\_\_\_\_. 1984.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kiert, Grzegorz. 1996.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sherick, Joseph W. 1987.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itzpatrick, Sheila. 1978.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lass War.” Pp. 8–40, i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ed. Sheila Fitzpatric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79.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3. “Ascribing Clas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dentity in Soviet Russia.”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5: 745–770.
- \_\_\_\_\_. 2005. *Tear Off the Masks! Identity and Impos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orster, Keith. 1986. “The 1976 Ch’ing-ming Incident in Hangchow.” *Issues and Studies* 22, no. 4: 13–33.
- \_\_\_\_\_. 1990.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E. Sharpe.
- \_\_\_\_\_. 1992. “Spontaneous and Institutional Rebellio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traordinary Case of Weng Sen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39–75.
- Friedman, Edward,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1991.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ung, K. K., ed. 1982. *Social Needs Versus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hina: Sun Yefang’s Critique of Socialist Economics*. Armonk: M.E. Sharpe.
- Galbiati, Fernando. 1985.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o, James Z. 2004.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_\_\_\_\_. 2007. “The Call of the Oases: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Xinjiang, 1949–53.” Pp. 184–204,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ardner, John. 1969. "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 Pp. 477–539,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 A. Doak Barnet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Garside, Roger. 1981.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 Gasster, Michael. 1980.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Pp. 463–534,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ed.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trell, Peter, and Mark Harrison. 1993. "The Russian and Soviet Economies in Two World Wars: A Comparative View."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46: 425–452.
- Goldman, Merle. 1967.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69. "The Unique 'Blooming and Contending' of 1961–62." *China Quarterly*, no. 37: 54–83.
- \_\_\_\_\_. 1975. "China's Anti-Confucian Campaign, 1973–74." *China Quarterly*, no. 63: 435–462.
- \_\_\_\_\_. 1981. *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man, René. 1962.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at Peking University: May–June 1957." *China Quarterly*, no. 12: 138–153.
- Goldstein, Melvyn C. 1989.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egory, Paul R. 200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linism: Evidence From the Soviet Secret Arch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illermaz, Jacques. 1972.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49*, tr. Anne Desten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Halpern, Nina P. 1993. "Creating Socialist Economies: Stalin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Impact of Ideas." Pp. 87–110, in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ed.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rmsen, Peter. 2013.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Casemate.
- Heilmann, Sebastian. 1993.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bilization in China: Factions, Work Units, and Activists during the 1976 April Fifth Movement." *China Information* 8, no. 3: 1–19.

- \_\_\_\_\_. 1994. "The Suppression of the April Fifth Movement and the Persecu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 1976." *Issues and Studies* 30, no. 1: 37–64.
- \_\_\_\_\_. 1996. *Turning Away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al Grass-Roots Activism in the Mid-Seventies*. Stockholm: Center for Pacific Asia Studies, Stockholm University.
- Henderson, Gail. 1993. "Public Health in China." Pp. 103–123, in *China Briefing*, 1992, ed. William A. Josep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Henderson, Gail E., and Myron S. Cohen. 1984. *The Chinese Hospital: A Socialist Work Uni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nriot, Christian. 1995. "'La Fermeture': The Abolition of Prostitution in Shanghai, 1949–58." *China Quarterly*, no. 142: 467–486.
- Hershatter, Gail. 1986.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7.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inton, William. 1966.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Hoffmann, Charles. 1974. *The Chinese Work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ofheinz, Roy, Jr. 1969.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45." Pp. 3–77,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 A. Doak Barnet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_\_\_\_\_. 1977.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oper, Beverley. 1986. *China Stands Up: Ending the Western Presence, 1948–1950*. Boston: Allen & Unwin.
- Hough, Jerry F. 1977. "Party 'Satur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Pp. 117–133, in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ed. Paul Cocks, Robert V. Daniels, and Nancy Whittier He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enemann, Ralph W. 1966. "Urban Rationing in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26: 44–57.
- Hung, Chang-tai. 2010. "The Anti-Unity Sect Campaign and Mass Mobi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202: 400–420.
- Isaacs, Harold R. 1961.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nd rev.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in, Shail. 1975.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 Compilation of Dat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Jin, Qiu. 1999.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A. Ross. 1972.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Ideology: The Yugoslav Case, 1945–1953*. Cambridge: MIT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A.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ravsky, David. 1970. *The Lysenko Affai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aple, Deborah A. 1994.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u, Michael Y.M. 1975. *The Lin Piao Affair: Power Politics and Military Coup*. White Plains: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 Kecskemeti, Paul. 1961. *The Unexpected Revolution: Social Forces in the Hungarian Upris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hrushchev, Nikita S. 1962.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Special Report to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February 24–25, 1956.” New York: The New Leader. At <https://archive.org/details/TheCrimesOfTheStalinEraSpecialReportToThe20th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TheSovietUnion>, accessed June 10, 2014.
- Kirby, William C. 1984.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6.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China Quarterly*, no. 188: 870–890.
- Klochko, Mikhail A. 1964. *Soviet Scientist in Red China*, tr. Andrew MacAndrew. New York: Praeger.
- Knight, Amy. 1993. *Beria, Stalin’s First Lieutena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rnai, János.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Experience in Hungarian Light Industry*, tr. John Knap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79. “Resource-Constrained Versus Demand-Constrained Systems.” *Econometrica* 47: 801–819.
- \_\_\_\_\_.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_\_\_\_\_.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ramer, Mark. 1998.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1956 Crises in Hungary and Poland: Reassessments and New Findings: Internal-External Linkages in Soviet Policy Making (Part 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3: 163–214.
- \_\_\_\_\_. 1999. "The 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Upheavals in East-Central Europ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 no. 1: 3–55.
- Kraus, Richard Curt. 1981.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uan, Chen, Hongchang Wang, Yuxin Zheng, Gary H. Jefferson, and Thomas G. Rawski. 1988.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ese Industry: 1953–198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2: 570–591.
- Kuhn, Philip A. 1978. "The Taiping Rebellion." Pp. 264–317,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0.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2n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ung, James Kai-sing, and Justin Yifu Lin. 2003.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 51–73.
- Lang, Olga. 1946.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nge, Oskar, and Fred M. Taylor. 1964.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New York: McGraw-Hill.
- Lardy, Nicholas R. 1987a.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1st Five-Year Plan." Pp. 144–184,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7b.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Stress, 1958–1965." Pp. 360–397,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rdy, Nicholas R., and Kenneth Lieberthal, eds. 1983. *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 Non-Maoist Alternative*, tr. Mao Tong and Du Anxia. Armonk: M. E. Sharpe.
- Lee, Hong Yung. 1991.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se, Daniel. 2011.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15. "Revising Political Verdicts in Post-Mao China: The Case of Beijing Fengtai District." In *Maoism at the Grass 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Joh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vine, Steven I. 1987.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win, Moshe. 1974.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s: From Bukharin to the Modern Reform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John Wilson. 1963.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 Bobai, and Andrew G. Walder. 2001.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1949–199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1371–1408.
- Li, Huaiyin. 2006. "The First Encounter: Peasant Resistance to State Control of Grain in East China in the Mid-1950s." *China Quarterly*, no. 185: 145–162.
- \_\_\_\_\_. 2007. "Confrontation and Conciliation Under the Socialist State: Peasant Resistance to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in the 1950s."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3, no. 2: 73–99.
- \_\_\_\_\_. 2009.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 History, 1948–200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Hua-Yu. 2006. *Mao and the Economic Stalinization of China, 1948–1953*.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_\_\_\_\_. 2010. "Instilling Stalinism in Chinese Party Members: Absorbing Stalin's *Short Course* in the 1950s." Pp. 107–130, in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ed. Thomas P. Bernstein and Hua-yu Li.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Li, Wei, and Dennis Tao Yang. 2005.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 840–877.
- Liberman, E. G. 1971. *Economic Method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duction*. White Plains: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 Lieberthal, Kenneth. 1973. "The Suppression of Secret Societies in Post-Liberation Tientsin." *China Quarterly*, no. 54: 242–266.

- \_\_\_\_\_. 1980.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7.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plit in the Yenan Leadership.” Pp. 293–359,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Cyril Chihren. 1981. “The Reinstatement of Economics in China Today.” *China Quarterly*, no. 85: 1–48.
- Liu, Jianhui, and Hongxu Wang. 2006. “The Origins of the General Line for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d of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Summer 1955.” *China Quarterly*, no. 187: 724–731.
- Liu, Shaoqi. 1939/1984. “How to be a Good Communist.” Pp. 107–168, in *Selected Works of Liu Shaoqi*, vol. 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Louie, Genny, and Kam Louie. 1981. “The Role of Nanjing University in the Nanjing Incident.” *China Quarterly*, no. 86: 332–348.
- Lüthi, Lorenz M. 2008.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1960.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Praeger.
- \_\_\_\_\_.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3.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9.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Pp. 3–18, in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_\_\_\_\_. 19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quhar, Roderick,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s. 1989.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chcewicz, Paweł. 2009. *Rebellious Satellite: Poland, 1956*, tr. Maya Latynski.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Kinnon, Stephen. 2011. "The 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p. 181–206,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ddison, Angus. 2006.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Publishing.
- Mao, Zedong. 1926a. "An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Classes among the Chinese Peasantry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he Revolution." (January), pp. 303–309, in Schram (1994).
- \_\_\_\_\_. 1926b. "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Peasant Movement: Resolution of th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Guomindang." (January 19), pp. 358–360, in Schram (1994).
- \_\_\_\_\_. 1926c. "Some Points for Attention in Commemorating the Paris Commune." (March 18), pp. 365–368, in Schram (1994).
- \_\_\_\_\_. 1926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Peasant Problem." (September 1), pp. 387–392, in Schram (1994).
- \_\_\_\_\_. 1926e. "Resolution on the Problem of *Mintuan*." (October 28), pp. 409–410, in Schram (1994).
- \_\_\_\_\_. 1927a. "Repor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February 16), pp. 425–428, in Schram (1994).
- \_\_\_\_\_. 1927b. "Report on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February), pp. 429–464, in Schram (1994).
- \_\_\_\_\_. 1957.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Speaking Notes)." (February 27), pp. 131–189, in MacFarquhar, Cheek, and Wu (1989).
- \_\_\_\_\_. 1967, 1969/1977. *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 tr. Moss Robert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arks, Robert. 1984.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artin, Brian G. 1996.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dvedev, Zhores A. 1969. *The Rise and Fall of T. D. Lysenko*, tr. I. Michael Lern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ilenkovich, Deborah D. 1971. *Plan and Market in Yugoslav Economic Thou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itter, Rana. 2013.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Moody, Peter R. 1977. *Opposition and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Murck, Alfreda, ed. 2013. *Mao's Golden Mangoe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Zürich: Museum Rietberg Zürich and Verlag Scheidegger & Spiess.
- Nagy, Imre. 1957. *On Communism, 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 New York: Praeger.
- Nathan, Andrew J. 1976.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_\_\_\_\_. 1983. “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16–28.” Pp. 256–283,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eh, Hualing, ed. 1981a. *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Volume I: Criticism and Polem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1b. *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Volume II: Poetry and Fi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Oi, Jean C.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_\_\_\_\_. 2008.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elfare Regimes,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 Oksenberg, Michel. 1968.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Ladder of Success on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36: 61–92.
- \_\_\_\_\_. 1976. “The Exit Pattern From Chinese Polit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67: 501–518.
- Ostermann, Christian F., ed. 2001. *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953: The Cold War,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Paige, Jeffery M. 1975.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 Pantsov, Alexander V., with Steven I. Levine. 2012.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Peng, Xizhe. 1987.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3: 639–670.
- Pepper, Suzanne. 1999.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2nd e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Perry, Elizabeth J.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4.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China Quarterly*, no. 137: 1–27.
- \_\_\_\_\_. 2007. "Masters of the Country? Shanghai Workers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Pp. 59–79,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rry, Elizabeth J., and Li Xun.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Platt, Stephen R. 2012.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Riskin, Carl. 1987.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n, Stanley. 1982.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_\_\_\_\_. 1985. "Guangzhou's Democracy Movement in Cultural Revolution Perspective." *China Quarterly*, no. 101: 1–31.
- Rossabi, Morris. 2005. *Modern Mongolia: From Khans to Commissars to Capital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we, William T. 2007.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9.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usinow, Dennison. 1977. *The Yugoslav Experiment, 1948–197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ich, Tony, ed. 1996.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Armonk: M.E. Sharpe.
- Schoenhals, Michael. 1985. "Elite Information in China." *Problems of Communism* 34, no. 5: 65–71.

- \_\_\_\_\_. 1986. "Original Contradictions: On the Unrevised Text of Mao Zedong's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6: 99–112.
- \_\_\_\_\_. 1996.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79." *China Quarterly*, no. 145: 87–111.
- \_\_\_\_\_. 2005. "Why Don't We Arm the Left? 'Mao's Culpability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Great Chaos' of 1967." *China Quarterly*, no. 182: 277–300.
- \_\_\_\_\_. 2008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6." Pp. 67–87, i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Under Communist Regimes: Research Review*, ed. Klas-Göran Karlsson and Michael Schoenhals. Stockholm: Forum for Living History.
- \_\_\_\_\_. 2008b. "Out-Sourcing the Inquisition: 'Mass Dictatorship'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9, no. 1: 3–19.
- \_\_\_\_\_. 2013. *Spying for the People: Mao's Secret Agents, 1949–196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ram, Stuart, ed. 1994.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2: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December 1920–June 1927*. Armonk: M.E. Sharpe.
- \_\_\_\_\_. ed. 1995.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3: *From the Jinggangsha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iangxi Soviets, July 1927–December 1930*. Armonk: M.E. Sharpe.
- Schwartz, Benjamin I. 1951.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bestyen, Victor. 2006. *Twelve Days: The 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 Selden, Mark. 1971.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ervice, Robert. 2004. *Stalin: A Biograph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eybolt, Peter J. 1986. "Terror and Conformity: Counterespionage Campaigns, Rectification, and Mass Movements, 1942–1943." *Modern China* 12: 39–73.
- Sheng, Michael M. 2006. "Mao Zedong and the Three-Anti Campaign (November 1951 to April 1952): A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2, no. 1: 56–80.

- Shirk, Susan L. 1982.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ue, Vivienne. 1980.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Šik, Ota. 1966. *Econom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Czechoslovakia*, 2nd rev. ed., tr. M.I. Parker. Prague: Orbis.
- \_\_\_\_\_. 1967. *Plan and Market Under Socialism*. White Plains: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 \_\_\_\_\_. 1972. *Czechoslovakia: The Bureaucratic Economy*. White Plains: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 Silbey, David J. 2012.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Siu, Helen F. 1989.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 Bennis Wai-yip. 2002. “The Policy-Mak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arly 1950s: Findings From New Materials.” *China Quarterly*, no. 171: 682–703.
- Spence, Jonathan D. 1996.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W.W. Norton.
- 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Pp. 142–193, in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ed. James G. March. Chicago: Rand-McNally.
- Strauss, Julia C. 2002.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 80–105.
- \_\_\_\_\_. 2006. “Morality, Coercion and State Building by Campaign in the Early PRC: Regime Consolidation and After, 1949–1956.” *China Quarterly*, no. 188: 891–912.
- Su, Yang. 2011.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ubman, William. 2003.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Norton.
- Taylor, George E. 1940. *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Taylor, Jay. 2011.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new ed.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eiws, Frederick C. 1976. “The Origins of Rectification: Inner-Party Purges and Education Before Liberation.” *China Quarterly*, no. 65: 15–53.
- Teiw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eds. 1993.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ization in China: Mao, Deng Zihui, and the “High Tide” of 1955*. Armonk: M.E. Sharpe.
- \_\_\_\_\_. 1995. “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 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 Pp. 339–387,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ed.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Armonk: M.E. Sharpe.
- \_\_\_\_\_. 1996.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London: Hurst.
- \_\_\_\_\_. 1997. “The Politics of an ‘Un-Maoist’ Interlude: The Case of Opposing Rash Advance, 1956–1957.” Pp. 151–190,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of China*, ed.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Armonk: M.E. Sharpe.
- \_\_\_\_\_. 1999.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M.E. Sharpe.
- \_\_\_\_\_. 2004. “The First Tiananmen Incident Revisited: Elite Politics and Crisis Management at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Pacific Affairs* 77: 211–235.
- \_\_\_\_\_. 2007.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M.E. Sharpe.
- \_\_\_\_\_. 2011. “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Under Hua Guofeng: Party Consensus and Party Myths.” *China Journal*, no. 66: 1–24.
- \_\_\_\_\_. 2013. “China’s Economic Reorientation After the Third Plenum: Conflict Surrounding ‘Chen Yun’s’ Readjustment Program, 1979–80.” *China Journal*, no. 70: 163–187.
- Thaxton, Ralph A., Jr. 1983.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8.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en, Hung-mao. 1989.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Tucker, Robert C. 1977. "Stalinism as Revolution From Above." Pp. 77–108, in *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Norton.
- \_\_\_\_\_. 1990.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Norton.
- U, Eddy. 2012. "Dangerous Privilege: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of the Early Mao Years." *China Journal*, no. 68: 32–57.
- Unger, Jonathan. 1982.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4. "The Class System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Pp. 121–141 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ited by James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rban, George, ed. 1971. *The 'Miracles' of Chairman Mao: A Compendium of Devotional Literature, 1966–1970*. Los Angeles: Nash Publishing.
- van de Ven, Hans. 2011.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History." Pp. 446–466,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Slyke, Lyman. 1986.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Pp. 609–722,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ed.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ogel, Ezra F. 1965.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21: 46–60.
- \_\_\_\_\_. 1967. "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Bureaucrat: The 'Regularisation' of Cadres." *China Quarterly*, no. 29: 36–60.
- \_\_\_\_\_. 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11.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keman, Frederic, Jr. 2007. "'Cleanup': The New Order in Shanghai." Pp. 21–58,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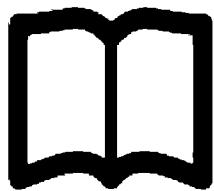
- Walder, Andrew G. 1978.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_\_\_\_\_.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_\_\_\_\_. 1991. "Cultural Revolution Radicalism: Variations on a Stalinist Theme." Pp. 41–61,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P.W. Wong, and David Zweig.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_\_\_\_\_.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524–539.
- \_\_\_\_\_.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309–328.
- \_\_\_\_\_. 1996.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Party-Stat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of Conflict." Pp. 167–198, in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ed. Elizabeth J. Perry.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_\_\_\_\_. 2006. "Factional Conflict at Beijing University, 1966–1968." *China Quarterly*, no. 188: 1023–1047.
- \_\_\_\_\_.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15.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Social Science History*, in press.
- Walder, Andrew G., and Songhua Hu. 2009. "Revolution, Reform, and Status Inheritance: Urban China, 1949–199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 1395–1427.
- Walder, Andrew G., Bobai Li, and Donald J. Treiman.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191–209.
- Wang, Haiguang. 2015. "Radical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and Ethnic Rebellion: The Communist Encounter with a 'New Emperor' in Guizhou's Mashan Region, 1956." In *Maoism at the Grass 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Joh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Peter Chen-main. 1999. "A Bastion Created, A Regime Transformed, An Economy Reengineered, 1949–1970." Pp. 320–365, in *Taiwan: A New History*,

- ed. Murray A. Rubinstein. Armonk: M. E. Sharpe.
- Wang, Qisheng. 2011. "The Battle of Hunan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s Response to Operation Ichigō." Pp. 403–418,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Shaoguang. 1995.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Y.C. 1967. "Tu Yueh-Sheng (1888–1951): A Tentative Political Biograph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 433–455.
- Watson, Rubie S. 1990. "Corporate Property and Local Leadership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1898–1941." Pp. 239–260,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ed.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stad, Odd Arne. 2003.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Lynn T., III. 1978. *Careers in Shanghai: The Social Guidance of Personal Energies in a Developing Chinese City, 1949–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_\_\_\_\_. 1979. "The Road to Urumchi: Approved Institutions in Search of Attainable Goals During Pre-1968 Rustication from Shanghai." *China Quarterly*, no. 79: 481–510.
- Whyte, Martin K. 1974.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hyte, Martin K., and William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bur, C. Martin. 1983.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From Canton to Nanking, 1923–28." Pp. 527–72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1983.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1: The Economy, Statistical System, and Basic Dat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ylie, Raymond F. 1980.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 Fei. 2014. "Rival Rebel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Guangzhou's Mass Factions in 1967." *Modern China*, in press. doi: 10.1177/0097700414533633.

- Yan, Jiaqi, and Gao Gao. 1996.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 and ed. D.W.Y. Kwo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Yang, C.K. 1959.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IT Technology Press.
- Yang, Jiang. 1984. *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 tr. Howard Goldblat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Yang, Jisheng. 2012.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tr. Stacy Mosher and Guo Ji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Yang, Kuisong. 2008. “Reconsidering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China Quarterly*, no. 193: 102–121.
- \_\_\_\_\_. 2011.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Warfare in North China.” Pp. 308–327,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15. “How a ‘Bad Element’ was Made: The Discovery, Accusation, and Punishment of Zang Qiren.” In *Maoism at the Grass 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Joh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Martin C. 1945.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Yang, Tianshi. 2011.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and Nanjing.” Pp. 143–158,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ick, Joseph K. S. 1995. *Making Urban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CP–GMD Struggle for Beiping–Tianjin, 1945–1949*. Armonk: M.E. Sharpe.
- Young, Ernest P. 1983. “Politics in the Aftermath of Revolution: The Era of Yuan Shih-k’ai, 1912–16.” Pp. 208–255,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u, Liu. 2006. “Why Did It Go So High?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87: 732–742.
- Yue, Daiyun, as told to Carolyn Wakeman. 1985. *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aleski, Eugène. 1980. *Stalinist Planning for Economic Growth, 1933–1952*, tr.

- Marie-Christine MacAndrew and John H. Moo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Zhou, Xun, ed. 2012.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iy Press.
- Zweig, David S. 1978.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China Quarterly*, no. 73: 140–159.
- 卜偉華，2008，《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_\_\_\_\_. 199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2000，《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卷）。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
- 《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1984，《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王力，2001，《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香港：北星出版社。
- 王友琴，2004，《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開放雜誌社。
- \_\_\_\_\_. 2006，《六十三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二十一世紀》，第2期，頁42–55。
-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1998，《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朱地，2005，《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北京：華文出版社。
- 吳雪晴，2002，《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百年潮》，第8期，頁18–24。
- 沈志華，2008，《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林蘊暉，2009，《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1953–195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金延鋒，2000，《當代浙江簡史（1949–1998）》。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 徐建剛，1990，《四人幫迫害上海幹部群眾的三場運動》，《上海黨史》，第12期，頁18–25。
- 海楓，1971，《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
- 統計局，1983，《中國統計年鑒（1983）》。香港：香港經濟出版社。

- 郭德宏、林小波，2005，《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1989，《當代中國的天津》。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 \_\_\_\_\_. 1990，《當代中國的河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_\_\_\_\_. 1991a，《當代中國的湖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_\_\_\_\_. 1991b，《當代中國的廣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_\_\_\_\_. 1993，《當代中國的上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2005，《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廣東省地方史志纂委員會，2005，《廣東省志》(大事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索引

按筆劃排序，頁碼為原書頁碼、本書旁碼

- 〈九評〉(1964), 195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38  
〈論十大關係〉(毛澤東), 136–37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 138–39, 149–50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大字報), 299–301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36, 138  
「三家村札記」(前線雜誌專欄), 187  
「五族共和」, 36, 37  
「百花齊放」的演講(毛, 1956), 137, 139  
「海瑞罷官」(吳晗), 187–88  
「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 291–93, 300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 43  
「過渡時期總路線」(毛澤東), 53, 82  
「踢開中央文革小組，自己鬧革命」(大字報), 225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314  
GDP (國內生產總值), 83, 321–26  
一月革命(上海), 12, 236–39, 317  
一打三反運動, 283–84, 300  
一貫道, 67  
一號作戰計劃, 22  
丁玲, 28, 134  
七千人大會(1962), 182, 183, 187, 197, 199  
九大(1969), 265, 282, 290, 294  
二兵團, 238, 245  
二戰, 3, 15, 32, 83, 95  
人口增長, 321; vs. 死亡率, 275–77, 333–34;  
    與大躍進, 169–70  
人民日報, 214, 231, 250, 272, 280, 312  
八路軍, 20–22  
十一中全會, 214  
三反五反, 76, 77, 124  
三反運動, 62, 76  
三司, 221, 222  
上海: 共產黨解放, 63–64; 與清隊, 274–75;  
    犯罪在, 68, 69; 文革在, 196–97, 245,  
    248; 與四人幫, 313; GDP, 325; 中學  
    生在, 270; 一月革命在, 12, 236–39,  
    317; 工會在, 70; 體力勞動改造在,  
    271; 軍管在, 242, 243, 266; 作為模仿,  
    240, 255; 抗議在, 147; 與清明節抗議,  
    307;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在, 301; 密密  
    結社在, 67; 工人造反派在, 231–32,  
    234–38, 245, 308  
上海人民公社, 237, 238, 240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232, 234–38,  
    245  
上海市革委會, 237, 274, 318  
上海黨委, 232, 236, 237, 238, 248  
土改: 在內戰, 18, 33; 與階級標籤, 47, 49,

- 109; 與階級鬥爭, 17, 40–45, 61; 與集體化, 53, 56, 123; 與共產主義勝利, 17; 死亡人數, 334; 經濟影響, 49–51; 在日本, 51, 333; 與地主, 45, 47, 50, 51; 與生活標準, 333; 與地方精英, 41–42, 45, 46, 60; 與軍管, 40–41, 46–47; 與國民黨, 41–42, 45, 51; 政治影響, 45–49; 與秘密教門, 67; 與農村精英, 41–42, 45, 46, 60; 暴力在, 33, 46, 47, 50–51, 52, 211  
 大字報, 207–08, 293, 305, 306; 與中學, 214; 在百花齊放中, 210; 與一月革命, 238; 李一哲, 299; 與軍管, 264, 265;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299–301; 在北大, 207–8; 在清明節抗議, 307–8; 與紅衛兵的抵抗, 224, 225, 226; 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7, 298; 與工人造反派, 232  
 大眾媒體: 與文革, 11, 206, 208, 247, 256; 與四人幫, 312; 與百花齊放, 140; 與一月革命, 237; 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130; 與毛崇拜, 279, 280; 與軍管, 264; 與政治運動, 305; 與清明節抗議, 307; 與紅衛兵, 11, 207, 216, 230. 另參見新華社, 人民日報  
 大學: 錄取, 113–14, 116, 207, 267–68, 269, 270; 與反右運動, 149; 攻擊, 71–75; 關閉, 267–69; 與文革, 14, 115, 206, 207–13, 219–22, 230; 百花齊放在, 143–47; 與毛的遺產, 315; 在軍管下, 263; 與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 343; 紅衛兵在, 207–13, 219–22, 230; 重新開, 294; 科學在, 72, 74–75, 304–5;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1, 192; 監控系統在, 105; 聽課及考試, 207; 暴力在, 210, 211; 工作組在, 208–13, 233; 與武漢事件, 249. 另參見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大蕭條, 84  
 大躍進(1958–1960), 152–79, 197, 199; 責任歸屬, 182–85; 與農業, 153, 154–55, 157–61, 170–71, 178, 316; 與反右運動, 152, 153, 156, 160, 175, 178; 與官僚體系, 156, 158–69, 174; 共產黨在, 159–62, 320; 階級鬥爭在, 152, 153, 155, 163, 166, 167, 168, 180, 181; 與清隊運動, 282; 與集體化, 56, 153, 154, 156, 157–58, 163, 180, 181; 公共食堂在, 157, 158, 180; 建設工程在, 157–58, 160; 與文革, 97, 99, 162; 死亡率, 333–34; 人口學影響, 169–70; 與經濟, 97, 99, 159, 164–65, 167, 168, 178–79, 183–84, 186, 316, 320–22, 326, 328; 嘴報, 10, 159, 161–64, 167, 168, 182; 與饑荒, 4, 10, 159, 161–164, 169–173, 178, 181, 182, 184, 316, 320; 與戶口制度, 78; 與工業, 153–55, 157, 158, 160, 173–78, 180, 323; 與毛, 82, 160, 163, 164, 168, 174, 178, 337, 339, 341; 群眾動員, 154, 155, 167, 173–74, 179, 316, 332; 鎮壓在, 162–69; 起源, 153–57; 紹正, 180–88; 自欺欺人, 159–62; 與中蘇分裂, 193; 與蘇聯模式, 153–57, 180; 有關統計, 162, 170–71; 目標, 156–57, 159; 沒有預期到的結果, 277, 316, 319; 在農村地區, 171, 173, 184; 暴力, 162, 164–65  
 山西, 46, 148, 240, 258  
 山東, 240  
 工人: 與五一六運動, 284; 與反右運動, 149, 150; 作為黨員, 103, 104; 階級劃分, 109; 在文革中, 4, 205, 231–33, 234, 259, 261, 263, 285, 317; 與林彪事件, 286; 要求, 234–35, 237; 派系, 233–36, 237, 238–39; 在大躍進, 173–74, 175, 180; 與百花齊放, 140, 142, 147, 148, 315; 與一月革命, 238; 與軍管, 266; 工業數量, 177; 抗議, 300; 與造反派, 259, 261, 263, 317; 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7;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1; 薪酬, 327–28, 331; 白領, 235–36, 270–71, 286  
 工人民兵, 70, 303–04, 309  
 工分, 57, 58, 59, 157  
 工作組: 在運動中, 76; 在中學, 214, 215,

- 219; vs. 軍管, 262; 反對, 219–20, 225; 在北大, 208–13; 與紅衛兵, 219, 221–22, 226, 228; 與恢復秩序, 303;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89, 190, 191, 192, 193; 在大學, 208–13, 233; 與暴力, 217, 219; 與工人造反派, 232  
 工會: 與共產黨, 70–71; 在文革中, 232, 234, 247; vs. 幫會, 68; 與百花齊放, 147; 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7; 與秘密結社, 68–69  
 工業: 與集體化, 57–58; 與合同法, 88; 與文革, 247; 諷條在, 176; 與去斯大林化, 127, 136, 137; 在東德, 126; 私有部門退場, 76–77; 與大躍進, 153–55, 157, 158, 160, 173–78, 180, 323; 重工業, 82, 85, 91, 154, 157, 322–23; 國貨的心態, 88–89; 動力, 182, 195; 公私聯營, 79; 與生活標準, 86, 97, 324, 326–27; 與毛, 315, 320, 321, 338; 市場機制在, 304; 現代化, 302; 國有化, 62, 123, 127, 128, 327–28; 組織化, 86–89; 產出, 177, 183, 323–24; 數量 vs. 品質, 175–76; 農村, 57–58, 158, 160, 174, 178; 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301;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 85–86;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1; 社會主義轉型, 54, 61, 79, 125, 153; 蘇聯模式, 82–83, 86, 91, 124, 233, 234; 監督系統在, 105; 暴動在, 147. 另參見國有企業; 工人  
 中央工作會議(1966年10月), 222  
 中央文革小組, 202–3; 與反五一六運動, 284; 與攻擊軍隊, 251, 252, 253; 強烈攻擊, 224–29; 與黑龍江, 239; 與一月革命, 237, 238; 與林彪, 288, 290; 與解放軍, 243–44; 與奪權, 240, 241; 迫害, 317; 與造反派, 245, 246, 247, 249, 259, 317; 與紅衛兵, 205–7, 220–30, 231; 與革委會, 243–44, 255; 與學生, 213, 214, 215, 219, 228–29; 與工人造反派, 232, 233, 235; 與武漢事件, 250  
 中央委員會: 與文革, 201, 202, 203, 205, 265, 294; 與大躍進, 165–66, 168, 182; 與清明節抗議, 306, 307, 308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 204–5, 271, 272  
 中共十大(1973), 294  
 中國社會科學院, 305  
 中國科學院, 304  
 中學, 267, 270; 在文革中, 213–19, 221, 225, 226  
 互幫互助團隊, 53, 54  
 五七幹校, 201, 269, 270–71, 286, 294  
 五反運動, 62  
 五四運動(1919), 146, 211  
 五年計劃, 83, 154  
 內部參考, 118, 146, 206  
 內蒙古, 36, 37, 243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 272  
 內戰(1945–1949), 31–35 與共產黨, 15, 16–19, 38–39, 100, 123; 與階級劃分, 110; 結束, 35–37, 38; vs. 大躍進, 174, 179; 通脹, 32, 34; 土改在, 18, 33; 遺產, 38–39; 林彪在, 31–32, 34, 35, 197; 與毛澤東思想, 335; 群眾動員在, 16, 31, 33–34, 39, 151, 179, 201; 國民黨在, 3–4, 15, 16, 18, 31–35, 38; 在農村地區, 18, 32, 33, 38, 53  
 公安員警: 與鎮壓反革命, 65; 在文革中, 216, 235; 與去斯大林化, 137; vs. 幫會, 68; 與戶口制度, 78; 與一月革命, 238–39; 與工會, 70; 與清明節抗議, 309–10; 與紅衛兵, 207, 218, 221, 227; 與秘密教門, 67; 蘇聯模式, 82, 104, 105; 在城市地區, 63, 64, 80  
 公安部: 招生, 105–6; 與革委會, 230; 監控系統, 104–6  
 六一八事件(1966), 210–12  
 反五一六分子運動, 284, 298  
 反日抗爭. 另參見日本侵華  
 反右派運動: 與階級標籤, 148–51; 在大躍進裏, 152–53, 155, 160, 162, 165–68; 與毛, 188; 與大躍進倒退, 181, 184, 185; 在農村地區, 52  
 反右運動(1957), 9–10, 148–51, 185, 316; 與文革, 211; 與大躍進, 152, 153, 156,

- 160, 175, 178  
 天主教堂, 47, 64  
 天安門事件(1976年4月4日). 參見清明節抗議  
 天安門廣場: 抗議在, 293, 343; 造反派在, 260; 紅衛兵集會在, 207, 214, 219, 239  
 天津, 35, 67, 68, 270, 271  
 天派, 258–59, 261, 262  
 太平天國運動(1850–1864), 2  
 孔子, 295  
 少數民族, 36, 105, 281  
 巴基斯坦, 279, 322, 330, 331, 333  
 巴黎公社, 42  
 戈揚, 142  
 戶口制度, 62, 63, 104, 110, 145, 332; 在城市地區, 64, 77–78, 234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4–5, 10–13, 200–262; 「成就」, 302, 304, 316–17; 與官僚體系, 122, 200, 201, 202–5, 285, 320; 政治運動, 313–14; 與共產黨, 13, 195–99, 201, 202–5, 214, 314, 316; 批判, 286, 291–93, 296, 298, 299–301, 306; 死亡率在, 317, 334; 與鄧小平改革, 305; 與經濟, 97, 99, 321, 322, 326; 與四人幫, 1, 341; 與大躍進, 97, 99, 162; 中學生在, 213–19; vs. 百花齊放, 210–11; 迫害領導層, 200–201; 與林彪, 287, 293–94; 地方政府在, 233–36; 與毛, 11–12, 82, 260–61, 313, 317–18; 與毛澤東思想, 201, 285, 336, 337, 339; 毛的準備, 195–99; 群眾動員在, 201, 205–13, 232–33, 316, 332; 起源, 180–99; 與解放軍, 4, 12, 198, 220, 235, 316; 與民眾抗議, 5, 11, 13, 318; 與清明節抗議, 309, 311; 地方奪權在, 239–42; 反對文革, 263–86;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1, 192, 208, 209; 紀念品, 344; 學生在, 11, 12, 13, 213–19, 231, 317; 沒有預期到的結果, 319; 大學在, 115, 207–13; 與蘇聯, 10, 13, 194, 195, 205, 233; 暴力在, 210–11, 212; 工人在, 4, 11, 205, 231–33, 234, 259, 261, 263, 285, 317; 與周恩來, 13, 198, 295. 另參見中央文革小組; 派系, 造反派; 紅衛兵  
 文革簡報, 206  
 文匯報, 307, 308  
 文學, 28, 134–35, 186, 196; 與百花齊放, 141, 143  
 日本: 經濟, 13, 322, 325, 326, 342; 不平等在, 331; 土改在, 51, 333; 投降, 15  
 日本侵華: 與共產黨, 6, 15–16, 17, 18, 19–22, 27, 100; 與內戰, 3, 32; 與階級劃分, 110, 111; 與內戰, 272–73; 與合作, 66; 死亡人數, 334; 毛有關, 313; 軍事影響, 19–22; 與國民黨, 15, 19–24; 政治影響, 22–24, 31; 在城市地區, 64  
 毛遠新, 310, 312  
 毛澤東: 與抗日, 20–21; 與反右運動, 151; 與官僚階層, 81, 121; 與鎮壓反革命運動, 65, 66; 共產黨官方決議, 314; 與中央文革小組, 203; 在內戰中, 3, 31, 34–35, 38, 39; 與政府管控, 294; 有關階級鬥爭, 42–43, 188, 335, 336–37, 339, 340, 341; 與清隊運動, 272, 277; 與集體化, 54–55; 批判, 187, 286, 291–93, 300, 306; 作為文化象徵, 343–44; 與文革, 11–12, 195–99, 313–14; 逝世, 311–12; 與鄧小平, 294–95, 302–5; 與去斯大林化, 128, 134, 135–36, 137; 與經濟, 82, 89, 91, 97–99, 315, 319–26, 338, 339, 340; 葬禮, 1; 與四人幫, 1–2; 芒果, 279–81; 大躍進, 82, 160, 163, 164, 168, 174, 178, 337, 339, 341; 與中學生, 213–14; 與百花齊放, 137, 138, 139, 145–46, 150, 339; 與匈牙利, 133; 與一月革命, 237, 239; 遺產, xi, 5, 14, 315–19; 在林彪事件之後, 289; 與林彪, 287–88; 與劉少奇, 10, 11, 182–83; 與馬克思主義, 25–26, 27, 154, 202; 與群眾動員, 39, 320, 338; 與軍隊, 198, 242–45, 252–58, 263, 264, 267, 278, 289–90, 302; 有關少數民

- 族, 37; 與農民革命, 41, 43; 有關「人民戰爭」, 22; 個人忠誠, 196–98, 201, 202; 與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 121–22; 與奪權, 240; 迫害, 27, 136; 與清明節抗議, 310–11; 與造反派, 260–61, 317–18; 與整風運動, 30; 與紅衛兵, 4, 11, 205, 207, 208, 221–25, 228, 229, 231, 336; 與糾正大躍進錯誤, 180–84, 187, 188; 與革委會, 255, 256; 與農村 vs. 城市革命, 61–62; 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6, 300, 301–2;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0–91; 與蘇聯模式, 82, 91, 124, 315, 321, 335, 340, 341; 與斯大林, 129, 136, 149, 166, 184–85, 292; 與斯大林主義, 82, 84, 135, 316; 與學生, 212, 213; 與沒有預期到的結果, xii, 6, 9, 10, 277, 316, 319; 與蘇聯, 10–11; 在蘇聯, 153–54; 有關暴力, 43–44, 217, 224, 228; 與婦女, 28; 與工人造反派, 232, 233, 235; 與吳晗, 188; 與武漢事件, 249–50; 與周恩來, 11, 295, 318  
 毛澤東思想, 334–41; 關於官僚主義, 335, 339, 340–41; 與陳伯達, 26–27, 197, 290; 與文革, 201, 285, 336, 337, 339; 死亡人數, 333–34; 與去斯大林化, 137; 關於經濟, 89, 338, 339, 340; 關於專家, 99, 279, 321, 338, 340; 與知識分子, 71, 72; 與林彪, 197; 與毛崇拜, 124, 278, 337–38, 339, 340; vs.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335, 339; 與軍管, 264; 與宣傳隊, 262; 與斯大林主義, 335, 337, 338, 339; 與蘇聯, 337, 338–39, 341; 暴力在, 335–36  
 毛澤東選集, 188  
 王力, 203, 249–50, 253, 284  
 王大賓, 265  
 王任重, 169  
 王光美, 222  
 王希哲, 299  
 王明, 25, 27, 29  
 王洪文, 1, 232, 237, 238, 266, 312  
 王寶味, 28, 146, 361n77  
 王蒙, 139  
 主體思想(朝鮮), 130  
 北大附中, 214, 215, 225  
 北伐, 41–42  
 北京: 共產黨解放, 35; 與清隊運動, 271–72; 與文革, 196–97, 202; 與一打三反運動, 283; 與清明節抗議, 308–10; 造反派在, 258–62; 紅衛兵在, 206, 223, 229–30, 235; 密密教門在, 67  
 北京大學: 與清隊運動, 274; 文革在, 207–8, 226, 258–59; 教職工, 269; 百花齊放在, 143–44, 146, 211; 六一八事件在, 210–11; 與軍管, 264–65; 與造反派派系, 258–59; 紅衛兵在, 226, 230;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2–93  
 北京公社, 230, 237, 240  
 北京市委, 186, 187, 193, 199, 202, 229  
 北京市革委會, 230, 260, 262, 264, 318  
 北京師範大學, 214, 230, 258, 265  
 北京紡織廠, 280  
 北京航空學院, 219–20, 221, 225, 230, 265  
 北京針織總廠, 278  
 北京新華印刷廠, 272–73  
 北京衛戍部隊, 230, 309, 312  
 北師大女附中, 214, 215  
 去斯大林化, 150, 197; 與官僚制度, 121, 127; 與毛, 128, 134, 135–36, 137; 與個人崇拜, 9, 127, 128, 137, 194, 195; 與中蘇分裂, 11, 194; 在蘇聯集團, 11, 125–28, 151  
 臺灣, 4, 34, 35; 蔣介石在, 23–24; 經濟模型, 342; GDP, 322, 325, 326; 收入不平等在, 331; 土改在, 51, 333  
 四一二派系, 257, 258  
 四人幫, 1, 2, 292, 312–13. 另參見江青; 王洪文; 姚文元; 張春橋  
 四川, 243, 265  
 四六指示, 244–45, 246, 248  
 外國人, 64, 105, 328, 343  
 尼古拉·布哈林, 154  
 市場經濟: 需求約束, 89–91; 薦條, 83, 84, 176, 178; 與去斯大林化, 128; 全球的,

- xii, 17, 123, 342; 不平等, 93, 119, 331; 與毛澤東思想, 89, 338, 340; 與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 325, 342, 344; 農村, 56, 58, 181, 182, 333; vs. 社會主義經濟, xii, 89
- 布爾什維克, 26
- 民主, 27, 71, 73, 121, 145, 166, 167, 227; 社會主義, 144, 299–301
- 民主運動, 286, 289, 299, 301, 343
- 民主牆, 142, 145–46, 149, 343
- 民兵: 地方, 41, 45–47, 49, 248, 313; 傳統, 48; 工人, 70–71, 297, 303, 309–10
- 犯罪: 鎮壓運動, 53, 62, 321; 販毒與賣淫, 7, 62, 69–70, 80, 321; 毛關於, 41; 農村, 60; 鎮壓, 7, 49, 63–65, 67, 68, 80; 與傳統地方治理, 48; 城市, 63–64
- 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 131, 132
- 生活標準: 與幹部隊伍, 117–18; 批判, 143, 293; 與去斯大林化, 127, 128; 與工業化, 86, 97, 324, 326–27; 與毛, 315, 321, 326–30; 後文化時代, 13–14; 與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 341; 抗議, 233, 234–35, 286, 289, 300, 317; 農村, 58–59, 333; 與蘇聯模式, 326–27; 城市, 54, 94–97, 327–30, 331; 在蘇聯, 320; 與單位制, 93–94, 327
- 田家英, 182
- 伊斯蘭教, 67
- 全國總工會, 70
- 共青團, 9, 67, 106, 116, 145, 147–48
- 共產黨. 參見黨內審查, 64, 127, 134–35, 140, 142, 186
- 共產黨: 1927年迫害, 3, 15, 22, 44, 45, 68; 1949勝利, 2, 4, 15–39; 與抗日, 6, 15–16, 17, 18, 19–22, 27, 100; 與反右運動, 151; 強烈攻擊, 123–51; 與官僚體系, xii, 2, 27, 40, 100, 123; 與內戰, 15, 16–19, 38–39, 100, 123; 與清隊, 272; 與文革, 13, 195–99, 201, 202–5, 214, 314, 316; 與鄧小平, 302–3; 黨紀, xi, 23–29, 31, 38–39, 120; 與經濟, 60, 99, 155, 327; 演化, 100–122; 對勝利的解釋, 16–19; 在大躍進中, 159–62, 320; 等級, 101–4; 與百花齊放, 139–48, 149, 210; 與一月革命, 237; 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130; 與工會, 70–71; 忠誠, 112–17; 與毛, 8, 102, 278, 314, 315, 344; 與毛澤東思想, 335, 336, 337–38; 軍事化, 16, 19; 與國民黨, 3–4, 15, 19, 22, 23, 27, 31, 41, 42, 43, 44, 45, 68, 100; 與朝鮮, 130; 組織架構, xi, 6, 8, 23, 100–122, 102; 與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 302–3, 343; 勝利後的地位, 100–101; 宣傳部, 186, 193, 199, 202; 內部迫害, 25, 27–28, 120, 136, 159, 200–201; 重建, 14, 293, 294, 304, 318; 與整風運動, 28–29, 31; 與紅衛兵派系, 223, 229; 與秘密部門, 67; 在農村地區, 15, 20, 24, 51–53, 52, 61, 100, 103–104, 106; 密秘服務, 29; 書記處, 193, 203, 211;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89–93; 與蘇聯模式, 80–81, 82; 斯大林化, 25; 學生攻擊, 207–13; 斯大林, 104–6; 在城市, 43, 61–62, 100, 103, 104, 106; 與前蘇聯, 6–7, 15–16, 25, 100; 與工人造反派, 232, 234, 236; 在延安, 6–7, 16, 19, 25, 27–31, 34, 38, 120. 另參見官僚主義；幹部；共產黨政治局
- 共產黨軍隊. 參見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紅軍
- 共產黨黨員, 15, 100–101, 270; 與階級劃分, 107, 108, 110, 112; 鄧小平的意見, 303; 與黨紀, xi, 24–25, 38–39, 120; 與教育, 112–13; 與精英, 8, 104, 108; 與百花齊放, 142, 144; 動機, 8, 116, 120–21; 由農民組成, 103, 104; 與政治互動, 115–16, 117; 招募, 106–8, 117; 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6, 297
- 列夫·托洛茨基, 26
- 匈牙利, 331, 342; 與去斯大林化, 127, 128; 與百花齊放, 138, 139, 144; 蘇聯模式, 98, 128; 暴動在, 131, 132–34
- 印尼, 321, 322, 324, 330, 331, 332, 33

- 印度：經濟，321, 322, 324, 325, 326, 332, 333；收入不平等，330, 331, 332；與西藏，36, 37
- 回族，37
- 地主，72, 110；與清隊，274；與集體化，53；與大躍進，168, 169；與土改，45, 47, 50, 51；毛，41, 42
- 地派，258–59, 261
- 地院東方紅，219–20, 221, 228, 229
- 地質部，219–20, 221
- 安徽，164, 251, 253
- 托洛茨基主義，28, 29
- 朱成昭，228–29
- 朱德，21
- 江西蘇維埃，15, 20, 25, 28, 45
- 江青，28；逮捕，1, 312；與清隊運動，274；批判，306, 307；與文革，199, 203, 204, 214, 215, 227, 253, 261；與文藝界，196；與清明節抗議，309–10；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301；有關暴力，217
- 江蘇：與反五一六運動，284–85；攻擊軍隊，251, 252；文革在，240, 241, 245, 246；百花齊放在，148；軍管在，253, 258, 266, 267；革委會在，255–57, 285；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297–98
- 江蘇黨委，240, 245
- 百花齊放（1957），9, 10, 135–48；批判，148–51；與共產黨，139–48, 149, 210；與集體化，147–48, 315；vs. 與文革，210–11；與知識分子，75, 140–41, 142；與毛，137, 138, 139, 145–46, 150, 339；關門整風 vs. 閉門整風，137–39, 146, 148, 149, 150, 205；大眾反應，139–48；與糾正大躍進錯誤，185, 186, 187；與蘇聯模式，140, 143, 210, 211；在大學，143–47；與工人，140, 142, 147, 148, 315
- 百萬雄師，248, 249–50
- 米丘林，74–76
- 考試：科舉，48；高考，207, 267–68, 269
- 自行車，85, 93, 96, 117, 328, 331
- 自殺，135, 146, 165；與清隊運動，272–74；與文革，189, 198, 199, 200, 211, 216, 263；與社會主義轉型，47, 72, 76
- 西藏，19, 36, 37, 52
- 住房，14, 85；與工業化，86, 324；與生活標準，327, 329；與黨員身份，101, 118；配給，95–96；與蘇聯模式，233；與國有企業，90–91, 92–93；城市，356n25
- 佛教，67
- 吳晗，187–88
- 宋教仁，3
- 戒嚴，5, 126, 133, 260, 343
- 批林批孔運動，295–301
- 批林運動，289–93, 295, 296
- 批鬥會，305；與清隊運動，273；在文革中，236, 259, 264；在黑龍江，239；與毛澤東思想，336；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301
- 批評／自我批評：在文革，193, 198, 247, 249；與大躍進，156, 162, 181；與知識分子，71–72, 73；與軍官，264, 290；與革委會，255, 256。另參見批鬥會
- 抗美援朝，73
- 折磨，24, 25, 300；在清隊運動中，273, 277；在文革中，205, 252, 259；在大躍進中，164, 165；赫魯曉夫，129；在土改中，33, 47；與軍事控制，5, 263, 272, 273, 274, 277；在整風運動，29–30, 197；在三反運動中，76
- 李一哲，299
- 李正天，299
- 李立三，70
- 李懷印，59
- 杜月笙，68
- 汪東興，198
- 私人慈善，64, 77
- 私有行業，76–77, 93, 181, 329–30, 342
- 貝利亞，127, 128
- 貝魯特，130, 131
- 赤衛隊，234, 235, 236, 237
- 辛亥革命，3
- 周恩來：於抗日，21；與反復舊主義運動，306；在內戰中，35；關於集體化，55；

- 與文革, 13, 198, 204, 218–19, 221, 227, 228, 240–42, 246, 253, 255–57, 261, 294; 逝世, 305; vs. 鄧小平, 302; 葬禮, 306–07; 與大躍進, 154, 155, 156, 169, 181, 182, 184; 在林彪事件之後, 288; 與毛, 11, 295, 318; 與西城糾察隊, 218–19, 220, 223–24, 227–29; 在清明節抗議, 13, 305–310, 311; 在整風運動, 30; 與紅衛兵, 218–19, 221, 227, 228; 與革委會, 255, 256, 257; 與工人造反派, 231, 232; 與武漢事件, 249  
 周培源, 73–74  
 孟加拉, 323–24, 333  
 宗教: 與私人慈善, 77; 鎮壓, 53, 65, 66–67, 80; 傳統的, 59. 另參見佛教; 天主教堂; 道教; 新教教堂  
 官僚體系: 與易貨貿易, 88; 與共產黨, xii, 2, 27, 40, 100, 123; 與內戰, 16, 27; 與階級劃分, 108; 與文革, 122, 200, 201, 202–5, 285, 320; 與去斯大林化, 121, 127; 與經濟, 81, 98–99, 123, 340; 與就業, 63, 79; 與大躍進, 156, 158–69, 174; 與土改, 263, 270–71; 與毛, 8–9, 81, 121, 340; 與毛澤東思想, 335, 339, 340–41; 軍事化的, 39; 國民黨, 80; 農村, 56–57, 59, 158–59; 自欺欺人的, 159–62; 蘇聯模式, 80, 81, 120–21, 123, 174, 201, 340; 傳統, 48, 79, 80; 城市, 62, 63, 78–81  
 居民委員會, 78, 96  
 延安, 6–7, 19, 197; 在內戰中, 16, 33, 34, 38; 蕭反在, 25, 27–28, 120; 在整風運動, 25, 27–31  
 拉伊克·拉斯洛, 132  
 拉科西, 127, 132  
 拉馬克, 74  
 明朝, 36  
 易貨貿易, 88–89, 93  
 服務業, 62, 63, 85, 329–30  
 杭州, 65, 199, 303, 306; 文革在, 248, 252; 與清明節抗議, 308, 311;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在, 296–97, 301  
 東風派, 247, 251–52, 275  
 東德, 104, 125, 126, 147, 331  
 東歐: 與中國, 80, 83; 共產主義解體在歐洲, 343; 經濟, 97, 154, 186, 325, 326; 與大躍進, 157; 收入不平等, 331; 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128–29, 130, 151; 後斯大林時代, 125–28; 暴動在, 136, 148  
 林希翎(程海果), 143–44  
 林彪: 死亡之後, 5, 286, 288–89, 290, 318, 320; 被運動, 13, 288, 289–93, 295–302; 在內戰中, 31–32, 34, 35, 197; 與文革, 196, 197, 198, 204, 261, 287, 293–94; 死亡, 5, 13, 286, 287, 289, 306; 與毛, 12–13, 197, 198, 244, 278, 287–88; 與解放軍, 197, 242, 287, 289–90; 陰謀, 12–13, 312; 與清明節抗議, 308; 與糾正大躍進錯誤, 183; 與周恩來, 296  
 林彪體系, 299–300  
 武漢, 247–49, 284, 306  
 武漢事件(1967年7月), 249–51, 253  
 武漢軍區, 248, 249, 250  
 河南, 158, 168, 169, 271; 大饑荒在, 334; 暴力在, 243  
 波蘭, 331, 342; 去斯大林化在, 127, 128, 130, 131; 與百花齊放, 144; 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130; 暴動在, 131–32, 133, 147  
 知識分子: 與反右運動, 149, 150; 攻擊, 29, 62, 71–75, 124, 134; 共產黨控制, 123; 與共產黨黨員, 108; 與階級劃分, 109, 110; 批評/自我批評, 71–72, 73; 與去斯大林化, 127; 與百花齊放, 75, 140–41, 142; 與勞動改造, 269, 270–71; 與毛, 336, 344; 在波蘭, 131; 與糾正大躍進錯誤, 180, 181, 182, 185–88; 在城市地區, 61; 與蘇聯, 72–75; 在延安, 27  
 社區組織, 64, 79, 96–97, 104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89–93, 234, 277; 和文革, 208, 209; 與毛澤東思想, 337

- 社會主義教條, 134, 186  
 社會主義經濟, 82–99; 與反右運動, 150,  
 151; 與官僚體系, 81, 98–99; 與消費緊  
 缩, 94–97; 蕭條, 13–14, 176, 178–79,  
 181; 與去斯大林化, 127–28; 破壞,  
 301–2; 出口導向, 14; 缺陷, 97–99;  
 GDP, 321–26; 與大躍進, 97, 99, 159,  
 164–65, 167, 168, 178–79, 183–84,  
 186, 316, 320–22, 326, 328; 增長,  
 83–86, 91; 團積, 88–89, 90, 98, 159,  
 164–65, 167, 168, 182; 收入不平等,  
 330–32; 毛時代, 315, 319–26; 與毛澤  
 東思想, 338, 339; vs. 市場經濟, xii,  
 89; 市場機制在, 89, 98, 99, 186, 304;  
 與大眾動員, 79, 98–99, 151; 與政治忠  
 誠, 155; 價格控制在, 86, 94–95; 生產  
 性投資 vs. 非生產性投資, 84–86, 94;  
 恢復, 185, 302–5, 304, 318; 改革, 302,  
 311, 325, 341–43; 資源限制, 89–91,  
 173, 176; 科學管理, 97–98, 99; 斯大林  
 關於, 55; 與工人造反派, 235, 另參見  
 蘇聯經濟模式  
 社會主義轉型: 與去斯大林化, 127–28,  
 136; 在東歐, 125; 經濟, xii, 61,  
 148–49; 工業, 54, 61, 79, 125, 153  
 社會結構: 與幹部, 59, 117–19; 共產黨控  
 制, 123; 與集體化, 56–59; 不平等在,  
 xiii, 7, 331–32; 與土改, 45–49; 毛在,  
 41; 傳統農業, xii, 7, 40–45  
 金日成, 130  
 金融行業, 84, 86, 87  
 長征, 15  
 長春(滿洲), 35  
 青海, 243  
 青幫, 68  
 俄國, 83. 另參見蘇聯  
 保加利亞, 125–26, 331  
 前線(雜誌), 187  
 南京: 與反五一六運動, 285; 與反復舊主  
 義運動, 306; 在文革中, 240, 245–46,  
 247, 248, 256; 文革在, 243; 日軍大屠  
 殺, 20; 軍管, 245–46, 258, 266–67; 國  
 民黨在, 20, 23, 24, 35; 市委, 191–92,  
 234; 抗議運動, 144, 146, 147; 與清明  
 節抗議, 307, 308, 309, 311; 在第二次  
 文化大革命, 297–99, 301  
 南京大學, 209, 307  
 南京軍區, 238, 241, 246, 252, 298  
 南清村(廣東), 49  
 南斯拉夫, 98, 127, 128, 134, 138, 143, 144,  
 331  
 城市地區: 下放, 235, 269–70, 284; 官僚  
 體系在, 62, 63, 78–81; 幹部在, 61,  
 63, 270; 鎮壓反革命運動在, 62, 64,  
 65–66; 共產黨在, 43, 61–62, 100, 103,  
 104, 106; 在內戰中, 34; 階級劃分在,  
 109–10, 112; 犯罪在, 63–64; 在文革  
 中, 235–36; 大躍進在, 171, 173, 184;  
 戶口制度在, 64, 77–78, 234; 與百花齊  
 放, 140; 生活標準, 54, 94–97, 327–30,  
 331; 與毛的遺產, 315; 遷移到, 57,  
 77, 78, 332; 與國民黨, 24; 人口, 176;  
 被下放者返回, 298–99; 革命在, 38,  
 61–81; 與農村集體化, 57–58; 社會結  
 構, 7, 77;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89;  
 監視系統在, 105; 單位制在, 92–94  
 城市精英, 7, 77  
 姚文元, 1, 196, 203, 237, 238, 312  
 威廉·辛頓, 46–47, 52  
 宣傳隊, 269, 304; 與清隊, 274; 與毛崇拜,  
 279–80; 與軍管, 264, 267; 與造反派,  
 261, 262, 263, 265  
 思想改造運動, 62, 71, 75, 124, 211, 264,  
 268  
 政府: 在文革, 4–5, 233–36; 地方, 45–49,  
 52, 233–36; 共產黨控制, 101–4; 傳統,  
 48. 另參見官僚體系  
 政治局, 101–2; 與文革, 202; 與林彪, 290;  
 濟進派在, 306, 307–8, 309–10, 312; 與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301; 常委, 1, 102,  
 166, 202, 204, 217; 與周恩來, 295  
 政治精英: 與共產黨, 8, 104, 108; 與階級劃  
 分, 109; 在毛澤東思想, 336, 339; 特  
 權, 118. 另參見中國共產黨, 精英會

- 員，傳統農業，59, 114–15; 破壞，7, 40, 80; 與土改，41–42, 45, 46, 60; 與地方政府，48
- 柏林牆，125
- 派系：在林彪事件之後，288–89, 290; 與毛澤東思想，338; 與毛的遺產，315; 在國民黨，23, 31; 與清明節抗議，311; 在紅衛兵中，209, 212–13, 215, 218–22, 223, 229, 230, 317; 在學生中，212–13; 鎮壓，302, 303, 304; 在工人中，233–36, 237, 238–39; 與武漢事件，250
- 科學：毛有關，338; 限制，140, 185, 187, 315; 復興，186, 304–5, 333–34; 社會主義，72, 74–75, 121, 279. 另參見專家
- 紀登奎，292
- 紅軍：與階級劃分，101, 110; 與傳統戰爭，7, 16, 18–20; 與土改，46–47; 與長征，15. 另參見解放軍
- 紅革會，238, 245
- 紅旗（雜誌），198, 202–3, 222, 226, 250
- 紅旗派，247, 251–52, 275, 299
- 紅衛兵：與反五一六運動，284; 在北京，206, 223, 229–30, 235; 與中央文革小組，205–7, 220–30, 231; 控制，201–2; 異見者，206, 224–29, 230, 235; 結束，229–30, 261–62; 派系，209, 212–13, 215, 218–22, 223, 229, 230, 317; 在黑龍江，239; 在中學，213–19, 221, 224; 在林彪事件之後，13, 286, 287, 291; 與毛，4, 11, 205, 207, 208, 221, 222–24, 225, 228, 229, 231, 336; 群眾動員，332; 與媒體，11, 207, 216, 230; 與軍管，263, 264; 抗議，13, 225, 286, 299, 300, 306; 與公安部員警，207, 218, 221, 227; 與清明節抗議，13, 306, 307; 紀念品，344; 超出預期的結果，277; 在大學，207–13; 暴力，215–19, 220, 223, 224; 與工人造反派，231–32
- 紅寶書，197, 287, 294
- 美國：與中國內戰，34; 經濟，83, 178, 320, 331; 與大躍進目標，156; 與百花齊放，140; 與知識分子，71, 73, 74;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130; 在朝鮮站在，123; 與中國私人慈善，77; 配給，95; 與紅衛兵異見者，228; 與科學，75; 與西藏，37; 與蘇聯，153, 194; 與周恩來，295
- 胡風，128, 134
- 胡風反革命集團，134, 137, 142, 143
- 胡喬木，182
- 胡適，72
- 英國，71, 73, 95, 154, 156; 經濟，331; 與西藏，36, 37
- 計劃生育運動，79
- 軍管會，263, 271, 272, 278, 286
- 軍閥，22, 32, 42
- 重慶，3, 15, 20, 35, 251
- 革委會，266–67, 283, 316; 與反五一六運動，284; 與攻擊軍隊，252; 下放，270; 在北京，230, 259, 260, 262, 264, 318; 與中央文革小組，243–44, 255; 與清隊運動，271, 272, 274–77; 與死亡人數，334; 結束，294; 在江蘇，255–57, 285; 在林彪事件之後，288; 與毛，255, 256, 280; 與軍管，263, 265; 與解放軍，230, 242, 243, 318; 與奪權，239, 240; 在上海，237, 318
- 韋國清，257
- 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218–19, 220, 223–24, 227, 228, 229
- 香港，49, 72, 342; GDP, 322, 325
- 個人崇拜：對於蔣介石，26; 與去斯大林化，9, 127, 128, 137, 194, 195; 在東歐，125; 對於金日成，130; 與中蘇分裂，194; 對於斯大林，9, 26. 另參見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 個人檔案，63, 94, 104, 105, 116, 135; 與黨員身份，107; 與階級劃分，109–10
- 員警。參見公安員警
- 哥特瓦爾德，126
- 孫中山，3
- 孫治方，98, 186
- 徐州，303; 鐵路局，303
- 徐懋庸，141

- 旅遊, 63, 79–80, 94, 118. 另參見農村－城市遷移
- 核武器, 194
- 泰國, 321, 322, 331
- 浙江, 71, 148, 252, 303. 另參見杭州
- 浙江大學, 71–72, 308
- 浙江軍區, 252
- 消費品, 85, 93, 94–96, 154, 233, 236, 322; 配給, 14, 328. 另參見生活標準
- 烏克蘭, 56, 334
- 烏蘭夫, 272
- 特羅菲姆·李森科, 74–75
- 秘密報告(赫魯曉夫; 1956), 128–30, 193; 與東歐, 125, 128–29, 130, 132, 151; 與百花齊放, 142–44; 與毛, 11, 135, 136, 149–50, 184, 338–39; 發表, 130
- 秘密結社: 與工會, 68–69; 毛有關, 41; 鎮壓, 53, 65, 66–68, 80; 傳統的, 60
- 秦始皇, 145, 292, 293
- 納吉·伊姆雷, 127, 132
- 紐約時報, 130
- 翁森鶴, 303
- 耿金章, 238
- 袁世凱, 3
- 配給: 與幹部隊伍, 119; 消費品, 14, 328; 在東德, 125; 口糧, 54, 57, 58, 95; 與戶口制度, 77, 78; 住房, 95–96; 收入不平等, 332; 方法, 94–95; 與社區或者政府沒有區別, 79; 城市, 63, 64; 在農村, 95
- 陝西, 19, 267
- 馬克思－列寧主義: 與階級劃分, 108; 與百花齊放, 138, 140, 145; 與知識分子, 71, 72; 在林彪事件之後, 306; 與毛, 25–26, 27, 154, 202; vs. 馬澤東思想, 335, 339; 與後毛時代的改革, 342; vs. 蘇聯修正主義, 195; 關於城市 vs. 農村革命, 38, 41
- 鬥批改運動, 263–64, 266, 271
- 參考消息, 118
- 參考資料, 118
- 國民黨: 與抗擊日軍, 15, 19–24; 於共產黨, 3–4, 15, 19, 22, 23, 27, 31, 41, 42, 43, 44, 45, 68, 100; 在內戰, 3–4, 15, 16, 18, 31–35, 38; 於階級劃分, 111; 與清隊運動, 272, 274; 與合作, 66; 腐敗, 68, 80; 與文革, 205; 派系在, 23, 31; 與青幫, 68; 與大躍進, 168; 與百花齊放, 141; 與工會, 70; 與土改, 41–42, 45, 51; 與毛澤東思想, 335, 336, 337; 軍事, 23–24, 32; 與少數民族, 36–37; 與私人慈善, 77; 在農村地區, 41–42, 45, 51, 61; 與秘密結社, 67;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1; 與斯大林, 37; 與地下黨, 205; 活躍在地下的, 53, 64, 65; 在農村地區, 64; 弱點, 22–24, 31
- 國企: 易貨貿易在, 93; 共產黨黨員在, 103; 國積在, 88–90; 勞動改造在, 271; 與私有部門, 76;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1; 與社會主義產業轉型, 79; 與蘇聯模式, 82, 83; 供給與生產在, 86–91; 暴動在, 147; 作為福利提供者, 91–94
- 國防部, 219–20, 221
- 國家統計局, 162
- 國務院, 198, 218, 219, 223, 228
- 基督教, 60, 67. 另參見天主教堂
- 婚姻, 79, 94, 96, 112
- 婦女: 作為黨員, 107; 與階級劃分, 112; 與忠字舞, 281; 在農村地區, 270; 在賣淫, 69; 對婦女的暴力, 211; 在延安, 28
- 專家: 與階級劃分, 109, 110; 經濟, 322, 327; 海外, 72–73, 343; 與大躍進, 154, 155, 174–75, 180, 185, 320; 林彪事件之後, 288; 與毛, 99, 279, 321, 338, 340; 職業的, 109, 110, 117, 121, 137, 142; 平反, 182, 302, 343
- 康生, 202; 與清隊運動, 273–74; 與文革, 197, 198, 199, 203, 204, 208, 215, 227, 261; 與去史達林化, 137; 與整風運動, 29, 30; 與中蘇分裂, 194–95;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2, 193
- 張春橋, 1, 12, 308, 309; 被捕, 312; 與文革, 196, 203, 222, 232, 253; 與一月革命,

- 237–38, 239; 與清明節抗議, 309–10  
 戚本禹, 203, 225  
 捷克斯洛伐克, 126, 147, 331  
 教育: 與共產黨, 101, 108, 123; 與階級劃分, 108, 109; 與文革, 215; 對鄧小平的恢復, 302, 305; 外國的, 211; 與百花齊放, 140, 142; 與機會, 116; 與政治活動, 116; 與政治忠誠, 112–14; 與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 343; 在單位中, 92, 117. 另參見中學; 學生; 大學  
 梅德韋傑夫, 74  
 清明節抗議(1976), 13, 305–10; 之後, 310–14  
 清洗反革命集團運動(1955), 135, 137  
 清理階級隊伍, 12, 271–77, 318; 批評, 294, 300; 死亡率, 275, 276, 277, 334; 與毛崇拜, 281–82; 與毛澤東思想, 341; 與一打三反運動, 283–84  
 清朝, 2–3, 36, 123  
 清華大學, 258–59, 260, 265, 269; 毛崇拜在, 280  
 清華附中, 114–15, 214, 215, 216–17, 225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5–302, 303, 318  
 第二次鄭州會議(1959), 163  
 第四機械工業部, 234  
 統一戰線(1925–1927), 15, 19, 41, 42, 43  
 許世友, 241, 251, 252, 285, 298; 與軍管, 253, 266, 267; 與革委會, 256, 257  
 牽毒, 7, 69, 80  
 造反派, 4–5, 11, 12, 13; 與反五一六運動, 284, 285; 四二二, 257, 258; 在北京, 258–62; 與反復舊主義運動, 306; 與中央文革小組, 245, 246, 247, 249, 259, 317; 與清隊運動, 274, 275–76; 地派, 258–59, 261; 東風派, 247, 251–52, 275; 天派, 258–59, 261; 在林彪事件之後, 288–89; 與毛, 260–61, 317–18; 與軍管, 263–66; 百萬雄師, 248, 249–50; 與一打三反運動, 283; 與解放軍, 242–49, 257–58, 261; 紅旗派, 247, 251–52, 275, 299; vs. 紅衛兵, 223; 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 296, 297–98, 301; 鎮壓, 263–67; 聯指, 257, 258; 與暴力, 245–49, 259–61; 與武器, 251, 253–55, 275, 317, 334; 與工人, 259, 261, 263, 317  
 陳一陽, 299  
 陳再道, 247–48, 249, 250–51  
 陳伯達: 與中央文革小組, 202, 203; 與文革, 197–98, 199, 222–23, 261; 在林彪事件之後, 290; 與毛澤東思想, 26–27, 197, 290  
 陳雲, 154, 156, 319  
 陸平, 193  
 陸定一, 198, 199  
 勞改: 與鎮壓反革命運動, 65, 66; 批評, 291, 294; 與文革, 263, 265, 267, 269, 270–71; 與百花齊放, 148; 與政治運動, 135, 150; 在農村地區, 267, 269; 在蘇聯, 127  
 單位制, 79–80; 與幹部隊伍, 118; 與教育, 92, 117; 與住房, 95–97; 與身份認同, 94; 與住宿標準, 93–94, 327; 與服務, 92–94, 330; 與監查, 104  
 就業: 官僚化, 63, 79; 與階級劃分, 108; 共產黨控制, 101; 與政治活動, 116; 與造反派頭頭, 268–69; 在國有企業, 90, 91, 92  
 彭沖, 257  
 彭佩雲, 193  
 彭真, 137, 187, 193; 與文革, 198–99; 與百花齊放, 139  
 彭湃, 41  
 彭德懷, 10, 180, 183, 197; 與大躍進, 166, 167; 與毛, 188, 198  
 揚子江機械廠, 191–92, 234  
 斯大林: 與共產黨, 6–7, 25; 與中國內戰, 21, 31, 35; 與階級劃分, 109; 與集體化, 54–55; 逝世, 124; 與經濟, 154; 與遺傳學, 74–75; 與大躍進, 316; 與百花齊放, 143, 144; 與土改, 42; 與毛, 129, 136, 149, 166, 184–85, 292; 與少數民族, 37; 個人崇拜, 9, 26; 被清除, 27, 134, 135; 被指控, 9, 11, 125,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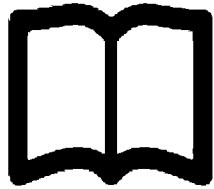
- 184, 193. 另參見秘密報告
- 斯大林主義：譴責，127, 132, 138；與百花齊放，138, 210；與毛，82, 84, 135, 316；與毛澤東思想，335, 337, 338, 339；與迫害，27–31. 另參見去斯大林主義；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
- 斯里蘭卡，322, 330, 331
- 朝鮮，130
- 朝鮮戰爭（1950–1953），52, 64, 67, 73, 82, 123
- 游擊戰，7, 16–21
- 湖北，258, 271
- 湖南，3, 43, 183, 265
- 程海果（林希翎），143–44
- 華沙，131, 133
- 華國鋒，1, 305, 311, 312, 313, 319
- 菲律賓，321, 322, 330, 331
- 貴州，52–53, 66, 240
- 貿易協會。參見工會
- 貿易政策，14, 173, 304
- 越南，17, 257
- 開門整風 vs. 閉門整風，137–39, 146, 148, 149, 150, 205
- 階級鬥爭：與反右運動，150, 151；與資本主義，26, 72, 228；與階級劃分，109；與共產主義勝利，17–18；與去斯大林化，127, 137；在東德，125；與大躍進，152, 153, 155, 163, 166, 167, 168, 180, 181；與百花齊放，139, 144；與知識分子，185；與土改，17, 40–45, 61；毛關於，42–43, 188；在毛澤東思想，335, 336–37, 339, 340, 341；黨內，26, 188；在後斯大林時代的前蘇聯，121；與科學，72, 74–75；與中蘇分裂，194；社會主義下，6, 151, 181, 189, 337；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89, 191, 193；與社會主義轉型，148–49
- 階級標籤：與反右運動，150–51；劃分，108–12, 113, 357n4；與共產黨黨員，107, 108, 110, 112；與清隊運動，274；與大學招生，269；對聯上，215；在文革裏，210, 215–17, 223；與性別，112；與大躍進，169, 181；與百花齊放，145；世襲，111, 113；與土改，47, 49；vs. 精英，113–15；與機會，112–17；與懲罰，270, 298；與整風運動，29；與紅衛兵，227, 229；註冊登記，63
- 雅諾什·科爾奈，89
- 集體化，7, 53–60, 86, 123–24；與農村合作社，54, 55, 93；負債勞動力，57；與大躍進，153, 154, 156, 157–58, 163, 180, 181；與戶口制度，77；與百花齊放，147–48, 315；與工業，57–58；與土改，53, 56, 123；與生活標準，58–59, 333；製造業的，62, 63；與毛，54–55, 188；與毛澤東思想，338；與公社組織，56–57；與農民，40, 53, 57, 59；在波蘭，131, 132；與後毛澤東時代改革，343；快速完成，55–56；抵制，9, 56；與農村經濟，56–59, 60；服務業，62, 63；與社會結構，56–59；蘇聯，129, 178, 334；與政府採購系統，57–60
- 雲南，52, 258
- 馮雪峰，134
- 黑市，57. 另參見易貨貿易
- 黑龍江，241；文革在，239, 240, 242, 243
- 傳統經濟：與集體化，56–59, 60；通脹，32, 34, 70；與土改，49–51；農村，53, 56–59, 60；社會主義轉型，xii, 61, 148–49；城市，61, 62, 79
- 奧哈布，131
- 幹部：被虐待，47；與反右運動，149；在內戰，27, 33–34；階級背景，29；與集體化，55, 56, 59；與文革，200, 291；與林彪之死，286；vs. 專家，174–75；在大躍進，152, 155–56, 158–59, 161, 164–65, 168–69, 174–75；與百花齊放，138, 139–40, 141, 147–48, 205；與信息，118–19；與工會，70；與土改，33；在林彪事件之後，288；與毛澤東思想，336；與黨紀，xi, 24–25, 38–39；與政治運動，52, 271, 274, 306；特權，59, 117–19；迫害，25, 27–28, 120, 136, 159；與清明節抗議，311；等級系

- 統, 117–19; 與整風運動, 28, 29, 120, 135, 137, 193, 197, 199, 203, 337; 平反, 293–95, 296; 與秘密教門, 67; 限制, 119–20; 革命, 101, 113, 115; 農村, 51–52, 59, 61, 168–69; 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7–98; vs. 祕密結社, 68–69;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89–90, 191; 在大學, 210; 城市, 61, 63, 270; 在蘇聯, 25, 26, 27
- 新加坡, 322, 342
- 新四軍, 20–21, 22
- 新教教堂, 64
- 新華社, 118, 206, 312
- 新疆, 19, 36, 37, 243
- 楊尚昆, 198, 199
- 楊開慧, 307
- 楊慶堃, 48–49
- 極左分子: 批鬥, 265, 284, 318; 批判, 288, 293, 295, 296
- 經濟特區, 343
- 群眾抗議, xiii; 與文革, 5, 11, 13, 318; 與林彪之死, 286; 在東歐, 126; 與百花齊放, 9; 在林彪事件之後, 289, 293; 有關生活標準, 233, 234–35, 286, 289, 300, 317; 在南京, 144, 146, 147; 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 296, 297–98, 301; 在江南門廣場, 13, 293, 309–10, 343。另參見清明節抗議
- 群眾動員: 反對官僚, 122, 285; 在內戰中, 16, 31, 33–34, 39, 151, 179, 201; 傳統戰爭, 7, 18–19, 33–34, 83; 在文革中, 201, 205–13, 232–33, 316, 332; 在大躍進中, 154, 155, 167, 173–74, 179, 316; 與毛, 39, 320, 338; 在農村地區, 46; 與社會主義經濟, 79, 98–99, 151;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89; 在城市地區, 62, 64
- 義和拳, 2
- 葉群, 204
- 解放軍: 與四六指示, 246, 247; 攻擊, 250–52; 與鎮壓反革命運動 65; 與中央文革小組, 243–44; 在內戰中, 31–35; vs. 民事控制, 293–302, 304; 在文革中, 4, 12, 198, 220, 235, 242–49, 257–58, 261, 316; 與死亡總數, 334; 在黑龍江, 239; 在一月革命, 238; 與江青, 196; 與土改, 40–41; 在林彪事件之後, 288; 與林彪, 197, 242, 287, 289–90; 與毛, 198, 242, 243–44, 245, 289–90, 302; 群眾動員, 18–19, 31, 33–34, 80; 軍管, 263–86, 317; 動機 vs. 武器, 197; 與政治運動, 282–83; 與奪權, 240, 241, 242–45, 246; 與造反派, 242–49, 257–58, 261; 與紅衛兵, 207, 218, 221; 與革委會, 230, 318; 在農村地區, 52, 61; 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8; 奪權, 100; 在城市地區, 62, 63; 與武漢事件, 249–51
- 解放軍報, 206
- 資本主義: 與階級鬥爭, 26, 72, 228; 全球化, xii, 18, 342; 與毛, 8, 11, 188, 338, 340, 341; 市場導向政府, 344; 與科學, 75, 99; 與社會主義經濟, 89, 91, 99, 186, 322; 斯大林關於, 55; 在蘇聯, 194, 195; 缺陷, 83, 84, 85, 90
- 農民: 作為債務勞動力, 57; 作為共產黨黨員, 103, 104; 階級劃分, 109, 110; 與集體化, 40, 53, 57, 59; 與文革, 291; 與大躍進, 154, 162, 186; 於百花齊放, 147–48; 與土改, 50, 60; 毛有關, 41, 43; 與軍管, 266; 民族主義, 17; 與革命, 40–45; 傳統精神, 17; vs. 城市工人, 61. 另參見農業; 農村地區
- 農村—城市遷移, 57, 77, 78, 332
- 農村市場, 53, 182, 333
- 農村地區: 與反右運動, 149; 武裝力量在, 60; 下放, 235, 269–70, 284;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 52–53; 共產黨在, 15, 20, 24, 51–53, 61, 100, 103, 104, 106; 共產黨黨員在, 103, 104, 106; 內戰在, 18, 32, 33, 38, 53; 與階級劃分, 112; 與共產黨勝利, 16–17; 文革在, 232; 口糧配給在, 54, 57, 58, 95; 百花齊放在, 148; 工業在, 174, 178; 勞改在, 267,

- 269; 與毛的遺產, 315; 遷移, 57, 77, 78, 332; 軍管, 51–53; 國民黨在, 24; 與一打三反運動, 283; 人口總數, 176; 貧困在, 331, 332–33; 難民, 173; 下放者回來, 298–99; 革命在, 38, 40–60, 61–62; 社會結構在, 7, 40–45;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89; 暴力在, 258. 另參見農業; 集體化; 大躍進; 土改
- 農業: 與去斯大林化, 136, 137; 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被用於, 158, 160, 174; 與糧食出口, 173; 與糧食採購, 53, 171, 172, 322; 與糧食生產, 154, 157–60, 163–64, 170–74, 332, 333; 與糧食配給, 54, 57, 58, 95; 與大躍進, 153, 154–55, 157–61, 170–71, 178, 316; 與收入不平等, 331–32; 與毛澤東思想, 338; 方法, 160–61; 自留地, 182, 184, 188; 與糾正大躍進錯誤, 180, 181, 183, 184; 與社會主義經濟, 86, 321, 322, 332, 333; 國家控制, 56–60; 有關統計, 170–71; 生活水準, 8, 14, 58, 333; 目標, 154–55. 另參見集體化; 農民; 農村地區
- 道教, 67
- 達爾文, 74
- 達賴喇嘛, 37
- 奪權, 239–42, 317; 與解放軍, 240, 241, 242–45, 246; 在第二個文革中, 296; 與周恩來, 241, 242, 246
- 寧夏回族自治區, 265
- 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277–82, 319; 與陳伯達, 26, 197; 與清隊運動, 281–82; 與去斯大林化, 9, 127, 128, 137, 194, 195; 與百花齊放, 9, 135, 136, 137, 143, 144, 210; 與林彪, 13, 286, 292; 忠字舞, 12, 281; 在毛澤東思想, 124, 278, 337–38, 339, 340; 在軍管下, 263; 與糾正大躍進, 187; 與反對文化大革命, 285; 儀式, 12, 278–82, 294, 300; 與中蘇分裂, 194
- 廖沫沙, 187
- 滿洲里(東三省), 36, 62; 在內戰中, 4, 15–16, 19, 31–32, 33, 34; 傳統戰爭在, 83; 日本侵華, 3; 群眾動員在, 98; 國民黨在, 3, 22
- 漢族, 36, 37
- 監視, 104–6
- 維吾爾, 37
- 腐敗, 59, 119, 159; 攻擊, 62, 76–77, 80; 與毛的遺產, 344; 國民黨, 68, 80; 與一打三反運動, 283;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89, 190, 191
- 蒙古, 36, 37; 飛機墜毀在, 286, 289. 另參見內蒙古
- 蒯大富, 222, 230, 258, 259, 260, 261, 265
- 裴多菲俱樂部, 132
- 製造業: 集體化, 62, 63; 家庭生產, 58, 343. 另參見工業
- 赫魯曉夫, 9, 10, 11, 127, 128, 195, 320; 批判斯大林, 128–30, 135–36, 185; 與匈牙利, 131, 133; 與毛, 153–54, 292, 339; 與朝鮮, 130; 與波蘭, 131, 132; 趕下台, 190;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0. 另參見秘密報告
- 趙紫陽, 242, 300
- 價格控制, 86, 94–95
- 劉少奇: 與反右運動, 151; 與內戰, 35; 與清隊運動, 274; 集體化, 55; 與文革, 196, 199, 200, 204, 209, 212, 222, 223, 228, 262; 逝世, 13, 294; 降級, 223; 與去斯大林化, 137, 138; 與大躍進, 10, 181, 182–84, 185; 與百花齊放, 138; 與毛, 10, 11, 182–83; 與黨員的紀律, 23;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89–90, 191, 192, 337
- 廣州, 146, 298; 文革在, 243, 246–47, 248, 251–52; 國民黨在, 35; 第二個文革在, 299, 301
- 廣西, 21; 文革在, 257–58, 267
- 廣東, 271; 清隊運動在, 275; 文革在, 241–42, 258; 在大躍進中, 164; 社會主義轉型在, 49, 148
- 德國, 7, 31, 74, 83. 另參見東德格羅·埃諾, 132, 133

- 暴力：與清隊運動，272, 275；與集體化，55；在文革中，210–11, 212, 240；派系的，245–49, 259–61；在大躍進，162, 164–65；在河南，243；在土改，33, 46, 47, 50–51, 52, 211；毛有關，43–44, 217, 224, 228, 335–36；與軍管，243, 266, 268；反對，224, 225–26；與造反派，245–49, 259–61；紅衛兵，215–19, 220, 223–29；在革命中，43–45；在第二文化大革命中，297；在大學，210, 211；在城市地區，62；與武器，253–55；針對婦女，211。另參見折磨
- 潘復生，239, 242
- 蔣介石：1927年清洗共產黨，3, 15, 22, 44, 45, 68；有關共產黨黨紀，23–24；在內戰中，16, 31, 32, 33, 34, 35；與青幫，68；與日本侵華，19, 20, 22–24；與土改，41, 51；毛關於，313；與少數民族，36–37；個人崇拜，26；在台灣，23–24
- 賣淫，7, 62, 69–70, 80
- 鄧子恢，55, 154
- 鄧小平：批判，304–5；運動，306, 307, 311；與政府管控，295；在文革中，200, 203, 204, 209, 212, 223；降職，13；與經濟，302；在百花齊放中，138；與毛，11, 302–5, 312；與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318, 342；與清明節抗議，310–11；與紅衛兵異見者，228；平反，294–95；與糾正大躍進錯誤，182, 184；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3
- 鄧拓，139, 187
- 學生：錄取，305；與反五一六運動，284；與反右運動，149, 150；在北京，258–62；與關閉大學，267–69；在文革中，231, 285, 317；在民主運動中，343；派系在，212–13；中學，213–19, 267, 268, 269–70；與百花齊放，142–48, 315；與一月革命，238；與勞動改造，263, 269–70；毛關於，150；與軍管，266, 267；數量，231；在大學，207–13；與工作組，210–13；與工人造反派，233。另參見紅衛兵
- 整風運動（1942–1944），25, 27–31
- 穆欣，203
- 衛生保健，320–21
- 遼寧，258
- 縫紉機，96, 328
- 聯合國，37
- 聯指，257, 258
- 聯動，225–26, 228
- 聯總，247
- 薄一波，222
- 謝富治，204, 217–18, 227, 249, 250, 274
- 韓國，13, 342；GDP, 322, 324, 325, 326；土地改革在，51, 333
- 韓愛晶，265
- 聶元梓，208–10, 230, 259–61；與清隊，274；與軍管，264–65；與造反派，258；與紅衛兵異見者，226；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2, 193
- 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1951），49, 69, 77, 106, 124, 142；在農村地區，52–53；在城市地區，62, 64, 65–66
- 壟斷機制，71
- 廬山會議（1959），165–67, 178, 183, 185, 187, 197
- 瀘州，251
- 羅瑞卿，198, 199
- 譚厚蘭，265
- 邊境地區，105, 149。另參見少數民族
- 關鋒，203, 284
- 蘇聯：顧問，64；邊界，36；管理制，80, 81, 174；與共產黨，15–16, 100；與中國分裂，11, 82, 97, 193–95；中國幹部在，25, 26, 27；與中國內戰，19, 31, 32, 35；與中國知識分子，72–75；中國宣傳攻勢，194–95, 203；階級劃分在，108–9, 110；與清隊運動，272；共產主義解體，343；集體化，54–55, 57, 59, 124；與文革，10, 13, 205, 228；去斯大林化在，9, 11, 121, 124, 125–28, 151；在東德，126；經濟，89, 91, 97, 325, 326；饑荒，55–56, 124, 334；與大躍進，157；與百花齊放，138, 140, 143；與匈牙利，131,

- 132–34; 收入不平等在, 330, 331; 克格勃, 104, 105; 與土改, 42; 與林彪, 287, 289; 與毛, 99; 與毛澤東思想, 337, 338–39, 341; 與國民黨, 35; 與朝鮮, 130; 與波蘭, 131–32; 與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 342; 迫害 128, 129, 200–201, 205; 配給 95; 發射衛星, 84; 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0; 部分禁止核子試驗條約, 194; 在二戰中, 7, 83. 另參見東歐; 密密報告
-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 25–26, 54, 82, 167, 335, 337
-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 55
- 蘇聯經濟模式, xi, xiii, 6, 26, 99; 蕭條在, 176, 178–79, 181; 與大躍進, 153–57, 180; 與收入不平等, 331–32; 工業, 82–83, 91, 124, 233, 234; 與土改, 53, 123–24; 與生活標準, 7–8, 14, 94–97, 233, 326–27; 資源約束在, 89–91, 173, 176; 成功, 7, 84, 320, 322
- 蘇聯模式: 官僚的, 80, 81, 120–21, 123, 174, 201, 340; 與百花齊放, 140, 143, 210, 211; 與毛, 26, 82, 91, 99, 315, 321, 335, 340, 341; 政治的, 80–81, 82, 84, 104, 105, 140, 143, 210, 211; 修正, 154, 156, 186
- 饑荒: 與內戰, 32, 47; 死亡率, 333–34; 與大躍進, 4, 10, 159, 161–65, 169–73, 178, 181, 182, 184, 316, 320; 在河南(1943), 334; 在蘇聯, 55–56, 124, 334
- 鐵托, 127, 138
- 鐵路: 在抗日戰爭, 20–21; 破壞, 232, 235, 236, 256, 297, 298, 299, 301, 303; 恢復, 299, 303; 安全, 105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毛澤東的判斷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他所認為的問題是體系不可避免的產物，而這個體系正是他所堅持的唯一體系，不可動搖，只能通過回到初始狀態，重新煥發活力。毛澤東的判斷導致中國陷入衝突和毀滅的循環之中。

——魏昂德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press.com](http://www.chinesepress.com)  
HONG KONG, CHINA

